寻找英雄孙永勤

上卷

詹文宏　主编
翟丽芳　编著

在万里长城东段
调查
抗日救国军
悲壮抗战始末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寻找英雄孙永勤

詹文宏 主编
翟丽芳 编著

在万里长城东段
调查
抗日救国军
悲壮抗战始末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英雄孙永勤/詹文宏主编；翟丽芳编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2

ISBN 978-7-202-062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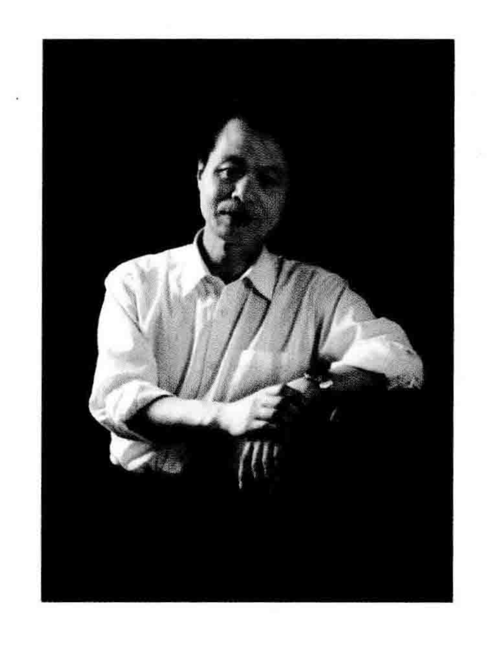
Ⅰ．①寻… Ⅱ．①詹…②翟… Ⅲ．①孙永勤（1898～1935）—传记 Ⅳ．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464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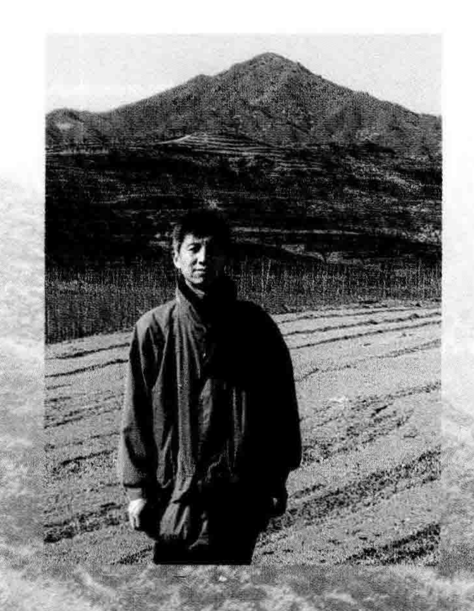
书　　名	寻找英雄孙永勤（上下卷）
主　　编	詹文宏
编　　著	翟丽芳
责任编辑	王　静　赵　蕊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装帧设计	李　华　张巧欣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封面摄影	李耀南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　　张	72.75
字　　数	1 580 000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6213-5/K·1038
定　　价	280.00元（上下卷）

《寻找英雄孙永勤》编委会

主编简介



詹文宏，男，汉族，1956年8月出生，197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毕业。1974年4月下乡知青。曾历任生产队副队长、民兵连长、村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委办公室副科级干事、行署办公室科长、行署研究室副主任、行署农业局副局长、省政府研究室正处级研究员、省领导专职秘书、省政府办公厅人事处长、省政府督查专员（副厅）、省政府参事室主任（正厅）、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河北书画诗词艺术研究院院长、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恢复组建以来，组织参事馆员、有关专家及机关工作人员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大局，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形成了69篇调研报告和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乃至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主编有《河北省公务员艺术创作成果集萃》、《馆员书画精品集》、《文史知识精粹》、《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河北卷》、《燕赵风云六十年》等书，编著《改革的结晶　成功的探索》、《少林佛汉拳》两本著作，此外，发表过长篇小说《冰封雪落霜满天》，创作各类诗歌千余首。



编著者简介

翟丽芳，男，1965年生于河北省三河县。1984年毕业于廊坊师专中文系，1992年毕业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硕士。曾工作于河北廊坊地区教育局、廊坊市电大分校，1992年进入河北电影制片厂工作，任导演。

受作家张纯如事迹震动，2005年起，开始在冀东、冀西长城沿线进行抗日战争专题调查。目前已完成抗日英雄孙永勤、刘耀梅事迹调查（中国大陆范围内的文献搜集与实地采访），基本完成冀东八路军抗战历史调查，发表相关文章四篇，发起、拍摄相关故事片一部、纪录片三部。

谨 以 此 书

献　给

国破家亡时刻

在伪“满洲国”西南“国境”地区

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孙永勤烈士！

献　给

万里长城东段

连绵起伏的群山中

所有为国战斗、牺牲的抗日救国军（民众军）英雄们！

序　一

悲歌慷慨　浩气长存

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　赵　勇

《寻找英雄孙永勤》一书，是河北省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组织专家学者经过五年多不懈努力编成的一部文史研究专著，是目前研究抗日英雄孙永勤的最权威的著作。

孙永勤是冀东长城北侧原热河省的抗日英雄，与杨靖宇、赵尚志在东北组织游击队武装抗日几乎同时，举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大旗，曾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其名字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中与大家熟悉的吉鸿昌、瞿秋白、方志敏并列。宣传他的英雄事迹，歌颂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对弘扬燕赵精神，推动热河与冀东抗战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由河北省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出资拍摄的三集电视纪录片《孙永勤》，在河北电视台六个频道轮番播出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先后获得电视界三个相关奖项，使这一民族英雄再次名声大振，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民族斗志。

在原有材料基础上，河北省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又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深入研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走访了许多知情者，终于形成了长达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寻找英雄孙永勤》，为我省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树碑立传。该书资料全，图片多，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地描述了民族英雄孙永勤伟大光辉的一生，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精品力作。该书的出版在孙永勤的研究历史上具有空前的意义，必将载入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史册。

2012年3月7日

序　二

为民族英雄再立丰碑

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主任（馆长）　詹文宏

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除组织政府参事围绕政府中心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参政咨询外，另有一项重要工作是开展文史研究，特别是对燕赵历史、文化进行研究，修史编志，以史资政。提起燕赵的历史、文化，便不能不说燕赵精神。燕赵精神在近代的一次突出体现是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据我国民政部门统计，抗日战争中，河北仅被定为烈士的就有10万余人，他们以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代价，为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驱赶出中国领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燕赵儿女发扬燕赵精神、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以发生于冀中地区者最为国内广大读者、观众所熟悉，如《小兵张嘎》、《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家喻户晓的作品均取材自冀中军民的英勇抗敌事迹。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日伪占领更早、军政控制更为严密、斗争形势更为残酷的热河与冀东地区，人民的英勇反抗行为却甚少被人关注。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的热河、冀东军民的抗战，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处于被忽视状态，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这年春天，河北电影制片厂翟丽芳、河北电视台影视剧频道陈清华同志将拍摄《孙永勤》纪录片的方案报到了参事室。孙永勤是冀东长城北侧原热河省的抗日英雄，起义时间与杨靖宇、赵尚志在东北组织游击队武装抗日几乎相同，曾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其名字在1935年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中与大家熟悉的吉鸿昌、瞿秋白、方志敏并列。原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对孙永勤一直非常推崇，解放后曾多次请党史和宣传部门调查、宣传他的英雄事迹。歌颂这样一位民族英雄，这对弘扬燕赵精神，推动热河和冀东抗战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我们积极支持了此片的拍摄工作。翟丽芳同志带领摄制组成员冒着酷暑，深入冀东长城南北孙永勤生活与战斗过的地区，采访孙永勤亲属、抗日救国军后代、知情者、热河抗战史与冀东抗战史研究者，历时半年，完成了《孙永勤》的摄制与编辑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3集、90分钟长度专门介绍孙永勤的纪录片，不仅实现了

孙永勤家乡和他战斗地区的众多人民的愿望，而且填补了热河与冀东抗战宣传方面的一项空白。该片在河北电视台六个频道和孙永勤家乡地区电视台播出后，反响很好，河北省委统战部部长陈秀芳同志专门就该片表扬参事室："宣传讴歌河北人民抗日救国精神，赠送人民一份宝贵的精神礼品。"此片后来获得了"河北新闻奖"三等奖、河北省影视艺术"奔马奖"三等奖、中国文献纪录片二十年（1986~2006）优秀作品奖。

纪录片《孙永勤》在制作过程中，受电视表现形式的制约，剪掉了许多有价值的素材。此外，孙永勤抗战一年半中，一些重要事件上仍有谜团尚需要破解。为弥补这些缺憾，我们委托翟丽芳同志在采访到的素材基础上，补充一些调查，以文字的形式，将孙永勤的英雄事迹和精神尽可能全面、深入地表现出来。但无论参事室还是翟丽芳同志本人都未想到，原定一年完成的工作，却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这与孙永勤家乡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积极提供给他资料有关。《孙永勤》播出后，兴隆县史志办主任王庆生先生、副主任科员刘玉兰女士很是感动，了解到翟丽芳同志到兴隆继续调查孙永勤这一情况后，他们毫无保留地把史志办所藏全部关于孙永勤的原始采访资料都提供给了他。这些材料极为宝贵，是承德、唐山地区的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在20世纪50至90年代调查孙永勤事迹时，留下的第一手采访资料。翟丽芳同志在无限感激之余，却发现不得不面对一个情况，即通过阅读这些原始记录，他注意到许多在公开出版物上比较肯定的观点，实际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举例来说，孙永勤起义的原因就存在着十个大版本、七个小版本，为什么入关，也至少可看到十六个版本。为了确定哪些版本更接近历史真相，以便将真实的孙永勤情况呈现给世人，翟丽芳同志不得不努力到达原始材料所提到的地方去向当事人或知情者求证。2006年以来，他共去冀东长城南北六次，千米以上高山就登临了六座、十次。以主峰海拔1224米的承德县老梁山为例，为寻找到当年孙永勤部队搭木头突围的悬崖，翟丽芳同志共去了四次老梁。前三次或因为季节不适合或因为未找到了解地理者而未能如愿。直到2009年冬，第四次前往老梁，才找到准确的突围地点。由于绝大多数重要的史实翟丽芳同志都尽可能做了核对，实在

无法核对者也将各种说法列出，因此，本书可以称作是孙永勤牺牲以来，关于他的英雄事迹最为完整、最为贴近历史真实的一本著作。不仅对普通读者了解孙永勤、了解十四年抗战初期冀东长城南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有重要意义，对抗战史学者研究热河、冀东的抗战也有着重要的帮助。

为我省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树碑立传的巨著《寻找英雄孙永勤》终于出版了。该书资料全，图片多，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地描述了民族英雄孙永勤伟大光辉的一生，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上乘佳作。该书的出版在孙永勤的研究历史上具有空前的意义，必将载入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史册。

《寻找英雄孙永勤》最终能够完成，据翟丽芳同志讲，是许多人帮助的结果。如果从他2002年第一次到冀东长城沿线实地调查孙永勤事迹算起，十次采访过程中，仅留下名字的就有以兴隆县委宣传部、兴隆县史志办为代表的130多家单位，还有以刘刚范、佟靖功、邓一民、李成民、栾福忠先生为代表的300多名专家、抗日救国军亲属、目击者、热心人士的帮助。可以说，本书是冀东长城南北和河北以外众多关心孙永勤和热河、冀东抗战的单位、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这些单位和人士心血的集体结晶。在此，我谨代表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向积极支持了本书调查、写作的所有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大家为推动热河、冀东抗战研究，弘扬燕赵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所作的贡献。

抗日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但孙永勤烈士，热河、冀东军民，燕赵儿女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体现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永存！

2012年2月23日

前　言

对于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十四年抗日战争初期，活跃于华北燕山地区的抗日救国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是一件闻所未闻之事；对于1935年5月24日，发生在河北遵化东北部山地的日本关东军、中华民国政府华北当局联合“剿灭”“孙永勤匪”事件，除了战斗发生地的人民和抗战史研究者外，我相信能够详细讲述一二者更是几近于无。

在21世纪已过去了十余年的今天，为何还要提起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长城东段地区的以孙永勤为首的一批英雄们的故事？以好战、凶残著称的日本关东军为什么誓要将他们消灭？当时的国民政府华北当局为什么要积极配合日军“协剿”他们，继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日蒋联合“剿灭”后，再次上演了一幕令英雄心寒、人民齿冷的人间悲剧？抗日救国军失败的原因，及其对今天、未来的启示是什么？以上是本书要努力回答的问题。

十分难忘第一次见到刘刚范先生的情景。记得那是1998年9月的一天，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来到位于石家庄建设北大街一座小区内的刘先生家。刘先生个子不是很高，为人热情，极富正义感。他是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曾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取得多项开拓性研究成果。谈话当中，他提起20世纪80年代初在承德师专政史系任教时，响应时任中顾委委员的李运昌的号召，接受承德地委宣传部、承德地委党史办邀请，调查黄花川农民孙永勤抗日的情景。那是截至那时为止我三十三年的人生当中，第一次听到孙永勤的名字、第一次听说黄花川农民抗日大起义的事情。当时的我已看过了梅尔·吉布森导演并主演的电影《勇敢的心》，我最初的感觉是，孙永勤的故事和影片中的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的故事惊人地相似：不仅主要情节几乎完全相同，就连最后的悲剧结局及其细节亦如出一辙。二者所不同的是，一个故事在中国北方的万里长城地区展开，一个在阴雨连绵的苏格兰高地进行；一个主要活动时间为20世纪30年代，一个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时间上相隔600余年而已。在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孙永勤的故事完全可称得上一部中国版的《勇敢的心》。不仅如此，孙永勤的精神还与我一直希望探索的“燕赵风骨”有着密切

联系。我甚至认为，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燕赵风骨”如果说其开创者是荆轲的话，那么它在近代的典型代表便是孙永勤了。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开始了对孙永勤故事的进一步搜集工作。我最初以为，这个工作短时间内便可结束，从未想到它会断断续续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搜集工作遇到了如下两方面困难：一、孙永勤的抗日斗争正好处于1933年的《塘沽协定》至1935年的所谓“何梅协定”之间的时期，那一阶段不论政治、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可谓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极其错综复杂的一个时期，表面相对平静，内里暗流汹涌，很多涉及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华北军政当局与关东军、支那驻屯军之间关系的历史谜团，由于当事人均已不在人世，很难解开。二、孙永勤抗日活动的地域纵贯冀东长城北侧属于伪“满洲新国家”统治的高山大河地区和南侧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的低山丘陵地带，由于至今难以讲清楚的原因，冀东长城两侧地区的抗战解放后几乎一直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空白——除了承德、唐山地区少数学者在呕心沥血地做这方面研究工作外，鲜有其他地方的更多研究者涉足此领域，很多课题都未能得到深入开展。这两方面问题使得企图从宏观和具体角度深入了解孙永勤抗战全过程，特别是努力把握他的心路历程的愿望实现起来非常困难。这期间，具体地说，2000年前后，由于体制原因，全国电影制片厂都陷入了困境，同许多充满理想的60年代出生的同龄人一样，我个人的事业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无力拿出很多资金深入开展关于孙永勤的资料搜集工作。有三四年的时间，我内心极度焦虑，但只能眼睁睁看着时光从身边掠过，当时的心情一如我所喜爱的一首蒙古民歌中所唱的：“骏马疲惫于旋律的惆怅，壮志消耗于心灵的跌宕。”

情况的发生变化，开始于2004年11月11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中午，我打开电视，突然间看到了凤凰卫视播出的一条新闻：《南京大屠杀》作者、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自杀身亡。难以表达我当时深受震动的情景，正像同样无法描述它在其他华人心中引起的震惊一样。望

着电视里不断播出的张纯如生前活动画面和照片上那张清秀的面孔，我感到十分的惭愧：作为一个在美国出生、美国成长，中文都不能流利讲述的女作家，张纯如能够远渡重洋，深入中国大陆采访，为华人受害者伸张正义，而我作为一个在中国本土生本土长、年龄还要比她略长几岁的男人，却不能为就长眠在我们身边不远处的荒山野岭中的英雄们做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自我辩解的一件事情。张纯如以38岁的短暂一生为世人留下了三部有形的著作：《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在美国的华人——一部叙述史》。通过这三本书，她向人们展示了百多年来华人对国际社会所作的贡献及华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乃至残害。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尚不是她最伟大的作品。她最伟大同时也最令人惋惜的作品在于，以自杀惊醒活着的人们去努力探寻历史的真相并认真思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像张纯如那样的活着才是有价值的活着，像张纯如那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我觉得应该向张纯如学习，以她为榜样，到了把为英雄所做的事情做完的时候了。抱着这样的想法，我首先电话联络了河北省社科院刘刚范先生。恰好原兴隆县委党史办副主任佟靖功先生来石家庄探亲，我知道这一消息后，又给他以及在河北电视台工作的一位朋友黄朝耕打了电话。三位当中，刘刚范先生的情况在前面已做了简单说明。黄朝耕是我在廊坊工作时的同事，也是十多年来一直支持我的朋友。这里着重介绍下佟靖功先生。佟先生本不是河北人，他的原籍在今天的辽宁省葫芦岛市。1949年3月，19岁的他从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兴隆县参加革命工作。从他肩扛公家配发的一支用于防身的大枪到达兴隆的时候起，便不断听到当地民众说起抗日好汉孙永勤的事情。这引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开始利用每次下乡工作的机会，收集孙永勤的资料。1983年，他从水利局调到兴隆县委党史办工作。由于有了较以前要方便的工作条件，于是花费七年时间，走遍兴隆全县每一个自然村，并到承德、平泉、宽城、青龙、迁西、迁安、遵化等多个县市走访，了解孙永勤的情况，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孙永勤调查报告《孙永勤将军》，出版了关于孙永勤的小说

《雾灵精魂》。他是国内当之无愧的孙永勤研究专家和长城沿线“千里无人区”研究专家。

我与刘、佟两位先生、朋友黄朝耕一起商量如何开展孙永勤抗战过程中一些谜团的调查工作。讨论的结果是：既然短时间内尚无法将孙永勤的全部事情搞彻底，实现将其故事搬上银幕的愿望，不妨根据已调查清楚的史实，先摄制一部纪录片，在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播出，宣传孙永勤的英雄事迹，同时利用纪录片拍摄之机，进一步了解孙永勤抗日活动中的未解之谜。

我把此方案向曾有过愉快合作的河北电视台影视剧频道陈清华主任做了说明，她很支持我们宣传孙永勤的想法。我们联合向有关部门打了资金申请报告，然而迟迟没有消息。转眼到了2005年春天，这期间我虽然已依靠自己的资金，抢救性地拍摄了一些资料，但要真正完成关于孙永勤纪录片的全部工作，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是不可能的。由于中国的纪录片一直没能形成市场，指望商业投资不可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朋友介绍，我和陈主任找到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令人高兴的是，参事室文史处郭庆华处长非常重视此事，他立即向詹文宏主任做了汇报。詹主任认为宣传被埋没的民族英雄是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义不容辞的责任，经他与其他几位领导召开办公会讨论，很快正式做出了支持孙永勤纪录片的决定。2005年5月24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第一笔五万元人民币资金汇到了河北电视台账上。巧的是，那一天也正好是抗日英雄孙永勤牺牲七十周年纪念日。随着拍摄的进行，参事室后来又为我们追加了五万元人民币。虽然由于刚恢复工作不久，参事室仅能支持这些资金，但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关于孙永勤宣传的历史上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的支持，解放后国内第一部以90分钟长度专门介绍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的纪录片才得以问世，不仅英雄的事迹得到宣传，英雄家乡人民半个多世纪的愿望得以部分实现，对孙永勤的了解也得以进一步深入。由于有了参事室的这笔资金，除孙永勤生活战斗过的兴隆、承德、宽城、遵化、迁西几县及承德市、唐山市外，我们得以到达曾深刻影响了孙永勤

及其队伍命运的长春、北京、天津、张家口、南京、福州等地采访，为在比较广阔的历史风云背景上把握孙永勤这个人物打下了基础。

纪录片《孙永勤》在河北电视台六个频道播出后，得到了孙永勤家乡人民的好评，受到了当时的河北省委统战部部长陈秀芳的表扬，此后还获得了河北省内外两个三等奖、一个优秀奖项。成绩虽然尚可，但我知道，有关孙永勤抗战的一些谜团并未全部解开，观察其起义全过程，会发现仍有不少环节处于云遮雾绕之中。

有鉴于此，经向参事室领导申请，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在纪录片播出之后，我继续开展了对孙永勤事迹的调查工作。2006年以来，又到冀东长城南北采访、搜集资料六次，累计从2002年夏天第一次实地走访孙永勤抗战之地至今，一共调查十次，最北到达张家口、多伦、长春，最南到达福州、贵阳，东抵秦皇岛，西至古北口，除台湾和日本的资料、证言无法看到听到外，基本上收集齐了国内能够看到的所有与孙永勤有关的口述、研究资料，并到孙永勤生活、战斗过的几乎所有重要地方走访了知情者。

本书是在上述资料搜集和调查基础上编著而成的。之所以用“编著”一词，是因为这本书是很多人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首先，其真正的创作者是以孙永勤为首的一群英雄们。他们是中国的威廉·华莱士及其同伴，是水浒英雄在中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再生，只不过长大成人后反抗的对象不是官府，而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其次，在我之前，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已有20余位中共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包括崇敬孙永勤的民间调查者，默默地做了很多关于孙永勤事迹的采访工作。正是由于他们先期在满目榛莽中开辟了一条坚实的路径，我才得以比较容易地踏上探寻孙永勤心灵轨迹的旅程。

最后，包括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在内，本书的调查和写作得到了冀东长城南北130多

家单位的300多名热心人士的帮助。没有这些人士的支持，要想比较彻底地调查清楚孙永勤抗战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

本书并未完全解开孙永勤抗战过程中的所有谜团。仍有部分问题需要等到新的资料发现后，才能给出答案。有些由于当事人去世、材料销毁或未留下文字证据，恐怕永远也无法找出答案了。

在经过了十多年搜集、调查，编著完这本书后，最后说几句话：

传说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的故事是由15世纪一个名叫盲哈里的吟游诗人传播开来的。他把威廉·华莱士的故事编成了一部长十一卷、一万两千行的传奇史诗《华莱士之歌》。史诗于16世纪在苏格兰出版后，迅速流传，威廉·华莱士的名字和事迹深植苏格兰人心，盲哈里功莫大焉。与之相映衬的是，较之威廉·华莱士更早一些的中国宋代的水浒英雄们的故事也是依靠一个署名施耐庵的小说家的努力才得以保存到今天的。将在民间已流传了几百年的故事和话本予以加工，施耐庵完成了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闪烁着不朽光辉的杰作《水浒传》。这部小说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中国人，以致中国人不仅对水浒英雄们的故事耳熟能详、如数家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还成为了中国人民反抗异族入侵的用兵宝典，这其中就包括本书所要讲述的主人公——英雄孙永勤和他的同伴们。毫无疑问，论人生阅历及才华，我既不能与盲哈里比肩，更不敢望施耐庵项背。但尽管如此，我仍追求着与他们二人同样的目标：希望人类历史上一些英雄们的事迹永远流传。如果人们不嫌鄙陋，能通过我拙劣的文笔，了解到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曾有以孙永勤为代表的一群民间英雄挺身而出，英勇抗争，能让他们的精神得到继承并世世代代发扬光大，或者这本书能为后人给这批英雄们写作更好的传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我的心愿已足。

翟丽芳

2011年9月15日

编著说明

一、由于多方面原因，一些人名、地名在本卷引用资料中存在着写法极不统一的情况。对引用的1949年前的图书、报刊资料，为保持历史原貌，本卷采取了在原文字后，将核查准确的写法标注于“〔　〕”中的处理方式。对少数暂时无法调查或已无查清可能的名字，采取了暂按一种写法统一，将这种写法同样地标注于“〔　〕”中，置于原文字后的处理方式。对引用的1949年后的图书、报刊资料及采访笔记原稿，为方便读者阅读，本卷采取了根据调查、考证清楚了的结果对这些人名、地名予以直接统一的处理方法。对于暂时无法核查或已无查清可能的名字，采取暂以一种写法直接统一的处理方法。

本卷实施了处理、统一的人名、地名如下：

1. 人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序）

C

柴启瑞。传为今河北省承德县上谷乡郭杖子人，但据郭杖子村支部书记郭书均帮助调查，村中不但没有曾叫过“柴启瑞”之人，且没有柴姓，因此准确籍贯还需查考。他是孙永勤军师之一。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柴启瑞”、“柴积瑞”。准确名字由于现阶段无法核实，暂按“柴启瑞”写法统一。

F

樊凌玺。今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东草厂人，中共地下党员。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樊凌玺”、“樊凌喜”两种写法。现根据其传记作者陈述的写法，统一为“樊凌玺”。

G

高作忠。今河北省兴隆县三道河乡偏岭子人，地主。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高作忠”、“高子忠”、“高自忠”、“高佐忠”等几种写法。经向其孙高印萱核实，统一为“高作忠”。

关元有。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王宝石人，抗日救国军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关元有”、“关元友”、“宫有元”、“韩有源”

等几种写法。因其妻子1944年被日军枪杀，儿子在其妻子遇难前一年（1943年）牺牲于遵化，女儿在日伪统治时期移民黑龙江，名字目前无法准确核实。暂根据兴隆县委党史办佟靖功先生1986年到王宝石采访时所作笔记及本人2005年对王宝石村关元奎老人的采访、日伪及民国报纸对“有”字的写法，统一为“关元有”。

H

郝敬义。今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人，孙永勤军师之一。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郝敬义”、“郝敬意”、“郝静一”、“郝静义”、“郝世祥”等几种写法。经向其孙郝连坤求证，确认“郝敬义”为正确写法。

何育民。传为今河北省迁西县三屯营人，彭杖子地主岳荫臣的大经理。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何育民”、“何玉明”。准确写法现阶段无法核实。暂根据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徐文礼老人回忆，统一为“何育民”。

L

雷常玉。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河南大峪老房子人，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长。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雷成玉”、“雷长玉”、“雷庭玉” 等几种写法。根据其外孙朱金城意见，统一为“雷常玉”。

卢仪卿。今河北省兴隆县兴隆镇人，伪“满洲国”热河省承德县兴隆办事处财政局（一说为财务局）局长。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卢仪卿”、“卢仪清”、“卢义卿”、“卢义清”等多种写法。根据佟靖功先生所写《孙永勤传》及兴隆县历史编写委员会办公室编《兴隆县历史（第一卷）》中写法，统一为“卢仪卿”。

骆凤庭。今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骆各庄人，20世纪30年代曾任中共遵化县委书记。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骆凤庭”、“骆凤亭”。根据他20世纪80年代所写回忆文章上的署名，统一为“骆凤庭”。

骆凤鸣。今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骆各庄人，骆凤庭弟弟，中共地下党员。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骆凤鸣”、“骆凤明”。根据骆凤庭20世纪

80年代所写回忆文章中的写法，统一为“骆凤鸣”。

M

马保德。今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人，抗日救国军副军长。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马保德”、“马宝德”。经东双城村支部书记马柱向其侄辈亲属核实，确认“马保德”为准确写法。

S

孙永香。今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罗圈沟人，民国时期兴隆县北五保总保长。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常写作“孙义香”或“孙一香”。经向其孙孙守礼求证，确认“孙永香”才是准确写法。

孙文阁。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人，抗日救国军战士。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孙文阁”、“孙文革”。经向其亲属求证，确认“孙文阁”为正确写法。

孙文伶。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人，孙永勤长子。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三种写法：“孙文伶”、“孙文邻”、“孙文令”。他名字的准确写法目前难下定论，经与孙永勤亲属商量，决定暂以可能性最大的“孙文伶”写法统一。

W

王承祖。名继宗，字承祖，今河北省玉田县杨家套乡后黄坨人，鸦鸿桥民团司令，中共地下党员。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字存在着两种写法：“王承祖”、“王承组”。根据张世昌所写人物小传《王承祖》，统一为“王承祖”。

王平陆。今河北省迁西县罗家屯镇上梨树峪人，20世纪30年代曾任中共京东特委委员、中共迁安县委书记、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王平陆”、“王平路”。根据中共迁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所写《王平陆和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游击第一支队》，以“王平陆”进行统一。

汪海澂。传为辽宁盖平人，即今辽宁省营口市盖县人，曾留学日本，1933年10月至

1934年10月任伪“满洲国”热河省承德县兴隆办事处处长。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汪海征”、“汪海徵”、“汪海澂”、“王海澄” 等几种写法。由于目前无法看到他的档案，暂依原兴隆县委党史办副主任佟靖功先生及本书特约编辑王笠晖先生的建议，统一为“汪海澂”。“澂”意为“水清”，“海澂”即“像海一样清”，有可能最符合其取名原意。

Z

赵邦海。籍贯不详，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队副，一说为中队长。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赵邦海”、“赵帮海”。准确名字目前无法调查。暂按照王笠晖先生建议，统一为“赵邦海”，缘“邦海”可能更贴近取名初衷。

赵廷普。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人，抗日救国军战士。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三种写法：“赵廷普”、“赵廷朴”、“赵庭普”。经路通沟村副村长刘胜新帮助调查，确认“廷”字为其名字中间字的正确写法。至于其名字当中最后一个字如何写作，目前已较难核实，本卷决定暂以“赵廷普”为准，进行统一。

赵廷山。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人，抗日救国军战士。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赵廷山”、“赵庭山”。根据路通沟村副村长刘胜新对其名字中间字进行调查的结果，以“赵廷山”写法统一。

赵有。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人，抗日救国军军法处处长，一说为卫队队长。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赵有”、“赵友”。经路通沟村副村长刘胜新帮助调查，确认“赵有”为准确写法。

张海鹏。今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沙岭镇热河台村人，奉系军阀，“九·一八事变”后叛国投敌，1933年5月至1934年11月间任伪“满洲国”热河省警备司令官兼热河省省长。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张海鹏”、“张海朋”。现根据解放后各种出版物中的写法，以“张海鹏”统一。

张含明。籍贯不详，曾任河北省特警队第一总队第一区队长。本卷引用的资料中，有

关他的名字存在着两种写法:“张含明”、“张耀明”。根据张庆余所写《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记》及张炳如所写《冀东保安队琐闻》,以“张含明”统一。

2. 地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序)

B

八卦岭。地在今河北省承德县大营子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八卦岭”、“八挂岭”两种写法。今根据承德县198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八卦岭”。

北鄺。地在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北鄺”、“北川”两种写法。今根据承德县198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北鄺”。

C

柴户场。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柴户场”、“柴户厂”、“柴禾厂”等几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柴户场”。

常峪沟。地在今河北省承德县柳树底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常峪沟”、“长峪沟”两种写法。今根据承德县198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常峪沟”。

E

二十里铺。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崔家庄乡境内,分“东二十里铺”、“西二十里铺”两个村庄。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二十里铺”、“廿里铺”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二十里铺”。

F

房家峪。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房家峪”、“方家峪”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房家峪”。

G

甘查峪。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侯家寨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被写作“干楂峪”。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更改为“甘查峪”。

官台子。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官台子”、“关台子”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小厂乡信访科员吴艳民先生帮助核实的结果，统一为“官台子”。

H

化鱼沟。地在今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两种写法：“化鱼沟”、“桦榆沟”。今根据兴隆县200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化鱼沟”。

洪山口。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洪山口”、“红山口”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洪山口”。

J

尖山屯。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新店子镇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尖山屯”、“线山屯”两种写法。“尖山屯”为正确写法，“线山屯”应为排版错误。

L

老梁。地在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老梁”、“老崀”、“老㟁”三种写法。今根据承德县198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老梁”。

罗降梁。地在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大杖子乡交界处。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罗降梁”、“罗将梁”两种写法。准确写法尚需考证，今暂统一为“罗降梁”。

路通沟。地在今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路通沟”、“路同沟”、“陆同沟”、“鹿通沟”、“鹿同沟”、“鹿洞沟”、鹿筒沟等多种写法。今依承德县198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路通沟”（介绍“鹿通沟”名字由来时除外）。

M

毛山。地在今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毛山”、“茅山”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毛山”，这可能也是此山历史上的准确写法。依据是，2010年7月13日，遵化毛山沟村民刘宝全对我说：“过去有老辈子人

讲过，这座山之所以叫毛山，是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姓毛的老道在山上修道的缘故。”

毛山沟。地在今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毛山沟”、“茅山沟”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毛山沟”。

N

暖儿河。地在今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暖儿河”、“暖河”两种写法。今根据承德县198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暖儿河”。

Q

秋花峪。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秋花峪”、“楸花峪”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秋花峪”。

秋科峪。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侯家寨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秋科峪”、“楸科峪”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秋科峪”。

S

潵河。滦河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今河北省兴隆县境内，在今河北省迁西县境内汇入滦河。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潵河”、“撒河”、“洒河”三种写法。今根据兴隆县200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潵河”，这也是这条河历史上的准确写法。

潵河桥。地在今河北省迁西县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潵河桥”、“洒河桥”、“撒河桥”、“撒河沟”四种写法，今根据这条河历史上的准确写法及兴隆县200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潵河桥”。

三里店。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三里店”、“三家店”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三里店”。

三屯营。地在今河北省迁西县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三屯营”、“三头营”两种写法。今根据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核定的地名，统一为“三屯营”。

X

小于沟。地在今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有“小于沟”、

“小于家沟”两种写法。今根据遵化市1996年核定的标准地名，统一为“小于沟”。

Y

永合堂。地在今河北省兴隆县大杖子乡境内。本卷引用资料中，此地名写作“永和堂”。今根据兴隆县2004年核定的标准地名，更改为“永合堂”。

二、本卷引用的1949年前的图书、报刊资料有的有脱字，有的有讹误字。为使读者准确理解原文，对这些脱字、讹误字分别进行了增补、更正。增补的脱字，置于“〈 〉”之内。讹误字，于原文字后在“〔 〕”内加以更正。本卷引用的1949年后的资料发现有脱字及讹误字问题的，采取了直接增补、更正的处理办法，以使读者能顺畅阅读。

三、本卷处理、统一过的所有引用资料的原文，包括进行过脱字增补和讹误字更正的引用资料原文，都编进了下卷《孙永勤与抗日救国军口述及研究资料集》中，希望看到资料原始样貌的读者可参阅本书下卷。

翟丽芳

目　录（上卷）Contents

目　录（下卷）Contents

一、原始口述材料

二、图书、报刊文章

奇怪的黄狗

车轮跳动着，快速冲向一道小山岗。

这是在万里长城东段——由明代徐达监修、戚继光加固扩建的冀东长城北侧四十余华里，横亘于河北省兴隆、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三县交界处的一座大山中。山名庙梁，又名大咔嚓山，全山由若干座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峰组成，最高处越千米，山势巍峨，气象颇为壮观。

时间是2005年7月10日前后，我从下板城租了一辆面包车，前往山顶岳伙房煤矿，寻访传奇抗日英雄孙永勤的战斗遗迹。汽车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跳跃着疾驶，转过几个大弯，开上半山腰后，透过面包车的前挡风玻璃，可以看到前面出现了一道小山岗。司机踩足油门朝上冲去，我在轰鸣的马达声和汽车底盘剧烈的颠簸中，无意识地朝车窗外望了一眼，就在这时，一条狗进入了我的视线：



图1　庙梁山　2008年7月

那是一条浑身长满了黄毛儿，之中略微夹杂着些黑色毛发，身长约七八十公分左右的狗，它出现在道路左侧斜上方大约七八米外的山脊上。我看到它时，它正低着头，一步一步默默地走向前方。

“这儿怎么会有狗呢？”我迟疑了一下，说出了这句话。

进山前，在山脚下一个叫石门子的村庄，我曾经向村民了解过情况。据他们讲，庙梁山上人家不多，大部分居住在距离石门子五六华里的山顶地带，有的甚至住在更远的地方。我们当时所处的位置为半山腰，按说不应该有人家。此外一路驶来，我们也没有看到房屋和人的影子出现。

“哪儿呢？”听到我的话，司机和我身右的摄像师不约而同地把脸转向了窗外。

“没有啊。”二人把头探出车窗，努力搜寻了一番，见不到狗的踪迹，又缩了回来。

我试图告知他们黄狗所在的位置，不巧的是，汽车已开上山岗，道路两侧壁立的岩石将我的视线瞬间挡住，我只好静待汽车开过山口。约十余秒时间，汽车从山口驶出，我迅速回过头，寻找在山脊上行走的那只狗。我惊讶地发现：山脊依然，狗却不见了。

我真的看到了一条狗吗？

我未做梦，可以肯定，确实看到了一条很像狗的动物。

它也许是只狼呢？

当那条像极了狗的动物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时，我记得仔细辨认过它的样子，从它的嘴、耳、尾巴的形状来看，它绝对是条狗，而不是狼。根据我所掌握的野生动物知识，狼的嘴一般突出且尖，耳朵小、挺括，尾巴长，给人以近乎拖在地上的感觉。而我看到的动物不但嘴短，双耳大、向下耷拉，尾巴也是卷曲着的，一如平日里我们看到的家狗的样子。支持它是狗而不是狼的还有一个理由：漫长的与自然界其他兽类争斗的历史，特别是火器发明以来，与人类打交道的教训，培养了狼警惕、谨慎的性格。一般地说，光天化日之下，在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地方，比如我们的车辆行驶着的通往山上村庄和煤矿的路旁，狼是很少会现身的。

那么，如果我肯定自己看到了一条狗，而且是一条黄狗的话，那它为什么突然出现，几乎转瞬之间又消失了呢？

我所租车辆的司机为承德县当地人，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感到难以理解。

司机、摄像师和我三个人正在车中百思不得其解，突然，一个念头像闪电般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我猛地想起了在冀东长城北侧、原热河省南部一带的百姓中已流传了70多年的一个传说……



抗争之山

从很少被人谈论的燕山山脉说起吧。

在地质学家的眼中，燕山是距今一亿六千万到九千万年左右、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时期中国东部地区剧烈造山运动的产物。

在八旗余孽、帮闲文人的笔下，燕山是北京成为“皇城”后才获得了意义的一道用来赏玩的风景。

而在我看来——我相信，燕山山脉自古至今无数的民众也会赞同我的观点，燕山却是一座抗争之山！牺牲之山！燕山那连绵不断的山的海洋完全是一片血的海！泪的海！

> 烛龙栖寒门，光耀犹旦开。
> 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风怒号天上来。
>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 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
> 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
> 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靫。
> 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
> 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
> 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
> 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历史上关于燕山的诗文不是很多，但也并非绝无仅有。然检索我能看到的所有关于这条山脉的文字，我认为，不管李白是否到过燕山游历，只有他的这首诗篇最真切地写出了燕山的真意——他不仅抒发了唐代守边将士的豪情，描述了唐时燕山边塞生活的艰辛，而且写出了那之前和那之后燕山留给中原人民的集体记忆：自然地理层面的“苦寒”与情感地理层面的“恨”。在这个意义上讲，李白的这首诗篇确实是超越了时空的，这也正是李白能成为伟大诗人之所在。但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企图从全面的视角来苛求，我认为，李白的这首诗篇也并非没有欠缺：他显然忽略了边塞所在的燕山人民的忧伤。

自发源于河北省沽源县南大马群山，经赤城县流入北京市延庆、怀柔，在密云县石城乡注入密云水库的白河河谷与千里奔驰而来的太行山脉分野后，燕山山脉一路迤逦东向，直奔苍茫渤海而去。横跨了今天的北京市北部、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部地区，长达350余公里，宽100余公里，平均海拔在400至1000米之间，最高峰超过2100米的这条巨大山脉不仅自然地成为了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水岭，自有人类以来，还成为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来自北方或东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次次企图突破燕山山脉中的天险进入中原地带，从战国时代起，先期占据了中原的统治者便开始在燕山山脉的北侧及腹地修筑长城，以阻挡游牧民族的冲击。从公元前4世纪到17世纪中叶明朝灭亡，难以计数的激战在燕山山脉的狭关险隘中展开，拼杀双方的嘶喊和兵器的撞击声一次次刺破燕山山脉的天空，燕山的褶皱里积满了战死者的尸骨。

连绵不断的战争不仅残酷地吞噬着交战双方将士的生命，同时也让成为战场的燕山地区的民众无辜经历磨难。战祸所及，家园被毁，亲人惨遭屠戮，即便侥幸存活，也要承受任人宰割和奴役的命运。以本书主人公活动地域之一的今河北省兴隆县为例，战国之前的情况邈远难考，仅自有明确记载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至1911年清王朝结束的2132年间，今兴隆县地区除被中原汉族的皇帝管辖过外，还至少被匈奴、鲜卑、契丹、羯、氐、女真、蒙古、满等八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过。其中特别要提的是，1005年北宋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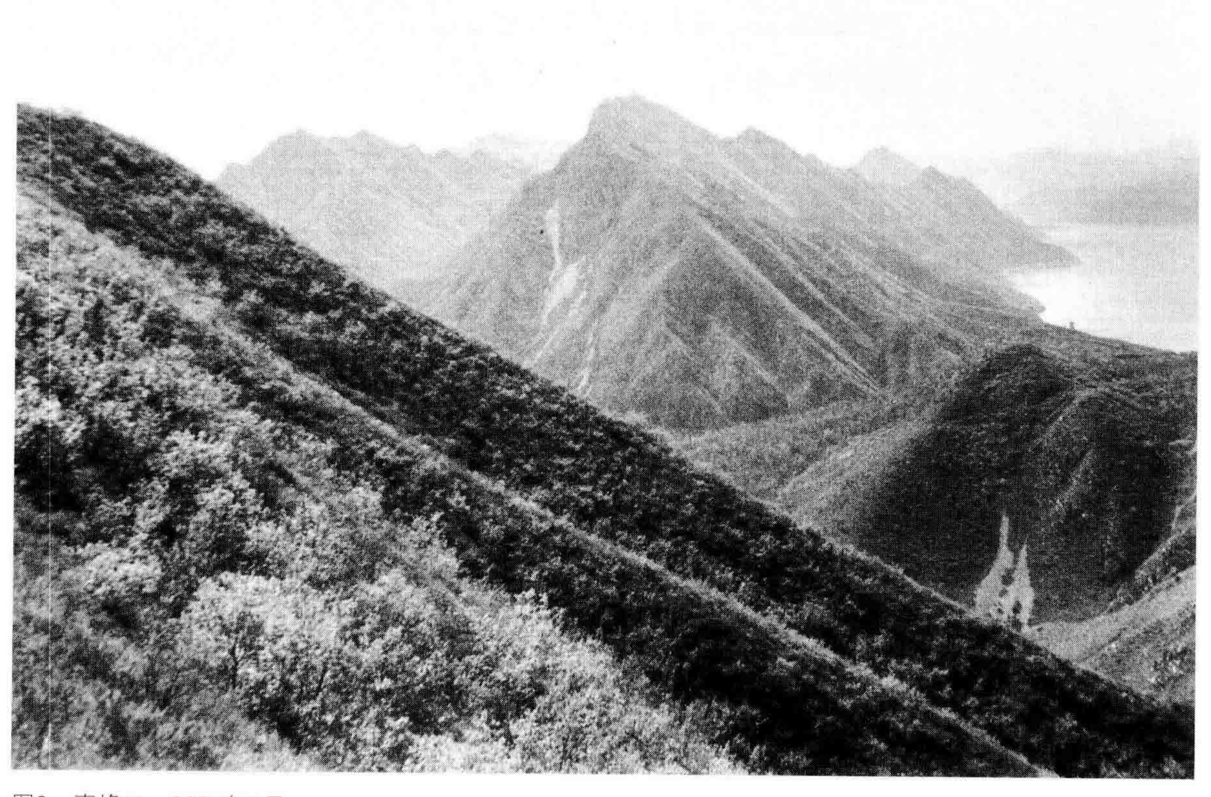


图2　喜峰口　2007年4月

方以白沟为界，兴隆被划归辽国121年，1141年南宋、金国订立绍兴和议，双方以淮水中流为界，兴隆被划归金国93年。这两段被中原王朝割弃的历史，在兴隆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图3　老梁杨宝全老人说，他手中的扎枪是爷爷专门定做的，用来扎日本兵。2007年4月

不屈的人们不甘忍受压迫，开始起来抗争。他们拿起一切可以充作武器的东西，勇敢地反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命运。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失败，但他们的子孙们仍前仆后继、顽强地战斗下去。这样的历史在燕山地区反复上演着，可以说，燕山的每一块土地上不仅浸透了交战民族对垒军队阵亡将士的鲜血，也洒满了燕山人民的泪、燕山人民的血。燕山人民的泪与血混合在一起，化作愤怒的云，在燕山的山谷间激荡徘徊，变作不屈的水，奔腾着、咆哮着，流进浩荡渤海。站在白云缭绕的燕山的峰谷间，或是浪花四射的渤海边，如果人们能够静下心来用心感受的话，也许不仅能听到战死的军人们不绝于耳的厮杀声，或许还能听到无数冤死的黎民百姓的啜泣声，以及他们勇敢的孩子们坚强不屈的呐喊声。

燕山人民苦难与抗争历史的最近一次上演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那场波及了整个中国与几乎全部亚洲国家的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中。战争初始阶段，燕山人民最为杰出的代表是孙永勤，以孙永勤为首的一群民间英雄们英勇杀敌，顽强抗争，不仅在北宋宋江起事八百年后，在中国北方的燕山地带上演了一场20世纪版的水浒英雄传奇，而且在中国万里长城东段的高山峻岭地区演绎了一个中国版本的威廉·华莱士故事。

黄花川

不论在随处可见的比例为350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上，还是在八十万分之一的河北省地图、二十万分之一的兴隆县地图上，你都无法找到黄花川的名字。事实上，在今天公开出版的任何一张地图上，黄花川都没有被标注其上。

黄花川是燕山山脉主峰雾灵山东南100多华里处的一条河流，确切地说，它是发源于蒙古高原，纵贯内蒙古草原东南边缘、河北省东北部和东部山地，在潘家口切穿燕山山脉，在河北的唐山市和秦皇岛市接壤地区注入渤海的华北第二大河——滦河的一条三级支流。

黄花川的源头在今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的张杖子。

那是一个隐身于外来者视线之外的、极其不可思议的村庄：站在俯瞰村口的高高的承德至栗树湾国防公路路基上，目力所及，映入眼中的只有百米开外一所黄墙红瓦的学校和校后山坡上稀疏矗立的几座村民的房屋，你或许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张杖子村的全部了，殊不知13个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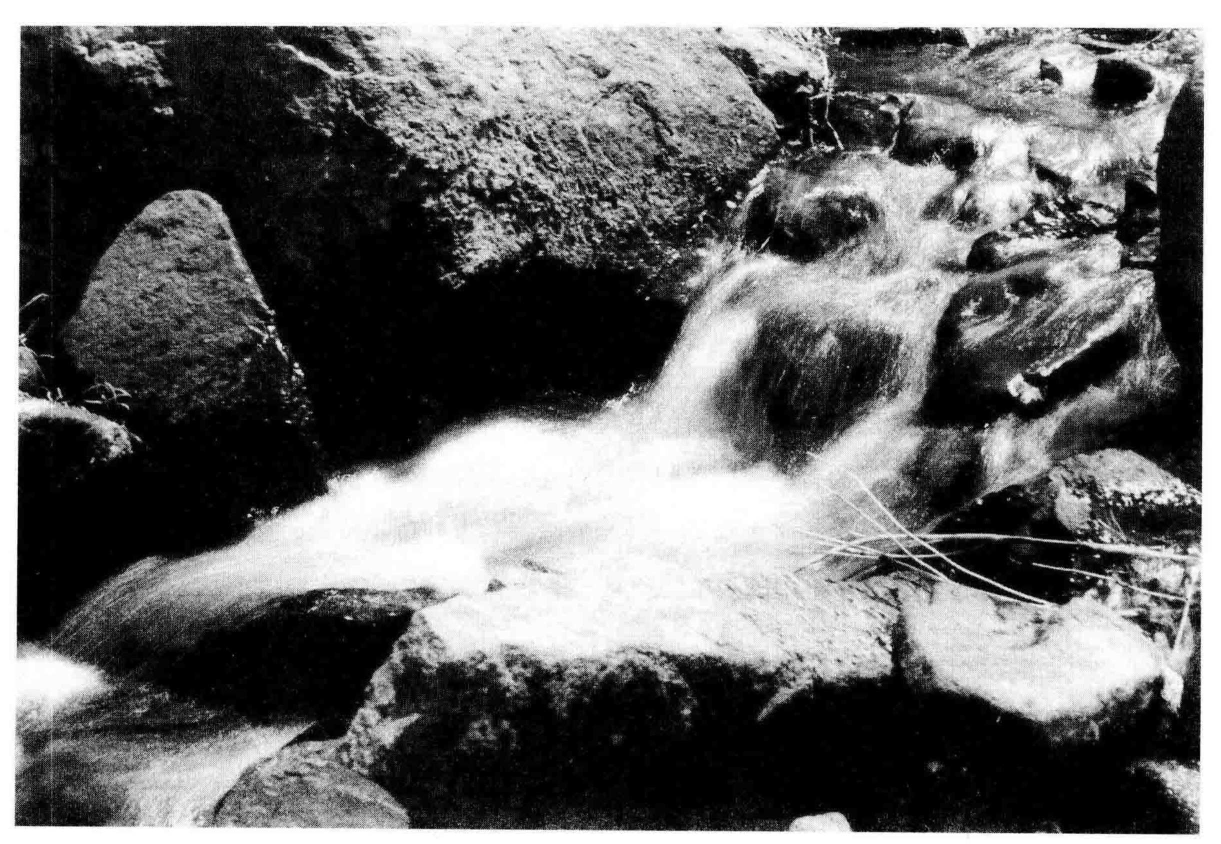


图4　黄花川　2006年4月

然村、460多户人家依山势的起伏，错落有致地分散在13华里狭长蜿蜒的山谷中。村庄为黄土梁、马架山、广东山、月儿鞍、骆驼脖子五座海拔近千米和千米以上的巨大山峰所环绕。2007年4月16日，当我为寻找黄花川源头，第一次走进张杖子时，天空中正下着蒙蒙细雨，带状的白色云雾在远处高峻的山尖飘荡游走，粉红色的桃花和白色的杏花鲜艳地怒放，一团一簇或成片成片地点缀着黄花川两岸的山岗。由一个乍暖还寒、黄褐满眼的外部世界骤然进入到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别样风景当中，不由得令人立即联想到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而当一缕青烟从河对岸的山崖后面升腾而起——正是播种季节，猜测是村民在焚烧树叶和杂草，空气中很快弥漫过来类似煨桑的味道，又令人恍然以为已经置身于遥远的青藏高原上。

“我们张杖子多像莲花环绕的村庄啊！”张杖子漂亮能干的女村书记陈翠琴不无骄傲地说。

“莲花圣地。”结束在燕山腹地的第五次采访，返回石家庄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我一直回忆着在张杖子所看到的一切，特别是陈书记所说的话，反复思索，觉得唯有用“莲花圣地”或“燕山深处的莲花圣地”这样的词汇才能准确形容我对张杖子的印象。之所以这样说，不仅仅是由于张杖子拥有极少为外人所知的、洞天胜境般的独特风景，更因为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令人极其感动。那种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村民与外来者之间的古朴的、融洽的、一团祥和的气氛，即便对于走过国内很多地方的我来讲，也是不多见的，那是一种一般只在古代人们关于理想国的描述中才可能见到的气氛！

2007年春，我进入张杖子的目标是：找到黄花川源头，并争取从源头走到河口——黄花川与滦河交汇处，然而我的这一愿望在当年未能实现。在张杖子，热心的村民们告诉我：黄花川有将近十个源头，全都在张杖子村西很远的大山上，不可能在一天内全部走到。我提出只到达主源头即可，当时唯一非常熟悉道路的村民何树元却因严重的腿疾无法带我前往。我试图请村民们告知我大致方向，一个人前去。“那上面有狼，你不怕吗？”一个脸蛋红扑扑的40岁左右的女村民调皮地问了一句，说完便抑制不住地咯咯笑了起来。

尽管不能一睹黄花川源头的真容，令我感到十分遗憾，但2007年春第一次寻找黄花川源头之旅，也并非丝毫没有收获。

“我81岁了，在这儿住多少代了。”1986年11月，时任兴隆县委党史办副主任的佟靖功先生曾到张杖子采访了一位名叫张如山的老人。在回答关于“黄花川”名字来历的问题时，老人说：“这条沟为什么叫黄花川？开始这里叫黄木川，因为上边有个大柏砬，上面长有几搂粗的大黄木。后来黄木被人砍了，大甸子上都是黄花，这才开始叫黄花川。”

张如山老人的答复里有个关键词“大柏砬”，这个大柏砬是否真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他所

说的“黄花川”来历问题的真伪。2007年4月，我执意要到达黄花川源头，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认是否真有这个大柏砬。

“确实有那么个大砬子，就在双山梁脚下。那上面长满了柏树，柏树多了，吸引了好些飞鼠来吃柏树子。现在那上面到处都是飞鼠屎，那可是好药材，中医里面叫五灵脂，能驱胃寒。”之前提到的张杖子村民何树元说。何树元，2007年时55虚岁，曾在双山梁下的一条山坳里生活多年，张杖子村在那里居住的唯有他一家。近年由于腿患风湿，上山下山感到吃力，这才和家人从双山梁脚下搬进村中。何树元不清楚柏砬子上过去是否曾生长过大黄木，但他确认有柏砬子存在这一点，便足以证明张如山老人关于“黄花川”由来的说法应是真实的。不仅确实有此大柏砬，而且，据何树元讲，黄花川的主源头就在这座大柏砬下面。黄花川从那里发源后，沿途陆续接纳若干条支流，渐变成一条越来越宽的小河，沿燕山东段山脉向东南方向逶迤穿行约15华里，再折转东北方向穿行10华里，最后在河口地方注入滚滚奔腾而去的滦河。黄花川流经的区域，当地的人们习惯上就以“黄花川”这条河流的名字命名之，与此相同的是，瀑河流经的地区被称呼为“瀑河川”，黑河流经的地区被称呼为“黑河川”。黄花川穿行区域的河谷和山地上早年确曾成片成片地开着鲜艳的黄花——一种当地特有的草本植物，非我们日常食用的名为“黄花菜”的黄花，但不知何故，这种黄花现在已完全灭绝，再难觅到其踪影。

我的头脑中翻腾着一幅壮丽的图景：在有如莲花瓣般耸立着的、五座峻美的高峰拱卫着的白云缭绕的巨大山谷里，滴滴清泉汇成的涓涓细流从一个长满茂密松柏的巨大石壁下面流下，之后它欢唱着，一路不停地向朋友们发出邀请，一条条白亮的泉水纷纷从远处赶来，它们汇聚到一起，变成一条快乐的小河，喧闹着、跳跃着，穿过桃花、杏花掩映的村庄，流过蜜蜂、蝴蝶飞舞的开满黄花的原野，一路蜿蜒辗转，直奔白浪翻滚的滦河而去……

我相信那不是我的主观幻想，它是黄花川曾经有过的过去，我还希望它是黄花川不久的将来。

从1998年起，对黄花川这个燕山腹地的滦河三级支流地区，我一直非常关注。除努力搜寻所有关于它的文字材料外，还曾先后到那里做过七次采访。促使我不断前往黄花川的原因是，1933年底，那里曾爆发了一场由一群农民发起的武装抗日起义。这场在中共党史文献里被称为“黄花川农民抗日大暴动”的农民反抗斗争，是在日本法西斯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境、热河省大部、南京国民政府长城抗战失败，中国工农红军尚在南方进行反“围剿”，中华民族处于最为危难的时刻爆发的。它由几个结拜为兄弟的山区农民发起，最初仅有黄花川及附近地区的十几个农民参加，鼎盛时曾达到五千人左右的规模。起义时名为“民众军”、两月后更名为“抗日救国军”的这支农民武装在“亡国论”甚嚣尘上，长城抗战失败、察哈尔抗战失败后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和抗日热情处于最低谷的时刻，心向中国，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满洲国”国民，他



们手持老旧的武器，部分人手中只有棍棒、扁担，甚至还有徒手者，在既无枪弹补给，也无粮食、服装、医药供应的情况下，勇敢地在热河省南部、万里长城北侧的交通要冲、山岳河谷地带攻打伪满警察机构、海关税所，伏击日本关东军，不时穿越长城，进入“非武装地带”，与日伪周旋，令关东军司令部及日本陆军中央极为恼火，将这支农民抗日武装视为“热省治安之癌”，必欲铲除而后快。后果真调集热河、喜峰口、澈河桥、建昌营、古北口、马兰峪、罗文峪、凌源等多地驻军，会同中国方面的战区保安队、河北省特警队、遵化县民团，于1935年5月24日，将抗日救国军主力重重围困于遵化毛山之上。日军在所有制高点布置机枪，五处炮阵地密集发射各种火炮，更有飞机在战场上空侦察、指挥地面日军作战，至少四百名抗日救国军官兵在这场战斗中英勇牺牲。据毛山当地百姓回忆，战后流水为之变蓝（抗日救国军军服由芦苇烧成灰后熬水染成），地上的血痂经太阳暴晒，翘起一指头厚，伏尸变臭，两三个月无法进山。其战斗惨烈程度，据冀东百姓讲，创抗日战争中冀东地区之最！和毛山发生战斗同一天，行进至遵化房山沟的另一路抗日救国军也遭到日军的攻击，至少一百名官兵在此战斗中阵亡。



图5　我一睹黄花川源头的愿望在第二年夏天得以实现。2008年7月21日，在陈翠琴书记的帮助下，我由一位名叫付艳金的年轻人带领，从张杖子村部出发，先乘摩托车西行8华里，之后徒步翻越两座小山梁，步行约4华里，到达双山梁山麓的黄花川主源头地带。图左中部和右上位置的两座峭壁均被称之为柏砬子，黄花川主源头在右上位置的柏砬子下（箭头指处）。一滴滴清水从砬根的岩缝中渗出，汇集成细流，潺湲而下。从主源头到滦河，黄花川共流经张杖子、孙杖子、城墙峪3个行政村，流域全长25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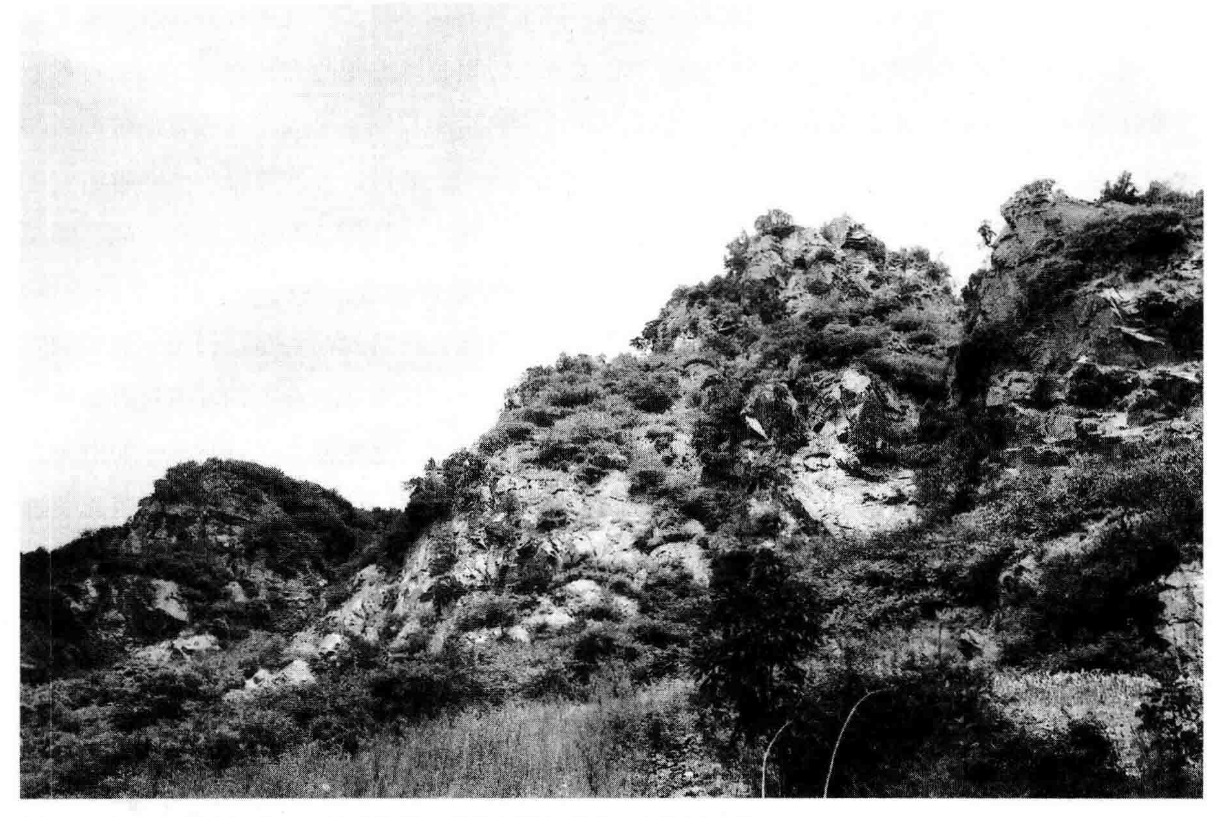


图6 黄花川主源头柏砬子，砬顶依稀可见柏树矗立其上。2008年7月

黄花川农民抗日起义在主要领导人于1935年5月24日牺牲后便归于沉寂，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很快被中国全面抗战的洪流所淹没，以至几乎被人们彻底遗忘了。黄花川起义英雄们的事迹逐渐为他们战斗地区以外的人所知，首先要归功于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冀东地下党特派员、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李运昌将军，其次应归功于河北省承德、唐山地区的中共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李运昌将军的呼吁下，20余位中共党史及政协文史工作者顶寒风、冒酷暑，经过30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将抗日战争初期这批被埋没的民间英雄们的基本事迹调查清楚，由于他们的努力，这批在燕山怀抱中长大的英雄儿女们为中国民族独立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才渐渐为承德、唐山地区以外的部分公众知晓。

黄花川农民抗日起义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就是我在前面曾提到的孙永勤，他是这场起义的核心与灵魂人物。可以这样说，没有孙永勤，便不会有黄花川农民抗日起义；没有孙永勤，这场武装抗日起义也不会坚持一年半之久。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这场起义发生；正是因为有了他，这场起义才与众不同，被染上强烈的传奇与悲壮色彩，至今仍被冀东长城南北他活动地区的人们常常提起，深切缅怀。

真实的孙永勤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身上具有哪些优秀品质？何以冀东长城南北的人们至今难以忘记他？

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20世纪下半叶在发表介绍孙永勤的文章时，为时代所局限，隐去了他身上许多生动的、极具个性特征的内容，部分地方作了善意的拔高。此外，孙永勤领导的黄花川农民抗日起义涉及地域广，一些地方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未能前去调查，未到达地方的内容需要填补，有些已访问过的地方细节需要进一步核实。再者，黄花川农民武装抗日起义自发生到失败的1933至193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关系十分错综复杂的一个时期，国际层面上的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国联、美国、英国、苏联，日本与苏联、美国、英国之间，国内层面上的日本国内激进派与缓进派，在中国的关东军与支那驻屯军之间，中国国内国民党与共产党、地方军阀，国民党内蒋氏派系与反蒋派系，亲日派与抗日派，共产党内“左”倾路线与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倾路线者之间，所有的矛盾都对孙永勤领导的农民抗日起义产生了影响，导致了在研究孙永勤和黄花川农民抗日起义时，发现很多问题仍处于云遮雾绕中的局面，如促使孙永勤起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在日伪的严密统治下，特别是面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法西斯侵略气焰正盛的日本关东军，抗日救国军何以能坚持抗日活动一年半之久？1935年5月，孙永勤为什么突然率抗日救国军全军进入关内？如果不进关，能否避免失败的结局？南京政府华北当局为什么要配合日军对抗日救国军进行“围剿”？遵化县长何孝怡、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战区保安队、河北省特警队官兵在“围剿”孙永勤部时具体扮演了什么角色等。

鉴于存在着以上三方面问题，2002年7月，我开始了首次前往黄花川调查孙永勤、“黄花川农民抗日大暴动”之旅，2004年底受张纯如自杀事件震动，更是每年至少抽出半个月的时间前往孙永勤起义涉及的地点进行实地采访。我的希望是：在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之前所做工作基础上，再拓展一下调查范围，增加一些调查深度，在黄花川农民抗日起义过去70多年后，努力将20世纪30年代初风云变幻大背景上，以孙永勤为首的一群民间英雄们的真实面貌尽可能完整地呈现给公众，同时努力破解笼罩在“黄花川农民抗日大暴动”上的一些谜团，对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被“剿灭”的教训加以总结，为今天及后世留下有益的镜鉴。

山东移民的后代

从柳河上游的兴隆县城出发，乘车沿京建（北京——建昌营）公路向东南方向行驶150华里，穿越冀东长城，抵达属于迁西县管辖的栗树湾，然后沿承栗（承德——栗树湾）国防公路，复穿越长城，向东北转西北方向行驶约23华里，到达兴隆县东部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蘑菇峪，自蘑菇峪向东60华里范围内便是极少为人所知的中国大陆最为壮观的地理景观之一——滦河河谷地带。

汽车在幽深山谷中的公路上疾驶，路两侧是一重高过一重、直插天际的险峻大山。“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只有借用1200多年前李白描述蜀道难的诗句，才能最真切地状写那里的图景。英雄孙永勤的故乡孙杖子就位于滦河西岸波澜壮阔的群山的海洋之中。

孙永勤出生地今天官方的称谓为“河北省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孙杖子自然村”，当地的人们现在一般以“孙杖子庄”称之，以便和“孙杖子村”（即孙杖子行政村）相区别。孙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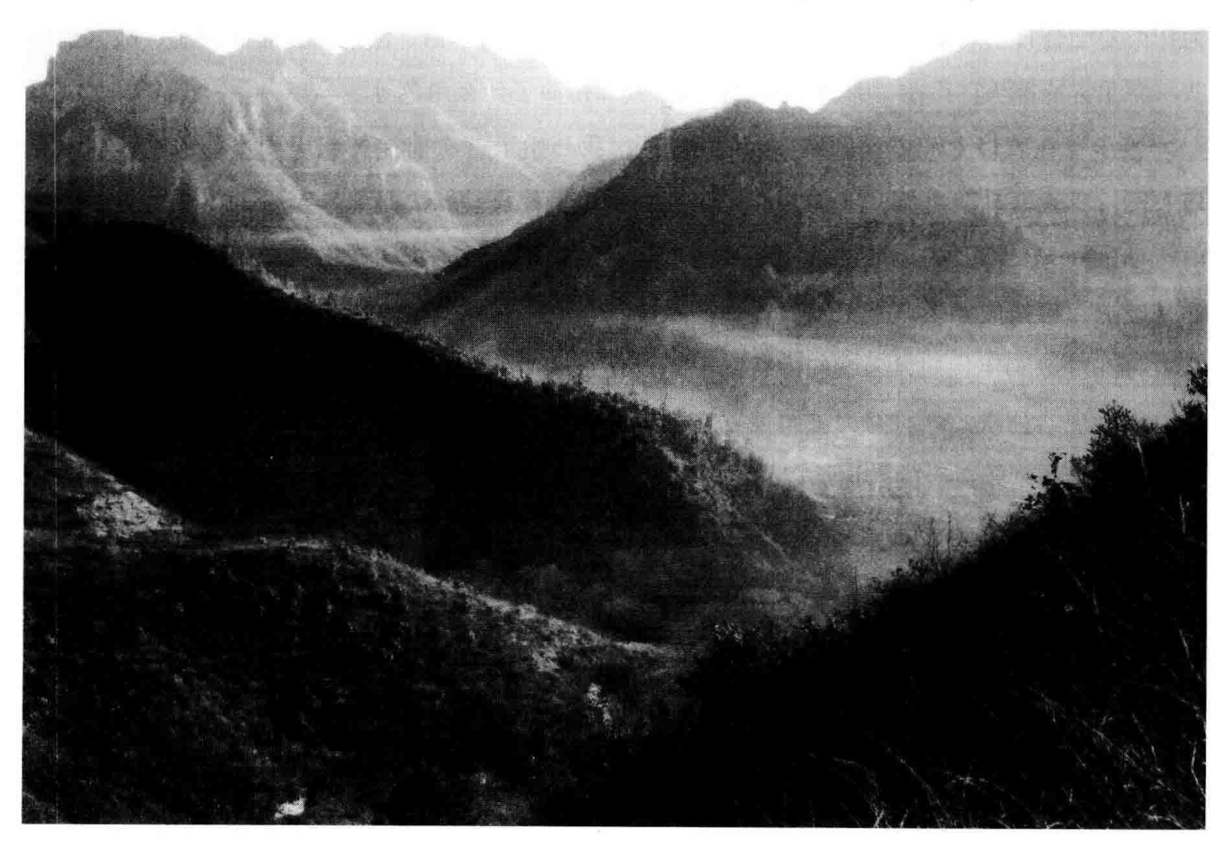


图7　滦河西岸山地，薄雾下的村庄便是孙杖子。2009年12月

子庄是孙杖子村下辖的九个自然村之中的一个，位置在孙杖子村西部，西南距蘑菇峪23华里，西北距黄花川源头15华里，东北距黄花川、滦河交汇处10华里。我在本书中不使用“孙杖子庄”，而使用“孙杖子”名字，是沿用政社分开前200多年间人们的习惯叫法。孙杖子今天共有60多户人家，360余口人。



图8 郭瑞萍、孙文顺、儿子孙团营合影。1964年（照片提供：郭瑞萍）

“滦河在中间，两边都是高高的山。我们背着婆婆，一走一滑地走羊肠小道，那真是羊才走的路，过摩天岭，特别高的山，上上下下，左一个山右一个岭的，才能到下板城坐车。不论到哪儿，去兴隆、承德，都得到下板城坐车。”

50多年前，迁西少女郭瑞萍与一个年轻人的恋爱遭到了她父母的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小伙子人挺好，家庭出身更没的说，提起他爸爸的名字，当块儿谁不知道？那绝对是一个大英雄，一个好人家！可就一样儿，那地方太远、太偏僻了，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遭罪！”

郭瑞萍恋爱对象的名字叫孙文顺，不是别人，正是本书主人公孙永勤的第三个儿子。二人经孙文顺的一位侄子介绍开始恋爱，彼时，孙文顺刚从部队复员，在鹰手营子煤矿当矿工，郭瑞萍则在迁西家乡做一名小学教师。

郭瑞萍顶着父母的压力，尤其是母亲的极力阻挠，与孙文顺结了婚。婚后她记不清共随丈夫回过多少次孙杖子，探望婆婆（即孙永勤妻子雷永兰），帮助料理家中事务，尽管至今她都对与孙文顺的结合不后悔，但每次去婆婆家要承受的跋涉的艰辛，特别是1973年以后，因不忍见婆婆在贫病交加中艰难生活，与丈夫一起背着婆婆到承德市去办理烈属证明的经历，还是让她对父母当初干涉她婚姻的心情有了深刻的理解。

“一九八几年到大杖子才通车，还只有敞篷车。我记得清楚极了，脚冻得都不能走路，得用大衣捂着。下了车，还得步行五六十里山路，走罗降梁或者是猴山梁，才能回到家。”郭瑞萍对孙杖子交通状况的描述一点没有夸张，孙杖子村民孙中彦在回忆当年进出孙杖子的艰难时



图9　冬日孙杖子　2009年12月

同样感慨万千。

孙杖子地处冀东长城北侧40华里、滦河河谷西岸的斜坡地带。村庄四面为起伏的山峦所环绕，群山围裹的环境不仅使那里与外界沟通起来十分不易——1995年承栗国防公路修通之前，经黄花川、滦河岸边的崎岖山路步行出山，或是徒步走到河口，从那里乘船，经滦河水道前往北部的承德市或南方的关内，是人们仅有的两种选择，而且使那里的气候具有鲜明的山地色彩。

“冬天真冷啊！”

发出如此慨叹的是孙杖子一位名叫孙中训的老人。老人个子很高，无儿无女，一个人居住在孙杖子村的养老院中。2007年4月、2008年7月，我曾两次采访他，他向我讲述了不少童年时期的有趣故事。2007年的时候，他79虚岁。

“那个地区特别冷，尤其是冬天。见太阳的时候特别晚，起码得10点、11点钟，太阳落山的时间又特别早。”提起孙杖子的气候，郭瑞萍更是记忆深刻。

孙杖子冬季奇寒，和它所处的地球纬度有直接关系，然而如果要归根结底，则应还是周边高耸的山峰造成了它特殊的局部气候。

孙杖子的坐标为东经118° 14′ 69″ 、北纬40° 54′ 12″ （以孙杖子庄中心为坐标点，秒数可能略有误差），较高的纬度让它在冬天很容易受到极地大陆气团的控制。寒潮漫过雾灵山

脊，拂过燕山东段层层的山岭，在黄花川各个角落纵横肆虐，让孙杖子的人们在寒流的侵袭面前无处躲避。而较高的海拔，特别是孙杖子东西两面高高耸立的三座大山，更让那里的人们每当想起冬季，便有一种冰冷至极的感觉迅速传遍全身。

孙杖子的海拔高度目前尚未看到准确的数字，参考《滦河志》提供的冀北山地丘陵区的海拔数据，最低应在500米以上。孙杖子庄东3华里处，村民们称之为平顶山（又名大平台、小平台）的山梁比孙杖子高出约150米，村西四五华里外，名为黄土梁（也叫南大梁）、马架山的两座毗邻的高山比平顶山大约又要高出200米。三座大山在冬天使太阳在孙杖子露出笑脸的时间很晚，落山的时间很早，那里的人们一天只能享受五六个小时左右的日照，在夏季又封堵住了孙杖子的风道，使得那里由于雾灵山对东南海洋气流阻挡的缘故，本已变得炎热的天气，越发闷热不堪。

黄土梁、马架山正是上节提到的耸立在张杖子村东南和南面的两座山，由于它们距离孙杖子相对较远，且主要是在气候方面对它构成影响，在这里不予多谈，只就平顶山多说几句。

平顶山的形状很是怪异，我一度曾想用“像豆腐干被切落了一边”这样的词句来形容它，终觉不合适，后来偶然翻阅《水浒传》，发现有“一个是巨灵神忿怒，挥大斧劈碎山根”一句话，便觉用“天神劈柴未完便匆匆离去，在人间遗留下的一个半拉子树墩”来比喻，可能更为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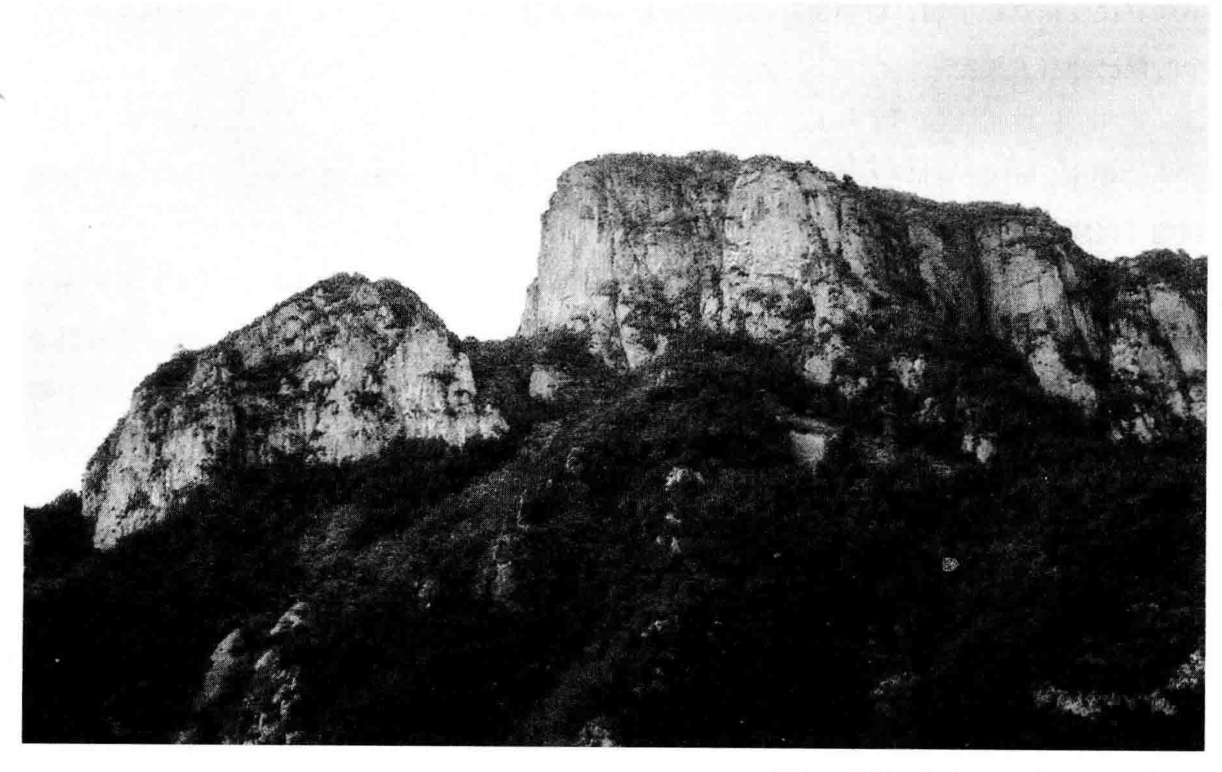


图10　孙杖子庄东的平顶山　2008年7月

“左近很出名，出蟊寇的地方。”2002至2007年间，我曾到孙杖子采访过五次，每次都只是把平顶山当作了孙杖子的一个标志性风景。2008年7月19日下午，我第六次来到孙杖子，由于离天黑还早，我便前往位于平顶山脚下的孙杖子小学，试图拍摄悬挂在学校篮球架子上的一座古钟。在原来是小学校的地方，我遇到了正在清理废墟的一位名叫田玉仓的村民，从他口中，才知道学校已搬至它处，并且头一次听说了平顶山过去还曾是土匪巢穴的事情。

“土匪使马朝上运水，站在山顶往下射箭。过去捡过各式各样箭头，40年前，在下面的山沟里还发现过一只120斤重的大铁锤，现在上面还有马粪呢。听老辈子人说，过去土匪把好看的大姑娘掠上去，玩够了，劈了，从一个大缝子那儿扔下来，眼下那砬缝子里还有骨头呢。下雨阴天，有时候会听见小孩哭，就是看不见人。我们村田玉林大集体时放羊，就亲身经历过。现在要是一个人去也发瘆，阴天下雨更不敢去。”

据田玉仓小时候听老人们讲，平顶山上的土匪，后来被黄天霸赶走。

“黄天霸朝上射箭，射到土匪的窗棂子里去了，把土匪给吓跑了。”

黄天霸为公案小说《施公案》里的人物，史书上未见关于他的记载。由于兴隆县南部、遵化市北部靠近冀东长城一带都流传有关于他的传说，历史上确有黄天霸其人似乎是肯定的。按《施公案》所写，黄天霸主要活动于清康熙年间，根据他随施公到京东剿匪是在后期这一情况来推断，他到孙杖子平顶山平寇的时间当为康熙晚年。这个时候，平顶山上有土匪驻扎，并且不断有民女被劫掠上山，特别是有人目睹过黄天霸攻打土匪的经过，说明黄花川流域至迟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民定居。

“明末，山东一孙姓人家来此始居，后人取村名孙杖子。”关于孙杖子，2004年第一次出版的《兴隆县志》这样记载。

“孙杖子老孙家是清朝乾隆年间从山东迁徙到兴隆来的。”上文提到的孙杖子村民孙中彦对县志的说法不予认同。孙中彦，2007年时59虚岁，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曾担任蘑菇峪乡办公室主任、乡土地站站长等职，2002年，响应承德市的一项鼓励政策，提前离岗回到孙杖子家中。耕种之余，他搜集了很多关于家乡的风物传说，有关孙杖子和孙永勤的许多故事，我都是头一次从他那里听到。

孙中彦不同意县志说法的依据是《孙氏家谱》。

“爷爷、父亲在世的时候，常给我背《孙氏家谱》。据他们说，我们的祖籍是山东登州府杏花村柳树底下，那里有孙广先、孙广召兄弟俩，孙广先移民到了寿王坟，孙广召乾隆时挑担子来到了今天蘑菇峪乡的宋杖子。孙广召在宋杖子去世后，葬在了西山，以后宋杖子西山就成了孙杖子这支老孙家的祖坟所在地。过去清明时，孙杖子的人们前去上坟，宋杖子老百姓还记



着这段历史，对我们特别好，上坟的时候主动提供锹镐，上完坟还管一顿饭，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那里的第一户人家。”

孙中彦所讲的孙广先、孙广召移民长城以北的时间与历史记载有吻合之处。2005年，一位名叫邓辉的年轻学者出版了一本专著：《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里面讲到，满人入关之后，清政府为防止蒙汉一体化，一度实行严厉的禁垦蒙地政策，汉人被禁止出长城开垦土地。这一政策持续了六七十年时间，到雍正、乾隆时，被迫终止。终止的原因是，关内人口激增和水旱灾祸使得许多农民破产，流入京师地区。为解决这些汉族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清政府被迫改行借地养民政策，准许内地饥民到口外开垦谋生。邓辉在书中说：“乾隆八年（1743年），天津、山东、河南遭灾，灾民闻知口外雨水调匀，纷纷流往口外。清政府谕令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诸关口的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发出，但今日流民不比寻常，若稽查过严，若辈恐无生路矣……令其不必过严，稍为变通，以救灾黎。’于是又有大批贫民进入蒙地。”根据邓辉提供的上述材料，孙广先、孙广召兄弟极有可能便是在乾隆八年，即1743年前后这一时期，由山东登州府移民到长城以北的今兴隆地域的，今兴隆地区那时为蒙古卓索图盟牧地。

历史上的登州府设置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废于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明朝至清朝初期，下辖一州七县。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起，下辖一州九县，一州指宁海州，九县分别为：蓬莱县、黄县、福山县、文登县、荣成县、招远县、栖霞县、莱阳县、海阳县。其地在今天对应于山东烟台、威海两市所辖区域。杏花村柳树底下目前虽难以查明具体位置在哪里，但孙广先、孙广召兄弟来自山东半岛东端这一点则应是肯定无疑的。

“清代前朝，于热河虽有府厅州县之设，其实仍限制移民实边，至有汉人妇女不得越长城之禁令，又禁止汉蒙杂居，汉蒙通婚。此种深闭固拒之政策，并非为蒙古人之福利着想，盖亦别有用意在也。然清廷虽明令蒙人不得多开一亩，多招一民，实则私开私招，暗中繁殖者，不乏其人，则以政策操之朝廷，而各旗王公不尽一致奉行故也。盖各旗垦荒收租，为王公之大宗收入，且垦民中多有泥瓦木铁工匠者流，资而用之，亦有许多便利。蒙旗既相容纳，汉人来者日多，此种趋势，权兴于乾嘉之初，而鼎盛于咸同以后。至其所来之原籍，则以山东人为最多，山西河北人次之。大凡从事耕垦，培植瓜果蔬菜，及业木铁匠为教读者，多为山东人；从事贸迁开烧锅当铺钱庄烟店者，多为山西人；至医卜肩挑负贩者，多为河北人。如赤峰一城，山东人占十分之四，山西人十分之三，北平人十分之二，热河土著居民十分之一云。”1933年，张其昀（音tián）在《国风》半月刊发表了《热河形势论》，其中对清代蒙地开垦历史，特别是对各省移民从事职业的介绍，对我们了解孙广召兄弟移民蒙地之后的生活情况有重要帮助。

孙广召在宋杖子去世后，其后代不知于何年、因何原因又搬迁到了张杖子，住在一个叫做

列门子的地方，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迫使老孙家的人们再次走上了迁徙之路。

"有个人在列门子附近的河里下'mí'（音迷），"孙中彦说，"'mí'这个字怎么写，不清楚，总之意思就是捕鱼，在河里放一个酒壶似的嘴小肚子大的东西，过去人们管它叫'xūlong'(音虚笼)，捕鱼。一个姓雷的人夜里去偷鱼，被抓住，挨了打。姓雷的人就埋怨我们老孙家的人不去拉架，因为老孙家就在列门子那儿住，一气之下，把老孙家的房子给烧了。老孙家一个老奶子觉得实在是太冤枉，就一个人拐着一双小脚，翻过罗降梁，穿过隆坡洼，走一百多里山路，到承德府告状，告了很多回，终于赢了。官司虽然赢了，但老孙家的人们也不想再在张杖子住了。他们在张杖子村东三里多地一块没人的地方，盖了房，定居下来，于是有了孙杖子。"

根据孙中彦的回忆，孙广召共生育了四个儿子：孙红、孙秀、孙祥、孙立，他们的后代名字是孙良青、孙良武、孙良玉、孙良书、孙良毕。这几个人之后是孙宗尧、孙宗起、孙宗富、孙宗贵。自"宗"字辈后，老孙家又经历了"福、进、永、文、中"五辈，"中"字辈后起名不再统一。本书主人公孙永勤是孙广召第二个儿子孙秀的后代。

孙中彦提到的《孙氏家谱》于1930年前后流落他乡。一种说法，到了今兴隆县李家营乡下台子，另外一种说法，到了今属承德市管辖的寿王坟镇罗圈沟村。

"《孙氏家谱》以前一直保存在孙杖子，后来为什么没了呢？"孙中彦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孙广先、孙广召兄弟俩当年分家时，孙广先欠下了孙广召一块金元宝，这事被写到了家谱上，算是欠款的一个凭证。大概一九二几年，或许是一九三几年头儿上，反正那时日本还没进中国，孙杖子老孙家派人去寿王坟，找孙广先的后人们要这笔旧账。那时候的人都是用钱褡裢装东西，就是往肩膀上那么一搭的那种，就把家谱装褡裢里，作为凭据，走着去的。孙广先的后人们知道孙杖子来人的意图后，也可能是当时还不起，也可能觉得都老辈子的事了，不该再提，总之是不想还这笔钱，于是好酒好菜把孙杖子去的人灌醉，把写着欠款一事的家谱从褡裢里抽走了。孙杖子的人酒醒了以后，跟对方提欠款的事。对方说，好，既然家谱上记着这事，那就拿家谱来吧。孙杖子去的人到褡裢里找，没有，结果不但钱没要回来，连家谱也丢了。"

循着以上线索，2007年4月23日，我专程前往寿王坟镇罗圈沟村，希望找到《孙氏家谱》的下落。我的心愿是，亲眼看到《孙氏家谱》，以便将孙永勤的家世情况核实准确。

罗圈沟村支委委员禹桂娥不辞辛苦地骑摩托车带着我在几个自然村中走访，最后我们了解到确有《孙氏家谱》存在。"每年春节都还把它摆出来，大家前来供奉。"保管这份家谱的女村民说。我提出看一看家谱的请求，女主人显得很为难。考虑到主人可能非常敬重祖先，并因此缘故不愿向陌生人展示，我当年没有再坚持，带着十二分的遗憾离开了罗圈沟。

像2008年终于实现了到达黄花川源头的愿望一样，我一睹《孙氏家谱》的愿望在同年也得

到了实现。

2008年7月16日，为了解日伪偷袭孟家沟孙永勤部驻地之事，我第二次来到罗圈沟。采访中我偶然得知，前一年去过的保管着《孙氏家谱》的那户人家的老人过世了，家谱被转到了一位名叫孙守印的老人家中保存。

守印老人88虚岁，住在连同他家在内总共只有两户人家的一条山沟内。我冒着被狗咬伤的危险，前去拜访老人，被邻居大嫂告知，老人去了几十里外的闺女家。好在老人的儿子因奥运安保原因矿山停工，正好在家，在这位名叫孙玉钟的年轻人的热情帮助下，我终于看到了《孙氏家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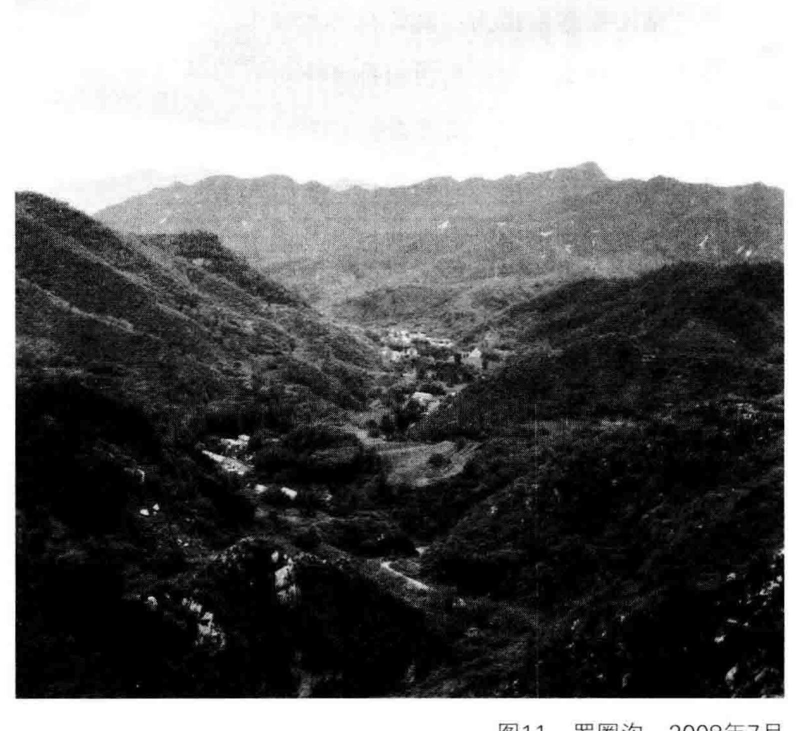


图11　罗圈沟　2008年7月

真实的《孙氏家谱》和我在别处见过的线装古籍的样式不同，非常近似中国古代的长卷。将卷轴慢慢打开，是一块长约一米七八、宽70厘米左右的白布，白布上据说刷过蜡，上面用红、黄、蓝、黑、粉红等颜色绘着庙宇、祥云、散财童子、八仙、上供的男人、供桌等图案。庙宇的匾额上题着“万代宗祠”四字，之下是一层层的牌位，上用毛笔书写着孙氏历代祖先的名字，最后一块牌位画在白布底部的供桌上，上面写着“孙氏门中万代宗亲”字样。“祖居山东登州府荣成县人氏现在集居住先茔黄山口阜柳树村落户”，特别要说的是，在白布中央靠右侧的一个地方，注着这样一句话。

“老高祖母王氏”，在罗圈沟见到的孙氏家谱这样称呼着第一位祖先。

“从山东移过来，是一个寡妇，管叫祖母，要饭过来，丈夫在山东没过来就走了（指去世了）。在这儿生育，一辈一个小子，生到四辈上，小子就多了。”次日上午，我乘长途汽车到达鹰手营子东庙河河北庄，见到了看望女儿的孙守印老人，老人对家谱上的第一位祖先这样解释。

老祖母之后，罗圈沟孙氏家谱记载的孙氏一族传承如下：

老高祖孙讳榜，字登武

高祖孙考云锦

孙儒兰（另一份手抄家谱上为：高祖孙考儒兰）

孙讳兰（手抄家谱为：高祖孙考讳兰）

孙讳璠（手抄家谱为：高曾祖孙考璠）

孙琪（手抄家谱为：高曾祖孙考琪）

孙玳（手抄家谱为：高曾祖孙考玳）

孙广先（手抄家谱为：高曾祖孙考广先）

孙其鑰（手抄家谱为：高曾祖孙其鑰）

孙其余（手抄家谱为：高曾祖孙考其余）

孙迎祥（手抄家谱为：高曾祖孙考迎祥）

孙万宜（手抄家谱为：故祖宗孙考万宜）

之后是“龙”字辈、“廷”字辈、“永”字辈。

以上我抄录了罗圈沟保存的孙氏家谱从第一代直到“龙”字辈之前的祖先的名字（略去了女性祖先的名字），将其与孙杖子孙氏目前依靠背诵方式传承的家谱内容对照，会发现：如果孙杖子孙氏对家谱的记忆准确，如果两地家谱上的“孙广先”不存在重名重姓问题，是同一个人，那么罗圈沟孙氏和孙杖子孙氏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

可是，为什么罗圈沟家谱上有孙广先的名字，却没有孙杖子孙氏提到的孙广召名字呢?

排除两个地方的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关联这样一种情况，原因恐在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罗圈沟孙氏家谱并不是最初的家谱。

我所见到的罗圈沟孙氏家谱，正面除图案、正文，背面除意为遵化制作的几个字（惜原文当时未录）外，再无其他文字痕迹，由此判断，它肯定不是孙杖子孙氏所说的曾保存于孙杖子的孙氏家谱原件。

“孙守合父亲孙朝祥组织掏钱续家谱，我看见了，1952年。”家住郑家庄（罗圈沟第十村民组）的孙守礼老人介绍罗圈沟孙氏家谱的来历时对我说。我看到的家谱最初便保存在孙守合老人家，将这一情况和孙守礼老人所说的情况结合起来推断，现在的罗圈沟孙氏家谱极有可能便是1952年版孙氏家谱——注意，我在这里只说1952年版家谱，而没有说1952年家谱原件，原因是，几天后，我在孙杖子见到了一张罗圈沟孙氏家谱的照片，里面的文字内容相同，图案却不一样，说明罗圈沟1952年续修的家谱至少制作过两次，现在看到的家谱既可能制作于1952年，也可能制作于1952年之后的岁月。

在1952年版罗圈沟家谱之前，一定还存在着一个或一个以上版本的孙氏家谱，不论一个还是

多个，最早的那个版本都应与孙杖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版本相同，甚至，就是孙杖子家谱原件。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版本演变成1952年版本，或者说从孙杖子版本演变成罗圈沟版本，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二是刻意回避的结果。前者是1952年续修家谱时，自主地确定只记载罗圈沟孙氏谱系的原则，不涉及情感因素，后者则牵涉到了历史事件。据孙杖子孙姓的人们反映，民国年间，孙杖子孙氏、罗圈沟孙氏之间曾因为家谱遗失事件，孙永勤绑走罗圈沟百姓并火烧孙永香房屋事件，两度出现不愉快情况。特别是后一事件，发生于1934年，但直到1957、1958年，罗圈沟的人们仍不能释怀。此情况极有可能对1952年罗圈沟续修家谱造成了影响。

“我们跟孙杖子不是一回事。”为避免单一站在孙杖子立场，只从孙杖子孙氏角度考虑问题，可能犯下歪曲历史、损害罗圈沟孙氏形象的错误，我向罗圈沟四位77岁以上的老人作了请教。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即便在罗圈沟同一个村庄内，关于罗圈沟孙氏与孙杖子孙氏、罗圈沟家谱与孙杖子家谱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以孙守礼老人为代表，他参加过解放东北的战争，辽沈战役时期是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六师的一名机枪手，行军路过辽宁北部一个叫马杖子的孙姓人口很多的村庄时，与那里的人们有过接触。“东北马杖子跟我们是家了（即亲戚），那边说，这边姓啥那边姓啥。”另一种说法来自孙守印老人：“听老辈子说过，罗圈沟跟孙杖子是家了。”

尽管在罗圈沟看到了孙氏家谱，但由于罗圈沟孙氏与孙杖子孙氏、罗圈沟家谱与孙杖子家谱之间关系尚不能最后确定，我准确核实孙永勤家世情况的计划实际上是失败了。

虽出现了这样的结局，但因不论罗圈沟孙氏还是孙杖子孙氏，都肯定自己来自山东登州府，且不论按罗圈沟家谱上推，还是根据孙杖子孙氏的记忆，他们的祖先都是清朝时期才移民长城以北，孙永勤祖先来自山东半岛东端，清朝时期始迁移至今河北省兴隆县境，孙永勤是山东移民的后代这一结论则可以说是准确无误的了。

本节结束前，需要说一句，由于历史上孙杖子、罗圈沟两村庄之间曾有过恩怨，2007、2008年，我两次进入罗圈沟村采访，内心都十分紧张，可谓如履薄冰，唯恐因涉及的是敏感话题，罗圈沟的人们拒绝采访。未想到李瑞言老人、孙守合老人、孙守礼老人、孙守印老人不但毫无抵触地接受了我的访问，而且在涉及过去的历史时，非常坦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不清楚的情况也直言不知，令我很是感动，我在此特别向四位老人表示真诚的敬意！

孙二奶奶

山，

极其奇怪的山！

2007年4月17日的黄昏，我独自一人走上孙杖子庄北的西台子山，从那里朝着东北方向，翻越两座浑圆的山头，登上了孙杖子北面最高的山峰——五梁西岔后堵。

站在俨如海岬的绝壁的最高处环顾四野，五梁西岔后堵分别伸展向东南、西南方向的两条隆起的山脊宛如大写的“人”字，静卧于四面高耸的群山之中。北面，宽约四五华里、深近百米的山谷外，是东西向一字形状展开的名为“大五道梁”的黛青色山峦。东面，三四华里外，渐渐黯淡下来的蓝色天空下，是努力向上耸立的平顶山。西面，六七华里外，重叠在一起，乌云样遮蔽了小半个天空的是高高的黄土梁与马架山。两座大山脚下，有着淡淡缭绕炊烟的山谷，便是我称之为“莲花圣地”的张杖子。那一天，当我立在五梁西岔后堵山顶看向那里时，夕阳最后一抹金黄色的光辉正斜射在黄花川北密密匝匝、随山势错列建筑的房顶上，它令我一



图12　前往五梁西岔后堵的路上。2007年4月

下子想起了吉祥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南面，几乎正对着五梁西岔后堵大敞着的谷口的地方，卓然挺立着一座秀丽的山峰，它就是孙杖子人们称为“前山尖”的黄花川南岸一系列波涛起伏的山峦的主峰。突然，我有一种强烈的并非置身于静寂山顶，而是站立于一艘巨大的开足了马力挺进的军舰的舰首的感觉。五梁西岔后堵断崖北面，横绝四五华里，猛然下降近百米，底部山石平缓的山谷，正如跃动着细碎波涛的海面，我驻足其上的似“人”形、又似“V”字向后延展的山峦恰如一条不知身长多少华里、其大无比的战舰，从东、南、西三面静默肃立的高山中挟威冲出，带着隆隆的螺旋桨轰鸣，奋力劈开波涛，朝北方冲去！

宇宙有大关合，气运为主。山川有真性情，气势为先。

地运有推移而天气从之，天运有转旋而地气应之。

天气动于上而人为应之，人为动于下而天气从之。

我不禁想到了传说南唐何浦撰写、明朝刘伯温注释的《灵城精义》中的几句话。

自2002年夏首次到孙杖子采访以来，我亲眼目睹了这一村庄的巨大变化：自然环境由本世纪初的山清水秀、空气澄明变成今天的随处可见生活垃圾，卡车一过便尘土飞扬；村庄规划由原来的整齐有序变成今天的杂乱无规则；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由原来的淳朴、温暖变为今天的隔阂、冷漠，开始充斥着金钱味道。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孙杖子的情况不过是全国只着眼经济，根本不再考虑其他的一个缩影，并且其变化的程度较之长城以南的发达地区，特别是靠矿产骤然暴富的地区，甚至根本不值一提，但仅仅七八年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是让我常常自问：同是一个孙杖子，何以在七十多年前会产生像孙永勤那样的人？同是一个孙杖子，何以在抗战初兴的时刻会产生紧跟孙永勤的一批人？2007年4月17日傍晚在五梁西岔后堵山顶的所见所感，让我内心倍受触动，也许我们该超越孙杖子目前的暂时的现状，从山川地理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内在品质的塑造，大的时代风云对个人、民族、国家本质的唤醒的角度和视野，思考孙永勤的问题，思考追随他的一批农民英雄的问题，思考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国这个国家的问题。

从孙杖子西南方面的村口进村，沿承栗国防公路向东北方向行大约100米，可以看到路北建着房屋的高台下有一块低洼的空地。2006年夏天之前，那里除了杂乱生长的刺槐和荒草外，尚可看到一口石砌的水井向天空大张着黑洞洞的井口，仿佛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生活过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这里曾创造了一段无法磨灭的历史。2006年夏季以后，先是这块洼地的南部建起了一座酒家，之后西面又盖了一座民居，洼地仅余的一小块刀把形的地方最后也成了村民倾倒垃圾的场所，令人见后感觉十分心酸。




图13　孙永勤家水井　2002年7月

这块洼地便是孙永勤的旧居遗址。

2002年到2009年，我共七次来到孙永勤旧居遗址，每次看到那颓败孤寂的所在，都不禁无限感慨。这就是那个国民政府长城抗战失败后，高举“天下第一军”的大旗，在热河省南部英勇地打响了民众抗日第一枪的抗日救国军军长孙永勤家所在地吗？这就是那个曾威震冀东长城南北，一度令日本关东军闻之胆寒，让日本陆军中央为之震怒的传奇英雄孙永勤的故居遗址吗？

不错，它正是孙永勤的故居遗址！

关于今天能够看到的孙永勤故居遗址，民间盛传着一种说法：那块地是个凶宅。

版本之一说，那里除孙永勤能镇住外，其他任何人无法居住。

孙永勤三儿媳郭瑞萍2005年春向我回忆：“婆婆在世时跟我讲过，从前，孙杖子的人家很少，庄儿也没现在这么大，公公一家住的地方过去是村子的大西头，极其荒凉。有不少人相中那块地方，想在那儿建房，都因为房盖好以后，夜里总是听到很奇怪的动静，特别害怕，不得不把房又扒了，搬到别处。直到后来我们公公在那儿建房，那种特别奇怪的声音才再没有出现。”

“孙永勤盖完房，住进去后，夜里有人拍他的脑门。”版本之二说，“孙永勤睁眼一看，有人形，没脑袋。拿起枪去追，出门就没了。请人看，说此地叫‘灰飞烟灭’。”

第二个版本由孙中彦向我转述，时间是2007年4月16日下午6点左右，地点为我住宿的孙杖子一个兼营旅店的小酒家里。酒家紧邻承栗公路，西距孙永勤故居遗址大约300米。天色已黑，忙于春耕的村民们劳作了一天后，三三两两踱到这里来闲聊，门外不断传来载重汽车咣咣驶过的巨响。“孙永勤不信邪，忒拧啊！”孙中彦说完这句话后，便没再讲下去，我可以猜到他的思绪一定是越过了长城，飞到了孙杖子南面70多华里外的遵化毛山地方：1935年5月24日，在黄花川农民抗日起义爆发一年半后，1600名抗日救国军官兵在孙永勤带领下，开入长城以南的遵化境内，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援，未料遭到日本关东军、战区保安队、河北省特警队、遵化县民团的联合“围剿”，包括孙永勤在内，至少400名抗日救国军官兵在毛山被日军用火炮炸死、机枪打死、刺刀挑死，另有至少100名官兵在房山沟阵亡。孙永勤的头被日军割走，拿到承德二仙居示众。那结果可以说正好印证了“灰飞烟灭”这句话。

郭瑞萍、孙中彦所述传说是否“迷信”？我在这里不做判断。将它们如实记下的原因，一是为完整地保存关于孙永勤的资料，二为这两个传说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情况：即今天我们尚能看到的孙永勤故居遗址实际并非他的出生地，而是他长大成人、自立门户后才居住的地方。

孙永勤的出生地在哪里呢?

“孙永勤家的祖坟在张杖子。”孙中彦说，然而涉及到孙永勤具体出生何处的问题，除了可以肯定他是在孙杖子出生的以外，准确位置孙中彦也不清楚。

孙永勤的出生地点，由于年代久远，了解情况的老人们都已谢世，今天实际上已不可考。同样不可考的，还有孙永勤家族历史的一些情况。

按孙中彦祖父、父亲向他介绍的情况，孙永勤是孙广召第二个儿子孙秀的后代，孙秀之后是“良”字辈，之后是“宗”字辈，再之后是“福”字辈，即孙永勤爷爷那一辈。“良”字、“宗”字虽有名字留下，但哪位是孙永勤的直系祖先，如今已没人能够说清。

即便孙永勤爷爷的情况，目前也所知不多。他爷爷的名字，据孙中彦2009年12月4日向我讲述，叫孙福巨。这个名字是孙杖子南沟孙中亚2008年冬告诉孙中彦的。“孙中亚父亲叫孙文香，有文化，他记的这个名字应该是准确的。”孙中彦说。除此之外，关于孙永勤爷爷，只知道一他会过日子；二他生育了三个儿子，也有的说是四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是孙永勤的父亲。

持孙永勤爷爷有三个儿子说法的是孙中亚、孙中彦。“孙永勤父亲辈哥仨：孙进坤、孙进山、孙进川，孙永勤父亲是孙进山，排老二。”孙中彦转述孙中亚的话说。

认为孙永勤爷爷有四个儿子的是孙永勤次子孙文孝。1983年5月31日，他在接受兴隆县委党史办朱素清女士采访时说：“我爷爷他们弟兄四个，我爷排老二，叫孙静昆，是傻子，我奶奶当家，大家都叫她孙二奶奶。”

比较孙中亚、孙中彦与孙文孝的观点，我们发现，二者唯一一致的地方在孙永勤父亲排行第二这个问题上。这之外，二者不仅在孙永勤爷爷有儿子数目上意见不一致，在孙永勤父亲名字究竟叫什么问题上也显示出不同。孙永勤爷爷到底有三个还是四个儿子，对孙永勤的问题没有影响，可以不再讨论。孙永勤父亲准确名字是什么，按道理应尽可能搞清楚，但由于目前实在没有更多的资料可拿来判断“孙进山”“孙静昆”谁真谁伪，抑或还有第三个名字，为慎重起见，在本书中我决定只以“孙父”或“孙永勤父亲”这种方法称呼之。

孙永勤父亲的精神状态似乎与正常人有些区别。一些人直截了当地说他是“傻子”，这样认为的不仅有孙永勤次子孙文孝，孙杖子村民孙文炳、孙中贵也持此看法。孙文孝的回忆见上面的引文；孙文炳是在1983年接受兴隆县委党史办栾福忠先生采访时，说出“孙永勤父亲是傻子”这样一句话的；孙中贵则是在2008年7月21日我到孙杖子采访时，表达出相同的观点的。“太爷也是傻子。”孙中贵道。他并且补充说：“腿有毛病，着凉，风湿病。”

也有一些人反对说孙父是傻子。“孙永勤父亲是个老实人。”1983年，孙杖子村民孙永忠接受栾福忠先生采访时说。“孙永勤父亲不傻，就是老实厚道，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2007年4月15日，我到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菇峪村黄花峪采访孙永勤表外甥史耀清，老人说。

“孙永勤父亲是个二憨子，说话不真灵。”另有人这样描述孙永勤的父亲。2008年春，我第二次前往张杖子寻访黄花川源头，81岁的陈永会老人向我讲述了他所听说的孙永勤父亲的情况。老人所说的“不真灵”为兴隆方言，即说话不清楚的意思。

傻子也好，老实人也好，二憨子也好，以上三种表述，表面虽有所不同，内中却有一致之处，即孙永勤父亲至少不是个聪敏机灵之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娶了一个为众人一致称赞的好妻子。

孙父的妻子，即孙永勤母亲，是孙杖子西南23华里处的蘑菇峪人，姓陈，本名不知，孙杖子的人们习惯上均以“孙二奶奶”称呼她。

“孙永勤母亲孙二奶奶是个爽快人，三里五乡有名，会扎风。”1983年，孙永忠在接受栾福忠先生采访时说。

“过日子是把好手，会给小孩扎风病，谁请都去，没有阔家主的架子。”同年，孙文炳在接受栾福忠先生采访时回忆道。

从孙永忠、孙文炳回答提问时的语气看，尽管那时距离孙二奶奶去世至少已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但仍可感到有一种尊敬之情不可抑制地溢于言表。

二人态度之所以那样，并非没有原因的。

现存资料显示，至迟在孙永勤爷爷那一代，孙家已经是一个殷实的人家了。“他爷爷、爹爹都会过日子，放债。”1983年6月，孙杖子村民孙文阁在接受栾福忠、邢连义先生采访时回忆说。孙家的经济状况在孙二奶奶嫁过来后，只能说朝着更为红火的方向发展了。因为孙二奶奶也是一个会过日子之人，用孙文阁的话说：“孙永勤母亲能说会干，会过日子，提起孙母‘二奶奶’，三里五村都知道。”

虽然生活较之孙杖子大多数人家要富裕，但孙二奶奶却没有富人身上普遍具有的那种气势凌人的毛病，无论贫富，她都平等对待。“待人热情”，孙文阁评价孙二奶奶时这样说。孙二奶奶会门绝活，就是孙永忠、孙文炳讲过的会扎风，小孩子得风，嗓子长疙瘩，或得了痞积，她用针就可以给扎好。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知道谁家的小孩子病了，不论是本庄还是外村，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只要有人去请，她拔脚就跟人走，这让了解她情况的人们至今对她充满了怀念之情。

孙父与孙二奶奶共育有四个儿子，另有一种说法，生育了五个儿子。

持夫妇二人生了四个儿子说的，不论在上世纪下半叶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前去采访的

年代，还是在今天，都占了大多数。四个儿子分别为：老大孙永彬（也有人写作孙永宾），老二孙永连，老三孙永勤。老四有的说叫孙永庭，有的说叫孙永山，更多的人则说他根本没有大名，一般称呼为“傻四”或“傻子”。“‘傻四’说不出话，是哑巴，驴脸大挂的。”2008年7月我在孙杖子采访时，孙中训对我说。“老四叫‘傻四’，没大名，下巴长一大瘤。”同日，孙中贵对我说。

持夫妇二人生了五个儿子说法的，见于记载的有两人：一是与孙永勤同辈份的孙杖子村民孙永忠。二是孙永勤妻子雷永兰。孙永忠在1983年接受栾福忠先生采访时说：“孙永勤一辈弟兄五人”。雷永兰在1982年10月的《回忆我的丈夫——孙永勤》一文中，讲到分家一节时说道：“当时家是老哥五个。”但到了1983年6月，她在另一篇回忆录中又说道：“孙永勤弟兄四个，排行老三。”与前一篇文章矛盾，不知何故。

不论持四个儿子说还是持五个儿子说，孙永勤在亲兄弟大排行中位列第三，大家都无异议。

除儿子外，孙父与孙二奶奶还生有两个女儿。由于旧社会重男轻女的原因，这两个女儿不仅没有留下名字，不知排行第几，而且从没有人正式提起过她们。我是在阅读孙永勤起义后压枪的材料时，看到有人提到“妹夫”一次，有人提到“妹妹”一次，才猛然意识到孙永勤还有两个妹妹的。根据回忆录提供的线索，孙永勤的一个妹妹嫁到了王宝石上庄子，丈夫名叫关仁和，是个小财主。另外一个则嫁到了城墙峪，丈夫姓张，据史耀华1986年11月向佟靖功先生回忆，名字叫张老店，也是一个小财主。

甲午之战

“表姨父是属狗的？”

“嗯，属大龙的。”

2007年4月，我到兴隆县蘑菇峪村黄花峪采访史耀清。老人回忆孙永勤起义后，他的哥哥史耀华与表姨雷永兰之间曾有过上面一次对话。

雷永兰回答史耀华问话时，她已和孙永勤共同生活了十三四年之久，有理由认为，她关于丈夫属相问题的答复是十分可信的。

孙永勤起义时间是1933年，他的儿子孙文孝回忆他当时42岁；孙永勤牺牲时间为1935年5月，热河烈士纪念馆保存的一份材料说他那时44岁。两个年龄的记忆都将孙永勤的出生时间指向了19世纪90年代。

查《万年历》19世纪90年代的农历壬辰年，即龙年，起止时间为公历1892年1月30日至1893年2月16日。据此，孙永勤出生于1892年，或者18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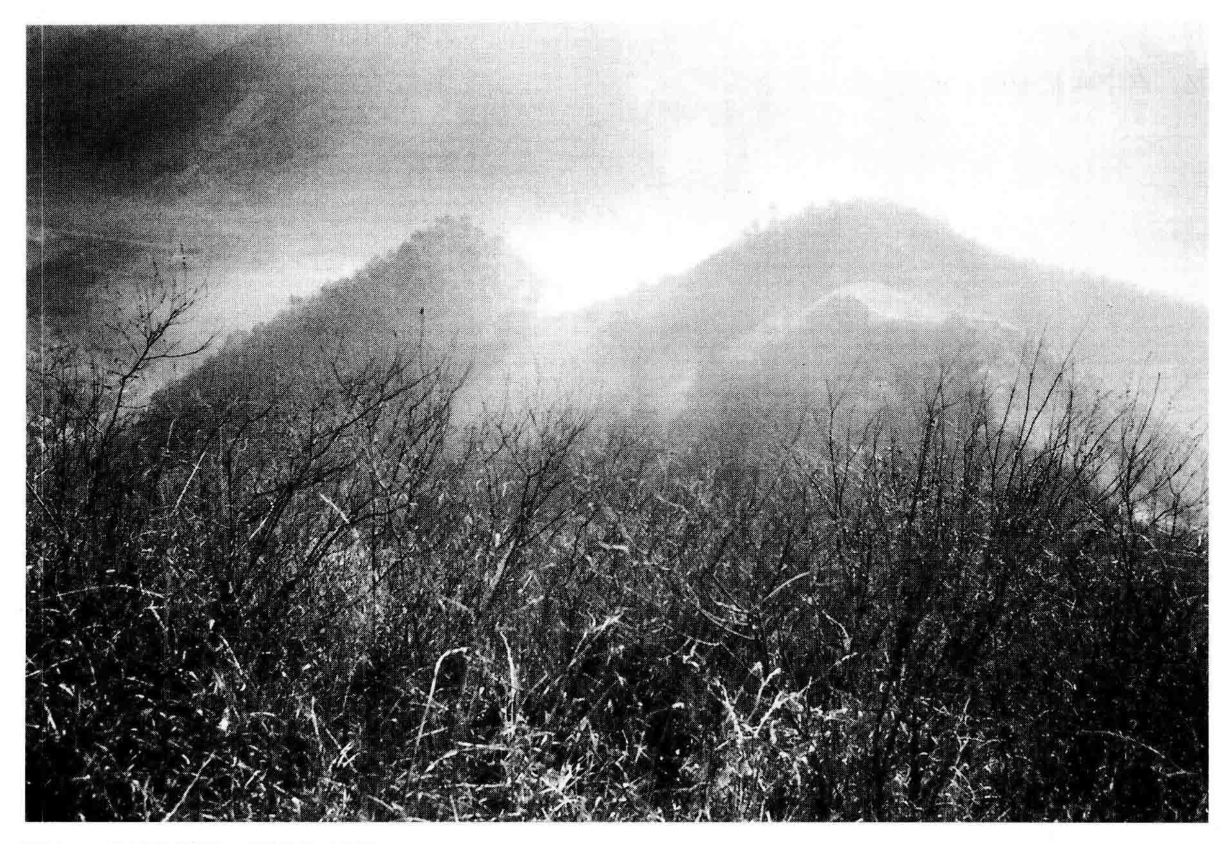


图14　冬日孙杖子　2009年12月

"孙永勤今年91岁。"1983年5月31日，孙文孝接受朱素清女士采访时说。他说的91岁当为虚岁，按此推算，孙永勤应生于1893年。

"孙永勤属龙的，腊月生日。"1983年6月，孙文阁在接受栾福忠、邢连义先生采访时，讲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他的记忆准确的话，那么孙永勤的出生时间可以进一步圈定为1893年1月18日至2月16日之间。

"龙年生人，蛇年讲命"，孙文阁当年接受采访时曾引用过这么一句古语。大意是说，这个时候出生的人，属相虽为龙，却是肖蛇的命运。

孙永勤出生的时间，按清朝的纪年，为光绪十九年初。

与孙永勤同一年出生的，还有一位伟大的人物，这就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毛泽东出生于当年的12月26日，比孙永勤小约十个月左右。

孙永勤出生之时，包括孙杖子在内的整个黄花川流域尚属直隶省承德府管辖。承德府的设置时间是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它由雍正元年（1723年）设立的热河厅改设而来。承德府初属热河道，嘉庆十五年（1810年）开始，改由热河都统署管辖，至中华民国2年（1913年）2月，被民国政府裁撤止，承德府共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5年的时间。承德府裁撤后，中华民国政府设立承德县，县公署驻承德街，即今天的承德市，黄花川地区从此改由承德县管辖。承德县初属中华民国热河道，民国3年（1914年）起，属热河特别区域热河道。民国17年（1928年），张学良易帜，热河特别区域被改为热河省，从那时直至1933年3月4日，日本侵略军进入承德街，建立伪承德县，隶属伪"满洲帝国"热河省止，承德县一直由中华民国热河省管辖。

日军侵入前的中华民国热河省，在中国的自然地理版图上，为内蒙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之一；在中国的政治地理版图上，却为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之一。热河省面积，据《热河失陷目击记》所载舆地新学社1928年的调查结果，约为59万方里，合14.75万平方公里。其形状为以赤峰为中心，南北稍长，近似菱形。过去把热河省接近万里长城的地域称为"热河南部"或"热南"，孙永勤家乡便位于热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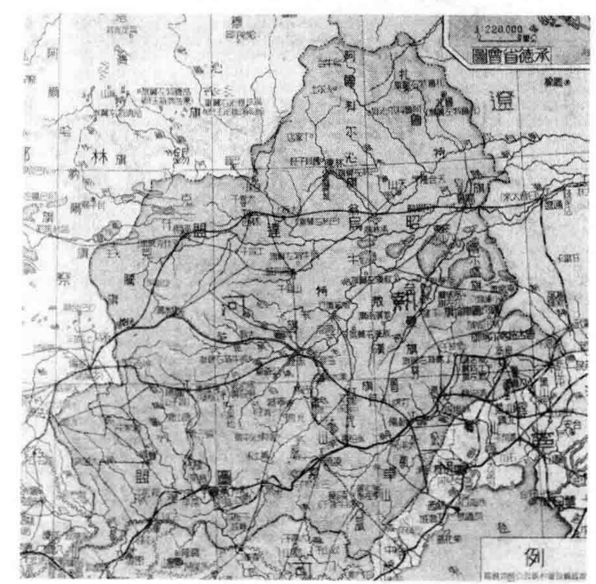


图15　中华民国热河省地图

孙永勤出生后到上私塾前的情况，未见任

何文字材料有记载，今天更没有人能够说清。按理说，他的童年应该是快乐的，原因有三：①他家在孙杖子属于比较富裕的农户，他应不会像贫困人家孩子那样有衣食之忧。②从他成年后对母亲非常孝顺来看，至少孙二奶奶对他应非常疼爱。③当时孙杖子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远胜于现在，景色宜人，可以为他童年的身心提供自由驰骋的舞台。



图16　悬挂于孙杖子小学篮球架上的一座古钟，铸造于清同治十二年八月，上刻铭文："直隶承德府黄花川五道梁陈起德陈起秀创立古庙一座舍立鸣钟一口"。2006年4月

"在过去，后山这树多着呢，有杨树，有杉树，杉树最多。"2007年4月，孙中训向我回忆起他记事的时候，即孙永勤牺牲前后时期，孙杖子的植被还极其茂盛。"小时候，黄花川河套整片整片长着黄花。"

"一直到七几年，孙杖子的山林和河流都还保护得相当好。"孙永勤之孙孙团营小时候曾随父母从唐山回孙杖子探亲，对那时的风景还有记忆，"特别是春天和夏天，绝对可以用天蓝、水碧、山青，到处姹紫嫣红、鸟语花香来形容。"

生活于这么优美的一个自然环境，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夏天的时候，孙永勤会和小伙伴们一块下到村前的黄花川中尽情地摸鱼、嬉笑打闹，冬天的时候，则鼻子头冻得红红的，在一片银白的世界中捉麻雀、打雪仗，或是三五成群地跟着大人们上山追山鸡、撵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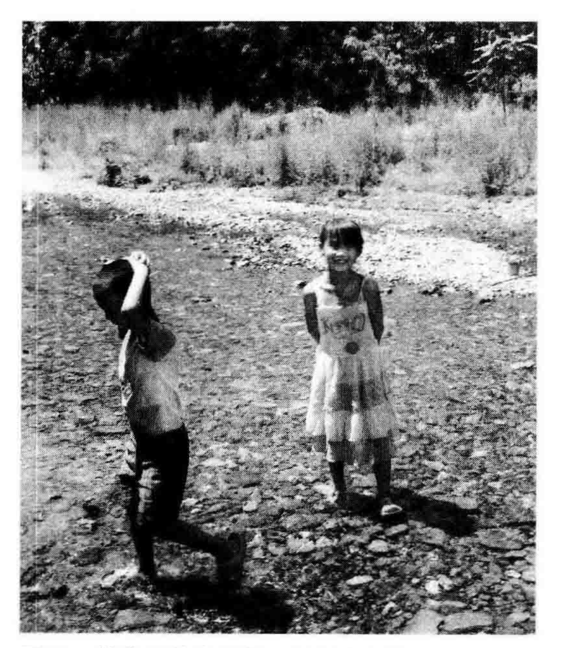


图17　黄花川的孩子们　2008年7月

"小时候玩藏猫，几里地几里地的玩藏猫，"孙中训向我讲述了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孙杖子的小孩子们还爱玩的一些游戏。"在粪堆上玩抢殿，谁给抻下去，就不是英雄。晚上吃完饭玩，一般十来个小孩。吃鹰，一个人抓着前面人的裤腰带，一个人要把鹰头摔倒了，就败了。"

大约这个时期，孙永勤也开始接触武术。"我父从小喜文爱武，好练武术刀枪。"1983年5月，孙文孝接受朱素清女士采访时说。

孙杖子一带流行的武术似乎不是很复杂。"撴拳捋腿，那就是武术了。"史耀清老人谈及孙杖子的武术时说。

一边玩耍，一边习武，或者根本就是把习武

也当作了玩耍的一部分，孙永勤在长城以北的偏僻小山村度过了他一生中应该说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黄花川孩子快乐的心里有时也会掠过一缕难以言说的伤痛。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即孙永勤出生的第二年，日本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预设圈套，诱骗清政府出兵朝鲜，随后借口日朝《济物浦条约》和中日《天津条约》中有只要中国向朝鲜派兵，日本便可向朝鲜派遣军队的条款，大举增兵入朝，蓄意挑起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附近海面首先偷袭北洋舰队，影响中国近代史走向的甲午战争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未料到的情况下突然爆发！

日本以一个国土面积仅相当于当时清朝三十分之一的小小国家为什么要发动对中国的甲午战争（日人称之为日清战争）？110多年来，中、日、英、法、意、德、美、前苏联等国进行了程度不等的研究。中文材料中，民国元老戴季陶、当代作家张承志因为有在日本长期居留的经历，对日本人心理的把握较学者单纯地翻阅资料得来的结论我认为更准确。

1928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论》一书，在《中日国际关系与日本的南进北进两政策》一章中，戴季陶写道：

“我们试想，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地面的差异、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处的生番，便是它所谓天孙民族的这个阶级，还不知是在何处。然而中国文化输入日本以后，不过经过一千几百年，它便造成了日本的统一。如果把一个日本三岛当成一个世界来看，就是它已经造成了一个大同的文化，而旁边的中国民族一天比一天堕落。最初赐文化给日本的朝鲜，更是堕落得不成样子。如果不衰，谁敢去问它鼎的轻重。中国民族如不衰败，日本何敢起侵略中国的野心。蒙古灭宋，这是刺激丰臣秀吉的最大事实。满洲灭明，英法侵略中国，两次订盟城下，是引起西乡隆盛等的野心的最大事实。自此而后，日本的内政一天好似一天，进取的能力一天增加似一天，帝国主义的雄图油然兴起，而历史上的传统政策便确实进行起来了。

“在日本维新之前，俄国的势力从北方压迫到日本来，这个时候，日本志士当中已经生出一种防北的主张。开发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这防北的政策就是北进的基础。北进的道路，不用说跟着神功皇后、丰臣秀吉以来的传统政策来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征服高丽、侵略满洲。在明治元二年，已经有几个很狂妄的武士主张日俄联盟瓜分中国。后来中国的国力一天衰似一天，满清统治能力的薄弱已经被日本看透了。中法战争的时候，中国连战连胜，依然北京政府要忙着割地赔款，这样的情形哪里不引起日本的轻视呢！不止此也，此时俄国势力的南下一天紧似一天，如果日本不努力北进，它也怕唇亡齿寒。占了满洲的俄国一定向高丽进

取，以那样腐败的朝鲜王室和两班哪里当得起俄国的一蹴，所以他们的北进也可以叫作实逼处此。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的大战，他们也是拼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来的。究竟中国和俄国都是世界的大国，以小抗大，而且是抗十倍之大，难道日本人真是疯子，一点不会做退一步的想吗？前进是生路，后退是绝路，他们也是算清楚了的。”

“经过了恐怖的1840年，”2008年，作家张承志根据他1983年以来数次前往日本学习交流的经历，写作了《敬重与惜别》一书，在《长崎笔记》一章中，他写道，“日本朝野上下，因近邻的中国遭受的鸦片战争大受刺激。他们感到危机迫在眉睫，决心富国强兵，救亡图存。”

“细处无需纠缠。重要的是：已经由于中国遭受鸦片战争而受到强烈震动的日本朝野，这次又因黑船的刺激，痛感刻不容缓，发愤富国强兵。”在《三笠公园》一章中，张承志对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心理做了进一步的解析。文中的“黑船事件”，指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四艘蒸汽式军舰强行闯入日本浦贺海面，以武力胁迫幕府开国，次年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结束锁国之事。当时侵入日本海域的美国军舰的舰体为黑色，舰上粗壮烟囱喷吐着的也是黑烟，日本人惊惶失措之下称呼其为“黑船”。黑船事件，国内曾有人将其比喻为“日本的鸦片战争”。

蒙古灭宋，满洲灭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势力南侵，美国黑船进入，中法战争，将戴季陶、张承志提到的诸事件串联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人从战国时代末期开始的心理演变过程：一边是中国——日本一千多年来的学习榜样、老师，张承志称之为日本的“文化母亲”，日益衰败；一边是俄国、美国，开始从南北夹击日本，日本即将上演和中国同样命运的悲剧。于是像上文中戴季陶所说，前进是生路，后退是绝路，日本选择了主动学习西方列强，不再效法中国，极端者如福泽谕吉甚至将朝鲜、中国一概比作“恶友”，“与恶友交亲者难免共有恶名，我应自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倡议“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这种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后，日本迅速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

按照孙中山的观点，东方文明为王道文明，西方文明为霸道文明。日本人以西方列强为师，富国强兵，国力刚获得提升，便走上了和西方列强一样的侵略别国，特别是征服中国的道路。这和它的生存问题有关——日本是个岛国，孤悬太平洋上，火山、地震频发，日本人自古便有不安全感。而国土面积狭小，南北长，东西窄，缺乏防御纵深，资源短缺，又制约了它抗衡白种人的斗争。西方霸道文化让日本人骤然得到启发：化解困扰日本人诸问题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登上亚洲大陆，特别是占领地大物博的中国。当时中国已经衰败，既然蒙古人、女真人、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都曾经打败过它，迫使它割地纳款请降，那么日本人如果准备充足，也完全可实现这一切，甚至成为中国大陆的主宰者、亚洲的主宰者。日本人明了这个问题后，

另外一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适时强烈地起了作用：明治维新之前的1000多年中，日本受中国之惠，但同时也生活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阴影中。对中国景仰羡慕之下，国民内心深处也积累了相当多的忌妒、畏惧与屈辱的情绪——这是由张承志在《敬重与惜别》中多次提醒的中国人需要检讨的大国情结造成的。忌妒、畏惧与屈辱情绪累积到无以复加，突然发生以往不敢仰视的形象的突然崩塌，这些被极端忍耐克制的东西便会以相同的力量肆意发泄到倒地的对象身上。甲午战争应该说是在这双重因素作用下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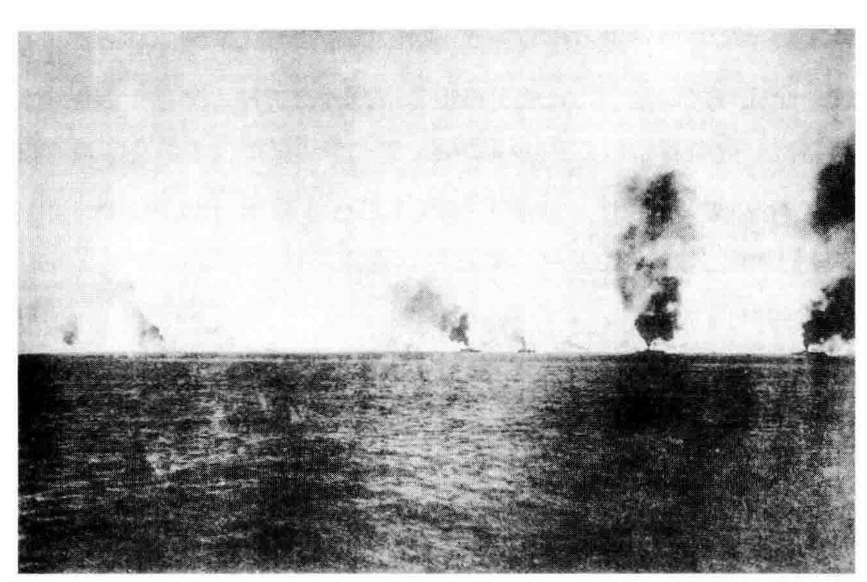


图18　1894年9月17日中午，黄海海战刚打响时的情景（摄影：小川一真）

1874年，日本武力入侵中国台湾，迈出了侵略中国、向外扩张的第一步。1879年，日本吞并中国属地琉球，将其改名为冲绳县。1884年，日本策动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企图摧垮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政变因袁世凯率清军进攻而失败，但次年4月，日本却通过《天津会议专条》（又称《天津条约》），基本实现了策动政变的目标。从这一年起，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开始十年扩军计划。1892年，扩军计划提前三年完成，次年，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为武力吞并朝鲜并同中国开战作准备。为打赢与中国的战争，日本做足了功夫，陆海军除从1879年起便派将校和驻华武官秘密潜入中国各地，搜集军事情报，制定进攻方略外，还使用了相当多的女间谍。“许多秘密情报是怎样获得的呢？北洋水师高级将领中聘请了英国人、德国人。日本派遣女间谍打入这些人出入的外交场合、娱乐场所，想方设法探听窃取情报。”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名叫三浦的原日本海军少尉对中国留日学生方军说。1997年，方军将其写入了《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中。

1894年7月爆发的甲午战争持续了近九个月的时间。

尽管光绪皇帝持积极主战态度，尽管清朝的陆军、海军中像左宝贵和邓世昌那样拼死力战、勇于捐躯的爱国将士并不在少数，战争爆发地区的民众也努力支援清军，但由于清政府中内耗严重，中方统帅在战争指挥上缺乏坚强的战斗意志和敢于胜利的精神，特别是集军事、外

交大权于一身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严重估计不足，过度迷信“两国外交，全凭理之曲直”，自始至终抱着通过外交折冲、列强干涉保全和局的幻想，战争爆发前不积极备战，战争开始后，又消极防御，甚至避战保船，甲午战争最终以清王朝全面败绩而告终。[1]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及随后签订的《辽南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中国不但被迫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承认属国朝鲜完全独立，割让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给日本，而且作为反侵略一方的中国还不得不向侵略者日本支付赔款库平银2亿两、赎辽费3000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并给予日本在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企业的自由及在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天津、上海、厦门、汉口八座城市设立租界的权利。通过这些条约，日本一跃成为了亚洲强国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日本人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也未免太天真了。”曾在清政府的海关担任总税务司长达50年之久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在评论甲午战争时无比沉痛地说。

甲午战败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极为巨大的。它不但打断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进程，迫使清政府和中国人民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进一步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最重要的是，它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深受打击。甲午战争前，中国虽已被英法两个西方国家打败过，但中国人骨子里仍信心满满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所谓“大国”之一。甲午之战，中国被东方一个经常蔑称其为“蕞尔小国”的岛国击败，是从来未想象过的，中国人的自大的感觉受到沉重的打击，民族自信心一落千丈，从此只能在暗中咀嚼耻辱并承受痛苦。直到将近60年后，在毛泽东领导下，还是在朝鲜半岛——甲午战争的爆发地，中国人民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才开始重新树立。其次，它使世界，特别是日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导致了30多年后另一场更大悲剧的发生。日本富有良知的学者津田道夫在其《南京大屠杀——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一书中，援引过村上兵卫著作《国破》中的一个例子：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派遣亚洲最大的两艘军舰“定远”和“镇远”号到达长崎，舰上官兵粗暴地对待长崎当地居民，日本人由自卑感出发而称呼中国人为“呛呛和尚”。津田

---

[1] 近年有种新的观点认为，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责任不应由李鸿章来负，以军机大臣、帝师翁同龢为领袖的清流言官们才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的罪魁祸首。出于对经手洋务的李鸿章的不满，为将李氏淮系势力清理出陆海军，翁同龢等人在战前及战争进行当中处处给李鸿章掣肘，造成整个甲午战争成了北洋一隅与日本一国相搏的局面，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详见陈悦《沉没的甲午》。他认为，若论甲午失败的深层原因，还是中国近代化改革的不彻底。

道夫由此引伸开去说，直到甲午战争前，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人都是极端景仰甚至可以用极端恐惧来形容的，但这种态度由于中国人的参与美国西部的建设，特别是之后的甲午战争，发生了180度的大转折。日本人由极度崇敬中国人转变为极度蔑视中国人。“中国对日本而言，本来犹如希腊、罗马之对于西欧人，但在美国西部铁路铺设和矿山开发中，危险而又比奴隶更便宜的劳动，居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由此开始了‘苦力贸易’。这一事态受到了日本的精英阶层的注意。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的印象中，已有了不同于固有印象的另一个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迎来了日清战争的胜利。正如竹内好所说：‘这一蔑视感毋宁说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具体地说，是日清战争的产物。而且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由日清战争前的恐惧感造成的。’”以为只有日本人才是亚洲最优秀的人种，除日本人外的所有亚洲人都是劣等人，尤其中国人简直就是猪，特别地不把中国人当人，浸润到日本人的骨子里和血液中，直接造成了日本人在20世纪对中国的肆意侵略与野蛮杀戮。

回归本书正题，孙永勤的童年正处于中国经历甲午战败，随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意欲将中国彻底瓜分这一阶段，外界通往孙杖子的道路虽艰难，但因为距离京师并不遥远，且村东十华里处便有滦河水道沟通关内和承德方面的消息，充塞相当多中国人心中的面对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挫折感与痛恨多少会影响到那里。作为黄花川边的一个极其顽皮的山村儿童，即使再茅塞未开，也会从大人们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一些沉重的东西。

在快乐与怅惘交织的岁月中，孙永勤长到了上学的年龄。“孙氏兄弟当中，数孙永勤最鬼头。”史耀清说。孙永勤被家人送进私塾读书。私塾的地点，一种说法为蘑菇峪，孙杖子村民孙永忠持此说。一种说法为黑河，兴隆县三道河乡灰窑峪村续振声持此说。然“黑河”这一概念涵盖地域甚广，五指山以南、明长城以北的黑河沿岸地方都称之为“黑河”，孙永勤具体在哪里上学，续振声未讲。第三种说法是孙文孝1983年5月向兴隆县委党史办朱素清女士讲述的，据他说，他父亲是在潵河二堂胡椒峪读的私塾。第四种说法，孙永勤就在孙杖子庄内读的书，孙杖子村民孙中训持此说法。孙文孝1990年11月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也讲到他父亲是在孙杖子跟私塾先生念的书，然而他的这个说法又与1983年说法矛盾，不知何故。

李桂攀

不止一位历史工作者在评论孙永勤英勇而短暂的一生时，注意到私塾阶段对他人生观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在私塾中，他遇到了母亲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塾师李桂攀。

李桂攀，据佟靖功先生介绍，是兴隆潵河川的著名爱国文人，解放后曾当选为兴隆县第一届政协委员。“在老华国（指中华民国）那个时候，他可以说是兴隆最好的一个教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诗书教得特别好。”

“都管他叫‘三先生’。”原中共兴隆县委组织部部长、兴隆县人大副主任杨玉良1938年冬跟随李桂攀念过一个冬天的私塾，那一年他8岁。1945年日本投降后，再次跟李桂攀读了一个冬天的书。第二次读书时，他和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与李桂攀之子——他们的同班同学义结为兄弟，因此缘故，李桂攀成了他与几个同学的干爹，“默认，谁也没叫过。”杨玉良说。

“在我心目中，最主要的是他会教书，当时附近就数他文化高了。”李桂攀第一次教杨玉良读书时，已年近六十。杨玉良回忆他的模样时说，“大圆盘脸，大眼珠子，大厚嘴唇，红得都发黑，还长着连鬓胡子，学生见了他呲眉瞪眼的样子就害怕。冬天穿黑色大襟棉袍，夏天穿大褂，也是蓝色、黑色居多。都是家织布，自己染成黑色或是蓝色。夏天戴着草帽。教书中（方言，行、好的意思），就是对学生严格。今天给你号十页作业，你明天上午必须得把它背写下来。光会背不行，你还得讲下来，讲清楚。那时候，晚上钻被窝里都得念呢，不念，第二天就交代不了。比如说，今天讲‘人之初，性本善’，你得讲下来。他后屁股底下专门坐着一个板子，念错了，或者不会了，你就自动把手伸出来。写错一个字或是念错一个字，都是三板子，差一笔画还不中呢。我有一次，就差一画，挨打三板。打儿子更是没数。给你出仿影，写个十天八天，再换一个，你还得写。随便写不中，笔杆得冲鼻梁，想手一侧（音zhāi）歪，歪着脑袋写，姿势差一点，‘啪’一脖搂子。淘气，被他发现，也得挨揍。学生哪天也有几个挨打的。有一个杨新文，挨打，哭着央求：‘你别打，你别打，我给你拿嘎渣儿（即锅巴）。’他的妈妈在教室外听见，嫌孩子不争气，大喊：‘打！打！’有的学生承受不了，中途也有不念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李桂攀这种老式的教学方法，极易让人产生简单粗暴的想法，为现代教学方式所不取。但世间万事万物没有绝对，这种古老的教学方法也并非全然没有可取之处，杨玉良就说：“他教的学生，一般出来都差不多。书法，只要学下来的，都可以。”

李桂攀的家乡在孙杖子西南50多华里外的灰窑峪，今天它是属于兴隆县三道河乡管辖的



一个村庄。村子的绝大部分坐落于京建公路北侧，从村子中央一个路口下道，向北步行约200米，可以看到一块四周用碎石垒砌的方形平地，平地有半亩大小，中部和南部零零星星生长着几株杏树，靠近北头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黄土的坟茔，那便是李桂攀最后的安息之地。

"爷爷是1967年去世的，活了88岁。"

李桂攀的孙子李思迁是灰窑峪村的党支部书记。2006年4月中旬一个阳光明媚、杏花怒放的上午，我来到他家，听53虚岁的他和他76虚岁的哥哥李思伶（孤儿，被李桂攀抚养长大）、62虚岁的哥哥李思尧一同回忆了李桂攀生前的一些情况。

"身高一米七，白胡子，走路走得很快。烟袋长长的，是特制的，既是烟袋，也是拐棍。学生不听话，'啪'就是一烟袋。"三兄弟不清楚爷爷年轻时候的样子，只对他晚年的模样有记忆。"

据三兄弟讲，他们的爷爷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爷爷的父亲是清朝的秀才，真实名字不清楚，只知道大家习惯上都称呼他为"李老东先生"。老东先生酷爱丹青，一辈子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对水墨画的研习上。他的山水画和花鸟画非常出色，滦河地区过去很多庙宇的墙壁上都留有他的墨影和题名。三道河一带农民盖新房，如果要画房檐和影壁，主人第一个希望请的画师就是老东先生，并以最终能够请到他为全家的荣耀。

老东先生有三子，李桂攀是最小的一个。受秀才父亲影响，少年时曾饱读诗书，并会中医，精于妇科，此外对天文地理、堪舆等学问，也颇有涉猎。

与父亲的志向不同，李桂攀对绘画不感兴趣，他为自己选定的人生之路是传统的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李桂攀从15岁开始，便出外到宽甸、蘑菇峪等地做私塾先生，给那些地方的少年儿童讲授诸如《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等启蒙课程。

"上大人，孔乙已，化三千，七十士，……"三兄弟至今还会背诵一些爷爷教过的课文。

"特别爱编顺口溜，比如说宽殿[1]地方大，编过'宽殿宽殿，大殿三百五，小殿赛牛毛。前街唱戏，后街知不道。东庄下骡子，抱到西街就老死了。'瞧见八路军打日本，高兴，编过'机关枪，迫击炮，打死敌人两河套'等等。"尽管外表给人极为风趣幽默的感觉，但在三兄弟眼中，爷爷骨子里却是一个非常传统之人。"他编过一部长达二十多本的书，取名《糟糕传》，讲的是一对开铺子做小生意的夫妻因为打架，惹得财神发怒，生意败落，穷困潦倒的故事，有劝诫众生之意。另外，每当新鲜水果下来，必首先端一些恭恭敬敬摆放到先人照片前，说这是对先人的尊敬。"

在这方面，杨玉良与三兄弟看法一致："他挺信奉孔子、孟子。那时候，教室里供着孔

[1] 即今日兴隆县蘑菇峪乡宽甸村。

子、孟子，初一、十五烧香。每天一进教室门，先给圣人像鞠躬，再给老师鞠躬。背书都得在孔子像前背。”

李桂攀对中国传统精神的重视和坚守最集中地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担任孙永勤老师的那段时期。

长城以北、热河南部地区旧时儿童入私塾的年龄一般为七八岁，照此来推，孙永勤入私塾应为1899或1900年前后，那时的李桂攀大约二十一二岁，正是一生中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光，但是他当时的心情应该不会愉快，甚至要用“郁闷”乃至“沉重”等字眼来形容。

那一时期，对中国人来讲，正可谓多事之秋。甲午战败的创痛还未平复，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狂潮又如巨浪般掀起。先是1895年开始，法、俄、英三国分别强迫清政府将中国的一些地区开放为商埠，并将中国部分地区的开矿、筑路、航行权夺到手中。其后又发生了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打死的“曹州教案”为借口，出兵占据胶州湾（今青岛），将山东强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俄、法、英、日不甘落后，分别将东北三省、蒙古、云南、两广、长江流域诸省及福建划为自己势力范围之事。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及传教士、教民的恣意妄为终于引发了中国农民仇恨的怒火。1900年春夏之交，中国直隶、山东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作为对这一抗争行为的回应，八国联军随即侵入天津、北京。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政府顽固派为维护统治地位，始则对义和团大加利用，终则不仅将其出卖，而且与列强合谋，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的剿杀。1900年12月24日，英、俄、德、法、美、日、意、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十一国共同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款，强迫清政府接受，慈禧“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款，全部照允。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十一国公使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额最大、主权丧失最为严重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按当时全国人口数，每人向列强赔偿白银一两，共计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赔款在39年内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中国共应向列强支付白银9亿8千多万两（如加上中国各省需赔偿的“地方赔款”或称“教案赔款”白银2000多万两，中国实际共要支付白银10亿多两，折合2008年之前的美元，约100多亿美元）。赔款外，《辛丑条约》还规定：各国可在北京东交民巷单独设立使馆区，使馆区内可以驻兵，中国人不准在此区域内居住；将天津大沽炮台和从大沽至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周围10公里范围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禁止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运入中国，为期二年，可以延长禁运期；清政府惩办祸首；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一律斩首；清政府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果再发生伤害各国人民的事情，或者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刻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等等。

《辛丑条约》除第六款——偿款一条外，与孙永勤及中国人民的十四年抗日战争关联最大

者，为第九款，内容如下：

按照公历1901年1月16日，即农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日后长城抗战之所以打响，“何梅协定”之所以达，“卢沟桥事变”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此第九款赋予了日本国在京榆铁路沿线战略要地驻军的权利。可以说，死伤数千万中国人命、财产损失无法计算的巨大灾难虽在30年后才发生，但其中一颗非常重要的地雷却在1901年就已被悄然埋下。

《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愤怒与屈辱充塞着每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的内心，这种痛苦体现在年轻的私塾先生李桂攀身上，就是极力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李桂攀先生曾去北京考过学，在瀓河、黑河等地教书多年，他曾经在黑河教过孙永勤。”1990年2月，灰窑峪村民李伯然、续振声向到访的佟靖功先生回忆道，“李先生教书，很有进步思想。他除了教五经四书以外，还给学生讲中国历史（当指中国古代史——编者）、中国近代史，给学生讲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当指中日甲午之战——编者）、辛亥革命，还讲过红军、土地革命。每天夜间他都给学生讲《说岳全传》、《聊斋》等爱国或正义的故事。由于他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孙永勤曾受到他的启蒙教育。”

李伯然、续振声提到的那些课程，当为他二人随李桂攀读书时学过的内容——1900年前后，孙永勤读私塾时，辛亥革命、土地革命尚未发生。然而，即便去掉这两部分内容，从私塾课程外，主动向学生宣讲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中日战争、《说岳全传》、《聊斋》来看，年轻的李桂攀心中激荡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浪潮，胸中充溢着对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的怒火，并希望把所有这些像种子一样培植进学生心田，这种复杂的感情还是很容易感受到的。

李伯然、续振声所讲是一个李桂攀主动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的版本。此外还有一个被动版本，这个版本是1990年11月，由孙文孝向佟靖功先生讲述的。事情起因是李桂攀年轻时爱抽大烟，家人曾经多次劝说，都无结果。

“有一次，孙永勤对李老师说，我有三句话，你听，我就跟你学到底，不听，我就不学了。李老师说，你说吧。孙永勤说，第一，除去诗书以外，请你还要教我们《岳飞》、《三国》、《中国近代历史》、‘三民主义’，我还要跟你学武术。第二，你们家的土地很多，向穷人少要些地租。第三，这时我父亲给老师跪下了，接着说，老师，你给我们讲鸦片战争，林则徐如何爱中国，禁烟，烧了英国人的鸦片。老师，你是爱国的，可是你为什么也受了鸦片的

流毒？老师，你不能再抽大烟了。我帮助你戒烟，别的学生一年给老师五斗棒子米，为了帮助老师戒烟，我给老师一石棒子米。李老师是个有志气的人，为了戒烟，在我们家住了21天，都是我母亲（疑为‘祖母’之误——编者）服侍他。我父亲是大学长，第二天给学生上什么课，都是在头天晚上李老师教给我父亲，第二天我父亲再给李老师代课。李老师戒烟以后，对我父亲特别重视，他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还给我父亲等几个学生讲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指中日甲午之战——编者）、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我父亲深受李老师的影响，很早就有爱国思想。”

以上情况是孙永勤私塾时代的同学孙永海、孙永芳、孙永彩告诉孙文孝的，具有一定的可信性。此一版本中，李桂攀课外讲述的行为变成了孙永勤请求的结果，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求知欲非常强、仁义、敢于仗义执言的少年孙永勤形象，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勇于纠正自己错误、认真教育学生的年轻塾师的形象。

主动也好，被动也罢，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会自己从天外飞来，它们是因为李桂攀先生凭借自己的博学对孙永勤启蒙、传授，才在孙永勤的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起来的，这一点，任何人都不应否认。

据传，李桂攀给孙永勤讲的所有东西当中，最让孙永勤喜欢的是《说岳全传》、《水浒传》。

“孙永勤最佩服的是岳飞，”佟靖功先生说，“对岳飞抗金救国的精神非常敬仰，对水浒义士们的行为也非常欣赏，受他们影响，他从小就产生了除暴安良的忠义思想，很小就养成了不畏强暴的性格。”

对岳飞和水浒英雄的热爱贯穿了孙永勤的一生，他们的精神深深融入了他的骨髓和血液中，特别是水浒英雄们的故事，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日后孙永勤的抗匪行动，而且直接指导了他起义之后对日本关东军的斗争。由于采取了和水浒英雄们一样的善待穷苦百姓的方式，据传孙永勤在冀东长城南北赢得了和宋江相同的“及时雨”的名声。

孙永勤跟随李桂攀读私塾的年限说法不一，有五六年说，有七八年说。他之所以不再继续读下去，一种说法是与他的父亲突然去世有关。

孙永勤父亲死于一个意外。

之前讲到过，孙永勤父亲腿患风湿。“太奶奶（指孙永勤母亲）用五挑水熬草药，那水得有半缸，让太爷（指孙永勤父亲）坐里面，拿石头缸盖盖上，给他治病。为他好，结果闷死了。”孙杖子村民孙中贵说。

孙永勤父亲去世时，孙二奶奶33虚岁，因自己的大意导致丈夫丧失生命，让她陷入极度的自责中。丈夫之死不仅让她从此形单影只，家中的劳力也变得紧张起来。由于这个原因，据说孙二奶奶不得不被迫终止孙永勤的学习，让他回家帮助打理家业。

然而上述说法似乎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他们弟兄四个都念七年书。”1983年5月31

日，孙文孝接受朱素清女士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他的话属实，那么孙永勤读多少年私塾取决于父母最初的决定，和他父亲的突然去世无关。

无论什么原因，总之孙永勤的学业要终止了。他每天形影不离缠着老师，要他讲述古代英雄人物忠孝节烈的故事，包括作为大学长代老师讲解课文之事，都将成为遥远的过去。从此再不可能每天踏进熟悉的课堂，再不可能每天见到老师的面容，每天聆听老师的教诲，可以想象，孙永勤的心情是极其失落、极其难过的。如果说孙二奶奶是给予了他肉体生命的人，那么李桂攀在孙永勤的成长道路上，应该说是赋予了他精神生命的人。两个人都非常重要，但后者要比前者的分量似乎更重一些。这一点，孙永勤内心深处似乎十分清楚。20余年后，他投身到残酷的抗匪和抗日斗争中，常带队伍从灰窑峪过。据李思迁兄弟讲，只要时间允许，他一定会去看望一下李桂攀——给了他思想、近乎精神之父的老师，师生简单地说说彼此的近况，谈论一番时局。之后，孙永勤和老师告别，匆匆离去。

雷永兰

最早1903年，最晚1908年，孙永勤终止了私塾学习，回家从事农业生产。

清末时期，孙杖子一带的主要农作物有玉米、高粱、谷子、豆子几种，果树也有，但是品种单一，数量也少。“有一点栗子树，都是打来自己吃。”孙中训说。

“从小参加劳动，爱干活。”孙永勤从事农业生产时期的情况，见于文字记载的几乎只有孙永忠的这寥寥数字。看起来虽然极简单，但却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孙永勤的一个显著特点：虽然家境富裕，但是不懒惰，不骄奢，具有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孙永勤家乡地区的农业活动集中于农历三月至九月间，之后便是漫长的近半年的农闲时光。年轻的男子们不愿猫在家里无聊度日，此时会选择拿起枪，登上黄花川和滦河两岸的高峻山岗去打猎，一方面让家里的大人孩子们尝到些野味，同时借此舒展一下被土地拴缚得僵硬、迟钝了的身心。

黄花川、滦河一带山中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据孙杖子多位超过70岁的老人介绍，至少有土豹子、狼、灵狗子、狍子、野山羊、野兔、野鸡等七八种可打的猎物，其中又以狍子、野山羊、野兔、野鸡的数量为最多。男人们上山打猎，一般三四个人一组，人数之所以不再多，据孙中训老人解释，“去人多，打着了，一劈就没了。”这种几个人一拨、相互配合着打猎的方式在热河南部山区被称之为“打红围子”。经年上山打猎，孙杖子颇出了几位枪法出众的人。“我们北山有几个猎手，举手枪就响。”2008年7月21日，孙中贵以极是服气的口吻对我说。



图19　孙永勤表外甥史耀华。2005年1月，佟靖功先生带我到黄花峪采访他时，他已卧病在炕，一年后去世

孙永勤在秋庄稼收完、颗粒全都装进粮仓后，也加入到了打猎的男人们当中。由于从小头脑就灵活，加上练过武术，身手比较敏捷，读过几年书，会总结经验教训，他很快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孙永勤枪法准，头上顶洋钱，一枪一个。”孙杖子村委委员张青山小时候常听家里老人念叨孙永勤的枪法，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他们说过的一些话。“燕子过来，可以打下来。”孙永勤起义时，史耀清12虚岁，由于年龄尚小，

未能参加表姨父的队伍，但他的哥哥史耀华却跟随孙永勤转战了一年多的时间，史耀清曾多次听到过哥哥这样谈论孙永勤的枪法。

张、史二人所言，应为孙永勤后来使用现代武器时的情况。据见过他的人回忆，孙永勤生前惯常使用的是盒子枪即毛瑟手枪。毛瑟枪等西式武器或仿西式武器流入热河南部地区民间基本上从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才开始，在此之前，冀东长城北侧民间打猎、看家护院主要使用火枪。孙永勤用火枪时的情况，虽无文字记载，今天更没人能回忆，但由他用毛瑟时的情况逆推，出枪快、枪法准也是不用怀疑的。

热南滦河地区多山的地理环境、寒暑两极的气候、半农半猎的生活深刻地磨砺着少年孙永勤，到18岁时，这个山东移民的后代不仅枪法远超同龄人，据说身高也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大长方脸子，大下巴，手大、脚大，得穿一尺长的鞋，个子还高。”孙永勤的表外甥史耀华说。

“七岁时就和十三四岁的孩子同样身高，到十七八时就快到两米了。”佟靖功先生说。

佟先生并非夸大其词。在兴隆县史志办提供给我的孙永勤资料中，有一份佟先生采访承德县路通沟村民赵廷山的原始记录，在1988年12月13日的这次访谈中，赵廷山回忆说：“孙永勤，大个子跟他差不多。”这里的“他”，经向佟靖功先生请教核实，指的是佟明开——佟先生的儿子，由于担心下雪路滑，父亲一个人出去不安全，他陪同佟先生到赵家庄做了那次采访。佟明开的身高为1米92，孙永勤的个子与他差不多，那么孙永勤的身高也大致为1米92左右。

身高之外，孙永勤令人错愕不止的还有他的外形。普通人之手都在膝盖以上，据说孙永勤的双手却可以垂到腿弯以下，这一点让看多了话本小说、听多了评书戏曲的老人们除了认为他是天上某星宿下界外，再无法做其他的解释。手长过膝和后来不断有人说他显形为黄狗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孙永勤是娄金狗转世或通俗一点说天狗星转世的传说，从1933年一直到今天，流传于冀东长城北侧原热河省南部的民间。

枪法好，身材高，体形奇异，使得孙永勤在孙杖子格外引人注目。这些加上他从小就仁义，不吃亏但也不恃强凌弱，为人公平，敢于主持正义，年纪轻轻就成了孙杖子一个很有威望的人。

“18岁时就拿事，孙杖子谁家有大小事，置房子置地，都爱找他。”1983年5月，孙文孝对兴隆党史办朱素清女士说。

孙永勤妻子雷永兰曾讲过一件事：“孙永江说媳妇，要一头猪才把媳妇送来。孙永江日子穷，给不起，孙永勤从家里抱了一头小猪，六斤多，给送去了，娘家哭笑不得。孙永勤说，你们说要一头猪，我就送来一头猪，你们可没说大小。现在是小猪，养大了就是大肥猪。把大伙说乐了，欢欢喜喜把姑娘送来了。”

孙永勤从事农业生产三四年后，大约1910年或1911年，经媒人介绍，与一位姓李的姑娘结了婚。关于这位李氏姑娘，由于时间过去近百年，她的详细情况已无人能说清。目前能够知道的是，她是离孙杖子不远的樊家沟人，和孙永勤大概只生活了三四年的时间，便因病去世了。李氏的病症据说是咳嗽，由此推测，她极可能患的是那个时代无法治愈的肺痨。李氏为孙永勤生有一个女儿，起名孙玉香。李氏亡故时，孙玉香3岁，像失去了母亲的羊羔，可怜地成长。

孙永勤第二次结婚是在李氏去世五六年后，时间为1919年。

“我们这个婆婆是阎杖子北大地的妈家，家里挺穷的。”家住兴隆县城车道沟的孙永勤二儿媳贠玉萍介绍说。

孙永勤新娘的名字叫雷永兰，当年17虚岁，比孙永勤整整小10岁。

来自各方面的材料表明，雷永兰爱极了她的这个丈夫。“他为人正直，性格刚烈，好打抱不平，非常讲义气。”孙永勤牺牲47年后，雷永兰向党史工作者回忆他的一生时说道，话语中充满了怀念之情。应该说孙永勤对这个小媳妇也是很爱的，孙中训就曾跟我说过：“孙永勤跟媳妇感情好。”但这只限于一般情况之下，由于年龄、性格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特别是人生观、世界观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对他来说重要的事情上，他与雷永兰之间常常发生意见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情况，也是无须掩盖的事实。

“孙永勤看书有瘾，‘看三国，瞅六国’，快吃饭了也要看。经常饭都凉了，还在看书。有时通宵地看书，一夜点半斤灯油。我因为不让他看书，他经常打我骂我。”1983年6月，雷永兰在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回忆说。

“孙永勤一个不怕老婆，一个不嫖女人，就是大男子主义！”2007年4月15日，孙永勤表外甥史耀清坐在他家炕头上，激动地点评道。

“大男子主义，谁说不听，邪门不信。”孙中训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

孙永勤和雷永兰结婚后不久，几兄弟便分了家。根据孙文孝1983年5月的回忆，孙家那时有土地二十二亩，他父亲分到了七亩半地。

分家后，孙永勤在村庄最西头选中一块地方，盖了新房，和妻子、孩子搬了过去，现在的故居遗址便是当年孙永勤所选之地。

“西头头一户，台子上是坟圈子，没人住，其他人都在庄里住，距离有半里多地。孙永勤在那儿盖了三间房（雷永兰和孙永勤长子孙文伶均回忆为六间房）。没厢房，独房独院。院里三间瓦房（按雷永兰、孙文伶说法则应为六间），一眼井，院外是碾子。碾子是唐山石头，自己打的。孙杖子那时也就五六十户（据孙杖子村民回忆，当时只有三十来户），都姓孙，没外姓。过去没杨树、槐树，只有柳树。也没瓦房，全是草房。”关于那处院落，史耀清回忆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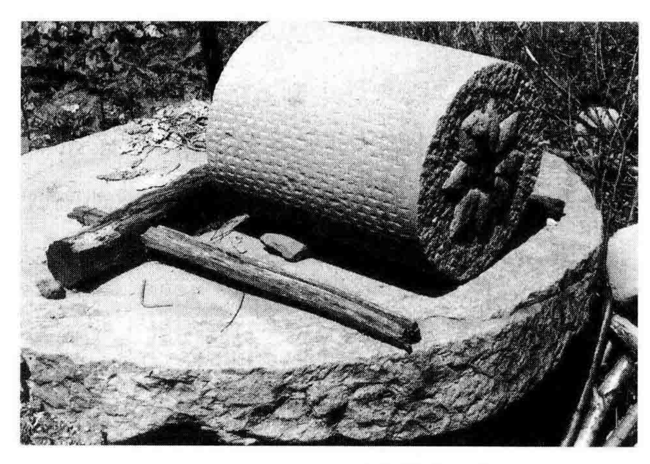


图20　孙永勤家碾盘　2002年7月

“挺好的一个窝里圈，就是风脉忒硬。房子凶着呢，动静大，不是这儿‘砰啪’，就是那儿‘砰啪’。孙永勤死后，儿子们都不敢住，住到另一处去了。”

自立门户后，孙永勤一家依然靠经营农业来生活。“什么手艺也不会，农人。”1983年6月，孙文阁接受栾福忠、邢连义先生采访时说。有种说法，孙永勤经过商，经在孙杖子了解，没有此事。

孙永勤将分到的七亩半地，划为两部分：一部分自己耕种，一部分租给别人。收获粮食后，除去家庭用度，其余大部分放了粮债。粮食生粮食，粮食多了购买更多的土地，土地再生长出更多的粮食——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这是热河农村典型的发家模式，孙永勤爷爷、父亲是用这种模式发的家，孙永勤也是采用这种模式发的家。

孙永勤发家到什么程度呢？

一种说法，到孙杖子土改之前，即1947年之前，孙永勤家有土地100多亩。

1983年，孙永忠在接受栾福忠先生采访时说：“孙永勤家有山洼地100多亩，土地大部分租给佃户。他家中有一个长工，忙时有五至十人帮工。”

同年，孙文炳在接受栾福忠先生采访时，也回忆说：“孙永勤家有100多亩土地，房屋六间，一马一驴。家中有一个掌柜的，负责管账，催收地租。家中雇人耕地打柴等。土改时他家被定为富农。”

持孙永勤家有土地100多亩观点的还有孙文阁。1983年6月1日，他在接受栾福忠、邢连义先生采访时说：“孙永勤家8口人，三儿三女加上他们夫妻俩。有六间房，一骡一驴，100多亩地。地都租出去，靠吃租子。雇一扛活的。”同次采访中，孙文阁还谈到一个情况：“孙永勤全年打三四十石粮食。”这个数字如果准确，按民国时期一石小麦约重145市斤，一石大豆约重140市斤来计算，孙永勤家每年可收获粮食约四五千斤。

“他家的地，实际有三五十亩就了不起了。”

对孙永勤有土地100多亩说，也有持异议者。黄花峪的史耀清老人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质疑者。“孙永勤种地的地方就在现在的孙杖子卫生院那儿。”2007年4月15日，他对我说。孙杖子卫生院位于我每次前往孙杖子采访时落脚的酒家东边，传说孙永勤起义时站立其上发表讲话的碾盘就位于卫生院旧址的西南角，那块土地面积确实没有100亩。

“孙永勤家，要我说没有100亩地，连50亩都没有。那时候都说种几天地，没亩数。都是山坡子地，没法丈量亩数。”与史耀清意见基本相同者还有遵化新店子镇康各庄村民孙中印。孙中印是孙永勤大哥孙永彬之孙，父亲孙文贺为孙永彬第五子。孙文贺曾跟随叔叔孙永勤起义，在门子哨二道石湖伏击过关东军。孙文贺于1947年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移居今遵化新店子镇康各庄，孙中印1954年在那里出生。“孙永勤就是矬子里拔将军，别人吃两顿，他能吃三顿。”2009年11月29日，孙中印说。

“孙杖子村现在总共不超过1500亩地，整个孙杖子庄不超过200亩地。”孙杖子孙中彦也不支持孙永勤家有土地100多亩说。2009年12月4日，我第七次前往孙杖子采访时，他说：“那时候孙杖子大部分地都是张如增的。孙永勤家要是连山林算上，就是不长庄稼只长树的地方都算上，可能有100多亩。孙永勤家只能说够吃，有余粮，有余钱，比别人稍微富点。”

“我家有吃有喝，我不愿把枪交给日本人，当亡国奴。”

“用奶奶的话说，我爷爷一家在当地已经属于比较富裕的大户了，从没为缺钱发过愁。据说钱多时曾达到用水舀子量的程度。”

上面两段引文，前者为孙永勤自己所讲，摘自抗日救国军第八队长单忠英1983年4月对栾福忠、邢连义先生的回忆中。后者为孙永勤之孙孙团营对我所说，时间为2005年4月5日。这两段话是孙家人自己对自己家情况的介绍和回忆，可作为100多亩说和不超过50亩说之外的第三种说法。

上述三个说法，仔细思索起来，实际上哪一种都和非常富有相距甚远，和关内的豪富相比，更是没有可比性——孙永勤大哥家的富裕程度和孙永勤差不多，1947年实施土地法大纲，孙永彬被定为富农，受打压，被迫由孙杖子搬至遵化。到遵化后，和当地的富农一比，据孙中印向我回忆：“觉得太冤枉了。”尽管不能称之为巨富，甚至孙杖子首富也谈不上，但相对于孙杖子大多数家庭来讲，孙永勤家位居富裕人家之列，是没有疑问的。

虽属于富人，但孙永勤对穷人却很好。这一方面和他自幼受到孙二奶奶的言传身教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他天性中有很仁义的因素也不应被否认。

“孙永勤热爱人。”1983年，孙文阁评价孙永勤时说。

“孙永勤为人公平，捧穷人，有啥吃不上饭的穷人，借给几斤粮食，还不起就不要了。”孙文炳说。

“孙永勤是孙杖子的富户，吃租子，放粮债。张如增放债是春天借一斗，秋后还两斗，加码子利息。孙永勤对揭不开锅的穷人，有的要几成利息，特别穷的不要利息，实在还不起的就拉倒了。”张杖子张如山回忆道。他所说的张如增是张杖子大地主，在遵化、承德两地广有田产。孙永勤起义后曾到他家压过枪，后面还会提到。

土　匪

从大约1903至1908年间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到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中间除了第一个妻子生病和去世会对孙永勤的生活产生影响外，大部分时间他都过着平静的山区富户的日子。

他不欺负别人，别人也欺负不了他。“孙永勤不恶不孬，谁欺侮他不干。”孙文阁回忆说。他的嗓门特别大，据说一嚷起来人人都害怕。“孙永勤办事吃不了亏。”孙文阁说。农业劳动间隙，他喜欢唱上两嗓子，被孙文阁形容为“唱唱呜呜，乐唱的人”。“孙永勤好唱，当地叫‘山坡羊’，山坡上砍柴禾时唱的。内容都是影戏里的，像‘吼断桥头水倒流’等等，个人解心闷的。”2007年4月15日，史耀清老人解释说。

务农的这些年中，孙杖子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先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南方爆发，满清王朝维持了260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中华民国建立。继而有1915年、1917年发生的袁世凯称帝、张勋拥戴废帝溥仪复辟的事件。之后，1919年4月，在美、英、法、意、日等27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于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与会国家拟按照日本政府要求，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派出的中国政府代表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5月4日下午，北京十三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此事引起上海、天津、广州、长沙等全国很多城市的学生、工人、商人及留法学生、南洋华侨的响应，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

毫无疑问，这些事件的余波很快会扩散到孙永勤所在的长城以北山区，但由于毕竟不在漩涡的中心，当地民众的生活未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和平宁静的生活是一定会被打破的，正如后来的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第八队长单忠英之子——画家、国防大学特聘教授单志华所说：“纵观人类历史，和平是短暂的，战争是经常的。”战争正如追踪猎物气息的饥饿的狼群，只要和平出现在视野中，立刻便会疯狂地扑咬过来，这是几千年人类社会的缩影，是人类的悲剧所在，它丝毫不以善良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长城北侧热河省民众的平静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走到了尽头：1922年、1924年，为争夺中央政权，张作霖奉系军阀与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在中国的北方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史称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进行了一周时间，双方共出动军队约22万；第二次直奉战争持续了近50天，奉直双方共出动了35万陆海空军。这两次战争给热河人民带来的灾难巨大，北京商界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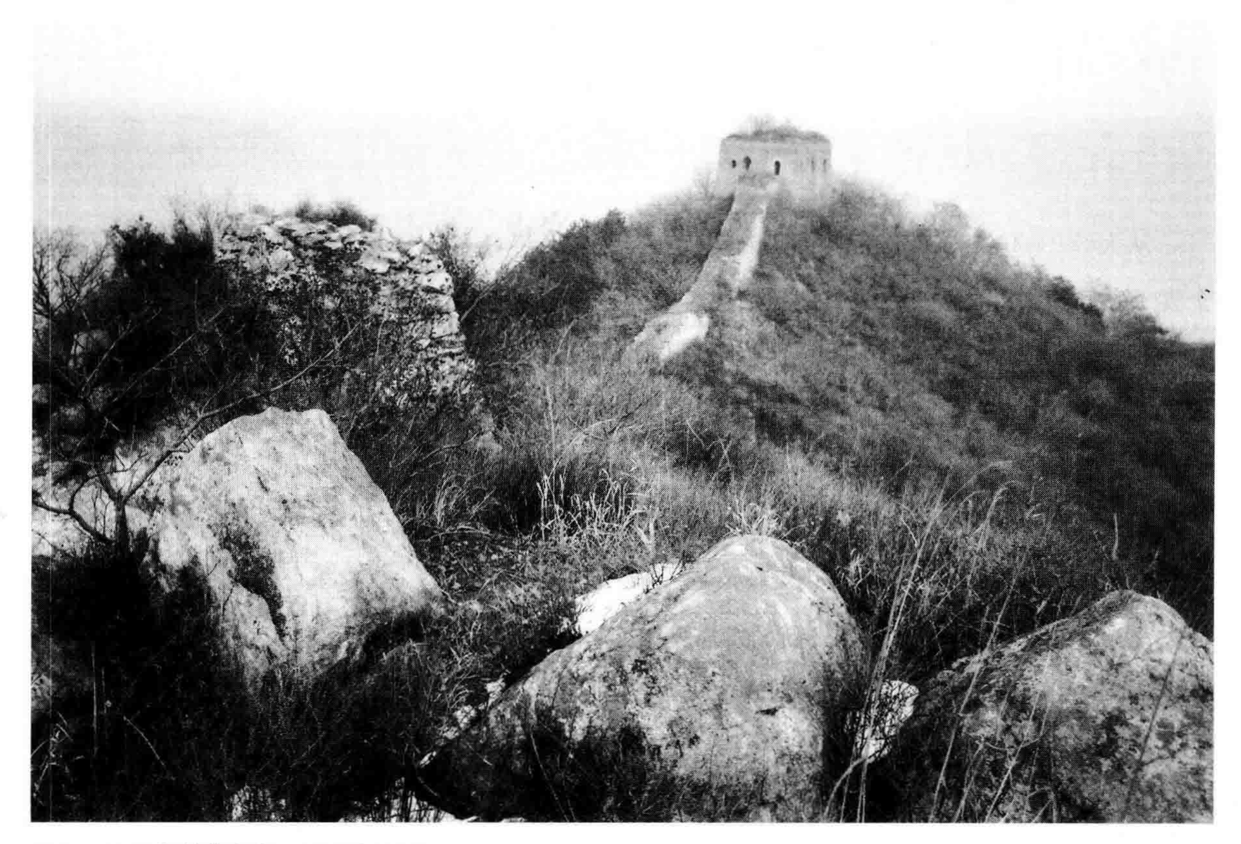


图21　万里长城冀东段　2009年11月

合会在请求政府设法救济热河兵灾的一份提案中写道："夫热河地居边徼，兵端急起，介处其间，或视为南下之捷径，或视为北上之要道。炮火所经，魂飞魄落，兼之征调夫役，勒派车马，责成供应，村落萧然，鸡犬无存。十五县之间，甚至数十里绝人烟，村落俱为大兵所洗，愁惨之情，莫甚于是！"《承德县志》在描述这一段历史时，写道："直军在两次战争中皆逼近承德县，派每甲出车二辆，无车者以三匹骡马相抵，撤离时车马多被掠走。"

人命、财产损失外，两次直奉战争，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及奉系的胜利给热河人民带来的最难吞咽的苦果是：一是严重得无以复加的匪患；二是横征暴敛的汤玉麟。

关于汤玉麟，我将在下一节热河失守时再叙述，本节主要谈一谈前者。

"热河地区的土匪历史很早，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了。到了民国年间，土匪就更多了，逐步由小到大，开始几十人一拨，后来几百人，最多时竟发展到上千人一拨。"

对热河土匪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的，当属原承德地委党史办主任王振兴以及王振武、王伟力三位先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位先生以匪患极为严重的围场县为重点，对热河土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我于2005年夏由原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邓一民先生介绍，与王振兴先生相识，听他讲了很多热河土匪的事情，本节关于热河土匪问题的叙述，绝大部分

摘自对王先生的采访记录及他、王振武、王伟力三位先生合著的《围场剿匪斗争》一书。

王先生介绍，热河最早的土匪本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贫民。清末时期，因官府横征暴敛、地主巧取豪夺失地破产，又遇上自然灾害频发，生计无着，不得已走上了当土匪之路。以后随着杀人犯、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大烟鬼也加入到土匪队伍中，其成分变得越来越复杂，手段变得越来越残忍，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渐渐成为热河地区的一大祸患。

热河的土匪，有步匪，也有马匪，表面都举着“劫富济贫”、“仗义疏财”的大旗，实际做的全是抢掠的勾当。开始还仅仅是抢劫过往行旅，后来随着人数的增多，武器的加强，竟到了绑票、砸明火、抢掠村镇、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的地步。从清末至民国初年，历任统治者无不宣称剿匪，如热河都统瑞麟、直隶总督李鸿章等都曾被清政府派去剿匪，但由于热河一带山多林密，幅员辽阔，极便于土匪藏匿、流窜，官府又基本上是把土匪赶出防区便万事大吉，有时甚至官匪勾结，结果土匪不但一直未能消灭，反而越剿越多，其胆子也越来越大。王先生曾举了清朝光绪年间的一个例子：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上旬，一个名字叫杨步清的匪首率领徒众八九百人从辽宁建昌流窜到围场沙尔虎作案，清政府接到地方奏报，立即命李鸿章、李长乐从古北口抽调军队前往围剿。杨步清探得消息后，马上开溜，一个月后，从一个叫白岔的地方又窜回塞罕坝老巢。李鸿章闻报，整队前往迎击，杨步清不但不赶快撤走，反而公然大张旗鼓地列队与官兵对抗。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杨步清土匪刚被剿灭，随之又有王瑞仁带土匪二百多人开进围场地界，全然不把官军放在眼里。

到了两次直奉战争时期，特别是第二次直奉之战结束后，热河土匪的严重程度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王先生介绍，四个因素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一、非常多的溃兵，特别是张作霖的奉系溃兵，加入到土匪队伍中，甚至有军官公开将队伍拉出为匪的情况，致使这一时期像“黄司令”、“潘副官”、“孟营长”、“贾连长”、“张排长”这种旗号的股匪多如牛毛，热河本已严峻的匪情更加严重。

二、一部分当了一段时间土匪，但是不想再干下去的人，了解到各系军阀为争夺地盘和中央政府控制权，都在绞尽脑汁壮大自己的实力，为了在这些军阀的队伍中混个官儿当，或是得到军阀政府的招安，便拼命扩张土匪队伍。因为当时军阀是按土匪人数的多少授予不同的官职的，土匪人数越多，所封的官职越大，以致“为当官拉大杆”竟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流行心理。

三、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曾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一职，大约有两年的时间，热河成为西北军、奉军的接壤地带，两军为保存各自实力，谁都不愿为地方分忧解难，导致一些悍匪乘机在热河区域大肆兴风作浪。王先生举了两个例子：①“白三阎王”抢掠围场县城案。1924年冬，盘踞在围场、赤峰边界的著名土匪白三阎王获悉围场县知事在外忙于迎送奉军统领，保安措施很不严密，县城内大部分巡警又都出去剿匪，警力空虚，于是决定抢劫围场县

城。1925年1月4日，白三阎王率土匪400多人首先在苍头坝将围场县知事、抬他的轿夫以及负责警卫的3名马警俘获，然后押着这5人利用夜色掩护打开城门，分路攻打邮报局、县公署、监狱、巡警分驻所及银行，大肆抢劫并将200多名犯人放走后，又前往各商号及富户家中进行抢掠。后来统计，围场县城在此难中共有33家商号、38个富户被抢，财产损失折合大洋8.36万元。此外，土匪还绑走包括围场县知事在内的肉票15名，裹挟20多名警察、40多个犯人当了土匪。15名肉票中，14个在三天后被放回，剩下一个姓王的在交了3万元大洋后才被释放。此案震动了整个热河，当时的热河都统汲金纯在社会各界压力下，派出军队前往围剿，然而只抓到了7个土匪，解救出5名肉票，截获少量马匹和财物。②七股土匪抢马案。1926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曹志山、曹志和、刘太和、宋自庚、郭老耗子、权头子、隋相臣等七股土匪计100多人聚拢在一起，将围场三道沟、大石头、马厂1200多匹马抢走，赶到多伦黑风河地区，投靠了西北军一个鲍姓旅长。丢马户请一个天主教神甫帮助，给鲍旅长写信，希望将被抢走的马匹归还给他们，鲍旅长回复“无法担责”。两个多月后，100多失主迫不得已带枪前往黑风河与土匪交战，土匪转而投靠了荣旅长。丢马户去找荣旅长，荣旅长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命令士兵攻打他们。丢马户拿出7千元大洋和8匹骡子，请西北军一个名叫陶汉选的团长帮助说和，总算要回了469匹马，没想到，陶团长不久也干起了明着军队、暗地里土匪的勾当。他派50多人到大石头，诬陷丢马户是盗马贼，严刑逼供后，抢走49匹马。丢马户告到县里，三年没结果，最后以一句“陶汉选已逃到北京”的话，将他们草草打发，整件事情不了了之。

四、西北军被奉军赶走，奉系控制整个热河地区，汤玉麟被任命为热河都统，1928年12月又升为热河省主席，由于贪婪至极，其部下上行下效，官匪勾结，兵匪一家，致使热河地区土匪气焰更为嚣张。仍以围场县为例，1932年，那里再次发生了一起震惊热河全省的大案。当年8月，恶名闻于全国的惯匪刘黑七率1000多名匪徒、1000多名眷属窜入围场地区，伺机抢掠。刘黑七，山东沂蒙山人，民国时期山东最大的一股土匪首领。作家李存葆在报告文学《沂蒙匪事》中，曾用非常多的笔墨披露他的罪行：“刘黑七，本名刘桂堂，黑七乃其绰号，清光绪十八年生于山东费县锅泉庄。幼时随母‘王大脚’讨饭，羊倌出身。1915年，黑七23岁时，与当地七名泼皮无赖拜了把子，偷得一把鬼头刀，劫得一支‘马连匣子快枪’后，遂干起剪径断路的勾当。1919年，刘匪扩充到300余人，攘夺掳掠，始引起官府注意，派兵围剿17个月，刘匪部非但未灭，反而陡增至千人之徒，号称‘刘团’。1925年，张宗昌督鲁，派两团精锐剿刘仍未果，黑七反用官军的枪械装备了匪伍。至1927年底，刘匪部膨胀到万人。张宗昌拿黑七不下，便将刘部收编，给刘匪戴上‘师长’的高帽。刘匪易帜，匪性益狂，绑票勒索，明火执仗，聚财敛钱，敲骨吸髓，烧杀奸淫，甚于禽兽。”

根据李存葆在山东的调查，刘黑七习惯破围屠村，特别爱用“火鸡法”。所谓“火鸡



法”，就是当村庄围垒久攻不下时，便抓来大量活鸡，将它们一一在煤油里浸泡，然后点上火，扔进墙内。活鸡受疼不过，乱飞乱跳，由于旧时中国农村大都是草房，整个村庄很快就会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刘黑七极其凶残。李存葆在《沂蒙匪事》中写道：“刘匪屠村时，除将有姿色的女子掠走供匪徒发泄兽性、将有钱有地的户主作为‘肉票’存留外，余者格杀勿论。女匪赵嬷嬷比起刘黑七这个杀人魔王，乃小巫见大巫。活埋、刀割、挖心、剖腹、剜眼、对耳穿、双劈腿、点天灯等等，是刘匪惯用的杀人手段。沂蒙山中多深井，刘匪常将山民填满井后，再用乱石封井，此谓‘塞井眼’。刘匪有时将青年壮夫拴在树干上，嘴里塞满火药，然后点燃，是称‘放人炮’。刘匪对妇女儿童更是变着花样杀戮：匪徒们有时将孩童放在石碾上碾成肉饼；有时将男童的小鸡睾丸割掉，让其于剧痛中呼号而死；有时将怀孕的妇女集中起来，用烈火焚烧，让胎儿从母腹中炸出……最令人发指的是，黑七常用的‘放天花’：匪徒们将大刀会员及抗匪壮士捉来集中后，在旷野或河滩里，挖出一片间隔相同的土坑，将受刑者一一埋至胸口以上部位后，众匪便策马在刑场上来回奔驰，仅露出头部的受刑者血压急骤升高，铁蹄触头，血喷数尺……发明酷刑‘炮烙’的一代暴君殷纣王，‘请君入瓮’的唐代酷吏周兴、来俊臣比之刘匪黑七，定会自愧弗如！”

刘黑七从1915年开始聚众作恶，至1943年11月被八路军鲁南军区和地方抗日武装消灭为止，共为害百姓达29年之久。他手下常有万余匪徒，据说最多时曾达到过3万多人，流窜祸害过鲁、豫、苏、皖、冀、津、晋、吉、辽等十几个省市，是闻名全国的混世魔王。老百姓因其上长下短，又矮又胖，且面目黝黑，都称之为乌鱼精所变。

刘黑七于1927年冬被张宗昌封为师长后，旋即弃张而去。之后投靠过韩复榘、何应钦、阎锡山、张学良，但匪性难改，每次获利即去。1932年8月17日，刘黑七从丰宁县窜入围场境内。当时汤玉麟部有富春、石文华两个旅共8000余人驻守围场，如果真想消灭刘黑七匪徒，完全能够做到，但汤部却只在嘴皮子上做功夫，任由刘黑七匪徒长驱直入。“匪队所到之处，烧杀奸掠，无恶不作。青苗被割喂马，牛羊猪宰了人吃。掠夺财物，十室十空。青年妇女被奸淫，不从者开枪打死。被抓走的人，有的被推入深沟，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刀扎死。”王振武、王振兴、王伟力三位先生在《围场剿匪斗争》一书中写道。1932年8月23日，刘黑七率匪徒来到新拨以北地区，准备第二天攻打新拨。新拨位于围场县城北面100华里处，毗邻以风光美丽著称的坝上草原，当时是个比较繁华的大村落，富春旅有两个连在那里驻扎，负责警戒。8月24日，刘黑七开始攻打新拨，富春非但不命令两个连阻击，反而将他们撤走，使得刘黑七很快攻进新拨。刘匪在新拨盘踞期间，富春令一个团和围场当地商团协同防卫县城，不去收复新拨，还允许刘黑七匪徒自由地到围场县城剃头、洗澡、抽大烟。石文华旅虽然

派出两团士兵到岱尹、大素汰、半壁山一线驻扎，对刘匪摆出半包围阵势，汤玉麟也派出炮兵、工兵来助战，但实际只是借剿匪之名发洋财罢了。他们与刘匪之间共“战斗”了四次，每次双方都是先对空鸣枪，之后汤玉麟部队假装进攻，土匪扔下大洋、烟土、细软“逃走”。汤玉麟部队缴获“战利品”后，在“战场”上留下枪支弹药，紧接着土匪“反击”，汤部撤退。由于心照不宣，刘黑七有恃无恐，占领新拨一个多月时间内，新拨及附近村庄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劫难：刘黑七攻打新拨时，烧锅东家高凤鸣组织自己的儿子、护院家丁、保甲队员，联合驻新拨的警察所丁巡长及10余名警察，共计50多人，拼死抵抗。由于众寡悬殊，先是高凤鸣儿子中弹身亡，接着保甲团的防线被土匪攻破，部分保甲团员被包围，丁巡长只身冲入匪群，企图营救他们，被土匪抓住，绑在树上，倒煤油，点了天灯。之后，土匪对高凤鸣一家及新拨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王振武、王振兴、王伟力先生在《围场剿匪斗争》中以无限怜悯的心情写下了如下文字：“刘匪打下高家大院后，男人除打死者外都抓去做劳役。女眷不论老少都遭匪徒强暴。刘桂堂强奸了高家五姑娘后充作姨太太，六姑娘被刘克仁霸占为小老婆。把高家的猪羊鸡鸭等一概吃光，首饰、衣被等物被抢光，然后挖地三尺，找金银财宝，对高家实施无情的报复。匪队在高家烧锅大院安司令部，由白俄连站岗，其部下分驻附近各村。匪队随意烧杀抢掠，抓住女的奸污后强迫伺候匪兵，打大烟，缝衣缝鞋，抓住男人让打水做饭，割庄稼喂马，杀牛羊宰猪鸡，稍有不从就要遭难。街东头一家一个男人给土匪煮鸡蛋裂了几个，说不愿侍侯他们，便开枪打死。匪徒把村里牲畜杀光后就到村外去寻，见影就开枪，有的割下四条腿上的肉就走，扔的村头野地白骨成堆，苍蝇黑乎乎一片，长蛆到处乱爬。那年年景较好，庄稼熟了，抓老乡从半截割下来铡碎喂马，各村附近的庄稼被割光。匪徒惨无人道，抢男霸女，无恶不作。银沟头号高玉之妻被土匪搜出，拉进炮楼欲行强奸，她从炮楼跳下，但没摔死，又拔下簪子扎自己脖子，尽管血流不止也未逃过匪徒蹂躏。碧柳姚振起之弟被匪打死，抓走其弟妻被众匪轮奸压断胯骨，大小便失禁，不堪忍辱，上吊身亡。岱尹村一位63岁老太婆被抓住，央求匪徒积德，仍未幸免。有一名妇女坚强反抗，匪兵将热火倒进她裤子里，烧得妇女惨叫，在地上翻滚，匪徒一旁取乐……刘匪在新拨盘踞一个多月，新拨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洗劫。仅就查有姓名被匪枪毙的男人300人，抢去妇女60人、大牲畜3000余头，宰杀牛3000余头、羊5000余只、毛驴1000余头。总之，他们所到之处，六畜尽净，室内院里掘地数尺搜翻殆遍。各色青苗俱喂牲畜，门窗均被砸烧，完整之家实不多见。”

对此恶匪，汤玉麟部不但不坚决剿灭，在与土匪暗中勾结，做做样子围剿后，还要地方老百姓杀猪宰羊，慰劳军队。据载，刘黑七被汤玉麟收编，撤离新拨后，围场县公署立即接到热河驻军37训令96号电令，上面写道：“三八子弹每百粒15元，七九子弹每百粒17元，两项合洋790元。迅将此款如数缴送。此令。”

回归本书正题。孙永勤家乡所在的热南滦河河谷地区历史上便是土匪活跃之地，孙杖子村东的平顶山便是一个明证。

热南滦河河谷之所以为土匪看中，首先是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

“日本进来之前，汤玉麟督热的时候，土匪蜂起，滦河一带更是长期闹土匪。那个地方山高川大，有五指山、五凤楼、老梁这些大山的连绵，大山中间还有滦河隔阻，向来都是土匪啸聚之地。”佟靖功先生说。

然而除了便于藏匿这个地理因素外，政治方面，那里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带，极适合土匪生存，应是更为主要的原因。

无论清朝还是中华民国时期，那里都属于多个行政权力的边缘地带。清时，它是直隶承德、顺天、永平三府边界地区。中华民国时，它被划属热河省承德县与河北省兴隆县、遵化县、迁安县四县管辖。土匪可以自由地游走于不同府与不同省县之间，承德府方面追捕则遁入顺天府或永平府，遵化县方面围剿则躲进承德、兴隆或迁安县。地方统治者碍于管辖权限制约，望洋兴叹，奈何不得。久而久之，热南滦河河谷地区任何一方都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管理，成了典型的权力真空地带。

座山雕、平西王、四海红、大王龙、小王龙、马拐子，据《承德县志》、《兴隆县志》记载，两次直奉战争，特别是第二次直奉之战以后，窜扰热南滦河河谷地区的土匪至少有以上六股。

官府在土匪面前无能为力，军队又与土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倍受土匪欺凌祸害的热河民众极感失望。先是，热河历史上就有人民自己保卫自己家乡的传统，辽代设有地方乡丁，清代设有乡勇。直奉之战结束，土匪活动越来越猖獗后，明长城沿线上的鲇鱼关、大安口、冷嘴头、山楂峪、沙坡峪、马蹄峪、罗文峪、洪山口、龙井关等边寨九保率先成立了伙会，抵御土匪。受它们影响，在一些士绅的推动下，河北省、热河省其他地方也纷纷成立了伙会或类似伙会的组织。

伙会订有严格的章程，以毗邻承德县的遵化县兴隆特别区（1930年8月后改为兴隆县）“五兴里伙会”[1]为例，它要求被保护范围内的村庄，每种30亩土地，必须购买步枪一支、子弹一百发。如不能完成任务，伙会有权利召集其他伙会到其村庄吃住，直到村子完成枪弹购置任务后才撤出，当时的人们将此行为称之为“压会”或者“压枪”。压会或压枪极可能直接借鉴自土匪勒索赎金的办法，其手段粗暴，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但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也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民国时期，曾被冀东长城沿线的热河省南部和河北省东北部的伙会、联

[1] 五兴里伙会为“三十六友”所设。“三十六友”乃对上世纪二十年代兴隆四十一位富豪的称呼。传统评书《隋唐》及京戏《贾家楼》中，有隋末豪杰单雄信传绿林箭，广邀江湖好汉到山东济南府为秦琼母亲贺寿，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等三十六人出于义气相投，在贾家楼歃血为盟，义结金兰，相约祸福相共、患难相扶的故事。兴隆各地的四十一位富豪效仿单雄信等三十六人，也结拜为异性兄弟，自称“三十六友”，联合管理兴隆境域的地方事务。“三十六友”是1915到1930年间兴隆地方的实际统治者，将其称之为兴隆县建立之前的地方自治政权也不为过。



图22　滦河河谷　2006年4月

庄会、民团等普遍采用。至于强迫购买的枪弹的来源，一部分为政府的配购，主要是连珠、套皮、马拐子等武器，一部分来自与军阀部队的私下交易，还有部分是购自溃兵手中。

直奉之战结束，热河的匪情异常严峻时，地处滦河河谷的孙永勤家乡孙杖子是否也成立了伙会呢？目前难下定论。从黄花川南面40多华里的长城口、西面50多华里的兴隆特别区都被迫成立了伙会这一情况来看，孙杖子那时不成立伙会的可能性很小，特别是需要面对"座山雕"等多股土匪骚扰的情况下。但因为自1958年10月，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调查孙永勤事迹以来，只有孙文炳于1983年向栾福忠先生说过一句"孙永勤领导伙会两三年"。2002年以来，我到孙杖子数次采访过程中，只有孙中贵说出"当时起伙会得三四年"。二者一将孙永勤担任孙杖子伙会首领的时间指向了1930或1931年，一将孙杖子起伙会的时间指向了1929或1930年，此外再无孙杖子更早时间成立伙会的明确记载和回忆，故对孙杖子是否于直奉之战后便成立了伙会，只能待更多的资料发现后才能给出答案。

热河及河北省靠近冀东长城地区的匪情，据《兴隆县志》载，在1928年初得到了缓解。原因据说是，1927年，奉系军阀最高统领张作霖派东北军二十八军军长岳兆麟及骑兵师长武汉卿到热河一带与土匪商议招安，包括兴隆特别区和关里在内的大股土匪均接受了招安。这些土匪共被收编为二个步兵团、一个独立营，归东北军二十九军指挥。一些未被收编的小股土匪，继

续出来为非作歹，也于1929年被消灭。

匪患解除，深受土匪之害的人们从心底里松了一口气，他们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心地过上宁静幸福的生活了，殊不知更严重的匪患、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1931年9月18日夜，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在其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的主谋下，炸毁南满铁路奉天北郊柳条湖一段路轨，随后嫁祸张学良东北军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日军下达了进攻奉天的命令，10小时内，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奉天内城、东北军第二大营东大营相继陷落，“九·一八事变”发生。

身在北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接电报后下达了收缴军械、不作报复行动的命令，严禁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进行抵抗。

张学良之所以采取不抵抗主义，长期以来的说法是：蒋介石给他下达过不抵抗的手谕。张学良晚年在接受各方采访时明确声明：不抵抗责任完全由他一人承担，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央无关。他对当时采取的方针的解释是：事前未料到日军会大规模地进攻。情报也不够，将日军的行为判断为军部的又一次挑衅。由于以前对日军这种行为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时也想采取同样的处理办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以期将事件和平解决。

张学良没有将其真实心理道出。

原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在《榆关失陷前后》中回忆，长城抗战前东北军高级将领普遍抱有寄希望于西方列强主持公道的心理。“显然，这种军事形势（指何柱国驻守榆关防御日军海陆空联合进攻时的形势）对我是十分不利的。然而作为一个军人，所遇到的并不总是有利的军事形势，有时遇到不利的军事形势也是要作战的，不过部署有所不同而已，所以这个不利的军事形势并没有使我气馁。实际上使我为难的却是另一回事。那就是当时在我上面掌握国家大权的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对敌政策：不战、不和、不守、不走。大家知道，当时蒋介石实行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千方百计地阻止东北军的抵抗，而东北军则借口听命中央，实际是在很大程度上把命运寄托在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身上。关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已经有很多人揭露了，这里我不想重复。至于东北军方面，因为过去既有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当时又有九国公约的保证，以为西方列强无论如何不会袖手旁观，日本到头总是吞不下满蒙的；而‘九·一八’以后又有国际联盟的多次开会和决议以及所谓调查等等，加上1928年皇姑屯炸车案，大家都以为由于当时的沉着应付，不放一枪，使日本找不到任何借口，因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这一切，都使东北军很多高级将领发生一种错觉，以为不抵抗是上策。我记得锦州失陷前，日本曾一度要求张作相出来办理东北全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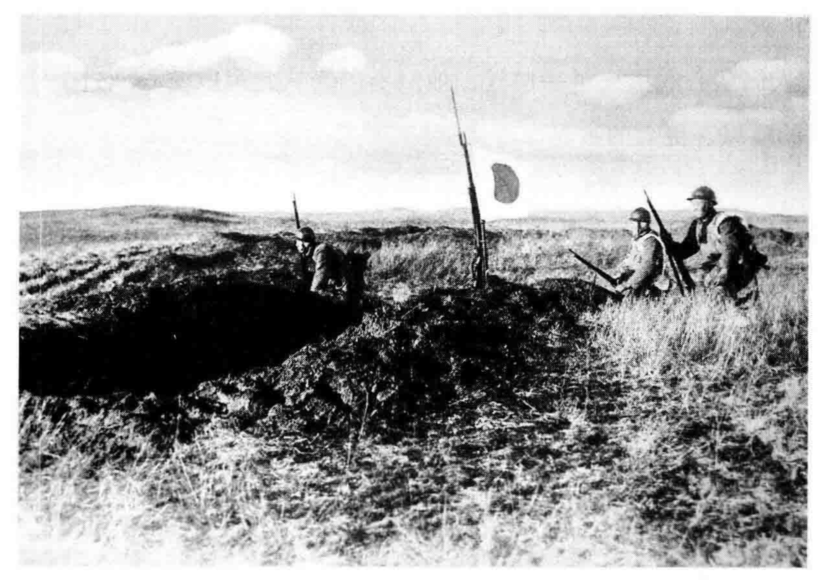


图23　日军在中国东北
（照片来源：《满洲事变写真》，提供：詹洪阁）



图24　日军在中国东北
（照片来源：《满洲事变写真》，提供：詹洪阁）



图25　日军欢呼胜利
（照片来源：《满洲事变写真》，提供：詹洪阁）

交涉。我因到锦州吊丧之便询问过张作相。张除了声明决不能做对不起张老帅的事情之外，很有把握地说：‘日本无论如何吞不下东北，东北总归是我们的，大家不必担心。’这几句话可以代表当时东北军大多数高级将领，包括我在内。所以‘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这里要指出：今天事实确已证明日本吞不下东北，但这和我们当年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当年所想象的并不是以后事实所显示的那样，要经过八年抗战与联合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击毁整个法西斯反动力量，因而也打败了日本，从而恢复了我们的东北。那时以为如同过去三国干涉还辽那样，不必流血，可以坐待西方列强代我们强迫日本吐出来，乃是一种愚昧无知而且十分可耻的想法。就因为这个缘故，当时无论中央政府或者地方当局，对于日本的着着进逼，一直没有明确的对策，指示前方将士的除了‘避免冲突’四个大字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因此前方的将士常常落入愤懑、隐忍、苦闷和无可奈何的为难之境。”


图26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

除了认为西方列强会再次主持正义外，另一个问题也需引起足够的重视。“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统一于中华民国，这当然是他的历史贡献，可张学良毕竟是个新的军阀。”原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现东北沦陷史总编室常务副主编李茂杰先生在追忆“九·一八”历史时，痛心疾首，肯定张学良的同时，直指以往张学良研究中有意无意掩盖之处。“蒋介石自己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给张学良副总司令，位置是相当高的。‘九·一八’时，张学良认为他把问题看错了，不是不抵抗，是情报不够，以为日军只是在演习呢。实际上张学良的情报班子相当庞大，他什么都知道，心里跟明镜似的。据我的研究，张学良的不抵抗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不是一回事。蒋介石的不抵抗是要对付共产党，张学良的不抵抗是为了要保存他自己的实力。张学良担心如果和日军打，打不过，失败了，没有实力了，他的三军副总司令的职务马上就会被拿掉。这样，遵照蒋介石的意旨，执行了不抵抗政策。最后，蒋介石还是把他抛出来了，‘你应该下野，你去留洋。’张学良也不得不如此。”

张学良严令东北军不抵抗的结果，导致“九·一八事变”发生到1932年1月仅三个多月的时间，辽吉黑三省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多万人民沦于敌手。

东北失陷后，关东军迫不及待地于1932年3月9日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强化殖民统治。大批东北百姓逃往关内，相当多的土匪在东北三省没有立足之地，也纷纷涌进毗邻的热河、察哈尔、河北省境内。

发生于“九·一八”之后的这次匪患来势极其凶猛，土匪要么是在东北占山为王、无恶不作的“红胡子”、“响马”，要么是风纪败坏，张口“妈了个×”、闭口“妈拉个巴子”，对日作战一触即溃，却惯会鱼肉百姓的兵痞。2008年7月初，我到达原察哈尔省东部重镇多伦（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县政协副主席马瑞林先生（80虚岁）对我说：“最孬的是奉军，进多伦大抢三日。我们家就住过，那时我4岁。记得奉军当时是灰军装，拉着马进来，把马鞍放在台阶上，让做饭。‘四个碟掐饺子，家常饭’，这是奉军挂在嘴边的话，嘴里不干不净的。东北退下来的义勇军军纪也不好，吃了败仗，精神状态不好，到老乡家也要这要那。当时多伦商家很多，有山西商人，有河北商人，他们一住十几天、一个月，横吃乱花，把商人都闹草鸡了，后来山西商人大部分随晋军回山西了。”

如果将1922年至1929年间由直奉之战引起的土匪遍地称为第一次闹匪的话，那么我将1931年开始，由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引起的土匪四处为虐、横行不法称为第二次闹匪。

第二次闹匪时期，窜扰热南滦河河谷一带的较大的土匪团伙有如下几支：

1. 小白龙。《兴隆县志》说他是辽宁朝阳的一个土匪头子，手下有徒众2000多人，曾被今兴隆一带的土匪引领到距兴隆镇18华里的南双洞一带，烧毁很多民房，掠走大量财物，使当地人民遭受巨大损失。而据原宽城县委党史办副主任杜青怀先生调查，小白龙则很可能为凌源人，曾攻打过宽城镇（今宽城县城），时间一说为1929年11月，一说为1932年11月29日。据当年接受杜先生采访的赵凤德老人讲：“来的一千多人，早晨进的街，下午四点多钟走的。为什么没久站呢？当时宽城街有个回民阿訇，叫王少武，与小白龙认识，都是凌源人。王少武告诉小白龙说：‘这里不能久站，民团多，又离承德汤大帅近，闹不好会吃亏的。’小白龙听完，决定立即撤出宽城镇。”

小白龙流窜至滦河河谷今承德、兴隆、宽城满族自治县三县交界地区的时间说法不一。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庄的陆翠芝老人（2007年时77虚岁）说：“日本来之前没土匪，小白龙是日本来之后才来的。”她所说的日本人来，当指日军进驻当时的承德县的时间，即1933年3月4日以后。陆翠芝说小白龙是北边人，“不多几个人，骑马，净抢东西。”也有说法，小白龙在日军侵入承德县前就已经过来。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徐文林老人（2007年时84虚岁）回忆：“小白龙等闹了一年多，1930年左右，日本一来就跑了。彭安祥他妈和妹妹跟他们走的。妹妹



很小，怀里抱着，据说妹妹后来被劈掉，反正没回来。”

小白龙是孙永勤剿匪时的主要作战对象，他起义也和打小白龙有关，根据1933年夏秋时节他还在和小白龙交火这一情况判断，徐文林老人在小白龙活动时间的记忆上有可能出现了差错。

2. 张玉书。1988年12月，承德县老梁吴连杰老人向佟靖功先生回忆：“张玉书是北边人。”《承德县志》载，张玉书手下有土匪120余人，以唱戏为名，用高价戏勒索民财，如不点戏，则出动枪、马绑架会首，官府听之任之。徐文林老人说：“张玉书、小白龙等都是绺子，实际上里面有很多老奉军，他们来是绑秧、要钱、扩大自己的队伍。张玉书、小白龙在当地没开过火。”

3. 李海山。籍贯不明。《承德县志》载，他靠杀富济贫起家，但后来却只杀富不济贫，最后竟发展到明抢暗绑。他在抢劫时有一个特点，成员大多以黑红两色抹脸，并戴假胡须，老百姓称之为“马达子”或“胡子”。

除以上三股大的土匪外，在热河南部地区活动过的还有刘崇经、野狼、龙三点、镇山虎等几股较小的土匪。

刘崇经。吴连杰老人回忆为刘崇经，和他同村的李振庭、许振岭老人则回忆叫刘宗臣。吴连杰说他是奉天人，其二当家的叫谢九洲，也是奉天人，大武家子。他们曾灭过一个双龙绺子。吴连杰11岁时，刘崇经带200多土匪上到老梁，住了三个多月，吃了百姓很多粮食。以后，他向东面活动，被张玉书缴了械，本人逃到阜新，有传说他死在那里的煤窑。

野狼。由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罗振环、罗振廷、罗振华三位老人向佟靖功先生回忆，具体情况不明。

龙三点。由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村张如山老人向佟靖功先生回忆，详细情况未讲。

镇山虎。由宽城满族自治县赵风德、张德勇、王乃文、王会川四位老人向杜青怀先生回忆，他曾在小白龙一打宽城镇后，率300名左右土匪二打过宽城镇，占据一两天后撤出。时间有1931年秋、1933年秋两种说法。

土匪各霸一方，蹂躏百姓，或联合作案，扰乱人民生活，民愤极大。

小白龙攻打宽城镇时，将当时十四五岁的王乃文绑去，农历十一月初二绑走，十一月二十九放回，共被绑去27天。据王乃文1987年4月向杜青怀先生回忆：“到家时两手已冻掉。”

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罗振环、罗振廷、罗振华1988年12月向佟靖功先生回忆：“当时土匪都穿着便衣，车河口罗振秀被绑，带到东化鱼沟南沟暖河堂，花80块现大洋才赎回来。”

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孙中训2008年7月向我回忆：“当时来过匪，叫‘大拨匪’，我们都跑宽甸去了。上宽甸一次，石湖沟一次。”

“号大枪买单子挑选大户，打胡子往北打两下都不通。”

上面两句出自热河民歌《十二月》，由徐文林老人向我背诵。它描述了热河南部地区民众由于不堪土匪袭扰，纷纷行动起来购置武器、保卫自己家园的情景。

购买枪械的资金主要募自大户即富户家中，由于大户是土匪绑架勒索的首要目标，出于保护生命和财产的考虑，一般采取了支持伙会的态度。还有很多大户本身便是率先倡导成立伙会者，甚至是所在地区抗匪活动的领导者。以今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大地主、不久后成为孙永勤死对头的岳荫臣为例，不但自己家成立了洋枪火炮队，而且要求全村百姓购买枪支，以便一旦有匪事发生，能够自卫。“老岳家让老百姓买枪，挖战壕。枪是用火绳驱的那种，能买一棵就一棵，两棵就两棵，不能买就三家买一棵。”徐文林回忆说。

孙杖子伙会在第二次围剿土匪的斗争中登场了。

孙杖子伙会由谁倡仪并出资创办，现已很难查清，目前仅知道两个情况：

1. 它的会长是孙永宗。“奸臣似的，黑胡子，发瘆。”张杖子村民陈永会（2007年时82虚岁）描述他的长相时说。孙杖子孙中训的看法与陈永会不同：“黑胡子，挂点恶相，脸上虽然挂恶相，但是心不恶。孙永宗比孙永勤大十来岁，孙永勤管他叫二哥。孙永宗多少富裕一点，说话有号召力。”

2. 孙杖子伙会成立时，武器非常简陋。“起伙会时都是火枪。”孙中训说。

加入伙会的人员必须枪法好。孙永勤那时30多岁，不到40，正值壮年，不但枪法出众，而且身高力大，会武术，为人公正，有威望，用佟靖功先生的话说，“在他们村中是第一条大汉”，自然地成为了伙会的重要人选。

抗击土匪的过程中，孙杖子伙会在两方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是年轻人多，其次是勇敢且枪法极准。佟靖功先生把后面一点归结为孙杖子的年轻人经常参加“打红围子”，特别是打豹的结果。“那一带山林里，常有豹子出没。打豹子，那胆小的人、力气小的人是不敢去的，凡是能够打豹的青年都是非常英勇而且枪法出众的。”

孙杖子伙会里面，孙永勤几乎是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敢干”、“气粗，胆子大”、“勇敢，胆子大”，见过孙永勤并在他领导下战斗过的人评价说。“孙永勤身高接近两米，身高力大，而且非常聪明。在中国，巨人身体往往不协调，可孙永勤身体非常协调，不仅力量大，而且手脚快，枪法还准。再加上他性格豪爽，崇尚忠义，所以逐步成为民团（当地称之为‘伙会’——编者）的骨干。”佟靖功先生说。

“土匪来了放双响，哪庄听着哪庄放。”[1]热南滦河一带第二次闹匪时，伙会、土匪之间

[1] 佟靖功：《大杖子郝家庄老农郝士玉回忆》，1988年12月15日。



的斗争非常激烈，双方都到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地步，原本便脾气暴躁的孙永勤性格中疾恶如仇的特性被彻底激发了出来。孙杖子伙会会长孙永宗见孙永勤在每次与土匪交战时都异常勇敢，而且非常富有指挥才能，便让他当了伙会的副会长。过去有种说法，后来随着土匪越来越多，孙永宗自感难以应付，索性把会长的头衔也让给了孙永勤，经近年向孙杖子年纪较大的一些老人了解，没有此事。

当了副会长的孙永勤带领孙杖子伙会转战黄花川、滦河河谷两岸，接到土匪前来袭扰的报告，便立刻前往阻击。有时遭遇大股土匪，或多股土匪联合行动，在力量不足与之抗衡的情况下，也会邀请附近村庄或地区的伙会前来助战。孙永勤长子孙文伶曾回忆："日本进关以前，我们家乡一带，土匪到处绑票，搅得人民不得安生。为了打土匪，各地都成立了伙会和自卫团一类的组织。我父亲孙永勤是黄花川一带的自卫团团长（应为'孙杖子伙会副会长'——编者）。有一次，土匪集结了200多人，想进攻黄花川，我父亲就带着人到罗降梁去迎战。因为人少，武器差，打不过土匪，我父亲就写信联络喜峰口、潘家口、车河口、寿王坟一带的伙会，让他们来支援。那次他们来了不少人，才打退了土匪的进攻。"

"在孙杖子一带抗匪那都是有规模的，"佟靖功先生说，"土匪有时候一次就来一二百人，甚至二三百、三四百人。在长年和土匪的斗争当中，孙永勤产生了农民必须要团结，特别是民团（伙会）必须要联合的这么一个思想，后来他们往往都是各民团（伙会）联合起来，几百农民对抗几百土匪。"

伙会的联合，与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有近似之处。它不是孙永勤的首创，在热河人民的自卫历史及土匪劫掠的历史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影子，说互相借鉴也不为过，但深刻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不但将其运用于抗匪斗争，而且后来还将其运用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孙永勤则是热河及冀东地区最早的实践者之一，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斗争历史上有他重要的历史地位。

孙永勤主动联合伙会抗匪，产生了两个结果：

1. 他被土匪列入黑名单，成了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孙文伶回忆说："打那儿以后（指罗降梁之战后——编者），土匪恨透了我父亲，经常派人来抓他。"

2. 在民众中的威望得到进一步提高。佟靖功先生说："当时，因为他联合得好，多次打退土匪，群众都称他为'黑脸门神'。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在抗击土匪这件事上，只要他在，土匪就休想进黄花川一步，像门神一样。他的脸肤色有些黑，所以群众管他叫黑脸门神。"

孙永勤担任孙杖子伙会副会长大约一年半，至多两年半后，1933年3月4日，日本关东军侵入了热河省会承德。日军的到来，令热河社会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九个月后，孙杖子富户孙永勤走上了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道路。

长城抗战

正月里开迎春迎春正发，日本人进中国二月初八，

登飞机扔炸弹伤人太重，张学良打花了下野回家。

二月里开杏花杏花不红，大街口郭团长名叫金英，

携大枪挑子弹挑选富户，各领人打日本四路不通。

三月里开桃花桃花粉红，日本人占热河出了新京，

不耗粮不耗草民人得过，起土匪闹绑票又砸孤丁。

四月里开梨花梨花叶青，白马川修铁道民人帮工，

小日本无端抡起洋镐把，庄稼人受欺负深受苦刑。

五月里开石榴石榴花红，老百姓领烟证大烟又兴，

小日本专买土将烟收净，炒烟泡一毛五少钱不中。

六月里开荷花水把花冲，孙永勤拉大队把煤局攻，

小鬼子宪兵队将他冲散，老乡们受失损深受苦刑。

七月里开菱花菱花立秋，小日本发官款利钱太薄，

庄稼人要活命去领执掌，有心使劲他又把利钱捞。

八月里开桂花桂花味香，宣统坐新京日本假装帮，

他卖了东三省热河以外，汤二虎吓屁了跑出营盘。

九月里开菊花菊花甚黄，鸡冠山打透眼又把人伤，

日本人抢木头不把钱给，老百姓还得受苦去帮工。

十月里开冬青冬青立冬，修铁道筑炮楼忙个不停，

庄稼人都穿不上棉衣裳，冻得人浑身发青浑身疼。

十一月开水仙水仙名扬，关元有拉大队各家要枪，

富户们说没有必定挨打，打完了爬起杀猪又宰羊。

十二月开腊梅数九寒天，小日本半夜起来把人圈，

圈起了老百姓成千上万，圈在墙里死的死亡的亡。

多亏了共产党啊毛主席，领导人民八路军打日本，

赶走了日本鬼子和老蒋，幸福的日子啊过在今天。

以上为承德县窦家沟窦启海老人（85虚岁）背诵的热河民歌《十二月》，它由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长雷常玉的外孙朱金城（雷常玉为其三姥爷）2007年5月记录并转发给我。与承德县彭杖子徐文林老人背诵的《十二月》相对照，它们之间在不少地方存在着出入，这让我相信，《十二月》有多个版本，随着时间推移，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它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窦启海版《十二月》的价值，一在概括了1933年3月至1948年11月间发生于热河省境内的所有重大事件；二在清楚地表达了热河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重压下的抑郁痛苦，以及共产党八路军将日本人、国民党反动派赶走后，热河人民无限感激、欣喜若狂的心情。它是热河人民的心声，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对我们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热河的历史，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的热河历史，具有重大参考意义，故将其完整抄录于此。

“日本在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后，很快就把整个东北占领了。占领的同时，就策划成立一个在它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伪‘满洲国’的范围包括东三省和热河省，就是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内蒙的东部区和河北省的承德地区。刚成立伪‘满洲国’的时候，还仅仅是东三省，当时的内蒙东部区也归东三省管。它要完全控制伪‘满洲国’的领地，就得侵占热河。当时热河的反日斗争情绪是很高的，它要侵占热河，就要讨伐，把自己打扮成很正义似的。”李茂杰先生说，“为了把热河也控制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日本天皇在1933年2月初和2月12号，两次批准由关东军对热河进行进攻。天皇批准后，下达到关东军司令部。当时的司令官是武藤信义，接到命令后，马上布置，调第八、第十四师团，三个旅团，一个飞行队，2万多人，同时调集伪‘满洲国’讨热的部队，总司令是张景惠，前敌总指挥是张海鹏，这样就部署在靠近热河的边境地带。那时的天气还是很冷的，关东军不适合在那里作战，又怕天暖了，冰化了，不利作战，武藤信义就下令2月23日日伪同时向热河进攻。”



图27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照片提供：伪满皇宫博物院）

日本急于侵占热河，有多个原因，时人张其昀曾归纳为：“巩固伪国之基础，倚为西方之屏藩，一也。封闭义勇军与关内联络之门户，杜绝我国出兵收复东北失地之要道，二也。以居高临下之势，控制中原，击破边墙，夹攻平津，以为征服中国大陆之准备，三

也。”[1]时人毕立更明言曰：“就敌方言，如得辽吉黑而不得热河终为心腹之患。一旦对苏俄有事，我国苟起而收复失地，即腹背受敌，在军事上为被制于人。故敌人未得热河之前，一似芒刺在背，必不能安享三省之利。若能并热河于三省为一整区，则非独可固三省不受腹背之胁，绝我收复失地之径，且可转而威胁我平津，窥我华北，以侵我中原。我平津处热河、山海关水陆逼视之下，将一筹莫展，有若无，实若虚。平津失势，则华北危；华北危，则全国无复有宁日；存亡操之人手，可无待龟筮而立决。”[2]

然日军欲占领热河，除出于纯军事方面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为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所不了解的原因。“打热河战争，关键是热河有鸦片。”原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邓一民先生说。

邓先生从1989年起开始关注日本鸦片侵华，特别是以热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日本鸦片侵略问题，2002年曾主编了《日本鸦片侵华资料集（1895~1945）》一书。2006年4月，我到承德市采访时，邓先生将此书送给我一本，我是在阅读其中收录的清末以来的政府文件、报纸文章、回忆录资料时才知道：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便开始有预谋地对中国推行毒品政策，并乘英国同意禁止印度鸦片运入中国之机，利用治外法权，以公开出口和秘密贩运两种方式，迅速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范围内向中国输入鸦片和吗啡的最主要国家。1931年，侵华战争开始后，以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害中国人民更成为日本的一项国家政策，由日本国家精心策划，并有组织有系统地付诸实施，与武力侵略同时并进。日本在中国推行鸦片毒品政策，其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毒化中国人民的身体和灵魂，弱化其抗战意志力。②为继续战争筹措巨额军费。③收买奸细，获取军事情报。④作为占领区傀儡政权的财政来源。⑤解决日本人、朝鲜人的生计问题。由于以上原因，日本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仅有的将毒品运用为战略物资的国家，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贩卖烟毒的罪犯。

日本的鸦片侵华、毒品侵华政策于战后渐为外界所知后，就连日本人自己都认为是“可耻的悖德行为”、“国家犯罪”。为抗议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以一人为原告，三次起诉日本政府，于2002年去世的前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更评论道：“大纲已明，在中国之战争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形象，应无可疑。”[3]然而所有日本人的批评，我认为都不如美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的揭露更淋漓尽致，更一针见血。针对日本官民一体从事鸦片毒品交易的行为，早在1918年，芮恩施便公开发表谈话，强烈谴责日本人的行为是“罪恶的”、“漠

[1] 张其昀：《热河形势论》，文载《国风》半月刊，转自《热河失陷目击记》，中外出版公司，1933年印行。

[2] 毕立：《热河概况》，文载《新亚细亚》月刊，转自《热河失陷目击记》，中外出版公司，1933年印行。

[3] 家永三郎：《战争责任》，转引自邓一民主编：《日本鸦片侵华资料集（1895~1945）》，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2002年8月出版，第528页。



视人道上与条约上的义务”，是一项“腐蚀一个国家的邪恶的计谋”。[1]

日本侵华时期的鸦片毒品生产与贩卖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为作为1912年《海牙禁烟条约》的签约国之一，日本国，包括经营鸦片的日本公司，如三菱商务公司、三井物产公司等，深知这是一项国际犯罪行为。也正因为此，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它们将大量档案销毁，以逃避世人追查。大陆学者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注意日本鸦片侵华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展开，热河鸦片便为其中一个重要课题。

热河地处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华北平原之间的斜坡地带，特殊的地理气候情况使得那里极适合于鸦片种植、生长。“承德的鸦片叫‘热土’，别的地方鸦片是黑的，热河鸦片是黄褐色的，不但特别香，而且产量特别大。”邓一民先生说。根据学者的研究，热河种植鸦片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一些跟随皇帝到承德避暑办公的官吏，由于染有大烟瘾，为能就近获得鸦片，开始在热河地区对其进行少量种植。鸦片在热河大规模种植开去，始于姜桂题任热河都统的1913年。汤玉麟统治热河期间，鸦片种植规模进一步疯狂扩大，竟至达到百万亩规模，成为国内首屈一指、亚洲重要的鸦片产地。

日本之所以要占领热河，一个重要考虑是：将热河的鸦片收入作为与海关收入并重的伪“满洲国”最为稳定的两大财源之一，弥补所谓“建国”财政困难。“有一位学者说，‘发动热河战争实际是一种鸦片战争，从热河到沈阳的路是鸦片之路。’长城以外划为‘满洲国’，鸦片起到支配作用。”邓一民先生说。

关东军对热河的进攻分四路进行：第一路由绥中沿北宁路向榆关（即今山海关）进攻；第二路由朝阳、凌源、平泉一线进攻；第三路由开鲁向赤峰进攻；第四路由林西向多伦进攻。

四路中，除第一路战斗于1933年1月1日便开始了外——这一日期后来被定为长城抗战的开始时间，其余三路战斗限于2月23日展开。

被国民政府认为至少可以支撑三个月的热河战役，自2月21日战争实际打响，仅用了十余天的时间，便耻辱地结束了。原承德市政协副主席白春旺先生曾向我回忆起热河省会承德陷落当天的情形：“1933年3月4日，阴历二月初九，早晨起来看到承德东面山区10公里左右，天上是几架飞机，下面有机枪响声，日本打进来了。做工的、上班的、上学的都不去了。人们都非常关心，实际上早就知道了，日本从锦西过来。当时汤玉麟抵抗部队的番号是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一师三十八旅，一个三十七团，一个五十七团，大约两个团的兵力，都是步兵。沿狮子沟、外八庙一线撤下来的，大约有一个团吧。当时部队看起来还比较有秩序，是四路纵队，以连、营建制为单位地往下撤。最后看团的指挥员，是个老头，白胡子，骑着马，手里托着战刀，他

[1] 转引自邓一民主编:《日本鸦片侵华资料集（1895~1945）》，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2002年8月出版，第535页。

的部队还是比较整齐的。看来当时那个心情，蒋介石不主张抵抗，底下部队还是抵抗的。随着他们往下撤的时候，日本飞机在狮子沟，那儿有个小街，瞅瞅，投下一颗炸弹，炸坏两栋民房，还没伤人。在须弥福寿之庙前，不有个石桥吗，撤下的部队在那儿休息，在那儿又投了个炸弹。它那炸弹很小，比啤酒瓶子大一点，就像可乐瓶子那么大。当时有部队用机枪还击，一还击，飞机就拔高了，一共九架飞机。等到下午三四点钟，从普乐寺南山上，从东往西进嘛，下来120多人。看得非常清楚，前面的人端着枪，枪上带着日本国旗——膏药旗。一共120多人，看样子像是侦察连。到傍晚时听说，它的主力还有战车是从红石砬子沟进来的。当时有一些富商、地主、士绅，他们就到红石砬子沟那儿欢迎，把他们接进来了。从那时开始，一直统治了十三年。”

白春旺先生所见到的120多名日军，应是最早进入承德市区的川原挺进队128名士兵。当年7岁的承德市农业局离休干部尹忠也目睹了这支日军先头部队进入承德的情景，不过两位老人在日军进入承德市区的时间上，记忆有些不同。

“首先进入承德的日军部队隶属于关东军第八师团，叫川原挺进队。它进来之后，从红石砬沟、承德火车站那方向出来。到咱们承德大桥那儿，日本人很狡猾，不走大桥，怕把他们崩死，统统穿着衣服渡过了河，从河里走过来的。到了草市桥头，就直奔夏宫门，就是今天的德汇门。德汇门当时上面的字是‘天下为公’，这是民国政府的汤玉麟，那是第八任都统、热河省主席写的，他当时的省公署就在现在的东宫。日本军进来的时间是1933年3月4日，上午11点50分，它就举行进城仪式了，上边的字它就不要了，弄个布，马上搞四个大字：共存共荣。日本人站上岗了，把挺干净的大门，修上了炮楼子。”尹忠先生说[1]。

热河在很短时间内便会失陷，并非没有一点征兆的。1933年2月23日，时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兼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的王化一与抗日救国会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在热河视察抗战准备情况时，便发现当时的热河守军“兵有决心，将无斗志”。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当时的热河统帅汤玉麟有极大关系。

“汤氏系一短小、年老、坚实之人，包在西洋货之牛皮大衣中，外束皮带，带上悬巨大木壳枪两支，皮靴，皮领，手持貂皮冠。”

1933年3月3日晨，一个名叫Nanchbaue的外国人来到位于承德离宫内的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司令部，对正在做逃跑准备的热河省主席兼热河驻军司令汤玉麟进行了采访。3日后，这名北京法文日报的主笔在其供职的报纸上发表了《热河观战记》一文，内中详细描述了他见到汤玉麟时的感觉。

[1] 日军进入承德时间，各方说法不一，除白春旺先生下午三四点说、尹忠先生上午11点50分说外，尚有上午8点、下午1点、下午2点左右几种不同记载。

“汤之头成圆形，剃一光头，白色胡子在其洁白之牙齿四周作下垂之状。

“一个蒙古人后裔的头，一个有力量的头，野蛮人的头，或可称之为一个老强盗的头，但是亦为一地之主宰，一军之领袖的头。”



图28 汤玉麟

汤玉麟（1871年~1937年），字阁忱，因在家中排行第二，绰号“汤二虎”。自称热河阜新县人，但据历史工作者研究，实为辽宁义县霍家沟人。赌棍出身，当过马匪，后随张作霖受清政府招安。与张作霖等七名土匪出身的军官结为盟兄弟，通称“七狼八虎”，排行第六。曾任东三省巡阅使署中将顾问、师长等职。1926年，因讨郭松龄有功，被张作霖由辽宁省东边镇守使升为热河都统，为热河八任都统中最后一任。1928年东北易帜后，改任热河省主席、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司令部司令，上将军衔，共统治热河六年之久。1931年4月，与张海鹏接受张学良的命令，共同镇压嘎达梅林起义。1933年2月，被张学良任命为华北对日作战军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统帅军队三万余人。汤玉麟自称自己是星宿下凡，也有“星宿将军”之称。

汤玉麟为人贪财、好色、好马，在东北军中一贯以骄横跋扈著称。原东北军某部赵毅1932年9月、1933年1月曾两次作为吉林省边防副司令兼吉林主席张作相的代表，前往热河面见汤玉麟。据他讲，“汤玉麟统治热河达五六年之久，可说是压根儿针鼻大的好事都未做过。除苛捐杂税、残酷剥削、大开烟禁外，复将全省土地划分下、中、上、上上四等，强征地亩税。每垧税率按5元、10元、15元、20元征收，均按现大洋折合，并一再预征，由民国20年竟有征到民国50年和60年的。人民完纳不起，怕吊打坐牢，有些人将地契文书贴在门窗或树上，向四方逃荒而去。劳苦人民在隆冬三九的季节，多数糊不上窗纸，八九岁的男女孩子都赤光光的浑身连一条线都没有。”[1]曾任张学良咨议、家庭教师，热河抗战时任张学良外交秘书的王卓然对汤玉麟印象亦颇为不佳。“头脑简单、性情粗暴，固然是他的本色，而不学无术，贪污虐民，却是他的本质。他自己兼任卅六师师长，用他的三弟玉山作该师五十八团团长，四弟玉铭任师属炮兵团团长，五弟玉书任师属骑兵团团长。他的大儿子佐荣任禁烟局局长，二儿子佐辅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这简直是把热河变成汤家的私产。热河的禁烟局根本不是禁烟，而是指

[1] 赵毅：《长城抗战前热河形势一瞥》，见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121、122页。

派老百姓种烟纳税。热河种烟也是请得南京蒋政权许可的，名义是筹措军饷，实际上禁烟局每年收多少烟税和怎样开支，全是汤氏父子的秘密，别人没法知道。至于军饷，还是常常拖欠数月不发。据说汤氏父子有这样一句信条，说什么'雄兵百万，发饷就散'。这样养兵，怎能卫国保民。"[1]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1933年2月18日在热河与汤玉麟见面并了解情况时，曾亲耳听到当时的热河电台台长吴子坤向他详细讲述热河军事政治的黑暗情况："汤玉麟视热河为私产，一切不许外人过问。两个儿子最坏：大儿子汤佐荣任禁烟局局长，公开要每县包缴鸦片烟若干两，名为'寓禁于征'，售者、吸者、运者均须纳税行销各地，为热河最大的税收。次子汤佐辅任财政厅厅长，想尽名堂抽捐抽税，从人民身上敲骨吸髓。县长、税捐局长、警察局长按缺的肥瘦，报效的多少，论价出售。军队完全为镇压人民和防止抢他地盘的工具。真实的人数、枪支（新购的枪弹存放库内不发，敌人进城完全放弃）不及定额的一半，多数吸毒。军饷层层克扣，最后军队驻在哪县，给养就向哪县摊派。上下交征利，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痛苦已极。甚至有人喊出宁愿日本鬼子来，不要汤氏父子继续下去。目下尚有两名日本浪人藏在汤的地下室内，督造白面。张副司令（张学良）如果还要热河，就不能要汤，要汤就必丢掉热河。日本人熟悉热河情况，汤玉麟想要做汉奸，日本人都不要他。"[2]2月19日，王化一再度与汤玉麟见面并会谈，据他亲眼目睹，"在汤的客厅里摆着一只猛虎的标本，墙上挂着汤手持机关枪骑在虎背上的照片，他坐的椅子上蒙着一张虎皮。据说和张作霖同时的'草泽英雄'，都相信他们自己是天上星宿降世，来辅助张作霖的。吴俊升是黑熊投胎，平时家中养着几只熊，吴本人走路行动也模仿熊的动作。张海鹏自己说是张飞转世，一遇到关羽庙，便进去叩头，向关羽泥像喊二哥。而汤玉麟说是猛虎投生，因此他很爱老虎，坐着谈话时候两手握拳前扑桌上，以表示'虎威'。如此头脑、如此政治，热河如何不失。"[3]

"汤玉麟实际上对抗战既没有抗战的决心，也没有抗战的力量。"邓一民先生在回顾7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时说道，"口头上说得非常好：'誓死保卫国土，亲临前线督师'，实际上他在承德哪儿也没动。报纸上说他到凌源前线督师去了，实际根本就没有动，利用扣留的240辆军车，把私产、烟土、大洋都运到天津去了。后来天津有个报纸就讽刺他：汤玉麟誓死守土，这个土不是国土，是烟土，誓死守他的烟土。当时热河抗战的时候，张学良任命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二集团军下辖第五、六两个军团，第五军团即汤玉麟的部队，第六军团

[1] 王卓然：《日军侵热与张学良下野》，见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136页。

[2] 王化一：《日寇侵热期间热河纪行》，见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167页。

[3] 王化一：《日寇侵热期间热河纪行》，见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168页。

是孙殿英的部队。实际上，汤玉麟跟孙殿英都是土匪出身，他们的部队，张作相根本掌握不了，他们也不让他掌握。张作相本身有两个旅，一个是张廷枢旅，一个是王以哲旅，这两个旅都布置在古北口。日军进攻热河，开始时间是2月23日，张作相是2月27日才到的承德。这时候东线已溃败得非常厉害，大势已去。日本当时进攻是10万军队，60多架飞机，100多辆坦克，力量十分强大，几乎是十多天就把整个热河占领了。到了3月2日晚上，已经实在坚持不住了，张学良就让张作相先撤退出去。但张作相还有点爱国心，觉得没有完成抗战任务，所以当时执意不走，在离宫里嚎啕大哭，只好让卫兵拖着走了。3月3日，听说日军到平泉了，汤玉麟就逃跑了，带着支援前线的200多辆汽车，装着东西往天津跑。跑到离承德市30多里的地方，听说没占领平泉，又回来了。3月4日早晨，平泉真正失守，又逃跑，带着1000多人狼狈出逃。结果到滦河那儿遇到日军飞机轰炸，400万大洋用骆驼驮子驮着，飞机一轰炸，骆驼乱跑，把大洋撒得满地，士兵乱抢大洋，闹得人仰马翻，连汤玉麟车都过不去了，最后骑一个摩托跑到滦平。溃退时就那狼狈相。实际上当时日军只有128骑进入承德，坦克车围着城转，好像部队人很多，其实没多少人。有个幽默文人林语堂在《吊热河失陷》中写了副对联，上联是：'旬日失六十万方里，热汤滚得快，打破古今记录。'下联是：'三天分个半斤饼干，冷口齿已寒，滑天下之大稽。'这是比较有名的对子。'热汤滚得快'，实际是鲁迅说的，'冷口齿已寒'，是指万福麟第四军团在热东只简单抵抗就跑到冷口去了。"

"汤玉麟率其亲信奔逃后，其政友及部下武官等，咸抱头鼠窜，秩序大乱。

"余侪乃返至古北口，出承德后至第一个山口，汽车又损坏，停顿中途，斯时天降微雪。

"吾侪下车向后一望，但见热河难民，扶老携幼，在冰天雪地之山间小路上列队前进。

"彼处有军队前进，似乎欲在山中各要隘处掘壕防守。彼等之军容不整，惟携有军乐乐器，所得之牛羊亦混在队伍中，掌旗兵手中所执之旗杆尖上，串有母鸡三只。"

前曾提到的北京法文日报主笔Nanchbaue在撤离热河后5天，即因赴热途中受寒，在北平去世。他在去世前写就的《热河观战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此乃一幕悲喜剧。"

热河抗战对于中国人来讲，宛如闹剧一般，在混乱中开场，在仓促中结束。这里面汤玉麟，包括万福麟，遇敌一触即溃，率先逃跑，是主要因素，但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也难辞其咎。张学良外交秘书王卓然、北平军分会参谋团参谋长黄绍竑在战前都注意到了张学良染有很严重的毒瘾，坐车每走30里，就要停车一次，注射毒品。座谈时间长了，也要回屋打吗啡针。当时便产生了其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能否担当热河防守大任的担心。而蒋介石表面上全力支持张学良，暗中早已打好让何应钦取代张学良的算盘，既无真正的抗日准备，也无真正抗日的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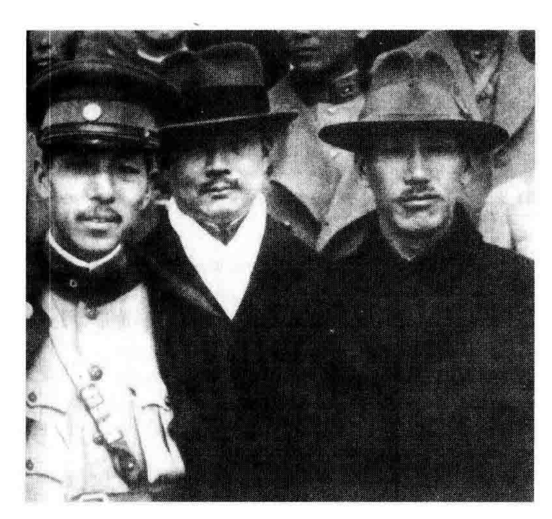


图29　蒋介石与张学良合影

心，又让本欲撤换汤玉麟的张学良犹疑不决，首鼠两端，最终没能斩钉截铁换掉汤玉麟，在丢失东北之后，一错再错。张学良、蒋介石的问题外，军队将领之间不能团结一致，也是热河抗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王卓然记述道："2月26日晚8时，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作去热河的准备。宋子文、杨杰均出席，到有万福麟、宋哲元、商震等将领十数人。张学良将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红蓝铅笔俯伏地上要划防地，首先仰面向宋哲元说：'明轩你可把守这一线（指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宋哲元当时厉声拒绝说：'我的兵力太薄，装备又差，怎能担当得了这么一个大面。'张说：'不要紧，你的右翼有何柱国，他可以支援你。'宋又很不客气地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靠不住，我怎能信他，我不干！'张听了这样不客气的回答，极感难堪，约有几分钟没有抬起头来。后来说：'再商量吧！'"[1]

热河匆促之间便沦于日人手中，引起很多有爱国情怀的中国人的愤怒。时人陈彬龢评论说："热河之失，据一般人之分析，其原因为汤玉麟平日苛政虐民，无人愿与效死。为军政当局对于热河迄无守御之准备，战事既发，前方既无总指挥之将领，后方亦无总兵站之准备，故天险之热河，实无异于空无一人，开门以待寇至。草芥疆土，儿戏国事，一至此极！一般人且以为日于热河，志在必得，且日亦曾声言以得热而止步，则热河既失，战事既可结束，我人又可苟安，故不如弃热以满日寇之欲。果尔，则吾人更复何言？"[2]

热河失陷后，关东军迅速向长城进发。日军的作战目标很明确：其一、强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长城为伪"满洲国"西南国界。其二、通过在长城南面制造一块缓冲区，阻隔南京政府收复东北失地，使伪"满洲国"合法化。其三、为日后侵占华北预先选择一块跳板。

国民政府迫于日军突破长城线，将危急平津及华北安全，影响"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实施，同时为应对爱国民众对其"无法谢罪于国人"的指责，采取了与东北三省的"不抵抗"政

[1] 王卓然：《日军侵热与张学良下野》，见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138页。据何柱国后来回忆，宋哲元当时所以拒绝防守冷口至喜峰口一线，乃因宋哲元原系西北军，曾和奉军之间内战过几年，前嫌未消，故借辞推诿。见何柱国：《忆长城抗战及热河沦陷前后》，《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130页。

[2] 陈彬龢：《热河失陷目击记》序一，中外出版公司，1933年印行。



策略为不同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原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系统的部队，包括一部分准备派往江西“剿共”的中央军都被紧急调配到长城各口。

“南京中枢的设想是，凭借古代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及其周围的险峻地势，死守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长城各口，阻止日军继续深入，争取时间进行国际交涉。据此命令第五十九军傅作义部守独石口；中央军第十七军守古北口；原西北军旧部编成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守喜峰口；第三十二军商震部守冷口。由长城撤下来的东北军整理后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地区担任防御，同时命令孙殿英部坚守多伦以东地区，威胁敌后。从上述军事部署上即可看出，南京中枢根本没有向敌人进攻以收复热河等失陷国土的决心，军事上完全是消极抵抗、被动挨打的架式。这种错误的政治军事策略，再加上中国军队装备低劣，战斗力参差不一，以及内部派系复杂、缺乏有力的统一指挥等等，不能不导致了后来长城抗战的失败。”[1]当时参战的十七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郑洞国多年后在《回忆长城抗战》一文中写道。

“由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对日采取妥协态度，缺乏抗日的决心和必要的准备，因而战争一开始就使我军陷于被动的境地。本来长城一带地势险要，我军倘若提前构筑坚固工事，加强纵深防御，并调精锐部队据险防守，则以敌人有限的兵力是很难突破我军防线的。但令人痛心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此几乎丝毫未曾加以注意，更谈不上修建什么国防设施。部队匆匆赶到前线后，因阵地上多半是岩石，工具又很缺乏，已经无法也来不及修筑像样的工事，官兵们只能凭借祖先留下来的古老的长城，以血肉之躯来阻挡装备精良的敌人的进攻。同时，由于部队平日训练都以‘剿共’为目的，缺乏对日作战所需要的对空和对战车以及近代的筑城作业等训练，因而我军未战之前，即在日军飞机、战车、大炮等优势火力的狂轰滥炸下遭受到相当伤亡。更荒唐的是，一些部队在开赴前线时，连军饷、服装、武器等项尚无着落。譬如：第二十五师2月25日由徐州出发时，3月份的伙食费还没有领到。该师只得在地方上借了10万元，部队才能开拔。当时北方还是冬季，尤其是古北口一带都为冰雪所覆盖，可我们的部队到达时，许多士兵还穿着草鞋，根本没有防寒服装。幸亏北方各界民众大力支援，始基本解决了部队的防寒困难。第二师由洛阳开到北平时，刚刚从仓库里领到轻机关枪，官兵们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以前部队里只装备重机关枪，没有轻机关枪）。前线部队的粮秣补给也很困难，当时后勤部队卡车很少，勉强可供运输弹药之用。粮秣运输皆赖骡驮和牛车，一日行程不及80华里。为了防空，运输都必须在每日下午5时至翌日晨6时进行，其余时间只能在树林中隐匿。这样由石匣镇往返北平一次，大约需六七日，部队给养时有中断之虞，如此等等。”[2]在同一篇文章

[1] 郑洞国：《回忆长城抗战》，见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21页。

[2] 郑洞国：《回忆长城抗战》，见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22页。

图30　20世纪30年代古北口全景（照片提供：庞宝忠）

中，郑洞国如是说。

郑将军所言中国军队的艰难情况，不少长城抗战参战将领在回忆往事时，作了同样的描述。循着这些回忆文章提供的线索，2006年以来，我两次前往古北口长城战场遗址，一次前往喜峰口长城抗战旧址，在当时中日军队反复争夺、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生命代价的将军楼子、八道楼子、老婆山等地，亲眼目睹了中方将领提及的对中国军队极为不利的战场地理环境，并在冷飕飕的山风吹过荒草和岩石时，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了既无隐蔽物、又无防空炮火和重武器，还要饱受寒冷天气折磨的中国士兵那种难忍又必须忍，豁出命来与侵略者相搏，脚下的土地即是自己的光荣之地那种悲怆的心理。

国民政府广大爱国官兵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与日军进行了惨烈至极的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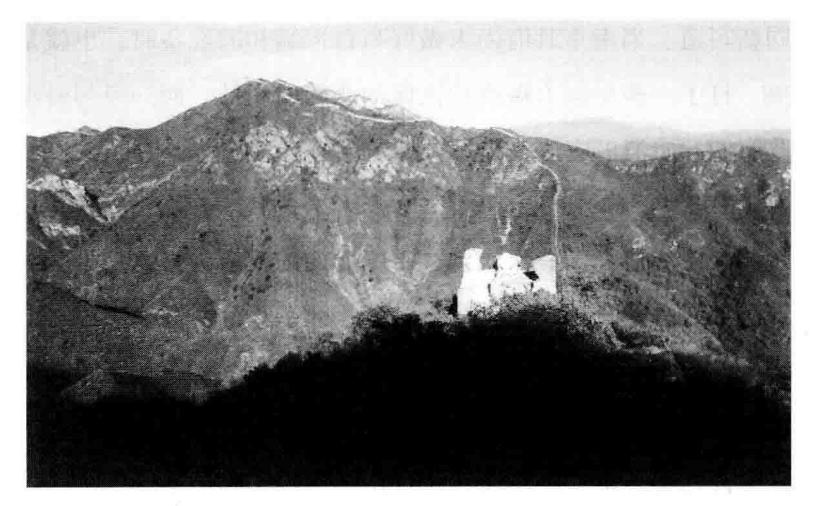
东部，冷口地区，晋系商震部队的黄光华师与日军在冷口展开激烈拉锯战，几得几失，最后将日军逐至口北20多华里的地方，并一度在那里对峙20天左右。

中部，喜峰口、罗文峪地区，原西北军旧部改编的二十九军在军长宋哲元指挥下，用大

刀、手榴弹、地雷与拥有飞机、重炮、装甲车的日军服部、铃木旅团相搏。三十七师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眼见喜峰口阵地反复易手，镇东北“群峰之冠”的主高地久攻不下，发挥二十九军近战特长，主动出击，率五百勇士组成的大刀队，夜袭日军炮兵阵地与骑兵驻地，重创日军，五百勇士也几乎死亡殆尽。



图31　喜峰口老婆山二十九军重机枪阵地遗址。2007年4月


图32　古北口抗战中，被日军占领的八道楼子之二道楼子，中国军队反攻多次，均未夺回。2009年10月

西部，古北口地区，中央军十七军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一个由7名士兵组成的建在帽儿山上的前沿军事哨，因电话线被炸断，不知部队已经撤退。该7名士兵以一挺机枪为依托，钉子样地顽强扼守阵地，共毙敌160余人，伤200多人。日军恼羞成怒，出动飞机火炮对这个小哨所反复轰炸，7勇士全部壮烈殉国。日军对这7名士兵非常钦佩，特派人将他们的遗骸从山上背下埋葬，并在墓前立碑，上题“支那七勇士之墓”。八十三师5月10晨至11日午时，一天半的时间，遭遇日军共计7500余名步骑兵、6辆坦克、8架飞机、70余门火炮的攻击，各团伤亡都巨大，有的团甚至伤亡三分之二。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因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牺牲那么多的官兵，悲愤至极，拔出手枪欲自杀，多亏部下及时救下。郑洞国旅以不到两千且连夜行军、极度疲劳的兵力，独挡飞机大炮掩护下的四五千名日军，危急关头，脱掉军装上衣，只穿白衬衫，提手枪，带一个特务排，亲上最前沿督战，以示与阵地共存亡……[1]

[1]　郑洞国：《回忆长城抗战》，见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30、31页。

从1933年1月1日到5月31日，从榆关到独石口，尽管有爱国官兵浴血奋战，尽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遵化市委党史办主任石学锋介绍，长城抗战期间，仅二十九军军部所在的遵化县城一地，老百姓就拆了门板4000多块，为二十九军做担架。此外还腾出很多房子，供二十九军官兵住宿。送了很多猪、鸡给二十九军，支援他们抗日。出来几位刀术教练，为二十九军培训部队。但长城抗战最终还是以失败的结局令人痛心地谢幕了。

“中日双方的政治目的，支配了长城华北抗战的全过程，战局的展开一步也没有离开这一中心问题。”[1]今人张同新在回首长城抗战时这样写道。日军的目的，如上所述是长城划界，并企图将伪满洲国彻底合法化；南京国民政府的目的是以抵抗求得国联出面调停，满足于暂时与日军相安，以便腾出手来全力“安内”。“这样，北平便有两套班子：打，靠何应钦按蒋介石的旨意指挥的北平军分会系统；和，靠汪精卫直接指挥的黄郛政务整理委员会系统”。[2]张同新写道。当南京政府尚未做好与日军媾和的准备时，也就是长城抗战的早期，军事上比较坚决，打了一些令国人振奋和钦佩的悲壮的硬仗。而一旦与日军妥协谈判的班底准备停当，南京政府便开始消极应战，积极求和了。

1933年5月31日上午9点，中日双方的代表在塘沽日军运输所正式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准备签署停战协定。此次谈判，中国方面的代表为：北平军分会参谋本部厅长、陆军中将熊斌；铁道部政务次长、陆军少将钱宗泽；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陆军上校徐燕谋；北平军分会顾问李择一、雷寿荣；华北第一军团参谋处长张熙光；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殷汝耕等。日本方面的代表为：关东军参谋副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关东军参谋、陆军步兵大佐喜多诚一；陆军炮兵少佐远藤三郎；陆军步兵少佐伊藤铁雄；师团参谋、步兵少佐河野悦次郎；师团参谋、陆军骑兵大尉冈部英一等。谈判一开始，冈村宁次便拿出早已由日方准备好的协定草案，声称一字不能改动。根据国人翻译的日方资料，中国代表提出了恢复战区原状、维持治安等修改意见，“关东军方面则表示：‘鉴于此次停战协定的性质，只需中国方面表明是否同意关东军所提示的协定方案，故中国方面之提案没有回答的必要。’”双方僵持一个多小时，10点50分，中国代表被迫屈服，按日本要求，一字不改地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便是《塘沽停战协定》，简称《塘沽协定》。

[1] 张同新：《长城抗战与古北口之役》，见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43页。

[2] 张同新：《长城抗战与古北口之役》，见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43页。

其全文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于昭和八年5月25日，在密云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正式接受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表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停战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缔结左列之停战协定：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经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

中华民国22年5月31日

昭和八年5月31日

中国方面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

日本方面代表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副长冈村宁次

《塘沽协定》的全部内容，公众所知的只有上述这样一份具有五项条文的正式文件。而根据历史学家近年披露的资料，实际上它至少还应包括一个觉书、一个有四项内容的口头约定及一个后续协定《关于华北善后交涉协定案》。

觉书的内容：万一撤兵地域之治安发生扰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镇压，应由双方协议之后再作处置。

中方应允并承诺不公开发表的四项口头条约：日方口头希望，①丰宁西面之骑兵第二师，望即撤退。②平津附近之四十师华军，望即他调。③白河附近堑壕及其他军事设备，望予撤去。④中日纷争祸根之排日即彻底取缔。

《关于华北善后交涉协定案》的主要内容：①长城各口由日军负责警备。②满洲国得在长城各关隘设立必要的机关，中方应予以承认并给予最友善的援助。

觉书与四项口头约定是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便签署和达成的。《关于华北善后交涉协定案》为同年11月7日，由冈村宁次与黄郛、何应钦低调签订。此三项之外，有研究者

根据6月上旬中日双方先后撤军，但日方却将骑兵部队留驻玉田附近，铃木旅团驻留密云地区“监视中国军队”，中方未提出抗议，怀疑《塘沽协定》也许还有另外的秘密协议，苦于目前无法查证而已。

《塘沽协定》在中日双方的近代史上都是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对中国人来讲，它是个极其屈辱的条约：表面上这只是个中日交战军队之间的军事协定，丝毫不涉及两国政治，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承认了长城为日军的占领线，实际上相当于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及热河的占领。而且由于按照协定，长城线以南、停战线以东及以北的22个县，中国政府不能留驻军队，只能通过警察维持治安，而日军却可以各种名目自由地进出该地区，实际上等同于中国政府已经丧失对该地区的主权。不仅如此，此后华北将一直处于日军的严密监视之下，换句话说，华北门户洞开，包括平津在内，以后再无安全可言。而同一协定，对日本人包括关东军和天皇来讲，则意味着取得了远大于他们期望的成果。来自日方的资料表明，实际上长城抗战的中期以后，关东军的战力就已达到极限，早日签署停战协定的心情，关东军比南京政府更为迫切。但由于南京政府急于求和，反致关东军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使得“满洲国”划界工作迅速完成。不仅如此，关东军通过《塘沽协定》之后的善后协定《关于华北善后交涉协定案》，规定了日军可以在长城各口屯集兵力，还为它日后与在天津的驻屯军遥相呼应，共同策划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埋下了非常重要的伏笔。

《塘沽协定》一经发表，必然引起全国爱国民众的强烈谴责，但南京政府的代表却有着自己的看法。何柱国在《榆关失陷前后》中回忆，《塘沽协定》签字后，黄郛用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各方头面人物。“我同黄郛同席，席间黄郛得意之余，大谈起秦桧，他说：‘人们都说秦桧不好，其实如果没有秦桧的议和，南宋就不一定还有160年的天下。’言下飘飘然大有与秦桧争妍比美的神气。天下无耻之人，竟有至于如此之甚者！”

《塘沽协定》签订一事，关东军、蒋介石都是赢家。关东军完成了它梦寐以求的“满洲国”划界工作，并保留了可随时进入华北的高压态势；蒋介石成功地将张学良驱赶下台，将国民党中央的势力伸展到华北。此外，他还赢得了对他来说头等重要的“围剿”红军、消灭一切反蒋派系的时间。

《塘沽协定》公布后，国内民众非常愤怒，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指责蒋汪二人卖国，说他们是出卖中国领土、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但协定已签，局面已难挽回，中国军队从6月初开始陆续从长城沿线撤出。

撤军的场面十分伤感，今举国民政府第二十九军撤离的情况来说明。

“在研究长城抗战时就看到了，二十九军下那么大力量，死得那么悲壮，一声令下，把

二十九军就撤了。”2005年夏，我到唐山采访，原唐山市委党史办副主任李成民先生说，“国民党二十九军的防区里，打得最激烈的是喜峰口和罗文峪。喜峰口是长城东线的重镇，日军下的力量很大，我们也下了很大力量。一开始发起进攻，我们把敌人打退了。敌人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也准备大干一场。首先从喜峰口开始，进攻之后，罗文峪就做好准备。喜峰口胜利后，敌人就偷袭罗文峪。中国军队这时就大量投掷手榴弹，我们的战士举着大刀向前冲、向前杀。据当地老百姓讲，那气势，不知道战士们怎么来的一股子劲儿。有的老百姓形容，战士举着大刀过去之后，那鬼子真是屁滚尿流，滚得哪儿都是，有的简直是无还手之力。鬼子让我们二十九军将士打得四处溃逃，一下子就可以推进十几里地。这个举动可是对咱们中国震动很大，老百姓组织慰问，煮鸡蛋呀，蒸馒头啊，拿好吃的东西慰问他们。这一仗打得非常好，将士也非常自豪，确实打出了中国的威风。日军当时也想速战速决，一看力量不行，马上往后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撤退。有很多二十九军将士回忆录写得非常好。比如一个回忆录里写道，老乡抱住一个团长的大腿，说：‘长官，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长官不愿意后退，拍拍老乡肩膀说：‘起来吧，往深山里躲一躲，我们还会回来的。’当时就抱着这种态度，就是说，1933年长城抗战的时候，国民党的那些部队是愿意抵抗的，可是蒋介石、何应钦一声令下，二十九军往西撤，一个劲儿往西撤。回来了没有，到今天也没回来，国民党军队到今天也没回来。刚才我说的那个团长，他非常沉痛这个话语，就证明了他对这个事是一种惋惜。我们这么好的战绩，我们不打，还要我们撤退，他是不满意的。1933年是这样，五年以后，是共产党、八路军过来了，四纵的宋邓支队八路军过来了。这是当时老百姓的心情，渴望中国的军队防御外国军队、打击外国侵略这个心情。”

“狗日的老蒋，日本人都是他放进来的。”2006年4月，我到遵化南部了解孙永勤抗日救国军最后覆灭前的情况，在岳各庄乡尖山屯村遇到91虚岁的陈瑞祥老人。1933年长城抗战时他已19虚岁，很多事情难以忘记，“要不是老蒋，日本人能进来？宋哲元打了那么长时间，都是老蒋让撤下来，这事忘不了啊！”

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展开的长城抗战虽然以中国人的屈辱失败而告终了，但那些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爱国军人们，我们却永远不能忘记他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僻陋乡村与繁华城镇、贫穷家庭与官宦之家的将士们在装备极其低劣、作战环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凭着一腔朴素的爱国热情，与掌握着精良武器的日军殊死战斗，英勇拼搏，往往为了一个战略要地的得失，前仆后继，反复冲杀，直至在日军炮火下化为齑粉，或在与日军大刀、刺刀肉搏中同归于尽，将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精神表现到极至。据弘治、黄吉平、张鑫典三位作者在《不可忘却的民族抗争史：乱世存亡》一书中介绍，中方在近3个月的长城抗战中，仅第十七、第二十九、第

三十二、第五十三、第六十七军就伤亡18000余名官兵，有评论者用“一寸河山一寸血”来形容，诚不为过。以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为例，该师编成于1932年，驻守徐州、蚌埠一带。1933年2月26日（一说25日），该师奉命向通县开拔，并于3月9日星夜急赶至古北口前线。3月11日拂晓，战斗打响。二十五师以四个步兵团抵挡日军西义一第八师团第十六旅团、骑兵第三旅团一部在飞机、大炮、坦克配合下的联合进攻。在友军协作不力，除迫击炮外，山野炮全无，光山秃岭，冻土岩石，没处掩蔽，也无法构筑坚固阵地的情况下，同仇敌忾，仅凭着一片报国心，与日军拼死搏杀。从11日晨至13日下午6点，三天两夜时间，二十五师便伤亡4000余人，前文七勇士英雄故事也发生于此战之中。[1]

二十五师部队中，有近3000名新兵是军长徐庭瑶按照严格标准从蚌埠和皖北各县招来的青年学生和农家子弟。他们身体素质好，爱国热情高，令人惋惜的是训练不足半年，便因长城战事起，被派至古北口战场。3月11至13日阵亡的官兵中，有许多即为这些年轻的“淮上健儿”。据《徐庭瑶将军在古北口抗战中》作者马俊如介绍，徐庭瑶在前线指挥所每日通过望远



图33　古北口八道楼子向阳面的敌楼墙砖上，依稀可见不少弹洞。根据当时的攻守态势来分析，它们是中国军队子弹留下的痕迹。2009年10月

[1] 马俊如：《徐庭瑶将军在古北口抗战中》，见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19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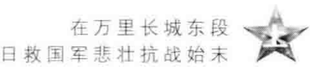




图34　古北口镇文化站科员庞宝忠手托从墙砖里取出的一颗弹头站在二道楼子前。2009年10月



图35　一位老人站在古北口南天门战场遗址上，表情凝重。2006年4月

镜看到暴尸荒山的这些战士的遗体，内心都十分悲恸，于是派官兵夜以继日收敛忠骸，在当地政府和百姓的帮助下，共敛得遗体500余具。徐又派专人采购木材，请工匠彻夜赶工，打出500口棺材，当地一些老人也主动将自己的寿材献给阵亡将士。“烈士遗骸边收敛边装运，”马俊如写道，“集中了100多辆马车，往返运送了十多天，才送到了通县，装满了半个列车的车皮。以团长王润波灵柩为首的一列运灵专车开向蚌埠，沿途各站大都受到各界人士公祭。走了一个星期抵达蚌埠，蚌埠各界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接着在安葬这天，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一个多月以前，群众欢送二十五师从蚌埠出发奔赴前线时，官兵们个个生龙活虎，斗志昂扬的气概，大家都记忆犹新。现在却运回来了500多具棺材，参加迎灵和追悼会的人无不痛心落泪，在心中激起了对日军无比的仇恨。”[1]

长城抗战古北口阵亡官兵的遗骸除无法收殓及一部分被所属军队将领移送回故乡外，其余大部被战场当地爱国民众自发组织埋葬。2006年4月、2009年10月，我两次到达古北口南门外埋葬国民政府军官兵较多的肉丘坟前，都看到苍郁的柏树前面，静静地伫立着自发悼念的人们送来的花圈和花蓝，挽联的落款显示着这些悼念者大都来自百里之外。长城抗战二十九军阵亡官兵的遗骸大部埋葬于遵化石门镇石门村西，现存一座无名烈士合葬墓和三座有姓名籍贯的军官墓。2007年7月，国内一个民间网站“长城小站”曾发起“为长城抗战牺牲的官兵寻家乡寻亲人”活动，并于次年1月，会同寻找到的二十九军阵亡官兵家属、长城抗战国民政府军将领后代一起为二十九军阵亡将士举行了特殊的祭奠活动。

民间自发纪念外，1997年、2005年，政协北京市密云县委员会、中共迁西县委、政府分别

[1] 马俊如：《徐庭瑶将军在古北口抗战中》，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见《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8月编印，第194、195页。

在古北口南门外和喜峰口楼沟建立了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纪念碑和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纪念1933年发生的长城抗战。

以上民间和官方两个层面的行为都说明了，尽管长城抗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我国人民对长城抗战爱国将士们的敬佩之情历半个多世纪都无法磨灭。

巍巍长城，虎踞龙腾。荡荡潮河，源远流洪。

将士守土，与倭抗争。为国捐躯，血染长城。

埋忠骨，青山有幸；慰英魂，绿水增荣。

缅怀英烈，泣悼英灵。慰藉往者，砥砺后生。

今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密云县委员会所立《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纪念碑》碑文转抄如上，谨借此慷慨多气之词来纪念长城抗战所有为国捐躯的英烈！

回过头来再说孙杖子伙会副会长孙永勤，由于平时特别爱看书报，故对时事的了解远较一般的山区农民要多。根据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上个世纪所做调查，1931年底、1932年初，当孙永勤得知东北三省由南到北依次被关东军占领后，便产生了拉起一只队伍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想法。较早的关于孙永勤的文章中，提到了他曾一度与退入热河境内的东北义勇军联系，希望共



图36 冀东段长城。《塘沽协定》签订后，关东军以长城为界，将北侧地区划入了伪“满洲国”版图。 2009年11月

同抗日的经历。孙永勤的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据说是由于他所联络的义勇军很快被日军消灭了的缘故。这个情况是否属实，现在无法查证，但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曾有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残部和冯占海等很多支抗日义勇军相继撤退到热河边境地区，其中不少还参加了之后的热河抗战、长城抗战，一直活动到1933年4月底，何应钦在北平召开华北军事会议，决定取消义勇军、救国军名号，大部分义勇军、救国军被遣散为止，却是历史事实。而以孙永勤对日本侵略者的认识和他在私塾时期培养起来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结，希望能和抗日的志士们联合起来，一起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赶出中国，也符合他的性格逻辑。孙永勤的孙子孙团营曾两次向我讲起他爷爷的一个故事："他听说日本人侵占朝鲜后，让朝鲜人跪在马下，日本人踩着上马。我爷爷听到这里的时候，当时就流泪了，说日本人已到了咱们眼皮底下了，咱们要当亡国奴的话，肯定也是这种下场。再看到日本人对百姓的做法，于是决定起义。"

孙永勤的起义是经历了一番曲折的。

"1931年就开始活动，到1933年才拉起队伍来。"孙永勤次子孙文孝1983年5月回忆说。之所以经过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孙永勤才实现起义的愿望，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是他的家庭起了牵绊作用。

无论他的母亲还是妻子都坚决反对他拉队伍打日本。

孙二奶奶不赞成，据孙永勤长子孙文伶回忆，是担心得不着儿子的济。刚30多岁便失去丈夫，晚年如果再失去儿子，怕生活没有依靠。

雷永兰不支持，则应该说一是不愿抛下富裕的生活，二是孩子年龄尚小，为孩子成长着想，三是她内心深处也比较依恋孙永勤，不愿意失去他。"早上，我奶奶把我爷爷衣服给藏了，紧紧搂着他，目的是想挽留他，参谋长一找来了，我爷爷想尽一切办法，该出征出征，该打仗打仗。"孙团营曾向我讲起他爷爷起义后，手下已有不少人马，奶奶雷永兰早晨仍然百般柔情蜜意，不愿爷爷带队出发之事。

对母亲，孙永勤是孝子，最初十分不愿拂逆老人；对妻子，孙永勤身上尽管大男子主义思想十分严重，可他经常是无计可施。"你爷爷那么厉害，率领千军万马打鬼子，日本鬼子见他就跑，他跟我使不出去。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把他衣裳给藏了，他围着被子在炕角：'老婆老婆，媳妇媳妇，快给我衣裳吧，给我衣裳吧。'那么威风，他也得跟我说好话。"孙团营回忆奶奶曾十分自豪地跟他说过这样的话，指的虽然是孙永勤起义以后，但我们可以想象起义之前的情景。

因为母亲和妻子的原因，不得不困守家中，孙永勤内心十分烦闷。这种局面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热河抗战开始时仍是如此。"1933年日本鬼子打热河的时候，听说驻扎热河的国民党反动派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却一枪没打就向南逃跑了。留下的地主、土匪武装更可恶，还和鬼子勾结起来，烧房子，抢东西，奸淫妇女，欺压百姓。永勤看到这个世道，愁眉不展，茶饭不进，整天整宿

地猫在屋里打主意。实在憋不住了，他就耐心地劝我婆婆，动员我，他要带着老百姓打鬼子去。我不愿意：‘你打鬼子去，这三个孩子怎么办？’他就说：‘你看，这年月哪有老百姓的活路？咱们得先治国后安家呀！’”1981年，在《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回忆丈夫孙永勤》一文中，雷永兰回忆道。

虽然由于家庭的阻挠，不得不暂时搁置起义的计划，但孙永勤并未就此熄灭他心中的抗日之火。他曾为二十九军的胜利激动过。受承德地委宣传部和党史办委托，于1983年春调查孙永勤事迹的刘刚范先生在《孙永勤与民众抗日救国军》一文中说：“在全国人民抗战洪流的鼓舞下，爱国的、原属冯玉祥将军的二十九军开赴长城一线抗战。3月9日日军攻占喜峰口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也正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双方激战，伤亡甚重。11日二十九军利用夜战、近战，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乘敌不备偷袭了日军阵地。爱国官兵用大刀砍杀日寇，敌人伤亡惨重，终于把喜峰口夺了回来。接着又在罗文峪击退了日寇的进犯。这是长城抗战的唯一胜利。捷报传来，振奋人心。孙永勤听到百里之外的抵抗炮声时，由衷地兴奋，他信心十足地告诉人们说：‘只有抵抗，才有出路，二十九军兄弟们的大刀也能把鬼子打败。’”根据佟靖功先生的调查，孙永勤曾实际支援过二十九军在罗文峪的抗战。“据孙永勤的邻居孙文阁介绍，1933年3月份，孙永勤和关元有到鹰手营子给民团（应为‘伙会’——编者）联系子弹、买东西，正好日军进攻那里。他们得知日军要往南去，孙永勤、关元有二人基于爱国的热情，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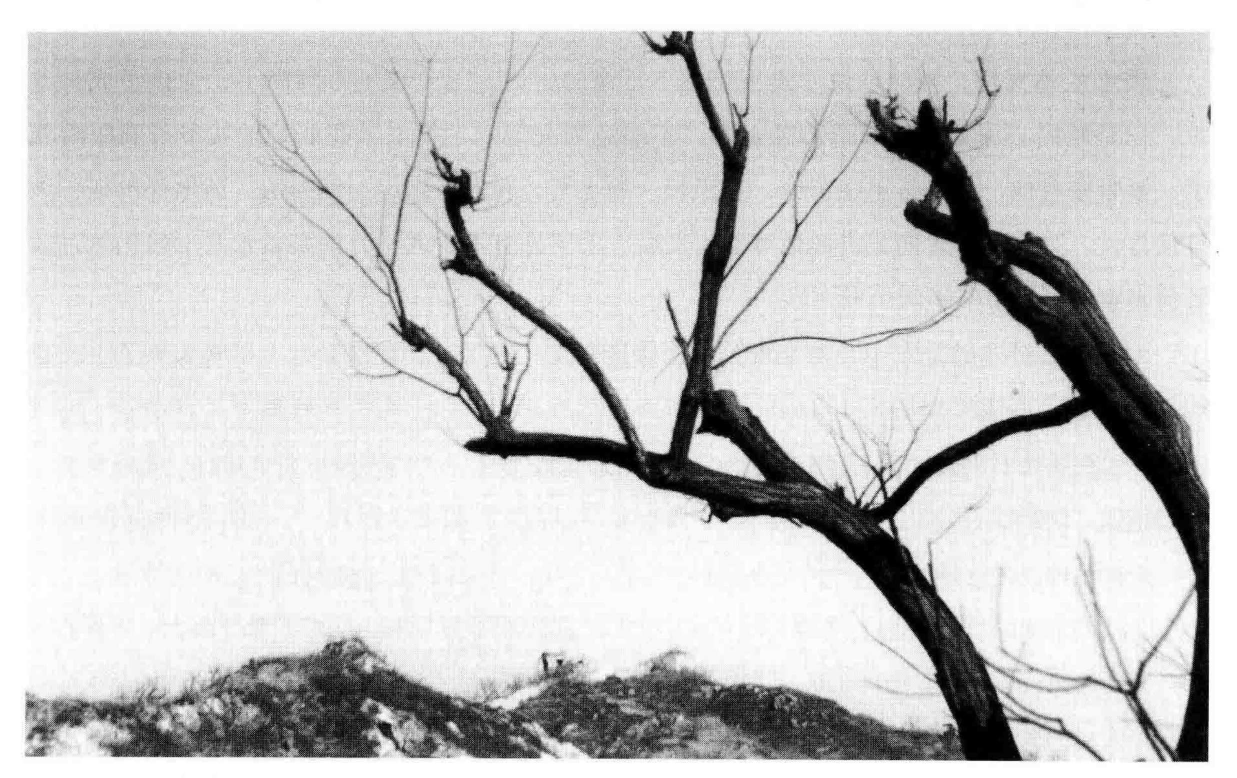


图37　罗文峪长城　2006年4月

马，到罗文峪给二十九军送过信，说日军已经到鹰手营子了，长城线上的中国守军应该注意。这事在二十九军副军长何基沣的回忆录里有记载，说有两个农民给他们送过信，他们很感谢这两人。何基沣没有记住这两个农民的名字，实际上根据孙文阁谈到的情况，就应是孙永勤和关元有两个人。鹰手营子到罗文峪有100多里地，还是夜里，很不容易。从这个细节上就可看出这两个民族英雄的爱国热情。”

佟先生提到的何基沣回忆录，我曾花费了很多时间寻找，后于2008年底在中华书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中见到。现将原文抄下：

“罗文峪在遵化北18里，东北距喜峰口110里，其地适当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长城凹入处，倘被敌占，则喜峰口的左后方受到威胁，势必无法站脚，不战自退。因此我方在这方面驻有刘汝明师担任防务，并与原驻口外的东北军李福和的骑兵第五旅一部取得联系，互为策应。不料当日军由热河向罗文峪挺进的时候，李部骑兵望风而逃，擅自向西撤退，也不通报我军。幸而当地民众基于爱国热忱，连夜向罗文峪我军报告日军南犯的消息。与此同时，我军在罗文峪口外，抓获一名佐官级别的敌探，在他身上搜出文件，知道敌人从朝阳、平泉、滦平一带，抽调第三十一联队、第八联队协同一部分伪军，经由兴隆县东北60里的鹰手营进犯罗文峪。我军得悉情况，严阵以待。十六日拂晓，敌人先头部队沿半壁山向罗文峪进攻，企图夺取三岔口高地。我军祁光远团跑步绕出黄崖口予以截击，经激战后，敌始退去。第二天，敌大举向罗文峪、山渣口、沙宝峪进攻，炮火猛烈，并有飞机助战。我军诱敌迫近，突出阵地，猛掷手榴弹，肉搏冲锋，反复冲杀。战斗竟日，阵地得失数次，我方复调李金田旅增援。傍晚，敌向鹰手营方向退去。此役敌伤亡甚重，有少佐指挥官一员被我军击毙。”[1]

孙永勤心中沸腾的抗日激情不久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牵动着全国爱国民众的神经，被国人寄予极大希望的长城抗战，以一纸《塘沽协定》令人无限悲愤地结束了。

根据近几年发现的新线索，心情抑郁的孙永勤极可能随后将目光转向了热河的西面，继而秘密参加了另一场给他带来新希望的抗日活动。

“据我奶奶说，你爷爷那时去张家口‘guà duì’。”2005年4月，孙永勤之孙孙团营向我讲了一件事情，“我奶奶那时年纪已经很大了，挺能讲的，哒哒哒，说，‘你爷爷一去多长时间不回家，去好几个月，再把队伍带回来。也不管我们，上张家口。’”

“guà duì”二字怎么写，该写作“挂队”还是“挂对”，如何解释，雷永兰当年未讲。孙团营那时年龄小，也未想到向奶奶了解。起初，孙团营、我都猜测“guà duì”大概是指联合的意思，说孙永勤到张家口“guà duì”，应是指他应张家口一带伙会或民团之类团体邀请，去察

[1] 何基沣：《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1版，第128页。



图38　从水母宫眺望张家口市区。2008年7月

哈尔省联合剿匪，但始终不敢肯定。2006、2007年，我两次利用去孙杖子、蘑菇峪一带采访的机会，向那里的老人们了解，但都没有结果——孙永勤家乡一带没有“guà duì”这样一个词汇，我所请教的老人们也无人知晓孙永勤曾有到过张家口的历史。

2008年6月，根据雷永兰当年所讲的情况，我给张家口市委党史办打了电话。经那里的同志帮助，与原张家口地委党史研究室征编科科长蒋维权先生取得了联系。一个月后，我到达张家口，当面向蒋先生请教，通过他的耐心解答，才终于弄清楚了“guà duì”一词的来龙去脉。

“guà duì”的准确书写法为：“挂对”。

“‘挂对’这一名词从铁路上开始。”蒋先生说。据他介绍，1905年，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施工时发生了工程车脱轨的事故。经查，是连接列车的铁链断掉了。这一情况引起了詹天佑对挂车问题的重视。早期的火车车厢之间靠铁链连接，人工方式挂车，行车事故、人员伤亡事件时有耳闻。那时美国人詹内已发明了可靠安全的自动挂钩，于是詹天佑将其引进，并做了一些改进，把它应用于京张铁路全线，不但行车事故大为减少，工人的生命安全也得到了保障，受到人们的欢迎。詹天佑采用的“詹式自动挂钩”，很像两个对着伸出去的方向相反的拳头，只要一撞，便会咬合在一起，像一只手拉着另一只手的样子，插上销子似的东西，车厢就能牢固地连接起来。以后铁路工人们便把挂上相对应的车钩，连接好车厢，称为“挂对”。“对”即对应、相合、配对的意思，这是挂对的最初含义。之后，上世纪20年代，“挂对”在张家口的意义又有了新的拓展。

“1922年，张家口成立党组织，当时叫工运小组，也叫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具体领导叫何孟雄，领导京绥铁路一次车务大罢工。这个组织提出‘挂对’两个字，把铁路用语用到斗争上了。当时的口号是‘团结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有对就挂，见好就收，提高再斗’。敢于斗争，有目标就干，目的达到就适可而止，接着再努力。在这里，‘挂对’含有碰对心意、接上关系、排斥别人的意思，与张家口当地的‘合手’更贴近。在袖子里一摸就知道了，但是只有摸的人知道，排斥外界，别人不清楚。”蒋先生说。

那么，张家口地区的伙会或民团一类组织在剿匪时是否也会使用“挂对”这个词呢？蒋先



生表示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除铁路工人和张家口中共党组织外，从未听说过伙会、民团当中也使用过这个概念。如此看来，挂对一词属于铁路工人和张家口中共党组织的专利，至少在新的证据出现之前可以这样说。

根据蒋先生介绍，并查阅张家口中共党史资料，我了解到：张家口的中共党组织自1922年创立，领导张家口当地的工人进行革命斗争以来，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曾成功地掀起过两次工农革命斗争的高潮。

第一次是1925到1926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国民军驻扎察哈尔时期。当时中共党组织的工作重心是统战、国民运动与军事工作三项，除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地区性领导机构（中共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城市各行业及农村建立党支部、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外，主要做了争取国民军响应国民革命，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工作。张家口中共党组织第一次的发动对象和响应者基本仅限于张家口当地的工人、农民及驻察哈尔省的冯玉祥国民军，除平、津曾派去一些中共党员外，外省未有民众前往察哈尔参加革命斗争。

张家口第二次工农革命高潮为1933年，即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时期。那时的张家口已改名张垣。当时中共党组织除发动察哈尔本地民众积极支援同盟军抗战外，还曾直接或通过抗日救亡组织动员东北和华北的青年学生、工人群众到张垣参加抗日同盟军，或者募集经费物资支援同盟军抗战。热河毗邻察哈尔，地处察哈尔省与辽宁、吉林、河北三省及北平、天津两市之间的地带。根据目前可看到的资料，曾有热河民军前往察哈尔加入到抗日同盟军战斗序列中，热河的伙会、民团是否曾参加或支援过察哈尔同盟军的抗战，各种资料虽没有明确记载，但我相信它们一定会受到过邀请，同时，雷永兰所讲的孙永勤到张家口（张垣）挂对也应正是这个时期。

“孙永勤，原来参加察哈尔事变。”2008年7月3日，在采访了蒋维权先生后，我由张家口出发，经张北、沽源、太仆寺旗、正蓝旗，到达原属察哈尔省、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的多伦县，对孙永勤或热河伙会、民团是否确曾参加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一事进行调查。我所行走的路线，基本上就是70多年前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的作战路



图39　察哈尔抗战时期的冯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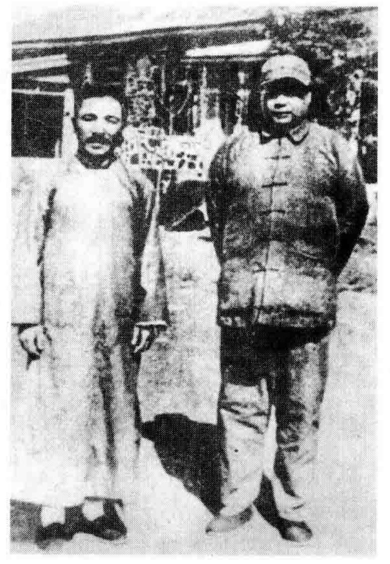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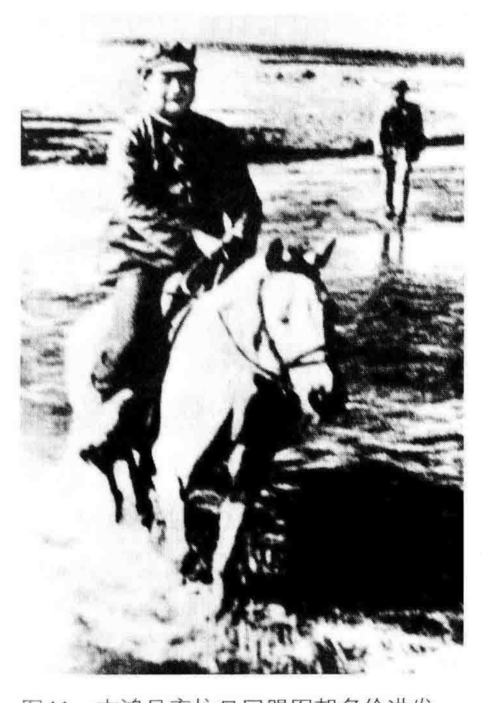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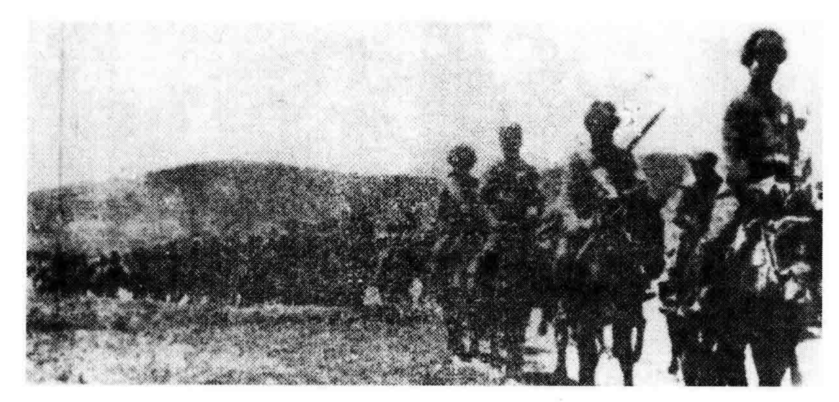


图40　冯玉祥、方振武（左）在察哈尔


图41　吉鸿昌率抗日同盟军朝多伦进发

线。2008年7月之行，由于年代久远，了解同盟军情况的人所剩无几，且同盟军当年的构成情况极其复杂，孙永勤那时还名不见经传，故未获任何结果。但在经围场、隆化、承德市到达兴隆县后，却意外地在兴隆县史志办保存的孙永勤资料中，见到了原中共河北省委财贸部部长李一夫的一篇采访记录抄件。在原件保存于冀东烈士纪念馆的这篇文章中，李一夫写道：“（孙永勤在察哈尔）事变失败后，来到冀东宁河一带活动。后来王承祖派人与孙联系在一起，与王承祖的民团编在一处。当时孙永勤从口外带过200多人，孙永勤很能打，曾与玉田的敌人打过几次仗，后来他们的队伍扩充到1000多人，声势浩大。玉田的于学忠（应为‘周毓英’，下同——编者）和日本人会谈，双方派兵围攻他们。于学忠为围剿他们曾派了一个师的兵力，日本兵也派了若干人，把孙、王包围在玉田县鸦鸿桥镇。在此次战斗中，孙永勤带他们原200多人的武装就冲出包围，而王承祖除他本人逃出外，就全军阵亡。经过此次战斗后，孙永勤就不听王承祖的话了，他带着原200多人就又回口外。因当时孙没有和当地党的组织发生关系，不知他是何样一个人，只知他在察哈尔抗过日。”

李一夫使用的“察哈尔事变”一词，我之前从未听说过。开始，我以为它指的是1934年10月、1935年5月两次“张北事件”，查阅资料，发现并没有此种叫法。2009年7月，在我编写这本书时，从蒋维权先生送给我的《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汇编（第一集）》中，看到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田夫（石心）致中央信第十五号，其标题用了“关于察哈尔事变与我们的工作（1933年6月27日）”这样的文字，而内容却讲的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组成成分，这才知道，察哈尔事变与察哈尔同盟军抗战本为同义语。根据这个发现，李一夫所说的“孙永勤，原参加察哈尔事变”及“他在察哈尔抗过日”，可以直接地理解为：孙永勤曾参加过由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


图42　行进中的抗日同盟军

日同盟军的抗战活动。

李一夫所言可信度有多少呢?

2009年8月13日，我给中共河北玉田县委党史办及玉田县政协打去了查询电话。根据玉田县政协社会法治科宣奇稳科长当日给我寄来的一份材料，王承祖实有其人，名继宗，字承祖，1903年1月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后黄坨村一个地主家庭。8岁入私塾，20岁到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学习，1933年下半年在家乡组建民团，抵御石友三部冯寿彭第二大队（人称“二队”）的骚扰。1934年春经中共丰润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根据中共丰润县委指示，在玉田县鸦鸿桥建立民团司令部，王承祖任司令，以“同盟自保”等合法名义做掩护，发展抗日武装力量。1935年3月，由于王承祖民团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合法界限，引起日军和河北省政府的注意，于是河北省政府派出特警队（当时应叫保安队，下同）第三大队长周毓英前来收编，遭到王承祖拒绝。周毓英下令围攻，王承祖只身逃出，但很快被捕，于1935年4月5日上午，被特警队杀害于玉田县城西门外刑场。

宣科长寄给我的这份资料只字未提孙永勤的名字，但由于文中写到“时中共丰润县委书记李一夫曾亲自秘密到团队司令部，向王承祖传达上级指示并指导布置工作”，显示李一夫为王承组的直接领导，且两个人之间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故我认为李一夫关于孙永勤的回忆当不属空穴来风之谈。

李一夫的回忆如果属实，那么它不仅对孙永勤到张家口（张垣）挂对的真相做了解释，而且也使萦绕我心中四五年的关于孙永勤的另外一个谜团得以破解。

2005年1月上旬，佟靖功先生带我去兴隆县蘑菇峪村黄花峪采访孙永勤表外甥史耀华，他提到孙永勤在起义之前曾接到过中共方面的一封信，并在看了那封信后不久正式起义。

“那个时候，他接着毛主席还有朱德的信了。‘你要起义，你就起吧。起了，你避难，别打呀，打不过人家呀。’让他避难，说，‘快了，日本进来三年了，苏联也打他呢。’后来，孙永勤从北面勾过来十来个子，可能是磕头十八个，勾过来了，就起来了。”当时已卧病在炕的史耀华回忆说。

对孙永勤在起义之前接到毛泽东、朱德来信之事，坦率地说，我过去一直持将信将疑的态度，甚至一度产生过史耀华是否在信口开河的想法。包括中共迁安县委、遵化县委、京东特委、冀东地委在内的中共党组织支援孙永勤部队枪械、药品，派遣党员、干部秘密潜入孙部军中，与孙永勤本人直接会面，向他宣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希望将他的部队引导到中共希望的方向上来，这些情况虽早已为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调查到并披露出来，然据目前能够看到的全部资料，除中共迁安县委的高存在孙永勤起义前夕，曾以卖水鞋的小贩身份做掩护，与他发生过一次极短时间的接触外——主要是考察，兼做了一些“暴动”的思想启蒙工作，其他最

早也是在孙永勤起义两个月后才与之发生联系的。那么在起义前，孙永勤突然接到毛泽东、朱德的书信，则不能不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很是费解：孙永勤如何会与远在江西苏区反“围剿”的毛泽东、朱德取得联系？毛、朱与孙永勤之间的信件又是谁帮助传递、通过什么渠道传递的呢？

上面的疑问，如果像李一夫所说，孙永勤参加了察哈尔同盟军抗战的话，便能得到一个貌似比较合理的答案：是张家口（张垣）方面邀请孙永勤挂对的中共党组织、党员个人或抗日同盟军中的中共党组织、党员个人，帮助他与毛、朱建立了书信联系。

这种推测并非毫无根据。

1932年10月以后，为帮助冯玉祥组建抗日武装，中共党员的身影就已出现于张家口冯玉祥身边和长城南北包括晋冀鲁豫、北平、天津在内的广大地域。

中共方面最早提出与冯玉祥再度合作的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回忆：“冯玉祥到张家口不久，就向我们正式提出要求，派干部一起和他筹划组织抗日同盟军。当时，先期派到张垣的干部有张存实、武止戈、许权中等，他们主要是做军事工作，抓军队的。此后，又派了张慕陶等人去做政治工作。”[1]除以上人员外，中共还派出很多党员、干部到长城内外动员学生和工人参加抗日同盟军。原在冯玉祥汾阳军校当分队长，1933年初被中共北方特科所属张家口特委介绍到驻廊坊东北军一一二师做团结抗日工作，6月中旬以后又被中共河北省委所属中共张家口前线工作委员会派到吉鸿昌第二军第五师一团担任营长的张公干1982年回忆，同盟军的不少力量是由中共帮助动员来的：“经过我党的广泛发动，平津的青年学生、晋冀鲁豫的爱国青年和一些主张抗日的部队纷纷集中到张家口。”[2]陕西师大副教授王晓荣在她的《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一书中援引《革命烈士传（4）》、《冯玉祥日记》等多方资料写道，同盟军筹组过程中，有中共干部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另外，还有张公干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各地为组建同盟军或为发动其他武装力量策应同盟军而奔走，有的甚至在工作中献出了生命，如中共内蒙特委书记陈镜湖，为联络长城内外各旗县武装民团参加同盟军，在从张家口去张北途中被匪徒暗杀，年仅33岁。”[3]

同盟军成立后，总部中有中共党员担任要职，如武止戈任同盟军总部高级参谋、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张慕陶任同盟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军委会委员、常务委员，吴化之任吉鸿昌部政治部主任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主力部队里面中共党员人数更多。张公干回忆：“由山西汾阳军校调来的军官和学生编为第二师；以汾阳军校调去一部分人作为骨干，

[1] 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抗日同盟军专辑），1991年3月印行，第7页。

[2] 张公干：《抗日同盟军一些情况的回忆》，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抗日同盟军专辑），1991年3月印行，第54页。

[3] 王晓荣：《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74页。

以平津学生和各地来张的青年编成第五师，以中共党员宣侠父为师长；还从汾阳军校和各部队调集骨干组成十八师，以中共党员许权中为师长。这三个师的师长和团长除个别人外都是共产党员，营连干部也大部分是中共党员。”[1]“去年七月间在察哈尔的抗日同盟军中有十多个部队有我们有力的组织，共有三百多个同志（这里指共产党员），五千个在我们影响下的赤色群众。……此外，有十数个部队中有我们较小的工作即个别关系。”蒋维权先生送我的《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汇编（第一集）》抗日同盟军部分有他辑录的一篇《全总华北办事处关于平绥路概况（1934年）》，从其内容看，中共党员已不仅仅存在于吉鸿昌等主力部队中，似已渗透到抗日同盟军的各个角落。而所有这些情况，假设孙永勤真的参加了察哈尔同盟军抗战，都为他、张家口方面的中共党组织、党员个人（也许是特委方面的，也许是前委方面的），在关内的中共党员、党组织找到他之前便发生接触、建立联系，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以上，我根据雷永兰、李一夫回忆，蒋维权先生的讲解，张家口工农革命斗争史及抗日同盟军资料，提出了一个看法，即孙永勤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极有可能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活动。然这个看法是否与历史真实相符呢？必须承认，也还存在着许多疑问：

1. 除非孙永勤是独自一人秘密前往张家口（张垣）挂对，或与支援二十九军罗文峪抗战相同，是和孙杖子之外的人前往，否则除雷永兰外，何以孙杖子的老人们过去、现在没有一个人知道孙永勤曾到过张家口？

2. 现在尚无法肯定“挂对”一词绝对没有在伙会、民团等抗匪组织中使用过。

3. 中共张家口特委、中共张家口前线工作委员会之外的党组织、个人帮助孙永勤联络毛、朱，发信指导工作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如中共河北省委下属冀东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中共迁安县委一系帮助传递信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以上三方面问题尚需进一步了解，以得出答案。

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如果孙永勤确实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那么不论他具体在哪个部队中（有材料称被抗日救亡组织、中共地下组织动员来的东北华北抗日青年主要被编在吉鸿昌第二军中，当然其他部队也有不同程度的收留），他都当在公历1933年7月，至迟9月初，即已离开察哈尔省回到热河故乡。因为根据很多人的回忆，1933年夏秋时节，孙永勤已率孙杖子伙会在热河南部的滦河河谷一带激烈剿匪了。

[1] 张公干：《抗日同盟军一些情况的回忆》，见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抗日同盟军专辑），1991年3月印行，第55页。

起义的十个版本

全体部下将士奋斗得宜，以前诚惶诚恐蒙下赐优渥之敕语，今又拜受指示并令旨。本职得与诸士共誉，光荣何加。今敌万策已竭，乞停战于我军门，我乃容之，缔结有关停战协定，皇军青史又添一段之光彩。如此，敌若诚意遵守停战协定，我亦无穷追之必要，乃收兵大致还归满华国境线。

夫睨平津之牙城于指呼之间，第一线将兵之意气将有冲天之概时，而忠魂长不归，贻战友尊贵之膻血而旋师，实不能无断肠之思。虽然此次我军于长城以南地域之作战，如向来所声明，发于纯正公明之动因，其目的一在挫折敌挑战之意志，以确保满洲国西南边境之安宁，为诸士之所熟知。而今其目的已完全达成，再继续战争，使无辜之民苦于战祸，千古之史迹失于兵燹，非我军本来所欲。今思诸士劳苦之结晶与崇高之牺牲，必为东洋永远和平之础石。为宣扬皇军出入进退之公正于中外，静视彼之态度，最近日之所以凯旋者。何况完成恢复满洲国内之治安，前途尚属辽远，有待诸士之努力者极多，不许一日之偷安。加之周围之形势，重责在于国防第一线，关东军的作战准备之完整，尤其军队训练之要精良，实乃大者。

诸士宜认清大局，更加格外紧张，心情一转，至期欣然迈向新任务。

训示如上

昭和八年六月二日

关东军司令官 元帅 武藤信义[1]

1933年6月起，侵入长城以南地区的关东军除留下部分兵力驻守长城各口及监视中国方面对《塘沽协定》的履行情况外，其余陆续向“满洲国”境内撤去。

就在关东军“用其主力，专事满洲国内的治安恢复”之时，1933年12月11日，孙永勤率十几位农民在孙杖子起义，在伪“满洲国”西南“国境”地区高高树起了反满抗日的大旗。

什么原因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年两个月23天、热河省会承德陷落11个月零7天、《塘沽协定》签订6个月11天、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缴械一个月26天后，孙永勤在热南黄花川起义呢？

---

[1]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1版，第204页。另，武藤信义在发布此训示后一个多月，即因黄疸病猝死于长春关东军司令官官邸。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大使职务的为陆军大将菱刈隆，任期是1933年7月29日至1934年12月9日。菱刈隆之后的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大使为陆军大将南次郎，任期从1934年12月10日至1936年4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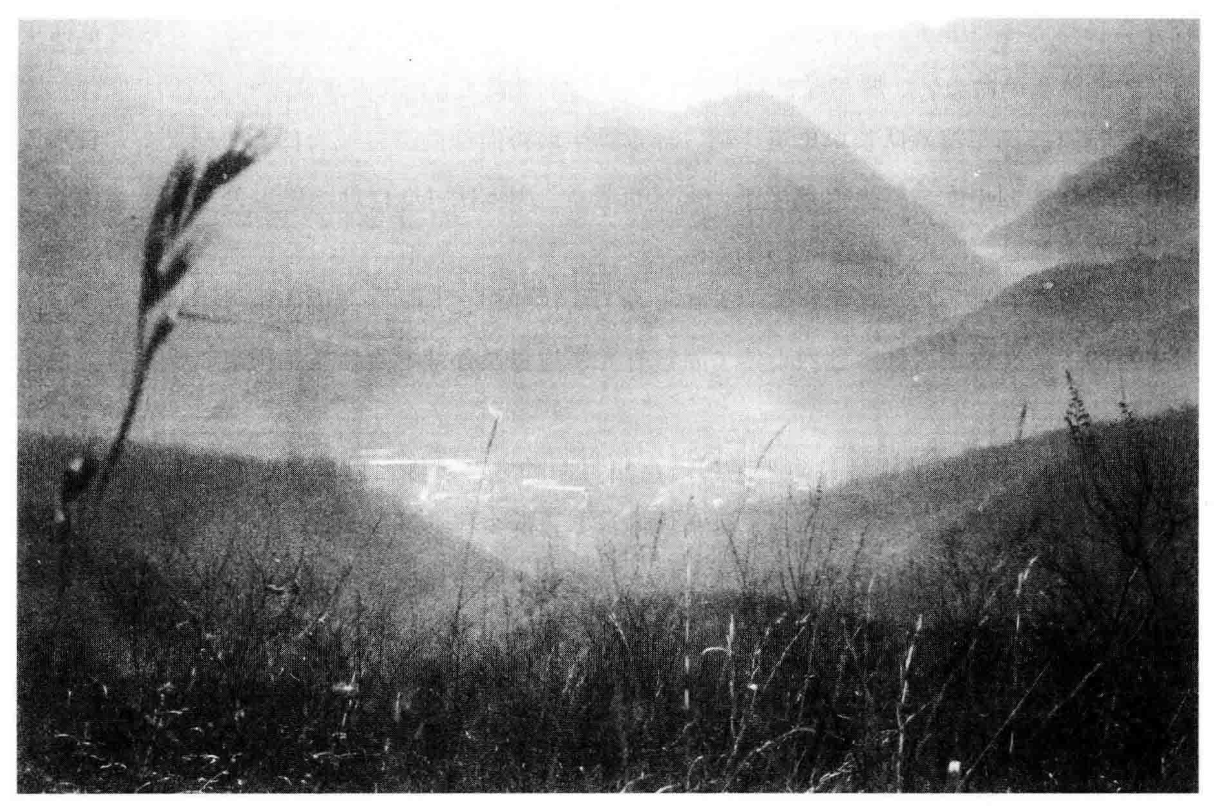


图43　冬日之孙杖子　2009年12月

“抓他不是，赶了没办法了，我非抄他小日本不可，就下这个决心了。”孙永勤表外甥史耀清说。

然而“赶了”说并不是迄今为止关于孙永勤起义原因的唯一解释。

根据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上世纪所做调查及2002年以来我到冀东长城南北采访的结果，发现在有关孙永勤为什么起义问题上，世间至少流传着十个版本，分别为：

一、孙永勤因女儿被日军强奸而起义

此说法似乎在孙永勤牺牲前便有所流传。1982年12月7日，原抗日救国军四大队一排三班班长廖金柱在接受未留下名字的一位党史工作者采访的时候回忆说：“孙永勤家住在兴隆车河口大杖子，是有名的大财主。为看家护院，他家还有几棵手枪和大枪。民国22年（1933年），日本鬼子进了关。孙永勤家大杖子边设了鬼子的据点，据点里的鬼子整天里抢掠奸淫，无恶不作。一天，两个日本兵闯入他家，强行奸污了他心爱的两个闺女。孙永勤对日本鬼子仇恨至极，他浇上煤油烧毁了自家的房屋，拿上枪，联络了三十多人，便拉起了抗日队伍，这支队伍就是‘民众军’。”

二、不满日满收枪而起义

孙永勤本人这样认为。他牺牲半年后出版的《东北抗日烈士传》、伪满兴隆县协和会庙

岭分会长郝席庵20世纪50年代末所写的交代材料、《兴隆县志》征集意见稿、《热河革命史稿》、《冀东革命史》、原兴隆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闻成先生都持此观点。

据抗日救国军第八队长单忠英介绍，孙永勤生前曾向他们讲过他为什么要起义："日本人收枪，想让我们手无寸铁。火气来了，起义抗日。"1983年4月17日，单忠英对前来采访的兴隆党史办栾福忠、邢连义先生说。

《东北抗日烈士传》由王亚编，大连大众书店1935年12月印行。书中第29至32页收录了闵时夫写的一篇文章：《孙永勤烈士传（附宫有元李连贵及孙部七百余人殉国事略）》。文章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孙永勤者，热河兴隆县附近某村之富户，而孙姓亦该地之巨族也。烈士性豪爽，颇知书史，虽家道殷实，未尝欺凌弱寡，且常周恤贫寒，故乡民亦甚敬爱之。东北四省各村镇因地方不靖之故，素多藏枪自卫。日贼占东北后，首即从事收缴民枪，盖欲我同胞之束手待戮也。稍有延误，即指为'匪'或'马贼'。虎狼四出，雷厉风行，惨杀株连而死者，盖不知凡几也。热河继三省失陷后，日伪即分途赴各地收缴民枪。至孙村，烈士愤然曰：'吾闻朝鲜被日灭后，三家共菜刀一把，日本鬼子之凶毒，今已身受之。政府既不能保百姓，然匹夫亦有国家兴亡之责也。'遂提议抗缴民枪，全村响应。日军大怒，当枪毙烈士家属一人，以相威吓。烈士即指挥村民，将日伪军枪毙大半，并生擒凶手，杀之。旋烈士召父老兄弟及附近村民，泣曰：'亡国之民，不如猪狗，吾人即欲忍痛偷生，亦不可得。吾不忍祖国为倭奴蹂躏，故乡为倭奴荼毒，兄弟为倭奴残杀也，今决杀戮我全家老幼，舍身救国。明知此处已在倭奴大军包围之中，寡不敌众，然为祖国，为祖宗，为人格，吾决与倭贼拼命。父老兄弟有愿相从者听，老弱妇孺须速离此。'即欲杀其家属，以示决心。村民咸奋呼决与一致杀贼，但全体婉劝勿杀家人，遂与全村妇孺老弱，统运半壁山中。烈士则召集壮丁，成立军队，附近民众亦均踊跃相从，共得健儿五百余，成立抗日救国军，并立举义之誓约曰：'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时民国23年冬也。"

伪满兴隆县协和会庙岭分会长、特务郝席庵在1958、1959年间写给人民政府的交代材料里面说：

"1933年春季，伪满政权——热河省公署及热河省各县旗公署，先后建立完毕。首任热河省长张海鹏、承德县长赵养愚等对地方执行统治政策，各主要乡镇成立警察署，各村成立警察分驻所及警察派出所，对地方农民极力统治与镇压。于是引起了以孙永勤为首的承德、兴隆、青龙三县农民武装起义，打起反满抗日旗帜，与日满军警讨伐队相持半年之久，大小战斗数十次，给以日伪军警讨伐队极大的打击。

"孙永勤是承德县属黄花川人，成分富农。起义的时候，约40多岁。在中国汤玉麟任热

河省主席时，家中即有私购自卫大小枪数支。伪满建国后，在车河口成立警察署，黄花川成立警察分驻所。1934年（伪满康德元年）伪满在承德县执行武器登记后，随即实行‘铳器回收’政策，孙永勤家中的枪支多半被警察署收去。后来警察仍旧向孙永勤及黄花川一带农民索要枪支，农民们百般地维持警察，但警察仍是勒索敲诈，对地方农民们打骂交加，并抓捕黄花川一带农民多人，在车河口警察署刑讯监押。这时孙永勤鉴于伪满统治，无法生存下去，乃同其胞弟子侄等及黄花川一带被害的亲友十余人，携带武器，将车河口警察署及黄花川警察分驻所包围，将警察武器缴收，房屋家具捣毁，公开地打起反满抗日旗帜，在车河口一带起义了。”

《兴隆县志》征集意见稿编写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1日，在“人物”部分收有一篇文章《民族英雄孙永勤》。作者写道：

“在古长城外的兴隆县，有一个赫赫有名的村庄，它的名字叫黄花川村。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到为抗日救国而光荣牺牲的民族英雄孙永勤，就出生在这个村庄。同时，也就在这个村庄，他领导农民掀起了1933年12月11日（即旧历十月二十四日）的抗日农民大暴动。

“黄花川村位于兴隆县正东的滦河西岸，村子四周被燕山环抱，到处是深山峡谷、茂密山林，是一个纯石质深山村。这个村东隔滦河与青龙县和承德市为邻；北走羊肠小道或乘滦河之船逆水行舟而上，可直达本县柳河川的车河口、大杖子等地；西隔五凤楼山与潵河川的半壁山、蓝旗营、倒流水为邻；南隔万里长城直通关内的遵化、迁安城，不足百十里路（原文有脱字，应为‘与这两个地方相距不足百十里路’——编者）。但是，这里由于山高坡陡，交通不便，对革命便于防守，加上农产品丰富，对发展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是极其有利的。

“1933年的3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进攻承德，国民党热河省督军汤二虎，真名汤玉麟，一枪未射逃跑至北京去了。日寇以180人的兵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到了3月10日，日寇以承德为跳板，派日寇岛村为司令，攻进兴隆县城。当时国民党伪县长窦宗汉早就吓得屁滚尿流向遵化县马兰峪逃命了，只有当时的士绅地主张全五、卢仪卿们点头哈腰地引狼入室，甘心要当亡国奴，诚心要当大汉奸了。鬼子占领了兴隆县城，派来了一个大汉奸名叫汪海澂。这个汉奸说一口好日本话，委任为热河省兴隆办事处处长。这个汉奸一到兴隆县城，就把原来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都换上了红膏药旗和红蓝白黑黄的五色旗，街上喊的也都是‘日满亲善’、‘一德一心’，还有什么‘八格野鹿’等语言了。老百姓暗中说：‘中国亡国了。’

“日子不多，汪海澂这个大汉奸，召集了各村土豪劣绅等大汉奸开会，说兴隆县不属于中华民国管辖，改为‘满洲国’热河省西南‘国境’了，并且出头露面大封官，委任当地汉奸卢仪卿为财务局长，史焕章为实业局长，张全五为内务局长，并积极筹划没收全县在中华民国的所有自卫团、伙会的枪支，企图镇压人民的反抗，以便使日寇能进一步进攻华北。

"兴隆县穷人穷骨头是硬的。当1933年4月，长城线上国民党二十九军兵士自动起来反抗日寇以后，穷人就提出：'枪就是命，只要鬼子收枪，咱就和他干到底'的口号。

"到了1933年8月，伪'满洲国'上板城警察署的马署长和车河堡警察队的东队长即公开勾结车河口村大地主兼大商户'大成兴'股东张、岳两家财主，决定要在11月里派大兵讨伐黄花川，接收孙永勤领导的伙会枪支。

"孙永勤，当时是个40来岁的青年，富农成分，系黄花川村孙杖子庄人。在日寇进占兴隆县前，担任封建势力组织的自卫团团总。因为他年轻有为，办事公正，好打抱不平，在黄花川村是富有威望的一个人。由于日寇占领兴隆，组织了伪政府，又要没收枪支武器，他心里总是不痛快，加上他经常听到冀东各地共产党组织工人暴动、农民暴动，攻打县衙的消息，也激起他要站起来反抗日寇、举行大暴动的念头。

"到了11月，车河堡的伪'满洲国'警察队要集合一起，讨伐黄花川村孙永勤领导的伙会。这个消息传到孙永勤耳朵中以后，激起他年轻的勇气。加上他积极要求抗日的念头，再也忍无可忍，就于12月11日这天晚上，在自己的家中召集伙会17人开会。他亲自宣传日寇侵略冀东和兴隆县以后镇压人民抗日的罪恶活动，表明他要立志坚决抗日，绝不当亡国奴，并喊出'敌不灭，怒不休，头可断，志不屈'的决心。次日，就有200多名农民随着孙永勤扯上写着'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红旗，掀起了闻名的黄花川村抗日农民大暴动。"

《热河革命史稿》、《冀东革命史》关于孙永勤起义原因的说法与《兴隆县志》征集意见稿基本相同，然又有所区别。现分别抄录如下。

《热河革命史稿》编竣于1988年9月，在第一编第二章第四节《民族英雄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中，编者写道：

"孙永勤（1893年~1935年），兴隆县黄花川孙杖子村人，生长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之家。少年读书，长大习武，为人正直，性格豪爽，'未尝欺凌弱寡，且常周恤贫寒'，在黄花川一带很有威望。汤玉麟统治热河后，横征暴敛，匪患丛生。为保护身家性命，黄花川成立一自卫团，孙永勤出任团总，有枪50多支。热河沦陷后，日伪委任汉奸汪海澂为兴隆办事处长，他笼络全县地主豪绅，充任大小官吏，加强殖民统治。日伪又通过伪警察机构推行'铳器回收'政策，强迫农民交出手里的枪支弹药，妄图以此扑灭热河人民反抗斗争的火焰。伪上板城警察署和车河堡警察队多次找孙永勤要枪，均遭拒绝。孙永勤严正地说：'人是中国人，枪是中国枪，要我当汉奸，只能是妄想！'

"正当日伪当局收缴农民枪支甚急，孙永勤徘徊忧虑之际，中共京东特委派人来黄花川一带活动，以卖水鞋为掩护到孙永勤家，向他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当孙永勤听到迁安、遵化的农民暴动，开滦煤矿工人罢工的消息，犹如在茫茫的黑夜里见到了光明，点燃了他胸中的抗日怒火。

“此时，车河口‘大成兴’商号股东、汉奸岳荫臣为土匪窝藏的枪支被外地民团抄走，他借机向日本人告发孙永勤劫走枪支，煽动抗日，图谋不轨。警察几次前来抓捕，孙永勤虽得逃脱，但家中已难存身。1933年12月上旬，伪兴隆办事处长汪海澂派伪军头目李海山率200余人再次到黄花川逼枪逼债，抓捕10多人，并限3日内交齐，否则就将杀头。官逼民反，孙永勤决心走武装反抗的道路。

“1933年12月10日，孙永勤来到承德县路通沟村赵家庄，串连了赵林、赵来、赵有和马保德、关元有、赵四川等7人，共议暴动大计。12月11日，孙永勤带领赵林等回到黄花川，同团丁等共17人聚集在自卫团部院子里，宣布暴动，并庄严宣誓：‘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在村里树起‘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的大旗，拉起一支农民抗日武装，命名为‘民众军’，推举孙永勤为军长，发动了黄花川农民抗日武装起义。”

《冀东革命史》编竣于1993年3月，在第七章第五节《孙永勤抗日起义》中，编者写道：

“1933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省，同时侵占了位于长城北侧隶属于河北省的兴隆县和都山设治局，并将其纳入伪热河省辖。从此，上述地区被划入东北伪满洲国的‘版图’。

“值此国破家亡之时，热河各地人民纷纷发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其中活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民族英雄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

“孙永勤是长城北滦河畔黄花川孙杖子村（今属兴隆县）人，1893年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之家，为人正义，在黄花川一带颇有威望。汤玉麟统治热河时，横征暴敛，土匪丛生，致使各地绅民纷纷成立民团以防匪自卫。孙永勤时任黄花川民团团总。热河沦陷后，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于1933年夏季成立了由伪承德县政府领导的兴隆办事处，秋季建立了由日本人任科长的兴隆县警务科，推行殖民统治。11月，又推行‘铳器回收’，强迫农民交出枪支，妄图以此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武装斗争。这时的孙永勤，被投靠日本势力的‘大成兴’商号股东岳荫臣告发藏枪不交，几次被逼，处境困难，逐渐意识到不愿任日本人宰割的中国民众面前只有武装反抗一途。遂与朋友关元有（已由遵化县共产党员高存发展入党，孙不知其政治身份）、赵四川、马保德等计议发起抗日，得一致赞同。1933年12月11日夜，经孙等串连的骨干分子共17人在孙家秘密宣誓：‘见贼就杀，毫不留情；有死无降，向前拼命；爱护百姓，不害好人；精忠报国，永无二心。’次日天明，在孙杖子村树起一面‘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的大旗，抗捐抗税抗缴枪的民众军宣告成立，孙永勤被推为军长。几日内，百余名农民闻讯前来参军，民众军初具规模。”

原兴隆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闻成先生也持孙永勤是因收枪而起义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他曾在孙永勤家乡一带担任副区长、区长职务16年，其间经常下乡，不仅无

数次听到过孙永勤的故事，有时甚至所住的村民家就是孙永勤司令部所在地。2005年1月，我根据佟靖功先生提供的地址找到闻成先生时，他说："孙永勤是被逼造反。孙永勤为防土匪买了一些枪，都是湖北造，手枪很少。承德县警察局来收，孙永勤觉得不合理，好不容易用小米等买来，因此不同意交枪。伪满警察抓他，没有办法，于是起义。"

三、不仅因为日伪收枪，且由于地主收租索债而起义

持此观点的为兴隆县党史办朱呈云先生。他在完成于1982年8月的《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中说：

"1933年3月3日，日寇进攻承德。伪热河督军汤玉麟（又名汤二虎）在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下，带领军队从滦平方面撤退进关。日寇以180人的兵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承德。3月10日，日寇又以承德为跳板，派岛村为司令进犯兴隆。当时，国民党的县长窦宗汉闻日寇侵犯，吓得屁滚尿流，携带大批财物奔往遵化，日寇一弹未发侵占了兴隆县城。

"日寇侵占兴隆以后，委任汉奸汪海澂为办事处长，声称兴隆位于长城以北，不属中国管辖，已划归'满洲'的势力范围。日寇害怕中国人不服，由汪海澂出面召集全县地主豪绅开会，封三十六友头子张全五、史焕章、卢仪卿等大地主分任内务、实业、财政局长，封中小地主为村长、甲长，加强反动统治，笼络人心。并决定没收全县农民手里的枪支弹药，梦想借此扑灭农民对日寇的反抗。但是，鬼子的美梦是不会得逞的，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民，坚决不向日寇低头，拒不缴出自己所有的枪支弹药。

"黄花川村孙永勤担任自卫团总，有枪50多支。伪上板城警察署韩署长、车河堡伪警察队车队长（一说为'东队长'——编者）按照鬼子的旨意，几次派人找孙永勤缴枪，都遭到拒绝。车河口商户'大成兴'股东张如增、岳荫臣亲自找到孙永勤，动员他把枪支缴出，孙永勤严正指出：'人是中国人，枪是中国枪，要我当汉奸，跪倒在日本人面前，只能是妄想！'张、岳二人碰了一鼻子灰，扫兴地回去了。

"正当鬼子收缴农民枪支的时候，中共京东特委王平陆同志从迁安县出发，穿过万里长城，深入到黄花川一带活动。并以卖水鞋为名，住在孙永勤家，领导农民抗捐抗税，动员农民不向日寇缴枪，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孙永勤越听越爱听。当他听到迁安县农民组织起来反海关税、反路捐税，两次赶跑上营统税局；遵化、兴隆一带农民组织齐心会，站岗放哨捉汉奸，抗缴路捐；开滦等矿工人举行大罢工等消息，在这暗无天日的茫茫黑夜里，中国共产党给走投无路的爱国志士指出了方向，点燃了孙永勤心中的抗日怒火，更加坚定了孙永勤抗日救国的决心。1933年秋天，车河口商户大成兴股东张如增派人到黄花川收租索债，孙永勤领导农民拒而不交。气得张如增暴跳如雷，说：'你们再不缴租还债，等到日本人来了叫你们拿双份！'孙永勤闻听哼的一声说：'别吓唬人！鬼子来了咱抗战，就是不缴捐税钱，看你能把咱姓孙的怎

样了！’地主张如增无可奈何地走了。

“伪兴隆县办事处长汪海澂听到地主、商户们报告孙永勤拒不缴枪归顺，又听黄花川农民抗捐抗税，大为恼火。于1933年12月上旬，派出日伪走狗李海山率领伪军二百多人，‘扫荡’黄花川，并命令伪军：‘不根除孙永勤，不把枪支收缴上来，不准返回县城。’李海山秉承主子的旨意，带领伪军进犯黄花川，奸淫烧杀，抢掠民财，无恶不作。大成兴股东张如增也随军狐假虎威地来到黄花川，大声嚎叫着：‘限穷人三天之内把租债缴清，否则要穷人的脑袋！’并当众叫嚣说：‘孙永勤如继续执迷不悟，反抗日本，将被碎尸万段！’整个黄花川被敌人搅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人心不安。

“正当敌人威逼的紧张关头，满怀抗日激情的孙永勤于1933年12月10日来到承德县群山环绕的路通沟村赵家庄，串通了赵林、赵来、赵有、马保德等五人，趁黑夜砸了大地主高成的家，弄了五支枪。12月11日，即农历十月二十四日，孙永勤率领赵家庄农民五人回到黄花川，同自卫团丁共十七人聚集在自卫团团部的院子里，遥望着燕山顶上苍松翠柏，注视着黄花川的茂密森林，控诉日伪军‘扫荡’黄花川的野蛮罪行。孙永勤大声疾呼道：‘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侵占了热河，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不能当亡国奴，我们要拿起武器，和日寇血战！’十多名武装农民愤怒地说：‘日伪军杀人放火，收枪收税，这是官逼民反，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孙永勤你领着我们干！’共产党员王殿臣气愤地说：‘有枪就有命，有命不缴枪。大敌当前，我们要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坚持抗战！’孙永勤听到日伪屠杀中国无辜同胞，又见大家抗日怒火胸中燃烧，压抑不住自己的仇恨，紧握手中枪，咬牙切齿地发出誓言说：‘敌不灭，怒不休，头可断，志不屈。宁为抗日死，不当亡国奴，我要跟着共产党，抗日到底不回头！’就这样，他们决心抗日，把队伍命名为民众军，推举孙永勤任团长，举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旗上写着‘关外第一军，杀富又济贫’十个醒目大字，揭竿而起，掀起了抗日民族大暴动。从此，他们拿起武器转入深山，在燕山脚下打响了农民抗日的第一枪，势如波涛汹涌的春潮，席卷长城内外的崇山峻岭，与日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四、孙永勤因日军要强占他的妹妹，出于愤怒而起义

此说法以“听说”的方式记载于李子华《革命回忆录》中，后被遵化孟家铺村收入《孟家铺村史》，文字略做了些删减。

《革命回忆录》完成于1961年9月。谈及孙永勤时，李子华说：“1935年，热南来了孙永勤，领导着农民同日本鬼子打起仗来。孙是热南的一个有名大地主，手下有六七百支枪，很有势力。听说因为鬼子军官要占他的妹妹，孙永勤不愿意，鬼子要逼他，两下就打起来了。”

五、因收粮起义

此版本为孙团营讲述，他听之于他大大爷，即孙永勤长子孙文伶。持近似观点的还有台湾

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李云汉。

2005年4月，孙团营对我说："日本不是收税吗，收粮食，他们不是自己去收，都是找当地有威望的大户负责收。我爷爷跟老百姓关系特别好，又挺有怜悯之心，底下老百姓一说，粮食还不够吃呢，我爷爷说，那就免了吧。日本人跟他要，他肯定没有，说老百姓还吃不起饭呢，我上哪儿给你交去。说翻了。他家离滦河不是近嘛，掏枪就把日本人打滦河里去了，是一个关税长。我大爷跟我说：'你爷爷就这脾气。'这么着，日本人抓他，因为这起的义。二指宽的纸条，写了六七个，送出去了，联络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这个乡的民团团长，那个乡的民团团长。又交粮食又交枪，肯定不交，就起义吧。"

台湾政治大学李云汉在1978年出版的《传记文学丛刊·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中写道：

"盖热河沦陷后，由于民众不堪日满苛政压迫，遂相率组织地方武力，对日军进行游击战。其中亦有接受我华北军政当局之委任而以义勇军名义号召者，亦有不接受我方委任者，日人则概称之为匪。孙永勤者，即热河此等军队之一部，计众3000余人，在热南地区与日军从事游击。"

六、因岳老亮逼迫起义

此一版本又存在着相互有区别的七种说法。

1. 孙文炳向栾福忠先生讲述，时间为1983年。

"孙永勤是伙会头头。土匪打伙会，追击伙会到车河口。土匪常打伙会，孙永勤恨土匪。车河口'大成兴'支持土匪，孙永勤就把大成兴抄了。岳家报告了局子，局子就抓孙永勤。孙永勤有'水连珠'手枪，局子抓不到，孙永勤也不得安宁。局子抓他，怎么办？孙永勤说，我在家里呆不了，就找到路通沟赵林、赵有等七人磕头，拉绺子，打日本。"

2. 张如山讲述。他于1983年、1986年两次接受党史工作者的采访。1983年6月接受栾福忠、邢连义先生采访时说：

"孙永勤起义原因是，闹匪时，孙永勤听说土匪有两箱子弹藏在'大成兴'。大成兴是富户老岳家开的，老岳家是车河口的大地主。孙永勤抄了大成兴，搞出了子弹，老岳家不让了，报告了日本人，说孙永勤是匪，是胡子，日本人就到处抓他。孙永勤就跑了，到路通沟一带，联合了几个穷人，拉起了队伍。谁家有枪跟谁要，动员百姓参加他的队伍，要打日本人。"

1986年11月，张如山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说：

"孙永勤起义是岳老亮逼的。当时车河川一带闹匪，匪头有龙三点、小白龙、张玉书、刘忠臣等。孙永勤团会、宽城梁国玉团会都参加了打土匪，我们这边团会把罗降梁，宽城团会把常峪沟。孙永勤他们把匪打跑，匪里有一个排是老奉军，他们的子弹放在'大成兴'里，孙永勤去把大成兴砸了。岳老亮告了，官兵来拾掇孙永勤来了。"

张如山的两次回忆可以说内容基本相同，互为补充，唯一的差别在抓捕者问题上。1983年的回忆说抓捕孙永勤的是日本人，1986年说是官兵，官兵作伪满军、伪满警察理解还是作日军理解？张如山当时未说明。

3．孙文阁讲述。1983年6月、1986年11月，他也曾两次回忆孙永勤起义经过。现将他在两次采访中的回答合并，整理如下：

1933年春，从东边过来土匪，每一拨都有一二百人，光土匪头儿就十几个。兴隆、迁西的民团会就都集中了，打土匪。从春天一直打到八月，当时日本军不管。正打土匪时，团会在常峪沟关杖子沟口卡住了十二三驮子子弹。一问，才知是“大成兴”给土匪运的，大成兴通匪。把土匪打垮了之后，孙永勤就组织团会打大成兴。打了两次，第一次没打下来，第二次才攻进去。掌柜逃走，团会把一个伙计枪决了，东西都给分了。孙永勤伙会分到八匹马，还有一点布匹，兴隆那边的民团得到的更多。大成兴被分后，东家不干，仗着在官府里有人，开始反扑。官家人来抓孙永勤，抓了一秋一冬。孙永勤一秋天没上家，没办法，这才到路通沟起义。

4．张凤林讲述，时间是1986年11月18日。

“打土匪，土匪跑了。西八保的卡子在水泉沟上卡住三驮子子弹，说是给‘大成兴’送去。西八保把大成兴抢了，把土匪的马给分了。大成兴的何育民，迁西人，与三屯营的陈所长（老家是迁西）好。何育民向陈所长告了孙永勤，陈所长派警察抓孙永勤。孙永勤跑到路通沟，孙永勤、赵四川，计十七个人，从这儿拉走了。”

5．讲述者为大杖子乡郝家庄郝士玉老人，时间为1988年12月15日。

“来了400多名匪，上五凤楼安盘子。那400多匪，外号小白龙，从下板城那边起来的。车河口伙会在雹神庙把着，不让匪上来。打三枪，匪轻易没敢上来。地方伙会约寿王坟孙永香伙会，滦河、车河伙会都过来，围住车河口。总会安在郝家庄河南的南台，让孙永香当总会长。打了七天七宿，匪缺子弹，奔乌龙矶那边去了。从那边来的，又回那边去了，扔下40上下匹马。在这个东台子，几个伙会把马分了。车河伙会没要，别处伙会分了。地方人反映，这些匪若没有‘大成兴’供应子弹，打不了七天七宿。大成兴有子弹供给土匪。孙永香有气了，把大成兴分了。

“大成兴掌柜何育民跟岳老亮气不出，想告孙永香。可是孙永香不好惹，蘑菇头，没敢告。认为孙永勤是个土包财主，就告孙永勤。

“下板城警察署批准让车河口警察署子月（即农历十一月——编者）21日去抓孙永勤。孙永勤有个哥叫‘老会长’，问干啥来？警察说，暖儿河岳老亮把孙永勤告了。老会长给他们做饭吃。快吃完了，老会长领人进屋，把两警察的枪给下了。孙家哥俩领人带警察上了这大南山广东山了。”

6．史耀华讲述。第一次为1986年11月22日，第二次为2005年1月初，以第二次讲述最为详细。现将其内容抄录如下：

“车河口有个买卖，大杂货铺，叫大顺兴。谁开的呢？暖儿河有个岳老亮，开煤局子，他有个小舅子，在那儿负责掌管。寿王坟罗圈沟有个孙永香，也是会长，把大顺兴给抄了，抄个溜净。孙永勤到那儿是末了，啥也没拾掇着，就把张北的唱戏的昆角、武生都绑来了。

“后来大顺兴的赵老子诬告孙永勤抢的。他不敢动孙永香，孙永香的侄儿是一个司令，在日本那边。孙永勤知道后，找到赵老子，对他说：‘赵老子呀，你别勾搭岳老亮告我了，我没拾掇他。’赵老子说：‘你说你没有，就是你！’后来大伙也说：‘赖孙永勤抄的没那事，他啥也没得着啊。’岳老亮的小子也对岳老亮说：‘你放着好日子不过，放着煤矿不开，弄这干啥？听说是孙永香伙会抄了这买卖。’头一回，孙永勤花钱请客，这事过去了。没多长时间，车河那边的人又再三再四地给孙永勤捎信，说：‘你快躲躲吧，又让大顺兴赵老子把你告了，告到岳老亮手里了，说你是匪头子，赖你拾掇的。’左一场右一场地说和，孙永勤给告了三回，下了三回台阶，吃了三个肥猪。后来孙永勤就回来了，孙永勤说：‘我不说和了。’跟他媳妇说：‘这还有家，没有家呀，我这会儿要抗日去了。’老伴说：‘你抗啥日，你放着好日子不过，你瞎胡闹。’孙永勤说：‘不中，日本子已经进来三年了，快不行了。毛主席、朱德都给我来信了，我得抗日，先治国，后治家，我要出家了。’老伴说：‘你别瞎胡闹了。’打了一架。晚上接着又跟他老伴说：‘咱们不要家了，家里爱啥啥，啥也不要了。’老伴说：‘你别瞎胡闹了，放着好日子不过，你怎么摆乎这个呀。再摆乎，赵老子是岳老亮的大当家的，他说了算。’孙永勤生气，对老伴、全家子说：‘你们就琢磨着吧。’出气，去北边十来天。

“从北边回来就是18个人了。孙永勤喊：‘开门！开门！’他的家眷把衣服穿上，开门。哎呦，18个人全是双手枪挎着。老伴就骂孙永勤：‘你这个疯子不疯子！你说你干这个，你打日本，你打过人家了？人家有兵工厂，人家是个国家。除非你把我枪毙了，你出家！’孙永勤说：‘杂宗操的，你说这话我不爱听。先治国，后治家！’后头他把盒子掏出来，叫开狗头就打呀，他旁边的弟兄们、亲兵呀就把他胳膊拦住了，枪子从瓦缝里打出去了。亲兵们劝说：‘别这样，消消气。’让家属隐到山沟里，由军队保护着，这才又聚了200来人。”

7．由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徐文林老人讲述，时间是2007年4月19日。

“岳老亮，真名岳荫臣，河南人。承德有个汤玉麟，他有个师爷叫吴少连，外号‘红笔师爷’，据说是岳老亮的舅舅。岳家由于这层关系，就从河南搬到了承德，落在了彭杖子。他家的院子相当大，大约有二亩地还多，有院墙，还有四个炮楼，都管叫岳家大院或岳家城。我那时十二三岁，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岳家城里有六七个护院的兵。其中有几个不是东西的，一个叫梁荫田，一个叫王国宾，还有一个姓马的，这几个人都是双手枪。护院的兵也有长枪，湖北

造。炮楼眼里都是大抬杆，装火药。岳老亮是靠煤发的家，现在的庙梁岳伙房煤矿就是他过去的煤矿。那时候的煤都是用口袋背，前面一嘟噜，后面一嘟噜地背，我老爷子的老爷子都给他扛过活。孙永勤怎么起的义呢？车河口有个大昌兴杂货铺，也卖酒什么的，也是老岳家的买卖，是老岳家分出的一个杈。那儿的大经理叫王老瑞，这是他的号，真名是什么不清楚。王老瑞在后房，前面开烧锅，卖杂货。他手下有一个掌柜，号叫赵老子，也叫赵老俊。听人讲，孙永勤的叔叔是给王老瑞护院的一个民团的团长。1933年，日本人已在承德城里了，当时有张玉书、小白龙儿股绺子，北边也叫拉杆子，大烟鬼啥的什么人都有，烧杀什么的都干，被日本人弄垮了。王老瑞在车河口住，张玉书、小白龙想整王老瑞，打大昌兴。孙永勤的叔叔把民团团长给孙永勤了。辛家庄有一个叫辛增祺的，给王老瑞运子弹，应该给孙永勤，好打土匪，结果辛增祺都给绑票的了。孙永勤大怒，我保你，给你护院，你给他。孙永勤就有火了，就找到王宝石关元有，把大昌兴给烧了，孙永勤就分得一匹马。王老瑞就跑到岳家城调兵，这才有孙永勤起义。”

七、因张杖子地主压迫而起义

1988年12月14日，承德县老梁吴连杰老人向佟靖功先生回忆：

“孙永勤是孙杖子村人，当过多年村自卫团团总。张杖子有一个姓张的大地主，孙永勤不得烟抽（方言，有矛盾，不得志之意——编者）。孙永勤与路通沟赵林相好，马保德、马保祥也与赵林相好。赵林住在路通沟柴禾沟门，孙永勤投奔赵林这儿来，孙、赵、马、马会见。赵林是当地小财主，会耍钱，那时讲天津字票子，比满洲票值钱，能顶现大洋。赵林输了3000票天津字票子，走投无路，正赶孙来。孙向赵林说：‘二哥，咱们有家难奔、有国难回了！’赵林说：‘怎么办？’孙永勤说：‘起义打日本。’赵林说：‘拿烧火棍打不了日本。’孙永勤说：‘三两棵枪，我回去可以闹。’孙说，‘先在你们家这儿动起来。’那时我13岁，正在路通沟给高长贤放牲口。赵林动员他大儿子赵廷普（铁蛋儿）、二儿子赵廷山（长存）、赵存（赵林叔伯哥们）、赵存的儿子赵廷玉、赵有、赵来。赵林又动员给他扛活的张福林、张福山、张福存（承德县蓝旗地羊杈子人）。杨树洼三仙洞，供地母三娘的，有个老道叫孙成，会看麻衣神相，推八门，那时30左右岁，他是五龙山那边过来的。孙永勤说：‘得有一个军师。’把孙成也动员出来。孙成推八门，说：‘腊月初十，去柳河口砸警察局子，取枪。’赵来说：‘那儿的署长是赵佩卿。’约在腊月十七八日，夜，把局子砸了，得个单子撅子。警察都跑了，赵佩卿藏在大门旮旯，开枪把赵来打死。别人都回来，赵林说：‘不幸，刚一出去把赵来伤了，军师算的不吉。’这时又把姓柴的请来当军师，柴算腊月二十三，或二十五。出发去孙杖子，到孙杖子起出十几棵枪，腊月二十五日正式起义。”

八、因分枪导致诉讼，岳老亮带兵抓捕而起义。

1989年1月23日，原抗日救国军战士、家住兴隆县金斗峪的常久芳老人向到访的佟靖功先

生说：

“民国16年，车河有一股匪。孙永勤是团总，岳老亮也是团总，把匪打了。因为分手枪，岳、孙打官司，把孙永勤弄到承德大狱去了。岳老亮钱厚，四分斗大院，家里养着七八十个兵。后来孙永勤跑了，承德大狱来信让岳老亮抓。孙永勤侄子有一棵大枪，孙永勤有一棵大枪，王宝石他亲家有一支大枪，一天一宿集中三棵大枪一支火枪，占了沟门。岳老亮的兵20多人来抓孙永勤，孙永勤的四支枪把他们打花达了，在河口打的，又得了几支大枪。几天，两个月（原文如此——编者），孙永勤集中60多人，在车河、柳河转，又转到半壁山，把警察所拾掇了。又转一个多月，100多人了。……”

九、基于民族大义起义

我看过的材料和采访过的人中，持此观点的有三人。

1. 抗日救国军第七队长（一说第九队长）何广永的弟弟何子桥。

何子桥，原名何广森。1961年11月15日，在河南平顶山市西市场人民公社担任社长职务的何子桥向来访的王桂荣回忆说：

“孙永勤是孙杖子村人，出身富农，曾当保卫团总，但也是一个中正人，有威信。因他与本村地主有矛盾（何矛盾不清），就不再给地主当团总了。日寇占东北后，他非常愤怒，并组织民众抗日。”

2. 宽城塌山乡塌山村村民王胤淋。

2005年7月，王胤淋对我说：“我听传说，孙永勤起义根本不是因为日本鬼子要他闺女、妹妹的，不沾边。根本原因是孙永勤有民族感、正义感，生来就不愿意当亡国奴，反对日寇侵略中国。联络广大贫苦群众，组织抗日救国军，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根本日本一开始没到他们家呢，不可能的那事。”

3. 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民郝连发。

2007年4月23日下午，我到郝家营村了解孙永勤军师“郝小辫”之事，遇到郝连发老人，他对我说：

“日本进中国，孙永勤起伙会，想朝外打，没打出去。”

十、受一个卖水鞋的人启发而起义

此说法来自孙永勤妻子雷永兰、长子孙文伶。

1980年前后，雷永兰在接受名叫从言己的作者采访时回忆说：

“永勤从小就喜文爱武。他个子高，胳膊长，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一有空儿，就玩枪练棒，人们夸他是神枪手。他要是看到天上飞着一只老鹰，胳膊一抬，随着枪响，老鹰就掉下来。有时间还好看个书。军阀在什么地方争夺地盘啦，土匪在什么地方动手打仗啦，好像他什



么都知道。1933年日本鬼子打热河的时候，听说驻扎热河的国民党反动派，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却一枪没打，就向南逃跑了。留下的地主土匪武装更可恶，还和鬼子勾结起来，烧房子，抢东西，奸淫妇女，欺压百姓。永勤看到这个世道，愁眉不展，茶饭不进，整天整宿地猫在屋里打主意。实在憋不住了，他就耐心地劝我婆婆，动员我，他要带着老百姓打鬼子去。我不愿意：'你打鬼子去，这三个孩子怎么办？'他就说：'你看，这年月哪有老百姓的活路？咱们得先治国后安家呀！'

"有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个卖水鞋的人。这个卖水鞋的人在西屋和永勤唠了一宿。我和孩子在东屋恍惚听见他们说共产党怎么样啦，红军怎么样啦，日本鬼子怎么样啦，还有好多我听不懂的词儿和事儿。第二天，永勤送走客人以后，那个乐哈劲儿就甭说了。他吃完早饭就带上自己那棵大盖枪，到下板城路通沟赵家庄去了。他联络赵林、赵来、赵有、马保德等五个人，趁黑夜砸了大地主高程（一说为'高成'——编者）的家，每人弄了一棵大枪，连夜赶回我们的家乡黄花川。……"

约同一次采访中，孙文伶对从言己说：

"日本进关以后，我们家来了一个卖水鞋的人，我父亲留他住下了。晚上，我跟着我父亲和那个卖水鞋的人在西屋睡觉。他们俩山南海北地拉了一宿，又是革命又是共产党，又是红军，因为我年龄小，也听不懂，也记不住。吃完早饭，我父亲买了一双，给他十块现大洋。我父亲自从听了卖水鞋那个人的介绍，心里油煎火燎，坐卧不安。在这之前，他跟我奶奶商量过几次：'妈，你看日本鬼子已经打进了咱们中国，我不能再呆在家里了。不赶走鬼子，国也不宁，家也不安呀！'我奶奶怕得不着儿子的济，就是不吐口。现在我父亲又劝奶奶，还是要打鬼子去。我奶奶没办法，就在屋里和我妈她们娘儿俩哭了一场。这天我父亲就趁黑夜离开了家乡，到承德县路通沟赵家庄去了。那是阴历九月前后，在路通沟呆了七八天，联络了赵林、赵来、马保德，还有一个姓柴的，他们一共五个人，拜了把兄弟。在那儿砸了一户恶霸地主，每人弄了一棵大枪，就回到黄花川干起来了。"

以上，我具细无遗地列出了今天能够看到、听到的几乎所有关于孙永勤起义原因的版本。如何看待它们？哪些涉及到了孙永勤起义真相，哪些则又应止于传说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孙永勤起义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上面介绍的十个版本中，一、三、七、八由于可能性较小，基本可以排除。版本二、四、五、六、九、十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孙永勤起义真相，有的触及了其历史背景，有的道出了其直接原因，有的讲了其诱发原因，有的注意到了个人品性对起义的影响。然这些尚未穷尽促成孙永勤起义的全部因素，真实的起义原因恐怕比这要复杂许多。

首先说版本一、三、七、八的问题。

我得出版本一、三可能性较小判断的原因是：不仅宽城县塌山村王胤淋老人说过孙永勤起义时日军尚未到达孙杖子，2007年4月我到兴隆县大杖子乡采访时，车河口张凤树老人（80虚岁）也说到："日本人当时在这儿人很少，大部分还在下板城。"如果此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孙永勤起义之前，他家与日军之间发生关联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故我认为除非有新的证据出现，否则版本一、三基本上只能归入道听途说之列。

版本八的情况与版本一、三近似。不论孙永勤的亲属还是了解岳老亮情况的人，都未讲过孙永勤、岳老亮曾一同剿匪，更未说过孙永勤有被关进监狱的经历，故我认为版本八也应归入传言之列。与版本一、三有所不同的是，版本八似不完全属于空穴来风。我的判断，它是岳老亮逼迫孙永勤说在向外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扭曲、夸大后的结果，即将和孙永勤一起剿匪的孙永香误听成岳老亮；将岳老亮起诉孙永勤的原因——孙永香、孙永勤分了岳老亮东西，引起岳老亮不满，但孙永香有势力，不敢告，转而告发孙永勤——误传成了岳老亮、孙永勤因"分手枪"起嫌隙；为了强调岳老亮、孙永勤之间有仇怨，更附会了孙永勤被岳老亮送进了监狱这一情况。这种看法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呢？由常久芳将事件发生的时间记忆为民国16年即1927年，与历史真实相差甚远来看，我认为上述分析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版本七的情况与版本八类似，基本上可以断定，也是岳老亮逼迫孙永勤说的变种。理由是，除吴连杰以外，再无第二个人说孙永勤与张杖子大地主有矛盾，而持孙永勤受彭杖子大地主逼迫而起义说法的人却不少。岳和张都是大地主，吴连杰在姓岳的大地主压迫孙永勤说传播过程中，极有可能误将岳姓听成了张姓。

再说我所认为的真实的孙永勤起义原因的问题。

站在写作本书的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探究70多年前发生的孙永勤起义事件，我们应努力提醒自己的是，要把有血有肉的孙永勤放在万里长城以北、蒙古高原南缘即热河地区广阔的地理、历史、时代背景上来予以考察。换句话说，孙永勤起义事件宛如一件从时空中独立出来的雕塑作品，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且表现出与其他的起义不同的特点，是由孙永勤置身其中的热河区域独特的地理、历史、时代及他自己的个性特征共同起作用，塑造而成的。漠视任何一个方面，都将导致把握孙永勤起义原因时的不全面，忽略任何一个层面，都将导致无法准确理解为什么孙永勤起义染有浓厚的悲壮色彩。

在这个视野中看待孙永勤起义事件，我们无法不关注以下几方面对他起义的影响。

1. 热河自然地理的影响

关东军侵入热河前，中华民国热河省的疆域是：东与辽宁省的绥中、兴城、锦西、义县、北镇、黑山、彰武、通辽县接壤；西与察哈尔省的锡林郭勒、东西乌珠穆沁、特哈吧、多伦、

沽源等旗县为邻；南界止于河北省遵化、迁安、抚宁、榆林、怀柔、密云县边境。热河省内的地形，以山地为最多，冈陵次之，平原最少。山地又以孙永勤家乡地处其中的西南地区为最多。曾有人描述那里的地貌说："西南山地脉络条条，长城倾泻，大山连亘，嵯峨矗立，几无隙地。"[1]到处都为崇山峻岭的结果是：①交通非常不便。②海拔高，气候寒冷。③土壤较少，人民生存不易。"在荒阿断谷之中，往往三五人家，自成村落，耕作所施，率在山坡，或傍河崖。因其土层甚薄，禾稼不甚蕃茂。而四山又皆童濯孤露，无树木以荫覆之。每逢六七月间，雨水暴注，则砂石与泥沙俱下，向之所为良田者，悉被冲刷，随流而去，以故其民贫困特甚。"[2]④一旦有匪情或战事发生，容易隐蔽，保存自己。前三者锻炼了热河山地人民"坚忍耐苦"的特性，如地层深处的岩浆，非至不能忍受时，一定忍下去，然一旦突破极限爆发，则无所阻挡。至于④，则使那里如果成为战场的话，极适合游击战术的发挥。孙永勤如旋风般拔地而起，摧枯拉朽般横扫伪满西南"国境"，及其敢于蔑视关东军，勇敢地利用热南滦河河谷两岸的群山与日伪开展游击战，和热河地理对人民品格的培育、热河地理在反侵略战争中具有地理优势有着直接的关系。



图44　由于土地大都开垦在山坡上，面积狭小，牲畜无法展开，原热河山区农民至今仍用人力拉犁耕地。2007年4月

2. 热河历史的影响

在本书的开始部分我曾说过，孙永勤家乡地区，也包括整个热河区域，至少被汉族以外的八个少数民族统治过。如果从国家或区域性政权的角度来统计，秦以降，除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这几个定都于燕山以南、以西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外，至少被匈奴、乌桓、鲜卑、魏、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魏、库莫奚、东魏、北齐、燕、后梁、后唐、契丹、辽、金等近20个区域和割据性政权划入过自己的势力范围。行政区划的反复无常，造成了热河人民特有的孤儿一样的无归属感，这种混杂着被强迫和被抛弃味道的感觉发展到极致，造成了那里的人民对于稳定和被强大政权接纳有着强烈的渴望。特别是从蒙古高原南缘向南，接近长城，汉族人口比重较大的地方，由于那里的汉人大部分来自关内的山东、河

[1] 惠我：《热河最近内容之一般》，文载《村治》月刊，转自《热河失陷目击记》，中外出版公司，1933年印行。

[2] 张其昀：《热河形势论》，文载《国风》半月刊，转自《热河失陷目击记》，中外出版公司，1933年印行。

北、山西，和中原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被强大政权接纳的渴望，直接明了化为对长城以南的强大中原统一王朝所认同、所拥抱的愿望。这种强烈的感觉一代一代沉积入热河人民的内心深处，特别是经历了有清260多年，又划入中华民国版图20多年，已习惯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怀抱后，突然发生侵略者闯入，再次强行要将他们从大家庭中分裂出去，重新回到供人役使、寄人篱下的奴隶状态，积淀热河人民心中2000多年的的集体潜意识便会突然爆发出来。关东军侵入热河，将热河划入“满洲国”版图后，孙永勤之所以起义，他说的“中国人要有中国心”之所以让部下觉得“听了很入耳”，他的起义之所以得到底层民众的拥护和响应，最深处的根源即在于此。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准确理解孙永勤起义的深层动因，而导致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的表面化。

3. 日伪的殖民统治

热河并入伪“满洲国”后，关东军为了避免立即招致在汤玉麟时期受尽盘剥之苦，甚至有“宁为亡国奴，不为汤治民”标语贴出的热河人民的抵触，使用了“右手持凶锋，左腕挂念珠”的伎俩。家住兴隆县三道河乡偏岭子村的退休教师高印萱回忆：“日本鬼子进关时，我已经记事了。日本刚一进来时，走的道路是宣传帮助中国建国来的，恢复清朝政府，建立‘满洲国’。我念书那时，人一问，‘你哪儿的？’我说‘我是满洲国的’。那时龙井关这边叫‘满洲国’，过龙井关就叫华北了。开始过来的日本人还中了的呢，宣传‘一德一心，共存共荣’，也写标语，宣传好着呢。那时候，在农村，中国人还是落后、没文化。有的人觉得对自己有利，他就认为日本人挺不错的。咋不错呀？你像那抽大烟的，抽大烟，日本人不管，不犯法，随便抽。没钱吧，他配给你，特别贱，质量还好。这抽大烟的人就说：‘日本人不错。’实际上他不领会这个道理，抽大烟不就亡国了嘛。不过日本人刚一来时，都挺好的，不是拉拢嘛。”然而就像豺狼再善于伪装，尾巴也会显现出来一样，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很快便被热河人民看穿。

“这十三年，日本人在承德，说实在的，坏事做尽了！”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发生的事情，白春旺先生忿闷地说：“一个叫抓国事犯，一个叫抓经济犯。国事犯当时也叫思想犯，就是说，你反对日本，有这思想动向，就是思想犯。实际上要说思想能知道吗？他就看你不顺眼，这就抓你。抓了很多人，弄到锦州关起来，很多人就死在那里了。经济犯是怎么回事呢？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凡老百姓生活必需品都实行配给制，像火柴、油、盐、米、面、布，这些都是给你分配多少，你用多少。他发给你一个本子，上边做着记录。如果不给你，你用了那些东西，就是经济犯罪，要抓起来。一是吊起来打，一是把你判刑，让你服劳役去。”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后，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邓一民先生说，“它在政治上建立省、县、甲、牌一系列组织，来实行殖民统治，并在1933年11月实行‘战时连坐法’，就是



在一个村子里，谁家出了问题，全村都要受株连，这是非常残酷的殖民统治。当时，警察岗哨林立，牢房监狱遍地，汉奸特务横行，真是一个恐怖的世界。它在经济上实行的是敲骨吸髓的殖民剥削。当时日伪搞所谓‘组合制’，就是将老百姓收获的粮食、棉花等，即所有的东西，全部交到‘组合’里，然后它再配给你一些东西，叫‘配给制’。就连那火柴、煤油、食盐等日常生活必须品都是配给的。它就是从农民手里把你收获的东西都征上去了，都交给‘满洲国’了，然后再‘配给’你一些东西。征上去的东西是很多的，领回来的东西就很有限，质量也差了。我就吃过配给的那种‘组合面’，就是以红高粱为主的杂合面。以前都是当牲口料，根本没人吃的。而且它配给的这些‘组合面’，有些是发了霉的，老百姓吃了拉不出大便来，只好用柴火棍子去剜，痛苦极了。它发的那个布，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次，不是棉花布，是一种次生布，没穿几天就碎了。所以穿不上衣服的人是很多的，十七八的大姑娘穿不上裤子是平常事。没衣服穿怎么办？在屋地上挖个坑，来外人时就躲到坑里去，叫‘遮羞坑’。它经济上的残酷的剥削掠夺，迫使农民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另外，文化上搞奴化教育，成立什么道德会呀，进行文化、思想统治。在日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这种殖民统治下，老百姓确实是没法生活。有压迫就有反抗，日伪为了更进一步加强统治，防止可能发生的武装反抗，搞一个‘铳器回收’政策，即把民间的枪支弹药都收上去。因为在民国时期，民间枪支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还有类似民团那样的农民武装，他们武器是比较多的。‘铳器回收’政策就是限期三天内把所有的枪支弹药都交上去，这就更激起了老百姓的普遍反对。”

“收枪厉害到啥份儿就不说了。”2007年4月，我到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采访，在任家庄遇到任富老人。回忆日伪当年收枪的情况时，他说：“我们老爷子有一个火枪，开始置时，是为养羊防狼的。头回去收，说祖上留下，砸废铁卖了，把人支出去了。崔家庄有一个崔永秀，坏，其实他啥也不是，就跟现在地痞流氓一样，想弄点钱花。我们老爷子枪藏在哪儿，他知道，给告了。我们老爷子病了，在炕上躺着呢，把老叔任福深绑去了。‘要么把枪交出来，要么就把吃饭家伙割去！’太厉害了。那时有火枪太受罪了。把老叔绑去多少时，托了多少人，最后到底是把枪交出去，人才放回来。收税更别说了，东西还没吃呢，牌长来了。要马料，没有得借去。‘穿个黄褂子算军衔’，摊多少多少升马料，当时马料论升不论斤，不给，揍你一顿。今儿马料，明儿马草，你就得给。要道木（即枕木），几家摊一根。哪有树呀，就得给。不给，打，‘三宾的给’一说，棍子就打你脑袋上了。那时候收大烟，有小白花、蓝花、紫花大头三样，要让看见，拉一斤，恨不得要你十斤。你想留下，没门儿。那时大烟最值钱了，都是中国人来收，听日本人的令，实际上要十斤，到日本人手里也就六七斤了。”

日军和伪“满洲国”执政当局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沦陷区人民的怒火，这些怒火蓄积在心中，构成了包括孙永勤在内的伪“满洲国”境内人民选择拿起武器、公开反抗日伪暴政的重要

时代背景。

4. 赵老子、岳老亮逼迫

欲说清这个问题，先要介绍大成兴，而要介绍大成兴，则又须先谈岳老亮。

岳老亮，大家在读了前引彭杖子村徐文林老人的回忆后，应已初步了解。现将他更为详细的情况介绍如下。

岳老亮，本名岳荫臣，彭杖子村民习惯上称呼其为“岳亮臣”或“师爷”，“老亮”为号。岳老亮原籍河南，他之所以到了热河，和其舅舅吴少连有关。吴少连传说为先任热河都统、后任热河省主席的汤玉麟的师爷，他不仅将外甥一家在彭杖子安顿下来，还帮助外甥发了家。

岳老亮发家是靠煤，其煤矿在彭杖子村东南十几华里外的庙梁山上，具体地点为今八家乡乡村联营岳伙房煤矿东南4华里处，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交界承德县一侧的假门沟山顶，今已废弃。岳老亮煤矿的名字，今天的人们常称之为“岳伙房”（乡村联营岳伙房煤矿承袭了岳老亮煤矿的叫法），之所以这么叫，据八家乡庙梁村主任石振林介绍，是因为老岳家在那里安过一个伙房的缘故。岳伙房煤矿最初的主人，徐文林老人说是老项家。老项家是彭杖子的坐山户，性恶，不仅拥有庙梁煤矿的所有权，连彭杖子村外暖儿河、滦河河套都宣称是他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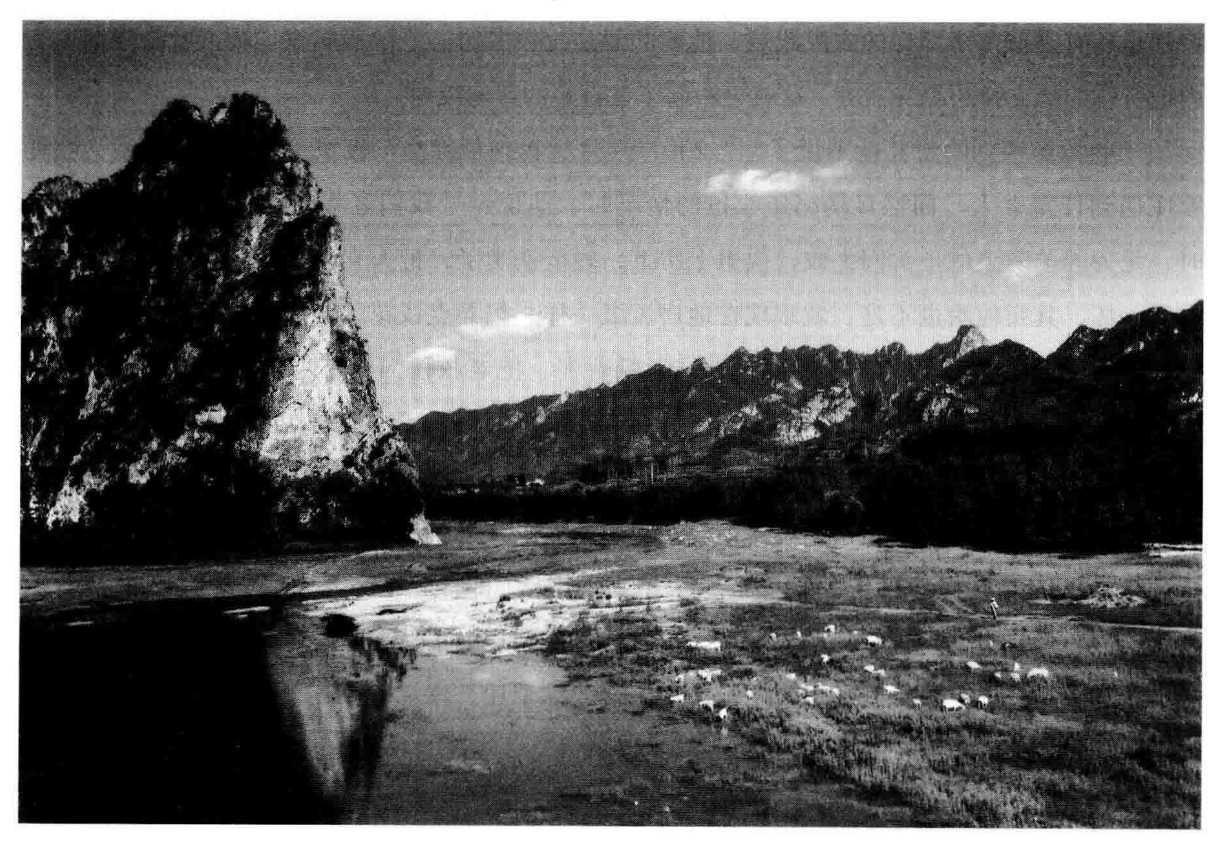


图45 彭杖子外景：左为鸡冠山，中间的河流为暖儿河，右面杨树遮蔽之处即彭杖子村。2008年7月

不论摆渡还是趟水都要向他家交河底钱。曾有一个羊贩子因为不肯交河底钱，赶羊趟水过河，结果“羊贩子淹死好多羊，抱着脑袋哭”。

煤矿由老项家的变为岳老亮的，徐文林老人的说法是，老项家将煤矿卖给了吴少连，吴少连又给了岳老亮。另有一种说法是，岳老亮贿赂平泉县长，巧取豪夺的结果。宽城塌山乡西沟村杨印增老人回忆说：

“就在大矿后山这个梁，有老项家和老岳家两煤矿，他们争边界。当时宽城、承德、青龙县都没有，统一归平泉县管，他们去平泉县打官司。老岳家拿西瓜装的银子，老项家拿鲤鱼装的银子。县长说：‘鲤鱼没有西瓜大，你们的矿在哪儿？’说在小庙梁上，县长说：‘以庙为界。’庙原在大庙梁的梁上来的，这老岳家回来，一夜之间，就把庙搬到大矿后山这梁上来了。他那头找人拆，中间找人递，这头就找人垒。那庙是瓦的，有一间房那么大，一宿黑夜就把庙盖完了。平泉县县长到这儿一验，‘庙在这儿呢，就以这儿为界吧。’矿都是老岳家的了。”

杨印增老人的说法中有值得注意之处：按他所讲，则不仅煤矿归属岳老亮的方式与徐文林老人所说完全不同，在岳老亮最初是否在庙梁拥有煤矿问题上，两个人意见也不一致。按杨印增老人的说法推理，则岳老亮原在庙梁上就有一个煤矿，徐文林老人的说法则是没有。实际情况如何，尚待进一步查考。

不论岳老亮怎么从老项家手中拿到的煤矿，他的主要产业是煤，并通过煤而发家，我看过的所有材料、遇到的所有人都无异议。岳伙房煤矿的煤开采出来后，岳老亮让人用毛驴驮到彭杖子村北的滦河南沿和鸡冠山根，那两个地方建有储煤场，一支船队专门负责将岳老亮的煤运往承德市区。

运煤的过程，在塌山王胤淋老人眼中，充满了血腥色彩。

“老岳家那恶霸地主，你这么说，那拉船的，出煤后他不往承德运吗？他不花脚钱，船逮住后，就给他拉一年。船上插着小旗，那叫官船，直到上冻为止了。爱给了，就给你点粮食让你吃，救命。不爱给，你就得自己想办法，就那么霸道。那死多少人哪！那两边河滩，修个大门子，叫水口，有守卫。夜里船有跑的，那里边砰一枪，打死勿论，白打死，就那么干。无法无天，官商勾结，官匪勾结，祸害老百姓，老岳家没有好名声。”

岳老亮是否曾打死过很多船工，尚需查证，但王胤淋老人所说岳老亮非常蛮横，似不为假。

徐文林老人回忆小时候见到的情景时说：“老汤在时，三百多只船，船上都插着红旗，都是官船，给老岳家往承德送煤。承德烧的煤都是老岳家供的。私人不许送别的东西，只能给老岳家送煤。”。

依靠官商勾结，垄断承德市区的煤炭供应，岳老亮迅速发了家。发家后，他一是在彭杖子建了一座大院，一是在车河口开设了一家商号：大成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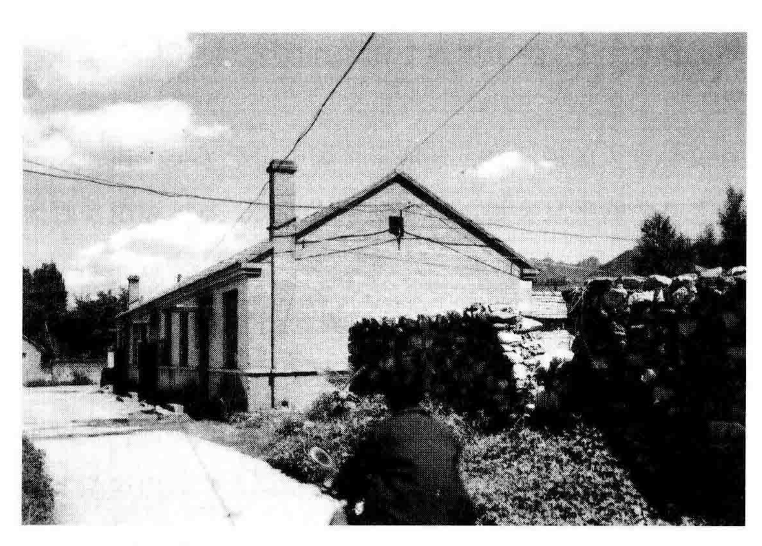


图46 岳家大院旧址 2008年7月

岳家大院，也叫“岳家城”，位于滦河支流——暖儿河南岸，彭杖子村东头。今八家乡供销社彭杖子村三农服务站所在地即其旧址。大院占地二亩左右，坐南朝北。最北面是一个八字形的大影壁，正中绘着龙的图案，青瓦覆顶，檐上一边有一个龙头向外伸出。影壁南面，正对着的是大院的大门。大门铁制，上铆虎头钉。大门顶上还盖着一座房，大彭杖子的人们称之为“更楼”，从地面到更楼的房脊，徐文林老人说有一丈五尺高。大门两边和大院的东、南、西三面全用院墙围住，院墙高七尺，石子砌筑。四角建有岗楼，到顶一丈多高，岗楼上设枪眼。大院内建有院落三层，从北向南，第一层用来开烧锅、卖百货；第二层是岳老亮大儿子和大管家何育民等人居住；第三层，岳老亮和其两个媳妇居住，二儿子和女儿是否也在第三层院落居住，没有了解。这是大院里面的格局，大院东墙外还有花园和菜园，北为花园，南为菜园。以后岳老亮病死，尸体即丘在花园的一所小房子中。

“团团脸，大眼珠子，个子高，胖，挺大的肚子。好几个丫环伺候他。大烟只抽一遍，大师奶把大烟灰攒起来，卖给别人。”这是岳老亮病死前给徐文林老人留下的印象。岳老亮娶了两房媳妇，大媳妇是河南人，没生育。小媳妇据说是口里关家庄人，比较受气，但却为岳老亮生了三个孩子：老大岳珠环，一说岳著环；老二岳列英，一说岳连英，又名岳连欧；还有一个女儿，名字不知。岳家大院内，除岳老亮一家六口人及服侍的丫环外，日常在里居住和活动的还有大小管家若干人，护院者十几人。

管家中，职务和权力最大者即上面曾说到的何育民。何育民，迁安三屯营人，今属迁西。他是岳老亮的第二任大管家。第一任姓戴，俗称“老戴”。何育民何时接替老戴不知，但至迟1933年夏秋季节，孙永勤等分大成兴时，他已在岳老亮大管家位置上。“长方脸，尖下颏，胖，长得挺富态，够个大老板样。何育民为人可不行，放高利贷，起租子。”徐文林老人对何育民评价不高，对他手下的印象更是不好，特别是对其中一个叫王老玉的，非常痛恨。“大名王成，号王老玉，是狗腿子，恶气着呢。打场，都是黑天打。要是白天打，让王老玉看见，过冬粮都留不下。王老玉随便抓起一把粮食，从手里往下流，‘不行，有谷糠！’‘剥’，拿斗搪子往下一压，给你压下半升谷子。老百姓都管王老玉叫‘王小鬼’，没人性。后来他上了年

纪，岳家不用，抽大烟死了。”

大小管家外，岳家大院中还有护院的“院兵”六七人。这些人大多都会武术，每人都配有武器，最早为火枪，后来是单子、湖北造，日军侵入热河后，据说又换成了三八大盖。岳家大院养好几个院兵，主要为防土匪。孙永勤起义后，第一次攻打岳家大院时，院兵与孙永勤之间曾激烈交战过。

介绍完了岳老亮和岳家大院，再说大成兴。

大成兴是岳老亮开在车河口的一个商号，然其准确名字和经营内容现在并不能确定。即便车河口一地，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1988年12月15日，车河口罗振环（79岁）、罗振廷（74岁）、罗振华（72岁）三位老人在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说：“大成兴是杂货铺，正东家老岳子（即岳老亮——编者），经理王老瑞、费××。费××外号废物东家。还有一个秦老子，一个赵老俊。秦老子是看院子的，赵老俊，被打死的。”2007年4月23日，我去车河口采访时，车河口村民徐敬礼（86虚岁）回忆：“杂货铺名字叫大昌兴，有七八间大，院子不小。掌柜的是王老瑞。炭局子，没有日用品。口里的人到这儿买炭往下运，走滦河水路往下运。”2008年7月14日，我再到车河口采访时，车河口辛连海老人（78虚岁）回忆：“那时车河口总共百十上户，就一条主街道，有‘大昌兴’，‘平升号’，主要这两家，都是口里人老板。大昌兴收木炭和杂柴，平升号开香磨，做香，也有酒。大昌兴在车河口南街，离河沿不远。炭堆得山似的，往口里头发，都是杂柴。大昌兴只卖炭，不卖杂货。”

需要说明的是，“大成兴”、“大昌兴”并不是已知的关于岳老亮这家商号的全部名字，还有一种说法，说它名字为“大顺兴”。孙永勤表外甥史耀华、史耀清这么认为。2007年4月16日，我到兴隆县张杖子采访时，张廷云老人（85虚岁）也曾向我纠正道：“车河口商号叫大顺兴，非大成兴。”

“大成兴”、“大昌兴”、“大顺兴”三者中，持“大成兴”说法的人为最多，回忆时间也最早，大部分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期，距孙永勤起义时间较近，有可能更贴近历史真相。经考虑，决定本书中采用“大成兴”这个名字。至于其经营内容，由于和孙永勤起义事件没有关联，不再探讨。



图47　大成兴旧址（照片提供：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

大成兴的所有者，大部分人认为属于岳老亮一人。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代

理人角色。1988年12月15日，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庄（今郝家营）村民郝士玉在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说："岳老亮做买卖的本钱全是他嫂子的，口里的。一年他嫂子来一次，算一年的账。"

除以上两种观点外，尚有一种说法，大成兴为张岳两家大财主共同所有。其中"岳"是指岳老亮，"张"有人认为就是张杖子的张如增。

大成兴大掌柜的，见诸回忆的有三种说法：王老瑞；王老瑞、费××；任凤阁。其中，认为是王老瑞的人数为最多。

王老瑞为人尚可。车河口辛连海老人说："王老瑞是大老板，人不恶。滦河夏天经常涨水，群众上山搭窝棚，他给一些苫席。冬天有穷的，他给一些木炭。群众对大老板平时反映挺好。"

王老瑞的手下，目前知道有赵老子、秦老子及年轻的管账的十余人。影响孙永勤起义的是赵老子。

赵老子，本名赵老俊，今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色树底下人。车河口村徐敬礼老人十多岁时见过他："30多岁，长四方脸，个子不算矮，不瘦。"一般认为赵老子在大成兴里担任的是掌柜角色。有种说法，他和岳老亮有亲戚关系，彭杖子徐文林老人认为与实际情况不符，二人之间并没有这种关系。

在孙永勤起义事件中，赵老子起了什么作用呢？

我认为，岳老亮和他的逼迫构成了孙永勤起义的直接原因。然这个问题要说清，另有一个人物必须要做些介绍。

"一米五六这样，不忒高，挺胖。右眼靠鼻梁地方有个瘊子，筷子头那么粗，开着花。"罗圈沟村郑家庄孙守礼老人描述的这个人是他的爷爷孙永香。过去常有人将"孙永香"说成是"孙义香"、"孙一香"或"孙进香"，实际为误传。据孙守礼老人讲，他一家是他太爷那辈由山东登州府长书社十二甲移民过来的。在罗圈沟落户后，太爷生了四个儿子，孙永香最小。在土匪窜扰到热南滦河河谷之前，相对于罗圈沟其他人家，孙永香一家基本上属于最富裕的户，有房20间左右，土地100多亩。

"孙永香房那时叫四方斗（也称'四面斗'，即四合院——编者），一个院，前面正房，后面正房，两边是东西厢，有过道屋、碾棚、羊圈，共20来间房子。当时位于村子正中间，道西。那时村庄总共五六户，大户分小户，也就40来口人，都姓孙，没外姓。"罗圈沟孙守印老人说。

热南滦河一带匪讯频传后，各地纷纷成立了伙会，孙永香担任了北七保的总保长。"当总保长之前，就一个地主身份。以前有钱就有势力，就当总保长了。从盘道梁到遵化的边关都归爷爷管，东边一直管到车河堡、下板城这一带，西到兴隆。"孙守礼老人回忆说。

"洋鼓洋号一吹，小旗儿一摆，可威风着呢。"罗圈沟李瑞言老人至今还记得一个外号

“梁豁子”的人（嘴唇有一个豁口）生前讲述孙永香训练伙会时激动的神情。

据罗圈沟村民讲，孙永香平日较“护群”，即比较维护村民利益，心地也比较善良。孙守印老人对我说过：“越穷，痴苶呆傻，他越成年养着。我们见有个瞎子在那儿养了几年，死了他给发送的。还有一个哑巴，瞎子的闺女。瞎子和哑巴要饭要到罗圈沟，孙永香看着可怜，留下了。”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富裕、有势力之人，孙永香不畏惧，甚至非常强势。“不小看人，穷不怕，富的你想怎么着不行。”这一点给人造成了孙永香“不好惹，蘑菇头”的印象，直接影响到后来孙永香带伙会分了大成兴财产后，赵老子、岳老亮不敢告孙永香，转而去告孙永勤的事情发生。

孙永香带伙会分大成兴财产的经过，综合各方回忆，简述如下：

1933年春，从承德县下板城方向向车河口一带流窜过来十余股土匪，包括孙杖子伙会在内，今兴隆、宽城、迁西三县靠近滦河的伙会全部集中起来，共同抵御土匪。各地伙会公推罗圈沟孙永香为总会长，总会设在了今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伙会与土匪交战的时间大约为公历六七月份，罗圈沟孙守印老人回忆当时是连阴天，“伙会拿的都是一个子的枪，叫套皮子。还有抬杆，一个人举不动，得专门有一个人扛着，另外一个人在后面拍那个火。”伙会、土匪之间的战斗十分激烈。一种说法是，交战过程中，宽城伙会在今承德县常峪沟一带截获了给土匪运子弹的驮队，经审问，驮队属于大成兴；一种说法是，伙会经过七天七夜激战，将土匪赶走后，车河口当地民众告知，土匪之所以能支撑那么长时间，和大成兴卖子弹给土匪有关。不管实际情况是哪一种，总之各地伙会都很愤怒。总会长孙永香大概也觉得，伙会本是为了保卫地方民众、商户的生命财产安全才去打土匪，结果受保护者却与要打击的对象勾结起来，难以容忍，于是便率领各地伙会攻打大成兴。打了两次，第一次没打下来，第二次才攻进去。孙永香命将大成兴内储存的物资全部分掉，外地伙会分给的比较多，以感谢他们远道而来帮助剿匪。车河口当地伙会没要。孙杖子伙会剿匪时的分工是把守罗降梁，防止土匪南窜，等孙永勤接到分东西的通知赶到车河口时，大成兴内的东西已基本被分完，只剩下了七八匹马，还有大成兴从张家口请来的一个戏班。由于平时比较喜欢唱戏，孙永勤便命孙杖子伙会将马匹和戏班一同带回了孙杖子。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在汤玉麟时期官商勾结、霸道惯了的岳老亮大概平生头一次遭遇到这种打击，一口恶气无法咽下。但因汤玉麟时代已结束，热河已成日本人和伪满官吏的天下，想告孙永香，怵其强势，底气不足。认为孙永勤不过是黄花川一个小地主，没发现有什么背景，于是便决定拿孙永勤当出气筒，将其向当地伪满政权告发。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史耀华老人在2005年1月初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岳老亮是因孙永香一个侄子在日军方面当司令，才不敢告。经与他1986年11月22日的回忆（当时说是孙永香的儿

子）相对照，并到罗圈沟调查，史耀华所说的“侄子”有可能指的是孙朝阳。孙朝阳是孙永香的二儿子，当时在盘道梁修路工地带工。说他是“司令”，明显是误传。不排除岳老亮因不清楚孙朝阳与日军之间有多深的交往，而不敢告孙永香，但从现在了解到的全部情况看，孙永香本人“不好惹”应是岳老亮心中最大的阴影。

岳老亮告发孙永勤的罪名，据佟靖功先生说，是两项：一是抢劫大成兴，二是藏枪不交。赵老子在告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是公然做伪证，不顾分大成兴的决策者是孙永香这个事实，而把责任全部推到孙永勤身上；二是死心塌地追随岳老亮，一而再、再而三地举报孙永勤。孙永勤请人从中说和，杀了三个肥猪，请了三回客，每次岳老亮、赵老子都是当面应允了，转脸就又向伪满政权告发。伪满警察根据岳老亮、赵老子的报告，来抓孙永勤。孙永勤无处安身，被迫到外面躲了整整一个秋天。

岳老亮、赵老子对孙永勤穷追不舍的结果，一是终于将孙永勤逼迫到了起义的边缘，二是造成了孙永勤起义后对岳老亮、赵老子坚决不饶恕。不但亲手将赵老子枪毙，而且两次带兵攻打岳家大院，甚至岳老亮已死，还要将他的尸首扒出来，抬到20多里外的老梁上——当然这样做，还有压枪压款的考虑在内。孙永勤在起义一年半中，除岳老亮、赵老子外，还曾对张杖子张如增、塌山杨老文、瀑河口任氏、二堂高作忠等多个大地主采取过强硬手段，然唯独对岳老亮、赵老子二人却一定要将其彻底铲除而后快，说明岳老亮、赵老子曾经令孙永勤恨之入骨。而这一点，从相反的方面说明了岳、赵二人的逼迫是孙永勤起义的直接导火索。

5. 诱发因素

探究孙永勤起义的原因时，以下因素也应予以充分注意：

（1）私塾时期，李桂攀的教育及《水浒传》、《岳飞传》等传统章回小说对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影响。

（2）“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报纸关于先期被日本占领的朝鲜半岛人民被奴役命运的介绍，对孙永勤内心的触动。

（3）马占山江桥抗战、各路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击日寇的行为对其抗日热情的激发。

（4）长城抗战，特别是二十九军喜峰口、罗文峪抗战对其抗日热情的进一步鼓舞。

（5）如果他如李一夫所说，确实参加或支援了察哈尔抗战，抗日同盟军“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的悲壮情怀，特别是吉鸿昌每战必赤膊挥刀，奋勇向前的情景，对他灵魂的涤荡。

（6）毛泽东、朱德书信对其增强抗日必胜信心所起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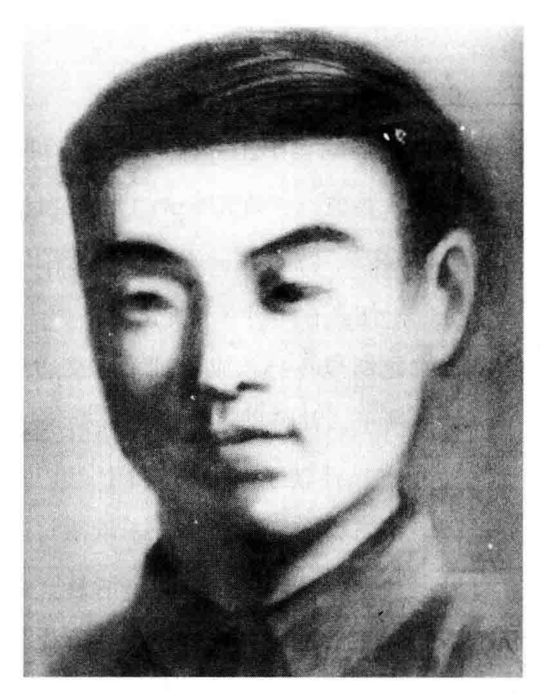
（7）卖水鞋商贩在其行走至起义边缘时刻，对其下决心起义所起的关键作用。

上述七点中，前四点较易理解，不多讲。五六两点目前虽无法证实，但亦无法证伪。特别

是第六点，由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专门提到了冀东的农民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来看，毛、朱和孙之间似乎确实有可能联系过。

谈一谈第七点，卖水鞋商贩问题。

卖水鞋的商贩，佟靖功先生认为他是遵化籍中共地下党员高存。根据遵化党史办张书明、陆占山先生上世纪下半叶所做调查，高存1893年出生于遵化县铁厂镇北店村，和孙永勤同龄。高存家中兄弟众多，他排行第四，由于律己特严，当地的人们习惯上称呼他为“四老严”。高存早年生活贫苦，初在村中务农，后为生存曾到唐山赵各庄煤矿下过煤窑。由于不堪资本家、工头的压榨，时间不长便回到了村中。他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活动范围在今天的遵化市、迁西县、兴隆县接合部一带。1933年9月下旬，中共冀热边领导人李葆华、李运昌、王平陆等在今迁西县上梨树峪创立了“京东红军抗日游击队”，高存和遵化莫家屯一位名叫高进忠的共产党员被任命为游击队在遵化方面的领导人。京东红军抗日游击队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高存打过游击，组织过工人斗争，后参加了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支队，任政委。1938年7月，冀东爆发20万工农抗日大暴动，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支队被编为特务第二大队，高存被任命为第二大队政委。1938年10月暴动队伍大部分西撤，高存率第二大队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于迁西、遵化境内。1941年7月，高存担任迁遵兴联合县的区委书记，在今迁西县三屯营镇开展抗日工作时，夜宿龙湾村，被日军和治安军包围，突围时受重伤被捕。审讯时，高存拒不吐露共产党方面的秘密，为此受尽酷刑，后惨遭杀害。他的长兄高升，人称“大老严”，于1933年被他发展入党，那以后一直跟随他从事抗日活动。在他牺牲的第二年，也被逮捕。高升以弟弟为榜样，宁死不屈，也被杀害。


图48　高存（照片提供：冀东烈士纪念馆）

高存同中国北方地区很多早期的共产党员一样，具有文化程度不高但革命异常坚决的特点。他们凭着一颗朴素的心去理解共产主义，真诚地希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为大众谋得幸福和解放。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程度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很多行为甚至只能用“冷酷无情”来形容。张书明、陆占山在他们的纪念文章《燕山滦水系英魂——记高存烈士》中，讲过这样一件事：1933年底，高存在京东红军抗日

游击队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以党员为主体，建立了一个游击小组，在兴隆县獐帽山一带打游击。正值寒冬腊月，由于环境险恶，高存等人穿不上棉衣，睡不着热炕，手、脚、脸、耳朵全被冻坏。他的妻子王秀荣心疼他，埋怨了几句，要他不要再往外跑了，想不到一下子惹恼了他。他大骂道："你四奶奶（当地习惯用语——编者）要反对我怎么的？今天我非劈死你不可！"抄起斧子就向妻子砍去。王秀荣四处躲闪，高存紧追不舍，一定要置她于死地。幸亏有人发现，拉住高存，才未酿成命案。

高存之所以在孙永勤走到了起义边缘的时刻，以卖水鞋的小商贩身份做掩护，出现在偏僻难行的孙杖子，并特别住到了孙永勤家里，据佟靖功先生介绍，与一个叫关元有的人有关。

关元有是孙杖子东北方向18华里、一个叫王宝石的山村里的农民。王宝石地处滦河边，关元有以拉船为生，常年奔走于承德与滦州（即今滦县）之间。关元有在孙永勤起义之前已被高存发展入党，具体什么时间不清楚。这个情况是1983年12月29日兴隆党史办栾福忠先生到遵化采访时，20世纪30年代曾任中共遵化县委书记的骆凤庭介绍的。1987年3月6日，栾福忠、佟靖功先生到遵化第二次采访骆凤庭，骆凤庭再次予以了确认。在1983年的采访中，骆凤庭说："高存与我们常有联系。1933年后半年他向我反映，有一个姓关的同志，叫关元有，是他吸收、介绍入党的同志。他和孙永勤一起闹暴动，搞抗日，请遵化县委支持他们，他们是打日本的。"在1987年的采访中，骆凤庭说："高存介绍关元有入党什么时间不知道，也没有问过。肯定和我说过，关元有是党员，高存介绍的，不知道啥时介绍的。"关元有和高存是怎么认识的呢？这和关元有一次坐牢经历有关。

1986年11月，关元有的侄子、王宝石村民关恒现在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说："关元有是我四大爷，我父亲是老五。他们老哥四个，两妈一父（即同父异母——编者）。我四大爷拉船，以前在滦州蹲过一年大狱。拉船时在滦州遇到红胡子，红胡子欺负人，他水性好，武艺好，与红胡子打起来，蹲了一年狱。"关恒现所说的滦州即今天的滦县，在滦县的监狱生涯影响到关元有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变化。佟靖功先生谈及这段历史时，说关元有在狱中认识了一个人。"遵化县的高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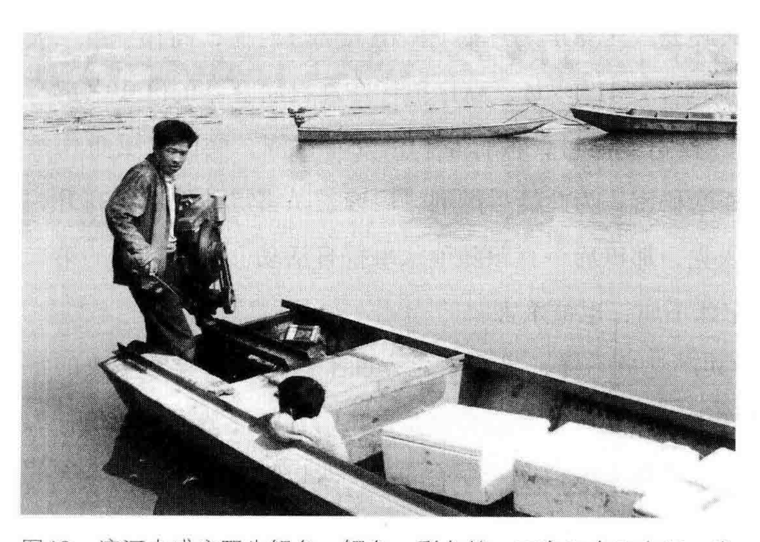


图49　滦河中盛产野生鲤鱼、鲫鱼、彩鱼等，王宝石今天有近一半人口打鱼。2006年4月





图50　据王宝石村民讲，倒扣的渔船位置为关元有家旧址。2006年4月

存的哥哥，也在这时候入狱，关元有和高升在狱中成为难友。关元有通过高升，结识了高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关元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准确时间虽不得而知，但由高存是1929年始入党，孙文伶回忆卖水鞋人走后，他父亲去了路通沟七八天，从那里回来才起义。由此推断，他应最早于1929年入党，最迟在1933年12月3、4日之前已经加入中共。关元有与孙永勤应比较早就认识。一种说法，他们两人之间有亲戚关系。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长雷常玉的外孙朱金城说：“孙永勤起义实际上是一帮小舅子跟着姐夫打日本。”是否如此，我觉得尚需调查。目前知道的是，孙永勤与王宝石关仁和有亲戚关系，孙永勤的一个妹妹嫁给了关仁和。但他与关元有之间是否有亲戚关系，还有待了解情况的老人出来做个说明。其实，去除这个因素，孙永勤、关元有之间也有很多的机会可彼此认识。首先，孙杖子、王宝石之间距离很近。我在前面说王宝石在孙杖子东北18华里，那是沿今天的公路行走，实际上两村之间过去有山中小路相连，小路距离不过10华里左右。其次，关元有在承德、滦县之间拉船，河口是必经之地。而孙永勤欲前往车河、柳河一带剿匪，也必须走河口，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可在那里相遇，彼此也因为这个原因都对对方有了解。“据我们推测，来的那个卖水鞋的商人就是高存。实际上，卖水鞋的之所以来孙永勤家，而且住在孙永勤家，那是经过关元有秘密介绍的。”大概正是因为上面的理由，佟靖功先生做出了这样的推断。

高存到孙永勤家的目的，根据列宁去世后，1934年4月季米特洛夫成为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之前，共产国际一直在向它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发布着“左”倾错误指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中共河北省委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左”倾路线方针政策来看，应主要是策动孙永勤发起武装暴动，目的是配合南方红军反“围剿”，在北方创造新苏区与红军。当然，包括高存在内的中共迁安县委方面的中共党员大多都具有尊重北方革命实际，对“左”倾错误路线不盲从，甚至敢于抵制的特点，然当时高存鼓动孙永勤的最多不过是“抗日反蒋”并重。因为遵义会议后，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错误路线虽实际上被迫终止，但直到1936年7月，中共中央收到季米特洛夫主持的共产国际发来的新指示、执行联蒋统一战线政策之前，确立并执行的也不过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抗日反蒋”方针，包括高存在内，中共迁安县委的中共党员无法超越这个时代局限。

单纯的反蒋也好，反蒋抗日并重也罢，由雷永兰、孙文伶的回忆及日后中共迁安县委领导人韩东征对抗日救国军战士、地下党员刘俊岳的答复来看，高存说的主要还是反蒋，暴动这种暴力的、武装的反抗形式还是进一步刺激了孙永勤。在“起义”的想法因为家庭的原因不得不搁置后，孙永勤再次看到了他应走的道路——与高存的期待有所不同的彻底抗日之路。在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史上，这是一条光荣之路，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况下，这却是一条“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之路。

6. 个性原因

孙永勤身上有四个十分突出的个性特征。

（1）忠。这个特点与他私塾时期所受教育及热河的历史有关，与他本身是山东移民后代这一点也不无关系。我最初阅读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的调查材料时，十分困惑于孙永勤为什么总爱强调“中国人”、“中国心”，后来在看到今人对山东人特点的评价时，才意识到，正如山东人身材高大的特点在孙永勤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一样，齐鲁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忠”也积淀到了孙永勤的血液中。“忠”是对民族的忠、对国家的忠，“忠”引导着孙永勤走上不承认自己是“满洲国民”，只愿当“中国人”、只愿有一颗“中国心”之路。

（2）仁。这一点应主要遗传自其母亲，构成了其性格中极其令人想不到的一个特点。仁即爱人，它在孙永勤起义问题上起到了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目前尚不清楚。但在起义后，他的这一铁汉柔情的特点却时常令周围的人感动，成为很多的部下死心塌地追随他、所到之地大部分百姓都积极支援他的重要原因。

（3）脾气急躁。日常生活中表现为遇事说话冲，嗓门大，有时甚至会嚷嚷；夫妻关系中表现为大男子主义，一言不合，便可能打老婆；作战指挥上，被一部分人视为“有勇无谋”；战斗中，据点攻不下来，拔枪就往前冲。具体到起义问题上，当无法忍耐时便不再忍耐。

（4）疾恶如仇。与对民族和国家的忠、对普通民众的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孙永勤对被他认为是恶人的人，坚决打击，毫不留情。对岳老亮、赵老子如此，对造成拜把子兄弟赵来死亡的陈敢干、杨小峰如此，对侵略中国的日本人更是如此。如1986年12月，遵化吴宪国请三位了解抗日救国军主力最后一战情况的老人们座谈。有老人就曾说起，毛山之战前，有中国翻译官求孙永勤放掉被抓获的两个日本人，只要放了，要什么给什么。孙永勤却坚决不放，回答说：“日本人死一个少一个。”这两个日本人后被孙永勤部下枪毙于毛山顶上。

7. 其他

1982年10月11日，雷永兰在接受未留下名字的一位党史工作者的采访时回忆说，孙永勤决定起义前，“那时十三口人，被小日本摧残死只剩五口人了”。但具体谁被害死，又是因何被害死，采访记录里面未记载。2007年4月15日、2008年7月21日，我就雷永兰所说事情分别向黄花峪史耀清老人和孙杖子孙中贵老人（孙永勤二哥孙永连之孙）求证，史耀清老人的回答是：“孙永勤的亲哥哥在外地被害。”孙中贵则回忆：“王宝石河北一干哥们在下板城被人圈在屋子里杀了，被满洲国兵杀的。”

雷永兰、史耀清、孙中贵三人所讲虽不一致，但孙永勤起义前曾有亲人或朋友被日伪杀害，似乎真实发生过。如果此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它在孙永勤思考是否起义的过程中，也应是一个推动因素。

以上，我从热河的地理和历史、日伪的残酷统治、岳老亮与赵老子的逼迫、诱发因素、个性原因等多个方面谈论了孙永勤起义的原因。我的结论是，孙永勤的起义不是单一因素促成的，而是上述远因、近因、深层原因、浅层原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赵家庄

决定起义后，孙永勤便动身前往赵家庄。

赵家庄是隶属于今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的一个小山村。路通沟原本写为“鹿通沟”，解放后始变更为“路通沟”。“鹿通沟”的来历是，传说康熙打猎来到下板城以南地方，看到一只鹿从眼前跑过去，于是随口将鹿通过的地方命名为鹿通沟。还有一种说法，路通沟本名“鹿虎通沟”，其来历与鹿通沟相同，不过主角不止是一只鹿，还有一条虎而已。

赵家庄在路通沟的村民组序列中为第八村民组，位置在下板城南15华里处。村庄坐落于东西走向的两列山岭当中——赵家庄人称之为南前山、后山。上世纪30年代，赵家庄人口为30多人。2009年底的统计数据是，人家35户，人口133人。

根据雷永兰20世纪80年代初的描述，孙永勤是在送走卖水鞋的商人后，提着大盖枪走上通往赵家庄的道路的。



图51　赵家庄　2009年12月

从孙杖子到赵家庄，道路全长约90华里：沿黄花川向东北走10华里到河口，之后沿滦河向西北走40华里到车河口，在车河口摆渡过滦河后，再向东北走40华里左右，其间还要再穿过一次滦河，才能到达赵家庄。几段路途几乎全是崎岖山路，其中又以河口至车河口40华里路程最为艰险。山路的右边即是浊浪翻滚的滦河，“滦河源远流长，诚口外第一大川也。”1933年春，张其昀在《热河形势论》中描述滦河当时的风景时写道：“其两岸皆崇山峻岭，削狭处则峭壁悬崖，卓立千仞，舟过其下，惴惴然惧将压焉。而奇峰怪石，千百其状，有孤峭若佛塔者，有蹲踞若虎豹者，有旷若堂，奥若房，整列若城垣，错落若旗鼓者，虽鬼斧神工，不能刻画其形似也。有时山麓之石，散入河中，则聚而为哨，‘哨’者，南人所谓‘滩’也。顽石嶙峋，凫动波间。而流势又复高下相悬，快若奔马。故舟行至此，必旋转其舵，随波纹以左右之，倏忽间但闻水声风声激石声，指挥喧号声，鞳鞺噌吰，耳鼓为穿，而是拍拍者已堕于漩涡急流之中矣。是之谓过哨。每遇一哨，船客皆眴目属耳，屏息不敢声，亦有拍手欢呼以助其势者。”张其昀描写的虽为坐在滦河船中所见所感，思想行人从河岸半腰上通过，目睹河水湍急，舟人惊呼喧哗，当亦足令身心悚动。不仅右边有滦河咆哮于下，路上还有险阻悄无声息地等待着行人。“判官肚子、关老爷脸、小狗腿子，这三个地方最险，只能在河套沿走。”孙杖子村民孙中彦对我说，“为啥起名叫判官肚子呢？山鼓出来一块，像判官的肚子。幸好上边长着点荆树条子，只能用手攥着它们，一大步迈过去。迈不好，就掉滦河里。判官肚子就在河口北边一里地。关老爷脸，砬子直上直下，形状像关公的脸，地方在小牤牛哨。小狗腿子，砬子上大下小，样子像狗腿，在小牤牛哨北边。”包括孙永勤在内，任何行人要从河口到车河口，都必须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三个险难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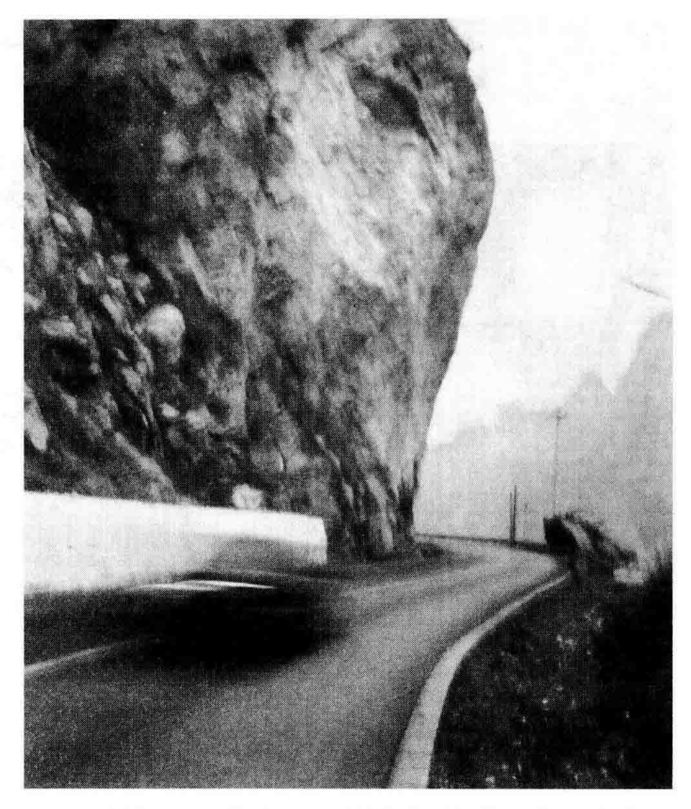


图52　判官肚子。修建承栗国防公路时山体已被炸去很多。2009年12月

孙永勤不辞辛劳，风尘仆仆跋涉90华里到赵家庄的目的，是动员一个叫赵林的人和他一块起义。可能的话，最好说服赵林的几个叔伯兄弟也加入抗日的行列。




图53　赵林之孙赵文忠站在他家柴门前。2008年7月

孙永勤是怎么与赵林相识的，不得而知。一种说法，两人是在联合抗匪过程中认识的，赵林担任过赵家庄伙会的会长。这一情况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考察。

赵林，据其子赵廷山、其孙赵文忠、其侄赵廷江、老梁吴连杰等人回忆，相貌为“细把连扦大个子”，禀性特点为“爱置地，爱置办家庭”。赵林有土地五六十亩，草房三间，一个小东厢房，一个小西厢房，在赵家庄属于富户，有人称其为“小财主”。

赵林妻名刘玉荣，也是大个子，脸有点麻子。其孙赵文忠回忆说：“我奶奶刘玉荣心眼太好，瞎子、瘸子啥人来都对他们好。我表叔他们都白吃白住，给干点活啥的就行了。”

赵林、刘玉荣夫妇生有两儿两女：大女儿名赵玉芝；二女儿名赵玉荣；大儿子名赵廷普，也有的写作赵廷朴；二儿子名赵廷山。赵玉芝、赵廷普、赵廷山后来都参加了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赵玉芝“小脚，穿着靴子，上身是青衣小靠。姑娘长得俊。骑着大马，使双枪”。在抗日救国军进关前夕，回到家中。日伪搜捕时，险些丧命。赵廷普在孙永勤到达赵家庄时，已与大杖子一位姑娘订了婚。未与之结婚，便和父亲一起参加了孙永勤部队，后来牺牲于遵化毛山。赵廷山年龄较小，1935年初才加入孙永勤部队，参加过老梁战斗，孙部进关前回到家中。四个孩子外，赵林夫妇还抱养了一个儿子，名赵廷海，以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

以上几口人外，根据赵林侄子赵廷良回忆，孙永勤到赵家庄时，赵林母亲尚健在。孙永勤、赵林等结拜后，孙永勤便一直以“干妈”称呼之。当然也有可能，孙永勤很早便已拜赵林母亲为干妈，因为赵林侄子赵廷江曾回忆，“孙永勤来去落脚赵林家”。

赵林家中有长工三人，也有的说是地户三人：张福林、张福山、张福存，又名张二、张三、张四。张四也有的说实际应是张福瑞。张福林、张福山、张福存是亲兄弟，他们一共兄弟六个，老家据说在承德县蓝旗地羊杈子。张福林、张福山参加了抗日救国军。张福林遇难于暖儿河后窝子。张福山即“张三”据说后任抗日救国军六队队长，“俊巴子，大迫子个儿，是个

人物”。也有的说是“小个儿，挺粗壮，有劲”。张福山和赵林大女儿赵玉芝是恋人关系，后为保护赵玉芝，被日伪抓走，残酷杀害。张福存未参加孙永勤部队，1988年时还有人见他生活于承德县狼窝。

当孙永勤来到赵家庄时，赵林也正处于走投无路时刻，两个原因把他逼进了绝境。

一、日本人征税。赵林之子赵廷山1983年回忆说：“那时候，日本人处处征税，什么都要税，要粮要草，见人就抓，穷人实在受不了。”赵林家当时外边有一块地，种上了大烟。有个在他家租房的报告给了日本人，日本人便来敲诈勒索，“要大烟干儿，缴了后还要。把我爸爸弄到警察署，打，没治。”

二、赵林大概逢年过节有耍钱的爱好。农历1933年的正月，他和赵来，还有下面要提到的遵化东双城的马保德在路通沟耍钱，结果输了很多。赵林输了3000票天津字票子。”老梁吴连杰老人说。输了钱，没有办法还赌债，日本人占领承德后，修建锦承铁路，赵林便去老牛河口工地干活，以为能挣到些钱。随他一同去修铁路的有儿子赵廷山，一说还有赵有。没想到干了几个月，白干，日本人不给工钱。赵林很愤怒。有说法他和赵有差点让日本人给杀了。正在郁闷又无可奈何之时，孙永勤来了。另有说法，孙永勤不是主动来的，而是赵林派在他家种地的张福山（即张三）去孙杖子请来的。张三的大哥和孙永勤相熟，曾在孙家做过零工，赵林一定从他口中听说了不少孙永勤的事迹，很是佩服，于是派张三请孙永勤到赵家庄来，一同商量办法。此说法实际推翻了孙永勤、赵林很早就相识的观点，是否属实，需要进一步查考。

不管事实真相是哪一种，孙永勤到赵家庄后，说出了起义的想法。根据老梁吴连杰的讲述，赵林听后，只提出了一个问题：烧火棍打不了日本，如何解决武器？赵林提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抗日救国军存在的一年半时间里，实际上一直深深困扰着他们，并一直没能很好的解决。但在当时，由于赵林事实上已没有更好的出路可供选择，当孙永勤说出两三支枪他能够解决后，起义一事便确定了。

之后的事便是商量起义诸事项。根据抗日救国军以后的发展历史来看，应包括了起义目标、起义军名称、旗帜、口号、军队组织、扩军、枪弹粮食医药如何补充等等。

商讨没有在赵家庄进行，而是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谁能想到，就这么个地方，谋划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呢！”

赵廷良老人站在三霄洞外的平台上，眼望着南面的青山慨叹道。这是2005年夏，我第一次来到三霄洞时所见到的情景。

三霄洞位于路通沟村的另外一个自然村——只有17户人家的杨树洼的一座小山的半山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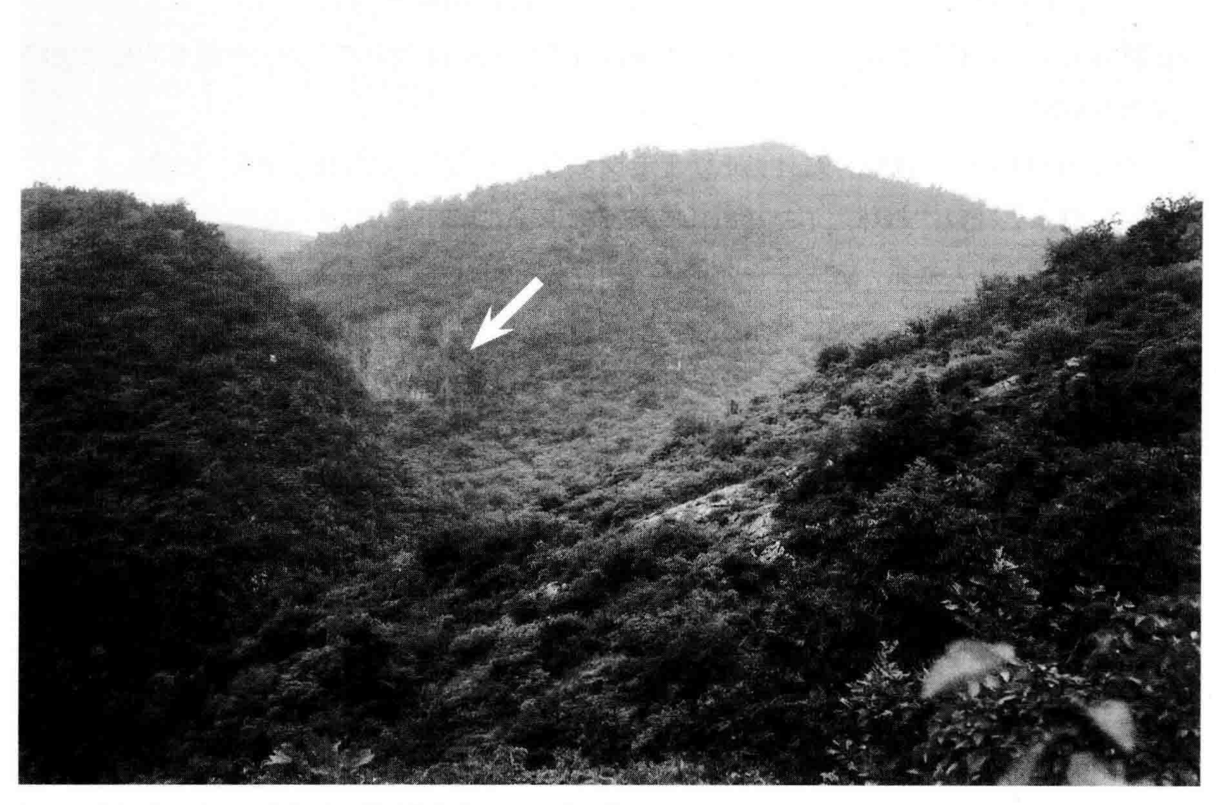


图54　路通沟三宵娘娘庙旧址（箭头指处）　2005年7月

上。出赵家庄，沿山中土路西南行2华里，可以看到一个小山坳。顺着山坳中的石板路上山，步行一华里左右，来到一座有半个篮球场大小的石砌平台上。平台的西、北、东三侧全是高达20米左右的崖壁，在东侧的崖壁下有一个天然生成的石洞。进得石洞，只见正对洞门的主座上端坐着三位云冠双髻、面貌庄严，分别裹着红、粉、紫色袍服的女仙塑像，女仙像前又有六个善财童子，每边三个，分侍两侧，这便是近年才由一位道士募捐重新修葺的三霄洞内部景象。

三霄洞是三霄娘娘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完整的三霄娘娘庙应包括三霄洞和三霄洞坝台下依山建筑的若干层殿宇，这些殿宇不知何年已毁弃，如今那里只有基址尚存，据说前些年还挖出过油灯等物。“小时候放羊经常去玩，泥像后面有假山。”路通沟任家庄任富老人说。

“从古时候有庙起，就有这庙了。三霄娘娘据说是赵匡胤的三个妹子。”2007年春，我第二次前往三霄洞时，遇到了正在山坡下放羊的张俊文老人。张俊文是杨树洼17户村民中最后一位尚未搬走的人，其他的村民由于这里交通、生活极不方便，均已搬往他处。“这庙从底下看不好看，得从南面山顶上看。从那儿看，是两条山脊环抱着三霄洞，很好的一个自然景。”

张俊文老人的话中有一些记忆不准确之处。三霄娘娘庙的三位女仙：云霄娘娘、琼霄娘娘、碧霄娘娘，即人们通常称呼的“三霄娘娘”，是民间称之为财神的赵公明的胞妹，与宋



图55　近年新塑的三霄娘娘像　2005年7月

太祖赵匡胤没有关系。三霄娘娘的故事见之于《封神榜》中：赵公明与妹妹云霄、琼霄、碧霄都是截教通天教主门下弟子。赵公明在峨嵋山罗浮洞修炼，云霄、琼霄、碧霄三位仙女则在三仙岛服气餐霞。商时，武王伐纣，赵公明不听妹妹云霄劝阻，应闻太师的邀请助纣伐周，被陆压、姜子牙用钉头七箭书杀害。云霄、琼霄、碧霄得知哥哥死讯后，悲愤异常，为报哥哥被杀之仇，出三仙岛，与菡芝仙、彩云仙子一起来到岐山商军大营。三仙女摆下"九曲黄河阵"，云霄跨青鸾祭混元金斗，琼霄乘鸿鹄执宝剑，碧霄骑花翎鸟，大战武王军队，将玉虚宫门下十二弟子擒获，姜子牙靠着元始天尊、老子的法力才杀掉三仙女。武王即天子位后，姜子牙奉太上元始敕命在岐山封神，三位仙女被封为感应随世仙姑正神之位——云霄娘娘、琼霄娘娘、碧霄娘娘，使命是执掌混元金斗，负责先后天一应仙凡人圣、诸侯天子、贵贱贤愚落地先从金斗转劫的事情。道教传说，封神后，三霄娘娘拜骊山老母——女娲娘娘为师，每日潜心修炼，终于返本还元，成就正果。

三霄娘娘虽出自神话小说《封神榜》，但三位女仙救苦救生的事迹却在信奉她们的地区广为流传，如辽宁营口，至今传诵着三位女仙施药救民的故事。

三霄娘娘在道教中被尊为"福寿"、"财星"、"送子"三圣，民间习惯称她们为增福延寿娘娘、财星娘娘、送子娘娘。

根据目前所知，中国的辽宁、河北、陕西及台湾地区，都建有她们的庙宇。仅在河北的冀东长城两侧就有三座三霄娘娘庙，一在今承德县路通沟村杨树洼，一在今承德县常峪沟北沟，一在今迁西县景忠山。三座庙中，景忠山三霄娘娘庙为主庙。

孙永勤等关于起义具体事项的商讨，是在三霄娘娘庙举行的。

为什么选择在离赵家庄两华里的这座大庙内讨论，以往的看法是这里地理位置偏僻，较易保密。但根据近年来我对三霄娘娘庙及其周围地区的走访，觉得可能还有一层原因，即祈求三霄娘娘的护佑。

在大庙内参加密议的，据赵林长女赵玉芝回忆，除孙永勤、赵林外，还有赵来、赵有、赵存、张福山、马保德、孙成、柴启瑞七人。

孙永勤、赵林、张福山之前已介绍。现将赵来、赵有、赵存、马保德、孙成、柴启瑞六人的情况叙述如下。

赵来，据其子赵廷江1983年向兴隆党史办栾福忠先生回忆，读过四五年私塾，有些文化。全家五口人：父亲、赵来夫妻、赵廷江，还有一个女儿。只有一间半草房，租种下板城庆元亨三亩多地，四六分成。当孙永勤来到赵家庄时，赵来正在车河口首饰铺当学徒，“受苦受累，三年学徒工白干，穷得没有法活，被孙永勤联络起义了”。

根据很多人的回忆，赵来有一个亲弟弟，名叫赵福。赵廷江未提他的名字，很可能是他早已和赵来分家另过。赵福据说在伪满下板城警察署署长陈敢干（外号“陈混蛋”）手下当警察，这两个人的名字在谈到赵来之死时还要提到。

赵有，他起义前的详细情况不知，我到赵家庄调查时，也未深入了解。目前只知道他有个姐姐嫁到了老梁老许家，日后，老梁成为抗日救国军的一个重要根据地，与赵有有一定的关系。赵有在起义后任孙永勤部队军法处处长，也有的说是卫队队长，后来牺牲于毛山。

赵存，赵家庄人。赵玉芝说他参加了密议，然其侄子赵文忠说他是二傻子，没有参加。

马保德，今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人。“人家脑瓜子切半拉也不叫唤，就有这本事，是个汉子。说话瓮声瓮气的，呜里喊叫的，外号叫‘马三嚷’。”东双城赵德老人说。2005至2007年，为了解马保德的情况，我曾三次前往遵化东双城，采访他的邻居和见过他的老人们。根据赵德老人及其他老人们的介绍，目前知道的情况是：马保德兄弟三个，他排行第三。大哥叫马保祥，也有的说叫马保田。二哥叫马保林。兄弟三个住着小三间房子，生活不富裕。马保德最初给地主扛长活，靠出卖力气为生。当时干得好，一年能领到三石玉米，来年续约。干得不好，一年则只能得到一到两石玉米，年底领了粮食便另谋他途。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后，由于只能勉强糊口，马保德便和两个哥哥商量，将家改成了不包饭的小旅店。有时和大哥一起，有时和二哥一块，往返于遵化与口外锡盟之间，做起了买卖羊羔皮的生意，这也是那时东双城大部分人家从事的职业。大概在走乡串户收购皮子的过程中，马保德与赵家庄赵林相识。由于义气相投，结成了朋友关系，来往常住在他家，并通过赵林，与和赵林友好的孙永勤相识。“马保德小伙子了不得呀，往那一站，威武。个儿又高，又粗，虎虎实实地，一两个人到不了他跟前。让日本人压迫得没办法了，这就当了民众。”东双城马春林老人说道。在见过马保德的大部分老人心目中，他是一个好人性的人。

孙成，三霄娘娘庙道士。当时30多岁，“脸上有小红麻子，大高个儿”。也有的人回忆是“中等个儿，长巴脸”，“小个儿，车轴汉子，一脸黑麻子”。孙成说话为当地口音，有的人

说他是从五龙山那边过来的。五龙山是否指今天的雾灵山，不得而知。孙成会看麻衣神相，推八门，“用一根细筤撅两截，掬咕掬咕就算计”，“爱放火烧房子”。

柴启瑞，赵家庄杨秀琴老人说叫柴积瑞，并说他是上谷郭杖子人。“柴积瑞是先生，会推八门。”蘑菇峪史耀清老人在孙永勤起义后曾见过柴启瑞，说他“四十多岁，比孙永勤大，有胡茬子。后来，留胡子不留头，怕挂花了不好裹伤”。史耀清曾以为他也是道士，“老老道对人和气，和孙永勤一块吃住，不穿道袍。看庙时穿，起义后不穿了。早晨起来算卦，有喜有财没有？仗能不能胜？比如三号、五号不行，得八号才行，军师算得很准，还不伤人”。柴先生与赵家庄赵林、赵来、赵有是朋友，后来确实参加了起义军，但他在三霄娘娘庙密议时是否其中的一员，有不同的说法。我看过的资料和采访过的人中，赵玉芝、杨秀琴、孙文伶、赵廷良都认为有柴先生，或者说“姓柴的”。老梁吴连杰说，柴先生是赵来死后才被请来当军师的，按此说法，柴先生当时未在密议的人中。但在同一次采访中，吴连杰又说柴先生卜算的起义日期是腊月二十三或二十五，后来孙永勤等把腊月二十五定为了正式起义日期，与大多数人回忆的正式起义日期有两个月的出入，所以吴连杰的回忆有可能不准确。

三霄娘娘庙内的气氛是既悲壮又沉重的。一方面，起义的决心已定，一方面又存在着在日满一日严苛过一日的严密统治下，如何在起义后迅速招集起足够数量的人马，解决他们的枪、粮食、药品供应，并有稳固的根据地支撑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当中，以解决枪的问题最为重要和急迫。之前在叙述孙永勤起义原因时，我曾抄录过一段话：“在兴隆县和遵化县交界的长城线上，当1933年4月国民党二十九军兵士自动起来反抗日寇以后，穷人就提出，‘枪就是命，只要鬼子收枪，咱们就和他干到底’的口号。”这段话的讲述人是谁，《兴隆县志》征集意见稿未注明。由它原样出现于《长城抗日英雄孙永勤——年焕兴同志回忆录》中来看，它是以后任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第二总队长的年焕兴说的，当无疑问。年焕兴的这段话回忆得非常好，它为我们理解孙永勤起义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枪就是命，有枪便有命，并且不仅意味着拥有生命，在孙永勤等人眼里，还代表着拥有自由、尊严，作为中国人的尊严！然而枪的问题也最难解决。任家庄任富老人向我讲了他父亲任福林跟他说过的一件事：孙永勤等人谋划起义的那段时间内，一天，任福林从村外回来，路上偶遇准备到下板城去的赵来。“那真是两手攥空拳，啥也没有。问干啥上街？说，上街把街上警察撂倒，枪不就夺回来了。”孙永勤等人为枪的问题焦虑不安但又苦无良策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枪的问题，在孙永勤的起义过程中，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孙永勤牺牲70多年后，穿过历史的烟云，纵观他一年半的起义历史，我们发现，不管孙永勤起义是多少重因素作用的结

果，但伪满警察收枪毕竟是促成他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以后的起义过程中，孙永勤很大一部分精力不得不放在解决枪的问题上，最后并因枪、粮食、服装补给问题而覆灭。一定程度上可以讲，始于枪，围绕着枪，终于枪，孙永勤的命运与枪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霄洞的秘密讨论持续了多长时间，无人清楚，根据日后很多参加过抗日救国军的老人们回忆的孙永勤队伍中有拜把子的传统，在三霄洞秘密集会的孙永勤、赵林、赵来、赵有、赵存、马保德、孙成、柴启瑞等人很可能在神仙塑像前拜了把子。

秘密商讨结束后，孙永勤等人便迅速付诸行动。

此后的事情叙述起来比较困难。雷永兰说："他联络赵林、赵来、赵有、马保德等五个人，趁黑夜砸了大地主高程的家，每人弄了一棵大枪，连夜赶回我们的家乡黄花川。"孙文伶说："那是阴历九月前后，在路通沟呆了七八天，联络了赵林、赵来、马保德，还有一个姓柴的，他们一共五个人，拜了把兄弟。在那儿砸了一户恶霸地主，每人弄了一棵大枪，就回到黄花川干起来了。"赵玉芝、杨秀琴、赵廷良则说孙永勤他们先是往南走，杨秀琴、赵廷良更直接说先去的老梁，然后才前往孙杖子。赵玉芝是这样回忆的："商量日子不少了，明5点起事，往南走。"赵玉芝说这话的日期是1988年12月13日。同一天，杨秀琴老人向佟靖功先生回忆说："柴积瑞（即赵玉芝所说的柴启瑞——编者）推八门，说不能从大门走，半夜子时走。从下板城撕来红布，做大旗，上写抗日救国军。招的人有赵存、赵堂的大儿子、赵有、赵来、赵林、赵林的大儿子赵廷普（18岁）、马保德，赵林的地户张二、张三。张四还活着呢，现在狼窝呢，张四没去。他们一起到老梁上，在老杨家（我的娘家）安了大柜。没有粮草，就出去绑秧儿……在老梁上呆了好几个月，我们庄的人都给站岗。日本人来了，他们都跑了。屋子里，墙上挂个老奉军的帽，黄布三块瓦的，赵廷在下板城卖柴禾买的。日本人问帽子哪来的？要毙我。翻译说，是赵廷买的。没毙我，日本人走了。后来日本人又包围老梁，日本飞机扔炸弹，我爹死在炭窑里了。我二哥跳在萝卜窖里，日本人打了七枪，我二哥死了。白天前晌炸的，那人死多了。我老兄弟杨万成那次被日本人抓住，带到老梁沟门，被日本人用烙铁烙，浑身全烙了，死了。我的老兄弟媳妇被日本人扔在火堆上烧死了。我妈被吓死，又被日本人打了三枪。赵林他们被打散了，就奔车河口，袭击车河口警察分驻所。""那时孙永勤叫起绺子，"2005年7月，我第一次到赵家庄采访时，赵廷良说，"他这大旗就在我们这儿（指赵家庄）插着，写着'抗日救国军'几个大字。孙永勤管赵文忠的奶奶叫干妈，是干儿子，在这儿拉起的队伍，想把小日本打过承德县去。这儿离下板城近，地势也低嘛，打仗容易吃亏，就把人拉到南老梁。早上八点多钟从赵林家走的，柴先生给拆的日子和时辰。没从大门走，走的是窗户，据说是为少死点人。从这儿直接上的南老梁。老梁是大柜，西梁顶是二柜。老百姓送军饷全都送到柜上去，要不当兵的吃啥。"





图56 老梁 2009年12月

赵玉芝、杨秀琴、赵廷良三人的回忆，在往南一点上一致，在出发时间上有些出入，但对理清孙永勤等人这一段时间的行动线索无大妨碍，可以置之一旁。三人的回忆中，主要是杨秀琴、赵廷良的回忆中，令我困惑的是以下几点：

1. 为什么二人都说孙永勤等人的旗帜上写的是“抗日救国军”？根据很多人的回忆，孙永勤将起义军更名为“抗日救国军”是在孙杖子正式宣布起义两个月后才发生的事。

2. 杨秀琴说孙永勤等人在老梁上呆了几个月，然后就是打车河口，与多数人回忆的孙永勤在外呆了几天或十几天便回到孙杖子，正式起义不符。她讲的车河口之战前便发生了日本人上老梁之事，也不见诸大多数人的回忆。

我个人的看法是，孙永勤等人上老梁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至少有三个原因可以推动他们去老梁：①趋吉避凶。②到老梁动员一部分人加入起义军行列。目前虽然不知真实的1933年12月11日起义人员里是否有老梁人，但据史耀华1986年回忆，至少1933年农历十一月，他参加孙永勤部队时，老梁小南沟已有20多人参加了起义军。③对老梁是否适合做根据地进行考察。然而即使孙永勤等真的上了老梁，也不能证明杨秀琴、赵廷良的回忆全部准确。综合很多抗日救国军战士的回忆看，她二人把一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混淆到了筹备正式起义这一阶段。

上老梁后（假设真实的话）至孙永勤等回到孙杖子，这之间的情况，没有任何当事人留下回忆材料。仅有的两个可以推测孙永勤等行踪的说法，一来自雷永兰、孙文伶母子，即前曾引述的“孙永勤、赵林等五人砸了一个大地主家，每人弄了一支枪”；二来自孙永勤表外甥史耀华，他在1986年11月22日向到访的佟靖功先生说：“回来17人，磕头的，十几人都是大皮帽子、腰带、手枪。”前者告诉了我们：孙永勤等人最初的枪是如何得来的；后者不仅传达了类似的枪的信息，而且透露了一个情况，即孙永勤的队伍比他离开赵家庄时又有壮大——如果杨秀琴关于孙永勤出发时起义人数的记忆准确的话，一路走来，他的成员至少增加了七个人。

义 旗

孙永勤等到达孙杖子的具体时间，今天已无法查考。根据史耀华1986、2005年两次回忆，当雷永兰见到孙永勤一下子带了很多人出现在她面前，真的准备竖旗抗日时，她曾极力反对。

尽管有妻子拦阻，孙永勤仍如期宣布了正式起义。正式起义的时间有1933年12月11日（农历十月廿四日）、1933年12月12日（农历十月廿五日）、1934年2月8日（1933年农历十二月廿五日）等多种说法，以认可1933年12月者居多。中共党史文献中，采用的是1933年12月11日的说法。连同孙永勤在内，最初起义的人，有5人说、7人说、17人说，也有18人说，中共党史文献采用的是17人说。2007年5月9日，佟靖功先生曾向兴隆史志办提交了一份《1933年12月11日孙永勤起义人员名单》，内列了17个人的名字。一些名字与杨秀琴1988年的回忆有所不同，作为一说，现将其抄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孙永勤、关元有、赵四川、王殿臣、雷常玉、马保德、王福合、张山、张山的哥哥、李长发、赵林、赵有、赵来、赵文书、孙成、赵林的侄子、另一人不知姓名。

起义宣布的时间是在早上。其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雷永兰曾向从言己做过回忆：

“记得已经过了八月十五了。有一天，早上挺凉，我们家后台子上集合了不少人。永勤站在一个大石头上讲话：‘乡亲们，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东三省，现在又占领了我们热河，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早已经不能指望了。咱们老百姓正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能等死，不能当亡国奴！愿意打日本鬼子的跟我来！’话音刚落地，忽啦一下子人们把他围起来，都喊着愿意干。永勤扫了一下乡亲们，举起拳头领着大家喊：‘敌不灭，怒不息，头可断，志不屈！’接着就竖起‘天下第一军，杀富又济贫’的大旗，举行抗日大暴动，建立了‘民众军’。在那个大会上，大家推举永勤做民众军的军长，以后又接着推选关元有、王福合、赵四川、赵林等人做副军长、大队长、参谋长和军师。”

孙永勤的抗日起义，是在十分艰难的背景下展开的，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文献里被称为“黄花川农民抗日大暴动”或“黄花川村抗日农民大暴动”、“黄花川农民抗日武装起义”，70多年间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

“大背景应该看到这一点，”邓一民先生在回顾孙永勤起义的那段历史时这样说道，“孙永勤是在国民党领导的长城抗战失败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冀热边大起义之前，在这个中间的阶段，当时亡国论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搞的起义，确实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当时除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东北同日军作战外，国内其他地方已没有什么抗战行动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

举起大旗，和日本做斗争，那是非常不简单的，也是非常悲壮的，确实体现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将孙永勤列为民族英雄，是非常正确的。他的事迹在承德流传很广，年轻一代虽然大都不清楚孙永勤，但是老人们都知道他，共产党也一直记着他。冀东八路军司令员李运昌一再谈到孙永勤，认为孙永勤是民族英雄。他本人虽然没有与孙永勤接触过，但是他多次谈起到他，他很佩服孙永勤。”

“有句话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赵胜军在谈及孙永勤时评论道，“在河北确实有那么一种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他作为一个农民，能够在外族入侵的紧要关头揭竿而起，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不屈服于外来侵略的一种反抗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他那时的武器很简陋，拉起的队伍军事素养也比较低，但他仍然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他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尤其是他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抗日，确实令人敬佩！”

“孙永勤起队时说：‘先安国，后治家，抛妻子，甩父母，也要打日本，不当亡国奴！’他跟家里人这样说，跟弟兄们也常这样讲：‘打垮了日本，再用八抬大轿接父老乡亲。’”1983年6月，雷永兰在另一次采访中补充回忆道。

今天能够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显示，尽管孙永勤最初的起义原因中含有少量个人方面的因素，但其起义的主要和终极目的却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铁了心肠要为中国人谋利益，铁了心肠要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承德县、赶出热河、甚至赶出中国。作为燕山深处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讲，特别还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来讲，孙永勤具有这种胸怀，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我父亲为了打鬼子，把我们的家产都搭进去了。”1980年前后，孙文伶在接受从言己采访时回忆说。“不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日子过得好好的，要当个汉奸，那日子，绝对发财发大了，再咋着，他也弄个一官半职。他为什么把家产全部变卖？不就是为了抗战嘛！那就是中国人应该有脊梁！应该有中国人的脊梁！从民族传统上讲，这就叫精忠报国。”原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第八队长单忠英之子、画家、国防大学特聘教授单志华对孙永勤评价极高。

从上世纪3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现实看，孙永勤举旗抗日的行为是很符合日占区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日本进中国，老百姓都膈应不是，使点火柴、穿点布都得配给。”史耀清说。“那时候可了不得的，在这儿还崩了一个呢。抓住了，就在这儿崩了。”2005年7月的一天，赵廷良老人站在老梁山顶一处道路旁，一边指点着，一边向我说道，“日本人他也不管你是张三还是木头六，不管好人坏人，只要有这人，你比如说，咱们两个人在这儿，你要比画，说这人是胡子，胡子就是小绺子，那没好，当时就崩了。”

需要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道理很浅显，谁都明白，然而实际行动起来，现实却显露出了它令人寒心的一面。

起义之初的情况，并不像解放后宣传的那样乐观。尽管孙永勤在孙杖子和整个黄花川流域都很有威望和号召力，尽管那里的人们都饱尝日本侵略者统治之苦，但真的要抛家舍业、真刀真枪地去与日本侵略军及其凶残爪牙——伪满警察作斗争，很多人还是宁愿固守田园，与家人厮守在一起，哪怕最终不过成为一只只引颈待戮的羔羊。举例来说，根据车河口村张凤树老人回忆，孙永勤曾两次到那里招募民众，但两次都没人参加他的队伍。“跟八路军扩军似的，招人，但没人过去，瞅着不行。那时人当兵的心情还没有呢，都愿意当庄稼人，不招灾不惹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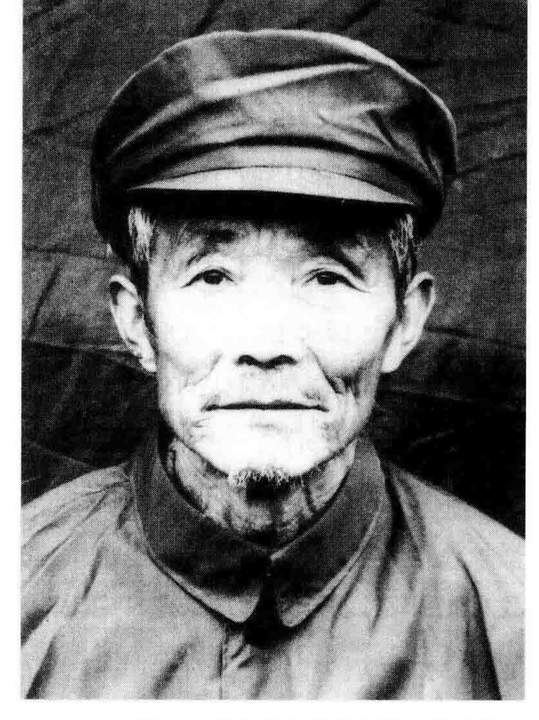


图57　孙文阁（照片提供：孙中志）

没有足够的人员，实现将日本侵略军赶出承德县、赶出热河的目标就只是一句空话。悲悯国人混沌、不争之余，孙永勤暴烈的性格开始发挥作用：他和赵林、马保德等人亲自来到伪承德县、遵化的一些亲属朋友家中，动员他们参加民众军。痛快加入者优而待之，不愿参加而又兄弟众多者，则毫不客气地捆绑起来，强迫加入队伍。孙杖子孙文阁就是一个被强迫参加民众军者。他在1983年6月1日向栾福忠、邢连义先生回忆说：“孙永勤回来后（指从路通沟回来），给我做工作，要我参加义勇军，打土匪。我不去，就捆上我了。”

和孙永勤等人四处奔走、苦心积虑地招收人马的同时，被封为军师的孙成，猜测包括柴先生，也在积极地活动着。

佟靖功先生提到，孙永勤初起义的那段时间，在孙杖子当地群众中曾风传着两件事情。一是说，孙永勤等人在路通沟三霄娘娘庙聚议时，突然闻听钟鼓齐鸣。出门来看，只见天降红云，内有许多神仙前来欢迎孙永勤。原来孙永勤本不是普通人，乃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的天狗星转世，生来是为打日本人的。二是说，起义之前的那天夜里，有人在孙杖子的一个大碾盘上，猛然看到一条金光闪闪的大狗。那人觉得蹊跷，进前仔细去看，却发现是孙永勤反穿羊皮袄睡在上面。

毫无疑问，这两件事情能够在孙杖子迅速流传，并很快蔓延到周边地区，孙成，可能还有柴先生，“功莫大焉”。中国古代即有通过将某个人附会成星神下界，引导一般民众信仰他，以实现某种目的的传统，这样的事例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数不胜数，而且很多获得了成功。但

具体到孙永勤的事情上，一概将以上两种传说斥之为迷信，却也是一种简单的做法。理由是：其一，关于三霄娘娘庙之事，虽然有孙成或柴先生过分夸张和渲染的成分，但辽宁营口三霄娘娘庙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及解放后确曾发生过一些奇怪的事情。类似的诸如福建莆田湄洲湾妈祖，宋以来历代都有示梦显圣、救难扶危的事迹被记载；河北易县黄土坡的后土娘娘，自西汉末王莽篡汉至20世纪70年代末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一直有护国佑民的故事被百姓传诵。那些不可思议的情节和细节均非当地人民依靠杜撰就能够编织出来的。其二，关于传说孙永勤为天狗转世，即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一的娄金狗转世的事情，不仅兴隆县，目前所知，在今天的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也有流传。人们认为至少在攻打车河口及毛山最后一仗两次战斗中，孙永勤曾显形为黄狗。根据我的分析，孙永勤为黄狗转世，准确地说是娄金狗转世之事，应在1933年12月他宣布正式起义之前就已经被当地百姓，特别是孙成、柴先生等认定了。史耀清提到孙永勤民众军的旗帜是面三角旗，红底，上画多半拉月牙，黄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此图案十分不解：如果把月亮比作孙永勤，根据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月亮为阴性，太阳为阳性。我不明白，孙永勤在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太阳旗时，为什么自居于“阴”的地位，而且是缺了一部分的“阴”的地位。如果将此月亮图案理解成民间常说的“天狗吃月亮”的话，日本在亚洲大陆东方的海中，自古就被中国人称为“扶桑”，即太阳升起的地方。日本人自己也将自己的国家视作太阳国度，国旗、军旗都设计成当中一个太阳的图案。按理，孙永勤等人应将旗帜设计成“天狗吃太阳”才对，而非月亮，因为我们看不到月亮与日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对民众军大旗图案的理解，是在看了一些资料后，才突然明白的：缺了一块的圆月亮确实应按“天狗吃月亮”来理解。孙永勤等人之所以选择了普通中国大众一望便知的这个图案形式，是因为它暗合了他们将日本人赶出中国去的心愿。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体系中，天狗，即娄金狗方位为西，月亮方位为东。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中，恰好也存在着中国、孙永勤在地理方位上为西，日本、日本侵略者为东的关系。由此往下联想，天狗可以完全代表中国、孙永勤，月亮完全可以代表日本、日本侵略者。天狗在五行中为金，月亮在五行中为木，根据五行相生相克学说，金克木，因此，选用“天狗吃月亮”作为军旗图案，表面上看与日本人无关，实际则暗含着以中国克日本，以孙永勤克制日本人，彻底打垮、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含义。

“天狗吃月亮”的图案虽可如是解释，但有一个问题：表达同样主题的五行相生相克的图案还可以有很多，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缺了一块的圆月亮呢？我认为，只有一种解释，即民众军成立之前，孙永勤为娄金狗，或者说黄狗、天狗转世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至少孙成、柴先生是深信不疑的。

关于孙永勤为黄狗化身的事情上，充满了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的味道。说它似是而非，是因为冀东长城北侧地区很多老人们都在这样流传，但今天的所谓“科学”又无法解释；说它似非





图58　老梁　2007年4月

而是，是因为有一些具体的事例又让人无法说它就是无稽之谈。

2007年4月15日，我到黄花峪采访史耀清老人时，他亲口向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大哥（即史耀华，2006年去世）说了好几回，表姨父那是天星下降，不是凡人。他为这事还专门问过雷永兰，'表姨父不是属狗的？'雷永兰听了后摇头，'嗯，属大龙的。'大哥为啥这么问，是因为孙永勤如果是属狗的，看见他显形为狗，照民间说法，那他是七阳出窍了。如果不是属狗的，却看见他是狗，那除了天狗下凡，没法解释。过去黑狗多，黄狗少，据大哥说，每回看见孙永勤时都是黄狗。"

对此事，包括三霄娘娘庙的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是，宇宙中有太多我们无法解释的秘密，关于孙永勤的种种传说，真实的也好，人为的也好，关键是透过表面，看它们企图把人们引领向何处，是为众人谋福祉，把人们引向正义、自由、光明的方向，还是为实现一己之私，把人们引向罪恶之渊。孙成、柴先生所扩散的关于孙永勤的言论是希望人们凝聚在孙永勤的大旗下，大家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把日本侵略者赶走，赢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这就够了。

"招人招人招人，先是20来人，后来到千把人，但不是一拨呀，今天这儿来100多人，明天那儿来200多人。但不管人来多少，从哪儿来，都归他领导。"史耀清回忆各地农民聚集到孙永勤大旗下的经过时说。孙永勤等人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效，史耀清的哥哥史耀华1986年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说他农历十一月，即公历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间去参加民众军时，



图59　河南大峪，通往雷常玉家乡之路。2007年4月

孙永勤已有了150多人："小南沟来了20多人，遵化来了20多人，其余都是本地和黑河、澈河人。人很多，有孙永勤、赵林、赵来、赵有、河南大峪的雷成玉、小河口的王福合、小南沟的吴恒山，还有赵四川（参谋长）、关元有（副军长）。那时年焕兴还没去，他是以后去的。李连贵、张福义也没去呢。赵林的儿子已经来了。"

赵林、赵来、赵有的情况已做介绍，雷成玉、王福合、赵四川、关元有因为都在孙永勤民众军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职务，在此将目前掌握到的情况简介如下。

雷成玉，也有人回忆成"雷长玉"或"雷庭玉"，准确名字为"雷常玉"，后改名"雷邦靖"，今兴隆县蘑菇峪乡河南大峪老房子人。据其堂侄任梦奇（父亡后，母亲改嫁任家，随继父姓）、外孙朱金城（雷常玉为其三姥爷）介绍，雷常玉生于1909年，家中四兄弟三姐妹，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四。雷常玉个子中等，好说，"磕巴"。初时在家务农，贫困，后担任河南大峪民团团总。他与孙永勤之妻雷永兰为堂姐弟关系。"孙永勤媳妇姓雷，孙杖子附近老雷家都是一家子，过去一块住，后来才搬到不同的地方，亲戚关系不远。姐夫起义，舅爷子跟着起义。"任梦奇说。雷常玉参加孙永勤队伍时，25虚岁，未婚，朱金城说他担任民众军第一大队大队长，"三姥爷骑白马，拿双枪，负责河南大峪及滦河两岸"。

王福合，今兴隆县蘑菇峪乡大东峪村前坡峪人。据曾参加过民众军的孙文炳回忆，王福合在孙永勤军中任第三队队长，毛山战斗前，有部下150人左右。王福合有一女儿尚健在，她在

我到达河南大峪采访任梦奇的前一天离开那里，故王福合更多的情况未能了解到。

赵四川，他的籍贯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是黄花川人，和孙永勤是同乡。有的说他不是兴隆人，是赵林的朋友。赵林之子赵廷山1988年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说赵四川“白脸膛，四方脸，中上个，当地口音”。2008年7月14日，我采访原宽城县委党史办主任杜青怀，老人说：“赵四川原来是燕子峪大庄的，一庄都姓赵。后搬到承德县路通沟赵家庄，年景不长，又落户到孙杖子。”赵四川在民众军时期任职军参谋长，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后，担任副军长。

关元有，也有的写作“关元友”，民国、日伪报纸大多误听误记成“宫有元”，个别误写成“韩有源”，今兴隆县蘑菇峪乡王宝石人。他是孙永勤抗日全过程中，我最佩服的三位英雄中的第二位，仅次于排名第一的孙永勤。今天，外界通往关元有家乡的陆路主要是经河口前往的那一条。2005年起，为了解关元有的英雄事迹，同时也为贪恋那条路两旁的壮丽风景，我曾三次前往王宝石，并每次都恋恋不舍地离去。从河口通往王宝石的路约8华里长，独自一人在这山路上行走，恍若置身于神仙世界之中。举目四望，满眼都是令人慨叹不已的大气磅礴的大山大水。“大象无形”，每当我企图描摹那造物主在地球上的神来之笔时，都不能不痛切地感受到自己语言的贫乏与苍白无力。

王宝石地处真正的滦河腹心地区。自蒙古高原南缘流下后，滦河便一路向东南方向狂奔疾走，流经与宽城满族自治县接壤的兴隆县境东北部地区时，它连续在险峻的燕山山脉中切割冲刷出三个大的拐弯。在第三个大拐弯南侧的一个山坳里，坐落着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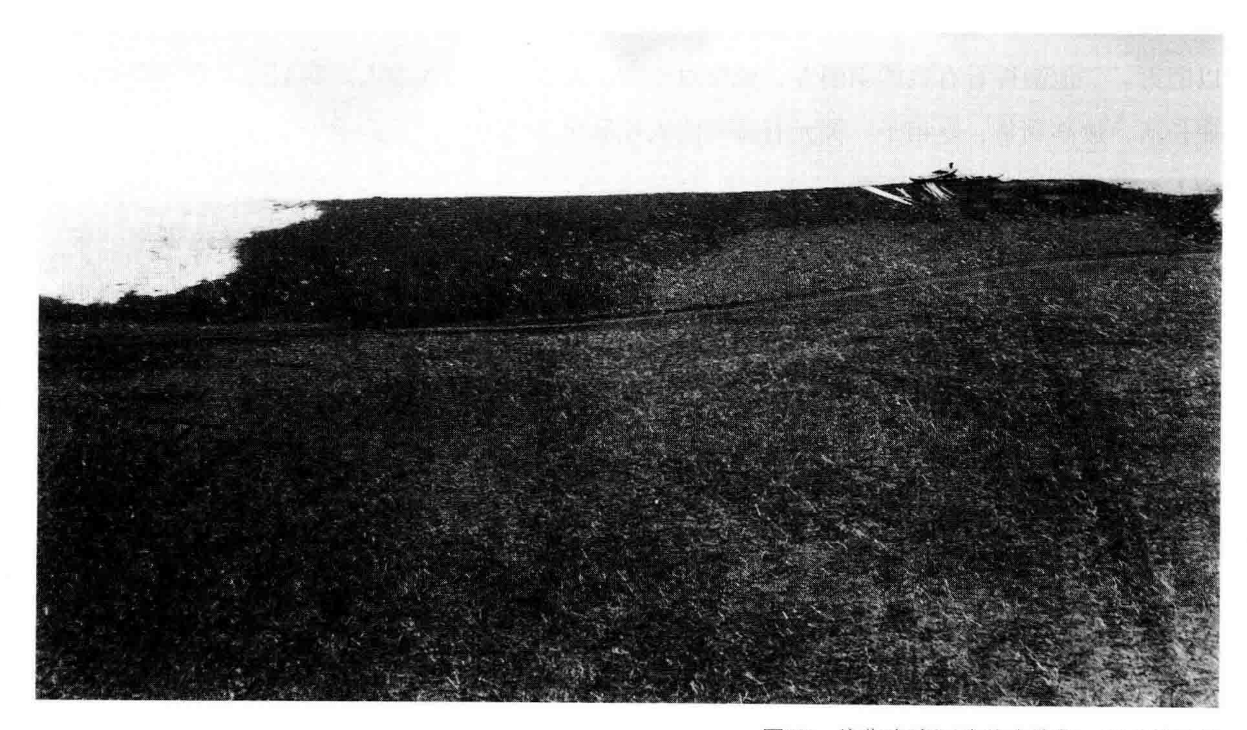


图60　停靠在滦河边的小渔船。2006年4月

那便是关元有的家乡。站在村庄西口的位置北望，只见滦河以近乎雷霆万钧的力量，从两岸高耸对峙的千山万壑中排闼而出，在村庄的西北面和北面留下一片宽阔的水面，之后马上又汹涌着朝东南方向流去。“小三峡”，这是今天人们对那里的自然景观的称呼。

王宝石附近的滦河里盛产野生鲤鱼、鲫鱼、彩鱼等几十种鱼类，村民自古依靠打渔为生，或在滦河上以拉船为业。车河口张凤树老人向我介绍过滦河上拉船的情况：“那时候交通不便，有的地方小毛驴还走不过去呢，就得使船。当时一条船长向得十来米，宽向大约两米多。船上面有帆，宽一丈五，高向有二丈多。帆朝上水使，下水使得少。刮风时使，没有风，得俩人在前头拉，一个人在后面掌舵。船上有个纤杆，一条绳子得二三十米长，线做的，每一股有筷子那么粗，用猪血血了，不沾水。行船时，好多地方得在地上爬着拉。一条船得有四五千斤，煤、盐、白面、大米，口里的栗子、梨，啥都运。家里有一分路子，也不能拉船去，是最低的劳动力了。”关元有早年即靠拉船为生，和同村一个叫关元士的青年合拉一条船，辛苦地往返于承德与滦州之间。“长方脸，大个子。那时候穷，土地没多少，还受人剥削，只好拉船为生。等到孙永勤一组织起来，人还不多呢，也就一二百人吧，他就参加了孙永勤的队伍。孙永勤是大军长，他是二军长。”2005年夏见到82虚岁的关元奎老人时，这位曾参加过四野并英勇负伤的老战士正在孤单地剁着猪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俯瞰不远处的滦河，可以看到紧靠河边的地方，有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那便是关元有家原来所在之处。关元有兄弟五个，他排第四，这在介绍高存时已说过。关元有、关元奎之间为叔伯兄弟关系，因为比关元奎年长不少，关元奎称之为哥哥。尽管非亲兄弟关系，时间过去70多年，关元奎对这位哥哥的记忆仍难以磨灭。“他懒得看有钱的剥削者，最反对地主、富农、剥削人的人。我们这儿有一个财主，雇长活，放高利贷，吃租子。关元有看到穷人挨欺负，不满意，就跟他干了起来。他只乐意看穷人，特别好替穷人打抱不平。”

因为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关元有在拉船至滦州时，打了红胡子，为此被关进狱中一年。“从滦州监狱回来后，家里很困难。”1986年11月，关元有侄子关恒现向佟靖功先生述说道，“孙永勤身背两把剑来了（疑为‘身背两把枪’的笔误——编者），那时我四大爷才回家。那次他们往北去，砸了上谷。”

关恒现接受采访那一年，关元有若活着，据说年龄应为87虚岁。如果这一情况属实，则关元有出生于1900年，比孙永勤小七岁，

关元有参加孙永勤队伍后，一直任副军长。另有说法，先后任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总队长，并且一直兼任参谋长。在1933年底至1935年5月孙永勤部队被“剿灭”的一年半中，他一直是孙永勤最为重要的副手和最为亲密的战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朱金城所说的关元有、孙永勤之间有亲戚关系可能有关。但孙永勤之所以非常相信他、器重他，我个人认为最主



要的原因还是：关元有是所有起义官兵中头脑最为冷静清晰之人。关元有曾为孙永勤部队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毛山战斗的最后时刻，他放弃突围机会，坚决与孙永勤并肩作战到底，直至流尽生命的最后一滴血，是一个永远值得人们纪念的人。

起义人员的增加，应该说令孙永勤亦喜亦忧。喜的是，他有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基本的力量——人；忧的是，起义人员需要给养，特别是枪。

“我父亲为了发展队伍，壮大抗日力量，单就为武器一样，就操碎了心。”在《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忆爸爸几件事》中，孙文伶回忆道：“有一次，我父亲听说黑河套的一个客店常有大烟贩子来往。大烟贩子从北边下来的时候，总要带着大枪和手枪。到这个店以后，就把大枪留下，只带着手枪，赶着大烟驮子，到关里去倒卖，等回来时，再把大枪带走。前几天，正有18个大烟贩子在这儿住过，现在到关里去了。我父亲就带着人跟店主要枪。店主不给，我父亲就治他一顿，他才被迫交出了18支三八大盖枪。”

孙永勤夺取18支枪的时间，是在正式起义不久，还是中后期部队已达数千人的时候，孙文伶在回忆录中未讲。然即便是在起义初期，18支枪对于到1934年1月人数已达到150余人的民众军来讲，也只能用“杯水车薪”来形容。重要的是，他虽一次夺得了18支枪，但那实在只是一个偶然，他不可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总有大烟贩子把枪送上门来一条路上。即使仍会有大烟贩子路过，在得知同道的枪曾被孙永勤收缴后，也一定会提高警惕，此后再从他们手中夺得武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寻找解决武器的新途径成为燃眉之急的问题。

在一筹莫展之时，孙永勤曾考虑把民间的火枪动员出来，并做了一些初步的摸底造册工作，但终因其威力实在无法与日伪手中的现代化武器相抗衡，最后只将其作为了迫不得已时的选项。任家庄任富老人说：“我们老爷子任福林说过，火枪开始置时，是养羊防狼用的。穷，也拿它打围。后来跟着孙永勤部队用。孙永勤把任家庄、崔家庄、赵家庄有火枪的组织成一块，有名单，想用火枪打日本鬼子，但火力上不行。以后，孙永勤说：‘组织你们时，就打。不组织你们时，就在家呆着种地。”

为情势所迫，孙永勤把目光放到了热南一带的大户，即大地主身上。

直奉战争后至“九·一八事变”前，为抵御土匪的袭扰，热河区域内，官府曾鼓励民间购买枪支以便自卫——这里的枪支主要指现代武器。但由于那里的人民生活普遍贫苦，一般百姓中能购买得起枪的人极少。即便像孙永勤那样比较富裕的农民，加入伙会之前，其表外甥史耀清说：“能趁个鸟子枪就了不起了。”热河地区能买得起枪的基本上只有一些大地主，依靠正当非正当的手段，积聚起了可观的财富。他们深知枪可以保命、枪可以保住财富的道理，为了让自己的富贵生活不受影响，纷纷通过官府配购或与军队、溃兵甚至土匪私下交易的方式购买了枪支。大地主们拥有的枪支数量少则二三杆，多的可达到二三十杆，视各自的经济实力而不

等。枪支种类涵盖了从洋鸟子、火炮这样的古老火器到单子、水连珠、马拐子、套皮等现代武器。总的来讲，越是富裕、有势力的大地主拥有的现代武器越多。以曾讲过的彭杖子大地主岳荫臣为例，由于财大气粗，守卫岳家大院的院兵不仅拥有湖北造等长枪，而且配备有当时人人羡慕的“盒子枪”，即毛瑟手枪。

孙永勤向大户募集枪支的行动，大多数人回忆是最先从张杖子大地主张如增家开始的。

张如增家位置在孙杖子庄西3华里处，今天的张杖子小学所在地即其家旧址。

“张如增在黑河、澈河等几个川是最大的财主，人缘不恶，是善财主。”史耀清说。

据张杖子、孙杖子的老人们回忆，张如增父亲那辈就已是承德、遵化一带较有名的财主了。到了他这一代，家业更加发达起来。

“我那时十来岁，记得张如增哥儿三个，老大张如增，老二张如辉，老三张如兰。上瓦房给老二了，下瓦房自己住，叫吉庆堂。”张杖子张廷云老人说。他所提到的上瓦房、下瓦房，也有人称之为上院、下院。下院的名字除“吉庆堂”外，还有“吉兴堂”、“积善堂”两种说法。张杖子张如山老人认为下院应叫“吉兴堂”，他说：“张如增、张如兰哥俩分家，张如增分得下院，张如兰分得上院。下板城往下，澈河桥往这儿属吉兴堂。”



图61　山谷中的建筑为张杖子小学，那里即张如增家旧址。后景重叠在一起的高山，左为黄土梁，右为马架山。2009年12月

“张如增家是前后四面斗房子，前后是正房，两边是厢房，门洞子在西边。门洞子外边是大道，门口用锁链子拴着俩大狗，看家狗，一般人不敢进院。”孙永勤率民众军到张如增家那一年，张杖子陈永会老人8虚岁，对张如增家的情况已有记忆。他的印象中，张如增是个“白胡子老头”。

张如增有子三人，长子张文弟，有的写成张文第，次子张文兰，三子张文辉。也有的说，老二叫张文辉，老三不知名字。

张如增之所以能发家，据说阴宅好是其中一个原因。孙杖子孙中彦说：“王善文是承德县八家乡庙梁村人。他父亲中过秀才，他自己从16岁开始就蹬凳子教书，是老私塾先生，会看阴阳宅、相面、袖口吞金，能使算盘开立方。听王善文说，张如增家祖坟是勒马横弓，坟在上瓦房上面的台上，阴宅好，所以才发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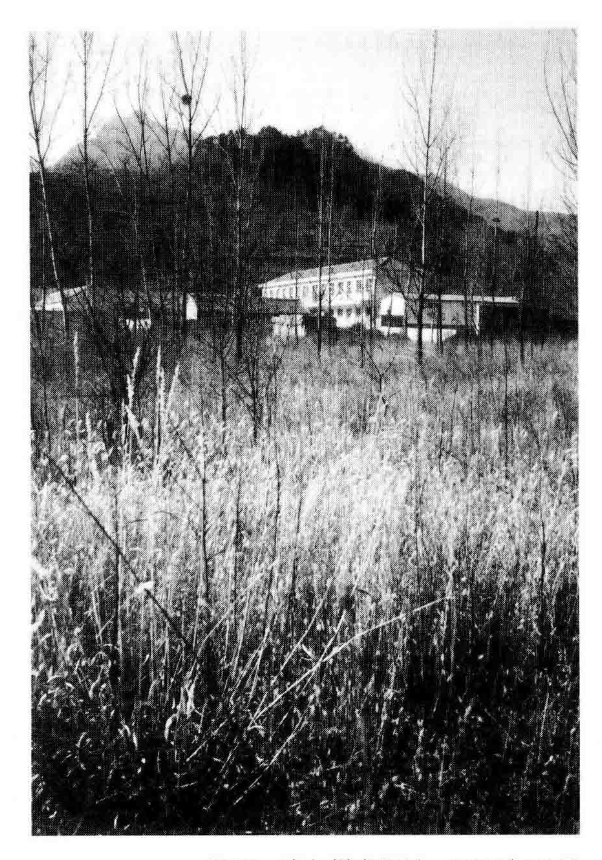


图62　张如增家旧址　2009年12月

“一开始是置地，上至承德，下至迁西，乌龙矶、车河口、潵河桥这一带的好地都是他的，再以后置铺子，这样发的家。”张廷云老人说。

张如增靠土地致富的具体方法是出租土地和放债。张如山老人曾回忆说：“我在张如增家中扛活，给他家放羊。我扛活时，他家中有20多口人，有5个长工。一大部分土地租给人家耕种，每年可收五六百石租子。”“张如增出名是靠吃地租，好几个掌柜的收粮食。柳河口有地，三台山地也是他的。潵河桥有俩烧锅，俩门市。他就靠地租和买卖发财，越来越多。不享福，弄俩钱都让土匪给抢去了，是土财主。”陈永会老人说。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张如增对待贫苦人和雇工并不太刻薄。张廷云老人说：“张如增是善财主，卖穷人柴禾，秤平平的。雇五六个伙计，一个是打头的，半个月改善一次，粳米干饭。平时都是一天一顿小米或者高粱米干饭，两顿稀的，菜一般是豆腐。”“张如增对穷人表面上都是有手腕的。”张如山回忆，“平时骑着毛驴，见人就下来，打招呼。谁家穷了，揭不开锅，吃顿饭不算啥。张如增到哪儿去都骑驴，见人下来问话。谁到他家吃饭不算啥，见到花子也说话。”“小老头，长得挺富态，留着小胡子。去潵河、遵化赶集时，不抽捞布袋子（腰带名——编者），那时有钱人都讲究。张如增跟他们不一样，他抽葛条（指用葛条当腰带——编者），两天干了，换，再用新的，不招摇。”史耀清说。

依靠灵活的经营手段，张如增积累了不少的财富。史耀清说他家“一天进个金元宝。雇着十二三个院兵，有大枪，有炮楼子。养活十二三匹骡子马”。“很有钱，”2006年4月，我到孙杖子采访时，孙杖子村委委员张青山说，“听我父亲和别的老人们讲，九缸十八锅的银子都还没找着呢。都是雇别人挖地道埋银子，一个哑巴夜里睡觉，白天专门负责清渣。”

张如增藏有“九缸十八锅银子”（有的说是“十八缸银子”）的说法在今兴隆县东部一带流传很广。2009年12月7日下午，我由承德县下板城坐长途车到孙杖子，车上还有乘客说起在张如增家大院旧址发生的有趣事情。“王宝石有个人在张杖子学校当管理员，发现墙里有地图，在瓦上。认为那就是张如增的藏宝图，但是看不明白。不明白怎么办呢，他一下雨就跑到外面地上看，说有宝的地方，地肯定先干。”

关于张如增埋藏的金银，还有一种说法：张如增大儿子的后代后来去了台湾。解放后，准确时间不清楚，开车来到张杖子，按图纸将几个金砖取走了。

张如增家有枪数量说法不一，有说30多支的，有说20多支的，也有说十几支，甚至几支的。这些枪都是张如增自己买的。“国民军打垮之后，张如增收了一些枪，护院用的。”张如山说。张如增雇佣的院兵都是中国人，日本占领热河后也是如此，这是他和大地主岳老亮的重要区别。

根据佟靖功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的调查，对张如增这样一个在当地百姓中评价不错的大户，孙永勤最初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在张如增面前，孙永勤是晚辈，他只身去拜访了他，对他说，大叔，我成立民众军了，您参加了吧。张如增不敢参加呀，说，三侄子，我支持你。但是我这么大岁数，怎么参加呀？孙永勤说，您不去也行啊，那您把枪给我，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抗战也算您一份。张如增说，三侄子，你叔哪有枪啊，你没看叔的脑门上带着土吗，脑袋上都带高粱花子，哪还趁枪啊。没给。孙永勤一看，这不行，跟我耍滑头啊。跟关元有一说，带出150人到张家去，跟张如增说，咱爷俩还是好说好道，我起义了，您是济困扶危的大户，我们暂时在您家吃住几天。张如增一看，150人在这儿吃住，心疼呀，但还是咬着牙挺着。好几天过去，都没给枪。孙永勤决定吓唬吓唬他，就对张如增说，大叔，您可考虑，您枪不给我们，就是要留给日本，我们先把张文弟带走，以枪赎人。当着他的面，把他大儿子张文弟绑走了。”

张如增大儿子被孙永勤带到了张杖子北面30华里的车河永合堂。当年参加行动的民众军战士孙文炳回忆说：“那时张文弟40多岁，当家人。我们把张文弟绑到永合堂，张文弟说我们有三棵枪，两袋子子弹。我跟孙永勤说了，孙永勤让一个队跟着把枪起了，让张文弟回家了。”

对张如增家交给孙永勤的枪支数量，除孙文炳三支说外，还有张如山“张如增、张如兰两家拿出24支枪”，其中张如增家拿出14支大枪、两把手枪说，孙文阁回忆张如增拿出30多支枪说。



“我参加一个多月，开始就到张杖子张如增家，在他家吃住好长时间。张交了30多支枪，弄了五六百斤银子（原文如此——编者），还得了一些衣物。”1983年6月1日，孙文阁向到访的栾福忠、邢连义先生说。在同次采访中，他还提到：“张杖子打了之后，粮食分给穷人。”

交枪之后，张如增、张如兰据说便搬到潵河桥居住了。有说法张如增最后病死于北京，张杖子陈永会老人说他实际病死于张杖子：“1945年前后死的，病死。实行土地法大纲，挨斗时，就死了。大儿子叫张文弟，老二叫张文辉。老三死得早，媳妇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后，他就死了。老三媳妇被人叫做‘三寡妇’。张如增活着时，老三媳妇就已经是寡妇了。老大的孩子当了国民党，八路军来了，跑了以后就当了国民党，土地法大纲宣布后就跑台湾了。老大大儿子叫张奎元。老二几个儿子都当八路军。大儿子叫张奎武，前几年来过张杖子，在保定。张如兰死在北京，他媳妇在实施土地法大纲时还挨过斗。他早就去北京了，始终没回来。”

张如增在张杖子立有一个私塾，塾师杨佩之于1934年冬被孙永勤聘入军中，担任了他私人的文化教员。

“第一仗，缴枪，赢了。孙永勤想，这么点枪不行啊，就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募枪，一是压枪。”佟靖功先生谈及孙永勤在张如增家收枪以后的情况时说，“募枪，跟大户好说好道，争取你主动拿出枪来支持抗日。募枪不成就只好压枪，逼他，施加压力，想方设法得把枪给我，这叫抢先收枪。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孙永勤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出政权，但是知道拿枪才能抗战。”

募枪是种和平的动员方式，无可非议，压枪则具有强烈的暴力色彩。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征集枪支的方式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前曾被热河各地的伙会、民团广泛采用，它是为了抵御土匪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枪作为当时一种昂贵的防身用品，普通百姓买不起，买得起的富户有时不采取强硬手段也轻易不会将枪拱手送人。伙会、民团最初的压枪行动由于考虑到乡里情缘，尚比较温和，一般是一队人马开到富户家中，吃住全由他供应，寄希望于富户由于担心被吃穷，主动将武器交出。后来鉴于不少地主比较顽固，自忖有官府或土匪做靠山，丝毫不将伙会放在眼里，伙会也被迫借鉴了土匪的一些做法，诸如绑架、烧房等。孙永勤在起义之前，担任伙会副会长期间，为募集枪支和伙会日常活动经费，曾采取强制的方式对待过一些地主。成立民众军后为解决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枪支，又被迫采取了向大户募枪，特别是压枪的方式。

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除张杖子张如增家外，他至少还从孙杖子孙永彦家、城墙峪张奎一家、二堂高作忠家、罗圈沟孙永香家、塌山杨秀山家、大杖子老毛家、车河口老姜家、潵河井连芳家、瀑河口老任家、尖宝山老周家、北峪子董大天家等地主富户家中压出过枪支。由于以强制的方式从这么多地主家中要过枪支，表面上与土匪行为无异，以致自他起义至今天为止近80年的时间内，在一些大户眼中，甚至一些不了解实情的善良百姓心目中，孙永勤的形象带

有“土匪”色彩。

“孙永勤起义那个地方叫黄花川，隔着一道梁就是我的家乡车河川。我是1938年生人，和孙永勤起义就差着三四年的时间，所以孙永勤的名字我从小就知道。当时的说法叫孙永勤‘起匪’。”2005年6月，我到承德市采访，原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邓一民先生说。

阅读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20世纪下半叶所做采访记录的原稿，并到热河南部孙永勤转战过的地方进行调查，我发现，原热河地区民间对孙永勤起义不是只有“孙永勤起匪”一种叫法，尚有“孙永勤拉绺子”、“孙永勤起绺子”、“孙永勤闹绺子”几种称呼法。土匪即绺子，绺子即土匪，那么真实的孙永勤是否一个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土匪呢?

“听老年人说，孙永勤在‘满洲国’建国以前，到这庄来过。”2005年7月，我在兴隆县三道河乡偏岭子村见到了76虚岁的退休教师高印萱——曾被孙永勤压过枪的名叫高作忠的大地主的孙子，他向我讲述了孙永勤和他家的一些故事，并阐述了他作为“受害者”后代对孙永勤的看法。“高作忠是我亲祖父。我父亲他们哥六个，我父亲是老大，因为这个缘故，我比其他房里的大一点，祖父死时，我已经记事了。我爷爷在兴隆来讲，是首屈一指的大户，趁一点土地，雇十来个伙计吧。土地不是自己经营着，挺分散的，哪儿都有。比如说迁西有一架松山，给置过来了，那你没人看着不行，就找那近处穷困一点的，土地白经营着，养牛羊也行，或者出钱给你买点牛羊，帮助看一下松山。据说迁西、兴隆、遵化三县都有我们家的土地。

“孙永勤头一次来，我爷爷一听说来不少兵，知不道咋回事不是，害怕，就跑了。孙永勤还没到呢，就把我们这小小子、小丫头全送到遵化去了。我们家在遵化县城里置有房子，那时候一不安定了，就跑遵化。遵化有城墙不是，省得让人绑了去。不光我爷爷高作忠害怕，跑了，这庄人都跑净了。那时这地方没有这么多庄院，总共才18户，就高作忠趁点瓦房，其余都是小草房。夜里睡觉，就是来个小蟊贼都吓跑了。蟊贼跟你要东西，腰里掖着个钱勺子，用红布包上，就说是枪，吓唬你。他们的动作都一样。跟孙永勤不一样的，蟊贼是为个人要点钱。比如你卖粮食，使出钱来，在瀓河桥让他知道了，黑夜就来找你，不给不中，得了钱他自己要。


图63　高作忠之孙高印萱　2006年4月

“孙永勤见庄里一个人都没有，就把房子给点着了。那意思是，看你下回还跑不。房子烧了就更不敢回来了。后来，孙永勤把家里人传了去了，要

家里人拿银子赎。据说我父亲他们都让绑过，绑到黄酒铺儿那有个地方叫金銮殿，是个小山，上面只有两户人家，他们长期在那儿住着。我父亲叫高景岐，当时30来岁。1957年我在大水泉乡黄酒铺当小学老师，刚到时，晚上开群众会，金銮殿村民讲：'把大掌柜的绑到这儿，我伺候来着。当时不绑着，跟军官吃一样的东西，达到目的就放了。'被绑的除父亲外，还有叔叔等几个人。

"我爷爷带着我们跑了。可不能一个劲跑哇，你这土地都在这儿啊，还得在这儿生活呀。后来逐步和当地的亲戚朋友，能和孙永勤挂上线的联系上，让他们当中来回跑道。问：'你找大家主什么目的，是要他命啊，还是要他钱、粮食啊？'一了解，他的目的是，他需要武器，得买，需要开支。你趁钱，给点钱。穷家主你也别跑，也不用你，当兵你乐意去就去，不去也不抓你。你只要给钱，就放人。为了钱好办，家里借借啥的，给了，就把人放回来了。后来经过两回，知道他把你绑去不是为了把你崩了，也就不跑了。等后来，发展大了，日本子再一进中国，目标是跟日本子打了，孙永勤就越来越得人心了。站在老百姓角度讲，他豁出来了，等于是给老百姓卖命的了，这样对于孙永勤，感情自然就全好了。说出多少钱我都愿意了，你打日本我沾光呢。这样矛盾就缓解了，对他就没有恨了。以后，不光孙永勤，高作忠掏过钱，杨二等过来，都掏过钱。据说杨二等都绑过高作忠，目的都是要钱。

"可以这么说，孙永勤起初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他是由于打日本才发家的，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孙永勤属于民族英雄，是抗日的，但要按现在来讲，他当时舆论宣传工作不到位，所以大家起初对他并不了解。"

高印萱对孙永勤的看法是很中肯的，他点出了孙永勤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农民武装的领导人所存在的局限之处。事实上，不仅仅是高印萱注意到了这方面问题，检阅积存至今，已有几百页的孙永勤调查资料，可以发现，包括民众军参加者、普通百姓在内，很多人在将孙永勤的队伍与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对比后，都指出了孙永勤队伍存在着问题：①就像高印萱所说的，用简单的暴力代替舆论宣传和思想工作；②纪律不严格。

先说第一点。史耀清提到孙永勤队伍中有"秧儿房"。这应该是借自土匪的一个用语。"秧儿"即人质，"秧儿房"即关押人质的地方。在孙永勤部队中，指关押被绑来的富人的地方。但秧儿房并不是在孙永勤所有部队中都存在，据说它只在总部才有。史耀清的哥哥史耀华当年在军法处（一说是监察班），专门负责看押犯错误的官兵、俘虏、秧儿等。2007年4月15日，我采访史耀清时，他说："孙永勤的枪都是跟地主压出来的。那时候，他从哪儿得枪啊，除了打死日本鬼子了，得点枪，再就是从地主富农那儿压出来点。那时候户大点就养枪，都是连珠、套皮、马拐子之类的。黑夜去抓几个大户来，审，要枪。没有枪，揍，使皮带鞭。我哥哥那时就管看他们，当时都管他叫黑小子，据说打人狠着呢，都怕他。大户'翘杆子'了（指

逃了），有家属啊，‘哪儿去了？’‘出门子了。’‘看起他来！’绑了去就揍。交了枪就放了你，没枪交钱。弄不出来的，走哪儿带哪儿，几天交不出来，就拉出去埋了。”以上的情况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难以置信，但以比较强硬的手段对待秧儿的事例确实有。2007年4月21日，即采访史耀清后的第六天，我到承德县老梁采访，当年80虚岁的李振庭老人讲到，1935年春，孙永勤率100多人在老梁上驻扎，“都上外面绑秧儿去。大米、白面、钱都得送，不送，秧儿就不放。老三他们那儿有一个秧儿房，李长瑞那儿还有一个。打呀，那罪受的。爷爷李忠那时候给他们做饭，不做不行。一个人耳朵差点被割掉，就连着一点。爷爷看着可怜，就拿糨子给粘了粘，还好了。”处死拒绝交枪的地主富户家人的事例在民众军战士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1983年6月1日，孙文阁就曾对前来采访的栾福忠、邢连义先生说过：“城墙峪财主张奎一有枪，交出四支，还有五六支枪，没有交够，把其过继的儿子枪决。”

需要说明的是，秧儿或地主富户家人受到极端对待的情形，有可能大部分是在孙永勤不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已退休的原兴隆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闻成先生20世纪70年代在兴隆县孙杖子区任区长，曾到宽甸检查过工作，并住宿在当年孙永勤住过的农民家中。2005年1月，他在接受我采访时，讲了如下一件事情：1934年春，当时孙永勤带领一二百人驻扎在宽甸。一个有手枪的人被抓去，让他交出来，这个人不交。“赵四川鞭打，孙永勤看见，问为什么打老百姓？赵四川说他有枪不交，孙永勤说拉倒吧。”

再说纪律不严格的问题。参加过民众军的孙文炳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党史工作者采访时说，孙永勤部队“没有好的纪律”。曾任孙永勤部队第八队长的单忠英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采访时也说，“孙永勤有两下子，但不细致，没有八路军那样的纪律”。2007年，我在遵化东北部采访时，当地群众也提到孙永勤队伍在后期存在着纪律松懈的问题。不如八路军纪律严格，似乎已成为人们对孙永勤队伍的共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孙永勤起义之前就已存在了。在2007年4月15日的采访中，我曾向史耀清老人问起一个情况：1933年夏季，伙会分了大成兴财产后，孙永勤是如何处理带回去的戏班的。老人说，有的旦角就被一些伙会会员带往山沟沟里“采花”了。虽然孙永勤不采花，并且明确对伙会会员说过，“每天打仗，你采花就挂花”，他们也明白“让大柜知道不行啊，真崩啊”，但孙永勤不可能每时每刻都盯着他们。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孙永勤起义后。孙文炳回忆说，孙永勤有命令，“不许动老百姓一个手指，一把草节”。单忠英回忆说：“孙永勤讲话我听了很入耳，‘我们民众军不许动老百姓的东西。我们吃老百姓，喝老百姓，老百姓反我们，我们就没处呆，呆不下去。’当时没有共产党八路军那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让我们不许动百姓的东西。孙永勤说，‘谁动老百姓的东西谁犯错误，谁抢东西谁是要开小差。不许奸淫妇女。’”尽管有如上的命令、要求，全军那么多官兵，特别是到1934年后半年，队伍一下子扩充到5000多人，一些无赖、游手好闲之徒趁机混入其中，

发生影响队伍声誉的事，孙永勤是无法完全控制的。“孙永勤不抢，他革命倒是革命，就是管得不严。他手底下抢东西，他知不道，都瞒着他不是。”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陆翠芝老人说。

对于以上孙永勤、孙永勤队伍的局限性的问题，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拿孙永勤牺牲几年后才出现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作参照来看待孙永勤和他的队伍的。如果我们注意到，孙永勤是在《水浒传》、《说岳全传》这样的民间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热河地区自清朝同治皇帝登基起至孙永勤起义的七八十年间，土匪蜂起，土匪文化浸润到热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孙永勤在领导伙会抗匪和成立民众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借鉴了古代豪杰和当时土匪的一些术语乃至行为方式，乃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不能因此就说孙永勤就是土匪。

原因有四：

一、孙永勤十分痛恨土匪，与土匪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势同水火

很多民众军战士在回忆录中都讲到，孙永勤经常教育他们不要学土匪。“有一次我想家了，”孙文阁1983年回忆说，“跟孙永勤请假，说我母亲病了。他说：‘明天回来呀，不许强奸妇女，土匪才强奸妇女。’”在《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忆爸爸几件事》中，孙永勤长子孙文伶讲过两件事情，反映孙永勤对土匪做法不留情面：“有一次，我父亲得到侦察报告，说一个中队队长陈志在外面又抢了老百姓的两驮子东西，准备偷偷送回家去。那天晚上正好有月亮，我父亲骑着马，带了四个人，去堵陈志。我父亲看到陈志过来了，就大喊一声：‘陈志！’‘有！’陈志的话音刚落，我父亲的手枪就响了，正打在陈志的腿上。警卫员把陈志拽下马来，摘下帽子绑上了。经过详细了解以后，知道他屡教不改，最后处决了他。还有一次，有一个姓陈的班长到车河口去抢，在路上把一个姑娘的包袱给抢了，还强奸了她。这个18岁的姑娘是个孤儿，靠表哥支撑着过日子。表哥领着这个姑娘来到黄花川下面的车河沟找军长。站岗的赵文义不让他们进，这姑娘就说：‘军长要不管这事，我就死在这儿！’赵文义没法，只得进来报告我父亲。当时我母亲也在军部，就把这个姑娘请进来了。这个姑娘进屋就给我父亲跪下了。父亲让她起来，问清来由，说：‘你认得这个人吗？军法不留情，杀错了可不行啊！’姑娘说：‘认得！’我父亲下命令立即集合。队伍集合以后，我父亲的警卫员孙文深拔出手枪，领着那个姑娘一个一个地认。等认到五六排的时候，姑娘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姓陈的。警卫员上前把他从队伍里拽出来，问我父亲：‘怎么办？’我父亲命令把他绑上。警卫员上前一脚，就把那个姓陈的给踹倒，用五花大绑给绑上了。带到屋里，问清了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以后，就开了大会，枪毙了这个班长。姑娘感动地给我父亲跪下了，还大声哭起来。我父亲忙扶起她，指着关元有和赵四川说：‘这都是你的叔叔。’最后，我父亲送给这位姑娘五块现大洋，关元有和赵四川也都给了她三四块现大洋。因为天要黑了，我父亲还派了一个班，护送她们哥儿俩到车河的化鱼沟。”

二、孙永勤的暴力行为只针对地主，不针对穷人

所有的采访都表明，孙永勤只对地主非常不客气，但对贫苦百姓却从来是爱护有加。“孙永勤只要知道地主有枪就收，不给不中。先是绑人，给枪就放，不给枪就打死。大地主的东西可以动，不给不行。坏人可以抄家，不用事先报告。不许动老百姓一件东西。一个战士鞋子坏了，找老百姓换了一双鞋子，孙永勤让找军法处处理。队伍主要是吃地主家饭，让他们送粮送米。吃老百姓家里的粮食要记账，和地主要来再还给穷人。”孙文炳回忆道。“孙永勤和我们经常讲：不许拿老百姓东西，吃饭要吃有钱的，不客气，跟八路一样。有时候没鞋穿，但不让孙永勤知道，跟穷人要，他要知道就得挨处分。财主家的东西可以动，不给不行，不管是谁。”孙文阁回忆说。

孙永勤为什么唯独对地主坚决不放过，原因说起来也简单：除了地主才能拿出他急需的枪支、粮草外，当时有很多地主为富不仁、对穷苦人非常苛刻是主要的原因。“那时候哪儿有善财主，跟电影里演的地主差不多，都是那样的玩意儿。”经历过旧社会的陆翠芝老人对我说道。孙永勤本人家里比较富裕，他深知地主剥削农民的伎俩。而他曾遭受大地主岳荫臣迫害的经历，则使他对地主与统治者相互勾结、沆瀣一气、鱼肉乡里的本质有更深切的理解。因为这些原因，孙永勤对地主不讲情面，凡被孙永勤要过枪、粮的地主，内心中也大都对他有仇视情绪，但在底层大部分贫苦百姓中，孙永勤却赢得了很好的名声。“老百姓都拥护，他打日本不是。日本进中国，老百姓都膈应不是，那咋不拥护。他到哪儿吃哪儿，没给养，都吃地主富农。贫农没粮食，他也不要。”史耀清老人说。“他是这么一个人，富有正义感，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替老百姓出气。哪家为恶作歹，他就找哪家，杀富济贫。我一小记事，就听人讲起他，老百姓都说他好，都佩服孙永勤，我对他也是相当佩服！”宽城塌山乡塌山村王胤淋老人说。

三、孙永勤并不只对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地主不客气，自己的亲属也同样对待

1983年6月1日，孙文阁曾向栾福忠、邢连义先生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我们到王宝石去，路上正好碰上他妹夫。他妹夫叫关仁和，是个财主。说了几句话，关仁和刚要往下走，孙永勤就说，捆上他，叫他把枪交出来。弄了四支枪。凡是财主都先捆上他，交出枪来，拿枪放人。”

1986年11月22日，史耀华向佟靖功先生也讲过一件事：1933年腊月底，打完半壁山警察署几天后，孙永勤率民众军来到了城墙峪张老店家。“张老店是孙永勤的亲妹夫，他家开杂货铺、裁缝铺。200来人住了六七天，孙永勤问他妹子：‘我来六七天了，干啥来了？’妹子说：‘住妹子家，管得起饭。’‘你管得起，我住不起，你把枪拿出来吧。’‘没有。’‘胡说！’问外甥媳妇，外甥媳妇说：‘没有。’问外甥，外甥说：‘没有。’孙永勤让我们用鞭子打他外甥。打死二三遍了，孙永勤说：‘不用费这个事，毙了他。’孙永勤把枪拿出来，拉出去要毙。他大外甥说：‘三舅呀，枪有哇！’他妹子跪下，孙永勤说：‘我踢你下巴，我要起不出枪来，我们就自消自灭了！’他们家拿出七棵枪，六棵大枪一棵匣枪，跟去了七个人。”

四、孙永勤具有罕见的仁义性格


图64 通往舍身台之路 2009年11月

2006年4月，我到遵化小厂乡采访，小厂乡信访办信访科员吴艳民（小于沟人，当年孙永勤司令部曾安在他家）对我说："听说孙永勤特别孝敬，到哪儿看到上年纪的妇女，就谈他妈如何如何，特别尊重上年纪的妇女。对他有好处的人，比如说挂花了，有搀他的，给他裹绷带的，好了，他就给人磕个头，包括妇女。"

即便是地主阶层，孙永勤也并不完全是仇恨对待。

1989年1月21日，高印臣老人向佟靖功先生回忆："有一年冬天，没穿棉衣裳呢。后晌，我给孙永勤带路，我给扛一捆枪，还有一个潘家口的人给扛一捆枪。当间儿有瀑河口的小'秧儿'，小男孩，13岁，瀑河口财主家的，孙永勤认他是干儿子。敌人从杨树林往这边打炮，我们往舍身台撤。走出二里多地，打来一个炮弹。那炮弹从我身边飞过去，我当是一个野鸡呢。'当'，炮弹一响，把那小秧儿崩死了。后边两个民众把小秧儿抱起来，小孩已经没气了。我们到边关上，孙永勤他们从后边赶上来。孙永勤说，小孩胆小，没死吧？结果还是死了。孙永勤好哭，说这是我的干儿子。"

2008年7月14日，我到宽城县采访，原宽城县委党史办主任杜青怀先生对我说："1934年农历五月十五日（公历6月26日），孙永勤因很多士兵徒手，便请李志芳（下板城岔沟人，清西县副议长）支援部队一些武器。李志芳共给了大枪10支，子弹200发，让韩广和带走了。后来孙永勤专门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去感谢。"

"孙永勤是好样的，他是跟老百姓一心哪，为了打日本鬼子啊！"郝家营陆翠芝老人在我问她怎么看孙永勤时评价说。

"说孙永勤是匪我不爱听，人家也是为了杀富济贫，革命嘛！"罗圈沟孙守印老人明确地说道。

上述四点，构成了孙永勤与土匪的重大区别。由于上面的原因，被日伪及不明真相的部分百姓加在孙永勤头上的"土匪"罪名应得到彻底洗刷。

赵来之死

“日本鬼子和中国汉奸看到永勤拉起了民众军，又急又气，又骂又跳，想方设法要想消灭民众军这支抗日力量。有一天，土匪头子刘宗臣、大王龙和小白龙他们带领不少队伍围攻黄花川。永勤得到情报，就立即拉着队伍，到半路上截击这些土匪武装。经过一场恶战，打退了土匪，保卫了家乡。”

1980年前后，雷永兰在接受从言已采访时回忆，民众军成立不久，孙永勤便与土匪打了一仗。这一仗的准确时间雷永兰未讲，根据上下文来看，应是在车河口战斗前。

车河口战斗是雷永兰以外，绝大部分民众军记忆中，孙永勤起义后所打的第一场仗。

“一京二卫三车河口。”车河口在孙杖子北面50华里处。从海拔1475米的五凤楼山北麓发源后，车河在燕山山脉中沿东偏北方向穿行近50华里，之后与柳河及滦河相遇。三条河流汇合在一起，形成一处十分宽阔的水面。水面的南方，有座山叫南山，当时的车河口庄就坐落于南山根下。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要修建潘家口水库，水库建成后整个车河口庄都将位于淹没区内，在政府的安排下，村庄于1972年整体搬迁到了名叫“东北山”的山坡上。“原来车河口有100多户，‘满洲国’时是有名的水陆码头。大买卖不少，有卖盐的，也有卖香面子的。香面子是从东北地方驮来碗口粗的木柴，把木柴劈开后，用水磨磨成面。那时候都使骆驼驮。以后解放了还运呢，使大木头车。船也挺多，从承德到滦州，拉船的不少。”罗凤书老人回忆车河口曾经的繁华景象时说。

车河口成为水陆码头有多少年历史，今天不能准确得知。根据《兴隆县志》介绍的情况，它最晚在明清时应已成为码头。再往前追溯的话，有可能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利用滦河水道将寿王坟的铜铁运往内地时，便已成为码头。车河口能够成为码头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是三河交汇之处，不论是简单的出行，从车河、柳河、滦河中任意一条河的方向前往另外一个方向，还是有些复杂的商品流通，将承德一带的皮毛、中药材、苇席、蚕丝、干鲜果品等通过滦河运往长城以南，将关内的布匹、化妆品、农具等日常生活用品从滦州运往下板城、承德，都必须经过车河口。由于这个缘故，车河口成为燕山腹地一个十分重要的水路枢纽，店铺众多，舟樯林立，人马、骆驼过往不息。日本侵略中国，建立伪“满洲国”后，深刻认识到车河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那里专门设立了一个警察分驻所，隶属伪下板城警察署管辖。

车河口警察分驻所的地点，据车河口庄辛连海老人回忆，“在原来马文华那院”。分驻所的房间数，有三间说、十来间说。伪警察的人数，有五六个说、八九个说、四十多人说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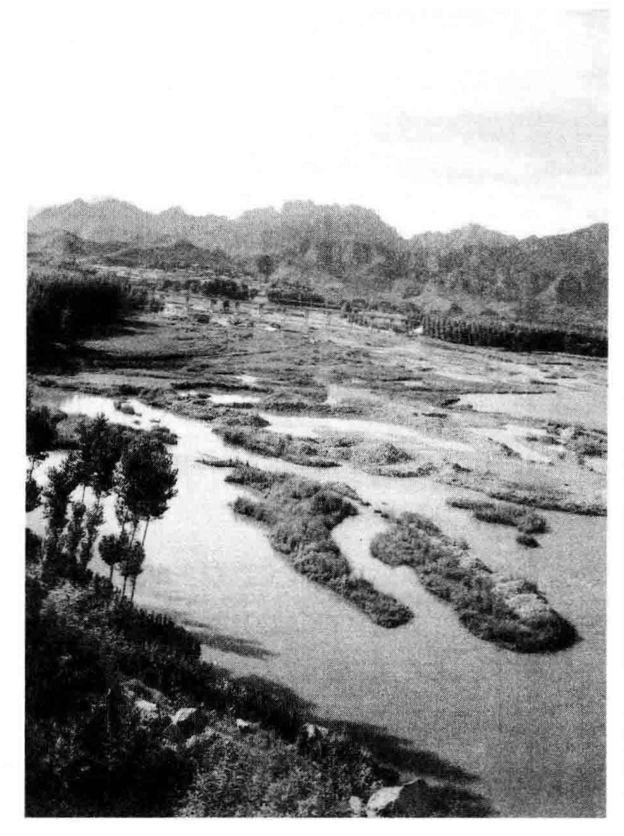


图65　车河口车河、柳河、滦河交汇之处，后景村庄为今日车河口村所在地。2008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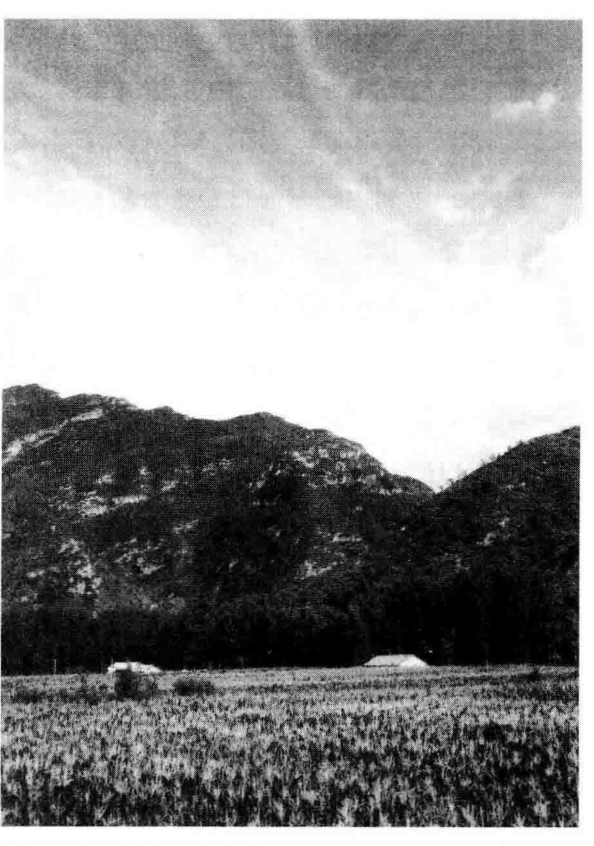


图66　修建潘家口水库前，车河口村所在地。2008年7月

“黑衣裳，大盖帽”，对伪警察的服装似乎无异议。

车河口战斗的打击目标正是车河口警察分驻所。它成为民众军的攻击对象，有两方面原因：

一、自热河省被并入伪“满洲国”起，它就成为了在伪满西南“国境”地带执行日伪残暴统治政策的急先锋。不论日伪颁布“铳器回收”政策后，到黄花川等地收缴民间武器，还是与岳荫臣勾结，以“抢劫大成兴”、“私藏枪支”罪名追捕迫害孙永勤，都有车河口伪警察积极参与。在孙永勤以外的其他百姓心目中，它也民愤极大。“警察和国兵不一样，国兵是挑去的，警察是自愿去的，警察坏。”高印萱说。我采访孙永勤事迹的几年中，遇到的几乎所有从伪满时期生活过来的老人都表达了对伪警察的愤怒情绪。“警察没好的，除了使黑钱，就是克扣老百姓。‘你姓啥呀？’‘姓啥姓啥’，告诉他了。过几天拿本来了，找到甲长、牌长，带着他们找你，说你投靠八路军。‘过几天到哪哪哪’，要多少钱，你就得给，不给就给弄车河口局子去了。烙铁烙，铁棍子烧红了，烫。灌煤油灯水，啪，拽一仰巴跤，人一倒，煤油蹿出很多。”日本投降时，车河口张凤树老人已18虚岁，亲眼目睹过许多伪警察残害无辜之事。2007年4月，我到车河口采访时，他向我讲了上面一番话。举的例子虽是1938年之后的事，但

实际上当地伪警察不仅仅是在八路军挺进热河后才如此，在日伪统治热河的十余年中，车河口伪警察，也包括其他地区的伪警察，很少给人民留下过好印象。“警察到处勒索。”兴隆大杖子乡大杖子村关元会老人1941年被伪满征召入伍，以前国兵之眼对伪警察作出了评价。

二、孙永勤攻打车河口警察分驻所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要获得那里的武器。“赵林、赵来在孙永勤队伍里当中队长，一正一副。”赵家庄赵廷良老人向我介绍车河口战斗来龙去脉时说，“赵来的亲兄弟赵福给日本干事，在车河口局子，是副局长。说有七八棵枪，让赵来带人去。去了之后一投降，就把枪给他们了。结果事败，黑夜把赵福调走了。”

攻打车河口警察分驻所的时间，据郝家营郝士玉老人回忆，是农历腊月一日，换成公历，为1934年1月15日。

战斗过程，史耀华回忆是：“腊月，我去后第一次打仗是打车河口警察分驻所，有八九个警察。半夜围住的，挑哨（即黎明——编者）开火，打了两个来小时。两个警察跳井，抓住两个警察，一个姓刘，其余警察跑了。得了六七棵枪。”郝士玉回忆是：“腊月初一日，孙永勤集合20多人到车河口来了。警察分驻所40人，孙永勤20多人分三四股，黑夜一放枪，警察吓得都跑了，赵来死了。车河口10多间瓦房安警察局子，孙永勤把那房子都给烧了。”

车河口徐敬礼老人当年12虚岁，目睹了攻打车河口的部分情景。据他说，他当时正坐在自家炕上，透过窗户，清楚地看见孙永勤等人从南山西边的坟茔沟进了车河口街，一共18人。“白天压下来，黑夜打几枪，把局子警察打跑，第二天发现赵来尸体。同一宿打了老岳家杂货铺。”

攻打车河口警察分驻所的战斗中，孙永勤队伍有两人牺牲，一个是郝士玉、徐敬礼老人说到的赵来，还有一个是赵成。

“先打死赵来，后打死赵成。”车河口张凤树老人说。赵成的准确情况不清楚，赵林之孙赵文忠回忆，他有可能是赵来的哥哥。“赵成可能是老大，赵来老二。”2010年8月18日，赵文忠说。

“柴先生推八门，说那天不让出兵，伤属虎的。赵来属虎。结果当官的不听，那天走了，赵来死了。”赵廷良说。

“辛连成早上起来，从赵来身上踩过去，吓一跳。”车河口辛连海老人讲了赵来尸体发现经过。

“有人说赵来是孙永勤的大队长，我们这边人说，赵来是孙永勤的文书。”1988年12月13日，赵来之子赵廷江在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说。

赵来的牺牲过程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版本。

1．见之于赵林之子赵廷山1983、1988年分别向栾福忠、佟靖功先生所做的回忆。

整理后，大意为：下板城警察署有个署长叫陈敢干，绰号“陈混蛋”，他派赵来的弟弟赵福出差，说服孙永勤解散民众军。赵福没能说服成功，当夜便住在辛家庄辛增祺家了。陈敢干

领着警察王岐山、村丁杨小峰等人去打孙永勤，骑马与孙永勤等走了个对面，由杨小峰开枪把赵来打死。孙永勤等未来得及把赵来的尸首抢走，日军就赶来了，不得不撤走。日军在赵来的怀中发现了民众军的名单，上写孙永勤、赵林、赵有、赵存、马保德、柴启瑞等人的名字。后来警察抓了辛增祺，把他枪毙了。

赵廷山提到的陈敢干，有的说是迁西人，有的说是平泉人，有的说是日本人，认为他是中国人、长城南面的居多。彭杖子徐文林老人说他："二型个，五六尺高，不高不矬，长方脸，爱骑小毛驴，人还中了的。"车河口辛连海老人说他："30来岁，人长得相貌不恶，对老百姓不好。"杨树洼张福玉老人回忆他是"平泉人，恶着呢。"赵家庄赵廷良老人说他是日本人，"赵福、杨小峰给他当差。大高个，得有一米七八，圆盘脸，连鬓胡子。不管对不对，就揍一顿。什么都干，勒索民财，强奸妇女。修部落墙，限多少日修好，陈混蛋差点拿刀把赵家庄人全砍了。原来这一带都归他管，有时在柳河口，有时在下板城，骑着马。后来调走了。"

2. 见之于杨秀琴1988年12月13日对佟靖功先生的回忆。

需要注意的是，她记忆中的车河口之战日期是赵林、赵来从老梁突围出来后。杨秀琴说："赵来是文书，赵来、赵福亲哥俩商量里应外合。赵来他们进去了（指赵来带民众军进入分驻所院子——编者），把警察堵在屋里。赵来以为赵福在里边，就没先开枪。结果警察先开枪，把赵来打死了。赵来死时，脑袋上还带着枪子，疼得咬地，牙都咬掉了，挠地，指甲都挠没了。赵福当时被调走了，那夜宿在辛家庄了。"

2007年4月18日下午，我到路通沟任家庄采访，任富老人讲述了与杨秀琴所说几乎相同的版本，细节稍微丰富了一些。"夜里，孙永勤、赵来带队伍来到大杖子车河口。赵来以为赵福还在警局子里面呢，就在外面叫号，怕打着他兄弟，其实赵福早跑下板城了。屋里的人听见赵来一个劲儿在外面喊，就说，咱们这么多人，怕他？就把门打开，走出来。见赵来端着枪，靠墙站着，开枪就把他打死了。赵来死了还端枪站着呢。按我们老爷子的说法，对赵林、赵来评价都不低。日本人烧杀抢，谁不恨哪，房子烧了，连墙都给推翻了。"

杨秀琴、任富版本均将赵福指向了叛变者。据赵家庄赵廷良老人说，赵福因此在八路军进入下板城地区后，被枪毙。"一九六几年'四清'时还倒腾这事呢。"任富老人说。

赵来的遗体后来被葬在他的家乡——赵家庄村南的山梁上。2005年夏，当我在赵林之孙赵文忠的带领下，从赵家庄的东南角登上这座有些陡峭的小山梁时，只见赵来的坟墓静静地置身于一大片玉米地中。六月的太阳灼灼地烤着湿热的土地，微风吹动油亮的玉米叶发出飒飒的响声，站在爬满了青草的坟墓前，我看到赵文忠几次差点儿流下泪来。

赵来是最早跟随孙永勤起义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首次战斗，他即遭遇不测，令孙永勤非常悲伤，愤怒的他命令战士不惜一切代价将警察分驻所攻下。"警察局子人少，"车河口张凤

树老人说，“孙永勤他们把局子砸了、烧了，警察跑了。接下来打煤局子。”他所说的煤局子指的正是岳荫臣在车河口开的大成兴炭局子，也有人说它是杂货铺。“进了大成兴，孙永勤说，赵老子在这儿么？说在这儿。到了外屋地，孙永勤一枪把赵老子打死了。”史耀华回忆道。

打死赵老子后，有说法孙永勤把大成兴的粮食、布匹、财物全都分给了穷人，也有的说没有，这时日军赶到了。日军当时驻扎在40华里外的下板城，据说孙永勤攻打大成兴时，是岳老亮家给日军打去了电话，才发生了日本人携带枪炮赶到车河口之事。

日军的火力远远胜过民众军，孙永勤抵挡不住，不得不撤退到滦河南岸的南山上，之后经过化鱼沟，回到了孙杖子。

首次主动出击的战斗，虽有斩获，但由于牺牲了赵来、赵成二人，孙永勤很长时间内心情都非常沉痛。赵林之子赵廷山回忆说：“孙永勤为报仇，经常来抓王岐山、杨小峰和陈署长。他派人把陈署长家包围，把王岐山、杨小峰的家包围，都没有抓到。”

与孙永勤对陈署长、王岐山、杨小峰实施报复的同时，日军对孙永勤等也开展了报复行动。据孙文邻、赵廷山、关元奎等人回忆，孙永勤、赵林、关元有三人家的房子均被日军放火烧毁，尤其孙永勤家的房子，还不止被烧毁过一次。

车河口战斗中，孙永勤继起义时被人传出“黄狗显圣”后，第二次有“显形”故事流传开来。“孙永勤在车河打大成兴时挂花，腿撺一溜皮，躺担架上。担架跟前一个大黄狗趴着。有的人见了，就上前骂道：‘死狗！人前趴着。’等孙永勤醒了，狗就没了。”史耀清说。

除“黄狗显形”外，关于孙永勤，据说还有一个称呼也流传开来，那就是“及时雨宋江”。我想，人民这样称呼他，是因为孙永勤反满抗日的行为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吧。

穿行于长城南北

车河口之战结束十余天后，孙永勤率民众军攻打了半壁山警察署。

在此之前，1934年1月22日，农历腊月初八，孙永勤曾在二堂打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在二堂子大财主高作忠家弄了20支大枪、三四支手枪、一台车子、一匹骡子，消灭敌人五人。得了一驮子洋钱，我们分了点，剩下都买武器了。”民众军战士孙文阁回忆说。

半壁山坐落于今兴隆县境东南部，滦河另一大支流——潵河的北岸。考古发掘表明，至迟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里已有人类居住。到了明清时期，半壁山已发展成一个人烟十分稠密的村庄。

如今的半壁山是个相当繁华的集镇，它不仅是兴隆县东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半壁山镇政府驻在那里，而且是沟通兴隆县西部与东部、兴隆县与外部世界之间联系的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北京—建昌公路与宣化—唐山112国道从兴隆县城开始重合，至半壁山镇，一个一路向东，直奔辽宁方向而去，一个则向南，经罗文峪通往遵化、唐山地区。

半壁山的名字来源于镇东北两华里处一座孤山的形状。北面除中间有道斜坡外，上部和下部都是直上直下的峭壁，远处望去，整个山体宛如被削去了半座一般，很早人们便以“半壁山”名字称之，其本名“北山”反倒有些湮没无闻了。

至少在五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半壁山都是由衙署位于长城以南的直隶遵化州或河北省遵化县管辖的。半壁山划为兴隆，始于1930年8月兴隆正式建县以后。1933年4月21日，日军侵入兴隆县城，随即将中华民国治下的兴隆县改为“兴隆办事处”，划入伪“满洲国”热河省承德县的版图，半壁山因之改受兴隆办事处



图67　二堂高作忠家旧址　2006年4月

节制。长城抗战失败后，依据北平军分会与日本关东军签署的《塘沽协定》，兴隆属于河北省政府接收的战区22个县之一。如果当时国民政府态度坚决，本可在短暂沦陷后即重回中华民国怀抱。由于当时蒋介石等的重点在迅速解决南方的红军与地方军阀问题，对北方只是希望维持住妥协局面，兴隆根本未能接收，致使那里的人民被遗弃12年之久，半壁山也直到日本宣布投降，才摆脱伪满的控制。

之所以攻打半壁山警察署，雷永兰在《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回忆丈夫孙永勤》中回忆，其原因是"起事的这年冬天，永勤听说滦河半壁山警察署给鬼子提供情报，敛款收税，打骂群众，奸污妇女，什么坏事都干，老百姓把他们恨透了。他就带着民众军从黄花川出发，一宿急行军，天没亮就包围了半壁山警察署，决心要替滦河百姓出出气，拔掉滦河百姓的这个眼中钉。"

半壁山在孙杖子西南方80华里外，中隔数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大山和黑河、横河两条大河。孙永勤带领民众军是从广东山出发，经五指山后背，走小路直插半壁山的。

攻击时间是农历腊月十七八，公历1934年1月31日或2月1日左右。

"我今年76岁，起义那年我25岁。"孙文阁参加了攻打半壁山的战斗。1986年11月17日，他在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回忆说，"起义那年的腊月十七八日，有大月亮地儿，民众军到半壁山。孙永勤说打警察署，咱们起义军16人天没亮就到了。打局子，打到日头出来9点多钟。警察从里往外打，我们从外往里打。"战斗异常激烈，作战过程中，孙文阁左膀中弹负伤。"打它还不容易，"雷永兰回忆说，"警察署院子里有八间草房，院墙又宽又高，敌人就凭着墙高院深死守。永勤心里想：要是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警察署，邻近几个据点的敌人知道情况后，就一定来增援，到那时候我们就不好办了。他急中生智，命令战士加强火力，牵制敌人，自己冲到离房子很近的院墙底下，把秫秸捆点着，扔到房上头，转眼之间，伪警察署就烧落架了。"

孙永勤放的这把火，火势很大——这可能和北方冬天气候干燥，并时常有风有关。据共同参加战斗的史耀华回忆，警察署住房附近的松树都被烤死了。凶猛的大火吓坏了伪警察，有的把枪扔到井里逃跑，跑不了的全部举手投降。"警察署的孙翻译被咱们抓住了。"史耀华回忆说，"孙翻译给孙永勤跪下了，央求。孙永勤说，咱们都姓孙，留你一条命，走后你就别干了。再干，我就不留你命。"

"一次绑他们12个人，一个小的没绑，一个大师傅没绑。"孙文阁回忆半壁山之战的战果时说，"咱们得了十几杆手枪、大枪，洋钱驮了一驴驮子，还有很多满洲票。"

"那时谁抢到钱谁要，抢的多的就分给别人一点。"孙文炳如此回忆民众军最初的战果分配方式。





图68　舍身台　2009年11月



图69　舍身台上的石刻莲花
2009年11月



图70　舍身台下的六祖庙
2009年11月

打下半壁山警察署后，孙永勤带领民众军战士迅速撤走。孙文阁回忆说："这次我们砸了局子就跑，鞋都跑丢了。趟着滦河（疑为'澈河'之误——编者）过去的，冻得腿都不能回弯。"

孙永勤带队来到半壁山以东三华里的东阎杖子吃早饭。在那里，发生了东阎杖子甲长企图告密的事情。"东阎杖子有个甲长想计策，孙永勤把他绑走了。他媳妇追到雹神庙，先给三棵枪，后应着还给钱，把人赎回去。"孙文阁说。大约在放回东阎杖子甲长之后，孙永勤发现有伪"满洲国"军队追了过来。事后查明，伪满军之所以能像猎狗紧跟着猎物踪迹一样而来，正是被放走的孙翻译报告的结果。"孙翻译往兴隆发电报。发了，满洲军便沿着澈河追孙永勤。"史耀华说。

面对人数远多于民众军的满洲兵，孙永勤头脑很冷静，他果断率领大家折入山中，沿小路穿越长城，进入由中华民国政府管辖的遵化县境内。"咱们军队奔口里，到陈家堡遇到保安队。保安队说：'在口里呆着不行。'把咱们黑夜送出来。咱们奔舍身台。"孙文阁回忆道。

舍身台位于今遵化市东北部侯家寨乡海拔889米的鹫峰山中。

鹫峰山又名"三台山"，全山由前台、中台、后台三个山头组成。在中台峰顶有一块高达数丈、傲然孤耸的白色巨石，石顶刻有一个棋盘和一朵盛开的莲花，那便是舍身台。

舍身台名字的由来，当地有两种传说。一种说，古代有个高僧在此石上修炼，后舍身成佛，故名"舍身台"。另外一种，则据说与一位名叫慧能的僧人有关。慧能与师父、师兄三人在鹫峰山隐居修行。师兄聪明乖巧，很得师父喜欢；慧能鲁钝木讷，为师父所轻贱，每日只吩咐他做些粗活、杂活。慧能全然不放在心上，任劳任怨。一天，山中粮食将尽，师父决定带师兄出外云游，命慧能留下看守僧舍。慧能问："师父，您走后，我吃什么？"师父不耐烦地说："烧大腿，煮石头。"慧能谨遵师命，在师父、师兄不在的日子里，每日苦修不辍，渴了便喝些山泉，饿了便捡些白石子放到锅中，以自己的大腿做薪柴，煮石当饭。很多年后，师父、师兄参访归来，满以为慧能已死，不料远远地便看到慧能神光四溢、脚步轻健地来迎接他们。师父大为诧异，问慧能如何还能活着，慧能便将按师嘱，每天烧大腿、煮石头之事说出。师父不信，让慧能取来尚未吃尽的石头，一口咬下，不料崩掉两颗大牙。师父大怒，认为慧能是故意让他难堪，抄起禅杖便去打他。慧能转身跑走，师父在后面紧紧追赶。慧能一气跑到舍身台顶，才发现前方已无去路。脚下是深不可测的山谷，眼看师父即将追上，慧能自念：与其学佛不成，徒令师父伤心，不如舍身一死，一了百了。于是闭上眼，一咬牙，纵身朝崖下扑去。就在慧能跳入深谷的一刹那，一朵莲花般的白云飞来，将他轻轻托住。原来是佛祖感念慧能道心坚固，特来接引。白云载着慧能渐行渐远，留下气喘吁吁赶来的师父惭愧无比地站立在崖壁之上……

此传说中的慧能，遵化人认为与唐时开创了禅宗新局面的六祖慧能大师是同一人。但在南

方成就了宏伟道业的六祖，何以在北地的燕山一带出现，是个不解之谜。舍身台下半华里的一个小山岗上，伫立着一座不到一间房大的小庙，庙的名字就叫“六祖庙”，也许六祖慧能与鹫峰山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

孙永勤奔舍身台的目的，不是为了拜谒慧能的圣迹，他是为了带民众军到舍身台下三华里一座古刹中休息。这座古刹的名字叫栖云寺，当地的说法是始建于东晋，重建于唐，重修于大辽。照此计算，栖云寺从当初有这坐庙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已在燕山南麓森林茂密的鹫峰山中存在一千五六百年了。

孙永勤何以知道栖云寺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带队到那里休息呢？根据最近几年在遵化地区的调查，我认为孙永勤之所以会带民众军去栖云寺，与一个人有很大关系，这就是他的副军长之一的马保德。

原因如下：

一、马保德在承德县路通沟的赵家庄与孙永勤结拜为兄弟之前，一直在长城南北奔走，做羊皮生意。从他家东双城到鹫峰山，不论走东路：建明——九虎岭——鹫峰山，还是走西路：遵化——侯家寨——鹫峰山，最远都不超过50华里，他对那里的地理人情应当很熟悉。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所有资料及我近年调查表明，民众军早期参加者主要来自今天承德地区的兴隆县、承德县和唐山地区的遵化市。兴隆、承德民众加入民众军，与孙永勤、赵家庄赵氏兄弟的努力分不开，遵化民众参加起义军，则主要依赖马保德之力。“我们庄去了不少，都冲二头儿去的呗。”东双城马广兴老人说。“二头儿”即指马保德，东双城老百姓习惯将副军长称为“二头儿”。遵化籍民众军战士自然了解遵化地形，即使马保德对鹫峰山情况不明，通过他动员加入民众军的这些当地战士也会迅速把那里的情况告知他和孙永勤。

孙永勤在遭到保安队拦截、无法深入遵化境内的情况下，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鹫峰山内的栖云寺呢？

2005年夏，我由遵化市区出发，经大石庄、侯家寨、北张庄子，前往鹫峰山。进山后，经栖云寺、舍身台，登上明抗倭名将戚继光亲自监修的蓟镇长城，才了解个中原委：首先，鹫峰山位于燕山南麓，人烟很少，全山为茂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栖云寺地处鹫峰山深处，极利于民众军隐蔽。其次，鹫峰山坐落于遵化与兴隆接壤地带，从半山腰的栖云寺出发，向北方走行六七华里，翻越由西南方向蜿蜒而来、又向东北方向奔腾而去的的明万里长城，可进入今天的兴隆县蓝旗营乡——当时的伪“满洲国”地区。而从栖云寺下得山来，向西南方向行走30多华里可进入遵化市区——当时的遵化县城。向东北方向走行15华里，可到达明长城上的重要关口洪山口，那里不论抗战时期还是今日，都是遵化、兴隆、迁西（当时属迁安）三地的接壤处。

向北可进入当时的伪“满洲国”兴隆境内，向东可进入当时由中华民国管辖的迁安县，向南则进入多山的遵化东部地区。由于以上的原因，栖云寺对于孙永勤来讲，是一个不论进退，都非常有利的地方。而不久后在栖云寺发生的战斗，也很快印证了这一点。

栖云寺战斗是在民众军进驻这座古寺的第二天上午打响的。从深夜到达寺庙，到午前11点战斗发生，民众军休息了10个小时多一点。被民众军战士统称之为“舍身台战斗”的这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在敌军的性质和死亡人数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包围民众军的是伪满军，史耀华曾回忆：“从半壁山撤走到舍身台，满军围了舍身台，打一仗。打了两个来小时，咱们没牺牲，满军也没死。”另一种则说，攻击民众军的主要是日军，日军在作战中有伤亡。这种说法以孙文阁为代表：“十二月十八九，在遵化舍身台打了一天一夜，日本人很多。我们50多人，打死四五个日本人。几次突围，冲出了敌人包围。”同一场战斗，留下了两种非常不同的回忆，是当事人记忆有误，还是战场情况发生了变化，日军前来增援了呢？另外令人不解的一点是，如果大家还记得孙文阁关于半壁山战斗回忆的话，他说攻打半壁山时，民众军为16人，何以一天后，在舍身台作战的民众军战士就已增加到50多人了呢？中间发生了什么呢？

按照孙文阁的回忆，舍身台战斗是在绝大多数民众军官兵尚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的。“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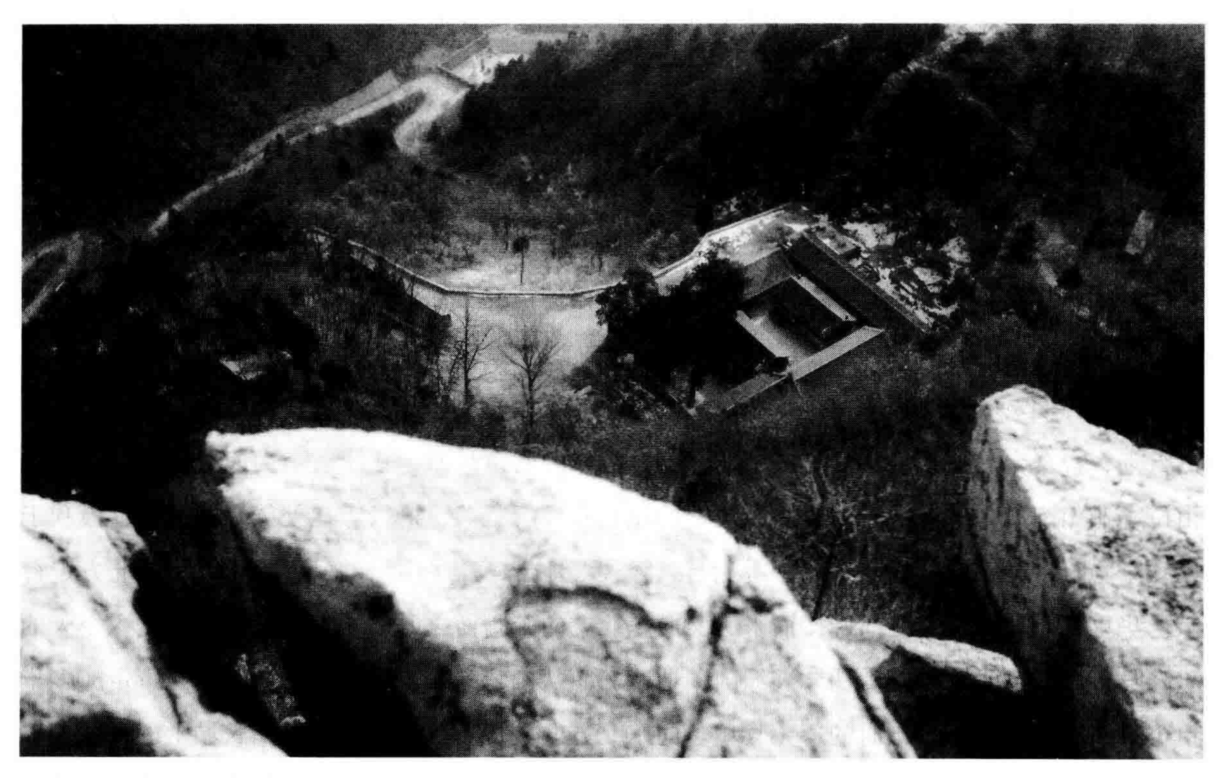


图71　由舍身台顶俯瞰栖云寺。2009年11月



图72　栖云寺大殿内佛像　2009年11月

一宿，次日11点左右钟，日军把舍身台围了。”孙文阁回忆说，“我们就在大梁顶上站岗，杨树林的一个甲长到梁上找我们说让下枪，我说得找孙永勤商量。孙永勤在庙里做饭还唱呢，马保德脚受伤，抬着，找到杨树林的甲长，把那甲长绑上了。”

根据孙文阁的以上回忆，我们能够复原的舍身台战斗最初的情况是，日军先是从伪“满洲国”一侧的树林上山，翻过长城，将舍身台包围。之后派杨树林甲长说服民众军缴枪投降，寄希望于不发生武力冲突，便将民众军解决。在民众军捆绑了甲长、公开拒绝投降的情况下，日军发起了对民众军的攻击。

“开火，打了一天，月亮出来还打呢。打伤一两个日本子，看着从山上往下拽来的。当时和尚都进了地窖子了，鬼子没敢进去。”孙文阁回忆说。

突围是在夜间进行的，从栖云寺撤出时，孙永勤没有忘记将杨树林甲长带上。

民众军的前进方向是鹫峰山南方25华里的东双城——马保德的家乡，民众军希望借此深入遵化境内的行动摆脱掉敌人。

从鹫峰山前往东双城，要穿越大片起伏的山地，民众军趁着月色，在腊月冻得梆硬的土地上一路疾走。行动是非常秘密的，尽管如此，当孙永勤带队到达东双城时，还是为当地伙会所察觉。

“咱们撤到遵化东双城子，关里的伙会来信要开火。孙永勤去信说，试巴试巴。他们会长来了，孙永勤要武器，给送过几棵枪。”史耀华回忆说。

发现东双城无法久留，孙永勤决定带队重返兴隆山区。为避开日伪的堵截，他没有经洪山口直接进入兴隆地区，而是在行走到吴家沟——洪山口南面二十六七华里的一个村庄后，取道东北，进入迁西县境西北部，经韦庄、栗树湾，穿越明长城，回到兴隆境内。

“我们到潵河北，把那甲长吊起来打。”孙文阁这里讲到的甲长指的就是杨树林甲长。“有一个妇女说情，要啥给啥，把那甲长放了。”

从潵河北，民众军开到二道河，孙永勤住在地主高作忠家。民众军官兵想不到的是，他们才住了一天，情况就被日伪掌握。像在遵化舍身台一样，战斗再次猝不及防地发生了。根据

史耀华的回忆，当时包围民众军的既有日本人也有伙会。“夜间，两个站岗的被抱去。孙永勤正拿虱子，两个日本子进屋里了。孙永勤打手枪，蹿了出来，踏冰过河。咱们失落五六人，跑出来130多人。”二道河战斗，孙文阁讲述的版本与史耀华略有不同。由于战斗发生时他与孙永勤在一个屋子，也许他所说的更为贴近历史真实。“狗咬，咱们有四个站岗的都被满军抓去了。孙永勤睡觉呢，我出去看看。敌人打我一枪。我在胡同里挨了一枪，就跳墙跑了，枪挂在了栅子上。孙永勤用手枪往胡同两边打，敌人躲了，他把我的枪拿了，跳到前院去，走了。我跑到灰窑峪，进一个人家烤火，孙永勤、关元有他们也到那屋里了。过了梁，到蘑菇峪上边的黄花峪。去几个人到蘑菇峪，找三先生要枪。三先生是孙永勤的亲戚，他给了几棵枪。腊月根儿，我们回到孙杖子。”

舍身台、二道河战斗反映出孙永勤及初成立的民众军的一个特点：虽无很高的军事素养，但作战勇敢，无所畏惧，像极了初生牛犊。两次战斗也暴露出民众军的一个致命问题：纪律松弛。两次战斗都是在哨兵丝毫未察觉的情况下，被敌人包围了的。由于哨兵不能有效警戒，作用形同虚设，两次战斗都在仓促中展开。若不是孙永勤及民众军战士心理素质稳定，面对日伪的偷袭敢于针锋相对，猛打猛冲，其后果很难设想。这个问题在两次战斗中虽已充分地表现出来，但一直未能得到很好地总结和纠正，以致一年多后，它竟成为了孙永勤部队覆灭的原因之一，令人扼腕。

孙永勤回到孙杖子的时间是农历腊月二十一，公历1934年2月4日前后。

自腊月十七八前往半壁山攻打警察署起，短短五六天的时间内，民众军从长城北进到长城南，从长城南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长城北，行程逾300华里，作战三次，虽斩获不多，两度甚至很被动，但对于他们的未来发展讲，这次行动的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通过这次行动，孙永勤和民众军其他几位领导人发现了长城南北的日伪势力之间具有不协调的特点。同时关内的中国武装力量，不论战区保安队也好，伙会也好，虽然不欢迎他们跨过长城，但也轻易不会对他们动武。这两个认识使得孙永勤等人后来一方面充分抓住敌人的弱点，游走于冀东长城南北，一方面则因为对国民政府的误判，而最终陷入被消灭的境地。这些为后话，暂不多讲。



图73　冀东长城　2005年7月

烧板子沟战斗

一连串的军事行动让民众军的名声迅速向外传播开去，根据民众军老战士们的回忆，截止到1933年农历腊月底，聚集到民众军旗下的人数已达六七百人之多。

为解决绝大部分战士没有武器的问题，孙永勤在孙杖子做了短暂停留，便率队前往滦河一带。之后的事情，前面曾做过介绍，他从王宝石、城墙峪妹夫家压出了11支枪，但这远远不够部队使用。为让更多的人手上有枪，他命队伍朝城墙峪东北30多华里外的彭杖子开去。

“岳家有钱，跟日本官一说，要多少人去多少人。孙永勤想把岳家打败，势力消灭，说‘无论如何要把岳家拿下来，不拿下来，北边消停不了！’”

史耀清回忆，孙永勤到彭杖子有两个目的：一是杀鸡给猴看，通过打击岳老亮家，威慑一些地主、富户不再和日军勾结；二是岳家枪支很多，孙永勤寄希望于夺得这些枪支，武装民众军。

孙永勤到达彭杖子时，岳老亮已病死，尸体放在岳家花园中的一个小房里“发引”，岳家的全部经营、管理都委托大掌柜何育民负责。

孙永勤攻打岳家大院的人数，有五六百人说、二三百人说两种说法。

民众军战士张凤林持五六百人说。1986年11月18日，他向佟靖功先生说：“我们五六百人把煤局子（指岳家大院——编者）围了，煤局子里边是官兵。孙永勤让我去点炮，是大火炮。第一次点时，门子哨大西沟的王××被打死。第二次我点。第三次是菜园子刘长春点的，他把炮点响了，里边一点动静没有。我们三个人去放尖兵，头一个牺牲，第二枪把王麻三的腿打中了。我们几个人又向前走，大门关着，上边是炮楼，一推门，‘哐啷’一下。回去一说，孙永勤说：‘撤岗，回去吃饭。回头用炮轰它一下。’咱们都



图74　两个小男孩抬着洗好的衣服从暖儿河边走过来。过去那里曾是岳老亮的一个储煤场。2008年7月

去大彭杖子（指彭杖子庄里，当时岳家大院在彭杖子村东头——编者）吃饭，官兵把大彭杖子围了，咱们撤柳河口（应指民众军一部分撤走一编者）。官兵上大彭杖子前山。打了一天一宿，敌人占到高处，咱们派部队从山后又上去，官兵又跑回大彭杖子。听说孙永勤的同伴金中奇的队伍下来了，去了两个送信的，上鸡冠砬，一看是日本军。日本一过河，鸡冠山下的滦河，咱们就开枪了，打死好几个日军。日本军进大彭杖子了，咱们还是围着打。后来听说高杖子又来了日本子，咱们就跑了，奔老梁。孙永勤说：'咱们是打日本的，日本子来了咱们哪能跑，回去打。'回去到常峪沟打的。咱们在山上，日本子在山下，打一天。腊月三十咱们撤下来，到邢杖子烧板子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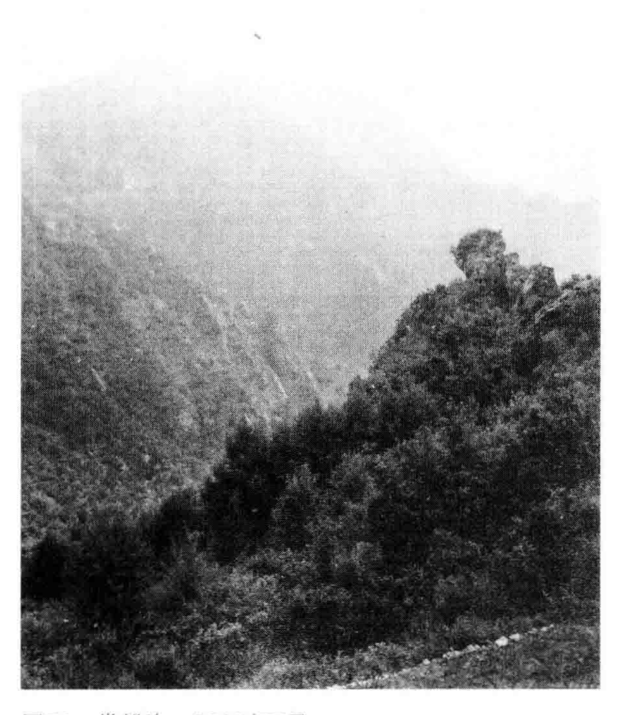


图75　彭杖子大桥下（南端）是岳老亮的另一个储煤场。2009年7月

张凤林的上述回忆中，民众军什么时候开打，到底打了多长时间，没有明确交代。2007年4月19日，我去彭杖子采访，徐文林老人告诉我，第一次打岳家大院总共打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徐文林老人当时10岁（虚岁），家就在岳家大院西南一百来步的地方。据他说，民众军是白天来到彭杖子的，他记忆中人数是二三百人。"头一次打仗时，净徒手的呢，刚参加的没枪。"老人回忆，民众军白天没进彭杖子庄，在南山坡、北山坡上与岳家大院交的火。之所以未进庄，是因为"大院有兵、四角有炮楼子，每个炮楼子都有大抬杆"。民众军进入彭杖子庄是夜里，"孙永勤带200来人，摸进村。他们有三个土炮，岳家大院炮楼都给打出裂纹了。打完，炮楼就不响了。"大抬杆虽不再发挥作用，但大院院兵似乎并未停止顽抗。徐文林老人回忆，后半夜，快天亮时，民众军子弹打完了，仍未能攻进大院。"据说孙永勤提一桶汽油，在影壁后骂老岳家来的。想烧岳家大院，墙是沙石夯成的，点不着，就去下板城煤场把三间房子点着了。"

正当民众军没了子弹的时刻，又出现了日军。"何育民给日本人打的电话，日本军从九道岭、椁椤树洼压下来的。"徐文林说。民众军只得由岳家大院外退走。"退到小梁那儿，就把鞭炮搁桶里，噼啦啪啦响了。"2008年7月6日，我第二次采访徐文林老人时，他回忆说。

孙永勤第一次攻打岳家大院的战斗以失败告终。民众军方面，徐文林回忆，死亡五人、


图76　常峪沟　2008年7月

伤一人。死亡的五人，一个是夜里打岳家大院的炮手，四个是日军从九道岭抓来的民众军。“早上，我二哥徐文有看见炮在那儿支着，在口里边关墙城楼子里挖出来的，牛腿子炮三个。装炮的被打死了，藏在二哥柴禾垛里。看见柴禾垛外有血，日本讨伐队给扒出来，见装炮的穿着羊皮，怀里还有花生。四个在影壁后让日本人枪毙了，是从九道岭给抓回来的。小晌午前枪毙的，埋在头道沟门。前些年，开石灰窑，挖出骨头。”被打伤的民众军是另一名炮手。“一个腿被打透了，没死，藏在张广臣家。”

日军在此次战斗中，也有四人被打死。“在老岳家城子东北，离河套不远的沙坨子炼的。日本人用蜡香祭奠，然后柴禾上倒上油。当时我在场，10来岁，放羊，看热闹。日本人说：‘过来，磕头。’一个人给磕了四个头，磕完了，日本人说，‘小孩，去吧！’给撵走了。炼完，把骨灰装了骨灰盒。”

岳家大院战斗结束后，日军曾想放火烧毁彭杖子。“日本人想用砖头裹上干草把子，蘸上汽油，把全庄都点着了，说彭杖子窝藏土匪。日本人管真正的土匪和民众都叫土匪。来的不都是日本人，也有很多满洲兵。一庄人都跪下了，求饶，才没烧。”

民众军从彭杖子撤出后，行动路线为老梁至常峪沟。根据张凤林的回忆，民众军在常峪沟与日军打了一仗。之后，队伍分散开来，一部分上了常峪沟西梁顶，史耀华在这部分人当中；一部分大概经全宝河退到了柳河后石洞，有种说法孙永勤随这一路行动；另有一部分则继续向南，到了今邢杖子村烧板子沟，张凤林在前往烧板子沟的队伍中。

民众军分别退往西梁顶、后石洞、烧板子沟，目的一，可能为甩掉日军，目的二，是准备在这几个地处偏僻、远离交通线的地方过年，因为常峪沟之战发生之日已是农历腊月三十了。

之前的一天，即农历腊月二十九，在从老梁前往常峪沟的路上，或到达常峪沟后，孙永勤分别给臭水湖一个财主和瀑河口大财主老任家写去了一封信，希望他们能支援民众军一些枪支。臭水湖方面的反应，未见有民众军战士回忆。瀑河口方面，据史耀华1986年11月向佟靖功

先生说，夜里来了四个有头有脸的人。他们找到孙永勤，对他说：“你们姑奶子把我们打发来的。你妹妹说了，枪有，那儿有100多伪军驻着呢，你们打不进去。”孙永勤很显然一下子被激怒了，他回答道：“你们回去，准备好，我去打。只要我去，就不留情。”不到两个月后，孙永勤果真率500多人前去攻打了瀑河口，老任家为他们的傲慢付出了代价。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西梁顶、后石洞、烧板子沟的情况。

西梁顶，也叫南山顶，海拔1000米多一点，地处今承德、兴隆两县交界处的承德县一侧。20世纪30年代，上有人家两三户，十余口人。今天登记户口10户，人口43人。近年由于出外打工，实际只剩6户人家，20口人。在承德县的行政区划中，那里属柳树底乡常峪沟村第一村民组。

据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赵家庄赵廷良老人回忆，常峪沟是孙永勤民众军的“二柜”，即第二个根据地。第一根据地，即“大柜”，是老梁。“老梁在赵家庄东南方向。到老梁，得经过一个大豁子，叫二道沟大豁，30来里地。从下板城走不行，有小鬼子。当时年轻小伙子走3个小时左右。二柜在常峪沟西梁顶，在赵家庄西南方向。从赵家庄走，得50来里地。上二柜都是黑夜走，从乌龙矶趟滦河过去，别处走不了。”

民众军在西梁顶主要吃住在王洪喜家。家住北梁顶——西梁顶北面3华里的兴隆县大营子乡前莫河北台村姜以珠老人说：“南山有个叫王洪喜的，存着几百石粮食。孙永勤来了，主要



图77　常峪沟西梁顶　2008年7月

吃他的粮食。别人管不起，自己还没粮食吃呢。孙永勤队伍衣裳啥样的都有，跟杂牌子队伍似的。有小旗儿，三尖，指挥用的。有红的，有白的，退了使白旗，出红旗就上。马不多，三五匹，头儿骑，白的、黄的、黑的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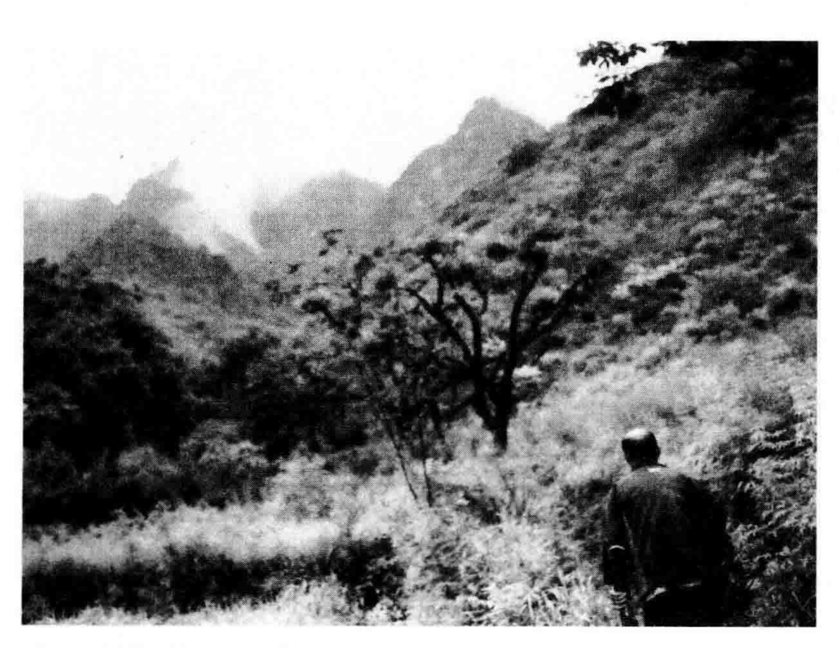
孙永勤之所以把西梁顶当做二柜，根据我一上西梁顶、四上老梁山的体会，是因为那里和老梁一样，一是山高，二是路远，最主要的是交通极为不便，不仅山路崎岖难行，而且都只有两条主路可通达山顶，只要在险要位置卡住路口，敌方很难攻上去。因为这些原因，西梁顶和老梁一样，过去便是土匪安“盘子”的地方。

后石洞，我因那里交通极为不便，未到达。据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郝连坤（不久即将出场的孙永勤军师郝敬义的孙子）介绍，它今天属承德县大营子乡獐子沟村管辖，位置在常峪沟西梁顶西面30华里处，里外两组现共有人家十五六户，人口四五十人。

烧板子沟，亦有人写成“少板子沟”、“哨板子沟”，今属兴隆县大杖子乡邢杖子村管辖，位置在后石洞东南方向30华里处，一道白家梁将两地分隔开来。2008年7月15日，我由邢杖子刘祝金老人带路，冒雨前往过那里。

烧板子沟沟长8华里，今天如果从邢杖子村村部前往，要向东北方向走行三四华里，由杨树沟——邢杖子的一个自然村进山，向北走六七华里，才能到达。烧板子沟内，据刘祝金老人介绍，过去只有赵文贵一户人家在里面居住。20多年前，赵家由那里迁出，搬到杨树沟后，烧板子沟就再无人烟。

“那沟凶着呢。”刘祝金说，“邢国海上山砍柴禾，瞅着头边有亮，就进沟了，结果趴坟上没气了。沟门老赵家狗咬，赵文贵的哥哥赵文忠胆大，让狗带着他进去。一个劲儿走，走到坟根下，见邢国海在那儿趴着，脖子上给掐紫了。把他从坟根下扛回来，到大杖子医院治好了。邢国海大前年死了，早晨去买肉，掉沟下死了，61岁。我过去常到那里放牲口，好天敢去，阴天下雨不敢去，瘆得慌。”


图78　烧板子沟　2008年7月

刘祝金说，过去烧板子

沟一带山中野生动物很多，有狼、土豹子、狐狸、灵狗子、山猫子（即兔子）等。北灵公路修路时，动物们都被吓跑了。

刘祝金带我从烧板子沟出来的路上，看到了一条耗子样的东西。我很奇怪，耗子应该在村庄里有粮食的地方出现，山里怎么也有？刘祝金说，那是山耗子。“山耗子爱吃树皮、玉米，没家耗子大，比家耗子跑得快。猫吃山耗子。”

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一提山耗子呢？

以后，关东军因总“剿灭”不了孙永勤，便送了他一个“山耗子”的绰号，意即从山这头围堵他，他从山那头出来，总也堵不住，就像山耗子一样。因为猫吃山耗子，据说关东军最后之所以要将其驱往毛山，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借“毛”“猫”声音相同，企图以“猫”克制住孙永勤这条“耗子”的结果。

一般情况下该欢乐度过的除夕，对孙永勤及民众军来讲，是一个悲痛的日子。根据张凤林、郝士玉、史耀华三人的回忆，腊月三十傍晚前后，日军及宽城伙会对烧板子沟、后石洞两地都进行了偷袭，民众军有三人被打死。

“头一天没吃饭，到烧板子沟吃饭。”1986年11月18日，张凤林对佟靖功先生说，“孙永勤打发一个老乡去探，可不好了，来了一群日本兵，到前院了。我们放了几枪，咱们战士李荣贵刚一上山，就中弹滚了下来。我钻到一个草垛里，里边已经有刘五子、赵文义、李林朝、陈义之四个人，连我五人。刘五子是老王家庄的，他对我说，‘老弟，过年咱们是周年了。咱们不如见他们去！’我说不行，刘五子还是出去了。日本兵在屋里，把他给绑上了。日本兵绑完刘五子回来，从干草垛里翻出个小狍子羔儿。鬼子抓狍子羔儿，我们那四人就没被翻去，从草垛里出来，跑了。我们四个人出来，有钻草垛的，有钻棒子秸垛的，赵文义钻到草垛里。呛，我们就又爬出来，往北跑。前边都是鬼子，我回来，钻小西沟里去了。此时，孙永勤在沟外。鬼子来，孙永勤钻到猪圈里。敌人是后晌黑走的，把刘五子带到姜家庄，扎了十几刀。鬼子走后，咱们散了的几百人又集中。我们全在山里过的三十。”

“在烧板子沟打仗正是年三十晚上。”郝士玉老人记忆中的烧板子沟战斗不是发生于后晌黑即傍晚之前，而且那次战斗也并不是烧板子沟内打过的第一场仗，二三天前，那里已发生了一次交火事件。“打煤局子时，有一股日军奔柳河姜家庄、烧板子沟了。孙永勤的一部正在烧板子沟吃饭，日军来了，孙部抗日军跑了。日军把一个叫王冲子的老乡给打死了，孙部一战士腿被打坏。打完之后，日本人就回到了车河口。”仅仅二三天后，烧板子沟内又发生战斗，大概是郝士玉万万没有想到的。回忆那晚的经历时，他说：“我们听见机枪响，上边还过着飞机。赶紧吃饭，好跑。吃完饭，上边杨树沟把孙部受伤战士送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又给送到南

沟的永合堂去。我们庄的郝敬义一起给送病人，见到孙永勤，他说会推八门，孙永勤就让他当了军师。这还是三十晚黑夜。这一仗打完后，伪满官家人就不敢来这一带了。”由上述谈话内容看，郝士玉当时不在烧板子沟现场，有可能就在他出生的村庄郝家庄，即今天的郝家营。

上引回忆中，郝士玉提到了一个人：郝敬义。由于他加入孙永勤部队后，一直帮助卜算行军作战事宜，是孙永勤比较倚重的“军师”之一，我在这里将他的情况介绍一下。

郝敬义，散见于回忆录中的他的名字有“郝静一”、“郝静义”、“郝敬意”、“郝世祥”多种说法。2008年7月16日，我第二次到兴隆大杖子乡采访时，在长途汽车上偶遇化鱼沟的陈文儒老人，经他热情提供线索，并经大杖子乡宣传干事杨福东先生帮助多方求证，得知他真实的名字为“郝敬义”。7月20日，在杨福东先生的帮助下，我与郝敬义之孙郝连坤在大杖子乡政府见面，经当面向他核实，证明“郝敬义”写法准确无误。

郝敬义解放后在车河一带是个为不少人知晓的人物。他被人记住，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形象很有特点。挺高的个子，传说进屋过门口得低头，很瘦，用陈文儒老人的话说，“瘦了巴唧的”，有的干脆说他是“手无缚鸡之力”，脑袋后却总爱留着个小辫，也有的说是大辫子。因为爱留辫子，他的真名很少为人提起，“郝小辫”之名却传播得很远；二是他喜欢推八门、算卦，“子丑寅卯说得熟熟的”。有的说他算得准。有的则说他算得不准，“不识字，拿么拿么，算得没啥准。在本庄不大算，串山沟算”。

“爷爷大概1970年秋去世，71或72岁。我当时11岁（虚岁）。”

2008年7月20日当天，我就关心的问题向郝敬义之孙郝连坤作了提问。根据他所说的他爷爷去世的时间、年龄来推算，郝敬义大约生于1899年或1900年。郝敬义的出生地即上面曾说到的郝家庄——车河北面的一个村庄。十多年前，郝家庄被改作了“郝家营”，今天官方的名字为“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



图79　郝敬义之孙郝连坤。2008年7月

“老祖宗从山东搬过来，定居在郝家庄。爷爷是第七代，到我是第九辈了。”郝连坤说。他印象中，“爷爷个头一米七五左右，长方脸，挺瘦的。皮肤黑中带黄，留头，跟电影《神秘的大佛》里的葛存壮一样，前边没有头发，后边说背头不像背头。他说过，过去有小辫也不长，文革中都让铰了。爷爷走路挺快，跟孙永勤跑山练出来的。说话很随和，尤其



对小孩。困难时，拿镰刀割柴禾，怕我出危险，亲自告诉我镰刀该怎么拿，摔跟头时怎么撇出去。”

郝连坤所说最后一点与大杖子当地认识郝敬义的人们评价一致。“人不坏，挺善良的。”郝家营郝连发老人说。

据郝连坤回忆，郝敬义擅长八卦。“拿手指头掐算，算出行什么的。很少看见看风水，那时（指‘文革’年间）属封建迷信，不允许。孙永勤因为听说郝家庄有一个懂八卦、懂出行什么的，慕名找的他。”在郝敬义怎么加入民众军一点上，他的说法与郝士玉的回忆有所不同。

“爷爷说，孙永勤为人豪爽，枪法挺准。”郝连坤说。这句话可看做郝敬义晚年回顾一生时对孙永勤的评价，中间多少透露了一些当年吸引他参加孙永勤队伍的原因。

郝敬义是孙永勤的第三个军师。第一个为孙成，第二个为柴启瑞。

回过头来，接着说1933年农历腊月三十民众军的遭遇。

“宽城的日军、伙会夜间来围，”1986年11月22日，史耀华对佟靖功先生说，“打一仗，咱们死一人。死的人是遵化下港的陈子兴，30多岁，大个子，200来斤力量。陈子兴拿一把菜刀，钻在草垛里。日本兵把他翻出来，他砍伤两个，其他日本兵把他绑上了。一个日本兵押着他，他把绑绳解开，用大石头把那个日本兵砸伤，三八枪砸坏。跑走了以后，他藏到一个炭窑里，又被日本兵翻出，把他带走了。孙永勤被围在院子里，他一跳栅子，一把盒子枪挂在栅子上，被宽城伙会拾掇去了。”

史耀华回忆日军、宽城伙会偷袭孙永勤的时间是腊月三十夜里，当时“孙永勤在后石洞过年”。和前引张凤林、郝士玉的回忆相对照，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按照张凤林的说法，烧板子沟战斗发生时，孙永勤在烧板子沟外；按照郝士玉的介绍，腊月三十日夜，孙永勤在永合堂；按照史耀华的叙述，日军、宽城伙会袭击后石洞时，孙永勤则是在后石洞。那么，腊月三十当天，孙永勤到底在哪里？

从张凤林的回忆看，他虽是烧板子沟战斗的亲历者，但他并没有和孙永勤在一起。而史耀华，根据他在同次采访时向佟靖功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们在常峪沟西山顶过的年”，可以判断，他也不是后石洞战斗的目击者。两个人关于腊月三十孙永勤行踪的回忆都应是来自他人。

那么，烧板子沟、后石洞战斗发生时，孙永勤到底在哪里呢？

现存资料中，除张凤林、郝士玉、史耀华三人外，再无关于烧板子沟、后石洞战斗的记载。包括这三人在内，目前所知，已没有一个民众军战士尚存在于人世。如果要弄清这两场战斗中的疑点，恐只能寄希望于搬到杨树沟的赵文贵一家和后石洞战斗发生地还有老人能帮助破解谜团了。然这在本书截稿前已无法做到，只能他日有机会到这两地时再做调查了。

五凤楼

五凤楼坐落于今日兴隆县大杖子、蘑菇峪、大水泉三乡交界处，巨大的山体为郁郁葱葱的森林所覆盖，它不仅是滦河二级支流车河的发源地，同时也孕育了兴隆县另一条著名的河流——黑河。

五凤楼主峰海拔1475.5米，在兴隆全县42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海拔2118米的燕山山脉主峰雾灵山和海拔1885米的白草洼山。

“老辈子就叫五凤楼，过去山上有梧桐树，据说曾经有五个凤凰落到过树上。”孟家沟孟庆礼在向我解释五凤楼名字的由来时说。

根据史耀华1986年11月的回忆，民众军在从烧板子沟、后石洞突围出来后，当夜便撤到了西南方向五六十华里外的五凤楼。

民众军驻扎在五凤楼的两个地方：一是三岔口，即今兴隆大杖子乡车河梁村委会所在地，目的是扼控从寿王坟通往大杖子的交通要道，以防范日伪的突然偷袭。二是在王胖子沟，也叫三岔口南沟，解放后更名孟家沟，三岔口南面5华里的一个小山村，今为车河梁村第六村民组所在地。

孙永勤住在王胖子沟。

“当时就老孟家一大户。一个大院，四面斗，不到20间房子，30多口人。三太爷孟昭贵是总当家的，有两个长工、伙计。大院外没人家。老孟家之前是老于家，老于家前可能是老王家。老孟家明初从山东邹县逃荒过来，分三大支。大部落在承德县孟家院，二门落在解放孟大地，我们这支落在大杖子乡柳河口西山嘴，就是车河口大桥头那个地方，后来搬到这儿。我们这支又分两支，另一支在车河堡。那支比这边多，两支一共60多口人。山林在我们这儿，土地主要在车河堡一带。那时这儿烧炭，炭归这儿管，吃粮归车河堡管。统共将近300亩土地，这儿100多亩，车河堡100亩，车河梁100多亩，山场3000来亩。这些都是奶奶孟刘氏跟我说的。”63岁（虚岁）的孟繁林手中托着一个锈迹斑驳的黑褐色的罐子，一边转动着，一边向我叙述着孟家沟的历史。那罐子是20世纪60年代末他在自家门前道边刨树根时，在一棵60公分粗的大柞木下一镐下去刨出来的。罐子不是很大，但是做的很精巧，敲击时能发出金属的声响。“听奶奶讲，孙永勤那时叫拉杆，反正打日本人，在上面我三太爷孟昭贵家老房子住。人数大约四五十人，没超过100人。我大舅张连玉也在里面，是他们的稽查处长。村子供他们吃住。”孟繁林说。





图80　五凤楼　2008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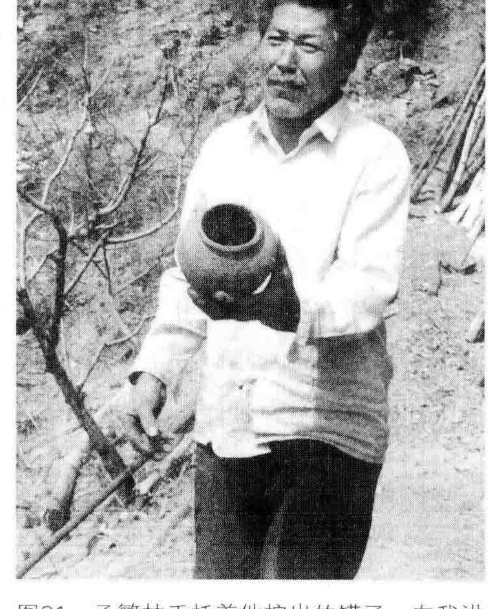


图81　孟繁林手托着他挖出的罐子，向我讲述王胖子沟的历史。2007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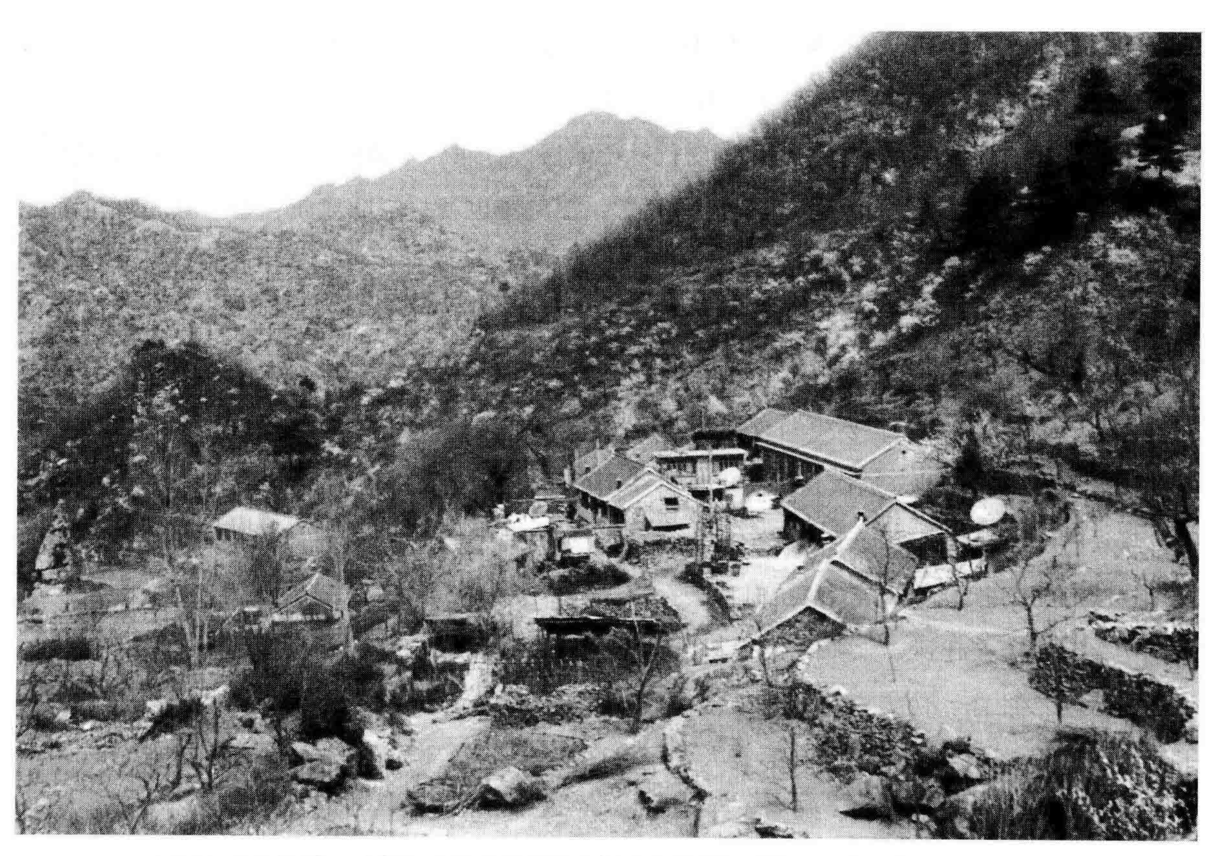


图82　王胖子沟。中间最高的房屋就是当年孙永勤军部驻地，现在的房子经过了翻盖。2007年4月

“那时孟家沟一个劲儿招匪。”孟家沟孟庆山的父亲当过民众军的办事员。2008年7月我到孟家沟采访时，孟庆山对我说，“老爷子说土匪是鞍匠那边来的。黑夜正睡觉，土匪来了。来了之后先上房，当时院墙一丈五尺多高，都能上去。扒着木头就上房，上房就叫号。先把男的绑起来，要钱，要东西，不给就打。我们这儿三奶子给土匪吊起来过，烙铁烙，香头烫胳肢窝。这会儿能睡点安稳觉，那会儿可胡瞎了。大骡子在门口拴着，土匪来，拉走就跑，不敢找。过年想杀点肥猪吃，全让土匪吃了，吃不上一口。种地时，听见土匪来，撂下家伙就跑。可能是土匪走了之后，孙永勤就来了。”

民众军在五凤楼驻扎了十余天的时间，亦有住了一个多月说和两个月说。期间发生了三件事情：①孙永勤与寿王坟孙永香决裂。②孙永勤攻打张福义父子，后将他们招纳至民众军中。③民众军更名为“抗日救国军”。依次叙述如下。

一、先说孙永勤、孙永香决裂。

要说清这件事，必须先从民众军为何被迫离开王胖子沟说起。

1934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后（亦有说法是农历二月底），继烧板子沟、后石洞发生被偷袭事件后，在王胖子沟再次发生了孙永勤队伍被偷袭的事情。其过程，见于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调查材料的有十个版本，我近年了解到的有四个版本，共计十四个版本。

1．见于《兴隆县志》征集意见稿中《黄花川农民暴动》一文，作者不详。《兴隆县志》征集意见稿的编写时间为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1日。

文中说：“汪海澂，东北人，民国时代承德地痞。日寇居承德就（原文如此，似应为‘在承德居然就’——编者）看中了这个‘白脸’，汪海澂也就打起顺风旗，当上兴隆办事处处长，跟在鬼子屁股后，活像小巴狗。汪海澂接到车河警察署3月的报告信中，详陈孙永勤第二次攻陷大成兴，把脸气得像个紫茄子。不及向鬼子陈述，忙招兴隆地痞三十六友头行人汉奸卢仪卿（伪财务局局长）等，把汉奸队全部打扫上，又加红梅寺卢仪卿部下的一群疯狗，凑起500多人，向寿王坟扑来，妄想围攻孙永勤。但这群熊兵都带双枪，一杆大枪，一杆烟枪，平时欺负老百姓犹如凶神，这次是真要打仗，一个个早准备抹油逃命，加上行军几十里，连累带瘾，哪还有心思打仗？只好半途停军，驻在寿王坟村老烧锅去。汪海澂怒火正燃，半夜又促进军。拂晓赶至王胖子沟，与人民抗日武装孙永勤部队接触。同时，大五龙匪团汉奸孙荣圃、上板城伪警察千余人赶到。敌人仗着人多胆壮，猛扑过来，战斗激烈。孙永勤沉着地指挥战斗，杀退敌人两次冲锋。伪警察署马署长督促大五龙部、孙荣圃上，大五龙、孙荣圃只是趴在山上不动。汪海澂带的一伙人见弹不饶人，早已腿肚子朝后，哪个还敢舍命向前。眼看日转正午，孙永勤恐继续相持不利，随撤退转移。汉奸伪警夹起尾巴也逃回窝里去了。这次战斗3小时许，毙死伤敌百余人，我军在冲锋中约阵亡十人。这一战斗，打破了敌人狗胆，为人民报了

仇，出了气。这一支刚刚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经受了锻炼，鼓起士气。”

2. 见于《兴隆县志》征集意见稿中《民族英雄孙永勤》一文，作者未注，有可能是遵化县访年焕兴同志办公室的刘恩如。

“孙永勤二次听到日寇要派大军剿他，就在1934年3月，亲自率领官兵1000多人二次攻克车河口，将财产和一切财物全部分给农民，并袭击了乌龙矶等敌人据点。孙永勤部队撤退后，伪兴隆办事处处长汪海澂、汉奸卢仪卿、大五龙土匪等1000多人，在王胖子沟赶到一起相遇。双方战斗三个多小时，击毙伪军100余人，吓得汪海澂等胆战心寒逃回兴隆县城去了。”

3. 孙永勤亲兵赵文义讲述，采访者不明，采访时间为1975年3月10日。

“有一次，民众军在五凤楼驻防时，兴隆讨伐队100多人包围了五凤楼。士兵通知他：‘我们被包围了。’他毫无惧色，仍然沉着地坐在炕上考虑对敌作战计划。敌人的两发炮弹在他住所的屋顶上爆炸了，他才下炕，威严地站在大门楼上怒骂敌人：‘你下来，我毙了你。’敌人的机枪雨点似的向他扫射，他用短枪向敌人还击，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4. 见于《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中，文章作者为朱呈云，完稿时间是1982年8月28日。

“日寇在兴隆县境内连续遭到武装农民的打击，损兵折将，拖住了兵力。伪热河省军管区则认为汉奸汪海澂工作不力，于1934年3月撤了他的伪办事处长的职务，委派吕俊福为其效力。吕俊福当上伪县办事处长以后，为了效忠日寇，做出‘成绩’，亲自率领喽啰兵500多人，于4月下旬东犯，驻守在寿王坟、罗圈沟一带。又命令上板城警察署伪军孙荣圃率领500多人，驻守在车河口一带。妄图通过东西合击，把民众军消灭在深山之中。

这时，民众军正在五指山（疑为‘五凤楼’之误写——编者）休整。汉奸吕俊福率领伪军爬过五凤楼山，气喘汗流，疲倦不堪。共产党员王殿臣见到敌人的狼狈相，率领300多名民众军进行阻击，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毙伤伪军200多人。吕俊福见喽啰兵伤亡近半，战斗不利，连忙下令撤退，仓惶逃窜。可是刚逃走不远，又遭到李连贵、年焕兴等农民武装的迎头痛击。伪军有如丧家之犬，又丢下50多具尸体，逃回寿王坟，不敢轻举妄动了。

“西山枪声响，伪军孙荣圃为使‘合击’成功，拼命向五凤楼山猛冲猛撞。民众军孙永勤率领300多人埋伏在山头，等到伪军冲进沟底，两山枪弹齐发，来个关门打狗，打得敌人死尸遍地，赶紧收拾残兵，缩回据点，结果‘合击’彻底失败。”

5. 张如山回忆，采访者为栾福忠、邢连义，采访时间是1983年6月1日。

“孙永勤起队伍，在五凤楼打了胜仗，收缴20多支枪，俘获了两个日本人、一个翻译。”

6. 孙文炳回忆，佟靖功先生采访，采访时间为1986年11月18日。

“五凤楼那一仗，民众军打了胜仗。上五凤楼时咱们部队就把孙永香抓到五凤楼上，我们住在一个富户人家，把孙永香锁到仓房里了。我们都住在那大院里，孙永勤也住在那儿。那大

院在山根，后边是大山。敌人从后梁上来，开炮把大门楼子轰了。咱们撤到南山，南山高，把敌人打退了。咱们也就把孙永香扔在后院仓房里了，那次敌人来就是他让来的。孙永香的家在寿王坟北边的一个山沟里，以后咱们部队绕到孙永香的家，把他的房子给烧了。”

7．张凤林讲述，采访者佟靖功，采访时间为1986年11月18日。

“又集中二百、四五百人（原文如此——编者），正二月去五凤楼。孙永香领着团会五六百人、满洲兵打孙永勤。打了半天了，孙永勤住在一家，敌一炮把住宅门楼揭开了，咱们死好几个人。”

8．史耀华讲述，采访者佟靖功，采访时间是1986年11月22日。

“咱们在五凤楼住着时，把罗圈沟的孙永香绑来，要枪。他儿子孙某在兴隆日军里管事，他儿子带日本军、伙会来包围五凤楼。开火了，咱们站岗的被抱去好几个。这阵儿有1000多人，李连贵、康永贵、年焕兴都来了。但打五凤楼时就是孙永勤我们一拨400多人，别人分开，李连贵在漱河赵杖子呢。开火后，咱们在后五凤楼损失六七个，连抱去的死了十多个。孙永勤损失一匹马、两驮子大烟，他派人又追回一驮子大烟。从挑哨打到八、九点钟，咱们把孙永香捆在仓里圈着。日本鬼子年到近前了，咱们撤了，日军又把孙永香弄回去了。这时也该正月十五前后了。”

9．郝士玉回忆，采访者佟靖功，采访时间为1988年12月15日。

“孙永勤就从全宝河那边绕到车河梁拱肚子沟老孟家，在五凤楼北部，扎盘子一个多月。来这儿以前，孙永勤到罗圈沟找孙永香给扩个队。孙永香当面答应，后起奸心向兴隆警察局报告了，兴隆发兵过来打拱肚子沟老孟家这儿。”

10. 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张家锅伙张德兴讲述，采访者仍为佟靖功先生，采访时间是1988年12月16日。

“找寿王坟罗圈沟孙永香，让他给助队扩军。那时日本子来了，调来日本军打了，孙永勤走了。”

11. 罗圈沟孙守合老人向我讲述，时间是2007年4月23日。

“听我父亲说，正月初儿，孙永勤队伍到我们庄，连男带女怎么也得十几口子，全给弄到车河梁去了。老爷（指孙永香）是北七保保长，当时没在家。大杖沟门有个叫孙守孝的（据孙守礼老人说，应叫孙守学），他爹叫孙朝什么来的，说‘你们在这儿呆着，我找老爷去。’到梁家沟找着了。跟老爷一说，老爷去了。说是老爷到那儿一瞅，孙永勤的人恭而敬之的，这让骑他的马，那让骑他的马，把我们庄的人都给放了。老爷跟着他们到了三岔口南沟，就给孙朝阳写了一封信。孙朝阳那会儿就在家，好像是一个包工头。老爷信上写着，让他上哪哪儿找日本兵来，看见黄大衣斜背着，那是暗号，看见那个不让打。那回把孙永勤打垮了。”



12. 孙永香之孙、罗圈沟孙守礼老人讲述，时间为2007年4月23日。

“孙永勤跟他要大洋，爷爷给不起，交不了那么多，给了一部分。爷爷被绑走了，把20多间房子都给烧了。父亲孙朝访当时领着20多个伙计干活，救不了爷爷。”

13. 车河梁村孟家沟孟繁林、孟庆生、孟庆山讲述，时间是2007年4月23日、2008年7月15日。

孟繁林2007、2008年两次回忆综合起来是：孙永勤把孙永香绑到王胖子沟来，跟他要5000大洋。孙永香的儿子孙朝阳表面上答应，却从鹰手营子警察署调来了日本兵。孙永勤等人在老房子正住着，孙朝阳、日本兵从三岔口过来，走石戳子后沟，到王胖子沟后梁支起了迫击炮。当时哨兵站在右山梁上，树大，没看见日本兵上来。日本兵开炮，把房子轰了好几个窟窿。孙永勤正在屋子里抽大烟，一看士兵抵挡不住，用棉被把头裹住，挡枪子，从房子出来，直接进沟，奔了西大山。孙永勤是最后走的。

孟庆生2007年回忆：“听父亲孟宪刚说，孙永勤住在我们这儿，在这儿安盘子。有几十人，使的火枪、火炮，在我们后院和日本人打起来，让日本人打跑了。日本人从石戳子后沟过来的。”

孟庆山2008年回忆：“孙永勤那时都没枪，躲到这儿。日本人从罗石沟过来，到小罗石沟梁顶，围攻，用机枪打。父亲是孙永勤的办事员，当时20多岁。我奶奶在别的屋住，父亲出去拽我奶奶，被日本子打了一枪。打后脑了，挺长一个大口子，差点揭盖儿。就在老房子那儿，那时还是草房呢。”



图83　孟庆山讲到自己的父亲时，难以抑制地流下了眼泪。他的父亲在抗战年代受了两次伤：一次是孙永勤部队驻扎王胖子沟，日伪偷袭时；一次是为八路军送信，被日军抓住，他父亲把信吃了，遭到严刑拷打，后来爬着回到了家。2008年7月

14. 罗圈沟孙守印老人讲述，时间为2008年7月17日。

“黑夜就来了，来一拨住罗圈沟了。没有日本人，二三十人全是便衣，但不是伙会，那时叫保卫团。二拨据说是日本人，有炮，从营子来的，没进罗圈沟，从车河梁直接开进三岔口南沟。我们村那一拨子第二天一早上开始打，从罗圈沟大东山梁往那边打。大东山梁

过去就是王胖子沟，也叫三岔口南沟。我们小孩儿就看热闹。兵打一阵子就跑回来了，一会又回去。晌午太阳歪了，说孙永勤已走了，兵回营子了。孙永勤武器不好，顶不住。有人回来念叨，孙永勤奔横河了。”

上述十四个版本，在王胖子沟战斗经过的描述上不尽相同。真实的作战过程、胜负结局是什么样子，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心的是这场战斗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发生的。

介绍十四个版本时，为不因随意断句引发理解障碍，我尽量完整地引述了事件的发生经过，因而事件发生的原因实际上也就浮现出来了。然正像王胖子沟战斗经过存在那么多版本一样，战斗发生原因如果仔细推究，也存在着多个版本。

在这么多的说法中，哪一种是最贴近历史真相的呢？

我认为，请孙永香扩军说可能最接近历史真实。

扩军说最为详尽的版本是罗圈沟孙守印老人讲述的。上引孙守印老人的回忆中，我只介绍了他记忆中的王胖子沟战斗经过部分。下面，我将他对我讲的战斗之前的情况抄录如下：

“孙永勤来罗圈沟是正月初四。大个子，骑着马，领着六个勤务兵。”1934年的时候，守印老人已14岁（虚岁）。2008年7月17日，他回忆说，“孙永勤想让我老爷孙永香当二头，自己做大头，好言好语，想和老爷认家了。老爷知不道咋想的，可能是有点看不起，不想去，没见，藏了。孙永勤一股火，初七又来。一早来，孙永勤没来，是关元有来的。这回不是六个了，很多人，村头全站上岗了，许进不许出。做饭，吃完早上饭，吹哨集合，把过去风灯的绳给剁开，把全庄人，40多口，两人拴一链，全拴起来了。又找孙永香，他家人知道藏在梁家沟。二头子说：‘你们要能找到孙永香，把你们都放了。要找不到，全让你们当民众（即民众军，指孙永勤部队——编者）去。’村里人有的乐意当民众，有的不乐意不是。不乐意的就让孙永香五儿子孙朝聘去找孙永香，那是他亲老爹。说‘这回你得去，你要不去，我们还40多人呢。’孙国安也跟村人一块绑着呢。孙朝聘找着他爹了，二头子见孙永香来了，乐着拍着他，就把庄里人都放了。孙永香就跟着去了王胖子沟，在孙永勤那儿一块呆着。孙朝聘到那儿去看过孙永香。呆到二月底，也知不道谁勾兵，咱们小人儿也不知道啊，二月底就来兵了。”

守印老人所说的情况，我为什么认为可能最接近真相呢？

两个理由：

1. 时间、情节、细节都非常清晰。

2. 符合孙永勤、孙永香的人物个性和心理。

作为一度威风八面的北七保的总保长，要给曾经的手下当副手，孙永香完全有可能觉得屈尊；对于脾气火爆的孙永勤来讲，非常诚恳地邀请孙永香加入民众军，却遭遇对方带有不屑味道的不合作，一时愤怒是很正常的。由正月初七关元有来，将罗圈沟村民全部绑起的目的不



过是要求孙永香出山，孙永香来了之后，立刻便将村民释放，孙守合老人回忆“老爷到那儿一瞅，孙永勤的人恭而敬之的，这让骑他的马、那让骑他的马”来看，民众军对孙永香一直是很尊敬的。情况发生巨大转折，是日军和伙会或者如孙守印老人所说的“保卫团”偷袭王胖子沟之后。由于队伍遭到攻击，且有战士牺牲，孙永勤及部下都不肯再原谅他，直接造成了不久之后孙永香家房屋被烧毁事件的发生。

“三月初四，孙永勤部队来，直接进罗圈沟。把孙永香和孙朝恩（孙朝恩是孙永香的侄儿）俩院，一人一个院，都站上岗了。头儿说大道东不让烧，大道西烧，要是跑东边，给救下。当时道东都是穷人，我们家就住在道东。把孙永香他们的房给点着了，道东没烧。”守印老人说。

孙永勤部队在王胖子沟遭遇偷袭，到底是孙永香授意儿子找来的日军、伙会或保卫团，还是孙永香儿子自作主张请他们来营救父亲，抑或是与他二人根本无关，现在已无法彻底搞清。上述十四个讲述王胖子沟战斗的版本中，有六个说孙永勤队伍遇袭是因为孙永香或他儿子调来了日伪，据此判断，孙永香或其子有重大嫌疑并非空穴来风。由孙永勤后来迁怒于他，将他家房屋烧毁来看，孙永香父子可能也确实逃脱不了干系。那么，能因为这个情况，就说孙永香父子，尤其是孙永香，死心塌地投靠日伪了吗？我觉得还不能这么归类。根据后来张福义被杀后，张福义之子张德兴能保住性命与孙永香多少有些关系；八路军包森部队过来后他派人给八路军送过信，并支援过八路军猪、羊、粮食；八路军、群众在他死前未对他清算来看，他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维护地方利益的日占区维持会会长那样的人物，地方群众利益要考虑，日伪的事情要应酬，抗日武装方面也不能得罪。“跟横河吕凤池一样，几面都维持，不维持站不住脚。我们村一个叫郑月秋的，只给日本办事，不给八路军办事，让八路军绑到上面一个偏记沟，砸死了，连枪子都吃不着。”孙永香之孙孙守礼对我说。那么，如果孙永勤队伍遇袭确与孙永香父子有关，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认为，孙永香父子，特别是孙永香本人，可能觉得只有土匪才做绑架的事，孙永勤先绑架了罗圈沟村民，后又将自己带到王胖子沟关起来，是土匪行为，找日伪来不过是打土匪而已。孙永勤将孙永香看做了死心投靠日伪的敌人了吗？我觉得也未必。他烧孙永香房应主要是因为自己有战士被打死的缘故。按孙守印老人的回忆，孙永香房被烧是1934年农历三月初四，公历为1934年4月17日，由这个时间到1935年5月24日孙永勤在毛山牺牲，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然未有任何关于孙永勤再找孙永香或他家人麻烦的说法。这一和孙永香据说在王胖子沟战斗后即因害怕报复搬到了兴隆镇有关，二和孙永香未到罪大恶极地步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根据我看过的资料和近年的走访，孙永勤对两种人毫不留情：一是日本人，二是铁杆汉奸。对这两种人，孙永勤坚决杀掉。然烧房之后，再未有孙永勤报复孙永香事情发生，至少现在未见到文字材料和听说过，那么我觉得孙永勤内心中只是把他当做了一个“道不同不相为

谋”的人而已。既然志向、道路不同，愤怒发泄过后，大家便各走各的人生之路，再不相扰。

孙永香什么时候从兴隆镇搬回罗圈沟不知，他于1946年去世。另有一种说法，去世于日本投降前。

“爷爷1946年去世，病死。死时70来岁，不到80。”孙永香之孙孙守礼说。

“孙永香上冻时死的，挖坑挖不动，第二年春天才埋的。死在寿王坟郑家庄，当时罗圈沟已经集家到郑家庄了。死时日本人还没投降呢。”孙守印老人说。

孙永香有六个儿子，传说中的搬来日军打孙永勤的孙朝阳，据孙守礼老人介绍，是孙永香次子。“游手好闲，生憨霸道的。修盘道梁带工，和日本人干架，得伤寒死了。”

“对爷爷没好看法，幸福我们没享受，罪恶替他享受了。我父亲虽跟着享受过富裕日子，但后来在罗圈沟被人用皮绳蘸凉水打。”2007年4月、2008年7月，我曾两次采访孙守礼老人，他不愿意多提他爷爷的事情。他本人参加过解放东北、天津、湖南的多场战役，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过贡献。但因为爷爷过去是地主，不仅父亲在土地复查时被打得露骨头，自己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也都受到牵连，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我爷爷不如吕凤池。我爷爷死时，好几十岁的都没掉眼泪。吕凤池被枪毙的时候，连知事儿的孩子都哭。没参加公判会的，全在家里跪着。我亲眼看见的，当时住在大舅家。一枪毙，大舅就跪下了，哇哇地哭啊！吕凤池救了很多人命。1943年，田野队‘扫荡’过来，把横河老百姓赶过来200人，赶到郑家庄河套，要枪毙。一个叫郭显宗的，中医大夫，让他背着一个四方的装酒的铁桶，里面生着炭火。疼得他在地下乱滚，一滚，火炭着得更欢。郭显宗至死身上都是大疤拉。表兄李勤被鞭子、棍棒打得肉皮黑紫，父亲他们找人抬到我家，养了半年。后来有人去告诉吕凤池，他骑马过来，跟田野说了不到两个小时，把人都放了。我爷爷没达到吕凤池那种程度，岁数大了，慢慢就死了。”



图84　张福义家　2007年4月

二、说过了孙永勤和孙永香之间的事情，再说说关于张福义加入民众军之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张福义加入民众军的经过几乎被一致地描述为：在孙永勤抗战的影响下，八卦岭村农民张福义组织100多人举行农民抗日大暴动，起义后与孙永勤会师。

如写作于20世纪50年代，至迟

1960年7月完成的《黄花川农民暴动》说：

“柳河川八挂岭村农民闻讯，心花开放。农民张福义支援战捷，发动了八卦岭农民暴动，缴获地主富农枪支，率众百人赶到车河口，与孙永勤部会师。”

热河烈士纪念馆1975年7月整理的《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中说：

“张福义是兴隆县八卦岭农民，于1934年2月于本村组织100余人起义，收缴本村地主枪支，奔车河口与孙永勤会合。”

兴隆党史办在1983年5月19日写给冀热辽分会正史编写组的《回答冀热辽分会有关孙永勤的几个具体问题：有关孙永勤的资料》中说：

“承德八卦岭的张福义、兴隆蓝旗营的年焕兴、苇子峪的李连贵也在孙永勤的影响下举行了农民抗日大暴动，并率其所属队伍与孙永勤会师。”

1988年编写完毕、同年出版的《热河革命史稿》在第一编第二章第四节《民族英雄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中说：

“两个月来，民众军转战车河、黑河、瀔河、柳河4条大川，打击日伪，发动民众，影响遍及长城内外。热南地区又有四支抗日暴动队伍先后与孙永勤部会师，民众军队伍迅速扩大到千余人。”编者在注释“与孙永勤部会师”的第三支队伍时写道：“承德县八挂岭村张福义组织百余农民暴动，转战到乌龙矶，与民众军会合。”

……

上述说法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不得而知，也非本书要探讨的内容。在本书中，我只将佟靖功先生1986、1988年调查的结果和我近年了解到的情况介绍如下。

张福义，今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张家锅伙人。八卦岭，过去也曾写作“八挂岭”。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南山有四个岭、北山有四个岭的缘故。张家锅伙是八卦岭的一个自然村，地处今承德、兴隆县交界承德县一侧的群山中，东北距承德县城下板城镇70华里，东距孙永勤曾攻打过的车河口10华里。村庄今有26户人家，解放前不过五六户人家，三四十口人。

张福义出生年不详。其容貌，据其子张德兴1988年向佟靖功先生回忆，“大个子，圆盘脸，黑黪黪的，一脸浅白麻子”。

“庄稼人，爱穿胶皮掌鞋。”2007年4月我到张家锅伙采访时，住在张福义家后面不远的高庆树老人补充说。

张家锅伙一带的农作物以玉米为主，有少量的高粱、谷子和豆子。张福义春夏秋三季在家干农活，冬闲时节一般出外做买卖。

“据老奶子（指张福义妻子）说，张福义做买卖，主要是从围场往南倒麻、大烟。”高庆树说，“围场那儿出线麻、大烟，南边没这些东西，缺就贵。麻、大烟卖了，再往北倒胶皮掌

子，穿靰鞡用。后来不知怎么，张福义倒大烟犯事了，在承德让人给抓了。抓他的人说：‘张福义，不想坐牢也行，只要三个月内，你能招十五个全副武装的人来，就放你。’张福义想，先放出去再说，就答应了。人给放出来了，可是上哪儿招那十五个人去？就要饭，不敢回家，怕再被抓。有一天要饭要到警察署前边，不敢要，想过去。结果警察署的官一眼看见他，就把他叫住了，问：‘你是哪儿的？’张福义说：‘我是八卦岭的。’‘你叫什么名字？’说：‘我叫张福义。’‘你是张福义？’怎么回事呢？有一天，老奶子在院外的石碾子上推东西。累了，抽口大烟。一个人拉白马往坡上走，一瞅这老奶子抽大烟，烟瘾立刻犯了，人就走不动了。老奶子瞅他可怜，请他住下，抽了一顿。走的时候，老奶子还给了他一块。这是一个恩情，拉马的记住了这家家主的名字叫张福义，当时张福义没在家。谁都想不到，这人后来当了警察署长。一打听清楚要饭的就是张福义后，就想报恩，于是一下子替他招了十五个人。张福义自跟警察署长认识，有了势力，就不倒烟了。后来趁好几个骡子、驴呢。”

高庆树所说的情况应发生于中华民国时期。日本侵略东北，土匪蜂拥至热河，各地纷纷兴办伙会抵御土匪后，八卦岭也办起了伙会，名字据张家锅伙张凤枝老人回忆叫大兴会。张福义家庭那时已比较富有，有土地20亩，六七个骡子，一个长工，一个“半活”，长短枪几支，又加上“是这沟信任的人”，即有威信的缘故，担任了大兴会的会长。

其后的事情，张福义亲属的叙述与民众军战士的回忆有些不一致：

张福义儿子张德兴说，孙永勤起义后，“来几次，我父亲他们才去的，是那年正月初五从这儿走的。正月初三来，呆到初五，进王胖子沟扎营”。

按照民众军战士孙文阁、孙文炳、史耀华的回忆，孙永勤只去了一次张家锅伙，而且是在攻打完张福义父子、接受关元有的建议之后，时间应为正月初六七或之后。

“从烧板子沟撤到五凤楼，头行人（即领导人——编者）开会。开会时，关元有说过迁安暴动的事，说民众不要吃迁安暴动的亏，提出要联合民团。从那儿，孙永勤到八卦岭把张福义联合来了。”1986年11月21日，孙文阁、孙文炳在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回忆说。

“三十晚黑夜咱们撤到五凤楼，住了十来天。住在五凤楼小庄，六七户，姓孟的老哥仨。三岔口也住着，看着寿王坟那条路。这时，张福义与他两个儿子贩卖大烟，四个骡子、三四个毛驴子，跟着八九个人，有几个汤二虎军队的给保镖，计十几人、十几支枪。那边有人送信，说八卦岭过来大烟客。孙永勤说，‘去两个排’。到大八卦岭打了半宿，打死两个老客，别的保镖的跑了，张福义和他两个儿子投降，大烟拿过来了。这是正月初六七的事。领导人开会，关元有说要联合民团，把张福义留下了。”1986年11月22日，史耀华对佟靖功先生说道。

上面两种说法，哪一种比较准确呢？

我认为，民众军战士一方可能比较准确。他们的说法中，不仅有情节，有细节，有邀请张

福义加入民众军的原因，而且其时间与前面孙守印老人的回忆有吻合之处：守印老人说，孙永勤正月初四到罗圈沟，正月初七没去，是关元有带队去的。民众军战士的说法正好解释了孙永勤为什么初四可以在罗圈沟出现，而初七却没见他的原因——他可能去了张家锅伙。而按照张德兴的说法，则孙永勤正月初四不可能出现在罗圈沟，除非守印老人的记忆出现差错。

那么，张德兴关于张福义加入民众军经过的回忆全部不准确吗？也不尽然。他说的孙永勤曾找过张福义几次有可能确有其事，但应该在孙永勤攻打张福义之前。我尝试复原的张福义加入民众军的全过程是：孙永勤在剿匪时曾与张福义并肩战斗过，至少是相识。筹备起义阶段和起义后，曾多次动员张福义一起抗战，但张福义没有响应。张福义运送大烟时，孙永勤最初不一定知道是他的驮队。战斗结束之后，经过关元有的劝告，孙永勤决定再做一次争取张福义的努力。他和关元有的分工是：关元有再去罗圈沟做孙永香工作，孙永勤去说服张福义。关元有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张福义经过孙永勤最后一次动员，终于同意了加入民众军，和孙永勤一起去了王胖子沟。

“孙永勤穿长袍戴礼帽，他媳妇跟着一块来。母亲不同意，能挡住了？”张德兴当年5岁（虚岁），2007年4月20日，他向我回忆了孙永勤最后一次到他家时的情景。

孙永勤来时还是他夫妻二人，回去时却已是5个人了。不仅张福义和孙永勤、雷永兰去了王胖子沟，张福义的两个儿子张德泰、张德录也随父亲一起参加了民众军。父子三人带去了三支枪：一支长枪、一把盒子枪、一棵撸子。

据张德兴回忆，张德泰走时年龄为21虚岁，“属虎，大二等个，圆盘脸，红白净子（即红白脸膛）”；张德录年龄为19虚岁，“属龙，长脸，尖下颏，瘦瘦的”。

“张德泰好枪法，一扬胳膊，鸟就掉地下，一般人。张德录漂亮，利索。”高庆树说。

张福义父子被吸纳进民众军中，关元有“不要吃迁安暴动的亏”的话起了关键作用。迁安暴动的“亏”，即教训，是什么呢？

先将迁安暴动经过简单介绍如下：

1933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以惨败结束，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对此次失败刻骨难忘。据传，他在给陈诚的一份手谕中写道：“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为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彻底摧毁中央苏区，蒋介石于当年5月在南昌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披挂上阵，准备对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

为配合南方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向办公机关在北平的中共河北省委发出了创建“北方苏维埃区域”的指示。1933年时期的中共河北省委有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门、张家口市委，京东、直南、陕北特别区委，津南特别委员会10个下属组织，

其中的京东特委下辖玉田、遵化、乐亭、迁安、滦县、丰润6个县委。中共河北省委于1933年6月23日作出了《目前华北政治形势与创造新苏区的决议》，要求华北各地党组织效法南方苏区的做法，开展土地革命，坚决为创建新苏区与红军而斗争。京东特委负责人接到中共河北省委指示后，认为迁安党组织稳固，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发展势头迅猛，具备暴动条件，于是请求首先在迁安发动农民武装暴动。京东特委的意见得到了河北省委的赞同，但遭到了以李子光、韩东征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迁安县委的反对。李子光、韩东征等人经过反复研究讨论，认为上级党委提出的暴动计划不符合迁安革命斗争实际，是过“左”的行为，必然招致失败，拒绝执行。当时正值“左”倾思想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李子光、韩东征等人遭到了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不仅被上纲上线地批评为“拥护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与维护国民党统一”、“阻止游击运动的发展”、“欢迎国民党‘围剿’红军”，而且被“切断关系”，由京东特委另立以高永祥即王平陆为书记的新迁安县委，加紧暴动准备工作。

1933年12月6日、7日，迁安新县委在迁安西部的长河地区（今属迁西县）组织了100多中共党员、民众会员及自卫队员游行示威。他们以全副武装的自卫队为先导，高喊“打倒土豪劣绅”、“抗捐、抗税、抗债、抗团费”等口号，贴标语，散传单，企图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发动民众。这次行动引起了迁安当地统治者的警觉，迁安新县委决定加快暴动准备工作。他们在长河东西两区开办了游击队训练班，于1934年1月23日傍晚正式宣布暴动开始。

暴动队员从长河东区的上下梨树峪出发，到前韩庄西山里后与长河西区的暴动队员会合在一起。两部分队员共100余人，他们手持各种武器，沿途收缴地主、鸦片商、高利贷者及警察所的枪支。由于缺乏群众拥护，从24日中午起，便不断有队员因信心不足脱离队伍。至24日晚，暴动队员剩下70余人。他们在河北庄吃过晚饭，准备从那里开往西寨。出发前突接县委通知，称前方村庄民团已做好攻击他们的准备。领导人意见发生分歧，最后决定，一部继续按计划前往西寨，一部则向西前进。西去的队伍当夜被民团击溃，东去的队伍于1月25日上午被团警包围，退至青山口南山，20余名暴动队员被捕，仅有少数脱身。迁安农民暴动仅维持了三天的时间，便以失败宣告结束。

迁安暴动的后果十分严重：很多队员被抄家封门，被迫逃亡外地；被捕的共产党员和暴动骨干被押送天津等地监狱服刑，个别人甚至牺牲于狱中；长河两岸20多个中共支部大部解体；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众会瓦解。迁安西部共产党的活动受到重创，陷入低谷，直到1936年春彭真被中共河北省委派到京东指导工作后，才得以渐渐恢复。

“京东这个地方，20世纪30年代是个是非之地。”2006年夏，原唐山市委党史办副主任李成民先生在回忆迁安暴动历史时说道，“30年代初期，兵荒马乱，各派势力，包括中国国内的，还有日本的，很乱。我们共产党的组织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是当

时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当时党中央在南方反‘围剿’，不久就被迫长征了。我们在京东这儿搞什么呢？1933年这儿根据中央的指示，按照王明的路线走，还在打土豪分田地。这在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京东来说，已经不适合了。1933年5月16日日军进入唐山，很快，不到20号，直接威逼北平和天津。到5月31号《塘沽协定》一签，冀东就成缓冲区了，实际上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人说了不算了。那么这时候你再打土豪分田地，显然就不适应了，因为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对。在京东来说，当时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国内矛盾了，而是上升为民族矛盾了。在民族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如果还用对待国内阶级矛盾的方法处理问题，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所以在迁安搞暴动是失败的，群众、党组织、各派政治势力都拢不起来，都拧不到一块。”

迁安暴动的教训十分深刻。在它失败69年后，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出版了一本专著《冀东革命史》，在第七章第三节《农村革命力量的增长与迁安暴动的失败》中，编著者们这样写道：“《塘沽协定》签订后的迁安县乃至整个冀东地区，名义上虽仍属中国地方政府管辖，实际上已处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监视与政治控制之下。受日军庇护而横行于冀东各地的日本与朝鲜的流氓无赖，恣意欺凌、压榨与毒害冀东各界人民，故日本侵略势力不仅为下层广大劳动群众所切齿痛恨，同时也日益激起冀东各界包括中上层社会中尚有良知与爱国心的人士的强烈不满。尽管冀东社会内部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甚至是尖锐的阶级矛盾，中日民族矛盾毕竟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正日益成为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最主要最迫切的要求。然而，受王明‘左’倾错误观点束缚的迁安暴动的决策者却未能正确认识冀东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上述变化的基本事实，仍旧继续执行并不切合冀东实际情况的河北省委《目前华北政治形势与创造新苏区的决议》，照搬党在南方开展土地革命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发动了旨在打土豪、分田地、创造新苏区的农民暴动。这就把统治阶级中那些本来可能争取过来共同抗日的力量同其他反动势力一起放在了革命的对立面，减少了革命的同盟者和同情者，使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处于孤立状态。其次，由于把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开展抗日救亡这一最主要、最迫切的要求抛在一边，而去搞打土豪、分田地、创建新苏区，也就造成了脱离基本群众的错误。从暴动前的游行示威到拉起队伍武装暴动，始终是以共产党员为主，人民群众参加者不多，这就把本应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为主体的革命斗争变成了少数共产党员的孤军奋战，结果势必被远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所打败。第三，迁安暴动的决策者在执行‘左’倾政治路线的同时也执行‘左’倾的组织路线，对在暴动问题上持有与其不同、但却是正确意见的党员干部强加种种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切断这些共产党员与组织的联系，这就在暴动之前首先削弱了本不强大的革命力量。”

《冀东革命史》出版于1993年。十几年后，读到这些实事求是、毫不客气地评论与分析，仍不得不佩服这些编著者们直面历史的勇气。

攻打张福义驮队，距离迁安暴动失败不过一个月零几天。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对这场农民暴动的教训做出总结，并提醒民众军勿重蹈覆辙，关元有与关内的中共党组织之间一定有着一条极其秘密的地下联系通道。结合关元有与李子光、韩东征在迁安农民暴动的问题上观点一致来看，我倾向于认为关元有一直受着中共迁安县委（非新县委）的某种指导。2008年7月，我在兴隆县史志办提供给我的一批之前未发现的资料中，看到佟靖功、栾福忠先生1987年3月采访原中共遵化县委书记骆凤庭的原始记录稿，上有骆凤庭的一句话："关元有搞暴动时，高存还向关介绍过迁西暴动的教训，是李运昌总结的：今后搞暴动要注意争取各村的民团、自卫团。"因为有这句话，关元有受中共迁安县委（非新县委）秘密领导，联系人为高存，得到了证实。

关元有"不要吃迁安暴动的亏"的建议对孙永勤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之前他在至少三年的抗匪生涯中，已对伙会联合起来便能够消灭一切土匪这一点有了深刻的体会，关元有的话令他突然看到了如果能将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联合起来，也许很快就能实现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光明前景。

"孙永勤在五凤楼的时候，明确了一个思想：团结民团（应为'伙会'，下同——编者），争取民团。他有一个想法，要把队伍搞成民团的大联合。民团的大联合曾经抗过匪，民团的再次大联合就能抗日。这是孙永勤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法宝。"佟靖功先生说。

三、最后谈谈民众军更名为"抗日救国军"的问题。

"在五凤楼，孙永勤把旗子改为'抗日义勇军'。告诉民众要舍身不舍土，要国不要家。"

1986年11月21日，孙文阁、孙文炳在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说了上面一番话。其中的"抗日义勇军"显然为"抗日救国军"之口误。

认为孙永勤是在五凤楼即王胖子沟驻扎时，将民众军更名为抗日救国军的不止他二人，1986年11月22日，佟靖功先生到黄花峪访问时，孙永勤表外甥史耀华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

"孙永勤接到过共产党组织来的信，他们念时我听到过。信里说毛主席、朱总司令、红军快过来了。以前叫'民众'，看信以后，孙永勤说：'咱们也起个名叫抗日救国军。'以后就红臂箍，上面是黑字'抗日救国军'。红旗，上面用黑字写着'抗日救国军'。在五凤楼看过一回信，还看过一次信，没见到人（应指送信的人——编者）。"

孙永勤在五凤楼看信的具体时间，佟靖功先生的采访记录中未显示；孙文阁、孙文炳的回忆录中，也未明确说出民众军更名的具体年月日。由上下文来看，应是1934年农历正月初六七，民众军领导人开会，关元有建议吸取迁安暴动教训、联合民团前后。

由于现有文字材料中未有孙永勤两次或多次驻扎到王胖子沟的记载，我近年到五凤楼调查时，也未听当地人说过孙永勤有再去王胖子沟的经历，故我认为，如孙文阁、孙文炳、史耀华的回忆无误的话，那么民众军更名为抗日救国军的时间，应就是1934年农历正月初那一次，具

体日期当为正月初六七或其前后，转换成公历为1934年2月19、20日或其前后。

孙永勤是看了哪个共产党组织的来信，决定将民众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军的呢？佟靖功先生的采访记录中同样没有记载。我猜想这不是佟先生未记、未问，而是孙永勤不可能把很多东西都主动告知史耀华的缘故。史耀华虽然与孙永勤有亲戚关系，然他毕竟只是军法处的一名普通战士而已。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破解的谜团。迄今为止，所有已发表的关于孙永勤抗战的文章都将民众军更名为抗日救国军说成是：王平陆与孙永勤“会见”、当面建议的结果。然王平陆与孙永勤会面的时间既有1934年2月说，也有1934年5月说，以认可后者的为最多；会面的地点既有黑河说、五指山双塘子说、兴隆与遵化交界的长城一带说，也有车河口或上下板城说，莫衷一是。

“我跟孙永勤并不认识，我们党派人去过。孙永勤是兴隆县黄花川人，他是民族英雄。在中华民族困难的时候，他发起了义勇军。日本军国主义对孙永勤这个民族英雄非常害怕，非常痛恨，所以想用全力消灭孙永勤的部队。孙永勤在热河的战斗比较孤立，热河的伪组织都反对孙永勤。关里的伪组织表面上赞成，实际上也不赞成。但共产党赞成，派人和他联系。去的人叫王平陆，迁安人。他回来后，报告了孙永勤起义的经过，说孙永勤很开明，你一说，他赞成，把民众军改成了抗日救国军。”

2005年6月16日，我到北京医院采访了1932年9月至1935年1月担任京东御侮救亡会主任的李运昌将军，他也持民众军改名抗日救国军是王平陆建议的观点。如此看来，王平陆促成了民众军改名似乎已无疑义。

王平陆的生平介绍如下：

王平陆，有的材料也写成王平路，原名高永祥，1902年出生于迁安县二拨子乡上梨树峪村（今属迁西县罗家屯镇管辖）。王平陆小时候勤奋好学，成年后，曾到哈尔滨中东铁路当过一段时间路警，因不忍目睹日本人在东北的残暴统治，愤而返乡。1932年，王平陆在中共党组织的培养下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将名字由高永祥改成了王平陆。王平陆对共产党的事业非常忠诚，他不仅动员自己的弟弟、妹妹也参加了革命，而且把他家辟作了地下党人的活动基地，京东御侮救亡会主任李运昌、迁安县委书记韩东征等常以他家为落脚点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7月，韩东征因为拒绝执行中共河北省委、中共京东特委关于在迁安发动农民武装暴动的指示，被错误地定性为“迁安右派”，与迁遵蓟中心县委书记李子光一起被撤销了职务，新的迁安县委书记一职由王平陆担任。王平陆为实现中共河北省委、中共京东特委建立北方苏区与红军的设想，变卖自家土地、树木和家产，购买了枪支弹药，聚集了一百多名暴动队员，于1934年1月23日，开始了迁安农民暴动。这次暴动因严重脱离《塘沽协定》后的冀东实际，因而没有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仅支撑了三天便宣告失败。王平陆也不得不转移到滦县、乐亭等地，以


图85　王平陆（照片提供：冀东烈士纪念馆）

躲避团警的通缉，并帮助恢复那里的党组织。1935年夏，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将京东特委分建为京东、冀热边两个特委，王平陆被任命为中共河北省冀热边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冀热边特委）书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在冀东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王平陆担任分会常委，党内改任为冀热边特委军事部长。当年12月，特委在滦县多余屯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游击战争，王平陆回到迁安西部，在黑洼村组建了“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第一支队”，任支队司令员。1938年1月7日夜，王平陆带领一支队攻打清河沿国境警防所，战斗中负伤，因失血过多牺牲。1949年，《子弟兵报》发表《王平陆同志》一文，评价1938年1月7日夜的枪声，“是冀东人民向日寇汉奸开火的第一枪”，“震醒了冀东千百万同胞，拉开了当年7月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的序幕，而王平陆是当时的揭幕人”。

王平陆与孙永勤会面，从时间上推断，正是在迁安暴动失败后，他在滦县、乐亭、玉田、丰润一带“流亡”期间。见到孙永勤时，除中共迁安县委书记外，他应还有一个身份：中共京东特委组织委员。这个职务是根据河北省委要求在京东特委成员中增加两名农民委员的要求，于1933年12月任命的，王平陆担任这个职务至少达半年之久。

“1934年2月，中共冀东特委（应为‘中共京东特委’——编者）根据我党中央关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派特委委员王平陆同志来到民众军的军部，向永勤耐心地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策略。王平陆同志还建议把‘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永勤看到这支队伍有了党的领导，心明眼亮，好像老虎身上长了一对翅膀，立即按照王平陆同志的意见，整编队伍，改名为‘抗日救国军’。”大约2006年4月，我读到了雷永兰口述、从言己整理的《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回忆丈夫孙永勤》，雷永兰以孙永勤妻子的身份确认了王平陆与孙永勤见面之事属实，时间为1934年2月。地点她虽只说是民众军军部，由孙文阁、孙文炳、史耀华、张德兴都回忆当时民众军军部在王胖子沟来看，王平陆与孙永勤见面是在五凤楼王胖子沟。

那么如何看待史耀华所说的孙永勤接信改名说呢？

我的看法是，史耀华听到的那封信是王平陆1934年2月19、20日前后在王胖子沟与孙永勤见面时随身带去的。至于那封信是谁写的，不清楚。

除了带去一封书信、促成了民众军更名外，王平陆在王胖子沟是否还做过一些其他的事情呢？



根据史耀华回忆的领导人开过一次会，会上关元有强调勿重蹈迁安暴动覆辙这一情况来看，王平陆有可能与时任副军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关元有进行过秘密接触——既然关元有的入党介绍人是高存，而高存又是迁安暴动在遵化方面的策应者，受暴动总负责人王平陆的领导，他完全有可能把关元有是共产党员的情况告诉王平陆，正像半年后他告诉骆凤庭一样。王关秘密商谈的内容，现已无法查考，根据抗日救国军后来的历史和地下党员刘俊岳的回忆来看，以下两种可能性都有：

1. 王平陆在经历了迁安暴动失败这一事件后，和李运昌、高存一样已深刻认识到冀东长城一带的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他希望关元有向民众军将领渗透联合各阶层一致抗日的意识。由民众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军、强调队伍的总旨是打击日本侵略者、吸引愿意抗日的人们共同抗战这一情况来看，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并猜测孙永勤接到的那封信有一种可能就是高存写的，高存将李运昌总结的迁安暴动教训写给了关元有，由王平陆交到关元有手中，关元有看后又拿给了孙永勤。

2. 王平陆尚未摆脱“左”倾路线影响，要求关元有积极发展暴动骨干，一旦时机成熟，即发动针对地主、土豪及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暴动。抗日救国军发展的中期，发生过加入孙永勤部队的中共地下党员派遣同是地下党员的刘俊岳到迁安东韩庄，找韩东征请示什么时候暴动之事，证明抗日救国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仍受着“左”倾路线的影响。

以上的猜测建立在王平陆、关元有曾经秘密见过面的基础上，也有一种可能，王、关根本没接触过：高存没有告诉他关元有的情况，王平陆因此不知道关是共产党员。

还存在一种情况：史耀华回忆的关元有讲话的时间是1934年农历正月初六七前后，但他未提及民众军更名的具体日期是在初六七之前还是之后。这就出现了一种可能，即关元有在王平陆到达民众军军部之前，由于已经从他和高存之间的秘密通道了解到了迁安暴动失败的教训，发现民众军有重蹈迁安暴动覆辙的倾向，先于王平陆向孙永勤及民众军其他领导人提出了有利于队伍在热河发展的建议。

真实的情况如何，期待发现有力的材料，予以澄清。

民众军初改名为“抗日救国军”时，史耀华记忆中的军旗是红旗、黑字。亦有人回忆，抗日救国军一度使用过三角大旗，上面是圆的红月亮，月亮周围写着“抗日救国义勇军”几个大红字。根据保存在热河烈士纪念馆中的一份材料，抗日救国军的旗帜最后定型为“旗面白布，中间楷书红字，边为红边”。

大约1974年，至迟1975年搜集整理的这份材料上，还保留了对改为抗日救国军后的孙永勤及其部队士兵形象、发式、服装的记忆。更名为抗日救国军后，即1934年2月以后，孙永勤的形象被描绘为：高个；长巴脸，色黑，脸凹一些；光头；胡须不轻不重，络腮胡子；穿对襟上

衣；所穿的鞋是单脸鞋，戴毡帽头；说话、动作稳，长相憨厚。普通士兵的发式为：有留小辫的，有光头的，有剃一圈留一刷背头的，有剃一圈留一个小辫子的。部队没有统一军服，都是农民打扮。多数戴毡帽头，少数戴瓜皮帽。多数人穿月白色上衣及裤子（土染法的颜色），少数穿青色，个别穿蓝色。上衣有对大襟的，也有带大襟的。绝大多数人腿上扎腿带。穿的鞋，既有带脸的（单脸或双脸），也有闷帮的，鞋面要么青色，要么月白色。武器方面，士兵一般使用七九、三八、湖北造等枪，军官一般用盒子枪。

这份资料非常宝贵，为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孙永勤领导的这支农民抗日武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1934年2月19、20日前后，民众军更名为抗日救国军，我们此后将不再使用民众军这一名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其最初的叫法已深入人心，冀东长城南北的百姓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仍习惯以“民众”或“民众子”称呼之。

抗日救国军在五凤楼王胖子沟驻扎期间，除发生了上面介绍的孙永勤与孙永香分道扬镳、张福义父子加入民众军、民众军更名抗日救国军三件事情外，还可能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李连贵、年焕兴、康永贵来投，各率一支队伍加入了抗日救国军的战斗序列。这是根据史耀华前面的回忆：攻打张福义父子驮队之时，李连贵、年焕兴、康永贵已来，并已回到了各自分散活动的地区而说出此看法的。然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文字材料中，李连贵加入抗日救国军的时间，除史耀华的1934年农历正月初六七前后在王胖子沟加入说外，尚有农历二月在苇子峪加入说及公历1934年5月在五指山加入说。年焕兴加入抗日救国军的时间除1934年农历正月初六七前后在王胖子沟加入说外，尚有1933年农历十一月加入说、公历1934年3月在五指山加入说、公历1934年3月在五凤楼加入说、1934年5月在五指山加入说。康永贵加入抗日救国军的时间除1934年农历正月初六七前后说外，还有公历1934年5月说。各种说法措辞都比较肯定，然都缺乏更多人的证明。在发现强有力的证据之前，为了不埋没李连贵、年焕兴、康永贵三人的功绩，本书暂依史耀华三人均在1934年农历正月初六七前后，即公历1934年2月19、20日前后到王胖子沟加入抗日救国军的说法。

先介绍李连贵的情况。

李连贵，孙永勤队伍中我最佩服的第三个人物。头两个人，之前已介绍，第一为孙永勤，第二为关元有。

李连贵的家乡在今兴隆县蓝旗营乡的苇子峪。村庄坐落于长城北面惊涛般起伏的群山的深处，北距乡政府驻地蓝旗营7华里，西南距洪武年间修建的明长城重要关口马蹄峪关30华里。村子地处由蓝旗营经开庄前往马蹄峪和关内的必经之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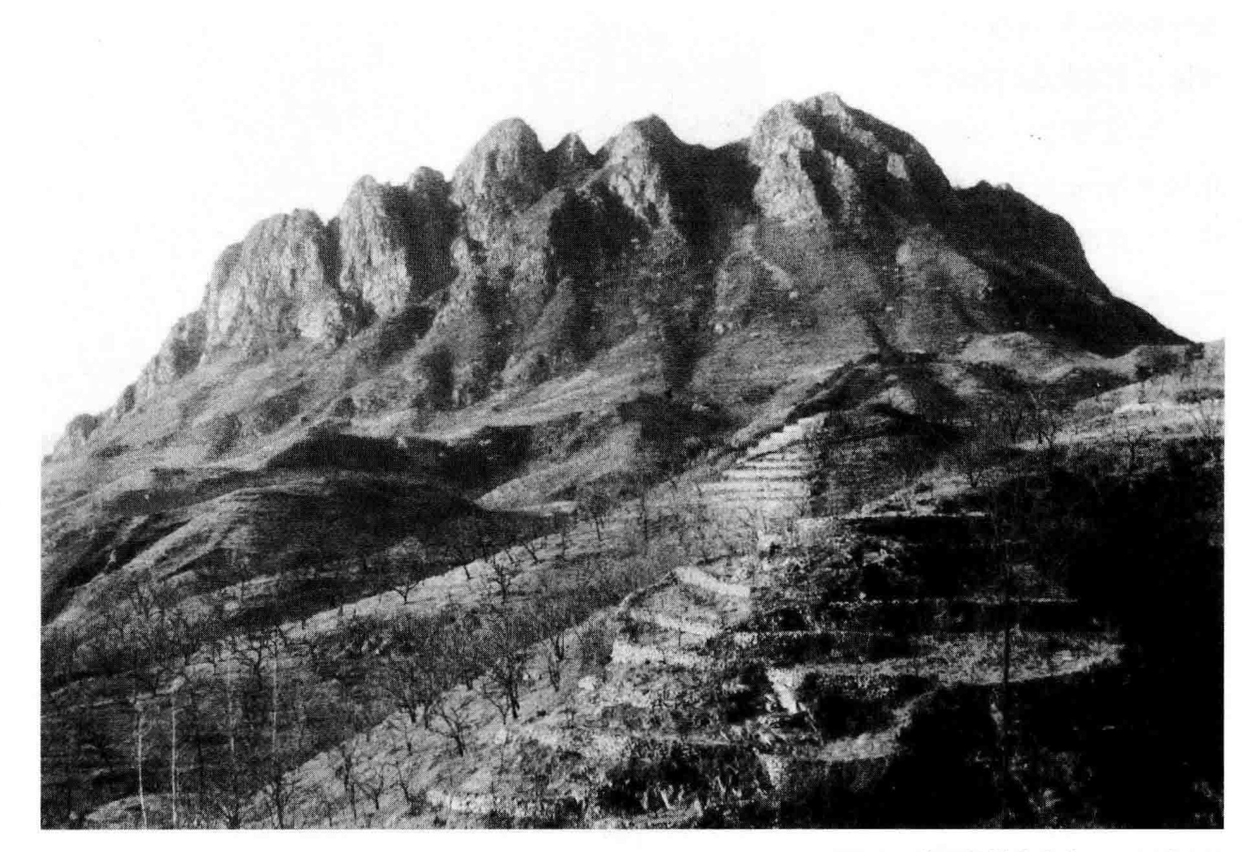


图86 苇子峪村北青山 2006年4月

“小伙子挺漂亮，细高挑，一米八左右。”2006年4月，我到李连贵家乡采访时，与刁山峪的陈国林老人不期而遇。他是李连贵重孙李海东的姥爷，当年84岁（虚岁），来苇子峪看望女儿一家。他记得见到李连贵时自己十来岁，李连贵“挺威武的。当过北五保的保长，开过旅店，南北向房，两层，十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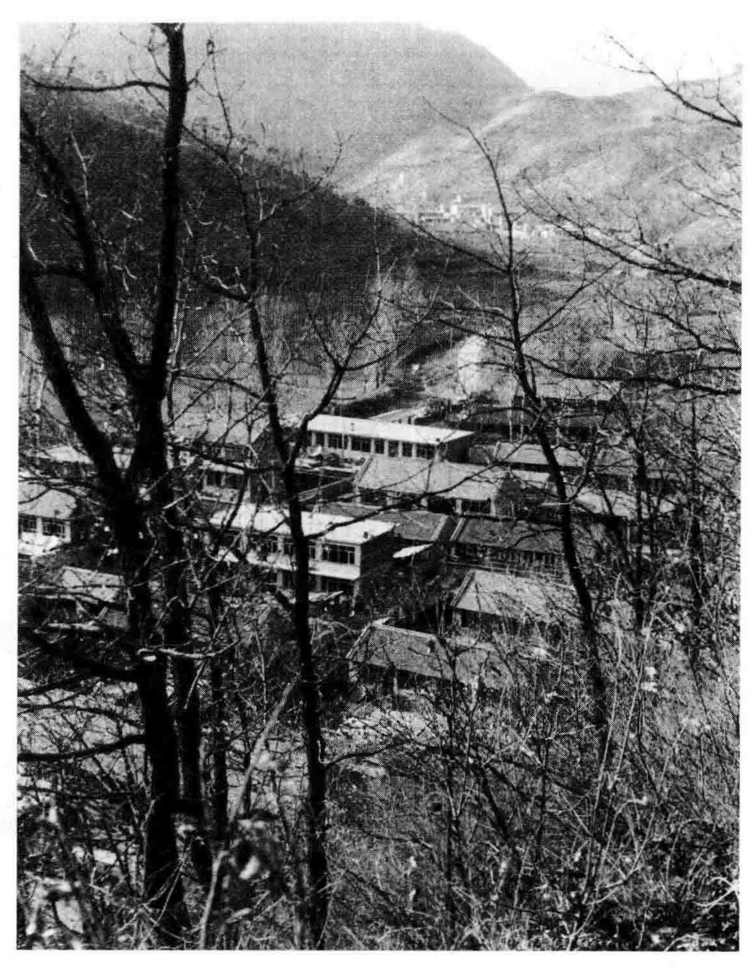
“大个子，肚子脸，黄白净子。”也有人这样形容李连贵的相貌。“肚子脸”、“黄白净子”为兴隆方言，前者是说脸型圆而胖，后者指脸上皮肤白净，微带黄色。

根据佟靖功先生1989年1月在苇子峪的采访，李连贵祖籍为今天津市宝坻县林山口，他一家是他爷爷那一辈挑担出长城落户到的苇子峪。他爷爷的名字不知。父亲的名字，据李连贵侄子李山回忆叫李有，据一位名叫管振兴的人向佟靖功先生回忆叫李老广。李有与李老广是否分别为他父亲的名字与号不得而知。

李山未对李连贵父亲的情况做过介绍，管振兴说李连贵父亲“虽不算太富裕，在这一片也数得着，雇活雇月”。李连贵父亲生子二人，大儿子名李连福，二儿子即李连贵。李山回忆：“李连贵老爷子小时候成天爱打枪，爱打鸟。一枪打过三个山老鸦。念过书，有二三年私塾底。心灵，性傲，能说大鼓书，自拉自唱。”李连贵之子李恩也说他父亲“什么都喜欢，喜欢

说快板书，枪打得好”。另有人回忆，李连贵还会点武术。

李连贵妻子为佟家沟人，陈国林十余岁见到她时“挺年轻”，有可能年龄比李连贵小不少。夫妻二人共生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五个儿子目前知道前四个的名字：大儿子李明，二儿子李青（也有的写作李清），三儿子李年，四儿子李恩。李明过继给了李连福。四个女儿目前知道三女儿名叫李金荣。2006年4月，我在李海东——李连贵次子李青之孙的带领下，到遵化市侯家寨乡前山寨村采访过她。她当年75虚岁，是李连贵唯一在世的子女。


图87　苇子峪　2006年4月

李连贵有可能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管振兴回忆：“没钱花时，李连贵偷过他爷爷的东西。后来李连贵过没招了，要钱，赢俩钱维持生活。以后在这河东开了个店。”这个店就应是陈国林老人说的“南北向、两层、十间”的旅店。开了一段时间旅店后，据说1927年，“老抢”到了苇子峪一带。“老抢”即土匪，匪头是孙宝贵，也有的说还有坐山雕、大镜面、马拐子等。苇子峪成立了伙会，也有人说叫民团、自卫团、乡团，李连贵是会长，带领伙会成员打了一年多土匪。他曾在靠近长城的小石门沟门打死过三名土匪，其中一个叫吴俊田，马圈子人。一个叫吴连芳的本来和吴俊田一块儿当土匪，见吴俊田被打死，便再也不当土匪了。

伙会最初用的是火枪，后来逐步换成了大枪。到孙永勤起义时，苇子峪有大枪一二十支，亦有一种说法几十支。

李连贵、孙永勤能认识，据抗日救国军战士、金斗峪的常久芳老人向佟靖功先生回忆，就是因为枪。说是车河口战斗后，孙永勤带队奔半壁山，从大兰口往西转，“得着目标，苇子峪有一个李连贵，有一个张嘴蹬把撸子，花牌撸子（原文如此，是‘张嘴蹬撸子’还是‘花牌

撸子'不确定——编者)。孙永勤动员李连贵:'这个撸子我们使使吧。'李连贵说:'这撸子不是我的，是我亲家的。'咋说也不给。孙永勤说:'你在瀫河套成立一队人，你这枪就不用交了!'李连贵是佟家沟的丈人家，张申是李连贵的小舅子。李连贵来到佟家沟，张申、金斗峪的司福来、蓝旗营的年焕兴等集中十二三个人。李、年是队长，在瀫河套活动。孙永勤就上黑锅顶了。露了目标，满洲队追，孙永勤把黑锅顶点着了。孙的100多人从刁山那边跑了，奔洪山口、瀫河桥，弄了1000多斤火药，十六七支火炮，一宿工夫奔灰窑峪。之后把三四千斤火药、锅岔子弄到岳老亮前山上。前山离岳老亮家半里来地，一亮天就往岳老亮的院子开家什了。岳老亮的兵给打得出不来。大院四角都有炮楼，打大院打到烧后晌火，把岳家院推平了。”

常久芳老人的回忆中有一些不准确之处。如张申非李连贵的小舅子，李连贵妻子姓佟，张申姓张，张申与李连贵之间没有姻亲关系。岳家大院也没有被推平，按彭杖子徐文林老人说法，大院的炮楼被打出了裂纹，但其他无损坏。真实的情况是，第一次，孙永勤未能攻进岳家大院。虽然有这样的问题，常久芳老人的上述谈话仍非常有价值，它提供了孙永勤、李连贵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李连贵加入孙永勤队伍的最初原因及李连贵队伍的最初成员。

按照常久芳老人的回忆，孙永勤、李连贵第一次见面时间为1934年农历春节前，地点为苇子峪。也有另一种说法，孙、李第一次见面是1934年农历二月，地点在榆树林。李连贵侄子李山持这种观点。1989年1月20日，他对佟靖功先生说:“我16岁那年，1934年，这是孙、李第一次取得联系。旧历2月间，这沟里榆树林唱影，我二叔李连贵也在那儿看影。有人跟他说，孙永勤来了。孙打发四个弟兄来找我二叔。孙永勤与李连贵一嘀咕，说:'要在苇子峪收枪。'李连贵说:'好，我也算一份。'我二叔回来，对我爸爸说:'孙永勤要枪来了。'我爸爸说:'你跟去呀?'我二叔说:'我不过日子了，豁出来了。'就跟着去了。一夜之间把苇子峪村的一二十支大枪都收了。”

李山的回忆，我不怀疑其情节的真实性，因为孙李联系的过程，及李连贵、李连福兄弟俩对话的内容非是想编造就能编出的。我有疑问的是，其“旧历二月间”的说法是否准确。佟靖功先生的原始采访记录中，几乎对所有被采访对象都未注明周岁、虚岁，恰恰在采访李山的原始记录上，明确注着1989年时李山70虚岁。照此来推，他应出生于1920年，至1934年，虚岁应为15，非16。李山上述回忆中，肯定地说孙李第一次见面时，他16岁，与他实际年龄不符。如果在他的年龄问题上都能够出现差错，理论上在孙李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上出现差错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李山的虚岁不是虚一岁，而是虚两岁，如果这样的话，1934年农历二月他已经16岁是有可能的。为了搞清李山是虚一岁还是虚两岁的问题，2010年5月27日，我给李连贵重孙李海东打去了电话，请他帮助核实。30日晚，接他电话:经向老人们询问，李山的准确出生日期为农历九月初四。至此，李山虚两岁的情况已经可以排除。



图88　李金荣与丈夫。2006年4月

李山是李连贵1934年农历二月加入抗日救国军说的代表，究竟他的说法准确，还是史耀华、常久芳的说法准确，目前不好明确判断，期待着有新的材料出现。

“我们老公公跟孙永勤走了。咳，一想起我都头疼，三间房子全让日本兵给点了。闹民众，孙永勤、老公公他们走了这就挨抄。走了就抄了，还没死呢。”李连贵五儿媳陈桂荣说。她印象中公公家只有三间住房，李连贵四儿子李恩1989年回忆是七间。他说：“我父亲于遵化毛山被围以前，我们家的七间海青房被烧毁，是特务白义斋领着警察来给烧的。烧的时间不是冬季就是春季。”李连贵家到底有三间还是七间住房？住房和旅店是什么关系？2010年5月27日，我请李海东帮助核实李山出生时间的同时，一并进行了解。5月30日，他告知我，太爷家有住房七间的说法是准确的，并说，住房没有兼作旅店，旅店十间在村子另外一个地方。

“父亲是个野人，光顾国，不顾家。”李连贵三女儿李金荣说。李金荣，2006年时75虚岁。我当年是因为李海东介绍，才知道李连贵还有一个亲生子女健在的。汽车从苇子峪向南开出后，一直在高山和深谷里的盘山公路上穿行，直到半个小时后看到侯家寨的路标，才知道翻越的是马蹄峪地区的大山，我们已进入遵化地界。汽车又向东北方向行驶十几华里，在距离鹫峰山不远处向北拐入一条山沟，当我们来到很里面的一个山村时，天色已快黑了。这是燕山南麓的一个小村庄，村子的名字叫前山寨，与鹫峰山同属遵化市侯家寨乡管辖，鹫峰山就在村庄东北面不足两华里处。

李金荣住在村子中央大门朝东的一座瓦房里。她为什么要嫁到燕山南侧这样一个地方，几十年中，因为燕山和长城阻隔，无法与北面的家乡相望？

她的命运，她母亲的命运，她一家人的悲惨命运，在她的父亲李连贵决定离家抗日那一刻，就被注定了。

“我5岁时父亲起义，他出走后就再没回来过。父亲临走时对我母亲说：‘你该出门子出门子，我反正‘满洲国’不推了不上家。’父亲走后，就母亲一个人撑着一大家。母亲累得心



口疼，嗷嗷叫。因为孩子太多，一个老妹子后来不得不过出去了，不然没法过。'满洲国'时集家并村，日本人准备把村里人都抓起来，移民到坝上去。男子都跑了。二哥钻席筒子，被警察拽了出来。三哥跑了。瓦房烧了12间。母亲小脚，骑着驴，一哭哭出西门，差点跳山涧，多亏白旗营保长王桂芳把她和嫂子救了。遭难时，谁都不理。二哥后来不得不给人锥鞋维持生活。我16岁时，母亲心口疼，病死。母亲七月十六死的，我九月初六出的门子。大舅给保的媒，见都没见过。村里人都说：'那么小岁数就出门子？'回家时，到母亲坟地好哭一场，觉得没爹没妈，自己太可怜了。5岁，父亲就走了，谁不想爹呀！有个坟骨朵，也给他烧纸啊，可是想管啥呀……"

李金荣讲话时，她的老伴一直默默地陪伴着她。还好与一个老实本分的人结合在了一起，这大概在李金荣悲苦的内心世界中是唯一感到慰藉的事情。

从李金荣家出来时，天色已经全黑了。汽车在黑黢黢的山道上行驶，经马蹄峪重新翻回苇子峪。那一路上，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李金荣几次欲流泪的情景，并且直到今天仍难以忘记。

李连贵在孙永勤军中不仅作战勇敢，指挥镇定有方，而且军事方面的嗅觉极其敏锐。佟靖功先生上世纪80年代调查他的情况时，曾听到一些抗日救国军老战士称之为"神机军师"，意谓他总是能捕捉到战机，并且能提前预见到不利的情况发生，及时指挥部下予以规避。李连贵



图89　年焕兴（中）　（照片提供：吴建华）

是一个深为孙永勤所器重之人，也是一个牺牲几十年之后仍为幸存者叹服不已的人。

李连贵主要活动于澈河、罗文峪一带，重孙李海东说他总是“骑白马”。

再介绍年焕兴的情况。

年焕兴，今兴隆县蓝旗营乡蓝旗营村人。据司显文1989年1月向佟靖功先生回忆，年焕兴父亲名叫年学文，年学文大概兄弟十个，他是老大。年焕兴是年学文的独子。出生时间，司显文未说。据《记优秀的抗日游击大队长年焕兴事迹》作者王泽、张福庭介绍，年焕兴出生于1912年1月19日。

年焕兴参加抗日救国军的时间、地点、经过，各种材料记载不一。

司显文说，蓝旗营有个叫赵福成的，本姓周，马圈子人，因蓝旗营赵廷喜无子，过继给他，改姓赵。“有一年赵福成参加孙永勤的民众军，赵福成叫年焕兴参加，年焕兴又让我去。我正闹病就没去，年焕兴与赵福成去了。黑夜打半壁山警察署，冬天，十一月间。以后司显奎（蓝旗营）、郭占岐（蓝旗营）等人也去参加了民众军。”

按照司显文上面的说法，年焕兴为1933年农历十一月加入孙永勤队伍，地点不知。

第二种说法，即史耀华所讲：1934年农历正月十五之前在五凤楼王胖子沟加入。

第三种说法，见于最迟1960年7月完成的《黄花川农民暴动》一文，说年焕兴是公历1934年3月底在五指山加入的抗日救国军战斗序列。文中说：

“1934年2月，兴隆苇子峪村李连贵发起暴动，缴了杨树林地富50支大枪，拉出18个人，奔蓝旗营一带活动。3月，蓝旗营北山年焕兴举行暴动，带20人同李连贵会师，提出‘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打倒日本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3月底，率兵攻击半壁山伪警察署，战斗失利，阵亡三人。撤到黑锅顶、二堂村，又遭日军围袭，伤亡20余人。迂回在黑锅顶密林中，乘隙扑奔黑河孙永勤部，在五指山与孙永勤会师。”

第四种说法，见于王泽、张福庭《记优秀的抗日游击大队长年焕兴事迹》中，完成时间为1992年4月12日。二人认为年焕兴是1934年3月在五凤楼加入的孙永勤队伍。他们说：

“1934年3月，年焕兴、李连贵与孙永勤民众军在兴隆县五凤楼会师。这时战士发展到5000多人，孙永勤任军长，下设分队，年焕兴、李连贵任分队长。”

第五种说法，认为年焕兴1934年5月在五指山加入抗日救国军。观点出自《兴隆县志》征集意见稿里面的《民族英雄孙永勤》一文，最迟完成时间为1960年7月1日。文章说：

“到1934年5月，蓝旗营村年焕兴、苇子峪李连贵也在本地领导农民暴动，率领抗日民众军约100多人投奔孙永勤部。他们在五指山上会师后，全军达5000多。”此文章的另一个名字为《长城抗日英雄孙永勤——年焕兴同志回忆录》，整理者为遵化县党史办刘恩如，整理完成时间为1961年5月30日。《长城抗日英雄孙永勤——年焕兴同志回忆录》与《民族英雄孙永



勤》之间关系如何，不得而知，由同样一篇文章，其中一个名字下注着“年焕兴同志回忆录”来看，文章是由年焕兴回忆的，观点的持有者也为年焕兴本人。

上引的五种说法，哪一种更真实呢？老实说，无法判断。本书暂取史耀华在王胖子沟加入的说法。

最后介绍康永贵的情况。

他的情况说法不一。

遵化党史办李永春先生根据兴隆县《雾灵英烈》所载和自己对康永贵家属的走访，写作了《为抗日献身的康永贵团长》一文。文中说，康永贵1896年生于今遵化市苏家洼镇乔家洼村，1930年前后，因家贫，搬至今兴隆县挂兰峪镇大鹿圈村白石峪，开荒种地为生。1933年长城抗战起后，他曾到二十九军中服役。二十九军撤走后，回到白石峪秘密组织武装抗日。于1934年春天，从挂兰峪拉出100多人投奔了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

另有一种说法，康永贵在加入孙永勤部队前当过土匪：一说在刘桂堂队伍中，一说在玉田王队长手下。

前者由抗日救国军第七队长（一说第九队长）何广永之弟何子桥（原名何广森）讲述。1961年11月15日，他在接受王桂荣采访时说：“刘贵堂暴动后，拉到曲河打了保卫团，（又）拉向张家口。刘贵堂底下的康永贵带了一百多人投孙。”这里的“刘贵堂”当为“刘桂堂”之误写。“曲河”，根据我的判断，很可能是“九曲河”的误听和误记。“九曲河”是蒙古语“吐力根河”的意译。吐力根河发源于今天的河北省围场满族自治县北部边境地区，之后曲折流淌于围场与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交界地带，在多伦县城东北30华里处汇入滦河。这一情况与刘桂堂一度活动于多伦地区的历史事实吻合。史料记载，1933年2月19日，即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达进攻热河令后的第三天，流窜到当时的热河省北部地区的山东悍匪刘桂堂曾宣布投降伪“满洲国”，被任命为伪满护国游击军司令。此后不久，刘桂堂被派往察哈尔省东部地区，一直驻守沽源一带。当年6月23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李忠义、周义宣部分别从张北和赤城出发，攻打沽源，刘桂堂担心实力受损，通电反正，被冯玉祥委任为抗日同盟军游击第六路总指挥。康保、宝昌、沽源收复后，抗日同盟军向察北战略要地多伦挺进，刘桂堂带队参加了攻打驻多伦的关东军和伪满军的行动，并在抗日同盟军瓦解后，与吉鸿昌、方振武、汤玉麟成立“抗日讨贼军”，南下进攻北平，企图夺取北平为根据地。这大概就是何子桥所说的刘桂堂暴动、打保卫团、拉向张家口的事情。

后者由抗日救国军战士常久芳介绍。1989年1月23日，他对兴隆党史办佟靖功先生说，玉田县有个姓王的财主，被土匪抢了后，自己也当了土匪，他任大队长，康永贵是副队长。“后到洪山口，洪山口、大块地立伙会打这拨匪。匪抓伙会十几个人去，在大块地把他们杀了。”

抓到伙会时，康永贵曾建议不要杀他们，说咱们是为财，不是为杀人。王大队长未采纳，于是康永贵便脱离土匪，找李连贵当了抗日救国军。

李永春、何子桥、常久芳的说法，严格说主要是在康永贵加入抗日救国军前的一段经历上，意见不一致。由于常久芳在1935年5月24日的战斗中亲眼目睹了王大队长因无法忘记与康永贵的仇怨，下令杀掉了不少康永贵部下之事，我认为他的叙述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

当然，说常久芳的说法真实，并不意味着何子桥的叙述便没有价值。根据民国报纸的报道，1935年春夏之交，在遵化东北部山区活动的土匪基本上都是刘桂堂的旧部。除非王大队长统领的土匪是一支独立的匪队，只要王大队长也属于刘桂堂部，那么何子桥的讲述则也是真实的。只不过他叙述的是康永贵土匪经历中的前半段，而常久芳介绍的是后半部分经历而已。

游走于滦河两岸

抗日救国军从五凤楼撤出的时间，按照史耀华的说法，是1934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后，依据罗圈沟孙守印老人的回忆，是农历二月底。

从五凤楼撤出后，围绕抗日救国军的去向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表述。

一种以史耀华为代表，说抗日救国军撤退到了五凤楼东北50华里外的两个村庄：车河南岸的东化鱼沟和永合堂。在这两个地方住宿六七天后，抗日救国军转移至广东山。在那里驻扎两天两夜，之后伪满军和日军来围，双方激战3小时，抗日救国军突围而去。日伪在恼怒之下，将容留抗日救国军的广东山上的两个村庄烧毁。抗日救国军摆脱日伪军队的追踪，第二次插向半壁山。曾遭受过孙永勤打击的半壁山伪警察署由于畏惧再次遭到攻击，那时已搬至半壁山村内.抗日救国军乘半夜将其包围，短促的交火后，以活捉几名伪警察，缴获大枪五六支、手枪二三把的战果迅速结束了第二次攻打半壁山之战。广东山和半壁山两场战斗，都未闻抗日救国军有伤亡的记载。

另一种以张凤林为代表，说抗日救国军从五凤楼撤出，经月牙山（应即今兴隆县蘑菇峪乡之月牙山，也叫月儿庵）、北鄚、老梁沟口、东沟、大坡，上老梁。在老梁休整七八天，下来过暖儿河，到塌山，攻打地主杨老文。杨老文跑到宽城，孙永勤围宽城。因当地愿出六万块钱讲和，先给三万，孙永勤接受条件，带队回到黑河一带。伪满派马队跟踪追击抗日救国军，孙永勤率队撤到宽甸，在长城上与伪满军队激战后，从五楼沟后山突围，安全回到黑河地区一个叫赵大地的村庄。

史耀华、张凤林讲述的抗日救国军的去向非常不同：一个主要开往西南方向，一个则直奔东北方向而去，在到达宽城后，才折转向西南方，到达黑河流域后，便没再过多向前开进。由于史耀华及其他人关于第二次半壁山之战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及孙永勤的名字，而孙永勤曾在老梁、宽城、活动的身影不仅在张凤林的回忆录中，而且在其他抗日救国军战士及那些地方老百姓的回忆中都被提到，我倾向于认为，从五凤楼撤出时，至迟在广东山、月牙山一带，抗日救国军便被孙永勤分作两部行动。一部直捣半壁山，一部奔老梁而去，孙永勤和军部跟随前往老梁的部队行动。然而这样说是否符合历史真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由于从五凤楼撤出后，孙永勤的行踪变幻不定，难以准确把握，为避免过于主观武断地下结论，可能导致严重偏离史实的结果，我拟采用类似史书中的“大事记”的写作方法，将孙永勤部队从广东山、月牙山撤出开始至1934年秋日伪实施秋季大“扫荡”前，所有已知的作战行

动、尽可能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一、攻打塌山杨家

“杨秀山和岳老亮一样，都属于比较恶的地主。要是活着的话，得乱棍打死、枪毙！”王胤淋坐在自家门边的椅子上，谈起杨秀山来愤怒满腔。这是2005年夏发生的事情。时隔近两年后，几乎完全相同的话我在塌山小东山张凤林老人那里再一次听到：“要是在口里，搞土改，早捶巴死他了。”但这次张凤林老人说的不是杨秀山，而是杨老文——杨秀山的父亲，他也是之前讲过的岳老亮的亲家。

塌山村位于今宽城满族自治县西北部，隔庙梁与彭杖子相望，据说两地相隔仅30华里。

塌山村的“塌山”二字原写作“塔山”。塌山河西村王德云老人向我介绍说：“东南方向有座山，形状像塔，原来叫塔山。60多年前，东大顶塌下来半拉，乡政府给改名塌山。”

塌山村今属塌山乡管辖，全村有九个自然村，20个村民组，人口1300人。2007年4月21日，我在村书记张城鑫的帮助下，到塌山村了解了杨老文、杨秀山父子的情况。

“杨老文在现在叫杨家坟圈，过去叫高丽大街的地方挖出过东西。”张城鑫站在一个土岗上，为我指点着河西村北一座三四百米高的山峰的山脚。在那里，1976年，当时12岁（虚岁）、正在上小学的张城鑫亲眼目睹了大人们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了箭镞和刀币等东



图90　杨家大院外围墙　2007年4月



西。“杨老文后来找阴阳先生看，在原来是小学校的地方有一个泉眼，阴阳先生说是风脉，说上面能发人，下面可发财。杨家后来选了下面，叫杨家地，东边盖了大院子住人，西边建了花园，确实发达了几十年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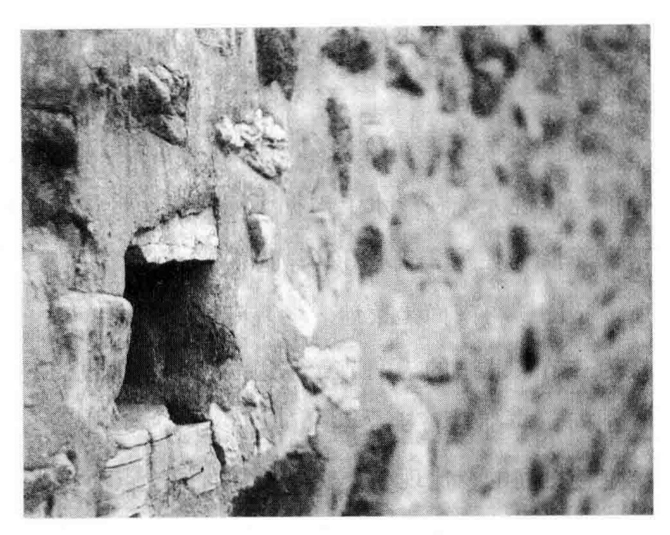


图91　杨家大院围墙上的枪眼。2007年4月



图92　杨家大院花园台阶。2007年4月

“杨老文长四方脸，一米七零左右，平时总穿青色的绸缎衣服。”张凤林老人不仅见过杨老文本人，还曾到他家喝过水。“我父亲还小时，他从下面清河口村搬上来。那时候这一块儿还属车河口管辖。当时什么也没有，就一挑子挑上来，落到了塌山河西。那时不讲户口。杨老文是得外财发的家，得的什么不清楚。他自己没多少地，都是霸占别人的土地。借给你钱，然后收利息。有时还招赌。一个叫张进旭的专门给他拉赌：‘上老杨家大院耍去。’给他拉赌，抽的头多。有些人还溜须张进旭，多给点。杨老文用招赌得的钱和借出去的钱的利息发达起来，为人霸道。以后生了个儿子叫杨秀山，比他还霸道。高利贷剥削，欺压农民。借给你钱，还不上，就把左近的好地都交给他。五分利的租子，到秋天要粮食，给不上就加利。下年再给不上，就一个粒也不给你留，赶着骡马驮子到你家，把粮食装了就走了。我们家原来借过他的钱，给不上，后来就把地给他了。杨秀山本身是地主成分，是个经营地主。因为不下地劳动，还得说是个封建地主。只管要租子，剥削穷人。杨家暴发四五十年，主要是杨秀山这一辈，杨老文比较着倒没过多好的日子。爷俩都比较势利，平时对有势力的打招呼，穷人根本不搭理你。”张凤林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敌工科当战士，解放后曾任塌山村党支部书记几十年，一生清廉，很受村民尊敬。他的哥哥张福存比他大六岁，曾参加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毛山战斗后被杨家大院里一个叫李国栋的人告密杀害。

除了放高利贷、招赌外，杨家还开办过酒厂，在平泉、赤峰、天津都有产业。河西村的王士和回忆说：“在现在宽城县法院那地方开过烧锅铺，平泉也有烧锅，发家和烧酒也有一些关

系。地主，收了不少棒子，没法打发，就烧酒、卖酒。那年头一般穷人买不起，只有富人才买得起。”

杨家大院的院址在今日河西村的村中央，背枕张书记给我看的那座山。左有青龙，右有白虎，据说大院在风水上占据了河西村一带最佳的地理位置。大院占地十余亩，北部是两个院落。东院为住房，有房30余间，一个商店。西院为花园。院落南面从东到西依次是马圈、厕所、猪圈，再南面是菜地。大院有四个炮楼，东、东南、西、北方向各一座。东南、西边的炮楼为一节，北边的为两节，东边的三节。东边的炮楼是木头搭的，顶上有瓦。其他三个炮楼我未细问，应都是石头垒的。河西村王士和小时候曾钻到其中的一个炮楼里面玩过，据他说：“炮楼挺高的，比现在公安局看守所的烁点。石头垒的，从门上去，上面有枪眼，四方的。”

杨家大院有护院100多人。护院的头叫李国栋，以前曾当过保董，好溜须杨老文父子。正是他，使张凤林的哥哥张福存被日伪逮捕，惨遭杀害。

杨家大院在解放后，其东院和西院曾分别为塌山村卫生院和塌山公社供销社所占用。20世纪90年代，卫生院撤销、供销社解体后，东院被分配给村民居住，现住着15户人家，西院目前处于荒废状态。2007年4月21日下午，张城鑫书记带我来到杨家大院旧址。但见大院高墙尚存一部分，墙上枪眼赫然在目。花园赏花的台阶也还存在，没有被毁坏。总的来说，杨家大院的保存状态要好过彭杖子岳家大院。

抗日救国军攻打杨家大院的详细情况，知道的人甚少。文字材料中只有抗日救国军战士张凤林（非塌山张凤林）留下过一句话：“路过塌山，打杨老文。杨老文跑到宽城，宽城有买卖。”2005、2007、2008年，我曾到塌山村三次，只在第三次时从河西村王德彬、王吉满老人那里了解到了一点情况。

王德彬老人说：“打杨老文，打两次。头一回没打进来。二一回打进来，抓去一个护院的。”

王吉满老人说：“王吉和，给杨家送信的，一天跑平泉一个来回。藏在我家前院胡同子里，绑票的（指孙永勤部战士）看见给绑去了。”

抗日救国军第一次攻打杨家大院的时间，目前已无法准确得知。根据抗日救国军战士张凤林、孙永勤之子孙文伶的回忆推测，发生于1934年春较早时候，应无疑义。

二、二打半壁山警察署

二次攻打半壁山伪警察署的过程仅在史耀华的回忆录中有记载。1986年11月22日，他对佟靖功先生说：“半壁山警察署撤村庄里去。咱们半夜包围半壁山，活捉了几个警察，弄来五六棵大枪，还有二三把手枪。”二打半壁山伪警察署的时间，史耀华未说。如果李杖子赵明河老人回忆的孙永勤到达十二岭的时间准确无误的话，那么二打半壁山的时间应为1934年农历二月十几之前，转换成公历，为1934年3月中旬或下旬，至迟为1934年4月3日前。



三、西大洞战斗

西大洞如今的名字叫中兴，地点在今兴隆县三道河乡政府所在地西北12华里处。据中兴村十二组郝文山老人介绍，“中兴”名字是八路军给改的。“雪山，老辈子叫‘南天门’，我们中兴过去叫‘大洞’，八路军给改的名字。八路军轧生地区，到哪儿都改名。那阵老莫家、老高家、郝家庄总共一百多口，我们郝家庄就几家子。”

西大洞战斗有三个版本：

1．孙永勤次子孙文孝讲述，时间是1983年5月31日和1990年11月14日。1990年的讲述比较详细。下面引用的是1990年版，采访者为佟靖功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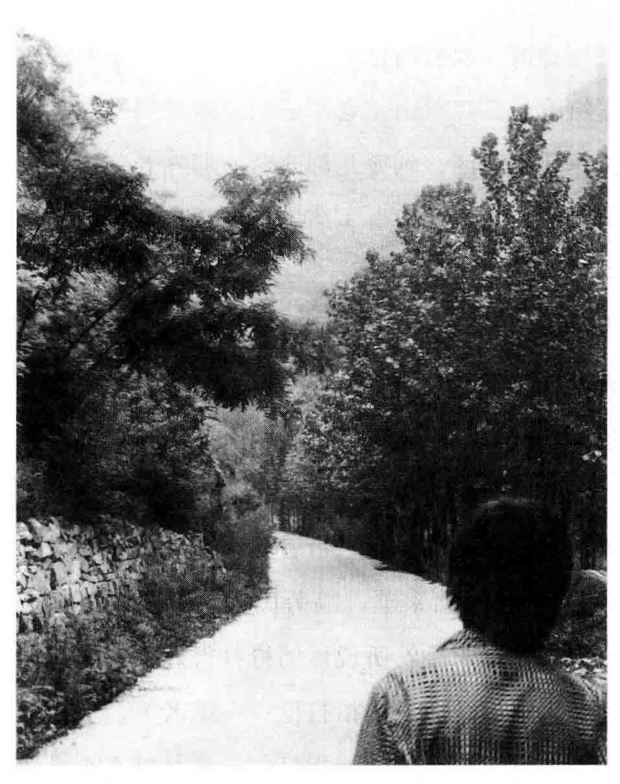
“那个地方叫透眼山（当地实际称之为‘透骨山’——编者），山上真有一个地方透眼。我是听莫俊荣介绍的，莫俊荣是听他的爷爷、父亲介绍的。莫俊荣50多岁，还在，现住三道河中兴大队一生产队。莫俊荣的老人家以前是大地主。有一次我父亲带着队伍在老莫家那村号饭，莫家的老当家的就让民众军在他们家吃的。他们给杀猪宰羊，犒劳民众军。还没等吃饭呢，被日本军包围了。当时日本军的头儿喊话：‘谁是孙永勤？听说你的枪打得好，我举起大拇指，你若一枪打中我的大拇指，我就一枪不递（‘递’，方言，指打枪——编者）。’我父亲说：‘你举起手吧！’砰地一枪，我父亲真的把那日本头儿的大拇指打去一截，日本军果然没递枪退了。莫俊荣的爷爷支持民众军，交了七棵枪。莫俊荣的爷爷又给带道，那条沟里交出十几支枪。莫俊荣的爷爷又报告：二堂的大地主高作忠家有枪。几天后，我父亲去高作忠家，动员高作忠支援枪。去了三次，高作忠也不交枪。第四次，我父亲带着队伍住到他家，才从他家起出几支枪来。以后，高作忠就向伪满告状，告我父亲。”

2．史耀华讲述，时间是1986年11月22日，采访者仍为佟靖功先生。

史耀华说：“我们四五百人奔三道河的西大洞，黑夜到那儿。夜间，三道河来了日军。三道河有人给咱们送信，孙永勤说：‘别吃饭，上梁，咱们顶他一阵子。’有点月亮，咱们在山上，日军在河沟，黑夜开火，打死20多鬼子。鬼子退了，咱们也退了。日军丢下一挺轻机枪，一清早把它又拿回去了。”

3．郝文山老人讲述，时间为2008年7月24日，我第一次到西大洞采访时。

老人说：“孙永勤是二月初三（1934年3月17日）后晌到咱们这儿，二月初四满洲兵知道了。兵是从潵河桥来的，日本子带队，就几个，满洲军多。追上就开火，前末晌打的。孙永勤在鲶鱼坑北山，我们一般叫透骨山，从那山窟窿后面往头里打，打的是满洲军。满洲军炮手正装炮，是迫击炮，孙永勤一枪就打炮手胸膛上了。满洲军叫好：‘好的！好的！’把死的抬潵河桥了。满洲军开炮，孙永勤就退了，向北去了。满洲军一炮，落到大十二岭去了，两地隔着十来里地。孙永勤一个兵在硿洞子猫着，兵退了，爬到老莫家，老百姓给抬到雪山，枪插在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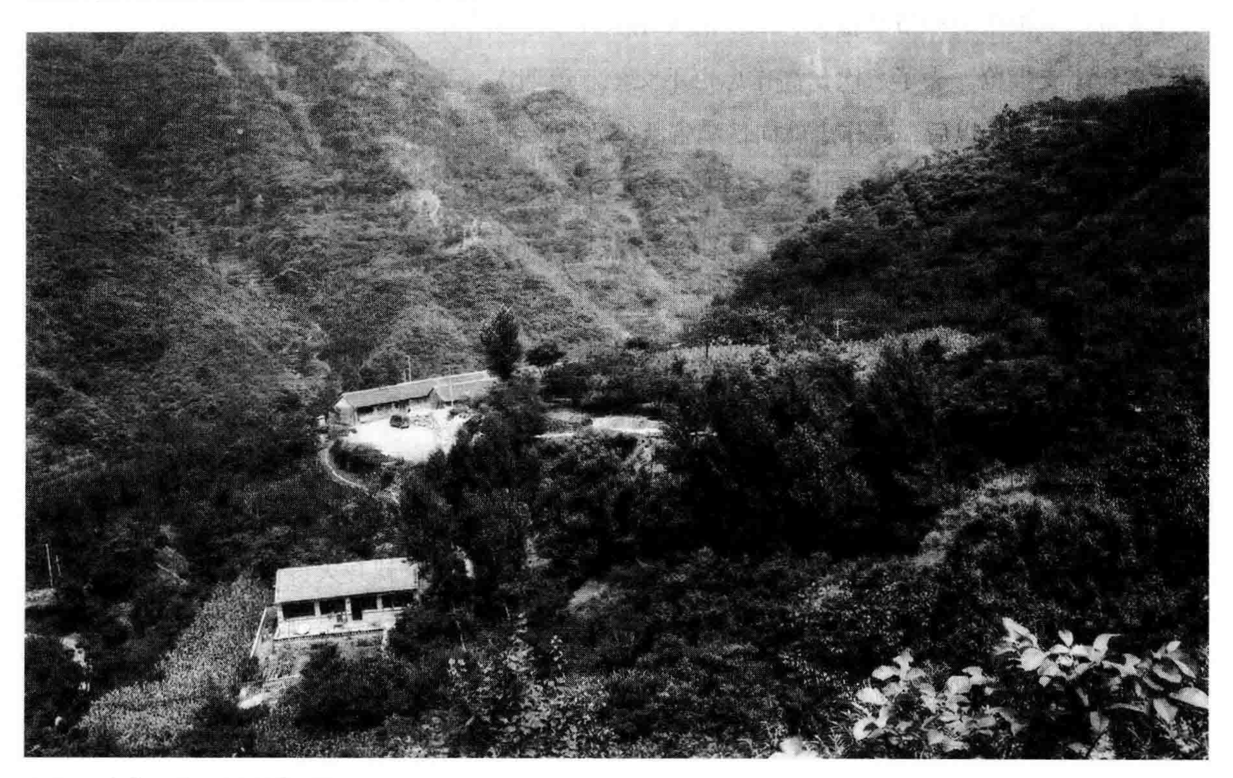

图93　薄雾笼罩着透骨山，一个妇女抬头朝它望去。山上的窟窿在左上角的山凹下面。2008年7月

的地方（即藏在所呆的地方）。40多年前，我那时三四十岁，去山上割柴禾，还捡到一棵枪。枪托子都糟了，就剩枪筒子了，还有一粒子弹。上上油，子弹打响了。前些年，半壁山来收枪，把枪交了。”

上述三个版本在时间、情节的描述上不尽一致，我曾疑为同一个地方在不同时间发生的三场战斗，但郝文山老人说：“孙永勤在这儿就打过一次仗。”所以，上述版本讲的应是对同一场仗的记忆。何以三种说法不完全相同呢？还是孙永勤在那里不止打过一次仗呢？需要进一步查考。

四、小十二岭战斗

小十二岭今为兴隆县蘑菇峪乡李杖子村的一个自然村，位置在蘑菇峪西北28华里处。村庄地处五指山山巅地带，隔一道深


图94　小十二岭　2008年7月

谷，仰面望去，对面便是海拔1383米的五指山山尖。上世纪30年代，小十二岭有人家十多户，人口六七十人。

小十二岭战斗开战时间有农历二月初儿（1934年3月15~24日之间）和二月二十六七（1934年4月9、10日）两种说法。

李杖子赵明河老人回忆是农历二月二十六七。赵明河当年二十出头。1984年6月21日，他对佟靖功先生说："孙永勤带队儿百人打半壁山局子后，从澈河过来。过雪山，到十二岭，要在十二岭分东西，当时是二月十儿。孙永勤到李杖子要粮食，派出来的人有雷音亮，北大地村的人，有车河化鱼沟江福英，有阎杖子村阎永泰，让他们三个人要粮：'让赵明河、李云满、李春青三家拿三斗高粱米。'我和李春胜送去的。用骡子送到小十二岭，骡子累倒了。我到十二岭，孙永勤队部在徐久岭家。见到孙永勤，让他们来了一个人，牵着一头驴把粮食拉走了。"

根据赵明河的讲述，抗日救国军到达小十二岭十天左右，行踪被伪满军获悉。这队伪满军，有说法来自蘑菇峪，经阎杖子、宋杖子，到达王杖子。开进王杖子的时间，据赵明河说，为农历二月二十五六晚（1934年4月8、9日）。

"打仗的头天晚上，王杖子村被满洲兵住满，不让老百姓出来。王杖子王殿勤偷偷跑出来送信。孙永勤派阎永才去探听消息：'到李杖子和赵明河打听消息。'我和李茂去打听，在王杖子村外被敌人发现，打了一枪，我俩分头跑了。我们后来跑到一块。这时别人说李杖子也来了满洲队，我不相信，回到李杖子家里。敌人没有来。鸡叫时我起来，想去十二岭报告，发现敌人从王杖子向十二岭开进，我们已经过不去了。"

农历二月二十六七日黎明，天降大雪，伪满军利用恶劣天气，摸上小十二岭南沟，首先向抗日救国军开火。赵明河回忆，孙永勤发现伪满军偷袭，立刻率领队伍向西高尖转移。命令下达时，孙永勤的军师'小老道'正在屋内算卦，刚出门便被敌人抓住捕走。"挑哨就碰着满军。"史耀华说，"我们前哨入了敌人的埋伏线，被打死三个人，是遵化的刘义真、马占德、×××。现在坟还在那儿呢。"

孙永勤率领部队边打边撤，遗憾地的是，由于雪大，行走艰难，尚未翻过西高尖梁便被伪满军追上。双方在万石口激烈对射。战斗中，抗日救国军方面由于武器差，子弹少，抵挡不过敌军，共有30余人阵亡（一说20余人），一匹骡子被打死。此外还丢失一驮子东西，被伪满军拉走一匹马。伪满军则无一死伤。

"我当年九岁，正在大石岭放羊。"小十二岭徐久强老人持农历二月初儿开仗说。2008年7月23日我去采访时，他回忆说："旧历二月儿，敌军，有日本官，从沟外进来。孙永勤他们在雪山住着，那天到这儿来，想住这儿，正好日军上来。村里有一徐成，怕在庄里打上，一拍大腿，一扬手，让他们往回卷。孙永勤兵开了三枪，打的信号，往回卷。日本人从这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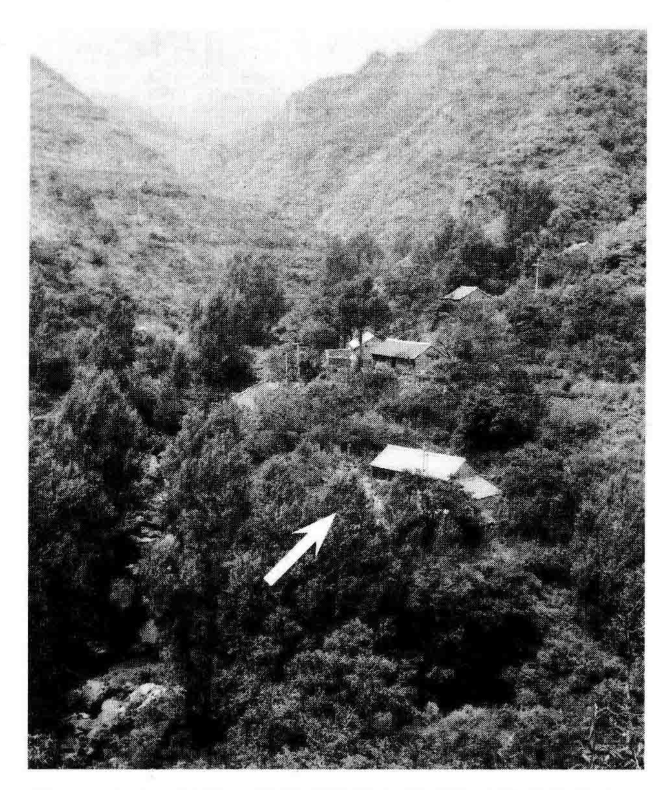


图95　小十二岭抗日救国军牺牲者埋葬地（箭头指处），遗骨现已被迁至他处。2009年8月

的西梁，往南沟里打。孙永勤的兵都死在南沟里了，牺牲十来个。南沟是西高尖下的一个山沟，从沟口到山尖不过二里。打了半天，大概不到9点开始，打到晌午。那天没下雪。孙永勤部尸首，村民抬回来一部分。有三个人被埋在柏碰沟，以后徐进林把坟起出来，在那儿盖的房，把坟埋在后面不远的碰根子了。在石灰窑上边有一棵大松树，后来在那儿看见一具骨头架子，因为是当时打仗的地方，猜测也是孙部的人，死在那儿，一直没有人发现。"

小十二岭战斗，抗日救国军不管是牺牲十余人，还是20余人、30余人，对孙永勤内心触动都很大。那么多风餐露宿、跟他转战于滦河东部和西部的年轻战士的生命，一下子终止于五指山巅荒凉的山野中，令他感到难以抑制的悲伤。遵化马广兴的哥哥牺牲于小十二岭，2006年4月我到东双城采访，老人讲述了战后孙永勤亲自到他家慰问的情景："我们总共哥儿五个，马贺臣，小名来子，排老大。他是晚上跟马保德一块走的，死在十二岭，受伤后被日军刺刀挑死的。孙永勤带100多人来慰问，说：'我们同胞的哥们儿，为共同打日本，牺牲了。'临走给我妈撂下100块大洋。100个人不过50条枪，剩下全是大刀片。母亲那还不哭。大哥撇下一个三岁的小小子。"

五、瀑河口之战

瀑河口在贾家安北面5华里处，东北距宽城县城宽城镇70华里。村庄位于滦河、瀑河交汇处的东南角，毗邻瀑河。今址是1978年修建潘家口水库时移民搬迁的结果。村庄原址在今址北面一华里，已被水库淹没。截止到2008年7月，瀑河口共有人家35户，人口140人。20世纪30年代，人口总数不到100，全姓任，没有外姓。40年代，集家并村回来，才有外姓出现。

瀑河口之战所以发生，在孙永勤方面，一是为了打击任家大地主的气焰，最主要的还是为了获得枪支。之前说过，1933年农历腊月底，孙永勤曾写信给瀑河口任家大地主，希望他们支援一些枪支。任家大地主自恃与伪满军关系密切，态度非常傲慢。当时孙永勤便发誓，打不下瀑河口，一天不在那里停留。可以说，任家大地主被攻打的命运在1934年农历春节前便被注定了。

下面将任家大地主的情况介绍一下。



任家大地主的真实名字是什么，不知道。2008年7月，我到瀑河口采访时，任克泰老人说："他是'克'字辈，只知道外号叫'三掌柜的'。听老人家讲，三掌柜的原来在口里滦县打工，用现在的话讲，有一个'小姐'，那时叫'窑姐儿'，跟了他好几年。小姐那时候趁钱，时间长了，钱就全交给他了。三掌柜的悄悄把钱整出来，那时都用船，就坐船回来了。小姐有一天没看见他，一打听，没回家，发现家里钱也没了，知道让他卷跑了，就追。追到贾家安，当地人说，没有这个人，小姐信了，就回去了。三掌柜的用小姐的这个钱买的地。那时候种地，这头搁水罐，那头搁咸菜罐，渴了这头喝水，饿了那头吃咸菜。后来发展大了，你困难，出俩钱，就把地置过来了。在宽城搞买卖，宽城半拉街，都是瀑河口的。清河口还有他们两处宅子，开着买卖。三掌柜在瀑河口的院子不大，在村子的北面。养团，后来病死，解放前死的，当时日本还没败呢，两口子隔半拉月死的。死后，他家不知拿出多少钱来，可着俩钱抹乎。尸身搁一个月，糊一个喷钱兽，戴一个假帽子，往外撒钱。当时糊纸的左近没有，都是从澈河桥请来的。出名从死这节出的，不管啥人，多远的，就是要饭的花子，只要拿两张烧纸来，一样招待。就那样，钱还没花了，都攮给老百姓了。'文革'时，两口子坟都被扒了，什么东西都没有。"

三掌柜的有子三人：任继承、任继武、任继文。任克泰说："任继承、任继武、任继文都是我们庄的，他们与我家就隔着一个河沟子。哥儿仨分家另过，他们都富，养团。"

在热南滦河河谷一带，三掌柜的一家几乎是仅次于张如增、岳老亮、杨老文父子的大地主。据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回忆，他家有护院的，也就是任克泰老人所说的"团"，30多人。

攻打三掌柜一家的时间，说法不一。史耀华说是1934年清明，1986年11月，他向佟靖功先生回忆："第二年清明，瀑河口来信，孙永勤带领五百多人去打瀑河口，分兵另一路抄后路。孙永勤喊：'我打不下瀑河口，一天不站！'打死满军、伙会十六七人。打进去，那些财主们拿出40多支枪，出来40多人。"第二种说法来自原宽城县委党史办主任杜青怀先生。2008年7月我到宽城采访时，他说："老任家，孙永勤打了两次。第一次是1934年阴历六七月


图96　瀑河口　2008年7月

份（公历1934年7月12日至9月30日），第二次正收秋，中间相隔三个月左右。老任家有一个姑奶子与孙永勤有关系，远房的。”

史说与杜说在时间上有两三个月的差异，何者更为准确，有待进一步调查。

六、贾家安战斗

贾家安在宽城县城西南45华里处，肠道一样弯曲的滦河的一个拐弯地带，今属宽城满族自治县独石沟乡管辖。

在刘俊岳的记忆中，贾家安战斗发生于1934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前后，转换成公历为1934年4月28日前后。“在险要地带，居高临下，袭击了日本军的面粉三船，打死日寇20余人。”1961年8月9日，他对迁西党史办许家保先生说。

七、潘家口战斗

潘家口在喜峰口西10华里，为滦河穿越长城处。“滦河出巨石间，水风相激，汹涌有声。”20世纪30年代，有人这样描绘那里的风景。

《塘沽协定》签订后，关东军以长城为伪“满洲国”与中华民国的“国境线”，在长城上的重要关口潘家口设有海关税所。孙永勤起义后，这个海关税所曾受到他不止一次的攻击。

现存文字材料中，孙永勤最早一次攻打潘家口的时间被认为是1934年春节前，观点持有者为孙永勤妻子雷永兰。在1981年发表的《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回忆丈夫孙永勤》中，她说，孙永勤打完半壁山警察署，“随后又在关门岭和潘家口打了两个漂亮仗，春节前后队伍就已发展到1000多人。”1934年春节前攻打潘家口的说法只在雷永兰一个人的回忆录中出现过，抗日救国军战士的记忆中，孙永勤最早一次攻打那里的时间是小十二岭战斗后的第三天早晨。1986年11月22日，史耀华向佟靖功先生说，从小十二岭撤出后，孙永勤率抗日救国军经南双塘子黑山沟、黄花甸到了黄花峪。次日夜，他们从黄花峪出发，经梓木林、东梁、车场沟，来到了潘家口的海关税所前。“一挑哨，不认人呢，咱们开火了。打到八九点钟，咱们死了五六个。把原来在半壁山警察署的那个孙翻译给抓住了，在海关税所的住家里把他抓住的，他藏在草垛里。孙永勤亲自用手枪把他枪毙了。在海关税所里一共抓住四个中国人，除了孙翻译外，还有一个姓商的、一个姓陈的、一个姓冯的。咱们把这四个人抓住，得了四棵手枪，二三支长枪。接着打日本，三四个鬼子钻到长城楼子里，还说：‘孙永勤胡子大大的，我们至死也不出来。’孙永勤登石梯子往里打手枪，打不着。派人搭人梯，往里装柴草，用烟熏他们。这时候，滦河东过来几汽车鬼子，开火，咱们退回来，奔了河南大峪。”

此次攻打潘家口海关税所的战斗，抗日救国军战士蔡连青也参加了。1989年1月21日，他向到访的佟靖功先生介绍了他参加抗日救国军的经过和攻打潘家口的过程：“有一年李连贵起民众，过来，对我们说：‘咱们打日本去，干干呀！’我们说：‘干呀！’我二哥蔡连臣、

我、王占朝我们都去了，发给一支大枪。从马蹄峪出去，往东走，到万树庵与孙永勤碰头，孙永勤是军长。从万树庵奔滦河东的凤凰山打日本，我们过去，日军追来。我们散开，日军入口袋。滦河口我们把日军打花啦了，得了几棵枪。日军约400多人，大约打死打伤日军一半人。日军跑了，咱们从凤凰山奔潘家口，打日本税局子。打二三个小时，敌人跑了。拿住翻译官孙本，一个眼，呲牙咧嘴，40上下岁，他竟强奸十六七岁的姑娘，坏得很，把他抓住后枪毙了。”

攻打潘家口的时间，按照史耀华的回忆为1934年农历三月十几以后，换成公历，为1934年4月底、5月初。在抗日救国军战士刘俊岳的回忆中，被认为是1934年农历三月二十日。1961年8月9日，刘俊岳对迁西党史办许家保先生说：“3月20日夜袭击潘家口，得枪十余支，毙日寇六七人。”农历三月二十日转换成公历为1934年5月3日，与史耀华的回忆基本相符。

八、燕子峪战斗

燕子峪在贾家安东南方向7华里、潘家口北面15华里的滦河南岸，今也属宽城满族自治县独石沟乡管辖。燕子峪战斗仅在刘俊岳一个人的回忆录中有记载，只有一句话：“袭燕子峪，得两船皮袄和毛毯等物。”燕子峪战斗发生时间，刘俊岳未明确说，根据上下文推断，应与潘家口战斗发生于同一日夜里。

九、洪山口战斗

刘俊岳回忆，时间仍是1961年8月9日，采访者为迁西党史办的许家保先生。刘俊岳说：“1934年四月初袭洪玉口，砸了警察局，得枪十余支。”1934年农历四月初，在公历中为5月13日以后。“洪玉口”应为“洪山口”的口误，或记录时之笔误。洪山口是冀东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位置在今遵化市版图的最东北角。明时戚继光曾在那里打退过蒙古俺答汗部的进攻。出洪山口向北行不远便可进入兴隆境内。

十、李杖子小岭战斗

李杖子在今兴隆县蘑菇峪乡政府所在地西北13华里处。小岭在哪里，我未到达。有关李杖子小岭战斗的情况，是李杖子李春会、赵明河老人于1984年6月向佟靖功先生回忆的。李春会老人说：“孙永勤当年活动地点是阎杖子、宋杖子、王杖子、李杖子、小十二岭、大十二岭，有上千人，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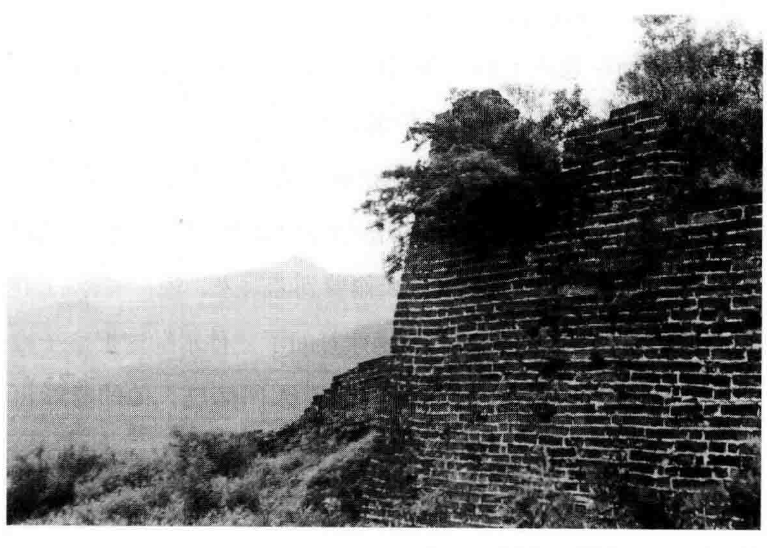


图97　洪山口长城　2005年7月

住在这一带。这一带离敌人远，藏在这小山沟。”李杖子小岭战斗打响时间，据赵明河老人回忆，是农历四月份，换成公历，为1934年5月13日至6月11日之间。战斗发生时，孙永勤部驻扎在王杖子、李杖子、阎杖子三个山村，100多名日军从三道河出发，走雪山（当时叫南天门）、西高尖、李杖子小岭过来。孙部未能提前察觉敌人的行动，撤退过程中，被追击的日军打死20余人（李春会老人说是十余人）。

李杖子小岭战斗发生时间距离十二岭战斗结束不到两个月。两次战斗都被敌人追着跑，并且伤亡较大，李杖子赵明河老人归结为孙永勤部武器不如敌军："孙永勤当时武器差，没有多少子弹。西高尖、李杖子小岭都被敌人打跑，小十二岭死了有30来个，李杖子小岭死了20来人。敌人一个没有打死，连受伤的也没有。”然而如果将这两场战斗和孙永勤之前经历的一些战斗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产生小十二岭、李杖子小岭战斗那样的结局不是偶然的：尽管我们说拿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标准来衡量抗日救国军对当时这些人不公平，但也必须说，他们身上麻痹大意、放松警惕的心理确实影响了发展。遗憾的是，这样的错误，不知何故总是一犯再犯，并且每次都不能吸取教训，终至一年后造成全军覆没的悲剧。每念及此，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十一、凤凰山、清河口战斗

凤凰山在今宽城县城西南40多华里处的清河北岸。凤凰山战斗的发生时间在现存文字资料中没有明确记载，通过研读抗日救国军战士的回忆录，对他们20多年前留下的记忆碎片进行比对、拼接，目前判断为：凤凰山战斗发生于李杖子小岭战斗后，时间也为农历四月份，即公历1934年5月13日至6月11日之间。

我尝试着复原的图景是：从李杖子撤出后，孙永勤渡过滦河，去了老梁。在那里短暂停留后，便去了宽城塌山。凤凰山战斗就发生于孙永勤进驻塌山以后。

孙永勤在老梁上的其他活动不知，目前只有他曾给宽城商会写过一封信，要他1934年农历除夕在后石洞遗失的一把手枪的记载。

1986年11月22日，史耀华在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说："我们在老梁上住着六七百人，在下河西住200上下人。孙永勤写信给宽城商会：'把这棵枪给我拿回来更好，不拿回来，我打进去鸡犬不留。'一个伪满军的营长偷着到老梁来，说：'你们打吧，我们里应外合。'商会知道后，给送来几把盒子枪，这时已经是四月间了。孙永勤这把盒子枪好，打100发子弹枪筒子也不热。”

孙永勤在老梁上呆了几天，没有人回忆过，他的身影再次在文字材料中显现时，已经是在老梁东南30华里外的宽城塌山了。

"去宽城（指今宽城县境，非宽城镇——编者）以前，天气暖和了。”1986年11月17日，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对佟靖功先生回忆说，“在尖山住一个队，清河口住一个队，塌山住

一个队。孙永勤带一个队100多人住塌山。咱们部队住在塌山沟门的一个财主家。前半晌歇着间，满军从山上压下来。敌人往下打，咱们往上打，打了半天多。在打仗时把孙永勤和孙田员围到一个砬翅上去了。敌人有两人去围，我跟张如香说，敌人把孙永勤围砬翅上去，我们说还得调队打呀！这就上去一个队，把敌人打退了。两下都撤了。"

孙文炳未说凤凰山战斗的具体日期，由他说"天气暖和了"来看，是春天无疑，但不能肯定是公历4、5、6月中的哪一个月份。

对凤凰山战斗时间的判断是根据史耀华的回忆做出的。

还是1986年11月22日那一次采访中，史耀华对佟靖功先生说："四月二十几了，打鬼子。奔清河，住在清河口。住两宿，宽城发过来鬼子，满军从清河平顶山发过来。打一仗，咱们撤到瀑河口，住了三四宿。把孙永勤的一个远房姑奶子的儿子，才15岁，绑来了。他们没给枪。"

清河口在凤凰山南3华里处，隔清河与凤凰山相对。清河口战斗与凤凰山战斗是同时发生，还是紧随其后发生，佟靖功先生的记录里未显示。由这场战斗结束后抗日救国军便撤至瀑河口看，凤凰山战斗应发生于农历四月二十几日或之前，转换成公历为1934年5月下旬至6月初。

十二、清河塘战斗

清河塘在凤凰山北略偏西4华里处。清河塘战斗记载于孙永勤长子孙文伶的回忆录《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忆爸爸几件事》中。"有一次，我父亲驻在清河塘，站岗的向他报告说，鬼子坐着四五条大船从滦河上面下来了。我父亲立即组织队伍，趴在房子上拦截鬼子。鬼子仗着人多，就冲上岸来，把我父亲他们的队伍给打散了。最后，我父亲他们20多人被包围在北山头，情况非常危急。军法处的赵林连写了两封信去瀑河口，调两个中队来解围，可那两个中队都没来。"

清河塘战斗的发生时间，孙文伶在回忆录中未讲。我疑也发生于1934年农历四月，孙部驻扎塌山期间，但不敢肯定。

清河塘战斗令孙永勤认识到了队伍遵守纪律的重要性。"后来，我父亲突围出来以后，就转到瀑河口，对这两个中队队长不服从命令的行动，给予了降职等严厉的处分。"孙文伶说。

十三、上谷车站战斗

上谷在承德县城下板城镇东面50华里处。上谷车站战斗仅在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1975年7月整理的《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兴隆党史办朱呈云先生1982年8月整理的《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中有记载，但均未注出处。

《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说这场战斗发生于"1934年5月以前"，根据文中把迁西许家保先生记载的农历日期都当成公历日期来看待这一情况，此处的"1934年5月以前"也应是农历，转成公历，为1934年6月12日前。上谷车站的战果，文章说是：全歼日伪军30余人。

《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中未说这场战斗的发生时间，根据上下文看，是1934年春季。战果为“全歼伪军30多人，拆毁了铁路，炸毁了桥梁，破坏了敌人的铁路运输”。

十四、乌龙矶战斗

乌龙矶在今承德县城西南14华里处。乌龙矶战斗，刘俊岳回忆是在“五月节后初八九”，公历为1934年6月19、20日。孙部攻打乌龙矶队伍的人数，他在1961年8月回忆为300人，1983年6月回忆为200人。战斗结果，1983年回忆为“打死40多敌人”。孙永勤参加了此次战斗。

十五、攻打宽城镇

攻打宽城镇的战斗是由孙永勤部下赵四川指挥进行的，孙永勤未参加。此次战斗的作战目标是，打击宽城商团、民团的气焰。战斗开始时间，据原宽城县委党史办主任杜青怀先生调查，为1934年农历五月十一日前后，转换成公历为1934年6月22日前后。战斗过程，杜先生在根据调查结果写成的《孙永勤打宽城是“一打”而不是“三打”》中说：“孙部主将赵四川率近两千人，从承德方向，经宽城小前坡峪，于傍晚到达下河西、上河西、缸窑沟门儿。部队一到，全部抢占山梁，打的野盘，老乡家一户未住。从岔沟门儿一直到东岭子（宽城街外一山岭），长达十几华里山梁全部布满军队，把宽城街围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另半圆是陡峭大山）。双方战地中间横隔一条瀑河，孙部指挥部设在下河西的后杨树湾，是个简易席棚。孙部大旗插在下河西后山梁的最高地，还架有两门小钢炮，炮口直对宽城街。河对岸杨树行战壕里是商团、民团，没有日伪军（孙部未到，有人告密，商团民团得知军情，提前两天就沿瀑河岸挖好战壕。当时商会会长是王俊波，商团团长是杨香普，镇民团团长是翁容久）。商团民团员约有200来人。商团民团的武器全是商会组织各商号集资购买的新武器。双方人定时开的火，战斗非常激烈。作战中，上河西、下河西老乡给孙部送水送饭。特别是下河西是拦截敌人要路之口，因此守兵最多，仅一处就有四五百人，当然下河西群众负责战场供应任务也就愈大。一河之隔，双方怒骂声听得真真切切。孙部将士向对方中下级人员大喊：‘你们一个月挣八九块钱，给谁卖命呢？’当见到街里买卖家弃货逃窜时，孙部向街里百姓高喊：‘穷哥们，你们见东西咋不拿呢，打宽城就是为了咱们穷人！’当作战到第二天时，街里商会调集乡下的峪耳崖、板城、汤道河三个民团500多人到宽城（峪耳崖民团团长是刘述，板城民团团长是李介侯，汤道河民团团长是王三喇叭）。援军一到，商民团凶气大长，火力倍增。当打到第三天下午时，孙部马二炮头在上河西王申斋院墙下掩蔽还击时，不幸被对面（马神庙，现宽城街瀑河桥头）敌人击中，当即阵亡。加之孙部子弹所剩无几，只好用石块敲打铁桶，以迷惑敌人。因此孙部只好下令停止战斗，于傍晚全部撤出阵地，从原路撤回承德方向。这次战斗打了三天三夜，双方没伤亡多少人，只有街里一个卖烧饼的妇女，绰号叫王大包子，当双方开火时，她去上河西卖包子，中途中弹身亡。战斗结束第二天，商会下令各商号出钱，进行所谓慰劳全体参

加人员，以鼓士气。”

宽城镇战斗，孙永勤部以200人攻打对方700人，未能成功，据接受采访的民众对杜先生介绍，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情况不明，地形不熟。第二，孙部武器低劣，好多都是徒手战士，双方武力相差悬殊。第三，街里百姓未有安排疏散，唯恐双方开战过多伤害百姓，故此不敢大打。第四，敌方早有准备，工事防守坚固。”

据杜先生了解，孙永勤部虽未能攻进宽城镇，但对遏制当地商团民团的嚣张气焰也并非没起到作用。据说，商团民团那之后再也不敢随意出没良民百姓家里，巧取豪夺，坑害百姓。

十六、九虎岭战斗

孙永勤抗战一年半所转战的地域当中，有两个地方都叫九虎岭。其一在今宽城县城西南25华里处；其二在今遵化市小厂乡政府所在地北面十余华里处，东南方向隔三四华里宽一道山谷与海拔646.8米的毛山相望。毛山便是1935年5月24日孙永勤牺牲的那座山。本节所说的九虎岭指宽城九虎岭。

宽城九虎岭，其名字的来历有两个说法：一说是九只老虎由西面来，从那里过；一说因为那里有九个山头。“哪有那么多老虎呀？”2008年7月21日，我到那里采访时，九虎岭村第三组王树庭老人说。

有关九虎岭战斗的情况，像其名字由来一样，目前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版本：

1．抗日救国军战士刘俊岳讲述，时间为1983年6月15日，采访者为兴隆党史办栾福忠、邢连义先生。刘俊岳说：“宽城失败的时候，连岗都没有。我们走大路，想在九虎岭休整，夜里10点，敌人占领东山，我们有三个连队被围，死伤80多人。我们看打不了，就跑了。打宽城我去了，孙永勤没去。”

2．杜青怀先生讲述。2008年7月14日，我到宽城采访时，他对我说：“孙部打完宽城，从九虎岭路过，时间大约是1934年农历五月十几日。上午，日军从平泉、宽城过来，一共600多人。孙部与其打了半天，老百姓为之挖战壕，送水送饭。孙部没恋战，没伤亡，日军死了七八个人。”

两个版本在战斗开始时间、过程、结果上的表述完全不相同，给人以似乎是同一地点在不同时间打的两场仗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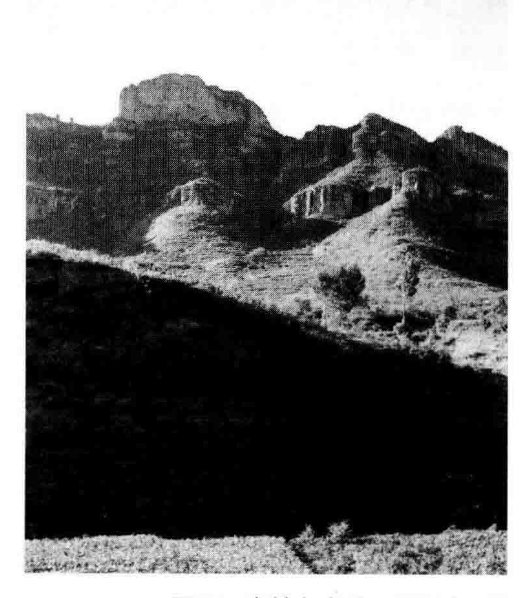


图98　宽城九虎岭　2008年7月

2010年6月1日，我给杜青怀先生打电话，核实他所说的情况。他说，九虎岭战斗的情况是他亲自调查来的，属实。至于刘俊岳的回忆为什么不同，他也不清楚。

刘俊岳已经去世，再向他了解事件真相已没可能。

欲解开这个谜团，只能寄希望于两个情况出现：一是有强有力的证明材料发现；二是九虎岭当地还有年岁大的老人能回忆起孙永勤抗日时期的事情。后者的可能性已非常小，2008年7月21日我在九虎岭采访时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记事、头脑还非常清晰的老人已极少了。

十七、佛爷来战斗

佛爷来在今兴隆县半壁山镇西南一华里处。刘俊岳回忆佛爷来战斗发生于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夜，公历为1934年7月9日夜。他在回忆录中的原话是："后又在龙井关外、付友来（即佛爷来——编者）村，约有100余户，有个大税局。在五月廿八日夜三四点钟，派去两个大队，第一、第三队，去打这个税局。这一税局住在一个大院里，有70左右人，鬼子20余人，警备队50左右人。打了有半个钟头，打死日本鬼子16人、警备队3人，其余逃跑了。共缴获大枪50支，王八盒子三把，子弹十一二箱。"

十八、三打半壁山警察署

刘俊岳回忆，战斗发生于1934年农历六月份一个夜里，公历为7月12日至8月9日之间。

此次回忆有两份采访记录，一为栾福忠先生所记，一为邢连义先生所写。将两份记录均抄录如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中的孙永勤。

栾先生的记录："夜间10点钟打的，去了300多人，赵邦海中队三个连队。孙永勤去了。孙永勤那时打一个地都怕拿不（下）来，都亲自参加。他领着走的时候多，不让白搭一粒子弹，不见敌人不发枪。把院围占好，孙永勤带头冲进去。孙永勤都是亲自领阵，不是站在一边指挥。孙永勤都是先撂倒哨兵。将胆大，兵也胆大。放火烧了半壁山，把粮食分了。半壁山战斗9点开始，两点钟收拾利落。"

邢先生的记录："打半壁山，夜12点钟去了300多人，赵这个中队三个连。孙永勤也去了。孙打哪儿都怕拿不下来，领着去。提前怎么打他都讲，子弹少，不让把子弹白打了，不见敌人不能开枪。在战斗中都带头冲，亲临战场，真像干部样。弄的粮食分给老百姓，其他东西都烧了。打了十多个钟头，两点开始的。"

两份材料对孙永勤个性特点的记录相同，互为补充，但在半壁山战斗起止时间的记载上却有出入，不知何故。

十九、山楂峪战斗

山楂峪，地在今遵化市侯家寨乡境内，南距明长城8华里。

这场战斗，刘俊岳回忆是第二、第三大队在农历六月初五（公历1934年7月16日）夜里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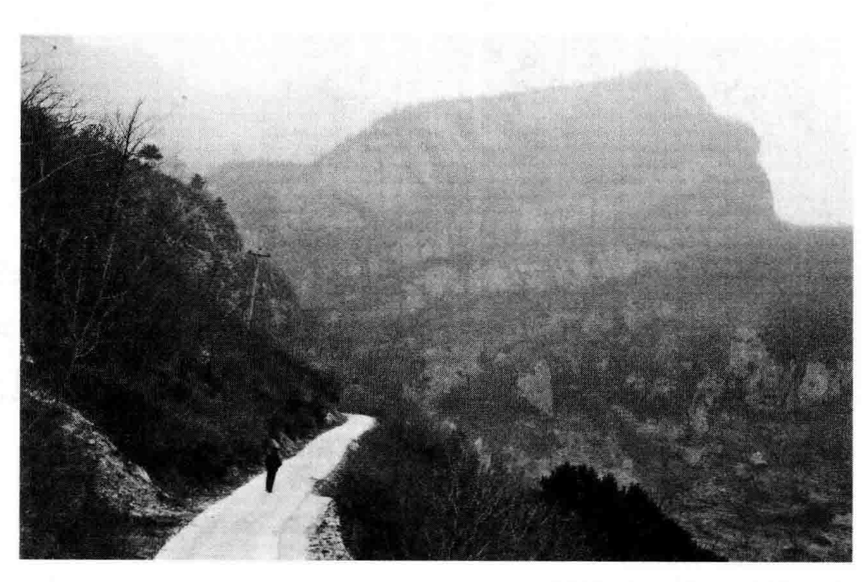
的，攻击目标是日本税局。“这次师部命令很坚决，打不下这个税局，不许回来。这税局子有50多人，其中鬼子9人。战斗结束，鬼子跑了三四个，其余全俘。得大枪30余支，子弹10余箱。”1961年，刘俊岳对前去采访的王玉璋先生说。

二十、门子哨战斗

门子哨在今兴隆县蘑菇峪乡政府所在地东北30华里处、孙永勤家乡孙杖子东北约13华里地方。门子哨战斗的情况是由孙永勤大哥之孙孙中印提供的。2009年11月底，我到遵化市采访，定居遵化新店子镇康各庄的孙中印对我说，他的父亲孙文贺曾加入孙永勤队伍，在门子哨二道石湖地方，与孙永勤等人一起用枪打死18个日本兵。日军不敢上来后，三爷孙永勤、父亲等人才撤走。这场战斗的准确发生日期，孙中印不清楚，他知道的情况是，当时跟着三爷的人数还不多，队伍尚未壮大。由此情况判断，门子哨战斗当发生于孙永勤起义后不久，至于是1933年底，还是1934年春夏抗日救国军达到发展的顶峰之前，则需要进一步了解。

孙永勤、孙文贺等人伏击日军的地点，我在孙中印的帮助下，由其外甥张景志带路，于2009年12月7日下午实地探访过。

战场在门子哨南面、滦河西岸的一道深山沟里。由沟底上行约2华里，抬头可见一道瀑布由山缝流下。瀑布为两节，当地称那里为二道石湖。我们去的时候由于是冬季，瀑布全冻成了冰，自上而下如白蜡般悬垂下来。冰瀑布的右方是一道二三十米高的直上直下的峭壁，据张景志介绍，当年孙永勤、孙文贺等人伏击日军的位置就在那座峭壁的顶上。由沟底到峭壁的顶部，只能沿山坡上至峭壁的右下方，从那里沿一条斜向的仅容半个脚掌的岩石断面爬上去。张景志在前，我在后，身体紧贴石壁，小心翼翼地把脚踩到有不少裂缝的岩石上，时刻担心石片会突然碎裂、滑落，人跟着跌下深谷。这段“道路”大约有十余米长。当我在先上到崖顶的张景志的鼓励下，努力抑制着恐惧，手脚并用、无限狼狈地上到顶部时，张景志问了我一句：“回去还敢从这里走吗？”我想了想，终于还是说了句：“不敢了。”我问张景志：


图99　门子哨　2009年12月

“你敢吗？”张景志说：“当然，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的。”我听了无限惭愧，在当年孙永勤、孙文贺等人的射击位置朝山下看了看，便和他沿山顶一条平坦但是要绕很多远的小路下山了。约走了二三百米，张景志突然回头对我说了一句：“其实要是我一个人的话，我也不敢。”我说：“你刚才不是说敢吗？”他答：“人多了敢，一个人不敢。”据他说，前些年，那里还发生过一起摔死人的事情。本来“村村通”已修到了山里，但当地一个村民为抄近路，从那里下山，结果一脚没踩好，摔到山下，死了。

当二道石湖的崖壁再次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的时候，已经是将近一个小时之后了。夜幕渐渐降临，雾霭悄然升起，站在“村村通”小水泥路上，俯瞰空旷山谷对面静默的旧战场遗址，我的内心产生一种实在无法言说的感觉。那样艰险难行的道路，人们如果不亲眼见过并实地走过，谁会相信呢？那么艰苦荒僻的道路，当年孙永勤等人如猿猱般轻盈而过，如岩羊般坚韧而过，如果不是二道石湖瀑布能作证，二道石湖山石草木能证明，有谁会相信那不是一个编造的神话呢？

上面，我介绍了孙永勤队伍自1934年春从五凤楼撤出后，至1934年秋关东军和伪满军实施“全满秋季大讨伐”之前，进行的20场战斗。由于年代久远，回忆者对于这些战斗进行时间的记忆不一定十分准确，但这20场战斗实实在在发生过，应是没有疑问的。

需要说明的是，上列战斗只是目前能够知道的。应还有不少由于采访者没有到达发生地点，没有遇到亲历者、知情者，或者亲历者、知情者已去世，而暂时不知道，或永远不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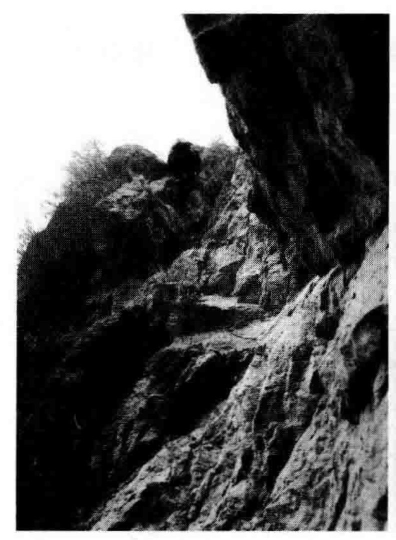


图100 前往二道石湖孙永勤、孙文贺伏击地点的所谓路只能容下半个脚掌，张景志手脚并用地在前带路，我战战兢兢地跟在他后面。2009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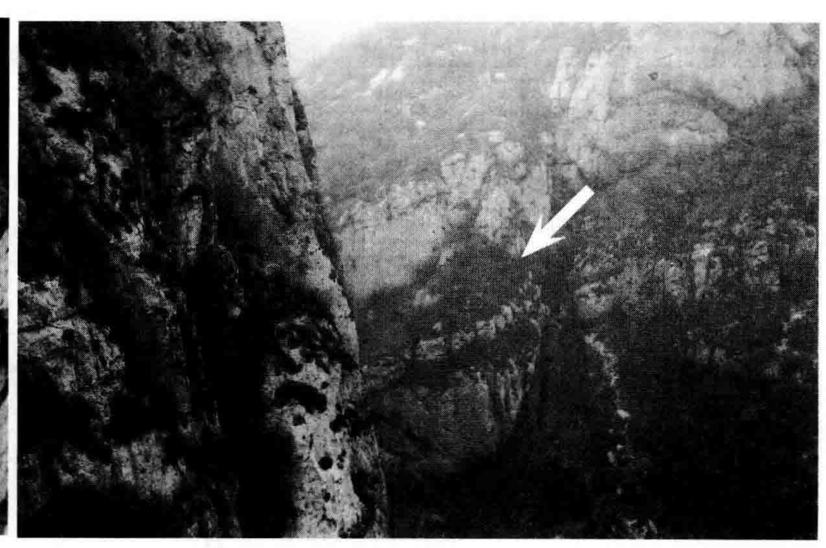


图101 门子哨孙永勤等伏击日军处（箭头指处）。2009年12月

五指山整编

1934年春至1934年秋是孙永勤队伍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其标志是：首先，部队人数达到了数千之多，较多的说法是达到了5000余众。其次，不仅引起了日伪当局的重视，而且吸引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国方面的正规军、地方会道门的目光，纷纷派人前来与孙永勤联络。

先讲第一个情况。

之前说过，孙永勤初起义时，与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文章宣传的不同，很多人希图过安稳的日子，是不愿意参加他的队伍反满抗日的。为此，“招人”在起义初期，对孙永勤来讲，曾是与解决枪支同等重要的两大问题之一。为了尽快扩充部队人数，他曾一度在劝说无效后，采取强制手段，让一些认识的人加入到他的队伍中。然而这一局面，随着人们对关东军和“满洲新国家”本质认识的深入，特别是发现孙永勤不是像他们痛恨的土匪一样，不抗日，只扰民，的确是企图将处于水深火热状态中的民众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解救出来后，很快发生了变化。民众不仅开始拥护他，而且主动前来加入他的队伍。

继父亲赵林、弟弟赵廷普加入孙永勤部队后，赵家庄赵玉芝在车河口战斗后参加了孙永勤队伍。她大概是孙永勤部队中最早的女兵。

孙杖子伙会会长孙永宗的儿子才16岁（虚岁），也加入到抗日救国军中。“他爹追了一回。孙永宗去前面找，他跑后面。孙永宗去后面，他跑前面。小伙子十六，那小伙子棒，有的兵犯错误，上级要是命令枪毙，他嘁叱咔嚓就把那个兵绑上。”2008年7月21日，我到孙杖子采访时，孙中训老人说。

“我一小记事，就听人讲孙永勤。老百姓都说孙永勤好，都佩服孙永勤，因为他是抗日救国，打日本鬼子、地主，为老百姓说话的。孙永勤的部队过来，人们自愿参加，愿意跟他干，因为他名声好。稍微一动员，甚至不动员，就自动跟他走，受欢迎到那样。”

塌山王胤淋老人有两位亲人参加过孙永勤部队，其中一位为国英勇捐躯。“我父亲就给孙永勤当过兵，跟着他走。后来到了大山坡峪，我父亲在小刘杖子那儿住，孙永勤在满杖子那儿住。夜里日本鬼子围攻，孙永勤他们趁黑夜走了。上边也没来得及通知，一放亮，日本鬼子开枪，我父亲差点没被打死。队伍给打散了，散了就回家了。我亲大爷叫王福富，那时家里贫困，也没媳妇，孙永勤杀富济贫，为百姓打仗，也跟着孙永勤去了。走对路了，抗击日寇，为穷人打天下，一直战斗到最后，到毛山牺牲了。”

普通民众外，一些伪警察因为受到热河当地开明人士的影响也参加了孙永勤部队。2007年4月23日，我在兴隆县大杖子乡政府偶遇51虚岁的王福清，据他讲，他的二大爷王永瑞早先在

车河口警察署当警察，“双手使枪，枪法准。后来参加了孙永勤部队，给孙永勤当警卫，毛山没回来”。王永瑞是在一位名叫霍福庭的士绅的劝说下参加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太爷霍福庭一家当时在车河川、柳河川是大家族，官厢、私厢都中。太爷和王永瑞关系非常好，做王永瑞的工作，说：‘你老当警察，日本倒了没有出路。’王永瑞听了太爷的话，结果就不当警察了，去了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霍福庭的重孙子霍秀成（46虚岁）说。

民众纷纷加入孙永勤队伍，增强了反满抗日有生力量，这是一件好事，但不加甄别、尽数收纳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无论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20世纪采访时，还是我近年进一步调查过程中，都遇到一些采访对象说起：许多没有营生、好吃懒做的人也混入到了抗日救国军中。这些人加入的结果，一是败坏了军纪，扰乱了百姓生活，使孙永勤背负了恶名。如2006年4月，我到遵化小厂乡小于沟采访时，吴显来老人（80虚岁）说：“那时候把粮食都埋地下。民众子来，拿棍子杵，发现有粮食，就起走。看见好衣服也拿走。”2008年7月10日，我到兴隆县大营子乡前莫河北台村采访时，姜以珠老人（81虚岁）说：“孙永勤部队见着鸡也抓，见着猪也杀，见到好吃的，自动就弄，不像共产党部队那样，所以管他们叫‘匪’嘛。头儿思想不错，也想走共产党那样的路，但是没有正确领导，不像共产党有明确的纪律。共产党多大的纪律呀！他那纪律不中，兵胡闹，不执行，三搞两搞就乱套了，老百姓都管孙永勤叫‘匪头儿’。”二是在日伪“扫荡”加剧、抗日救国军境况危急时脱离队伍，大大减弱了



图102 夏日五指山 2002年7月

抗日救国军的战斗力。这一情况在抗日救国军的上升时期尚不明显，在1934年9月秋高粱长起、日伪实施“大讨伐”后，便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图103 夏日五指山 2002年7月

无业人员涌入，造成了军纪败坏的情况，大概孙永勤也注意到了。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前面提到的清河塘战斗，虽然因为不知道这场战斗的准确发生时间，而无法说五指山整训一定和这场战斗中孙永勤意识到了部下不守军纪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后果有关，但他确实发现了对部队整训的必要。

有关抗日救国军整训方面的情况，原始采访记录中只有两个人曾留下过回忆：

首先是年焕兴。1961年5月，他在接受遵化党史办刘恩如先生采访时说，1934年5月，李连贵、年焕兴率100多人投奔孙永勤。在五指山会师后，“冀东特委王平陆同志在黑河与孙永勤会见，相谈数日，并建议孙永勤部队改换名称，并进行改组。孙永勤接受党的指示，将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军旗改为抗日救国军的大旗。在军队编制上，全军分为四个总队，每队1200余人。孙永勤担任军长，赵四川任军参谋长，张福义任第一总队长，年焕兴任第二总队长，何子桥任第三总队长，李连贵任第四总队长。各队分别挺进青龙县都山、承德、平泉、兴隆、迁安、遵化等县。”

还有就是刘俊岳。1983年6月15日，他对前来采访的栾福忠、邢连义先生说：“回五指山整训，练兵下操。”具体内容、整训时间未讲。

年焕兴的说法几乎为所有党史工作者所采纳。部分人有异议，也只是在“改组”时间问题上。有人认为是1934年3月中旬。《黄花川暴动》作者持此看法。

党史工作者一般将孙永勤在五指山进行的整训称为“五指山整编”。整编内容被描述为以下四点：

第一，将“民众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军”，更新旗帜。

第二，将已发展到5000多人的队伍进行改编。孙永勤继任军长，赵四川、马保德任副军长，王殿臣、关元有任参谋长。下设四个总队，每总队800至1200人。张福义任第一总队长，


图104 夏日五指山 2002年7月

年焕兴任第二总队长，关元有兼第三总队长，李连贵任第四总队长。总队下设中队、小队、班，以队为作战单位，活动于兴隆、承德、宽城、平泉、迁西、遵化等地。军直设稽查处和直属队，张志全任稽查处长，赵有任稽查队长。

第三，加强抗日到底思想教育。

第四，整顿纪律。

上列第一点，根据之前的分析，可能实际发生于1934年2月。

上列第二点，抗日救国军有5000多人的问题，阅读目前能看到的所有抗日救国军战士的回忆，可发现，关于抗日救国军在最盛时期的总人数，并没有统一的说法。除5000多人说外，尚有2000多人说、最多不超过3000人说、6000多人说，相对而言，持5000多人说法者较多。领导人职务上，孙永勤、张福义、年焕兴、李连贵四人职务没有异议，但副军长、军参谋长、第三总队长名字，即便在党史工作者中，看法也并不一致。有的说副军长实际为关元有，军参谋长为赵四川，第三总队长为何子桥，或何子桥、关元有两人。孙永勤长子孙文伶的观点接近这一种看法。在1981年发表的《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忆爸爸几件事》中，他说："队伍发展起来以后，组织也健全了。我父亲当军长，关元有当副军长，赵四川当参谋长。全军分38个中队，下边分排班。军部下边还设了军法处，是专管队伍纪律的。"由于孙永勤起义那年他已经12虚岁，可以清楚地记忆很多事情，此外又跟随孙永勤战斗过几个月，与孙永勤周围的几个领导人都很熟悉，我倾向于认为他的说法可能更为准确。

以上问题外，党史工作者完全接受了年焕兴的观点，认为"五指山整编"是王平陆建议的结果。但根据以前曾提到的雷永兰的回忆，王平陆是1934年2月到的孙永勤军中，那时孙永勤等人尚驻扎在五凤楼王胖子沟。除非那以后他又去了一次抗日救国军中，否则，说"五指山整编"与王平陆有关实在比较牵强。

五指山整训也好，五指山整编也好，尽管围绕着它的不少问题现在尚不能给出定论，但孙永勤在五指山（佟靖功先生认为是五指山双塘子）确实对抗日救国军进行过一次整训，是毋庸

置疑的。这次整训对抗日救国军的健康发展是否起到了积极作用呢？虽然不能指望一次整训便能产生什么效果，但通过这次整训及孙永勤平时不断地对部下进行教育，抗日、要爱护老百姓这两方面思想还是深深地植入了大多数本性善良的战士心中的。2006年4月，我到遵化东北部地区采访，小厂乡信访科员吴艳民对我说："听老人们讲，孙永勤的队伍过来，要是听到谁说日本人好，抓起来就打。""孙永勤常对我们说：'不许动老百姓的东西，不许开小差，不许强奸妇女。'"1983年6月1日，孙文阁对栾福忠、邢连义先生回忆，一个战士拿老百姓东西，发现后，被打跑了，枪丢下了。"

下面谈一谈第二个情况，即抗日救国军引起各方关注的问题：

一、日伪方面

日伪对"满洲国"西南"国境"这支抗日武装开始注意，据佟靖功先生说，始于1934年2月上旬二道河战斗结束以后。"二道河突围时，有四个战士被俘，敌人用飞机把他们送到了长春。当时关东军正要对平津用兵，关东军的高参们想了解'国境线'上的情况，就都听了对他们的审讯。这四个农民很朴实，他们说，我们不懂什么叫抗日，我们跟着孙永勤就是因为受到大地主的压迫。没吃的，没喝的，生活不下去。为了生活，这才起来的。四个农民说的很策略。关东军高参们就问，你们有多少人？四个战士说，我们都是一户一户的，现在有四五千户。关东军高参们一算，四五千户那是好几万人，很吃惊。当时日军在热河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征服好几万人，就通知热河省长张海鹏招抚，说这些农民起来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打日本，你们一定要招抚。张海鹏就通知兴隆办事处主任吕俊福，让他前去招抚。吕俊福通过寿王坟孙永香和孙永勤联系，要求谈判。孙永香曾和孙永勤联合剿匪，这时实际上已经投靠了伪满。他把吕俊福的意思和孙永勤说了，孙永勤提出一个条件：光吕俊福来不行，得带着兴隆县的一个士绅。我们认识兴隆县的人，不认识吕俊福。吕俊福就决定带卢仪卿去。卢仪卿是兴隆县很大的一个地主，也是挺有名望的一个地主，当时担任伪兴隆县办事处财政局局长。孙永香第二次来，就说吕俊福准备带卢仪卿来，希望约定时间、地点谈判。这时候关元有和几个军师一商议，不能听吕俊福的。你不管怎么说，他是伪'满洲国'的。他来和咱们谈判的目的，



图105　张海鹏（照片提供：伪满皇宫博物院）

是让咱们给他当亡国奴。孙永勤听后，把孙永香给扣了。一旦吕俊福有变，孙永勤就变。孙永香一被扣，他有个亲戚在伪办事处里，吕俊福就知道了。跟卢仪卿一商议，变计策了，明着招抚，暗中'剿匪'，发去500人打五凤楼。夜里进去，天亮时用炮轰了孙永勤的司令部。吕俊福的兵在北山，孙永勤的兵在南山，对着，整整打了半天，后来进了孙永勤的司令部，把孙永香弄走了。敌人一看，孙永勤的部队不是兴隆县办事处500人能剿灭的力量，撤了。"

佟靖功先生的说法中，有关孙永香被扣押和五凤楼战斗发生原因的介绍与罗圈沟孙守印老人掌握的情况有所区别，何者为真，希望将来有新的资料发现，以帮助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目前作为孙永勤研究中的一种说法、一个观点，依佟靖功先生对我所讲，原样抄录。

如果佟靖功先生所说关东军派张海鹏招抚抗日救国军、张海鹏又派吕俊福前去招抚属实的话——且不管孙永香被扣、五凤楼战斗发生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日伪1934年春的举动可称为"第一次招抚"。根据孙永勤妻子雷永兰的回忆，1934年8月，日伪还曾进行过一次招抚，我将其称作"第二次招抚"。

"敌人看到抗日救国军在长城内外点燃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鬼子站不稳，伪军坐不牢，处处挨打受挫，恨得咬牙切齿。日军热河司令部为了制服抗日救国军，又打了鬼主意，想用软的办法拉拢永勤。1934年8月，连续派人给永勤送了两封信，又是给地盘，又是给官做，还真的送来了一张委任状。当时我正好在场，永勤看过信后，气得额上青筋直跳，一边骂一边把信和委任状撕碎，摔到送信人的脸上。"1980年前后，雷永兰接受从言己采访时说。

雷永兰所讲情况并非凭空编造。早在1935年，《东北烈士传·孙永勤烈士传》作者闵时夫就提到日伪曾经诱降过孙永勤。

"至是（指孙永勤不断攻击日伪，队伍渐渐壮大起来后）日贼大惊，认为系伪国一大障碍，迭派大军自热进攻。烈士据险设防，日夜督战，贼不得逞。而烈士则时派小队四出袭击日伪军，日贼深以为苦。烈士并时攻承德，虽因无攻城器械，无效，然亦使日伪心惊胆战矣。先日贼拟利诱烈士，派日人前往说降。烈士逐之，谓如敢再来，当割其耳。后日贼又遣汉奸数辈前往劝诱，烈士笑曰：'汝辈无脸，以我亦无耻之徒，能在日贼暴力下，作走狗之走狗乎？'汉奸复强聒，烈士叱曰，如敢再饶舌，当割汝舌，为卖国奴之鉴戒。日贼乃益恨之刺骨。"

根据闵时夫在《孙永勤烈士传》中随后所写及雷永兰20世纪80年代初的回忆，日伪在劝降孙永勤无效后，便调集军队开始了对他和他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围剿"。伪满《大同报》、《盛京时报》报道：从1934年秋开始，关东军和满军在全满范围内实施秋季大讨伐行动，从侧面证实了闵时夫、雷永兰的说法。

二、中共方面

1934年春至1934年秋，共有中共河北省委、中共京东特委、中共遵化县委三级党组织派人

与孙永勤部进行了联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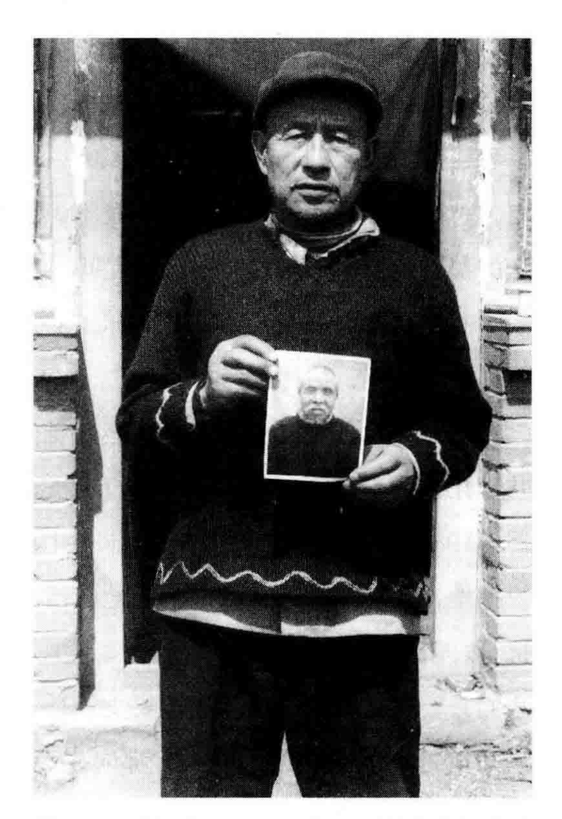
中共河北省委派遣干部进入孙永勤军中，中共遵化县委支援了孙永勤军队部分武器、药品，出自1933~1935年时任中共遵化县委书记的骆凤庭的回忆。

骆凤庭，今遵化市团瓢庄乡骆各庄人，1912年生[1]。

骆凤庭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其子骆玉占2005年夏对我说，他家过去“有地100亩，雇两个伙计管理”。

骆凤庭小学就读于遵化南岗高小，那所学校的教师中不少是中共党员。其中有两位，一个叫王子丰，一个叫兰小川，对他非常器重，上学期间，曾努力培养他树立反帝爱国思想。1928年，骆凤庭高小毕业，回家务农，王子丰、兰小川专程赶到他家，将其吸收为中共党员。

入党后不久，骆凤庭参加了京东党组织成员张明远在遵化北岗庄北捣药口山坡举办的党员小型训练班。那次培训对他影响非常大，李永春先生说，“他思想有一个跃进，应该怎么办，要怎么办，开始懂了。这个人同情革命得很，以后很积极，直接在张明远的直线领导下做了好多工作。他水平不高，但非常肯干，非常忠于党的工作。张明远是玉田人，对遵化不太熟悉，他熟悉。他当县委书记，领张明远开辟地区时，他在头里走，离张明远有100多米，说：‘发现了问题，我咳嗽，你就快跑。豁着逮着我，也不能逮住你。’给张明远的工作起到很大支持作用。”


图106　骆凤庭之子骆玉占手执父亲的照片站在自家房门前。2006年4月

骆凤庭是1933年底被当时的中共京东特委书记郭涤生（外号“黑锅”）任命为遵化县委书记的。担任书记后，曾做过很多工作：组织雇工农会、工会，从中发展党员；发动民众抗租抗税，维护合法权利和收入；按照“左”倾路线指示精神，夺取警察局、税所枪支，准备武装暴动等。前两方面成绩较显著，夺取武器之事一直不理想。为不致因枪支问题影响上级党组织实施武装暴动计划，骆凤庭和其他党员商议，决定集资买枪。他卖掉自家15亩好

[1]　本书校对期间，遵化党史办程水星先生不顾冬季寒冷，两次到骆各庄寻找骆凤庭之子骆玉占，为我核实其父的准确出生时间，在此特致谢意。骆凤庭出生时间现有1911年、1912年两种说法，由骆玉占说他父亲属鼠，2001年去世时90虚岁来判断，骆凤庭应出生于1912年。

地，买了一些枪支，后来支援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部分枪支就出自其中。

中共河北省委派人进入孙永勤部队，根据骆凤庭1983年12月对栾福忠先生的回忆，是“孙永勤闹暴动的消息传来以后”。之前，中共迁安县委负责人高存已将关元有是中共党员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并说“孙永勤是抗日队伍，要支持”。

中共河北省委遣入孙永勤部队中的人，名字叫徐英。据骆凤庭1987年3月向佟靖功、栾福忠先生回忆，他是河北省委派来的军事干部，以前在军队中工作过。“高存领来了徐英，30上下岁，中上等个，圆脸，听说话口音是豫北或冀南一带。他在孟家铺住过，和我没有一块工作过。去孙部之前，由高存给关元有写了封介绍信，当时是我派走的。”徐英到达抗日救国军中，与关元有接上关系后，给骆凤庭来了一封信，说孙部急需枪支、药品。骆凤庭接信后，立即从自己卖地购买的准备暴动用的枪支中拿出十支汉阳造和老套筒，又从药铺买了一箱子治外伤的药品，让自己的兄弟骆凤鸣和本村一个叫阎龙的青年，两人都是中共党员，星夜兼程，送给了孙永勤。

运送枪支和药品的经过，栾福忠先生曾做过专访。运送者之一的阎龙1983年12月回忆说：“县委书记骆凤庭派我给孙永勤送枪，那时我才17岁。我买了一张席，把10支枪捆好，让毛驴驮着，背上放了一箱子药，和骆凤鸣一起，走了三天三夜，摸到了车河口。找到孙永勤、关元有，把高存他们写的信给看了。我不识字，不知写的是啥。孙永勤、关元有清点枪支、药品。送的都是旧枪，那时候旧枪都是宝贝。”

徐英送出一封信后，再无音讯。骆凤庭说：“后来省里没有打听过他的下落，高存也没有再提起过徐英，估计是牺牲了。”

骆凤鸣、阎龙给孙永勤部队运送枪支药品的时间，据骆凤庭回忆是1934年春夏季。这是中共遵化县委系统第一次以具体的行动支援抗日救国军，那以后他们还给孙永勤队伍送过一次武器。1983年12月，骆凤庭对栾福忠先生说：“我们县委在孟家铺一带活动。那时叫开辟冀热边根据地，我们在靠近长城一带的地区活动。1933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后，党中央号召全民抗日，阶级斗争要让位于民族矛盾，主要是团结抗战打日本。孙永勤是民众军，抗日的队伍，我们县委在孟家铺开会，决定要支持孙永勤。和我在一起开会的有王平陆、樊凌玺。王平陆我只知道是上级党委派来的人，那时介绍信没有公章，就是一张便条，上面派人写个条子就行了。王平陆在遵化工作半年之久。那时我们在一起开会，他讲，中央主张全民抗战，打日本，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后来我派李子华、马子敬，他俩都是孟家铺区委负责人，要他们支援孙永勤一些枪支弹药。他们给送去了，向我说送到了。”

李子华、马子敬送武器的时间，骆凤庭没有留下清晰的记忆。根据各方面资料分析，应是1934年下半年或1935年初，总之应在抗日救国军进关之前。

中共京东特委在王平陆之后，还派人进入过孙永勤部队，是抗战时期曾任迁遵兴联合县县委书记的宋诚回忆的。1982年12月21日，他对未留下名字的一位采访者说："当时我在惠文中学念书，我家一带住有京东特委和县委的人员。特委的两个人曾想派我去孙永勤的队伍进行工作，后来因为我小，没有让去。看来特委这两个同志是专门来做孙永勤的工作的。两个同志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一个是山东人叫大李，一个是山西人叫小李，其他都是本县的。后来他们派了我们村的一个姓樊的去了，做孙永勤的工作。去了不久就回来，饿得啃青棒子粒。他说孙永勤的队伍很不像话，没法做工作。到1935年孙就失败了。" 这位"姓樊的"人的名字，据宋诚讲，叫樊凌喜，即樊凌玺。《师教导员樊凌玺》作者陈述说他1910年生，遵化东草厂人，1932年经单福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洪山口、潵河桥一带活动，发展党组织。根据宋诚说他"去了不久就回来，饿得啃青棒子粒"来看，他是1934年秋被中共京东特委派入孙部的。

以上是中共河北省委、京东特委、遵化县委在1934年春至秋季对孙永勤部队所做工作的介绍。除中共党组织这种由外部展开的对孙部的工作外，抗日救国军中还有一些以个人身份加入的中共党员，其中的一部分受"左"倾思想路线影响较深，曾企图在内部开展工作，将抗日救国军由抗日武装变为暴动所凭借的力量。幸亏中共迁安县委（老县委）书记韩东征头脑冷静，才未使抗日救国军重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分崩离析的覆辙。这一情况是孙永勤牺牲25年后，由抗日救国军战士刘俊岳向党史工作者披露的。

刘俊岳，今迁西县潵河桥镇东营村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5月20日加入抗日救国军。入党及参加孙永勤队伍的过程，他在1961年、1983年分别向王玉璋、栾福忠、邢连义先生作过两次介绍，综合起来如下：

他家有一亩地，由旗地改民地，要掏三块现大洋。刘俊岳暂时给不起，和甲长刘坤明商量，希望以后再给。刘坤明不同意，二人发生争吵，越吵越激烈，刘俊岳忍耐不住，将刘坤明打了。刘坤明报告警察局，两名巡警来到东营村，将拿锄正要下地的刘俊岳捆绑起来，打了一顿。此后不久，前韩庄韩东征，还有一个叫韩子信的192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便来到刘俊岳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转眼到了1934年农历四月初八（公历5月20日），刘俊岳去上营混沌峪看庙会。会上与口外燕子峪的李胜祥相遇，二人过去相识。李胜祥向他说起孙永勤正在口外组织民众抗日，刘俊岳听韩东征讲过抗日救国的道理，再加上从小喜欢枪，于是决定跟随孙永勤抗日。

"就找孙永勤队伍去。一直找到口外长河峪，见一家大院门前插着三角大旗，上面有圆的红月亮，旗周围写着'抗日救国义勇军'大红字。我想这一定是大队部。门口有站岗的，我叫他们传招一下，说我要当兵。雷庭玉（即雷常玉——编者）是大队长，赵邦海是大队副，见面说我是日本探子，就要绑上打我，来吓唬我。见我面不改色，镇静如常，才把我收下了。四五

天后，发给我大枪和子弹。”刘俊岳对王玉璋先生说。

刘俊岳加入雷常玉部队后，分配他负责号房和伙食。由于文化不多，花出100元才记个数，零碎账不计。他的军衔为中士。

“由于部队发展过速，存在时间较短，所以党员数少，工作薄弱。”有关抗日救国军中中共党员的情况，最早见于1961年8月9日刘俊岳对许家保先生的回忆。在那次采访中，他说，共产党并未有组织地派进党员，只是在部队集中时，有熟悉的人前来询问：“有关系没有？”，靠这种方式来串连党员。在队伍发展到3000人左右时，有党员20人左右。到5000人时，有党员二十五六人。“党员虽少，但一般都是排级以上的干部，负一定的责任。他们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开会研究工作。研究以后，一般都是通过公开的职务身份贯彻党内会议精神。非党员做领导工作的，有时也有意识地合起来开会。”

刘俊岳最初并不清楚他的指导员刘玉堂的真实身份，直到1938年他参加冀东暴动，在八路军十三团二连又见到了刘玉堂，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根据刘俊岳1983年6月向栾福忠、邢连义先生所作介绍，他在加入抗日救国军20多天后，即1934年6月上旬或中旬，刘玉堂交给他一个任务：回迁安，寻找县委书记韩东征，向他汇报孙永勤部队中党组织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了解上级党组织计划什么时间举行武装暴动，以便从口外接应。

刘俊岳回忆，他在于孤寨找到了韩东征，当时他与40多人正在开会。刘俊岳将情况向韩东征说了，韩东征明确阐述了他的意见。“韩东征跟我说：‘你回去，有什么紧急事情再来。暴动不到时候，没有枪支哪能暴动？都得听李运昌的，他说啥时候暴动才能暴动。’”

除了指出暴动未到时间外，韩东征还对保守党的秘密、开展斗争前做好充分准备工作作了指示，对抗日救国军应遵守的纪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刘俊岳回忆至少有以下四条：①不拿群众东西；②不打人、不骂人；③不得奸淫妇女；④不携带军火逃跑。

其他的，刘俊岳记不清了。

上述诸意见，刘俊岳回到抗日救国军中后，一一向刘玉堂作了汇报。从那时起，直至1935年5月底抗日救国军覆灭，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刘俊岳未闻抗日救国军中的中共党员再讨论过暴动事情，至少他未见因为要抗捐抗税、打土豪，偏离抗日轨道，而导致孙永勤愤怒、抗日救国军内部分裂之事发生。

抗日救国军得以延续将近一年，我个人的看法，韩东征在关键时刻阐述的几点意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勃勃图谋占领全中国，国内的爱国民众日夜企盼着尽快收复失地，将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孙永勤集中精力与关东军和伪满军警战斗的时刻，韩东征的几点意见，特别是暴动未到时间的观点，犹如在已经有了朝“左”倾方向行驶苗头的战车上踩了一脚刹车，又如在企图朝歧路方向拐去的一匹驾辕的马上抽了一鞭，终于使抗日救国军

不致因“左”倾路线影响，而再次上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凄凉落幕的悲剧。

韩东征的生平在此作个简要介绍：

根据唐山地区党史工作者调查，韩东征，原名韩复东，曾用名韩成。1902年生于迁安县前韩庄（今属迁西县东荒峪镇），1928年春由韩文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迁安县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的创立者，曾任前韩庄党小组长、前韩庄党支部书记。和韩文华一起创办过“贫民学校”，培养了很多党员。组织“赤农会”、“民众会”，发动群众开展过抗捐抗税、反“旗地变民”的斗争。1929年6月，他与共产党员李显荣一起发动两万多民众包围了迁安县城，迫使迁安县政府发布免征新增捐税的布告。同年冬，中共迁安县委建立，韩东征担任了县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韩东征率中共迁安党组织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他曾向东北军汤玉麟部派遣过党员，希望能增强汤部守土抗战的决心。热河沦陷后，又和共产党员高机先一同组建起由100多名成员组成的“抗日自卫团”，配合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董家口等长城要隘抗战。

1933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为配合南方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要求迁遵蓟中心县委在党员力量强大的迁安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北方苏区与红军。这一指示通过中共京东特委传达到迁遵蓟中心县委和迁安县委后，韩东征与时任迁遵蓟中心县委书记的李子光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迁安不具备发动武装暴动的条件，盲动蛮干的结果必然是失败。于是，拒绝接受中共河北省委、中共京东特委的指示，被扣上“迁安右派”、“欢迎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大帽子，迁遵蓟中心县委解散，迁安县委改组，韩东征、李子光二人职务被撤销。激愤之下，韩东征成立“游击县委”，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迁安农民武装暴动仅勉强维持了三天，便宣告失败，事实证明了韩东征、李子光对冀东革命情况判断的准确。尽管如此，韩东征却无法平静，因为他一手扶植建立的迁安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他自己也不得不出走玉田，在战区保安队躲避了三个月。重回迁安后，他与李子光、韩风山等人到金厂峪金矿，领导了金矿工人反对资本家李佳惠克扣拖欠工人工资的罢工斗争。

强加到韩东征、李子光身上的罪名被洗刷掉，是在三年后。1936年，刘少奇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冀东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被逐步纠正。1937年春，已担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的王平陆亲自找到李子光、韩东征，代表上级党组织恢复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和领导职务。

韩东征的第二次迁安县委书记职务只担任了一年多的时间。193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冀东组织了20万工农武装抗日大暴动，韩东征任冀东抗日联军第十四总队政治主任，随部队转战。西撤受挫后，他组建了八路军第三十二总队，配合苏梅、陈群支队在丰润、滦县、迁安三县交界地带开创小片根据地，为同年10月成立丰滦迁抗日联合县政府打下了基础。

1939年秋，韩东征带队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受训，次年7月返回冀东。那以后，直至全国

解放，曾历任迁遵兴联合县委书记、迁青平县委组织部长兼抗联会主任、迁遵青及迁卢青县委常委兼抗联会主任、冀热辽十五地委委员兼迁青平县委书记、冀东区贫民团副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韩东征一直在水利战线从事领导工作，先后任蓟滦河务局局长、河北省水利厅农田水利局局长、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水电部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等职。1975年10月，韩东征由德州离休回到唐山。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韩东征不幸遇难，终年74岁。

自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76年离世，近50年革命生涯中，韩东征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既不被“左”倾风浪所撼动，也不为右倾思潮所影响。抗战时期，他拒绝执行中共河北省委的“左”倾错误路线；解放战争时期，他抵制土改中的“搬大石头”等错误做法，努力予以纠正；“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中，他挺身而出保护了很多干部。他的所作所为，令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在民众心中树立了起来，他本人也因此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为很多人敬佩和怀念。

三、中国军队方面

有关中国方面军队曾与孙永勤部队联络的说法出自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的回忆。1986年11月18日，他对佟靖功先生说：“有一年夏天，我们部队在五指山王杖子，我听说八路军那边来人了，接咱们来了。听说他们来了五六个人，孙永勤怕是坏人没见。可能是关元有、赵四川、马保德他们见的。他们跟了咱们两三天呢，从十二岭进沟，跟到五指山，一直跟到解放那边。”

孙文炳的回忆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当时寻找孙永勤部队的不可能是八路军，因为“八路军”是1937年8月开始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在孙永勤抗战时期，只有红军的说法。

跟随抗日救国军的是红军吗？是哪里的红军呢？有没有可能是与热河接壤的河北省、察哈尔省境内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呢？“接”抗日救国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1934年夏天——由于孙永勤队伍从1933年12月成立到1935年5月底失败，只经过了一个夏天，所以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孙文炳所说的“有一年夏天”为1934年夏——发生于五指山中的这件正规军跟随孙永勤部队的事件，由于没有更多的材料，欲搞清真相，尚需深入调查。

四、会道门方面

会道门企图与孙部联系，出自抗日救国军战士张凤林1986年11月18日对佟靖功先生的回忆，联络时间未讲。

“澈河桥这边关家庄，有一个商人叫关元士。他与岳老亮是亲戚，派人来孙永勤部，想搞红枪会，刀枪不入。孙永勤未听。”

“孙永勤起队伍，我和大闺女跟着三个月。后来更名改姓，不敢姓孙，到处流浪。”1983年6月25日，雷永兰对佟靖功先生说。

“孙永勤拉队伍，全家房屋财产均被烧光。家里人东跑西颠，这儿住几天，那儿住几天。”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的回忆印证了雷永兰所说的话。

根据孙永勤次子孙文孝在1983年所作回忆，父亲起义后，他一家曾先后到毛文峪、黄花峪、河玉桥、左家坞等地躲藏，姓氏也先后改成过陈、王、任、张。河玉桥、左家坞，疑是孙永勤牺牲后他一家人躲藏的地点，这里不表。毛文峪、黄花峪是孙永勤还活着时，其妻子儿女躲藏之地。两个地方当中，毛文峪我未前去调查，他们在黄花峪生活的情况，2007年4月15日，史耀清老人曾向我作过介绍。

“雷永兰和几个孩子都藏在黄花峪。山沟里不是？一有风吹草动，就往山里跑。大川里不敢呆不是？没有卫兵，半个助威的都没有，各想各的办法。都是找亲戚，找有山沟的地方。”

史耀清说，有一段时间，孙永勤在红石砬驻扎。红石砬、黄花峪相距不过两华里，雷永兰曾想让孙永勤来看看她和孩子，让史耀华带话。“孙永勤不瞅不看，不打听。气得雷永兰背地里骂：‘大盒子背上了，把他妈都忘了。’”

史耀清说：“史耀华经常背三八大枪回家，说表姨夫说过：‘妈那个×的，地主富农不打垮了，枪不给部队装备起来，不能饶啊，想给日本子溜须？’表姨说：‘管那个干哈使，孩子老婆都撇了，你就自个一个人吃饱，让我们裹裆尿裤的。你说你逞那个强干啥，当军头子，还大柜！’”

“他家是个财主。”孙永勤之子孙团营在解释奶奶雷永兰何以对爷爷有怨气时说，“据我奶奶说，当时钱都用斗量。后来把家产都卖了，买军火了。按我爷爷的能力，生活肯定比普通百姓过得要好。即使受压迫，也比他们要强一些。但他不愿意做亡国奴，不愿意看着日本人侵略自己的国家。他起来就是想反对侵略者，把他们打跑。那家里肯定不干哪，谁不想过安稳日子？枪林弹雨，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有点啥事谁不愿意躲？我大爷讲，我太奶，就是我爷爷他妈，一看他就生气，但是没办法。我爷爷带队打仗回来，要是正赶上吃饭时间，准会问：‘老太太吃了吗？’‘没吃。’没吃他肯定不高兴。他是很孝顺的那种人，大孝子，就心想，老太太不高兴了，肯定是又为我担心了。就也不吃，撅个大嘴。下回再回来，把饭送过去了，问：‘吃了吗？’‘吃了。’我爷爷听了，也就端起大碗，扑噜扑噜吃了，特别高兴。因为他妈吃了，他没有负担了。有时甚至是，老太太不吃，我端着碗上你跟前吃，扑噜扑噜的，把他妈逗乐了，把饭吃了。我奶奶的事情也是这样。从我奶奶个人来讲，肯定是不愿意我爷爷起义，担心他生命安全。你说，日本人那么强大，作为老百姓，她肯定有这种担心。从夫妻感情上讲，拉家带口、有儿有女的，夫妻感情再好，她愿意他走？肯定是不愿意。但当时那种环境，日本人都逼到家门口了，几十里之外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不起义就只有等死，我爷爷肯定得从大局考虑。我奶奶说过，那时候还在孙杖子住的时候，早上，我奶奶把我爷爷衣服给藏了，怎么搂着他，目的是想挽留他，参谋长一找了，我爷爷想尽一切办法，该出征出征，该打仗

打仗。”

“那要不是好汉子，不大男子主义，起不来，惦着妻子、儿女的。一个人碍着什么事？人家革命，豁出来了！雷永兰那叫守了多半辈子寡，五个孩子都是她一个人养活大的。”史耀清感慨道。



“大讨伐”

1934年9月上旬开始，关东军、伪满军队联合行动，在全满范围内实施秋季“大讨伐”，目标指向在全满各地“跳梁之匪贼”。被划为第五军管区的“满洲新国家所属之热河省”“剿匪”行动如何部署和展开的，我因未见到相关文件，不敢妄加阐述。目前知道的是，早在当年5月中旬，伪满民政部警务司就已开始着手从包括哈尔滨游动警察队在内的多个游动警察队中抽掉官兵，拟将他们派往热河，编充所谓的国境警察队，巩固热河边防。这些游动警察队官兵后来是否成行、什么时候抵达热河不得而知，但伪热河省为维持伪满西南“国境”治安，曾专门开会研讨并采取过具体行动则是属实的。

伪满《盛京时报》康德元年8月21日（公历1934年8月21日）第九版报道：

热河省地区治安维持会，于十六日午前八时三十分，在师团司令部纪念堂召集各县委员长，日本军方面有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于原中将以下参谋，省公署方面有中野总务厅长、庭川行政科长、小林警务厅长、恩民政厅长，外有各县参事官警务指导官等六十余名，出席之下，开治安维持会，讨论左列各事项。在会议完后即开恳谈会，至午后五时散会。

一、整备警察机关及整理自卫团之情况。

二、武器调查之现状及武器改修计划。

三、调查户口保甲制度之情况。

四、通信施设整顿之状态。

五、蒙旗之情势。

六、匪贼之情势。

七、水灾之状况。

八、治安维持会经费使用之现状。

伪满《大同报》康德元年10月27日（公历1934年10月27日）第三版报道：

省境自入秋以来，匪患迭兴。因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对于匪情传达均用人力，军警虽星月奔驰，至则匪已远逃无踪，故于剿除诚属不利。当局为决心剿匪，以救民生计，特先在承德全境积极组设电话网，现已动工，故于灭匪上获益良非浅鲜矣。

以上两则消息表明，热河尽管地处伪满西南边陲，但日伪当局对“剿除匪贼”、维持边防安全并未丝毫殆慢，甚至可以说非常下功夫。

面对日伪全满范围内的统一行动，孙永勤等抗日救国军领导人采取了怎样的措施来应对

呢？非常奇怪的是，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不仅抗日救国军的领导人未留下，就是普通士兵、官兵家属也未留下哪怕一鳞半爪有价值的回忆。

不仅抗日救国军的应对方案不明，从1934年9月开始至1935年2月初（1935年春节前），将近五个月时间内抗日救国军开展了哪些战斗，人们所知也极其有限。

根据幸存抗日救国军官兵、知情者回忆和我近年所作调查，目前可以确定为1934年下半年进行的战斗只有以下几次：

一、二打瀑河口

1983年，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向栾福忠先生回忆："瀑河口打了两天。大财主有炮楼，有30多人护院。打进后，缴获五支枪。当家的不在，跑宽城了，抓到一个地主小孩。"

2007年4月，我到兴隆县蘑菇峪乡河南大峪采访，雷常玉堂侄任梦奇说："秋天，孙永勤他们早晨出去，中午打上，打到下午4点多钟。瀑河口有团（即院兵），孙永勤他们把团盯住了。团人少，总共100多人，孙永勤有六七百人。团打得枪管都软了，把子弹拿石板盖上，跑了。老任家都跑宽城去了。"

上面两段采访，在战斗耗时和护院人数的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因为都提到了主人跑到宽城，我判断为同一次战斗。此次战斗的发生时间，孙文炳未讲。任梦奇明确说是秋天，与宽城党史办杜青怀先生所说的第二次攻打瀑河口的时间相符，故我判断孙文炳、任梦奇所说为第二次攻打瀑河口经过。


图107　冀东长城敌楼废墟。2005年7月

二、杨树林、黑锅顶战斗

二打瀑河口战斗结束后，孙永勤似乎便西渡滦河，到了今兴隆县南部的潵河地区。

高印臣1989年1月向佟靖功先生回忆，1934年冬，未到穿棉袄之时，抗日救国军曾在今兴隆县三道河乡杨树林村与日伪打过一仗。"那次民众军在杨树林那边打死一个日军，那次有李连贵。"

杨树林之战结束后，抗日救国军越过长城，撤往遵化舍身台一带。战士在前，

孙永勤在后，行进当中，发生了日伪从杨树林开炮射击，瀑河口之战中抓到的任家地主小孩被炸死，孙永勤抱着小孩尸体哇哇大哭事件。

随后，黑锅顶战斗发生了。

“在黑锅顶与满洲队打起来了，打了半天。敌人死了几个，孙永勤队伍有一个队长挂花，不碍事。那次打仗，民众军举着一杆旗，三角旗，一庹长，绿色的，（上有）黑墨写的字，字有拳头大，三尺长把。孙永勤没子弹，让把那旗插在黑锅顶山尖上，引诱敌人打炮打枪。等敌人到了，民众军没影了。”

抗日救国军哪里去了呢?

他们由高印臣带路，向东急行军20多华里，到了遵化东北部的万树庵。住宿一夜后，天亮转移至别处。

“我在万树庵挨了一宿冻，天亮他们走了，我回来。”高印臣说，“到家第二天去埋小秧儿，去了七个人，有我、陆拥、陆奎、张永义、张殿士、张志龙，还有杨树林一个姓马的。我们还没埋呢，伪满军把机枪支上了。他们没走，黑锅顶山尖上满了。伪满军下来，攮了秧儿三刺刀，然后把我们带到杨树林。日本兵走了，剩伪满军了。伪满军让陆奎、张殿士、张永义给他们铡草，一直铡到半夜。伪满军一边看着他们铡草，一边骂：‘杂种操的，赶快铡呀！’到半夜，没人盯了，我们钻进马鸣龙大秫秸垛里去了。伪满军边找边骂：‘杂种操的，找到他们，非处死他们不行！’两个伪满军跟到马山家追妇女，马山扛枪拦过来：‘干啥？要粮给粮，要鸡给鸡，干啥呀？’伪班长把那俩兵找回去了。”

三、舍身台战斗

1986年11月17日，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向佟靖功先生回忆：“在舍身台打一次大仗，有张杖子张如香。敌人把孙永勤追到长城炮楼里了，我们顶着打。黑了，敌人撤了，孙永勤下来了。”

此次舍身台战斗的时间孙文炳未讲，由其上下文推测，是1934年冬。根据遵化籍战士刘秀存的回忆，1934年冬，孙永勤确曾在舍身台驻扎过。1986年10月25日，刘秀存对遵化党史办马秀山、李永春先生说：“我是1934年冬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投奔的孙永勤。初去，孙永勤身边人不多，只有十八九个人，别的地方是否有军队不知道。他正驻在舍身台。”

以上为目前所知的仅有的三场可判断为1934年下半年发生的战斗。另有几场战斗，因受访者未说时间，难以明确判断发生于1934年下半年还是以后。

这几场战斗分别为：

1．潘家口战斗。

由刘俊岳于1983年6月15日向栾福忠、邢连义先生讲述。

“潘家口是警察署。去我们一连队130人，夜间包围。滦河沿去一部分，占领山头要道。



图108　孤山子税关（照片提供：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

冲进去消灭敌人，打了200发子弹，消灭敌人40，晨3点收拾干净。”

2．车河口战斗。

刘俊岳讲述，讲述时间为1983年6月15日，采访者是栾福忠、邢连义先生。

“袭击车河口，我们参加了。去了两个连队，由赵邦海中队长率领。夜战歼敌是孙永勤一贯战术。敌人还击时，我们多一半冲进大院。我们牺牲三四人，敌人死了四五个，放走一部分，缴获80多支枪。有十多名俘虏参加了孙永勤队伍。”

3．孤山子战斗。

刘俊岳讲述，讲述时间仍是1983年6月15日，采访者为栾福忠、邢连义先生。

“孤山子据点是我们连队打的，赵邦海领着去的。”

4．罗文峪战斗。

刘俊岳讲述，讲述时间为1983年6月15日，采访者为栾福忠、邢连义先生。

“打罗文峪据点，是四连、五连去的，一共去了四百人。”

5．舍身台战斗。

1961年11月15日，何子桥在河南平顶山市西市场人民公社对到访的王桂荣说：

“孙永勤很有组织能力，很有力气，也很勇敢。听说，一次他们在舍身台被日本军包围，孙永勤说：‘把手枪集合起来，冲出去。’集中了20多支手枪，由他带头冲出去了。”

1989年1月21日，陆奎向佟靖功先生回忆：“孙永勤在舍身台庙里打过好几回仗。据说有一次敌人来了，孙永勤让弟兄们走了，他一个人在大殿南边的晾台上盯着敌人，和敌人打。还听说有一次他们在舍身台打死20多个鬼子，救过烧香的妇女。”

何子桥、陆奎介绍的舍身台战斗情况均听自他人，是否真实发生过，还需调查。这里暂作为孙永勤战斗事迹的传说资料列出，供读者参考。

6．广东山战斗。

2008年7月23日，我到广东山采访，二道岭子村三组李秀花老人（82虚岁）说：

“我19岁（即1945年）嫁到广东山。我们老爷子叫张坤友，本来是孙永勤的二姑爷，还没结婚，孙永勤的姑娘就没了。听老爷子说，孙永勤在广东山、广西山交界地方一个石砬子跟日本人打过仗，把孙永勤手下的撂下不少人。现在坟都冲平了。

“孙永勤来这儿好几回。因为他在这儿驻防，日本人来，把房、粮食烧个精光。当时60多口人，把30多口拿机枪都突突了，在庄后面杀的。张坤枝一家15口人，就剩下3口。”

1934年秋至1935年2月3日（农历腊月三十）间，有关孙永勤部队活动情况的资料流传下来的虽然非常少，但不能因此说整个1934年的下半年他们就几乎没怎么战斗。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他们不但经常在与日伪交战，而且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

1987年3月6日，佟靖功、栾福忠先生到遵化采访，骆凤庭讲了这样一个情况：1934年下半年或1935年初，他派遵化孟家铺区委委员马子敬、李子华支援抗日救国军一些武器。“李子华、马子敬回来汇报，说我们给孙永勤送武器，七八天才追上。那边的形势不太好，经常在战斗。”

康德二年5月22日（1935年5月22日）的《盛京时报》第十二版有一则报道：热河省境匪患，友军剿讨成绩。其开头写道：“热河全境，山险路僻，素为匪贼渊薮。虽经满日军队，一再痛剿，迄未肃绝根株。”

以上两个情况说明，孙永勤等人未曾松懈，其周围环境也不容许他们松懈。

康德元年12月14日（1934年12月14日）的《大同报》第十一版发表了这样一条消息：国军剿匪工作益趋进步，弹指之间匪群溃灭。文中说：

自本年夏季高粱繁茂时期，满日两国军共同开始大剿匪，为期彻底的歼灭计，目下尚在继续征讨。自帝制实施以来，国军意识顿为觉悟之国军，士气大振，得日本军之战友，渐收效果。尤其在近来天气严寒，捣毁匪贼之根据地，匪之衣食绝途，结果陷于自灭之运命，已无抵抗之余力，竟至陆续请求归降之状态。盖不出数月内，全满治安工作或将界划期的进步也。而今观全满匪贼分布状态，匪势比较活泼者，要以第一、第二、第四各军管区为最，因而该军管之国军对于讨伐之工作几不遑宁日。今探索其嗾使系统，大抵有三根源潜在：即系对第一军管区之东边道，有蒋介石政权伸其阴谋；对第二军管区之东边境，有朝鲜革命党之嗾使；北铁东部线及第四军管区内之匪贼，受俄国之煽动自不待言。然此等亦遭日满两军之断行平伐，而匪之无立足余地，盖亦为期不远矣。

这条消息透露了两个情况：①入冬以后，寒冷的天气给全满各地的“匪贼”带来了很大的困难。②直至1934年12月中旬，日伪中枢机构尚未意识到第五军管区即热河的“匪贼”其活动能力丝毫不逊色于有国民政府、朝鲜革命党、苏联背景的其他“匪贼”。五个月后，日伪中枢之所以称孙永勤队伍为“热省治安之癌”，“不许其存于天壤间”，一定要将其彻底“剿灭”，和他们发现这一点后恼羞成怒有很大关系。

关门岭战斗

“头一个年在西梁顶过的，在寿王坟东北。二个年在柳河口过的。”1986年11月17日，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回忆说。至于孙永勤本人是否在柳河口过的年，孙文炳未讲。

1935年2月初至3月初（即农历正月）抗日救国军如何活动的，现有资料中也未留下记载。他们的情况密集地出现于材料中，从1935年春天的关门岭之战开始。

关门岭在今兴隆县蘑菇峪乡政府所在地西南16华里处，孙永勤部据守的阵地在关门岭村外一个名叫“五楼沟”的大山上。

“长城从喜峰口那边过来，到西城峪以后，往西北修了个岔。漆棵岭，四楼沟，到五楼沟梁上就停了，戚继光修的。一架大山一个楼子，从东北往西南，一直数到五楼沟。”有关五楼沟的情况，2008年7月22日，关门岭村书记王成国曾向我作过介绍。据他说，包括五楼沟在内，关门岭一带的长城敌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均已损毁，“现在还有几块大条石，也杂草丛生了。”我曾企图到五楼沟山顶实地看一看，因山坡太陡，在距山顶100米处，被迫无功而返。

关门岭之战发生的时间，在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的调查材料中未见明确记载。经2007年4月、2008年7月我到宽甸、关门岭两次走访，确认发生时间为1935年清明前，约农历二月份（公历1935年3月）。

关门岭战斗之所以发生，据原兴隆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闻成先生调查，和孙永勤在黑河收枪，行踪为伪满当局获悉有关。1985年12月12日，他在《关于孙永勤和忠义救国军的调查材料》中写道：

“孙部没进关前，为了收集黑河川的枪支，率队进驻宽甸村，孙永勤住在李志清家。上板城警察署和骑兵一个团从北部追过来。敌人尖兵到曹台子以北，孙永勤才接到情报，急忙率队往南撤，过关门岭到口里。敌人追到宽甸，在宽甸村南架起一门炮，往关门岭村猛轰。一颗炮弹打中关门岭长城的楼子，塌了下来。赵四川等率部据守四楼沟、五楼沟的长城抵抗，赵受伤。从大小西峪收枪回来的士兵没过河即退回去，过梁绕灰窑峪到澈河川了。这个骑兵团在宽甸住一夜，团长也住在李志清家，因此李志清和他父亲是这场战斗的目击者。”

“孙部回到黑河，西边来兵。”抗日救国军战士张凤林曾部分地目睹关门岭战斗的发生过程，他记忆中的敌军来袭方向与闻成先生了解的不同。1986年11月18日，他对佟靖功先生说，“咱们撤到宽甸，在宽甸正要吃饭，敌人马队来了。咱们的人齐上五楼沟后山，当时有1000多人。炮向五楼沟后山打，我就站（方言，停留之意——编者）在宽甸曹家村那儿了。后山被打着火了，咱们的人从那儿绕到黑河赵大地。”

闻成先生的调查材料和张凤林的回忆中都谈到敌军有炮，2007年、2008年我在宽甸、关门岭调查，当地的老人们却说敌军没有开炮。

宽甸李昆峰老人说：“伪满追孙永勤是春天。那时草还没发芽，应是清明前。不是日本人，是满洲兵。满洲兵穿黄衣裳，跟日本兵差不多，帽子没后边两块布片。我父亲跟哥哥跑了，怕被抓去。临走前在炕沿上挡一炕桌子，让我猫炕根儿底下。伪满从后道上打机枪，朝柏砬子打，孙永勤顺关门岭下去了。满洲兵进来说：‘小孩，别害怕，没事。’得打了十来分钟。没放炮，在关门岭也没放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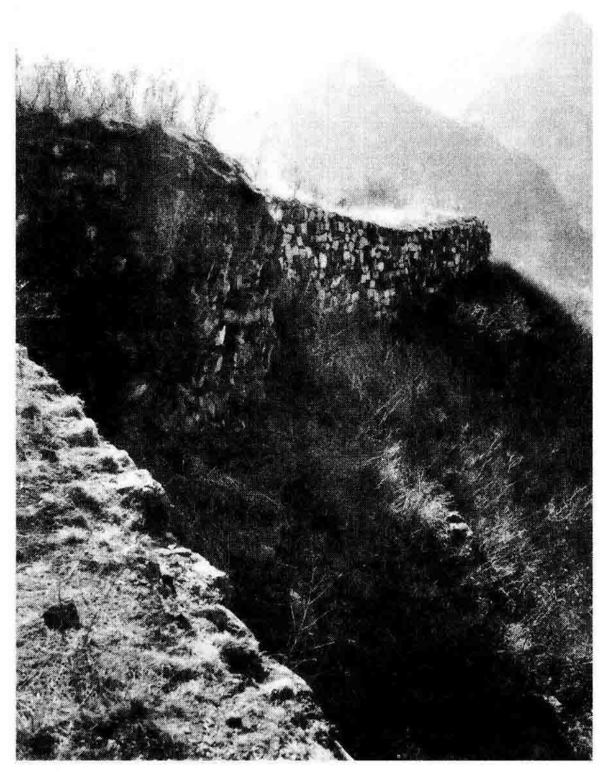


图109　关门岭长城　2009年12月

关门岭王占富老人说：“我那会儿十来岁。当时是春天，差不多到清明了。满洲队从上边下来，孙永勤的兵在宽甸也有，关门岭也有，宽甸那边的就朝下跑。满洲队从二道河进去了，骑马，不是日本人，就是附近的人。先进的二道河南沟，后面又从小西峪进去，上西大高尖。真出力啊，西大高尖那么高，你说得费啥样劲儿啊！后来孙永勤他们跑到这里，关门岭这儿不有一个楼子嘛，孙永勤他们顺五楼沟前山道的白石岔那儿上了五楼沟。他们把五楼沟后山点着，就烟走了。从四楼沟顺水峪那儿走了，王玉良给带的道。打了不大小会儿。那时没炮，没打炮，就打了几枪。一点多钟打的，当时都吃完中午饭了。村里人都跑张郎沟坝台下，山坡上有一棵杏树，在那儿躲着。”

关门岭战斗中，孙永勤队伍有一人牺牲，有的说是孙永勤的义子，有的说是孙永勤的警卫。

王占富老人说是孙永勤警卫，他说：“四楼沟那儿，孙永勤一个跟班的死了。他必是望来的，被打死了。”

李昆峰老人、关门岭村书记王成国说是孙永勤义子。

李昆峰老人说：“孙永勤一个义子有病受不了，孙永勤怕落到敌人手里受罪，亲自枪毙。”

王成国说：“听父亲王占久讲，敌人马队追到五楼沟前山道边，孙永勤他们上了五楼沟后山。他干儿子叫阵：‘杂种操的，你们上哪儿追？’那边就说：‘杂种操的，你敢抬起头？’孙永勤干儿子原来趴着来的，立起来，一枪就给打死了。”

捕获日本人

关门岭之战外，现存文字资料中，还有1935年春抗日救国军捕获了两个日本人、一名中国人（那两个日本人的翻译）的记载。

1986年11月22日，抗日救国军战士史耀华对佟靖功先生说：

“从瀑河又奔澈河赵杖子。这时李连贵在罗文峪口抓住两个鬼子，一个老鬼子，是查边关税、海关税的司令，一个鬼子30多岁，叫小木。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翻译，姓宋，30多岁，奉天人。这几个人就交给我们军法处了。老日本托出人来找孙永勤。在赵杖子说和一次，这是头一次。日本人说，‘孙永勤大军长要啥，我给找。’孙永勤说，‘我不要啥，我要全中国。’老日本说，‘这个我的办不到，要热河的我让。’孙永勤说，‘我要武器，要2500棵三八枪，×××挺重机枪，×××挺轻机枪，还有子弹、炮。’老日本说，‘这个我能办得到，千八百支办得到。’老日本答应给1000支枪，20万发子弹，宋翻译给翻译。孙永勤让老日本给日本军写信，是老百姓给送去的。黑河、澈河的日本军撤了。在赵杖子住一宿，孙永勤带



图110　罗文峪长城敌楼　2006年4月

队伍撤到柳河寿王坟梆子沟，李连贵仍留在撒河。没过几天，枪集中在遵化，几个鬼子奔罗文峪口来了。几个鬼子找不着老日本，哇哇好哭。鬼子发兵往北找，找到寿王坟附近。老鬼子在那儿又给他们写信，鬼子军又撤了。孙永勤带着他们上了老梁。孙永勤这队当时有七八百人，别处还有近千人，总计一千五六百人。咱们七八百人在老梁上住了半个月左右。大高山尖，四外全是黄砬子，里边是大蟠桃坑，那时住十二三户。在老梁上，两个鬼子一直绑着。宋翻译没绑着，跑了。从兴隆、下板城、宽城发来五六百鬼子兵，围了老梁。大概是旧历四月十几、二十几，有人来信说，三面进兵来了。一天，一挑哨，鬼子上来了。三架飞机照着，迫击炮、机关枪向上打，咱们人抱团扎窝子了。孙永勤一看不好，他带20多人打死30多个鬼子，打开一条路，先从东南闯山尖上走了。打了一天，黑夜咱们部队从东南闯了出来。撤到王厂沟，一天没吃饭，刚吃上饭，鬼子就摸上来了。咱们撤到椴树洼梁，小木说走不动，孙文炳把他枪毙了。”

史耀华在上面的谈话中，将抓捕日本人和中国翻译者记忆成李连贵，然而除了李连贵捕获说外，尚有何广永捕获说、年焕兴捕获说、其他人捕获说多种。

何广永捕获说见于何广永之弟何子桥（原名何广森）的回忆录中。1961年11月15日，他对采访者王桂荣说：

“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件很生动的事。住在口外罗明峪（应为‘罗文峪’——编者）的一个日本什么司令，叫田野，一天带两个鬼子骑马出来探消息。何广永也带人去探鬼子消息。两方相遇，鬼子跳下马来就打一梭子。何广永虽有准备，但他的破撸子打不响。就在鬼子压子弹时，何广永跑上去，把鬼子按住，两人打在一起。另外两个鬼子吓坏了，也不敢动手。何带的人从山腰下来活捉了这个司令。此后鬼子托人赎司令，条件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地盘也行。孙永勤提出要武器，不要钱，不要地盘，日本人不给。孙永勤就押着鬼子做人质，毛山被围后才把这鬼子打死了。”

年焕兴捕获说，见于抗日救国军战士常久芳的回忆。1989年1月23日，他对佟靖功先生说，孙永勤上老梁后，李连贵、年焕兴在遵化以北的撒河一带活动。“有80多个人，分拨了，年焕兴领着五六个人。正好三个日本人、一个翻译官来了。在岳王庙南沟口，年焕兴他们几个人把日本人捉住了。我那时还在三道河北沟大洞住呢，爱玩火枪。三道河北沟张连秀和李连贵是一块的，张连秀把我找去参加了，于良也去了，跟着李连贵转。在蓝旗营北沟河西，蛇皮外头，青杏沟北边，我还看了日本人几天。当时孙永勤正挨着包围呢，一个劲儿调李连贵、年焕兴北去支援。我们80多人都去了车河口，在车河口把几个鬼子交给孙永勤了。”

其他人捕获说，分别出自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原兴隆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闻成、承德县柳树底乡常峪沟村民姜以周的回忆。

1983年，孙文炳对兴隆党史办栾福忠先生说：

“我们在清河松挠沟抓到一个日本大胡子，一个日本人叫小木，一个是翻译。当地一个老百姓送信来，报告我们说，松挠沟有两个日本人和一个翻译在活动。我们包围他们时，他们骑着三匹大马。我们先开一枪。敌人开枪的卡了壳，扔掉了手枪。我们趁机扑上去，捉住了敌人。这次我们赏给报信的老百姓100块大洋。捉到的日本翻译说，只要放他们，要啥给啥。我们说，给100支枪、一门炮、两挺机枪，就放回去。当时写信。敌人回信说，给，去遵化拿。先放走翻译，去拿枪，谁知敌人变卦了。我们在遵化洪山口，派三个村子吃饭，200多人带足弹药去拿。敌人把遵化城门用麻袋装沙子屯了，架好机枪，说没有。”

闻成先生1987年4月15日曾向兴隆党史办提交过一份报告，题目为《关于乱石沟活捉日本人及翻译郑宏彬的调查》，文中说：

“1935年春，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一部27人在秋科峪外的乱石沟巧遇敌孤山子海关署的两个日本人、一名翻译，带一匹白马、三支短枪去乱石沟逛山景，发生战斗。在沟门击毙日本人佐佐木，活捉署长徐藤（一说为斋藤，一说是县里署长下去检查到孤山子——或称罗文峪——海关署的）、翻译（中国人郑宏彬，东北人），缴获短枪三支。白马（已死）和鞍屉为秋科峪人所得。

“救国军把这两人带往口里遵化，想从这两人身上弄武器，所以没处理。在吴家沟住一宿时，人们看见过这两个人。上半夜由于看管士兵疏忽，郑宏彬逃出，向遵化敌人报告，次日发生毛山战役。

“郑宏彬回到孤山子海关署，要在秋科峪、甘查峪找财主赵家等诈财，在甘查峪抓走了一个人，后用钱赎回。郑在乱石沟齐家找回了铜马镫。

“上述情节是大厂的齐林、齐云、马祥，秋科峪的王宗泽，孤山子的吴从山、吴从信、田贵珍、徐开士八人提供的。”

姜以周老人（84虚岁）的回忆时间是2008年7月10日。我到常峪沟采访，了解孙永勤在那一代的活动情况，他对我说：

“孙永勤在这儿拉过绺子，从这儿走的，这儿跟着好几个人呢。下边五组李占德、大杖子姜青都跟着走了。冷的时候来的，都穿棉衣裳了。在全宝河抓了一个老的日本人，四五十岁，一个小的日本人，看起来也就十八九岁样子。住李成国家，小的日本人跑了。小日本跑到后山，爬到柏树上，藏猫了。找了一宿，找着了，给抓了，好打。老日本表现挺好，给放了。老小后来都给放了，在别处放的。孙永勤他们就走了，当时带着百十来人来。”

上述五人的回忆中，抓捕者的名字，抓捕时间、地点，被俘对象人数、名字、结局，与史耀华版既有不同之处，也有一致之处，给人以既似同一版本在流传过程中的变种，又似在不同时间、地点分别发生的几件事情的感觉。真相是什么呢？应该说在国内破解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了。期待着将来在与孙永勤部队作战过的关东军部队战史、士兵日记、回忆录中能找到答案。

我个人2008年7月到罗文峪、乱石沟、清河一带调查的结果是：1935年春天，在罗文峪关东北4华里处的今兴隆县孤山子乡大厂村乱石沟门，确实发生过捕获日本人的事件。但像史耀华所说是在抗日救国军去老梁之前发生，还是如孙文炳、闻成所讲在老梁战斗结束后发生，抓捕者是谁，已无人能够说清。宽城清河流域，塌山以下直至贾家安，没有“松挠沟”或“松挠子沟”这样的地名。史耀华所说的孙文炳枪毙小木的地点——椴树洼，如果指的是承德县八家乡庙梁村椴树洼的话，我曾到那里问过一位80虚岁的老人，他未听说孙永勤部队在那里处死过日本人。至于全宝河，我未到达，不知那里是否还有年纪较大的老人了解捕获日本人的情况。

单忠英

目前虽然无法确定抓获日本人是在孙永勤率队上到老梁前还是下了老梁之后，也不清楚抗日救国军究竟俘虏过几次日本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1935年春天孙永勤曾在老梁上驻扎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登上老梁后不久，孙永勤迎来了他抗战一年半中最后一位将领——单忠英的到来。

单忠英会武术，是直到晚年才被他的儿孙们发现的。“那时候老家盖房，瓦瓦的时候，人手不够，房上急等泥用。我父亲看见后，一只手提一桶泥，一只手搭住房檐，一翻身就上去了。这才知道，老头有功夫，原来一直没露。”

单忠英的家在遵化市北关一条狭窄的胡同里。2005年夏，当我颇费了一些周折找到那里时，才知道单忠英已去世多年，后代们都在外地生活。通过为单家看房的一位阿姨的帮助，了解到了单忠英长子单志华的联系方式，等我来到北京天通苑他宽大的画室时，已是一个星期之后了。

单志华身高1米82，2005年时64虚岁，但人长得非常年轻，只像四十几岁的样子。他是到那时为止，我见到的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第二个高级领导人的后代，第一个是孙永勤的孙子孙团营。单志华现在是北方知名的山水画家，同时兼任着国防大学特聘教授职务。他为人爽朗，骨子里充满浓重的忧国忧民意识。通过他的讲述，我不仅对他父亲的经历有了了解，而且对孙永勤、对抗日救国军都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文革’前，我父亲的老战友张守礼经常和我父亲一块谈起当年他们在口外抗日的事情，我开始知道孙永勤将军，知道我父亲过去的一些情况，是在那个时候。更详细的了解是在‘文革’时期。孙永勤将军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文革’期间给视为土匪了。一个抗日的革命队伍的领导人，由于当时‘左’的思潮影响，被打成土匪，跟着他一块干过的人脱不了干系，也得交代历史问题。我父亲在孙永勤将军牺牲后，参加了冀东地下党。他地下工作的直接领导人是张志全，也是孙永勤部队出来的。他要是活着的话，可以为我父亲做证明，但是张志全解放战争时期牺牲了。‘文革’期间，知情的死了，不知情的没法证明，我父亲在牛棚中得把过去的历史一段段写清楚。看了他写的材料，才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了孙永勤将军的情况和他自己前前后后的一些经历。

“我们老头小时候很苦，是要饭到的沈阳，那时候叫奉天。带着他的小弟弟，才十几岁，那时就无家可归了。在沈阳，他碰到了一个卖艺的萧老师，沧州人。他对萧老师很殷勤，萧老师挺喜欢他，就教他形意、轻功这些东西。那是张作霖还活着的时候。后来萧老师进了大帅府





图111　单忠英（左二）　（照片提供：单志华）

卫队，他就把我父亲也带进大帅府，在里面当卫队队员。张作霖被炸死了以后，没两三年，日本人占了奉天。卫队散了，我父亲就到奉天纺纱厂当了一名学徒。后来又到兵工厂，一个日本兵头太坏，我父亲受不了他的欺压，把他打了以后跑了。跑到北票一个税务所给人打杂，没多长时间，北票也让日本人占了。板城修铁路，日本人抓劳工，我父亲那时二十四五岁，就给抓到板城修铁路去了。

"修铁路时，我父亲过去当卫队队员，手头不积攒了几个钱嘛，也没爹也没妈的，他就把钱发给弟兄们，喝酒啥的，打成一片。当时跟我父亲在一块的，一共二十几个人，因为这，都挺服他的，在这些工友们当中挺有威信。说话就到1933年年底了，我父亲他们当时在修滦河大桥。到年底了，日本人应该给这些工人开支，结果让一个日本鬼子把钱全卷跑了。工人白干了好长时间，一分钱没落着，都挺气。那时候在丫头沟小子沟，有一个工友开汽油机时烧伤了，被抬到猪头山北沟养伤。二十多名工人到猪头山北沟去看他。人一集中，日本人就犯忌。去了两个日本鬼子，'什么的干活！'到屋里看了看病号，当时留下了一个，走了一个。我父亲他们说，走的那个可能去叫兵了。他们在一个避风地方烤火，留下的那个日本兵也跟着烤火，听他们的谈话。我父亲一看这事可能要麻烦，当时也没什么政治工作，就拿起洋镐，一镐把那个留下的日本鬼子给刨死了。这不出人命了嘛，一个日本鬼子给打死了，他就说：'兄弟们这么

说吧，你们要留下来，都得让日本人给挑了。要想活命的，不当亡国奴的，跟着我走。’在这之前，有一个姓洪的，是孙永勤将军部下，在铁道线活动。在小酒馆喝酒时，他跟我父亲交上朋友了，透露说他是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让他可能的时候，把工人组织起来，投奔抗日救国军，有这么一个约定。这不把人杀了嘛，大家一想，留下来肯定是死，还是跟老单上山吧。二十多工人把那个日本兵推到山涧下，枪都没拿，就奔老梁去了。”

需要说明的是，单志华上述谈话中，可能有两个地方不准确：一是，打死日本人的时间问题。根据单忠英1983年4月17日对兴隆党史办栾福忠、邢连义先生回忆，他们在到达老梁后不久，就发生了老梁之战。由此判断，打死日本人的时间应是1935年农历三月份，公历4月份。二是动员单忠英参加抗日救国军的朋友，有可能不姓洪。老梁吴连杰老人1988年12月对佟靖功先生回忆：“赵林在老牛河口修铁路时，有伙子人是赵林的朋友。赵林把那几十人也拉了过来。”如果他的记忆无误的话，那么邀请单忠英上老梁的有可能就是赵林。

打死日本人之后的事情，单忠英生前作过回忆。1983年4月，他在接受栾福忠、邢连义先生采访时说：“我们在滦河汊，日本人在下板城，有兵把守。我们踩冰过河，受到孙永勤部队的接应。当时我们两个人把枪拿来了，跟上了我们。孙永勤讲了话：‘不许动老百姓的东西。动老百姓的东西，他们就会反我们，我们没有处呆。’给我们编了队。”

单忠英一伙人被编为抗日救国军第八分队。“当时，民众军（即抗日救国军）已有九个分队，每队人数三五十人、百八十人不等。我参加后，孙永勤又拨七八个人，加原来的二十多人，共三十来人组成一个分队，我任分队长。”单忠英回忆说。

第八分队，也被直接叫做第八队，由于核心成员是年轻的铁路工人，身体好，勇敢，又头脑灵活，自加入抗日救国军序列后，便成为其最有战斗力的队伍之一，日后一直承担着冲锋陷阵、断后和战场谈判等危险和艰巨的任务。

“孙永勤是伙会头，他有个册子，谁家有枪他都知道。20多人发给我们10多支枪，都是大盖、套筒，其他人徒手。”

初到老梁上，孙永勤队伍中的三个方面给单忠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如上面所引，抗日救国军中枪弹武器缺乏。

二是队伍中流行拜把子的风气。1982年12月，他在接受遵化党史办李永春先生采访时回忆说：“对于民众军（即抗日救国军），我能具体回忆的是，在队伍里时兴拜把子。我还记着几个人名：老大叫黎殿安，老四曹万林，张守礼是哥儿十八。还有张福义，排行第几我忘了。我是哥儿十三。”关于拜把子的过程，四个月后，他在接受栾福忠、邢连义先生采访时说：“我们拜把子的事，当时在山坡上，大伙发誓：谁要投降日本人，挨枪子，挨雷击，不得好死。说啥的都有，都是抗日的意思。”

拜把子，本是江湖上或绿林中惯用的手段，抗日救国军原样照搬了这种古老的维系忠诚和感情的方式，反映了它毕竟是一支农民的武装，与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相比，身上具有浓浓的草莽气息。另外一方面，在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所有军队都已撤至《塘沽协定》划定的非战区以南、以西，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还在反“围剿”、尚未抗日的时刻，一批食不果腹、衣不保暖、要枪没枪、要弹没弹、要医疗药品没医疗药品的以山区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仅仅依靠对日本侵略者的朴素的仇恨和古老的兄弟情谊，与气焰正盛的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警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又不能不令人感慨万端。

三是对孙永勤讲话印象深刻。“孙永勤讲话我听了很入耳，”单忠英1983年回忆道，“‘我们民众军不许动老百姓的东西。我们吃老百姓，喝老百姓，老百姓反我们，我们就没处呆，呆不下去。’当时没有共产党八路军那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让我们不许动百姓的东西。孙永勤说：‘谁动老百姓的东西谁犯错误，谁抢东西谁是要开小差。不许奸淫妇女。’……孙永勤常向我们讲：‘中国是国，中国人要装中国人的心，不要装土匪的心、汉奸的心。北京、天津我没有去过，但我听说，穷人吃豆饼，没法活。日本人收枪是让我们空手无权。我家有吃有喝，我不愿把枪交给日本人，就是不想当亡国奴。咱们不怕苦，有活儿咱们帮老百姓干活儿。中国人和中国人一条心，我们一心伙（方言，一心、齐心之意——编者）打日本！’”

单忠英所回忆的孙永勤讲话内容弥足珍贵，它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孙永勤是土匪的说法，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作为燕山深处的一个农民，孙永勤确实具有令人敬佩之处。

“第一个是爱国，第二个是义气、仗义，第三个是有勇有谋。父亲到死也佩服孙永勤。”单志华回忆父亲对孙永勤的评价时说。

生与死

老梁位置在今承德县版图南部，最高峰北砬子海拔1224米，常年云雾缭绕。由于远离乡村和城镇，海拔高，交通不便，那里的植被系统至今保存完好，珍稀物种丰富，是个遗世独立的动植物王国。又由于那里的人民异常淳朴，山上的景色极其独特、壮观，几乎未受到破坏，它还是个令人流连忘返的人间天堂。

20世纪30年代，老梁上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七八十口人。村民有吴、王、杨、许四大姓，分散居住在梁东、梁西、东沟、小南沟四个自然村落中。每个村落相距两华里。

孙永勤之所以把老梁作为抗日救国军的根据地，一个说法是他自己看中了老梁的军事地理价值，一个说法则是他听了赵有、赵林建议的结果。

赵林之子赵廷山在1983年向栾福忠先生回忆：

"孙永勤驻扎在老梁上，准备在那儿建立根据地，而后先袭击下板城警察署。当时认为老梁上山高林密，便于隐蔽，离下板城敌人驻地较远，敌人不易进攻。许多人不同意在那儿建根



图112　每当春季到来之时，老梁上都开满了各种鲜艳的花朵。2007年4月





图113　小南沟　2009年12月

据地，人家少，没有富户，粮食供应困难，交通不便。孙永勤不听。”

吴连杰老人1988年12月向佟靖功先生说，“过了年（此处指1934年春节——编者），回到路通沟，孙永勤问赵林，上哪儿去？赵林问柴先生。赵有的亲姐夫王占德在老梁许家（即小南沟——编者），赵有说，上老梁。孙永勤打发赵有、张福山来老梁看地形。孙永勤说，这地方好是好，就是不能久呆。赵林说，南北上不来，东西一卡没事。他们商量还得在这儿隐遁一下。”

两个说法不管表面上有什么不同，老梁作为抗日救国军的根据地被确定下来，完全是因为它在军事上具有易守难攻的价值。所谓易守难攻，说的是进出老梁只有东西两条路，这一点直至今天都未有改变：东路，由下板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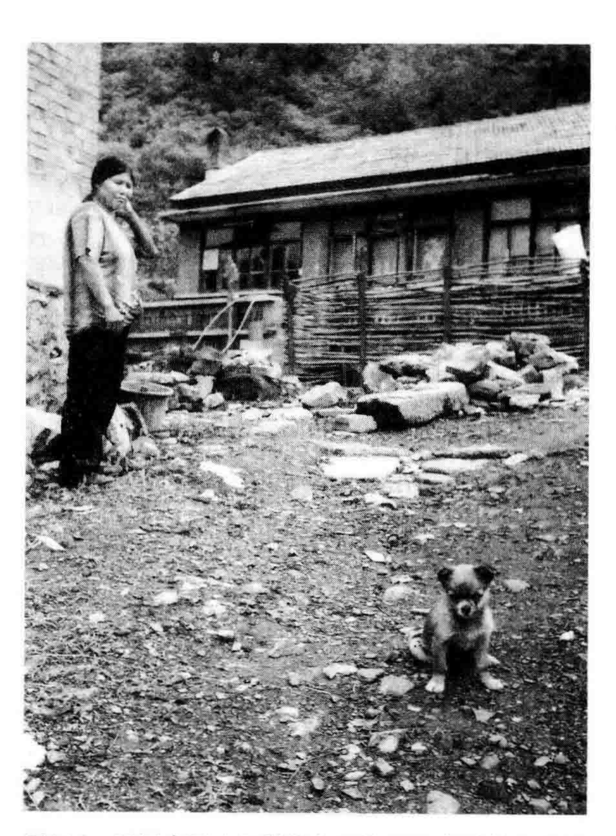


图114　后景房屋（已翻盖）即为1935年春抗日救国军在老梁驻扎时司令部所在地。2008年7月

经小平台村到老梁山顶，全长35华里；西路，由下板城镇经路通沟、北鄘（音quān）、老梁沟门到老梁山顶，全长42华里。孙永勤或赵有、赵林认为，只要能扼守住这两条路，便能收放自如，出可攻击下板城，实现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承德县，继而驱逐出热河省的目标，退又可容易地保存有生力量。

根据吴连杰老人的回忆，抗日救国军是1935年农历三月初七（公历4月9日）上的老梁，“从东边干沟子、棺材沟上来的，在老梁呆了一个来月”。

在老梁驻扎期间，孙永勤把司令部安置在了小南沟王占德家，即赵有的亲姐夫家。

根据赵来之子赵廷江回忆，抗日救国军确实多次发起了对下板城的战斗。

“种地轧磙子的时候，孙永勤打着大旗来承德县一带活动，经常和下板城警察署交战。孙永勤浑身衣服上枪眼像筛子眼那么多，身先士卒，敌人多次讨伐都是有来无回。敌人一次派飞机来，刚落地就被击毁。打承德（应指1933年3月关东军进攻承德——编者）就没有打孙永勤付出的损失大。”

抗日救国军攻打下板城之事在民国报纸上有过报道。《申报》中华民国24年3月26日（1935年3月26日）第三版以“承德义军活跃”为标题，介绍了孙永勤部一次攻打下板城的情况。

北平　喜峰口来人谈，在热河承德活跃之孙卫勤〔孙永勤〕部义军，现已开至平泉下板城地方，高揭青天白日国旗，并击毙日守卫队尉官小野真、吉河口正等十余，名声大振。（二十五日专电）

下板城外，《申报》还刊登过孙部攻打遵化、迁安边境的战况。

《申报》中华民国24年3月31日（1935年3月31日）第九版报道：

天津　二十八早，长城潘家口突窜入土匪二百余，由匪首孙永勤统率，烧掠全镇，火毁民房百余间，并缴去警所枪械，架去巡官赵长顺及肉票十一名，回窜喜峰口。迁安民团、警队往击，二十九日匪众退出口外，沿孩儿岭北窜。赵巡官得间逃回。（三十日专电）

《申报》中华民国24年4月5日（1935年4月5日）第三版报道：

天津　一日王继宗残部与孙永勤股匪由界山口内窥遵化。县长何孝怡率民团数百协保安队王泽民部往剿，激战三时，竟因匪势悍猛退却。匪股二日早攻平小堡，杀伤农民二十余，勒索富户供现款五万。因未措定，遂纵火焚毁全镇，不许扑救。嗣窜小头庄、泉水头、新庄子，遇屋放火，遇人即杀。经保安大队长王占元率部包剿，在新庄子发生激战，匪遂不支遁去。民团、保安队伤亡甚重。小头庄、平小堡以被焚皆成瓦砾，两村民居各三百余户，余屋仅数栋。（四日专电）

天津　二日午后，王继宗、孙永勤等匪股窜抵迁安，县长计慎行率民团应战于新镇。匪绕

道窜破城子、马店子、权家壩、何家营，仍到处纵火，以乱追军。民团在刘家河与匪激战，匪不支，三日晨拂晓，突围窜往长城喜峰口外。破城子马店子等二十三村皆被掠一空，各村房屋火焰迄三日晚犹多未熄。（四日专电）

天津 王继宗残部与喜峰口外匪股孙永勤部会合，集合数百余，窜扰遵化、迁安县，后逃喜峰口外。受日伪军堵阻，有回窜口内势。遵迁两县民团由县长何孝怡、计慎行督率，分防潘家、喜峰各口。迁安县民为匪绑去者六十余名。被害二十三村，县府已派员慰问，并调查灾情。（四日专电）

上述报道中，对孙永勤部的称呼由3月26日的“义军”变为了“股匪”、“匪股”，攻击日伪、向大户压枪压款的行为也被刻意朝滥杀无辜的土匪方向夸张和渲染，当是由于彼时中日之间正酝酿使节升格，各报接到国民政府当局授意的结果，读者应辨别清楚。

《申报》1935年4月5日的报道中，提及的两个人的情况作个简单介绍。

一、王继宗。他即本书前面谈及孙永勤“挂对”之事时提到的王承祖。继宗为名，承祖为字。王承祖于1935年3月中旬因不服改编，被国民政府当局宣布为“非法民团首领”。26日晨，驻玉田战区保安队周毓英部向王承祖民团发起进攻。激战六小时，民团死伤很多。余众部分退往丰润、遵化边境，受到遵化县长何孝怡亲率民团、保安队堵击后，沿遵化、迁安边境向北遁去，按《申报》的说法，在长城沿线与孙永勤部“会合”。至于王承祖本人，他在战败后只身化装逃出。拟经丰润去唐山，途中中四弹，在丰润代庄子被当地团警捕获，押回玉田。经河北省政府核准，4月5日上午，以“聚众构乱，抗拒解散”罪名被枪毙于玉田县城西门外。按照原河北省委财贸部长李一夫的回忆，孙永勤在1935年3月下旬王承祖民团遭受攻击前，曾一起活动。与于学忠（实为周毓英）交战失败后，孙永勤带200多人逃回口外。由王承祖残部在1935年3月底、4月初在长城口与孙部“会合”这一情况来看，他们之前有可能与孙部有过联系。然即使之前没有任何关联，加入孙部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单凭这一点尚不能说孙永勤就一定与王承祖合作过，并活动到玉田一带。我看过的材料和采访过的人中，只有王宝石关元奎老人曾说抗日救国军到过玉田一带。“关元有为什么要参加抗日的队伍呢？他是为了穷人翻身才去的。他参加的队伍打死过不少人，在承德老梁一带，在瀑河口一带，在清河，一直到玉田。”2005年7月我第一次到王宝石采访时，老人对我说。他提到的前几个地名，抗日救国军确曾驻扎和战斗过。既然前几个为真，孙永勤部到过玉田也有可能是真的。此情况是否属实，期待有进一步的发现。

二、何孝怡。遵化县县长，原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何公敢的堂侄。据其堂弟、何公敢之子何方生介绍，何孝怡1902年出生，属虎。“我们的祖籍在福清龙田镇。何家是个大地主。我曾祖父的父亲从福清迁到朱紫房以后，生了三个儿子。何孝怡算大房

那支的后代，我们这支算小的。我们这个家族发得很大，有几百人。我和何孝怡是同辈，都是‘孝’字辈。我本来叫何孝尧，后来改名叫何方生。大房那支下来的三兄弟，一个叫何孝更，一个叫何孝清，何孝怡是老三。何孝怡具体生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按我的估计，他也应该生在朱紫房，因为当时很少有人住到外面去。我们家族里很多人很小就去留学了，到日本。因为同时有两个人考上进士，一个五伯公叫何甘德，还有一个好像叫何建德。他们两个同时考上进士，一个是解元，所以家里生活条件还可以。何孝怡去日本留学时年龄不大。他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商科毕业后到日本留的学，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毕业。他去日本留学和我父亲有关。我父亲14岁就到日本留学去了，何孝怡如果去日本，可以有个照顾。我的一个大哥叫何孝光，我亲哥哥，抗日战争时牺牲了。他在何孝怡后面也留学日本。他们留学以后，对日本都没有什么好感，原因是日本人太看不起中国人。不像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那时候还不行，很不平等的。”

何孝怡留学归国后的情况，何方生未作详细了解。据《记老牌汉奸殷汝耕》作者严家理先生介绍，他先是在上海搞过一段时间翻译工作，后由殷汝耕介绍，到北平担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情报股长，负责发布新闻。由于与黄郛的秘书长发生摩擦，不久便辞职。时殷汝耕已被任命为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殷汝耕便请他到专员公署里做了助理秘书。主任秘书钱履周离职后，令他接任钱的职务。新秘书到位后，外放他到遵化县当了县长。到任时间，《遵化县志》记载为1935年，具体月份不清。根据《申报》1935年4月5日的报道中已出现他的名字情况判断，他至迟于1935年4月5日之前到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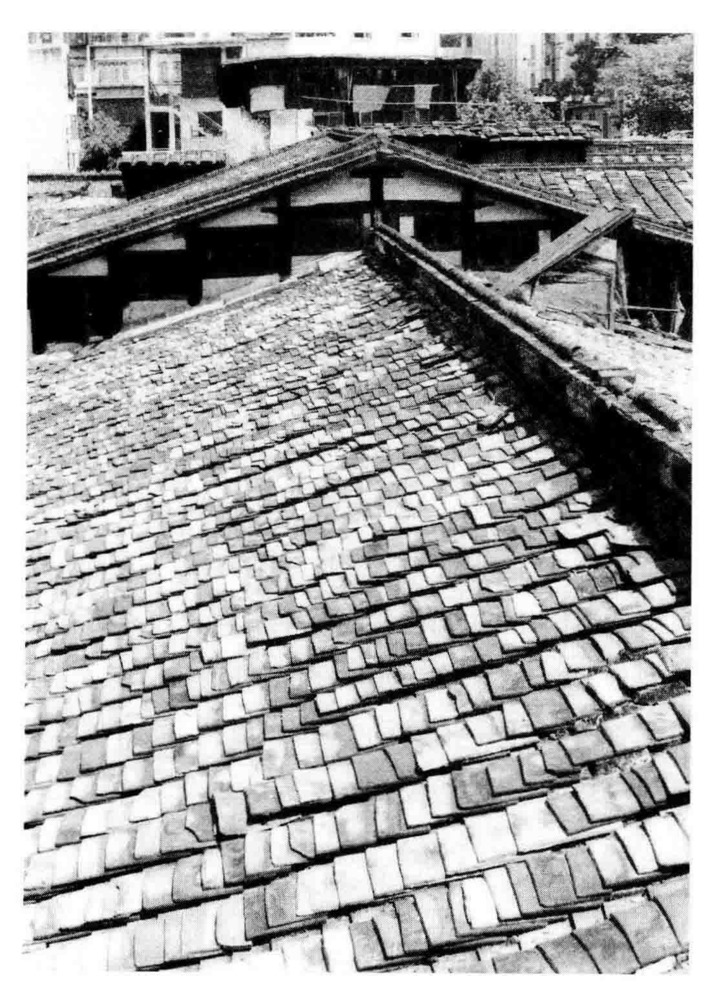


图115　福州朱紫坊何氏家族住宅。2005年8月

何孝怡任遵化县长时期的形象任何材料上都未见描述。何方生比何孝怡年龄小很多，第一次见到何孝怡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已快结束之时。“第一次从重庆回来时见到他，是在他家。他在和小孩子谈天。”何孝怡那时在福建省政府担任陈仪的会计长，何方生记



忆中他的模样为："块头挺大的，比我大得多。个子有一米八二到一米八五，头很大，人长得还比较英俊。他三兄弟里头，大概何孝怡长得最英俊。脸有点白白的，头发由中间打开向两边分，穿的衣服比较笔挺，不像我们，抗日战争时期都是随随便便穿，都破破烂烂的。因为他当时算当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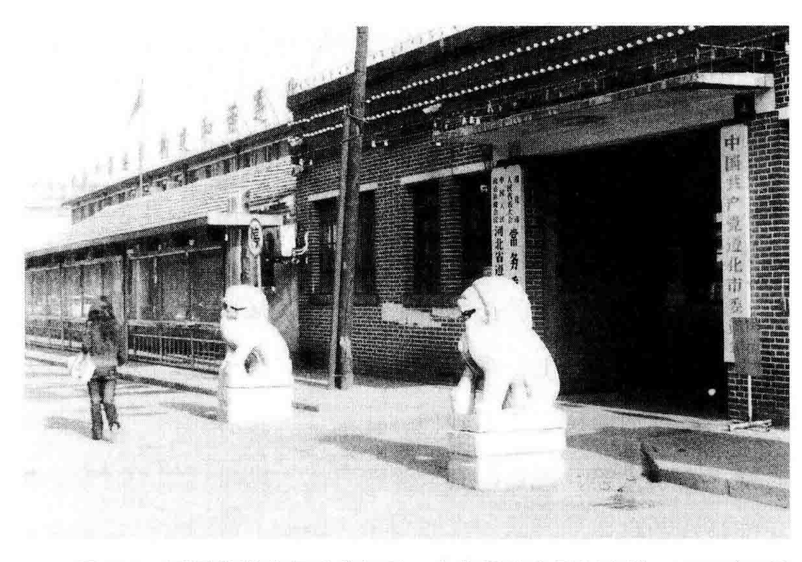


图116　国民党遵化县政府旧址，今为遵化市委所在地。2006年4月

何孝怡在不久后的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被"剿灭"事件中，被日方和中方共同指认为关键人物：关东军和支那驻屯军认为他"援助"抗日救国军；国民政府华北当局答复日军，如查得他暗中接济孙永勤部属实，一定"严办"；孙部大部分幸存者及孙永勤亲属都认为他是抗日救国军之所以覆灭的主要阴谋策划者，一直至他们去世对他都耿耿于怀。有关他在抗日救国军被"剿灭"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真实面目在这里暂且不讨论，叙述到孙部进关一节时再讲。

"我们在车河经常同日本拼刺刀。"除下板城、长城沿线各口外，单忠英回忆，抗日救国军还在其他地方与日伪交战过。根据他晚年向儿子单志华、孙子单健所作介绍，抗日救国军发展到后期之时，已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克制顽敌的技巧和战术。

"小时候，我和弟弟拿着秫秸秆玩打仗，爷爷叼着烟袋坐在旁边看。我问他：'那时候你们怎么打仗的？'爷爷说：'怎么打仗，拼刺刀呗！就是拼刺刀。'我问：'你们怎么拼刺刀？'他说：'跟小日本拼刺刀，你要研究小日本的特点，有你自己的一个法子。你像我们在东北军的时候，那种正规拼刺刀的方法跟日本人是一样的。他冲过来，你用枪的上半部拨他的枪，然后再刺他。但这个跟小日本用，没咒念。日本人冲刺的时候，力量非常足。十几米之外他就发力，跑过来了。越跑越快，直冲着你一条线地就过来了。你想这么拨他刺刀，根本拨不动，直接把你前心后心给穿透了。所以那种正规的拼刺刀的方法用不上。我们那时候研究了一套新的办法，新办法是怎么回事呢？'他给我讲时，从院子里拿起一根秫秸秆。'是这样，日本人过来的时候，是一条线冲你来的，跑得非常快。他的特点是有劲儿，但是他不容易变线。所以你端枪的时候，你这么一端，竖着攥枪，把枪尖朝上，别直冲着他。等他枪过来的时候，你身子往左拧，同时把枪往左搪。你把他枪搪过去以后，他的半个身子就都露在你刺刀

前面了，你再一拧身一捅，肯定把他扎坏了。然后你顺势右腿这么一踹，就可以把刺刀拔出来了。'他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拔刺刀必须要快。捅进去以后，一拧一踹，刺刀自然地拔出来了。如果你要不那么做，刺刀可能就拔不出来。一下拔不出来，第二下想拔的时候，另一把刺刀可能就冲你过来了，你就躲不开了。除了这个办法外，还有一个法子。他直线过来以后，你用手攥住枪尖，让枪托朝上，身体往右拧，拧的同时，用枪托往外搪他的刺刀，往右搪。一搪过去后，他整个脸就对着你的枪托来了。你马上往回拧身，冲着他的脸，往左抡枪托。一枪托砸脸上，肯定把他脸砸扁了。你就甭管他了，这个人肯定丧失战斗力了，身后的弟兄们就把他解决了。不理他，往前冲，接着对付下边来的那个。'他是这么给我讲的，讲的时候，面带微笑，说这两套战法跟日本人贴身近战的时候，很少吃亏。他们得到甜头，所有的兵都是这个打法。'不直接跟日本人硬顶。躲，躲的时候拧身。问题是选的时间必须要准，稍微晚一下，你的肩膀就挨上了。躲得稍微大了，你那枪的劲就跟不上去了。就是一个小拧身，枪同步往外一拨，然后直接捅过去，这才行。'我爷爷跟我讲的时候，那眼珠儿发亮，好像一下子又回到几十年前年轻的时候，正在迎着那日本兵冲上去。就那种状态，那种感觉。平时都是很和蔼的一个老头，挺和善的，但是就那一瞬间，他跟我说的那一瞬间，表情和眼里面的光芒让人感觉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年代，这给我印象特别深。

"还有打阻击，我爷爷跟我讲：'日本兵啊，小鼻子，东洋小鼻子。什么关东军厉害呀，我怎么没看出他们多厉害，我们打仗的时候不吃亏。打阻击的时候，我们在上面，他们在下面。他们是一群一群地往上冲。你别害怕，别被这阵势给吓倒了。他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子弹，有多少子弹。那些日本兵冲锋的时候，你就趴那儿沉住气。你知道你的口袋里就几发子弹，但你要是把那几发子弹利用好了，当当当，照着头上几个给打倒了，只要响一枪倒一个，响一枪倒一个，他们就都受不了了。你要是乱放枪，他们不害怕。但是你放几枪就倒下几个人，他们那个精神上就受不了了，就崩溃了，就得往回跑。叽哩咣当，乱叫乱跑，那乐着呢，看他们跑乐着呢，可乐着呢。鞋跑丢了，钢盔掉了，那背包、手雷什么的到处乱扔，叽哩滚蛋地跑下去。一跑下去，至少俩时辰他不敢上来。'他这么给我讲的，'他们也怕死。'

"小时候，我还特别关心射击。我那时知道枪要打一条线，还要瞄准。我爷爷说：'那么打枪，那你早完了，早吃枪子了。一般就是抬手一枪。枪打一口气，抬手就是一枪。'我那时候觉得爷爷神了，不瞄准就能打，当时还不太信。以后看奥运会，看运动员打飞盘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瞄，就完全是一种感觉，抬手一枪。他说那时候，经常打的是遭遇战。他们在山里面转，日本鬼子也在山里面转，随时随地就突然遭遇了。照面就打枪，先开枪你就占便宜。要是开枪晚了，那你就倒了霉，该吃枪子了。'就是一个速度'，他讲，'开枪得快，而且那时候因为子弹很少，每发子弹必须打中，不打中就别乱打。'还有，那时候我特别关心怎么打冲

锋，我问：‘你们冲锋怎么打呀？’他说：‘日本鬼子有轻机枪、重机枪，都是带梭子的。哒哒哒，打一梭子，就得换另外一个梭子，这中间有两三秒的时间。别的你别管，你先冲上去。听到机关枪响了，就赶紧趴着。等他那儿一停，你一跃身，再往前扑几米，再趴那儿，这时候他机关枪又响起来了。主要是躲他那轻机枪和重机枪。至于其他的枪，你就听着子弹嗖嗖地在耳边响，那你就甭管他了，那就是听天由命了。该着你死，你就得死。’

“爷爷讲，孙永勤部队中，一些人相当有军事素质，拼杀格斗、战术都懂，还做了好多土制设备，攻城拔寨时候用。爷爷那时候给我们讲蜈蚣梯子。什么叫蜈蚣梯子？就是中间一根木头，然后一个十字、一个十字地往上绑木棍，顶上有个小轱辘，还有一个挠钩。人往前冲的时候，咵，一对墙，轱辘咕噜咕噜上去了，叭，钩那儿了，紧跟着人就蹿上去了。这是蜈蚣梯子。攻城拔寨的时候，制造了很多土武器，特别有效的武器。

“那时候，我还问爷爷：‘你是八队队长，你手下有一堆人，那你怎么当领导啊？’他说：‘那怎么当领导啊？’我说：‘你有手枪吗？’我爷爷说：‘原来有手枪。一开始，队长都配小手枪，但那是个摆设。我们打仗，几乎没有子弹，大部分是贴身近战，拼刺刀。你拿个小手枪没用，防不了身，更不能进攻。就孙永勤用一把手枪，是用来整肃纪律的。’爷爷跟我说，‘谁都怕孙永勤的那把小手枪，那是专门整肃纪律的。如果谁要违犯纪律了，在下面打家劫舍，跟土匪一样了，一旦事实确凿，逮着了，孙永勤有时候亲自枪毙。孙永勤纪律整肃特别严。我爷爷那时候过村过庄的，他有时候看着那些个家庭，看着有些女孩、妇女在打水做饭什么的，也羡慕。这是生活，女人、结婚、生子，这是生活。他们行军路过村庄，看到那种景象的时候，都是一咬牙，唉，走了！这辈子，没这命了！一咬牙就过去了。他们要是贪恋生活，当亡国奴，那有机会呀，但是不想。死就死了，抗日嘛，别的不管了。因为手枪防不了身，也不能进攻，以后，当队长的也和队员一样，都用大枪，小手枪都扔了。‘打仗时，我们当官的也都拿大枪，孙永勤都用大枪。’我说：‘怎么领导啊？’爷爷说：‘怎么领导啊，这帮弟兄都看着你呢。你就是一面旗帜，你往前走，他们就跟着你走，你往后撤，他们就跟着你撤。你怎么做，他们就跟着你怎么做，这就是领导。反正大家要死一块死，活的话一块活。都是一帮生死弟兄，谁都帮不了谁，谁又都是相互照应的，就这样。’

“他们那时候的生活就是天天死人。经常看死人，也就不怕了。像我们那时候是小孩，爱玩打仗，爷爷就说：‘打什么仗，不好好活着。’我就说：‘爷爷，你们那时候打仗多好玩儿啊。’爷爷说：‘好玩儿？不像你们现在，想着今天，想着明天，想吃啥好的，喝什么好的，想着娶媳妇，还想着将来出国玩儿，最后可能还想长生不老。我们那时候，每天早晨醒了，一摸脑袋，哎哟！我这脑袋还在呢！感谢老天爷，我又多活了一天！’他说那句话给我的触动特别大。他感到高兴，感谢老天爷，是因为他多活了一天！所以说，那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人生活

理念真是截然不同。那时候就是天天的，用我爷爷的话说就是‘脑袋夹在裤腰带里，你不知道哪天就死了。你甭想它，就打仗。天天死人，弟兄们天天死，日本人天天死。天天看死人，都麻木了，无所谓了。’我爷爷有时候给我看他拼刺刀时留下的伤：‘你看这儿，’他指着肩膀上的疤痕，‘这就是刺刀扎的，腿这个地方也是刺刀扎的。’我说：‘疼不疼啊，爷爷？’他说：‘疼？根本不知道！打仗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从战场上退下来，感觉这儿有点湿了，一抓，有伤口，才知道是受伤了。’那时候在那么一种亢奋状态下，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受的伤，没有那感觉。不像现在小刀拉一个口子，拿针扎一下，吱地疼一下。他们那时候就知道拿着一个上了刺刀的大枪，扎！”

“日本人笨。”单志华说，“打日本人的汽车，老爷子讲，掐头去尾打当中。两头一打，车就不动，塞住了。然后呢，在当中打，一冲就散。他说，日本人也搁不住巧打。打出瘾来，大圈小圈下套，日本人吃他们亏不少。要不孙永勤怎么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那么恨他呢。”

孙永勤队伍的英勇行为令关东军感到难以招架。据抗日救国军战士张守礼介绍，喜峰口据点的日军头目给孙永勤写来了一封信，“说是如果他放弃抗日，便给他枪支、地盘。孙永勤不入敌人的圈套，他回复敌人说：‘别来糊弄老爷，老爷坚决抗日！’”

这是目前所知的日伪对孙永勤的第三次劝降活动。再一次被拒绝后，日军开始大规模调动部队，对抗日救国军进行“围剿”。

单忠英在1983年4月17日对栾福忠、邢连义先生回忆说：“日本人从大东峪方向开来四五辆汽车，堵住我们的去路，打伤我们十几个人。小青年给我们送水，中了埋伏。枪声嘟嘟，子弹像雨点。敌人换子弹时我们跑一阵，才摆脱敌人。”

“扛着炸药箱子，看见洞就以为里面有孙永勤的人，炸。见到房子就烧。”2007年4月，我到路通沟任家庄采访，任富老人说。

本来就困难的抗日救国军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化。“没有粮食”，单忠英回忆，“经常吃不上饭。”枪弹无法得到补充，单志华说孙永勤企图用俘虏交换武器，但未成功。“我父亲说，孙永勤让他作为代表出面，与日本人谈判。八队一部分人掩护着他，具体什么地方记不清了。一个大雪天，孙永勤的人站一边，日军站一边。那边日本的大官挎着刀朝这边走，他们向那边走，在当中会面。结果谈崩了，他要了他们机枪多少挺，步枪多少支，还要小钢炮，还要多少弹药、粮食。可能是在机枪、小钢炮问题上谈崩了，没弄成，但是没伤亡，都撤了。我父亲说，看两边，当时实力都挺厉害。那边保护日本军官的火力挺强，这边保护他们的也是把最好的武器都拿上去了。没谈成，日本人不能接受。”粮食、枪弹外，药品也非常奇缺。单志华问过他父亲，负伤后怎么治疗？单忠英回答：“啥治啥治，烂死拉倒。下了火线，一看流血了，这才知道负伤了。要么把刺刀烤红了，烫，要么就是火炭烧。有盐的时候，就捏点盐撒伤

口上，不长蛆。那时候没药，极缺。”

由于作战条件、作战环境恶劣，战斗减员开始增加。“昨天还在一块喝酒呢，热闹呢，第二天就死了，尸体都抬不回来。伤心哪，伤不过来啦。没准明天排上他，后天就排上我了，谁说得准呢？”单志华援引他父亲的话说。

部队粮食、枪弹、医药无法补给，迫使孙永勤不得不想办法。为了解决购买军需的资金问题，他率队第二次来到了彭杖子。

有关孙永勤第二次攻打岳家大院的情况，上世纪的调查材料中，只有吴连杰老人说过一段话：“孙部又去打老岳家。岳珠环领着家上天津了，孙永勤他们把岳老亮的棺材搁在许家（即老梁小南沟——编者）烟筒沟窑里了。”此外，再无记载。

彭杖子徐文林老人当年恰好目睹了孙永勤二打岳家大院的过程，为我们填补了在这件事上的缺憾。

“第二次没用打。”徐文林老人记忆孙永勤来彭杖子的时间是1935年农历二月（公历3月5日至4月2日）前后，与吴连杰说孙永勤农历三月初七上老梁有所出入。“暖和了，我正在岳家树行子放羊呢，孙永勤马队过来了。不是都骑马，就几个人骑着。黑天进的庄。孙永勤骑在大马上，掐着枪，前面骑马的全都端着枪，怕有奸细。把我吓得够呛，赶紧把羊往沙坨子后头赶。第二次来时，老岳家已经搬口里了，他媳妇是口里关家庄的。大院就剩下管院子的，叫张仝舟。张仝舟把四门大敞，接进去。孙永勤部队到了里面，把天津字票子从墙里都给扔出来了。‘小孩，拿去玩去！’我们捡了好多。老岳家没带走的东西，都让孙永勤用船带走了，其他东西全给砸了。”

第二次进驻彭杖子，孙永勤住在徐文林亲叔伯兄弟徐文岐家。“孙永勤挺胖的，挺大个，脸上有点麻子似的，抽大烟。我大娘也抽大烟，给他打大烟抽。呆了三四天。孙永勤一上火，就要刮搭，说，‘谁会刮呀？’我妈会拾掇火，一般都找她。让我妈刮。孙永勤躺着，那么高，我妈不敢刮。孙永勤说：‘刮吧，不怕疼。’刮得血葫芦似的。”

据徐文林老人介绍，孙永勤第二次到彭杖子时，岳老亮尸首还没坏，停在院外的花园里。花园里有花，也有菜，盖了一间小房，墙上画满了画，岳老亮尸首就丘在小房中。孙永勤队伍进了小房后，把一块玉器从岳老亮嘴里抠出，之后把他的尸首抬出来，用席卷了，抬到了15华里外的老梁山上。为什么要把岳老亮的尸首抬到老梁上呢？“为了跟老岳家要钱。”徐文林老人说。

岳老亮尸体在老梁上的停放处是小南沟王占德家的炭窑。“山是他们家的山，”2008年7月9日，我到小南沟采访，许振岭老人说，“炭窑里可以躺三四个人。一窑能出六七百斤炭，拿柞树烧炭，苦柳、色木、牛筋子也能做炭。”



图117　左为老梁许振岭老人，右为许振刚老人。2009年12月8日，由许振刚老人带路，我终于找到抗日救国军搭木头突围处



图118　王占德家炭窑旧址：山坡上的松树附近。2009年12月

许振岭老人说，岳老亮尸体抬来后，他母亲曾从岳老亮大衣裳上撕下一条缘子。“在张老五背走之前拿的。”

张老五据说是暖儿河人，孙永勤队伍从老梁撤走后，是他把岳老亮的尸体又背回了彭杖子。也有说法，是岳老亮自己家的人把岳老亮抬回去的。“一个人背不动。”老梁王树森老人说，“绺子走后，自己家人把尸首抬到八道石湖。石湖有两丈多高，把尸首搁下去，从旁边绕下，再弄走。”

“老岳抬回来后，都臭了。用四五六寸（指棺材底、帮、盖的厚度）大棺材埋了，发引排七天。‘文化大革命’时，当地红卫兵把坟给刨了。地主嘛，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啥也没有，只有棺材底下铺的一点洋钱。”徐文林老人说。



老梁之战

按照老梁许振岭老人的说法，孙永勤原准备以老梁为根据地，坚持三年。然而他的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未能实现，只在老梁驻扎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便被迫从那里撤出。

导致孙永勤撤出的原因是日军偷袭并轰炸了老梁。抗日救国军为避免被困死的命运，只好撤走。

日军是如何发现孙永勤行踪的呢?

一种说法是，如史耀华之前所讲，抗日救国军上老梁前捕获到了两个日本人、一名中国翻译。中国翻译承诺为抗日救国军解决武器弹药问题，孙永勤正为此事一直无法解决而苦恼，于是放走了他。未想到翻译下山就向日军报告，并为日军带路，进攻老梁。除史耀华外，抗日救国军战士赵廷山、第八队长单忠英也持这种看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孙永勤放走的不是中国翻译，而是一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向日军报告了抗日救国军的实际情况。2008年7月7日，我到承德县八家乡庙梁村黄花甸子采访，谢福成老人说："听石卫山讲，他跟孙永勤干过几天。孙永勤的人在老梁沟门下卡子，抓住一个小日本，带到老梁上去了。孙永勤一看，挺喜欢他，就让他在那儿呆着。后来小日本认了孙永勤干爹，啥事就不背着他了，结果里面消息都让他掏去了。黑夜他跑了，跑到日本人那儿，说：'孙永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武器，就是炮仗搁洋桶里。'日本人听了，就不怕孙永勤了，开始打他。"

日军攻打老梁的日期，据承德县下板城镇李秀兰老人回忆，是农历三月二十九，公历为1935年5月1日。

"我1935年阴历二月十九出生，一个月零十天，日本来飞机轰炸，老百姓都跑三节洞里去了。几十口人在洞里，大人吃不上饭，孩子没奶水。我爸爸让我妈把我堵死，怕我哭，说：'孩子哭，一洞人吃亏。'母亲李孔氏说：'我跟俩儿子和闺女死一块儿。"抱着我出了洞，到山尖树墩子上坐着。我妈后来没得着我济，我12岁时，她39岁，从娘家回老梁生小孩，没大夫，失血过多死了。"2008年7月12日，李秀兰老人说。

老梁战斗打响的具体时间，有的说是早上5点钟，有的说是6点钟。抗日救国军的人数有二百、四百、五六百、七八百几种说法，日军除了二百、五百说外，尚有一种六百说。

战斗爆发的经过，老梁吴连杰老人描述为：

"这时（指孙永勤在老梁上驻扎时——编者）孙永勤有一个卫队、一个部队、一个稽查队。一天，老柴说这地方不能呆了，得走了。赵林说没事，孙永勤说小心没坏处。孙永勤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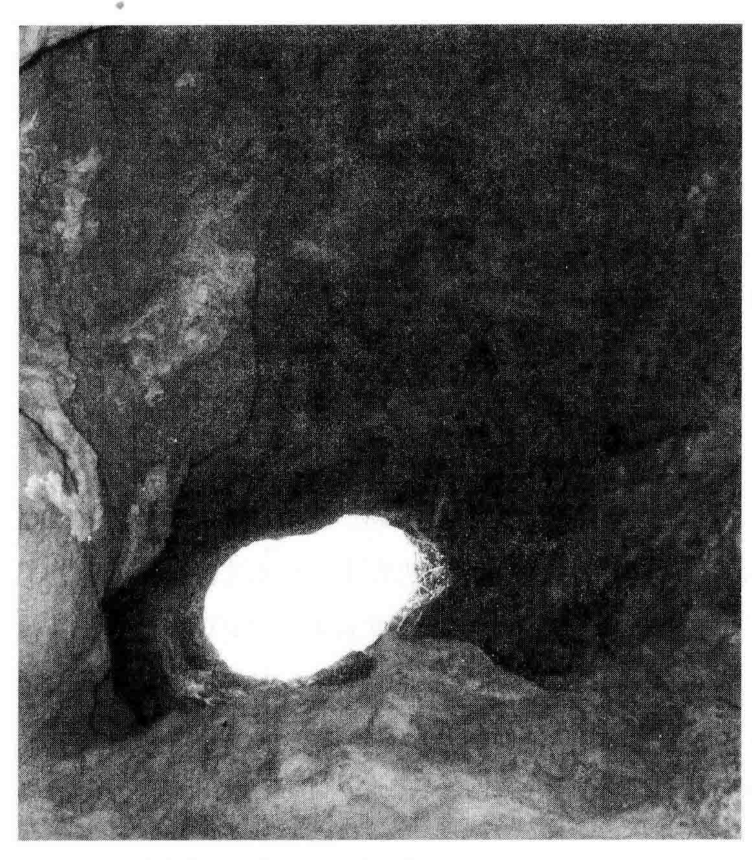

图119　小南沟大洞天窗。2007年4月


图120　老梁王贺林主任（现书记）为我介绍大洞情况 。2007年4月

着卫队到暖儿河二道河子，找财主老孟家，遇到日军，退回来。日军又从棺材沟进来，孙永勤带队在松树梁抗击，地点在李家后堵，棺材沟上垴，把日本军打抱团了。”

“傍亮天时，咱们站岗的抽大烟去了，漏岗。”抗日救国军战士赵廷山介绍战斗发生当天的情况时说，“16个日本兵从小后福、老梁东那条路摸上来，那条小道只能走一个人。连摸了两道卡子，占了战壕。蒙蒙亮开火，咱们的人都跑到南山。”

“小日本拱上来了，孙永勤的兵打枪不准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没挡住。当时的日本兵就跟现在电视里演的一样，帽子是三褡子，扛着机枪。打到半山腰，再上了梁，就没治了。眼看日本兵要过梁，孙永勤带人上来，一枪一个，打死30多个，给打回去了。”赵家庄赵廷良老人当年2岁（虚岁），正在老梁住姥姥家。战斗打响后，母亲用胳膊夹着他，和娘家人一块躲到了山洞中。长大后，他到老梁走亲戚，有当地的老人们向他讲述了日军攻打老梁时的情形。

日本人被打死之处，原名关家沟，早先沟里住着姓关的人家。关家沟后来被改叫成了棺材沟，原因是那条沟的形状与棺材有些相像。2005年夏我第一次到老梁采访时，赵廷良老人曾带

我去过当年日军死亡的地点：老梁东面半山腰处一个地方。山路从老梁山根盘旋而上，从棺材沟口处经过，继续绕山而上，日军当年的毙命之所正是棺材沟口与上老梁的山路丁字交汇之处。

“孙永勤为什么把大柜选在南老梁呢？它是个严密的地方。不仅小日本子，谁上来他都得走这条道，不走这条道过不去。小日本就给打死在这儿了，老百姓说小日本犯地名了，死在了棺材沟。”赵廷良说。

被阻截在狭窄山路上的日军由于无法前进，便用无线电联络了飞机来轰炸抗日救国军。老梁的王树森老人那年4岁（虚岁），2007年4月向我讲述说：“日本军官打去电话，几分钟就来了三架飞机，贴豁子半腰来的，没走砬尖。过了砬子那个豁子，炸弹就扔，把我们这老百姓都吓跑了，吓山洞里了。呵，就我们这大柳树、杨树得炸坏多少啊！有一棵大柳树给一炸两截，后来我们想用这棵树拉锯板，把锯齿都崩了。把锯卸下来，一看树里边一块大炸弹皮，那还拉得动？后来又长严了。”

日军飞机的出现，在抗日救国军中引起一阵慌乱。这一局面直到孙永勤发现情况危急，命令大家就地寻找有利地形隐蔽才得到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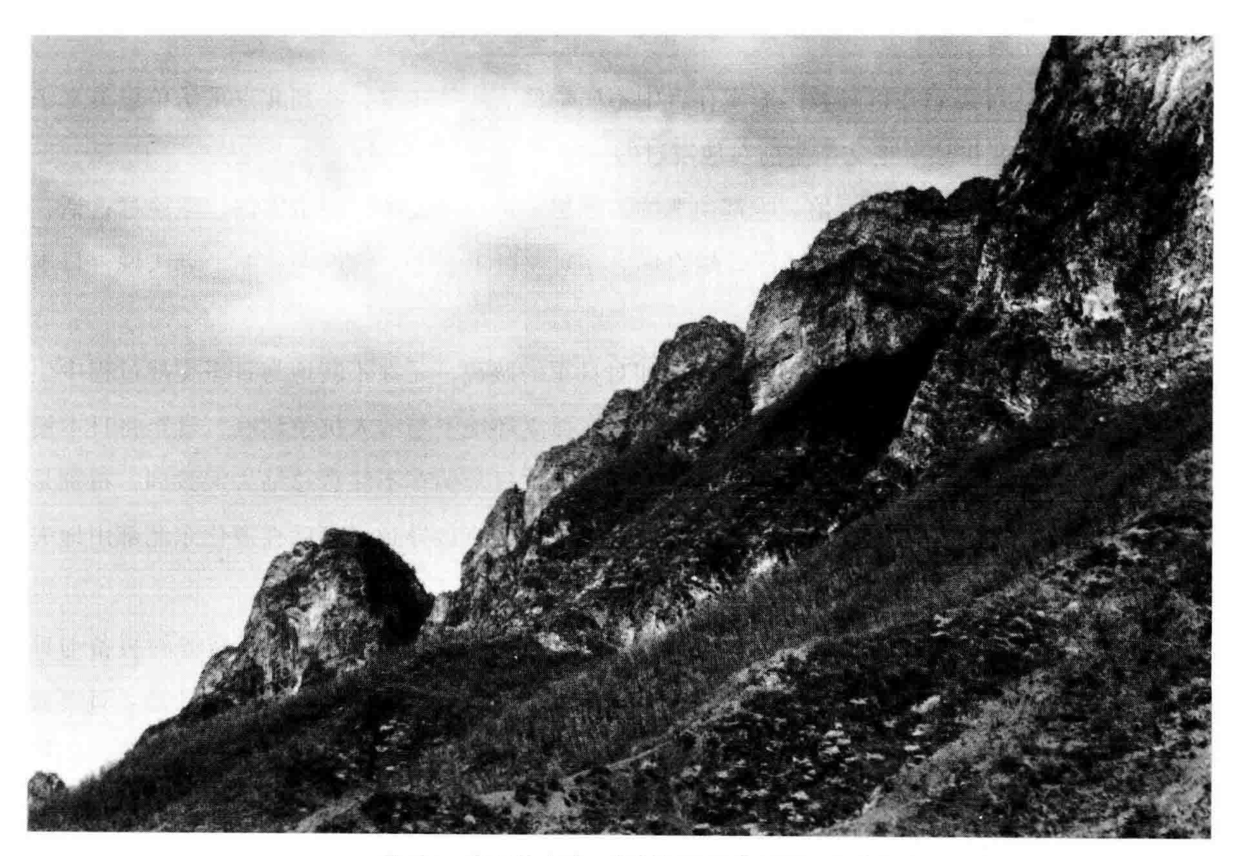


图121　老梁北大砬，左侧豁口即为日军飞机轰炸老梁时穿过之处。2007年4月

抗日救国军战士赵廷山在1983年回忆说："敌人守住了下山的要道——小后府那条路，派飞机盘旋五次轰炸。我们隐蔽在密林里、山崖下，敌人炸不着。只是在打飞机时，一个弟兄暴露隐蔽目标，被炸死。"

日军飞机的数量和抗日救国军被炸死的人数说法不一。吴连杰老人回忆，老梁之战中日军共出动六架飞机，抗日救国军有十余名战士被炸死。轰炸过程中，"刘殿荣枪法好，看到一个日军用旗指挥日军，他用老筒枪一枪把那个日军打死"。

轰炸过后，日军向老梁山顶发动进攻。"敌人用炮轰我们，烟雾腾腾。"孙文炳回忆道，"老梁只有两条路，两条路堵了就不中了，没有粮草。老百姓让孙永勤撤，他不撤。"

"孙永勤奋勇还击，"赵廷山回忆说，"敌人也没有子弹了，被孙永勤击退。"

老梁战斗自黎明开始直至后来日军子弹耗尽，敌我双方共在老梁山顶周旋、交火一整天的时间。一天中，双方各有死伤。日军的死亡人数，据史耀华回忆是50多人，刘俊岳回忆为100多人。抗日救国军的死亡人数，史耀华在回忆录中未提到，刘俊岳则回忆抗日救国军共被日军打死30多人，少于日军。

"日本军作战厉害，厉害也不中！老梁一仗，就打死50多个鬼子！"2005年1月，史耀华躺在他家的炕头上颇为兴奋地对我说道，言语中既有作为抗日救国军一员的强烈自豪感，又有对日军的十分不屑一顾。

史耀华的这种思想在抗日救国军幸存者中不属个例。2005年夏，我到北京采访单忠英之子单志华时，他向我讲述了他父亲生前对他说过的一些话。

"我父亲说，日本人不可怕。啥都怕恶的，他恶，你比他还恶，他也害怕。他说过这话，日本人像狗似的，你越跑，它越汪汪，越追你。你真要盯上它了，它就向后缩。老头说，日本人跟狗似的，柴狗。"

抗日救国军集体性的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和对日军的蔑视，是在不断地与日军交战过程中生发出来的。这种自信和蔑视的好处是支撑了他们在孤立环境下与敌人抗争到底，直至将日本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国土的决心和信心。但过度自信也令抗日救国军不注意总结失误教训，特别是关注新的战场变化，满足于靠经验、靠勇气与日军打仗，直接导致了日后在遵化东北部山地失败的结局。

老梁战斗再次反映出抗日救国军的长处首先是勇气可嘉，敢于凭借极其劣势的装备与日军对抗；其次是特别熟悉地理，善于利用地利进行反击，以折冲武器装备方面的缺憾。日军通过老梁战斗，特别是之后抗日救国军由滦河东岸向西岸的百里突围行动，对孙永勤部队"山耗子"的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一点后面再介绍，这里暂不多讲。

"刘俊岳同志认为，孙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不应全部集中于黑河川老梁山地区，那次损失



是很大的。”1961年8月9日，许家保在访问抗日救国军战士刘俊岳后在采访记录中记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文中“黑河川”我认为是“滦河川”的误写，因为刘俊岳显然是指老梁山那一场战斗。老梁山在滦河东岸七八华里处，黑河在滦河西岸40余华里外，两者隔滦河相望，风马牛不相及。

刘俊岳关于老梁战斗的评论并不十分准确：抗日救国军并没有全部集中于老梁山上。根据之前引述的回忆材料，抗日救国军当时在老梁最多不过七八百人，像张福义、李连贵等仍活动于孙永勤最初为他们划定的活动区域内，但是抗日救国军的军指挥机关确实设在老梁上。这与孙永勤要在老梁建立根据地的指导思想有关。

将一支队伍的首脑机关移置到一座高山上，在冷兵器时代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孙永勤所熟悉的古代英雄们，特别是“水浒”英雄们，包括与他同时代的一些绿林人物、他围剿过的一些土匪全部都选择在高山上安营扎寨，主要看中的是高山易守难攻、可进可退的优点。但这种传统的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攻防观念和方法，在近代战争的重武器、特别是空地立体攻击面前，其长处却尽数变成了短处。抗日救国军在老梁山上的牺牲者大部分死于日军飞机轰炸、火炮攻击，包括传言的毒气弹的投掷使用中。老梁之战展示了抗日救国军的强项，也暴露了他们的弱点：火力不足，缺乏重武器特别是对空武器，战争思维尚停留于冷兵器时代。如果不是熟悉地理、善于利用地形，仅凭勇敢，抗日救国军是很难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取胜的。

老梁之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抗日救国军最后的毛山之战的预演。日军由于认真研究了抗日救国军的长处与弱点，此后成功地将对手赶进了绝地，抗日救国军却由于未能深刻地总结教训，加之环境所迫，终至覆灭，令人慨叹！

在燕山腹地的长征

老梁之战进行至当日黄昏时，日军与抗日救国军陷入了僵持状态：日军弹药用尽，无力发动新一轮攻击，但也并不想就此收手，而是牢牢守住了下山的两条通道。抗日救国军虽顽强抵挡住了日军一天的进攻，但要将之彻底赶出老梁难度也很大。此外，他们本来不多的子弹也即将消耗殆尽。

困难的抉择摆在孙永勤等领导人面前：继续和日军周旋下去，势必将几百名抗日救国军将士的性命白白葬送于老梁山顶——日军的思路大家都很清楚，他们算定抗日救国军无法获得弹药补给，因此只要固守住下山之路，不让他们逃遁，抗日救国军就是瓮中之鳖、网中之鱼。只要日军的补给或增援部队上来，仅凭弹药一项，就可把抗日救国军消耗死。然而要想冲出去，日军又扼住了下山的要道。与之硬拼，日军的子弹虽已打完，但其拼刺刀的能力毕竟还是不能小觑的。虽说抗日救国军已总结出了克制日军的白刃战战法，但在天色渐黑的情况下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即便能够侥幸消灭占据要津的日军，由于消息断绝，焉知不会与迎面而来的日军增援部队狭路相逢？

"我父亲死的时候，身上大概有七处伤。有枪伤，有刺刀伤，以刺刀伤居多。"2005年夏，单忠英之子单志华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据我父亲活着的时候讲，他们那时候经常和日本人拼刺刀。我父亲那时年轻，体力好，功夫也好，日本人也能看得出来，打仗的时候，常常是四个日本人围攻我父亲一个。我父亲每回拼刺刀到最后，都是仗着会轻功，拿枪把子朝地下一杵，人飞起来，跳出圈，才得以活命。要是没有功夫，早完了。"

连单忠英那样的有武术功底的人在遇到敌人数量较多时，尚不能保证全身而退，普通士兵可想而知。

一是固守老梁，静待日军弹药补给或增援部队上来，被动地让日本人屠戮；二是打破围困，挣脱枷锁，如鸟儿重回天空，鱼儿重归大海，努力冲出去。抗日救国军选择了后者。

"舍死能敌万人。"1983年6月，刘俊岳对栾福忠、邢连义先生说，"怎么也是死，但是不能等死，不能随便善罢甘休。"

当日深夜，几百名抗日救国军战士悄悄从阵地撤出，利用夜幕的掩护朝小南沟南面的一条山沟开拔而去。那里有条很少人知道的小路，小路的艰难之处在于有座几丈高的山崖难以逾越，没有猎人那样的过硬身手和坚强胆魄很难通过，但只要能越过这道山崖，便能缘向南延伸而去的山谷到达山外。



“被围之后，在石崖上搭一根木头桥，挤过去的。山崖有十米高，一个一个地过去。”1983年，孙文炳向栾福忠先生讲述老梁突围过程时说。

他讲到的需要搭木头桥的那座山崖，我三次去老梁都未能到达它实际所在之处。2009年12月8日，我第四次到老梁，在王贺林书记的帮助下，由熟悉地理情况的许振刚老人带路，从小南沟出发，沿一条满是荒草和枯枝的山沟，曲折前行近一个小时，终于来到它的准确位置，老梁当地叫做大旱石湖的地方。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石豁口，豁口下方是大大小小破碎的石块，当年抗日救国军搭木头爬下的山崖已经不复存在。“1974、1975年，承德县南甲山林场修运木材的路，把大旱石湖给崩了。”许振刚老人说。据他讲，大旱石湖北距小南沟5华里，“原来上面是平的，水大时有水。底下深着呢，得有15米深，人下不去。要下去怎么办？旁边原来有三棵柏树，把木头搭在柏树根上，脚踩着木头，人贴着砬子，扒着石头从旁边下去。”

下了大旱石湖山崖后，前面虽还有好几华里山路，但已比较容易。抗日救国军战士一路疾走，成功地于天亮前后走出了老梁。将近50年后，刘俊岳回忆道：“革命不是请客送礼，我们豁出命冲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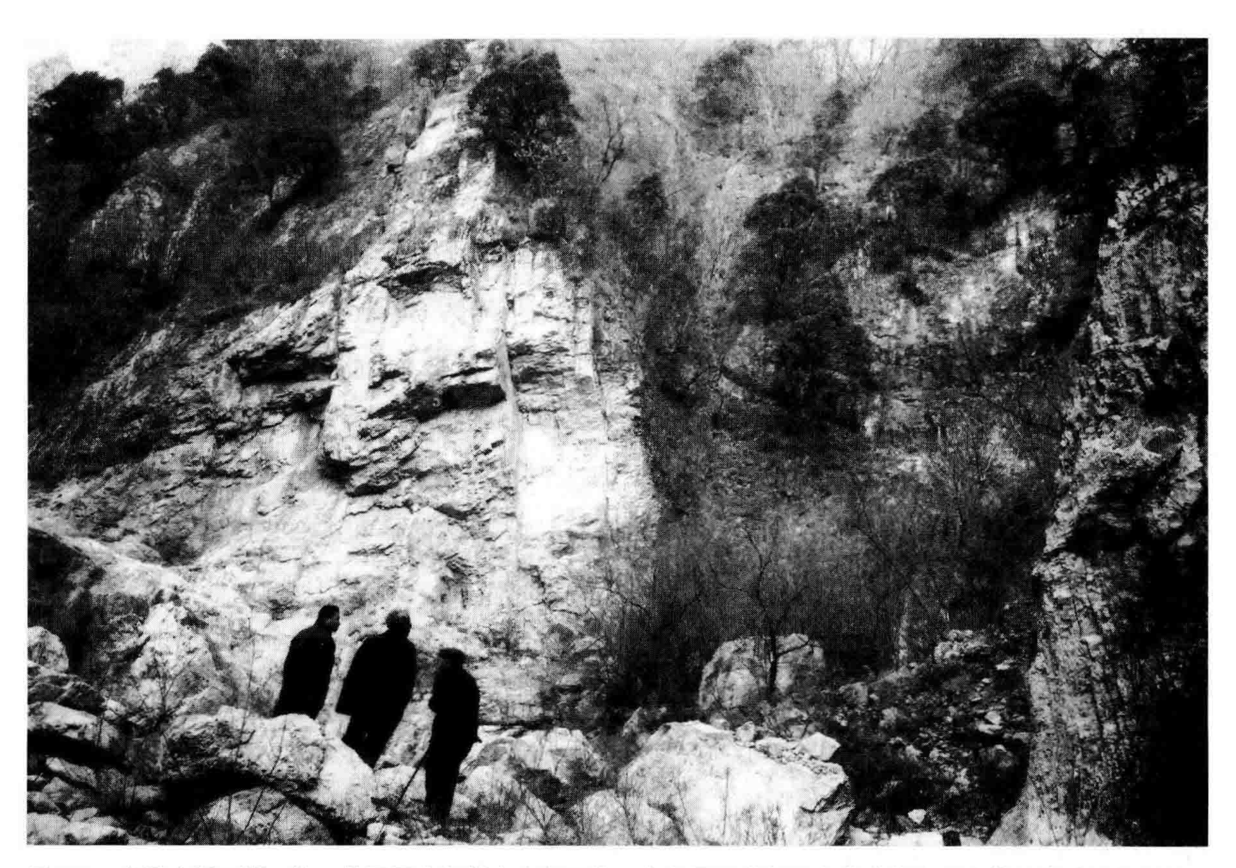


图122　老梁大旱石湖，抗日救国军当年搭木头突围处。山岩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甲山林场修路时炸开的。抗日救国军1935年春是从右侧松树位置脚踩木头、手扒崖壁下的山。2009年12月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孙永勤在老梁山上被围和突围的情况，正如之前关于他的很多事情一样，也存在着另外一个版本。1983年，史耀华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在回忆了日军上面用飞机轰炸，下面用机枪和迫击炮向上打，很多抗日救国军战士因为以前没有经历过如此的阵势，开始慌乱地挤成一团后，说："孙永勤一看不好，他带20多人先从东南闯山尖上走了。打死30多个鬼子，打开一条路。打了一天，黑夜咱们部队从东南闯出来，撤到王厂沟。"

"孙永勤走的那条路叫空山沟，离小南沟四里。"许振刚老人也持孙永勤先走的看法。从大旱石湖回小南沟的路上，他指给我看山沟左侧一条大约两米左右的孔道，说孙永勤就是从那里出去的。

在部下和日军激战的时刻，孙永勤率一部分人先走，只有两种可能：其一，孙永勤没有有效地应对突然发生的情况的措施。一旦遭遇意外，战士各自为战，各自逃生。其二，孙永勤作了安排，但今天已无人知晓。真相为哪个，有待新的材料发现。

"一天没吃饭，刚吃上饭，鬼子就摸上来了。"史耀华在回忆抗日救国军从老梁撤出，到达王厂沟之后的情形时说，"咱们撤到椴树洼梁，小木说走不动，孙文炳把他枪毙了。椴树洼打一仗，咱们死了几个人。之后奔平顶山，想从那里奔河口，老乡说那儿有几百鬼子，我们于是转而奔了王宝石。"

史耀华的这段话中，有两个地方与其他抗日救国军战士的回忆相左：

一是"小木被枪毙"一句。孙文炳本人的回忆是在毛山战斗中才将小木与税关署长一同枪毙的，不仅地点与史耀华所说的相差一百几十华里，时间上更相差近一个月，如果李秀兰关于老梁之战发生时间的记忆无误的话。那么谁的回忆准确呢？我认为孙文炳所讲是真实的。据遵化吴家沟吴宗耀老人在1987年9月5日向兴隆政协闻成先生回忆，1935年5月25日，即毛山之战次日，翻译官曾到吴家沟村雇了八个壮年，到毛山顶上去挖两个日本人的尸体。挖出后，四个人抬一个，送到东小厂，装上汽车运走。此事印证了孙文炳在毛山顶上将两个日本俘虏枪毙的说法。

二是离开平顶山之后的遭遇。史耀华说抗日救国军直接去了王宝石，赵林之子赵廷山则回忆："返回黄花川沟门，前面突击出去的部队渡河摆渡，被日本军和满洲队打死三船之多，每条船上20多人。"黄花川沟门即河口，位置在今兴隆县蘑菇峪乡门子哨村西南部，那里是滦河水系三级支流黄花川与滦河主河道的汇流处。在本书的开始章节，我曾提到解放前那里曾是繁忙的水陆码头，赵廷山所说的抗日救国军渡河的船只应该就来自那里。

一个说法是到了河口，一个说没到，同一场突围行动，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描述，究竟何故？

我个人的看法是，抗日救国军从老梁出来后至少是分成了前后两路队伍行进的，赵廷山属于前路，史耀华则在后路无疑。由于所在队伍不同，以致出现了对平顶山之后事情的不同回忆。根据史耀华所讲，他所在的队伍也是要去河口的，只是因为老百姓的报告，才没有重蹈前



图123 河口，抗日救国军遭遇伏击处。2008年7月

路队伍的覆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孙永勤的最初设想大概是像以往历次作战一样，在滦河东岸受到日军追击，便迅速转移至滦河西岸的广大山区，利用地理熟悉、民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与日伪周旋。但很显然，他这次的行动企图被日伪提前预料到了。

1935年5月2日、3日发生于今兴隆县河口的那场战斗应是典型的一场伏击战。河口的地形非常奇特，东、西、南三面都是高峻的山峦，山峦之下陡峭的深谷中，滦河自北偏西北方向劈千山、破万岭，狂野不羁地奔腾而来。在接纳了黄花川的清澈细流后，拐了一个大弯，又迅即朝东偏北方向滔滔奔涌而去。日军选择这样一个有利地形静候抗日救国军的到来，并乘他们半渡之机发起攻击，显然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兴隆县蘑菇峪乡城墙峪村河口自然村陈永付介绍，日军是从清河口或八家坐船过来的，大约是两条船。2008年7月20日黄昏，我到河口探访抗日救国军遭遇伏击处，巧遇陈永付，他说："我爷爷陈桂占给孙永勤他们抬过担架，用门板。他活着时净念叨，日军上岸后在东山岭带河东砬头上埋伏着。那儿有两棵松树，当地叫平顶松。日军把小钢炮架在砬头上。河口村后山还埋伏着两挺机枪。孙永勤的人坐船过滦河，想从岸上到孙杖子。划到山根白石头那儿被打，有的都快到石头跟前了，结果日军开炮、开枪了。"



图124　河口，春天到来时，空气里充满了苦杏花的芬芳。2006年4月

炮弹在河水中爆炸，激起一簇簇冲天的水柱。船板和人的断肢在水雾与火光中四散横飞，机枪子弹在接触到人体前，皮肤和血液便已爆裂、飞溅开来。今天的河口滦河拐弯处，虽然水量已大不如80年前，黄花川更是近乎干涸，但站在可以俯瞰旧战场的山坡上，似乎仍能听到牺牲者当年濒死前的惨叫。

横渡滦河的60多名抗日救国军战士中，应有不少就是黄花川一带的人。他们是在已经看见了家乡并即将踏上家乡土地的情况下惨死于日军的炮弹和子弹之下的。河口之战与其说是一场正常意义上的伏击战，勿宁说是日本关东军对只有简陋武器的抗日救国军的一场屠杀。

河口附近的山岗上，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都会开满了粉红的桃花和洁白的杏花，空气中也会充满了这些花朵的芬芳。写到这里，想起葬身于滦河里的那些英雄们，我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聊借每年春季都会刮过滦河河谷的长风将这些花朵的芳香献给他们。

河口遭到围堵后，抗日救国军转道城墙峪与王宝石之间渡过滦河，抵达王宝石。由于东北方向4华里的臭水湖也发现了日军，抗日救国军又迅速转移到河南大峪北沟，之后移至关家沟。“到后堵吃饭。”史耀华回忆说，“小米干饭刚吃上，河口来信，说鬼子从王宝石上来了。孙永勤让哨兵在梁上上岗，鬼子刚一上梁放机枪，咱们的枪就把鬼子打下去了。孙永勤带

兵来到饮马坑，把住河口这边。正打鬼子，鬼子开枪把孙永勤正腿肚子打个眼儿，受伤了。”

饮马坑在河口西南4华里处，西南距孙杖子6华里，据说是穆桂英或蠡寇饮马的地方。饮马坑负伤对孙永勤个人及抗日救国军后来命运的影响非常大。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由于抗日救国军内没有很好的医疗条件，直到孙永勤牺牲为止，他的腿伤似乎一直都未能彻底治愈。“孙永勤腿在饮马坑被打个透眼，一上火，就上脖子，说不出话，就得刮。”史耀华回忆说。抗日救国军的领导者、灵魂人物无法摆脱伤痛的折磨，军队的建设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影响。二十多天后，抗日救国军在长城以南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灭，孙永勤个人健康问题是导致那场悲剧结局出现的因素之一。

抗日救国军与日军在饮马坑激烈对射一个小时之久，随后抗日救国军战士抬着负伤的孙永勤沿黄花川向西微偏南方向转移。之后的情况，史耀华于1983年回忆道：“黑夜到张杖子马架沟，与满军打一仗，连夜奔广西山。从三道梁子、头道沟、摺荒地下去，到解放的化鱼沟开一仗，又奔天明村、南大台，过分水梁，奔大山、老窝铺、青杏沟、杨树林，从洪山口西边过长城，到大块地，住在大块地庙里。第二天奔关家沟。”

这段文字十分简略，总共不足100字。然而如果你熟悉华北地区的地理，或者你肯花工夫



图125　饮马坑，传说是穆桂英或蠡寇饮马之地。2008年7月



图126　万里长城冀东段　2005年7月

找到一张大比例尺的承德地区的地图、一张大比例尺的唐山地区的地图，将两张地图拼接，然后仔细地找到上面所说的地名，用线条依次将它们连接起来——你这样做时千万不要忘记真正的起点在今日承德县之老梁山，你会发现在史耀华语气平静、近乎轻描淡写的叙述下，一场伟大的军事行动，随着你笔尖的游走，它的面貌突然清晰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1935年5月初发生于热南山地与冀东北部低山丘陵地带、由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军事大转移行动，至今仍是个尚未引起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足够重视的课题。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一支几百人的主要由农民构成的抗日队伍由老梁出发，沿东南—西南方向穿越滦河东岸山地，渡过滦河，沿南—西—西北方向进入滦河西岸的燕山腹心地带。他们在一座连着一座海拔千米及千米以上的高山中穿行，在遭遇敌人的迎面围堵后，又迅速折转向南，穿越为茂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的人迹罕至的山岭，越过由黑河、潵河两条大的河流及明长城所构成的自然和人为阻隔，进入国民政府统治区。在那里短暂停留后，又掉过头，重新逾越长城，回到他们位于滦河西岸的根据地。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评论，都是个十分伟大的壮举。

这次行动的调查者和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研究者——原兴隆县委党史办副主任佟靖功先生曾用了“‘铁流’般的艰难突围”字眼来形容这次了不起的军事行动。但如果考虑到路途的艰辛、疾风般的行动迅捷、大开大阖的手笔，我更倾向于称之为具有史诗特点的一次伟大远征。其艰苦与悲壮与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万里长征具有异曲同工之感。

李连贵部的抗战

1935年春，当孙永勤率领几百人的队伍穿行于滦河两岸、长城南北，与关东军和伪满军作战时，他的部下也在划定的区域内与日伪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根据抗日救国军战士刘秀存的回忆，1935年春，抗日救国军进行了第二次整编。整编的时间，他记忆中是在他加入孙永勤队伍后，活动到黑河地区的广东山以前。1986年10月，他在接受遵化党史办马秀山、李永春先生采访时说，1934年冬在遵化舍身台加入抗日救国军后，他先跟孙永勤在舍身台呆了一些时间，之后去了潵河半壁山。接着去了西化鱼沟、黑河、荞麦梁。又回到黑河，然后是化鱼沟。在化鱼沟驻扎期间，他请假回家。回家时间，1987年3月他向兴隆党史办佟靖功先生回忆，是1935年农历二月。由此情况来看，抗日救国军第二次整编时间约为1935年农历正月，公历1935年2月或3月。

第二次整编的内容，根据刘秀存对佟靖功先生的回忆，主要是将抗日救国军全军划分为九个队。“第一、二、三队把守茅沟（疑为“蘑菇峪”——编者）一带，四大队把守横、潵、黑、车、柳河一带，第五、六、七队把守冷口一带，八、九队把守老梁子一带。”

刘秀存关于抗日救国军划分为九个队的说法，与单忠英回忆他到老梁上时孙永勤已有九个队相符，不完全相同的地方是，刘秀存单把第四队称之为“大队”，不知何故。

“二月间，我请假回家。没过两天，回去。到青杏沟，遇见李连贵，他留下我。李连贵的四大队编成四个小队，每小队120多人。我们是第三小队，年焕兴任小队长。我们班长姓陆，以后我担任班长。”

依据刘秀存这段回忆看，抗日救国军的“队”下面实行小队和班的设置。

由于从农历二月即公历1935年3月起，直至1935年5月24日毛山战斗爆发当日，刘秀存一直随李连贵活动，我们得以了解李部在这期间的活动情况。当然我们能有这个幸运，除了要感谢刘秀存外，还要感谢马秀山、李永春、佟靖功三位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辛勤采访。

按照刘秀存向马、李、佟三位先生的回忆，1935年3月至5月中旬抗日救国军进关前，李部曾进行了以下活动。

一、药王庙战斗

战斗发生时间是1935年3月。刘秀存说：“旧历二月间，我们民众军在半壁山药王庙北方与日本兵、警察打了一仗。打两个上下钟头，是咱们第四大队打的。咱们队伍里有一个赵顺，廖高庄人，外号老虎，是老兵，会打炮。四大队从长城上抬下两个牛腿子炮，是铁炮，有小盆

那么粗，二三人高。年焕兴让赵顺把炮架在北山，第二炮把庙里炮楼盖掀开了。100多敌人攻北山，咱们退到白云寺。”刘秀存所说的白云寺在今兴隆县大水泉乡境内，地点在药王庙西北约十二三华里处。

二、白云寺战斗

这场战斗发生于药王庙之战的第二天。刘秀存说，他们撤到白云寺后，“夜里，糜子地来信，说有100多马队要来。咱们天没亮就上了白云寺西梁，李连贵带人上去的。天亮，100多人的马队来了，看清是伪满军。亮天打到傍午，敌人跑了几个。消灭敌人八九十，得了八九十支枪，七八十匹马，还得了其他一些东西。俘虏20多人，以后又放了。不知是哪个队伍。”

三、五指山突围战

白云寺之战结束后，李连贵率队转移黑河，上了五指山尖。刘秀存说：“五指山尖上有一户人家，我们吃了人家不少粮食。他们没衣裳穿，两个小孩冷，烤火把身上都烤成吉吉花样了。李连贵让我们一人给脱一件衣服，脱了上百件给他们。日本兵来围，我们从南天门、西大洞撤到青杏沟。”

青杏沟在今兴隆县蓝旗营乡政府所在地东北3华里处。抵达青杏沟后，发生了药王庙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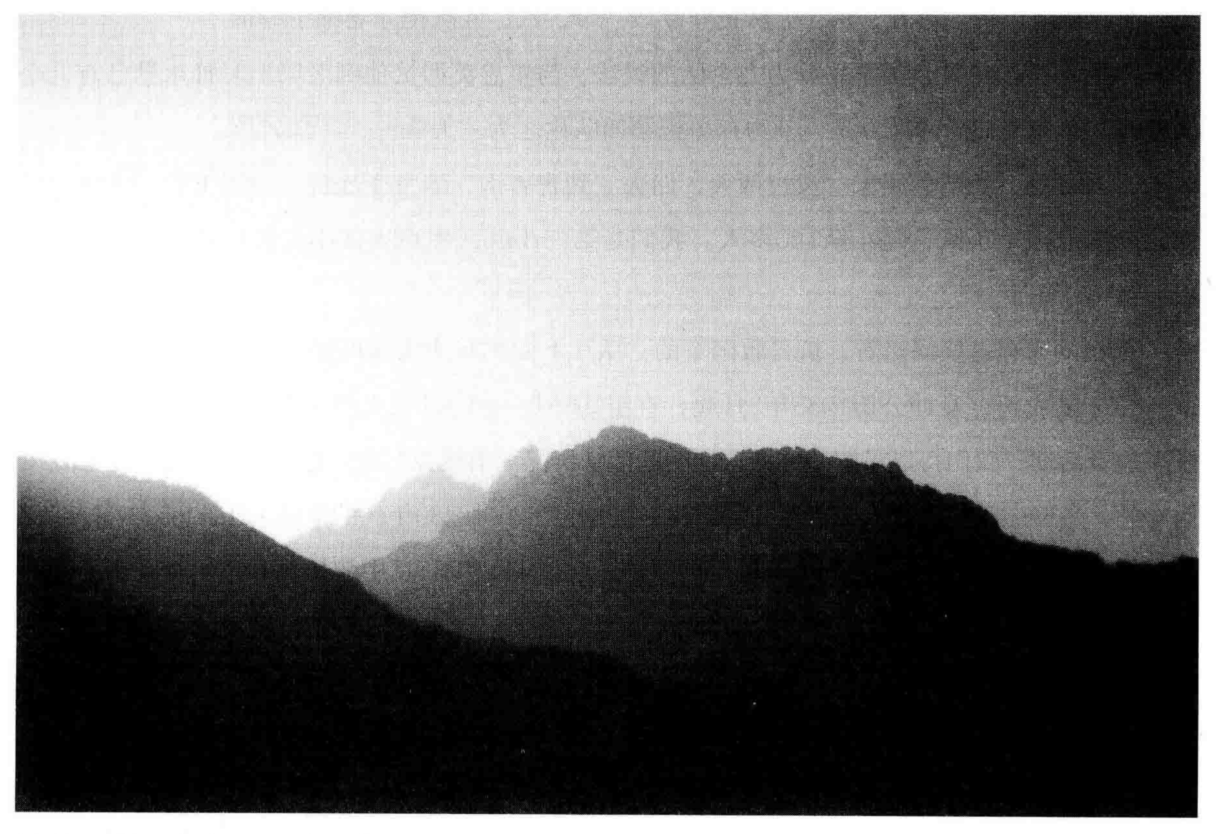


图127　冬日五指山　2009年12月

40左右人的民团前来投奔李连贵的事，时距药王庙之战结束约两三天时间。

四、蓝旗营战斗

李部到达青杏沟后，刘秀存率部分人到蓝旗营执行警戒任务，在那里与伪满军发生战斗。抗日救国军取得胜利，缴获了一些枪支和马匹。

五、向“杨白毛子”压枪

蓝旗营战斗发生后，李连贵部转移到青杏沟西北10华里处的西偏堂，住在一户财主家。之后回到青杏沟、蓝旗营。再后去了北厂沟（佟靖功先生的记录为西厂沟，地址不详），来到一个外号“杨白毛子”的财主家，向他要枪。“他说没有，翻出两支来。又要子弹，他还是说没有，给的钱。全大队500左右人，每人分上两块多钱。”刘秀存说。

带着从“杨白毛子”那里压到的枪和钱，李连贵部重新回到青杏沟，“两三天，孙永勤来了”。

进　关

1935年5月15日，孙永勤率领1000余名抗日救国军战士从洪山口进入遵化东北部山区。与之同时，一种说法是之后两天，李连贵按照孙永勤的意见，率领500余人与从北面赶来的两个队一起从洪山口西南20华里的马蹄峪进关，抵达遵化城东地区。

根据中华民国及伪满方面报纸报道，入关之前，甚至5月15日当天，孙永勤及抗日救国军旗下队伍都还在今承德市及承德县境内与日伪激烈战斗。

《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7日（1935年5月7日）第三版以“古北口盛传，义军攻承德”为题，报道孙部曾于5月4日攻占下梨城。这个“下梨城”，我疑为排版错误，实际指的可能是“下板城”。

北平　古北口盛传，热河义军孙永勤部率众千二百余人，于本月四日占领下梨城，大军已逼近承德。日伪军极慌，已分调古北口及其他承德附近各县日伪军前往援救，并檄察东伪军李守信部东进防堵。古北口日军奉令后，已全部移动。承德难民四处逃奔，状极狼狈。（六日专电）

《盛京时报》康德二年5月12日（1935年5月12日）第十一版以“匪首孙永勤率众千余盘踞大杖驿，警备员严重警戒中”为题，报道了5月6日孙永勤一度企图攻击大林驿的消息。

【锦州】　据凌源通讯，六日午后一时三十分，凌承线上谷、大杖驿中间、附近线路南方约米千四〔四千米〕地点，下板城，有匪首孙永勤，率众约千余名，拟向大林驿袭击。该驿警备员增派，严重警戒中。平泉自卫队于是日午后四时，亦奉令驰抵该驿，协同警戒，以防贼众据。据探，贼众持小枪者，大居多数〔绝大多数〕臂章署有“护国义友军”〔“护国义勇军”〕各伪美名号。该匪众为数政〔甚〕伙，野心勃勃。负有肃清匪类、维持治安为〔之〕当局，乃遣重兵往剿，以期歼灭，而免匪情扩大云。

除以上两地外，抗日救国军还在大板驿、三岔河、三岔沟、西大凹、大营子与日伪有过交火经历。

《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15日（1935年5月15日）第三版以“关外义军活跃”为题，在介绍了辽西、吉林两处义军的情况后，紧接着报道了孙部于5月10日对日伪展开的一次攻击行为。

北平　古北口讯：孙永勤部包围承德后，因日伪军压迫甚剧，本月九日沿承凌铁路线撤至下址城〔下板城〕以南约三里地方。该部现聚众千余名，本月十日与驻平泉、喜峰口日伪军开始接触。大板驿日本自卫队闻讯往援，大板空虚，竟被孙部五百余人占据。现双方激战甚剧，

长城各口日伪军均积极调动中。伪承德第五军管区司令官王静修认孙部为热河心腹大患，连日电长春日方报告，请饬锦州省驻军派兵往援。（十四日专电）

《盛京时报》康德二年5月22日（1935年5月22日）第十二版以“热河省境匪患，友军剿讨成绩”为题目，宣传日满军队的战功，但却让我们了解到了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在5月15日的活动情况。

【锦州】 热河全境，山险路僻，素为匪贼渊薮。虽经满日军队，一再痛剿，迄未肃绝根株。日前孙永勤匪首，率众千余，在平泉中心扰乱。已经友军出动，与以重大打击，几乎全灭。然该匪首仍存困兽犹斗之心，再出蹂躏闾阎。驻平泉友军有田部队主力，十五日午前六时出动三岔河地方，与孙永勤匪众二百余名遭遇。施以猛烈之攻击，结果将匪击溃，四散奔逃。当场遗弃尸体四十，负伤四十。残匪大股向三岔沟方面窜去。有田部队尾追其后，又在该地包围痛击。残匪狼狈窜去，遗弃尸体四，捕虏二，弹丸九十卤获。又驻平广川部队一支队，于同日十二时，〔在〕下板城南方四里半西大凹，〔与〕从滦河渡涉，向西逃亡中之匪贼冲遇。彻底奋战，贼遁。遗弃尸体七，捕虏一，弹丸一六四卤获。又驻承德村上部队于十四日夜由奉出发，十五日午前十日抵大营子，与盘踞该地之匪首张福伊率众一百九十余名遭遇。双方混战，结果匪势不支，向东南方面逃窜。匪首张福伊当场击毙，并击死匪众二名。孙永勤悍匪，经此一番大打击，死亡数十，负伤无算，贼胆已丧，率领残余拟向黄花川、瀑河口方面逃亡。捣穴擒□，肃清匪类，当在不远云。

上引4天战斗中，5月6日之战，有可能确为孙永勤亲自领导的。5月4日、10日，不敢肯定。5月15日的战斗则可以肯定孙永勤没有参加，因为那天他正在进关途中。《盛京时报》提到了“张福伊”的名字，张福伊应即“张福义”。张福义与日军交战的地点是大营子，三岔河、三岔沟、西大凹战斗的领导者则可能另有其人，是孙永勤的其他部下。根据下文要引用的刘秀存的回忆，他们有可能是抗日救国军的第八队和第九队，一说第五队、第七队，队长为康永贵、何广永。

如果孙永勤5月6日在大林驿能够得到确认的话——“大林驿”具体对应今承德县什么地方我未考证——那么为什么6日还在与日伪较量，8日后孙永勤却突然带领众多的抗日救国军进关了呢?

检索从1935年5月15日孙永勤率部进关直到今天，文字材料和民间传说中所有关于他进入长城以南地带原因的解释，中国方面至少可以归纳出十四种观点，日伪方面则有两个说法。

中国方面：

一、日军压迫说

此说最早见于中华民国24年5月26日（公历1935年5月26日）民国各大报纸。内容几乎完全

相同，均接自北平电话，用今天的话讲，似为“关系方面”的通稿。现援引天津《大公报》报道如下：

【北平电话】 关系方面对协剿孙永勤部，昨发表消息如下：查本月初旬以来，遵化县东北沿长城边区，匪患甚炽，枪杀焚烧，地方损失颇巨。先是口外著匪王彦如与热河土匪孙永勤两部约数百人，受日军压迫，窜至长城附近。我方团警闻讯，正欲前往长城附近堵击，以本月五日午后三时，我驻遵化之保安大队王大队长接到日军通知，谓日军对孙永勤部残匪决定铲除，惟恐发生误会，请该队暂移驻〔距〕长城二十五里处，罗文峪方面防务交日军担任等语。我保安队于五日晚间撤回遵化城，日军即设司令部于罗文峪内。未几日军司令部迁设于撒河桥〔潵河桥〕北三道河，并未通知我方派警接防。我方正派员与日军接洽填防中，而孙匪遂乘虚于十五日窜入关内，到大屯、侯家寨等地纵火焚烧，奸淫掳掠。我地方当局因恐匪势坐大，遗害地方，已与日军商妥协剿办法。连日以来，我团警分布于各要隘，搜索兜剿，匪部即形不支，扑灭之期，当在不远。至于外报所载遵化县长有庇护孙永勤之说，与事实不符，且完全不确。至关于协剿孙匪事，我当地团警与日军联络极为确实，我团警连日正与匪接触中云。

二、张庆余、张砚田设计说

此说法见于《兴隆县志》征集意见稿中的《民族英雄孙永勤》一文。完稿时间，最迟为1960年7月。文章说：

“1935年1月，孙永勤部队在黑河川老梁开会时，突然被日军、满军和冀东治安军包围，死亡约600多人，因此士兵士气有些低落。孙永勤此时未对部队进行整顿，加上抗日救国军皆系农民出身，战斗一年多了，有些留恋家土，逃走约1000余人。

“2月间，孙永勤领导的部队约3000余人，均穿棉衣棉鞋，行军困难，即率全军南征，奔向关内，企图得到国民党在武器、钱财上的援助。当时，国民党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部反对抗日，积极集中兵力，要消灭抗日军队。于是派伪县长白某伪装抗日积极人物，叫孙永勤全军去毛山一带剿灭马拐子土匪。胜利后，遵化县负责发放全军大部军装与物资。孙永勤等将领由于没有认清国民党的阴谋诡计和伪县长的伪君子丑恶面貌，存有严重的麻痹思想，在3月29日即旧历二月二十五日清晨，全军行至遵化县毛山吴家沟一带时，日寇〈驻〉潘家口、喜峰口、遵化、兴隆的日伪军和保安队约一万多人把抗日救国军团团围住。四周山炮齐发，枪声如同爆豆，喊声如同雷鸣，集中火力消灭抗日军队。”

三、中共冀东区委老陈、刘玉林等人要求将孙部调入关内说

此说见于李子华为《孟家铺村史》所写的文章中。完稿时间为1964年6月2日或之前。《孟家铺村史》我一直未能找到全本，下面引用的内容为保存在冀东烈士纪念馆的抄件。

李子华说：“冀东区党委派来老陈、刘玉林（听说是刘志丹的侄子）等三个同志来孟家铺

村组织游击队，首先联系上孙永勤。特委王平陆也就在这时深入进去，同孙永勤取得了联系。孙对我们的要求是：一要委任，二要枪和子弹。

“老陈他们要回去请示有关孙永勤的一些问题。临走时，先告诉孟家铺的游击队，‘你们能把他们调进长城以内，再发给他们东西。’4月间，游击队和孙永勤进一步取得了联系，孙永勤的两千左右军队也调到遵化城东一带住下了，可是老陈向上级请示还没有回来。游击队实在等不下去了，李子华就同孟寿田二人雕了个公章，做了一张委任状，委任孙为华北抗日军第一军军长，由王平陆任政委。他接到委任后很高兴，可是枪和子弹却没法解决。在这一段当中，他们也很大意，常常大白天骑着马进城，不久被日本兵发觉了。敌人调来了丰润、迁安、兴隆等县兵力，围攻孙永勤的部队。事败后，孙永勤带着几百个人跑到绥远去了。”

冀东烈士纪念馆的这份抄件未说老陈、刘玉林等人到遵化的时间，根据李子华在其《革命回忆录》中所写，为1935年。抄件中提到的老陈，遵化党史办李永春先生在《孙永勤在遵化》一文中说他原名叫赵仲池。

四、王殿臣建议说

最早见于朱呈云先生的《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完成时间为1982年8月28日），刘刚范先生的《孙永勤与民众抗日救国军》一文（完成时间为1983年）与之观点相同。热河革命史编委会编写的《热河革命史稿》（1988年11月出版）除了强调孙永勤进关还有一个目的——寻找共产党和红军外，其他与朱刘二先生观点相同。

三篇文章中，朱呈云先生的叙述最为详细，本书援引他的相关文字如下：

“日寇屡遭打击之后，更加恼羞成怒，像发疯似地从热河附近各县抽调上万名日伪军，1935年2月起开赴兴隆县黄花川一带，‘围剿’抗日救国军。一天，孙永勤、张福义等率领第一总队正在承德县老梁一带山区活动，突遭日伪军两千多人的围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永勤等领导人本应有计划地组织突围，但是他们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较深，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由于接连打了几次大的胜利，骄傲情绪不断增长，决心和敌人打阵地战、速决战，主张硬打硬拼，结果双方激战一天，虽然打死打伤敌人近千人，然而抗日救国军也死伤600多人。在战场上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孙永勤才率领战士突围，转移到黄花川一带深山中去。

“孙永勤率队突围转移到黄花川以后，敌人拼命尾追，妄图把抗日救国军扑灭在山里。这时，参谋长王殿臣等人提出了‘要集中全军兵力，与日寇决战，胜利一定会早日实现’的主张，孙永勤对此非常赞同。他说：‘在山地与日寇打大仗，吃粮、穿衣、军需供应都有困难。如果奔赴平原，吃穿住用容易解决。我们决战胜利后，同工人、农民一齐起来攻下大城市，革命肯定会早日成功，鬼子肯定会早日滚蛋！’于是他命令全军4000多人放弃山区根据地，越过

了长城，向遵化县转移，错误地想在平原地区与日寇对阵，搞大兵团决战。

“3月，抗日救国军开赴遵化县毛山一带。这时暗藏在队伍内部的汉奸商佩璋，早把军队行动情况密告给兴隆、遵化县的日伪机关。遵化县伪县长在日寇授意下，一方面用‘帮助’、‘合作’等手段，亲自到毛山找到孙永勤，伪装自己赞同抗日，要求帮助他消灭马拐子匪患，欺骗抗日救国军；另一方面给唐山伪国民党、保安队拍密电，加紧密谋，设下一条毒计，请求尽速派兵扑灭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孙永勤在当时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情况下，革命警惕性不高，只听伪县长口头抗日，没识破他内心卖国的反动实质；只知道马拐子是土匪汉奸，没识破伪县长和日寇早已同流合污，于是便答应了伪县长的请求，在毛山一带与马拐子作战。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日伪合谋派重兵‘围剿’就在眼前，结果上了大当，吃了大亏，遭到苦难。”

五、遵化县孔县长与日本人联合设计说

抗日救国军第四大队一排三班班长廖金柱持此说。1982年12月7日，他对前去采访的一位未留下名字的党史工作者说：

“民国24年春季栽白薯时，遵化县保安队贾义要投降民众军。他请孔县长帮助跟孙永勤联系，孔县长一面同日本人部署‘空城计’，一面与孙永勤联系在遵化县城接受贾义投降。一天，孙永勤带领队伍从大寨来到遵化县城，但却中了孔县长的‘空城计’。日本鬼子、伪军把他们团团包围。孙永勤带领队伍浴血奋战，突出重围。此后向东北攀上毛山，在毛山顶又与敌人激战了大半天，最后因弹尽粮绝，大都壮烈牺牲。我们四大队的140多人，只有6人被我从帽子山山坡带跑到我的家中（遵化洪山口三道沟盆楼峪）得幸免，其余全部牺牲。”

六、孔县长邀请剿匪说

此说见于抗日救国军第八队长单忠英向栾福忠、邢连义先生所作的回忆中，时间是1983年4月17日。

单忠英说：“当时没有子弹了，要求遵化县接济。孔县长给我们开会（此处文字有缺失，内容应为请我们到毛山剿匪——编者）我们说：‘毛山剿匪，子弹没有，怎么打？’他说：‘河北省给我们送来，三两天就到。’结果没有，赤手空拳。老是口上说有子弹，但总没有。”

需要说明的是，“孔县长”这个人物，除廖金柱、单忠英外，不见其他人的回忆。我初以为“孔县长”是何孝怡指派的一个专门负责与抗日救国军联络的副县长，2008年秋，经向遵化市委党史办程水星先生请教，他又向阅读过遵化所有伪档的原遵化县检察院文书客彩章（客，音qiè）了解，证实1935年时期，遵化县没有孔县长这样一个人物，由此基本可判断孔县长为“何县长”之误。2010年6月21日，我与栾福忠先生通电话，栾先生明确说，单忠英回忆录中的“孔县长”即何孝怡。他当年所以在采访记录中写为“孔县长”，是忠实记录单忠英原话的缘故，而单忠英当时年纪已高，一些历史细节已无法准确地回忆。

根据栾福忠、邢连义先生当年所做原始记录，并与栾福忠先生电话核实，何孝怡当年是派遵化县政府里一个姓杨的副官到抗日救国军中联系剿匪之事的。单忠英对他的印象是："国民党杨副官讲话没有理论。"剿匪的条件，单忠英回忆为："跟他到关里。没有子弹，给换军装。"这是栾邢二先生原始记录上的简略记载，用现在的话完整表述则当为："跟他到关里。没有子弹给子弹，没有军装给换军装。"

七、马拐子请孙永勤去遵化说

1983年5月31日，孙永勤次子孙文孝对朱素清女士说：

"高作忠告我父亲的状到马拐子那里。马拐子来我家住七天，说投降我父亲，叫我父亲去遵化。我父亲信迷信，叫小老道给算卦，问能不能去遵化。小老道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跟我父亲一年多了，他说得去遵化。结果小老道给告密了，他走到齐河岭就跑了，离开了我父亲。"

八、何孝怡、中共冀东区党委共同作用说

中共遵化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遵化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一）》（1985年8月印行）中，收录有李永春先生《孙永勤在遵化》一文。李先生说：

"1935年2月，孙永勤率部分队伍在地瘠人稀的热南山区活动，多次与日伪交战，严重打击了敌人。但是，在频繁的战斗中，由于军火得不到接济，给养得不到补充，部队得不到休整，境遇十分困难。4月中旬，遵化县东北部的松棚营、小厂一带遭受'马拐子'、'滚地雷'等土匪蹂躏，居民拖家带口逃难到县城，恳请县政府为民除害。当时遵化县县长何孝怡同情抗日，又忧于匪患，秘密邀请孙永勤来遵化县剿匪，并答应给孙永勤部队一部分军火和给养。冀东区党委老陈（原名赵仲池）和刘玉林、李子华等人组织游击队，与孙永勤联系，使孙永勤和共产党倍加亲近。遂把千余人的队伍经罗文峪、洪山口开进长城内。在进军途中，打下孤山子、罗文峪、洪山口等伪据点，活捉日本人关税总长佐藤及其随从，挟其为人质，要日本用武器赎回。"

九、去遵化取枪说

有两个版本：

1. 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回忆。采访者为佟靖功先生，采访时间为1986年11月。这个版本的原文在之前叙述抓捕日本人段落时已引用过，即孙永勤在今宽城县松挠沟抓到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翻译。日本人为活命，给日军写信，让他们给孙部一些枪支。日军回信可以给枪，但要到遵化城去取，于是孙部去了遵化。

2. 抗日救国军战士张凤林讲述。采访者也是佟靖功先生，采访时间为1986年11月18日。内容在五凤楼一章介绍过，大意是，孙永勤围宽城，宽城讲和。县长应允给一挺机枪，商会答应给六万块钱，先给三万，另三万与县长说的机枪要到遵化城取。关门岭之战后，抗日救国军想起此事，于是去了遵化城。

十、请求共产党、国民党政府支援说

此说法出自兴隆县史志办保存的《“抗日救国军”在遵化活动的有关情况》一文。作者不明，原件上只写着“遵化县委党史办提供”。写作时间为1987年3月7日。文中说：

“孙部来遵的目的，在口外非常苦难，到关内来请求共产党支援，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十一、县长投敌说

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郝士玉讲述，据说观点出自孙永勤军师郝敬义。

“听郝敬义说，孙永勤1000多人在老梁上活动。日本军来了很多围攻老梁，孙永勤率军奔毛山了。孙永勤子弹不足，朝遵化县长要子弹。那个县长答应给，让孙永勤上毛山等着。孙永勤上了毛山，可是县长投敌，与日军勾结，日军围了毛山。”1988年12月15日，郝士玉对佟靖功先生说。

十二、翻译官设计说

抗日救国军战士常久芳讲述。采访者为佟靖功先生，采访时间是1989年1月23日。他说：

“（把年焕兴在岳王庙南沟口抓到的三个日本人，还有一个中国翻译，送到车河口孙永勤那里后）李连贵调我们转到白河，又打上仗了。翻译官在王宝石跑了。他跑到遵化，把遵化县长使出来了。遵化县长打发人送来小报，把孙永勤当朋友，说‘你们来到口里，给你们一些枪支、衣服，比你们那里全是大林子强。’听他们念叨，遵化县长来过两次信。这时我们1000多人了，孙永勤答复了，送信人可能又回去给遵化县长回信了。送信这人是60上下岁的一个老道。

“在口里，李连贵我们这个队在头。我们住侯家寨，孙永勤他们住在上下港，呆一宿。听见啥话了，日本子遵化县就满了，汽车来回直跑。次日，就拉到遵化东南笔架山，到山上就打上仗了。打了一天，我们1000上下人没大伤损。孙永勤醒过闷儿来，还是往北返，往北撤，奔景忠山往北撤。”

十三、寻求国民政府支援说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1993年6月出版的《冀东革命史》持此看法。

在第七章第五节《孙永勤抗日起义》中，编者写道：

“1935年4月初，孙永勤率救国军一部东渡滦河，进入老梁山区，突遭千余名日伪军包围。激战一日，双方损失均较重。孙永勤在率队突围中腿部负重伤。他带伤指挥救国军且战且退，终于突出包围，撤至瀑河川青杏沟与李连贵所部会合。几个月来，由于频繁作战，伤亡增加，部队严重减员。5月初，救国军各队奉令赶到青杏沟，全军集中后约计1700人。此时多数救国军战士还身着棉衣，亟待换季。加之弹药缺乏、活动范围日益狭窄，抗日救国军的处境已十分艰难。孙永勤抱病召开干部会议，议决全军开赴冀东平原，寻求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解决吃穿与装备问题。尔后，抗日救国军断然放弃热南游击区，在不明外部政治军事形势的情况

下，开始向长城以南转移。

“同期，日伪军已集结数千人，在长城以北从西、北、东三面向抗日救国军进逼，并强行通知长城南侧的遵化县保安队后撤。显然，日军蓄意将决战战场推至长城南侧受国民党政府管辖的‘非武装区’，借以制造滥言，挑起事端，进而向国民党政府施加政治压力。5月15日，孙永勤部在优势日伪军压迫下，于罗文峪等处南越长城，撤入遵化、迁安境内山区，日伪军尾随追进。孙部于所到之处布告安民、宣传抗日，并派人向遵化县长何孝怡提出供给弹药的要求，遭到拒绝。日军压迫抗日救国军进入关内后，即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

十四、诱骗说

何广永之弟何子桥持此说。

1961年11月15日，何子桥对采访者王桂荣说：

“孙永勤失败，主要是被骗。孙在口外活动，日人‘围剿’多次无效。遵化县伪何县长就给孙去了一封信，说叫孙到遵化来，给他多少东西，协助抗战。孙虽知道这是欺骗，但也想用先把东西拿到手然后再说的方法对付他，所以就拉到遵化毛山。但当时不知用游击战方法对付敌人，怕敌人集中兵力把自己吃了，孙也集中兵力准备硬打。

“拉到毛山后，日寇就集中了日本鬼子、满洲军、保卫团、汉奸等一万多人，并开去很多汽车把山围住。但民众军非常英勇，而且大部分人枪法很好，激战一天，打死打伤1000多敌人，民众军牺牲150人左右。尤其是孙腿部挂花后，用人抬着还指挥冲杀。但终寡不敌众，最后还是被打散了，孙也牺牲了。”

孙永勤的亲属也持诱骗说。

2005年1月，我到兴隆县城车道沟采访孙永勤二儿媳贠玉萍，她说婆婆雷永兰生前讲过，当时不愿意让孙永勤去遵化。

“他那时人多了，好几千人，没枪，也换不下季（指服装）来。那时不是讲跑信吗，就让他带着部队去遵化，说是给他们枪，还给换季节衣服。那时都到了三月了，就去了。说当时有一个老道，会算命，告诉他不应该去。为了部队好打鬼子呀，就去了。到栗树湾子那里还有人参加他的部队呢。有活着回来的不是，说那个老道到栗树湾子就跑了，没去。偏偏到那儿（指遵化）还打花了（即打散之意）。”

“我听我婆婆说，我们公公要不死不了。让他们给诱骗去了，在遵化打了口袋仗了。上面受围攻，下面也受围攻，突围不出去，就牺牲了。”2005年4月，我到唐山采访，孙永勤三儿媳郭瑞萍对我说。

日伪方面：

1. 因日军扫荡、与遵化县长有关系而遁入遵化。

康德二年5月22日（1935年5月22日）的《盛京时报》第二版以“热省治安之癌，孙匪逃入战区，日军决追剿歼灭，达到目的后速撤回原防”为题，发表消息如下：

【东京廿一日电】 扰乱热河省治安之孙永勤匪贼团，受松井〇队长扫荡，其残党遁入停战协定地区。孙与遵化县长有关系，继续活动之事已判明，若长此放任，则热河治安又将被扰乱。因之关东军〔将〕决定出兵于停战协定地区内，彻底讨伐孙匪之旨，于廿日报告于陆军省。然对此，陆军当局云，此次关东军之行动，完全为讨伐扰乱热河省治安之匪残党，并非为将军队入停战协定地区为目的。在剿灭孙匪后，当即退出，无惹起其他各种军事行动之意志。

2. 受中国侧关系援助，进入遵化。

康德二年5月26日（1935年5月26日）的《大同报》、《盛京时报》刊登了同样的消息，以《盛京时报》为详细，现援引如下：

【北平廿四日电】 廿一日，在天津，酒井参谋长，仪我大佐，关于天津暗杀事件与孙永勤匪等，举行重要协议。高植〔高桥〕驻平武官，于廿三日午后十一时归平，于廿四日有如左谈：

此次之会合，对暗杀事件之正体，更加明确，当然采取断乎之处置，但现在尚非说具体办法之时。孙永勤匪，与仅为匪贼则不同，在中国侧，称孙为热河自卫军总指挥，□受北平义勇军□事处指系（原文印刷不清，《大同报》为‘与北平义勇办事处系相连系’——编者），纯为反满抗日军也。受中国侧关系者之援助，毫无所为禁止。前者由我方之抗议，张庆余之保安队出动三大队，阻止孙匪南下。但我方仍坚持立于独自立场，对扰乱治安者，彻底的扫荡之。

上面十六种说法，有的差别很大，有的则只有细微的区别。哪一种更接近1935年5月的孙永勤进关真相呢？

经过2002年以来十次前往冀东长城南北调查，并反复研读抗日救国军幸存者及其他知情者对孙部进入遵化后活动的回忆，我倾向于认为原遵化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李永春先生的表述可能更贴近当时的历史真相。

我尝试复原的图景是：1935年5月初，当孙永勤摆脱日伪的追踪后，他发现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弹药补给和换服装两大难题。正在苦思良策之时，遵化县长派出的特使和中共孟家铺区委负责人都找到了他。遵化县长特使希望孙永勤帮助剿灭窜扰遵化东北部山区的土匪，条件是给抗日救国军换服装和补给枪弹。孟家铺区委负责人按照冀东区党委老陈、刘玉林等人的指示，希望孙部开进关内。孙永勤提出条件：一要委任，二要枪弹，孟家铺区委全部答应。由于只要入关，便能从遵化县长和中共两方面获得补给，即便在比较坏的情况下，也应能从其中一方获得支持，于是孙永勤作出了进关的决定。只不过无论孙永勤、何孝怡还是中共方面（指冀东区党委和孟家铺区委）最初都未料到，他们的计划会被日军决定进入“非武装地带”而打乱，孙部被“剿灭”、何孝怡被误解几十年、中共方面痛惜交加的一幕，不可避免地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



支持上述观点的根据是：

1. 入关前，孙永勤确实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1983年4月，单忠英在接受栾福忠、邢连义先生采访时说，他们身上的子弹袋看着鼓鼓的，实际上里面装的都是秫秸秆。晚年他向孙子单健回忆往事时，说进关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子弹了，有子弹的数量也不多，已经陷入绝境了”。

单忠英提到的“大部分人”指的是有枪人中的大部分，包括他自己在内。很多人回忆孙部当中还有许多是徒手战士。“民众（即抗日救国军）没多少枪，很多人是大刀片、扎枪，还有的拿棍棒。”孙永勤率部进关后，曾在遵化小厂乡小于沟驻扎，吴凤起老人当年已经12岁（虚岁），对孙部缺乏武器的情况记忆深刻。

“只看见孙永勤穿过一次马靴，其他时都是打裹腿，着羊皮坎肩。”孙永勤在小于沟驻扎期间，司令部曾安在小厂乡信访科员吴艳民家。2006年4月我去小厂乡采访时，他对我说，“听老人们讲，孙永勤的战士有的上身穿棉袄，棉袄上露着棉花，有的穿生羊皮。脚上大部分都是牛皮缝制的靰鞡，里面装着草、纸。靰鞡上面是裹腿，有的用布裹，有的用皮子裹，腿弯处露着一些羊毛。也有穿缴获的日本军服、军靴的，但没有整身的，一般外面都裹着羊皮坎肩，一看就破破烂烂的。”

“千方百计搜集点武器，还是陈旧的老套皮之类的。整个队伍里，长短枪不超过400支，子弹也不多，很多人还没有枪。天气都热了，还穿棉衣服呢。你想都薅粳子了，粳子都长那么高了，很多人还没换上季呢，说明队伍里武器、给养供应，相当多的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毛山之战前一天，遵化小厂乡吴家沟村的陈贵平正在自家地里薅粳子，亲眼目睹孙永勤率队从南面过来，欲经三里店重返口外。50年后，当他的外甥——原兴隆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闻成前去毛山一带调查孙部失败经过时，他将所见的孙部困窘的情况尽数告诉了他。

孙部之所以非常困难，既和他们活动的热南山区地瘠人贫有关，也与他们得不到外界的支援有重要关系。孙永勤抗日一年半中，除了中共遵化县委书记骆凤庭给抗日救国军送去十几支旧枪、一箱子药品，孟家铺区委送去少量枪支外，再无其他外部力量援助他的部队的记载。这与逐渐披露的同在“满洲国”境内战斗的东北义勇军、抗联、国民党的抗日组织背后分别有张学良、苏联、南京政府的人力物力援助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于缺乏外界的帮助，孙永勤只能靠向热南地区的大户压枪压款和攻打日伪据点获得必需的补给，然热南大户的所谓富裕只是相对贫苦百姓而言。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我曾说到，孙永勤大哥之子孙文贺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成分，总被批斗，被迫搬至关内遵化新店子镇康各庄。到那里发现，同是富农，但是关外的所谓富农“太冤枉了”，与关内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由于热南大户提供的物资也很有限，对鼎盛之时曾达5000余人的抗日救国军而言只是杯水车薪，于

是孙永勤只好依靠攻打日伪来获得枪弹补充。然这个办法在日伪加大对抗日救国军的围攻力度后，渐渐失效，于是抗日救国军的枪弹、粮食、医药、服装补给都陷入无法解决的境地。这些物资不能得到补充，影响的不仅仅是肉体，至为关键的是它们影响到了抗日救国军从上到下的士气。现存文字材料中，多人提到老梁战后突围过程中，逃走了不少战士。甚至在抗日救国军已摆脱日伪的围堵、来到靠近长城的较为安全的地带时，仍有不少战士选择回到了家中。

史耀华1986年回忆，他所在队伍从老梁撤出，到达蓝旗营后，“我们200多人奔车河。孙永勤的亲兵赵文义和张文香一个到车河，一个到柳河。小南沟的吴恒山也是孙永勤的亲兵，他和下板城警察署的吴恒泰是亲兄弟。吴恒泰起下执照，把我们回来这200多人在车河西化鱼沟门一个叫义得堂的粉房那儿收了。200多人在那个大院子里把60棵枪交给吴恒泰。刚交完枪，吴恒泰的亲兵就把赵文义、张文香绑上了。我们一看，就全跑了，都回家了。”

战士的逃亡，让孙永勤意识到军需特别是枪弹服装问题已影响到抗日救国军是否还能存在这一根本问题。在过去的向大户施压和从日伪手中夺取军需两种手段外，如不能有新的办法，尽快解决剩余官兵的补给问题，不仅抗日救国军马上面临瓦解，他的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承德县、热河，乃至东北全境的宏愿也即将落空。

正在一筹莫展，极度焦虑的时刻，杨副官、孟家铺区委的负责人来到了抗日救国军中。

2. 何孝怡当时正面临如何剿匪的难题。

根据《申报》、《大公报》、《益世报》所载，从1935年3月中旬起，遵化县北部靠近长城地区便极不安宁。先有战区保安队冯寿彭部叛兵300余人，枪械整齐，由界岭口沿长城向兴隆县大小倒流水金矿逃窜；继而有王承祖“叛团”战败后，残部东出玉田，沿遵丰、遵迁边境，退至长城喜峰口一带，与孙永勤部会合，“窜扰”遵化、迁安北部边境；接着又有刘桂堂部土匪窜至遵化东北部山区，与王承祖残部合流后，烧杀淫掠，蹂躏人民；长城北面的红枪会、大刀会受日伪的打击、驱赶，也逃至长城一带。各股势力麕集于遵化北部边境，不仅令人民的生活大受影响，遵化县长何孝怡也疲于奔命到崩溃的边缘，以致不得不到北平调养。

现援引几则报道，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申报》中华民国24年3月31日（1935年3月31日）第九版报道：

北平　遵化电：长城各小口近日发现股匪甚多。窜抵潘家口一带之口外胡匪，已被当地保安队解决，惟当地民间损失颇巨。喜峰口等地股匪，亦于二十九日被迁安、遵化两县保安队及民团包围痛剿，是日晚窜出喜峰口外。玉田王继宗叛变民团其窜抵迁安新集镇附近之一股，亦被民团驱散。现长城各口情势仍极安靖。（三十日专电）

《申报》中华民国24年4月15日（1935年4月15日）第三版报道：

天津　九日早，遵化红山口〔洪山口〕外发现之股匪三百余名，为王继宗残部，由刘桂堂



部王庆芳统率，经迁安县境西窜，沿途抢掠七十余村。迁安红崖岭被焚民房三百五十余间，架去人票十余名，村民死者七。（十四日专电）

《申报》中华民国24年4月20日（1935年4月20日）第三版报道：

天津 王继宗残部仍由刘桂堂部匪首王庆芳统率，盘踞遵化城北三十里设神台〔舍身台〕方面。每于夜间窜扰附近各村镇，烧杀淫掠，居民受害者数百户。顷周毓英、王占元两部保安队遥取包围势，匪据山险顽抗不退。遵化四乡民团均抽调至县城增防，城内检查行人，宣布戒严。（十九日专电）

《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12日（1935年5月12日）第三版报道：

天津 长城北半壁山、红山口〔洪山口〕各处红枪会、大刀会匪，土匪、变匪，啸聚日多，声势殊大。马兰峪日军宫间部队百余名，协伪军一队往剿，并有伪热河凌南驻军一队，驰抵长城外防堵。日军在马兰关长城口设防，城头遍插旗帜，八日禁绝行人出关。长城北大刀会匪，八日与伪军发生激战，匪被击溃北窜。当夜卷土重来，攻兴隆山北鹰守营〔鹰守营子〕。双方发生巷战，枪声彻夜不绝，民房为流弹著处，起火多所。马兰峪日军对会匪取大包围式，仅留西南一路，欲将匪驱入我遵化迁安境内。（十一日专电）

天津 八日，长城北大刀会匪一部，受日伪压迫，向南窜逃。经我遵化驻屯保安队王占元部迎击，匪复退往口外。擒获会匪十四名，就地正法。遵化七日起，全县境戒严，县长何孝怡檄调各区民团，集结红山口〔洪山口〕、罗文峪一带扼防。长城线各潜伏匪股均蠢动，人心惶惶，马兰峪迄遵化间难民，向内地逃避者极多。（十一日专电）

天津 遵化县长何孝怡十日晚电省，请饬周毓英部保安队速开往协防。刘桂堂匪股沿遵化北境烧掠甚惨，各村悉成瓦砾场，妇女被奸杀者无数。匪每到一村，先举火开枪，村民窜逃则迎头击毙，遵化迤北随处皆有尸体。（十一日专电）

如果上述报道因倾向性或有可能存在的夸大问题难以判明当日实际情况的话，我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2005年8月，我到遵化小厂乡毛山沟村采访，遇到当年被土匪绑走的傅连明老人，他讲述了亲身经历的土匪的暴虐情况：


图128 1935年5月12日被土匪绑走的傅连明老人。2005年8月

“我那年11岁，已经会牵牲口了。那天是四月初十，我正给别人家种地。一亩地还没种上呢，我

们这西大梁上，北山堡的团就站满了，往北打。土匪在松棚营后山，人家枪好，有一挺机枪，咔咔，往那西大梁一打，把民团吓得都退下去了。土匪追到鸡鸣村，点着三间房子，在葫芦峪那儿点着一间，在这儿点了几间，松棚营还点来的呢。团退走了，土匪翻回去，往他们住的那庄走了。我们这种地的也不敢种了，枪响了，看得真真地，还敢种？就回家来了。我从南边胡同那儿过，有块石头，坐那上面歇会儿。不大会儿，过来四五个人，不知他们从哪边过来的，对我说：'起来，起来，起来！'正赶上我爷爷死，要穿孝褂不是，把它弄起来，朝我的脖子上这么一拴。一块被绑走的，还有我爸爸和我一个亲叔叔。我爸爸当时正出来。跟前一个小名叫'迷柱'的，也给绑去了。后台子还绑了一个。匪绑了我们，就押着上后山了。到了梁上，跟我们说：'坐下！'共计六七个匪，不多，是小拨匪。大拨匪都在庄上住着，出来几个小拨在外面转悠。要什么呢，跟我们每个人要300块现大洋、几两大烟、几两白面，把我们都弄树上了。'要不给啊，赎不回去，都打死你们！'这么说的。那咋办？我爸爸一个劲儿好说歹说，说好听的：'放出几个人去，我们给你们办钱去，办白面去。'土匪欢喜了：'中，那好。'挨个问。我们对面街里子不会说，说话倔，他说：'我一个子儿也不趁！'你跟土匪这么说还中？他不爱听不是。人家把枪一指：'我给你个子儿！'我爸爸赶紧说：'别这样，别这样，老总啊，他不会说话，我们也给他办钱去。'这一说好听的，土匪把气消了，枪就收起来了。又问第二遍，问到他，他就挨着我趴着来的，土匪让我们都趴着。土匪问他：'你准备预备多少大洋？多少大烟？'他脸朝上，冲着匪，还是那句话：'我一个子儿也不趁！'那土匪没容说，把枪一顺，'当'一下子，把他给崩了。唉呦，我这一瞅，我才十一不是，咋着，打死了？之后，把我爸爸，另外一个是谁记不清了，给放回家，办大洋、大烟、白面，把我们这一群人都绑到庄上去了。现在我还记得那地方呢。住了好几天，就等着大洋、大烟、白面送过去。上哪儿找去？还别说大烟、白面，就这300块现大洋都找不来啊。后来一两个土匪还上我们这儿来了一回。问我爸爸：'你们办去了没有？'说：'办去了。'告诉后，他们就回去了。后来我爸爸活着经常说：'这回干了（方言，即坏了之意），他们还得来。办不来，咋办？人还不都得崩了？'我奶奶那时还硬朗，他就跟我奶奶说：'土匪再来了，告诉他们，我去给他们办大洋这些东西，在城里让兵们给抓住，押起来了。'我奶奶就记住了。过了两三天，晚上，我爸爸去被绑的各家串门去了，土匪来了好几个。问我奶奶：'你儿子呢？'我奶奶就说：'给你们办钱去了，让城里的兵给逮住了，押起来了。'那土匪气得把腿一拍：'你知不道那是犯法？你让他们逮住还中？'气就小了，比不办强是不？这天晚上，土匪出门就走了。"

根据民国报纸介绍，当土匪在遵化北部肆虐时，遵化县长何孝怡用来围剿的武装力量只有驻遵化保安队王占元大队一部、战区保安队周毓英部一个中队及民团数百人。他虽电请河北省

政府派更多武装前来支援，但周毓英部其他警力及新编河北省特警队张庆余部都是5月17日左右才抵达遵化，投入剿匪战斗的。

大概由于援助力量迟迟不能到达，土匪的残暴又不稍减，不忍见民众每日都在死亡，存活者"露居野处"，状极凄惨，于是何孝怡想到了借助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力量帮助剿灭土匪的办法。

根据原遵化小厂乡大块地村村长方宝青老人的回忆，抗日救国军确曾与土匪交战过。

"土匪乱抢，杀人。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说话侉，我们都叫他们'侉子匪'。是散兵组成的，都穿军服，骑马，装备挺好。民众（即抗日救国军）曾用抬枪杆打侉子匪。侉子匪马队从房山沟往这边来，民众在九虎岭后面埋伏着，洋桶里搁着鞭炮。看见了就放抬枪，再装火药来不及了。侉子匪把民众追散，在庄头抓住七个，杀了。"2006年4月，我到大块地采访，方宝青老人说。

抗日救国军攻打土匪的情况在刘秀存的回忆中也有记载。1987年3月8日，他在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介绍：

"进口前半个上下月，我们来了两个小队，进马蹄峪，绕到粳子峪西梁，来打马拐子匪。到松棚营西梁，迎面来了几个人，拿着县长的名片，传话说：'情况有变化，你们还是回到口外去。'接到县长的名片，不让打马拐子匪了，咱们撤到青杏沟。"

何孝怡为什么出尔反尔，又不让抗日救国军打土匪了呢？

结合5月15日抗日救国军正式进关后何孝怡的表现，及毛山战后何孝怡到保定去见于学忠时的心理状态，我推测，何孝怡已经提前获悉日军图谋将孙部驱入关内，之后在低山丘陵地带利用空地打击优势将其彻底消灭的消息。日军的计划如果得逞，将带来两个严重后果：①孙部被剿灭，至少遭受重创。②因《塘沽协定》签订而暂时平静了两年的中日之间将再起纷争，以日军的狡诈、无耻、蛮横，惯用"谋略"制造事端和长于蚕食的特点，很难预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两者之中，以后者让何孝怡感到压力最大，因为他是河北省遵化县县长，一旦因邀孙部入关，给日军进入中华民国领地以口实，发生外交纠纷甚或导致军事冲突，他将难辞其咎。

那么是谁将日军的动向告诉何孝怡的呢？

这一情况比较复杂，既可能是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也可能是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也可能是第三方，比如他自己的情报系统，或者日军、日本驻华使馆官员、日本驻华记者中他的同学、朋友，因为他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

如果排除第三方的可能，只在于学忠、殷汝耕两人中选择，我倾向于殷汝耕告知何孝怡日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原因是：殷、何之间私交好于于、何。殷汝耕有一个特点，对世交或朋友的孩子照顾得都很周到。他之所以将何孝怡推荐给黄郛，在何孝怡辞职后，让他担任自己的



图129　殷汝耕（照片提供：北京市通县档案馆）



图130　晚年刘秀存　2002年7月

助理秘书、主任秘书，不久又将其外放至遵化当县长，和何孝怡的叔叔何公敢与殷汝耕为留日时期的同学有关。当日军的意图已经清楚时，他很有可能提前将情况告知首当其冲的何孝怡，让他注意妥当处理，避免卷入漩涡之中。

殷汝耕怎么会比较早地知道日军的意图呢？

南京政府（一说是黄郛与于学忠相商）将《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地带划为两个专区：蓟密区、滦榆区，各设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受黄郛任委员长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和河北省政府双重领导，其目的就在于“应付所谓‘特殊化’环境，处理与日本的交涉事项”。殷汝耕自1933年9月（一说11月）开始担任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职务，与日本驻平公使馆的书记官、武官接触较多，私下里又爱结交逢迎日本的浪人、记者、走私商人，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说殷汝耕在毛山之战前便已背叛国家，但他有比黄郛、于学忠要多的渠道可以提前获悉日军的动态、意图，应是没有疑问的。

由于殷汝耕较早地将日军的动向告知了何孝怡，何孝怡为避免出现我上面说过的两种后果，作出了不再请抗日救国军剿匪，让其退回关外的决定。但由于现在不清楚的原因，他未向抗日救国军明言，造成了他被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全体认为是出尔反尔、不守信义之人的印象。

根据刘秀存1986年10月、1987年3月分别向遵化党史办马秀山、李永春先生和兴隆党史办佟靖功先生所作的回忆，孙永勤曾经迁怒于何孝怡。由于1987年的回忆细节较1986年丰富，现援引1987年的讲述如下：

“旧历四月十几（公历35年5月12日以后），我们从马蹄峪进口。进来后直接住到西小

寨，晌午到的。我站岗，来了一个戴大草帽的，找孙永勤，上身是白汗褟，下身穿蓝裤子，30左右岁，中等个，口音有点侉。见了孙永勤，不大一会儿就走了。工夫不大，李连贵让拨18个人，是孙永勤给的任务。18个人里有我，带队的是我们大队稽查长徐连芳。他对我们说：'给咱们一个任务，去抓县长。把县长抓回来，粮食弹药啥都有了。咱们去时注意，手枪插在后腰，每人背着干草和柴，每人柴草里一棵大枪。'我们歇头歇前进的县城东门。保安队把门，问：'啥时候还进城？'我们走到东街道北的陈家饭铺，看见东门关了。我说：'快往南走，露了。'我们来到南门，南门正在关。徐连芳'啪'一枪，打倒一个，我们跑出去了。刚出南关栅栏，城楼上的机枪扫下来。没扫上，我们跑回西小寨。

"背柴进城回来的第二天，孙永勤又派三个人进城给县长送信。时间不大，就给送来一花轱辘车大米，还有猪肉、枪、子弹。说不清是从县城送来的，还是从别处送来的。从西边来的，我是从庄头上看着的。车上套着两个毛驴子，驾辕的一个，拉套的一个。车上有枪，还有子弹箱子。车上有两个人，都是30上下岁，脸盘挺新鲜，不像老百姓，穿着漂白布汗褟、青裤子，衣服像老百姓。"

需要说明的是，刘秀存1987年3月的回忆和半年前他对马秀山、李永春先生所讲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戴大草帽人来找孙永勤的时间。在1986年10月的版本里，戴草帽人是在孙部18人从遵化南门撤出、回到西小寨后去见的孙永勤，时间是傍晚以前。我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一点呢？①希望读者知道刘秀存两次的回忆并不完全一致。②戴草帽之人在抗日救国军刚进入遵化便去见孙永勤，和18人出城之后才去见他，对了解何孝怡、孙永勤当时的心理状态意义不同。前者说明何孝怡已明白无误地知道危险愈来愈近，派戴草帽之人去见孙永勤，很可能是让他尽快离开遵化，免得正中日军下怀。由孙永勤在来人走后，立即派18人进城抓县长和第二天早上又派人进城给县长送信看，他显然对何孝怡的警示没有在意。他胸中只有何孝怡不守信用、一直在戏耍抗日救国军的愤怒情绪，他要把何孝怡抓来当面质问，让他履行前言。在经历孙部派人进城抓他、送信两件事后，何孝怡派人送来大米和枪弹，有他理解抗日救国军困境的心理在内，同时也有表露蒙受了冤屈，但又无法辨白之意在内。后者则说明何孝怡根本未想到孙永勤还是进了关。当18人撤出后，他马上安排戴草帽人去见孙永勤，很可能是告知孙永勤不让他进关的真意。孙永勤了解了情况的严重性后，经过一夜考虑，可能寄希望于何孝怡尽可能帮助补充一些军需再回到关外，于是第二天上午，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刘秀存向马秀山、李永春先生回忆："孙永勤派两队战士，带一张写有字的纸，听说是向县里要军需物资的意思，我们把信扔进了城门里边就回来了。"

何孝怡接信后，随即给抗日救国军送来的大米，据刘秀存向马秀山、李永春先生讲，有两千斤。"反正中午吃的是大米饭，就是那项米。"刘秀存说。

这应是抗日救国军进入遵化以来，吃的最饱的一顿饭，同时也可能是他们在覆灭前所吃的最后一顿饱饭。

除两千斤大米外，据刘秀存介绍，何孝怡还送来两支枪、两箱子弹。这大概是何孝怡当时能为抗日救国军所做的全部事情了。我怀疑当他接到孙部战士投送的书信时，心里因为孙部知道敌情后尚不赶紧安排回到口外山中，一定要补充些械弹再走，已经有了无力回天的感觉。当运送物资的花轱辘车驶上通往西小寨的道路时，他已经看到了孙部很难挽回的命运。我个人猜测，他当时极可能长叹了一声，既为孙永勤部，也为自己，还为中日之间无法预见的未来。

3. 老陈、刘玉林等人为冒进盲动思想占据了头脑。

根据李子华在《革命回忆录》中的回忆和他为《孟家铺村史》所写的文章，中共冀东区党委的老陈、刘玉林等三人曾要求孟家铺区委以进关作为发给孙永勤委任状和武器的条件。由老陈等被派到遵化的任务是组织游击队，到孟家铺后便要求李子华等与孙永勤联系来看，他们极希望将抗日救国军变成中共可以掌控的一支武装力量。即使暂时无法将其拉入中共阵营，至少也要将其变成同盟者。然以1935年时期中共在冀东的弱小的现状，他们不是不知道发给孙永勤委任状易，但给他补充军火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能给他送去十几支枪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老陈等为什么还轻率地向孟家铺区委发出指令，要他们答应孙永勤的条件，调他入关呢？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当孙永勤真的进关后，老陈等人向冀东区党委汇报却迟迟不回，致使李子华等只能用萝卜私刻公章，给了孙永勤一张任命他为华北抗日军第一军军长、王平陆为政委的委任状，但向他承诺的第二项——至关重要的枪弹问题，却无法给他，使孟家铺区委直接失信于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既然实力不够，又想调孙部入关，那么孙部入关后如何应对无法为之解决枪弹的局面，为什么连方案也不给孟家铺区委一个呢？

尽管孙永勤抗日一年半中，外部真正帮助过他的组织或势力只有中国共产党，孙永勤牺牲后，努力宣传他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然在调动孙永勤入关问题上，我却要说，老陈、刘玉林等共产党人的举动实在太过轻率。当然在主观上，他们不可能希望这样一支武装被日军消灭，然而他们带有“左”倾盲动味道的莫名其妙决策的结果，却使孙永勤在何孝怡的支援之外又无端生出一个希望。当孙永勤怀抱两个梦想调动大军进入关内时，这两个希望却像水上的泡沫相继破灭。之后等待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的，只有被动地被日军追击，被战区保安队和新编河北省特警队堵截，战斗、战斗、战斗，直到退至毛山一带，被日军发挥空中和地面优势，将其“剿灭”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老陈等人客观上帮助日军消灭了抗日救国军。

顺便说一句，委任孙永勤为“华北抗日军第一军军长”一事，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在编写《冀东革命史》关于孙永勤抗日一节时未予采用。2005年6月我到唐山采访李成民先生，他向我介绍了当年讨论这件事情时的经过：

“李子华回忆私刻公章、委任孙永勤一事听说过，但我们没采纳。因为即便有此事，也不符合逻辑。为什么要把他调到关里来？目的是什么？我们查不到主要根据。是关里需要武装力量吗？当时冀东区委有力量驾驭那么大一支队伍吗？我们几个人研究过这事，虽然不能说有点滑稽，反正最后没有采纳。”

由李成民先生的话可看出，老陈、刘玉林等人的决策匪夷所思，不仅对我而言是这样，1993年《冀东革命史》出版之前，就已在深深地困扰着冀东地区的党史工作者。有关老陈等人作出调孙部进关决定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期待有新的资料发现。如新资料证明，那一决定的作出确实是“左”倾盲动思想影响的结果，那么导致他们头脑发热的原因则当深入剖析，罔顾当时的革命斗争实际，轻举妄动，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则当深深吸取。

以上是我对孙永勤率队进关原因的介绍。总结起来就是：孙永勤发现枪弹服装问题已危及抗日救国军的存亡，而这两个问题在热南山地很难解决。恰在这时，遵化县长、中国共产党都向他示意，只要他进关，便可为他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他决定入关。

产生了这个想法之后，他是毫不犹豫，马上入关的吗？

尽管不少抗日救国军战士晚年回忆孙永勤时说他“胆子大”、“说打就打”、“有勇无谋”，但我认为他还是经过了认真思考的。

1987年3月8日，抗日救国军战士刘秀存对佟靖功先生回忆：

“孙永勤带队过来，到青杏沟与李连贵商量进关。李连贵不愿意进关，在青杏沟呆两天，八、九队从北边过来，这才随着孙永勤一起进入关内。”

需要说明的是，刘秀存这里讲的从北边过来的两个队，按照抗日救国军战士常久芳的回忆，是康永贵、何广永两个队。“康永贵带着40多人，是第五队。”1989年1月23日，常久芳对佟靖功先生说。至于何广永，一种说法他是第九队长，另有一种观点他是第七大队长。兴隆高印臣老人1989年1月21日向佟靖功先生回忆：“李连贵是四队长。何广永也到过咱们这儿，那时何广永就是一个当家的，他是九队长。”何广永弟弟何子桥（原名何广森）说何广永是第七大队长，事见1961年11月15日他对王桂荣的回忆。由于只闻抗日救国军有第四大队之说，未听说有第七大队，所以我认为“第七大队长”应是“第七队长”之误。

孙永勤是在青杏沟停留两天，与李连贵、从北面过来的另外两个队同时入关，还是孙永勤先进关，李连贵等在两天后才开入遵化，刘秀存未明言。他于六七年前去世，无法再向他了解。原遵化党史办副主任马秀山先生在他生前发表的《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被日蒋“协剿”的基本经过》中，说孙永勤先于李连贵等两天进入遵化，作为一说，供读者参考。期盼有志者能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调查。

不论是同时进关，还是先后开入遵化，由孙永勤专程来找李连贵商谈一事，都应看出孙永

勤对进关之事还是持非常慎重的态度的。

孙、李在青杏沟的商谈，是孙永勤进入遵化前最后一次审视自己的决定。他关于抗日救国军生死命运的思考应在驻扎老梁时期日伪加大“围剿”力度时便已开始了。老梁突围过程中很多官兵的逃亡及突围后与日伪在今承德县、承德市境内进一步交战的体会，加深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力度。

根据兴隆县张杖子张如山老人回忆，孙永勤直到农历1935年春节时，仍是准备在冀东长城北面的几座大山中与日伪做长期游击战准备的。

“过了旧历年（指1935年农历春节——编者），”1986年11月8日，张如山对佟靖功先生说，“孙永勤来我们西屋找杨佩之老师。杨老师当时二十八九岁，他是宽城县的家，师范学校毕业。孙永勤找到他，让他跟着去。杨老师说：‘让我去也行，你得听我话，得围月亮庵、五指山、棒槌山这些架大山转。转下二年去，紧急时要跨县界、省界。’”

按照张如山老人的说法，孙永勤一口答应了杨佩之的条件，这才有杨佩之同意当孙永勤的先生——佟靖功先生说是当孙永勤的文化老师，参加抗日救国军之事。他后来还跟着孙永勤上了毛山。

杨佩之，据兴隆王宝石关元奎老人介绍，他是宽城岳王庙地方人。曾在王宝石教私塾，“会摇卦，算出门顺不顺，仗怎么打”。据他的学生——孙杖子孙中彦的父亲孙文云生前讲，他还会日语。

杨佩之后来之所以到张杖子教书，据他另外一个学生——张杖子陈永会老人介绍，是张如增把他请来的。“杨老师大中个，寸头，面貌精神。庄稼衣裳，夏天穿白的，冬天穿青色（即黑色）、蓝色。上《论语》、下《论语》、《诗经》，那么厚一摞，能一背到底。教学有办法。一个老师教四五十个学生，叫复式班。全靠学长，学长叫孟广书，他从清河带过来的。杨佩之做总指挥，长篇大论的他讲，《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大学》、《中庸》，杨老师就靠孟广书。前面有一黑板，就在他跟前，记分用。学生上课出去溜达，他不说，记分。有错误就记上，一星期一统计。他在炕上一坐，有一花椒树板子，要是打手的话，是100板，手都打出泡来。要是打屁股的话，打十板。学生见他，跟耗子见猫似的。”2008年7月21日，我到张杖子采访，陈永会老人说。

孙永勤为什么向杨佩之承诺了不脱离热南山地，在仅仅三个月后便开始改变主意，要带全军到关内呢？

据李连贵哥哥之子李山1989年向佟靖功先生回忆，抗日救国军开入关内后，他曾和哥哥李儒到遵化城东去看望李连贵。临出家门时，父亲李连福对他说：“你二叔去口里，没有大山，能行吗？你们去让你二叔回到口外来。”连李连福这样一个普通农民都能看出关内不利于抗日

救国军作战，孙永勤为什么几乎是一意孤行地选择了进关的悲剧之路呢？

围绕孙永勤带全军进关是否正确的问题，至今没有一致的答案。持他不该进关观点的占大多数，理由与李连福意见基本相同：关内地形不适合开展游击战。佟靖功先生独持异议，认为孙永勤作出的是正确的选择，他的观点是：热南山地必须与冀东平原相结合。

“过去对孙永勤为什么要到口里去，都不太理解，等宋时轮、邓华支队来才有了比较。他们人数和孙永勤队伍差不多，也是5000多人，并且是八路军的劲旅，可是他们来了之后，在平谷、兴隆、遵化、迁安这一带和日军作战了两个多月，不行，站不住脚。像这样精锐的八路军部队都站不住脚，最后又返回平西根据地，只留下三个小支队在这儿活动，这是一个比较。再一个，李运昌将军组织冀东军分区的主力十二团、十三团在冀东活动。1941年6月，他带这两个团走到玉田南部，被敌人包围。十二团团长陈群是老红军，非常英勇，那次受了重伤，不久就牺牲了。十三团一个营保护李运昌，其他人把枪全都插了（即藏起来之意——编者），藏入民间，换成便衣才出来的。两个团，一个是人员遭受很大损失，一个是武器受到很大损失。李运昌带着一个营，非常艰难地突围。出来后，李运昌将军反思这次行动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同时向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请示。军区、聂司令员指示：开辟冀东要注意，冀东必须与热南山区相结合。如果冀东平原不能以热南山区为依托，就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也难以建成稳固的根据地。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李运昌接受上级意见，认真总结1941年夏季教训，决定大力开辟热南。所以从1941年秋开始，组织开辟宽城、兴隆的长城工作团和开辟青龙、平泉的青平工作团。李运昌把很多部队化整为零，变成工作队，带着药、粮食、布匹到热南地区发动群众。李运昌将军亲自过来，在兴隆、青龙的结合部艰苦工作了七个月。从1941年秋到1942年冬，一年多，在雾灵山以东、都山以西建立了700里的山区游击根据地。

“后来，每到敌人搞‘强化治安’，用重兵‘扫荡’冀东平原的时候，冀东的领导人、主力部队都转到青、兴等这一带热南山区。等到敌人‘扫荡’过去，领导人、主力部队又回到冀东平原。到平原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扩大基本根据地，解决大部队的衣食住行



图131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左一）、副司令员包森（右一）

等军需问题。到热南山区，主要是为了回避敌人的锋芒，保障我们这支壮大的队伍能够存在下去。所以我们‘冀热边’这个名字是非常确切的，在李运昌、李楚离等冀东党政军领导同志的艰苦的工作之下，我们的根据地发展为冀热边，后来从冀热边发展为冀热辽、冀察热辽，从两个主力团发展到几万人的大军。等到抗战胜利时，冀察热辽根据地已经成为全国十九个重要的根据地之一，并且在接收、开辟东北的时候，起到了捷足先登的巨大作用。

“所以总结从孙永勤将军到李运昌将军，从冀东平原到冀察热辽根据地，结论是：热南山区必须和冀东平原相结合。一个山区，一个平原，一个要着重解决隐蔽地，一个要着重解决物资，这就是相辅相成的作用。回过头来看，孙永勤往南发展，大方向是对的，也是必要的。因为他那时已有5000多人的队伍，在蘑菇峪、马架山一带已无法解决军需问题。他那次挺进口里没有成功，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卖国，何应钦、殷汝耕卖国。假如他们不卖国，接纳了这支部队，孙永勤将军的队伍就可能发展成为一支更强大、更精良的部队。”

佟靖功先生的由日后难以计数的八路军和冀东民众的鲜血提炼出来的观点，除蒋介石、何应钦卖国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被发现，值得商榷外，其他我完全赞同。由此也令人想到一件事情，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便到北京任职的原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为什么念念不忘孙永勤，多次“请”承德地区的党史工作者深入调查孙永勤英雄事迹，努力宣传孙永勤的爱国精神？我猜想这和孙永勤是热南、冀东北部地区抗日斗争规律的最早摸索者，他以他的牺牲和抗日救国军战士的牺牲为冀东八路军和冀东民众提供了有益的镜鉴有着重要关联。

“在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上，有这样一个情况，”唐山党史办李成民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驻伪‘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和驻华北的天津驻屯军在部署上，步调很多时是不一致的。孙永勤能存在那么长时间，之所以被中共中央誉为民族英雄，和他充分利用两边的不协调这个战略思想不无关联。”李先生说，日后冀东八路军在长城沿线的“千里无人区”进行斗争也是充分利用了冀东长城南北日伪部署的不协调。“满洲军是满洲军的部署，华北军是华北军的部署。我们抓住了这个步调不一致，充分利用了所谓的两国的边界的不协调，发展我们自己，壮大我们自己。”充分利用伪“满洲国”和中华民国统治区内日伪的步调不一致开展抗日斗争，与冀东八路军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军区的正确指导有关，但和孙永勤抗战经验的实际启发应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利用长城南北日伪部署的不协调开展抗日斗争，是孙永勤在热南山地必须与冀东平原相结合以外，给冀东八路军和今人留下的第二个遗产，值得今天及后代的人们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孙永勤利用长城南北日伪部署不协调而进行抗日的特点在其活动的后期也为关东军所掌握。从孙永勤在老梁驻扎期间开始加大对他的“围剿”力度，乃至最后在关内将其消灭，正是有针对性地利用他的弱点，发挥己方优势的结果。援引关东军司令部起草的一段



文字证明此点。

《大同报》康德二年5月27日（1935年5月27日）第一版发表了一篇文章，其前半部分如下：

关东军司令部发表，〇〇本部队，自五月初旬以来，即以山田部队实行讨伐兴隆县方面猖獗之匪贼。该方面山岳重叠，部队行动极为困难，故讨伐殊难进展。缘此方面有自称救国义勇军之孙永勤一派，受国外援助，时出入于长城内外。前此虽有驻屯之杉原本部队之讨伐，而该匪巧避锐锋，势力得渐次增大，现在号称一千。山田部队长鉴于此处之地形与匪贼之特性，乃以小部队分散于广大地域，以包围匪团，而逐次缩小包围圈。匪贼以此随地受大打击，两周间匪死二百余，而孙永勤则突围逃往长城线外。其部下亦相互联络越长城，十八九集会于遵化附近者约四百名。查孙匪之惯用手段，每被穷追，则逃往华北，势盛则再逃回热河，以故讨伐热河，最为困难。孙匪之讨伐，现已为第三次。〇〇部队长以为，苟实于热河治安，不拘所在地如何，亦不许其存于天壤间。故根据望〔皇〕军大方针，而决心进兵于华北。于是令山田部队集合于奇望峰南方撒河桥〔澈河桥〕并罗文峪南方下营附近，准备讨匪。

回到前面正文，由于已经认识到，只有向南进到富庶的冀东地区补足军需，才能继续回转热河与日军鏖战，所以尽管李连贵出于他的军事直觉不同意进关，雷永兰出于感情因素和对他的生命安全的考虑，不愿意他去遵化，但孙永勤在认真考虑后，还是决定率队进入长城以南地区。他未想到的是，日军此次“剿灭”他的意志是如此的坚决，他的部队的弱点在冀东低山丘陵地区暴露的是如此的明显，以致进入遵化不过十天，便遭到失败的命运，令后世的英雄想起来，不禁泪湿衣衫。

关内十日记

从1935年5月15日进关，至24日毛山之战失败，抗日救国军在冀东长城以南地区只生存了十天时间，便因日本和国民政府华北当局的联合“围剿”而覆灭。

为清楚地了解5月15日至24日这十天中，抗日救国军的活动过程及日军、国民政府华北当局“围剿”他们的过程，现以大事记的方式将我所看到、采访到的情况记述如下。

1935年5月15日（中华民国24年5月15日）：

孙永勤率抗日救国军进入长城以南根据《塘沽协定》设立的“非武装地带”。

孙永勤本人的出发地，按照其妻子雷永兰的介绍，是他的家乡孙杖子。



图132　洪山口长城　2002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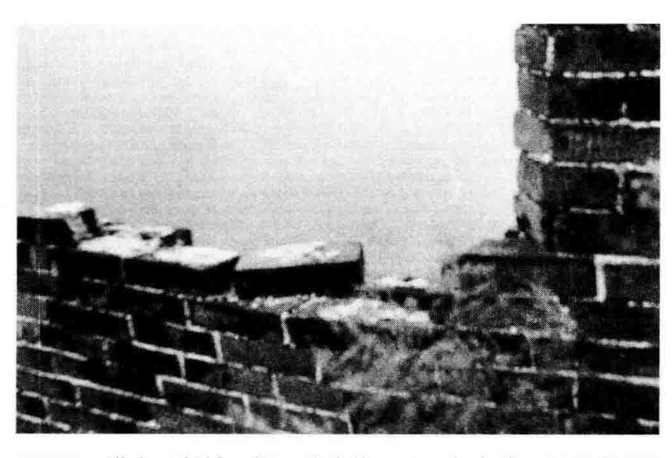


图133　洪山口长城，垛口外隐约可见一条小路。1935年5月15日，孙永勤率一千余名抗日救国军战士由此路进入遵化。2002年7月

动身之时的情形，雷永兰在不同的时间曾做过三次回忆：

第一次是1974年12月25日，采访者不详，材料保存于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

“我今年73岁。在我32岁那年，孙永勤最后一次从家走的，也就是那年他牺牲的。当时我大儿子14岁，二儿子11岁，三儿子刚生下来一两个月。在我家门口，他骑上马临走时，我大姑娘问他：‘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他没有回答她。他转向我说：‘把几个孩子好好经养着，别让他们当亡国奴。他们要是当了亡国奴，我回来杀了你。’”

第二次回忆为1980年前后，采访者为从言己。整理后以《保中华洒热血的民族英雄》为题发表于承德地区文联编《燕山》杂志1981年第2期。

“1935年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此处时间有误——编者）早上，永勤把抗日



救国军的全体将士5000多人集合到我们家的后台子上。他还是站在起事讲话的那块大石头上，对大家说：‘全体将士们！今天我们要向遵化进发，到那儿改善武器装备，然后到蓟州的盘山找红军去。’队伍立即就像开了锅的水一样，听说找红军去，心里很高兴。永勤接着说：‘我们这支队伍从起事的第一天起，就是打鬼子、除汉奸。这次行军还和以前一样，不许动老百姓的一根草刺儿，违者以军法处置。’永勤从带兵那天起，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经常教育干部战士要爱护老百姓，不许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有一次，一个战士拿了老百姓的东西，永勤把他关了15天。部队临出发的时候，永勤几次叮嘱我，让我放心，不要惦着他。我看着他那礼帽上的十几处枪眼，扶着他那患重病的身子，实在叫人心疼。可他是硬汉子，骑上那匹和他出生入死的枣红马，就带着队伍出发了。

“我站在村头望啊，望啊，队伍已经走远了，我还在望个不停。”

第三次回忆时间是1982年10月11日，采访者未留下名字，材料原件保存于兴隆县史志办公室。

“1935年阴历（原文如此——编者）的一天，永勤集合全部官兵，说要拉到遵化去战斗，然后找红军。部队这次是二道方向，我不能去。临出发时，永勤几次嘱咐我：‘你放心吧！不要惦记我，好好照看孩子，让他们快长大成人，好打鬼子。’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失声哭了起来。队伍出发时，我站在村口恋恋不舍地望啊，望啊，直到队伍看不见了，我还在默默地望着。”

上引三次回忆中，以第一次最为符合我所了解到的孙永勤的大男子主义性格，因此我认为第一次最真实。第二次、第三次回忆明显有采访者加工的成分和时代的烙印在内，影响了我们对孙永勤进关目的和他出发时真实心理的把握。然第二次、第三次回忆中雷永兰作为孙永勤妻子，她的个人感情的流露则应是真实的，未经过多修饰。

雷永兰在上述三次回忆中，都有一个情况未明言，就是孙永勤带队从孙杖子出发后，是直接进了关，还是先到青杏沟找李连贵，之后才去长城以南。如果他是直接进关，那么根据上节引用的刘秀存的回忆，他应是从青杏沟回到了孙杖子，在孙杖子召集队伍后直接入关；如果是后者，那么雷永兰介绍的动身之时的情形则是对孙永勤离开家乡和妻子儿女，前往青杏沟之前的回忆。真实的情况是这两者中的哪一个，由于我看到的所有材料中都没有记载，雷永兰于1991年去世，刘秀存约2003年或2004年去世，现已无法核查清楚。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雷永兰回忆的是孙永勤牺牲前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情景；不管是直接进关还是先去的青杏沟，孙永勤是5月15日进入的长城以南地区。

说孙永勤5月15日进入长城以南地区的依据，是曾引用过的“关系方面”的那篇通稿，在5月26日的中华民国各主要报纸刊登的这则消息中说到，5月5日下午3点，日军因决定铲除孙永勤部，唯恐误会，请驻遵化的保安大队王大队长将队伍暂移至长城南25里处，罗文峪方面防务

交给日军。保安队于当日晚间撤回县城，日军随即在罗文峪内设置司令部，很快又迁设于潵河桥北三道河，但未通知王大队长接防。“我方正派员与日军接洽填防中，而孙匪遂乘虚于十五日窜入关内，到大圩侯家寨等地纵火焚烧，奸淫虏掠。”

孙永勤本人进关的具体地点，根据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的回忆，为遵化洪山口。据他1983年向栾福忠先生介绍，从洪山口进入关内的抗日救国军官兵有1000多人，即孙永勤所率领的一路队伍有1000多人。此1000多人加上李连贵部500左右人，八、九队（一说康永贵、何广永队）还有部分人马，与中华民国及日伪报纸所载的进入关内的孙部武装共约1600人基本相符。

洪山口长城孙部进关处，我共去了三次。第一次是2002年7月10日前后。我去的那天，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攀上道路南侧的洪山口长城的断壁残垣，从垛口朝外望去，一条细细的白线在雨雾中若隐若现，从东北方向由远而近伸展过来，那就是孙永勤部进关之路。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我的头脑中不知怎么浮想起了《诗经》中的这句诗。

67年前，孙永勤从那里入关，他能想到九天后，他便会被日本侵略者和自己热爱的中国的政府联合“剿灭”了吗？

近七十年前，他从那里进入长城以南，他能想到从此之后他再也不能回到热河故乡，再也无法见到热爱他的妻子和泪眼婆娑、望眼欲穿期盼他回去的孩子了吗？

从洪山口进关后，孙永勤所率队伍的行动情况有几种说法。

一、孙文炳回忆是，部队进洪山口后就在三个人口比较多的村庄住下。“派三个村子吃饭，我们派200多人带足弹药去遵化城取枪。敌人把守遵化县城，架好机枪，说没有枪。我们回到鸡鸣村”。之后是在鸡鸣村开会，领导人商量队伍去向。第二天早上毛山之战便发生。抗日救国军本在遵化停留十天时间，但在孙文炳的回忆里变成了两天，明显地与历史不符。因为这个原因，我曾怀疑孙文炳说的到遵化取机枪之事是否发生于5月15日。后在抗日救国军战士张凤林的回忆录中看到，在叙述完一路队伍从洪山口进关，一路从刁山进关后，他紧接着说了一句：“咱们有120人的马队，咱们去遵化城，城门紧闭。”由这个情况判断，孙永勤进关当日确可能派人马到遵化城索要过武器，这与他来遵化的目的和心情相符——他之所以进关，就是要补充军需。联想到李子华也在写给《孟家铺村史》的文章中说过，孙部大白天骑马进城，那么，即使孙永勤不是15日进入遵化当天就派人进城，但曾派人去遵化城要枪这件事也可判断确实发生过。

二、原遵化党史办副主任马秀山先生说，孙永勤从洪山口进关后，“经驻尤山口三道沟，

迂回迁安境后，复入遵化小于沟、柴户场、王家沟一带”。并说，和孙永勤自洪山口入关同一天，张福义、何广永、康永贵等也从马蹄峪入关，“直抵遵化境大屯、侯家寨一带”。大屯，即前曾引用的5月26日“关系方面”通稿中所写的“大圩”，在侯家寨村东南两华里处。马秀山先生说这两个村庄有抗日救国军驻扎，与“关系方面”通稿相吻合。但说张福义也在当日入关，不知依据为何。如果伪满《盛京时报》5月22日第十二版的报道属实的话，那么当日张福义应还在今承德县大营子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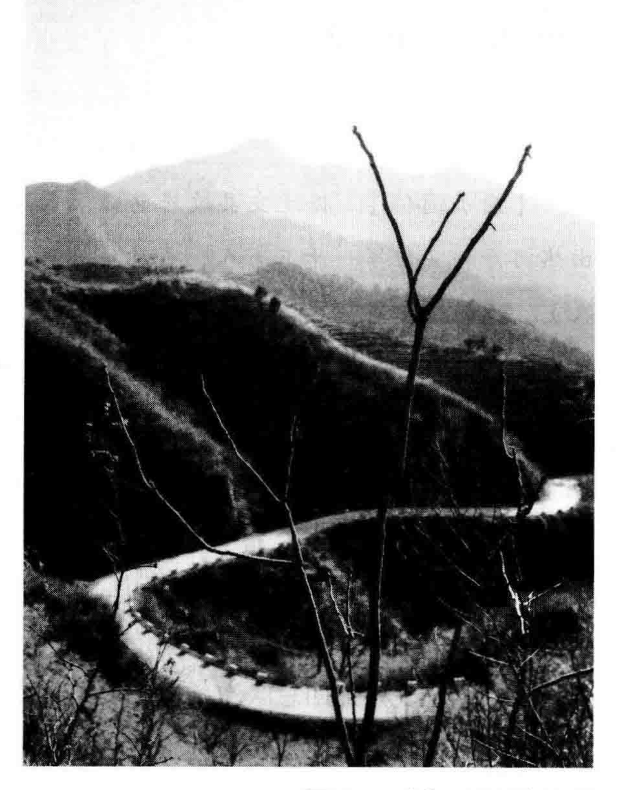


图134　毛山　2009年11月

三、原兴隆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闻成先生说，孙永勤入关后，“先在城东廿里铺驻扎，后在东小寨住一宿后，开赴遵化东北偏僻山区——洪山口，在野鸡峪、尤山口、三道沟、头道城子一带活动。最后从尤山口向南过九虎岭，去毛山东麓的小于沟村驻防，孙住在吴宪国家。几日后去吴家沟”。按此说法，当日孙永勤住在遵化城东廿里铺。廿里铺即“二十里铺”，在遵化城东20华里处，分为“东二十里铺”、“西二十里铺”两个村庄。

孙部5月15日的情况目前只知道这些。孙部之外需引起注意的一个情况是日本方面的。《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17日（1935年5月17日）第三版报道：

天津　十五夜十二时，日使馆驻平武官高桥坦搭平沈车过津，赴承德晤第七师团长杉原，有所接洽。（十六日专电）

报道未对高桥坦与关东军第七师团长所要接洽的内容进行介绍，但结合几日后日军出动的情况，我怀疑与“围剿”抗日救国军有关。

1935年5月16日（中华民国24年5月16日）：



图135　1945年10月10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的高桥坦（右一）

当日，抗日救国军活动于迁安西北部

地区（今属迁西县），晚间曾与日军交战。消息出自天津《大公报》中华民国24年5月19日（1935年5月19日）第十版：

义勇军一千余人开抵迁安

曾与日军一度接触

【唐山通信】 据迁安县政府电：十六日，迁安县属撒河桥〔潵河桥〕北喜峰口外，突由热河开到义勇军一千三百人，号称抗×第一军，首领为孙有琴〔孙永勤〕、孙黄桂（四川人）。所部非常整齐，枪支齐全，且有具双枪者。现驻于深山中，夜出昼伏，并出布告安民，且有宣传队向人民演说，称决不骚扰乡民，所有粮食向由自备。二日来确未向民间索食，只于十六日夜将富户李之桂等请往，借款二千元。十六日晚曾与日军接触，战约四小时，义军即避往山中。日军未敢穷追，用机侦视亦无结果。闻日军死十八人，伤二十六人云。（十七日）

1935年5月17日（中华民国24年5月17日）：

中午之前，抗日救国军仍活动于迁安境内。

马秀山先生根据他掌握的材料记述为，下午，孙永勤移至遵化城东。

“除李连贵所部四总队外，救国军各总队都已相继入关。下午，孙永勤主力驻于遵化城东15里之西小寨及临近各村。孙永勤本人住于西小寨的一家逃亡富户崔子珍的空宅，且于此宅设火立灶，由本村群众李增给救国军担任炊事，多数战士在所住各户休息。孙永勤、马保德（副军长）、何广永等到村外巡视地形，康永贵检查岗哨。”在《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被日蒋“协剿”的基本经过》中，马先生写道。

抗日救国军外，本日还有两件事需要记述：

一、17日，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正式发布中日互换大使公告，发言人发表谈话，阐述了增进中日邦交原则。公告发布时间，原定5月16日上午，因故推迟了一天。互换大使的过程，《申报》于中华民国24年5月16日（1935年5月16日）第三版做过专门描述：

“中日使节升格，王正廷长〔掌〕外交时曾一度商及，旋即搁置。最近日本广田外相倡议中日亲善，拟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迨有吉明返国，复经商榷，乃行决定。正式向吾征求同意，吾已答复同意。确闻中日双方使馆升格事，十五日下午五时，日总领事须磨代表使馆赴外部访唐有壬，述日政府确定将驻华使馆升格经过，及约定双方公布时期。谈约半小时。关于两国使节升格，双方约定十六日上午十时同时公布，我方公布文件内容，系叙述升格经过。至于日本驻华首任大使，有吉明已定六月初旬来华，呈递国书。我国驻日首任大使，亦定蒋作宾升任，一切手续，亦已竣事。我国驻日大使馆组织，闻仍照驻苏联及驻义大利〔意大利〕大使馆办法，所有经费预算等，稍事增加，亦经议定，足资办公。”

二、遵化东北部地区刘桂堂土匪滋扰甚烈，继新编特警第一总队长张庆余14日派出队警

100余人，前往遵化东北部，协助王占元部保安队剿匪外，驻玉田旧保安队第三总队长周毓英17日也派出两大队队警进入遵化，围剿刘桂堂部。

1935年5月18日（中华民国24年5月18日）：

抗日救国军方面，马秀山先生认为李连贵当日才率队伍由马蹄峪进入遵化。在《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被日蒋“协剿”的基本经过》中，他说：

“李连贵所部第四总队500余人亦自马蹄峪入关，午前直抵西小寨（一部驻于大寨）。于该村另一户逃亡富户李桐的空宅起火立灶，由该村李玉增为其任炊事。

“中午，孙永勤授意李连贵挑选17名精悍战士，由总队稽查长徐连芳带队，化装成卖柴人进城，想抓出县长何孝怡，逼其供给军需粮秣。下午出发，从城东门入，走到东街陈家饭店门前，忽然城门关闭。稽查长徐连芳警觉到形迹引起了保安人员的怀疑，带人快速转向南门。南门也被关闭，且有保警人员巡守。这18名勇士欲出遭阻，不得已说明身份，出示枪支，严厉交涉后，开门放出。出门后，保警队于城上朝这18人鸣枪，但无一伤亡，迅速返回西小寨。

“晚，一个戴大草帽的人来到西小寨，见了孙永勤。”

国民政府方面，继14日、17日，张庆余、周毓英各派出部分队警前往遵化东北部山区，围剿刘桂堂土匪后，18日，张庆余从一区队中再抽出两中队，周毓英从驻抚宁保安队中又拨出两大队，驰抵遵化北部剿匪。同时，长城北面，东起喜峰口，西到兴隆山，日伪军密布，防止刘桂堂土匪北窜。

1935年5月19日（中华民国24年5月19日）：

抗日救国军方面，马秀山先生根据他当年的调查所得，记载如下：

“早饭后，孙永勤又派两人进城送信给县长何孝怡。保警人员拒绝入城，此二人将信交与保警，返回西小寨。是日，县长何孝怡有电话报北平称：有匪自流星峪窜入，于十里铺集结，派调张庆余一中队驰剿。

“20日前的某日上午（有可能是19日），由城内来三驴一骡驮运物资到村（西小寨），有西小寨村民见康永贵等从驮运来之麻袋中取出皮鞋（革制鞋）分穿（笔者认为是县长何孝怡所送，尚待确考）。”

至于刘秀存回忆送信后即有人送来一车大米和枪弹之事，马秀山先生在《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被日蒋“协剿”的基本经过》中，将其记入20日的日志。

除上述活动外，5月19日或19日前，尚有一件事需要记载。根据李连贵之侄李山的回忆，李连贵进关后，李山和他哥哥李儒曾到遵化城东看望过李连贵，并带去了父亲希望李连贵回到口外的信。三人会面地点，李山回忆是遵化城东40多里地的黄台，见面时间是旧历四月二十二日午后四点。由于已知资料中，进关后，至5月20日下午两点之前，李连贵基本活动于遵化城



东十七八华里的西小寨一带，旧历四月二十二日转换成公历是1935年5月24日，那一天，李连贵在率队突围过程中，所以我认为李山在这两个问题上记忆出现了失误。他与二叔李连贵见面的地点很可能是遵化城东南10华里的黄台，今属崔家庄乡，那里东距西小寨不过8华里多一点，比较符合李连贵当时在西小寨一带驻扎和活动的情况。至于见面时间，我认为应是5月20日之前，因为20日下午西小寨一带已发生战斗，抗日救国军大部已向尖山屯、大寨一带转移。李山关于这次与李连贵见面的回忆资料，今天读起来令人十分感伤。当李山将父亲李连福（即李连贵的哥哥）带给李连贵的话说出后，李连贵只说了一句：“你们回去吧，革命人死了算完，就算抗日到底。”非常平淡，但是手足情、对抗日救国军前景的不乐观，以及虽然意识到前途渺茫但仍然抱定誓死抗日的决心，种种感情尽皆包含其中。语言非常简短，但是听的人、读的人心情却都长久无法平静。

国民政府方面，遵化县长何孝怡当日给北平所去电话的详细内容，在5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第三版报道为：

【平讯】 遵化附近，流匪窜扰，该县县长何孝怡，昨有电话到平报告。该项窜匪系由流星峪外窜入，现在十里铺集结。缘口外日伪军现正剿匪，该股不堪压迫，遂向口内窜扰。顷已由张庆余部调派一中队，携带机枪驰往围剿，可望聚歼云。

《申报》5月20日第三版也报道了遵化方面的电话内容：

北平 遵化电：刘桂堂残匪现在般若院方面盘踞，另一股在小寨。新特警张庆余部一中队奉令驰往，会同旧队周毓英部协力围剿。据探报，踞小寨地方之股匪，人数不多，粮弹缺乏，有退窜口外形势。（十九日专电）

由于孙永勤当时在西小寨，所以遵化电话中的小寨股匪指的是抗日救国军无疑。既报告了抗日救国军在遵化的情况，但又不明确向外界讲是抗日救国军或孙永勤部，何孝怡当时的心理状态颇耐人寻味。

日本方面，19日有两件事需要记述：

一、200余名日军乘汽车由滦河桥开抵遵化。

二、日本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从日本回到了天津。

图136 酒井隆（照片提供：詹洪阁）

《申报》5月20日第三版报道：

天津　津日军参谋长酒井前归国，出席参谋本部会议。十九日搭轮归津。对最近津日租界某暗杀案及丰润中岛事件，定二十日召在乡军人义勇队等开会商对策。（十九日专电）

1935年5月20日（中华民国24年5月20日）：

抗日救国军方面，马秀山先生记载为：

“上午，县长何孝怡派人送大米约2000斤，肉少量，子弹两箱，步枪数支，给驻西小寨孙永勤。且在这时获悉日军将到此‘围剿’，救国军午饭后立即集合，朝大寨进发。是日上午，有李连贵所部原留驻车河的八、九中队，自车河出发，经马蹄峪入关，直抵大寨。途中有日军尾追莫及。救国军于大寨召开中层以上军事干部紧急会议，议决行军意向——南进投奔国民军，并立即行动。一路行至七户，一路行至尖山屯，遭日军截击。”

何孝怡派人给孙部送大米、枪弹的时间，抗日救国军战士刘秀存回忆为与送信同一天，上面已提，不再多讲。孙永勤部朝大寨进发的时间，刘秀存在1986年10月对马秀山、李永春先生的回忆中，说收到何孝怡送来大米当天的午后，听说有日军来包围，马上就转移，奔往大寨北华山一带。在1987年3月对佟靖功先生的回忆中，又说发生于第二天，但这个第二天是指18人进城的第二天，还是派人进城送信的第二天，未明言。“第二天上午10点钟上下，有话：‘敌人要围西小寨，赶紧做饭。’不到12点吃完饭，奔西小寨南口子，奔那个庙了。战线拉挺远，前头到七户东边梁上，从南边过来了一支队伍，黄衣，平顶帽。我们队长说：‘先别打。’到跟前一看，是民团。咱们打一枪，民团就下去了。”刘秀存说。核对民国和伪满报纸，日军与抗日救国军在遵化境内首次接触发生于20日下午，地点北起般若院，南至尖山屯。至21日晚，孙部在日军和河北省特警队的围堵下已转往遵迁边境迁安县属的皇阁村、马甸子一带。由此判断，驻西小寨的抗日救国军既可能是20日前往的大寨、尖山屯方向，也可能是21日才出发，但至迟21日当天，他们已到达大寨、尖山屯等地。

尽管无法准确断定驻西小寨抗日救国军是20日还是21日前往大寨、尖山屯方向，但20日那天，小寨、尖山屯两地曾经发生战斗则属实。

《申报》5月22日第三版、《新闻报》5月23日第三版都转发了中央社的电文。文中说：“（日军）二十日午后二时，携钢炮机枪，由城内向城东十五里小寨一带，进剿孙永勤部。一时炮声震天，遵化县城，竟日关闭，戒备极严。”

天津《大公报》在日军到达遵化的时间与其由遵化城出发攻击抗日救国军的时间上与《申报》、《新闻报》有所出入，对交火地点与战斗持续时间的描述上较《申报》等要详细一些，现将其抄录如下：

【电闻社遵化二十日电话】　日军用汽车二十余辆，载兵二百余名，携有钢炮机枪多架，

于二十日由撒河桥〔澈河桥〕开抵遵化。下午二时半由城内出发，与盘踞城东十五里小寨、般若院一带之孙永勤匪部发生接触，炮火极烈。迄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双方仍在相持中。遵化城门，二十起竟日关闭。

——《大公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2日第三版

尖山屯战斗情况见于中华民国方面的《申报》、伪满方面的《大同报》、《盛京时报》。先援引《申报》报道如下：

长春 关东军发表，热河警备队之一部已出动，侦察在停战区域内掠胁之孙永勤军动静。二十日午后，在遵化东八基罗（应为英文“kilometer”之音译，即“公里”——编者）之线山屯〔尖山屯〕附近，遇孙部集团。即取敌对行为，加以攻击，孙部已蒙相当损害。又孙部主力部队似已开始逃往遵化县与蓟县之中间方面。（二十二日电通电）

——《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1935年5月23日）第三版

《大同报》对尖山屯战斗的记载见于康德二年5月24日（1935年5月24日）第一版，其标题为：“在停战地区域之内，孙匪继续不法行为，在华日军出膺惩之手段。”内容如下：

【天津廿二日电】 遵化方面遁走之孙永勤匪，被驻马兰峪之山田部队一支队在尖山屯击退，孙永勤似有脚部负伤之状。孙匪出热河省时已受大打击，带领百余名入遵化，纠合附近之匪军，按现在势力有一千六百名之数，武器弹药由遵化县厅支给，在停战地域内依然继续不法行为。以上军队宜讲膺惩手段。仪我大佐，高桥驻平武官，于廿一日欢迎天津之川岸〇团长，协议剿匪事宜。

《盛京时报》报道内容与《申报》相同，不再抄录。

尖山屯是遵化城东南方向的一个村庄。名字的来历，据说是明朝时有个山西临水县的官员在北京做官，死后葬到那里。后来不知何故，他的坟被扒开，人们在里面发现块石碑，上写“尖山公”。从那时起，村庄得名尖山屯。尖山屯距遵化城实际为24华里左右。2006年4月，我曾到达那里，听本书前半部分提到的陈瑞祥老人讲过尖山屯战斗的经过。老人当年21虚岁，他回忆抗日救国军到达尖山屯的时间是农历四月十八，这个日期换成公历是5月20日，与民国及伪满报纸报道的日期相符。

老人说，抗日救国军到了尖山屯后，“南山、北山都站上了岗，军官在本村老刘家住。有两个老道一掐，说有危险，应往东北撤。日本子进了关，到了茶棚，车撂下就打上了。他们用的是捋管炮、歪把子机枪。民众打不过，撤下来，日本子就追。到东双城子北，日本子撤回来，后来到了关外”。

尖山屯之战，抗日救国军有一人负伤。“在新立屯五道庙子养伤，大伙给送饭。养了好几个月，才回去。”陈瑞祥老人说。

5月20日，除小寨、尖山屯两地，按照天津《大公报》5月22日的报道，20日当天，在遵化城东北方向15华里处的般若院一带也有战斗发生。这些战斗，具体是抗日救国军哪支部队与日军打的，目前难以调查。既可能是马秀山先生所说的“李连贵所部原留驻车河的八、九中队”与追击他们的日军打的，也可能是抗日救国军第八队打的。

“孙永勤在进关之前开了军事会议，说：‘冀东县长爱国，抗日救国军到冀东可以支援枪支弹药。’开会后他率七个队先进关，让我父亲带年轻的八队打阻击。孙永勤从洪山口进去，在洪山口摸了据点，日本校官四人被捕。过口后他们往南走，我父亲带领八队在全军后面殿后。与日军打了七八次遭遇战，挂彩，一直追到大寨南山，才与孙永勤会师。后转至吴家沟、毛山沟，被日军驻山海关、丰润、玉田、遵化的四个师团围上来，当时孙部已弹尽粮绝。”1983年，单忠英之子单志华对兴隆党史办栾福忠、邢连义先生说。

日本方面，20日除出动部队攻打孙永勤部外，有三点值得记述：

一、日军热河警备队一部也开始进入长城以南。事见《大同报》康德二年5月24日（1935年5月24日）第一版。标题是“获原部队，扫荡孙匪进发”，内容如下：

【北平电】 据该地传来情报，扫荡遁走遵化附近之孙永勤之热河警备队获原部队兵〇〇〇名，于廿日晨起动，一部已越长城线，在进击中云。

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于20日下午前往北平军分会，向何应钦代理鲍文樾问责。消息仍见《大同报》康德二年5月24日（1935年5月24日）第一版。标题为“关东军通告中国，讨伐孙永勤匪，热河国境之军事行动”，内容如下：

【北平廿二日电】 北平武官室发表，关东军数月来屡次讨伐热河南部出没之孙永勤匪，该匪因此遁走长城以南，中国官宪似有庇护态度，不易解决以致今日矣。关此，高桥武官廿日午后一时越军事分会，对何应钦代理鲍文越，责问中国官宪之不信行为，且事态如果渐大，关东军只得进出于长城以南，独立将该匪遵化根据荡平，如此处置亦通告完毕矣。

三、关东军将进入“非武装地带”之事向日本国陆军省报告。陆军省向外界发表谈话，将关东军的行为解释为讨伐扰乱热河省治安的匪贼。消息见《盛京时报》康德二年5月22日（1935年5月22日）第二版：

热省治安之癌

孙匪逃入战区

日军决追剿歼灭

达到目的后速撤回原防

【东京廿一日电】 扰乱热河省治安之孙永勤匪贼团，受松井〇队长扫荡，其残党遁入停战协定地区。孙与遵化县长有关系，继续活动之事已判明。若长此放任，则热河治安又将被

扰乱。因之关东军〔将〕决定出兵于停战协定地区内，彻底讨伐孙匪之旨，于廿日报告于陆军省。然对此，陆军当局云，此次关东军之行动，完全为讨伐扰乱热河省治安之匪残党，并非为将军队入停战协定地区为目的。在剿灭孙匪后，当即退出，无惹起其他各种军事行动之意志。

国民政府方面，要记载的是，驻玉田战区保安队周毓英部又有400名队警开入遵化。事见《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1935年5月23日）第三版：

天津 遵化、迁安旁近长城线民户，因剿匪纷向玉丰迁移，难民络绎于途。周毓英部四百名，二十日由玉田开抵遵化城内协防。（二十二日专电）

共产党方面，有可能是20日这一天，中共遵化县委书记骆凤庭派阎龙去与孙永勤联系，准备支援他们，但未成功。

此事见于骆凤庭的回忆录。“我兄弟跟我汇报，说孙部在口外站不住脚，要开进口里。我派阎龙与孙部接头，他走到岳各庄，正好打仗，无法接近。听说孙永勤受伤，用椅子抬着他。”1983年12月29日，骆凤庭在接受栾福忠先生采访时说。

同日，阎龙向栾福忠先生证实当年确有此事发生。“遵化县南北堂有枪，想动员出来，支援孙永勤，这件事没有做到。第二次骆凤庭让我找孙永勤时，他已被围了。我在岳各庄找不到他，联系不上。”

1935年5月21日（中华民国24年5月21日）：

抗日救国军方面，马秀山先生记载的当日活动是：

“李连贵所部救国军自四十里铺东山转移到秋花峪、小厂、黄花峪宿营。孙永勤带主力自迁安境皇阁村、马甸子、三屯营等地朝遵化境秋花峪方向转移，后边有张庆余所部之保安队追迫。当到秋花峪时，东山梁上有保安队朝救国军猛烈射击，救国军不予理睬，奔小于沟、王家沟等地隐蔽宿营。孙永勤住小于沟吴凤忠家。”

马秀山先生上述记载源出哪里，他未作说明。民国及伪满报纸对抗日救国军21日活动的报道与他的记述有所区别。按这些报纸所载，当日的情况是：

至当日上午9点，般若院、小寨地区的战斗仍在进行中。下午，孙永勤率领的队伍在大寨遭到河北省特警队围堵，被迫转往迁安县境。当晚，遵化城东北4华里处，抗日救国军与保安队之间也有战事发生。

般若院、小寨战斗21日上午仍在持续的情况，之前援引的民国、伪满报道中已经提到，不再重复引用。现只将抗日救国军在大寨及遵化城东北的遭遇介绍如下：

一、大寨

大寨战斗只记载于中华民国方面的报纸中，伪满《大同报》、《盛京时报》未做报道。天津《大公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1935年5月23日）第三版以“孙永勤窜迁安，我警队民团

追剿中”为标题，记述如下：

【北平通信】　关系方面消息：盘踞遵化小寨子、般若院之孙永勤部，经我警队、民团追剿，前晚已窜迁安三屯营南十余里皇阁村、马句子地方，仍由警团围剿中。据殷汝耕氏语记者，遵化县东十五里大小寨地方之会匪孙永勤股，经特警队长张庆余派两个中队驰往迎堵，于前日下午二时开始接触，激战甚烈。至下午六时许，该股不支，向迁安三屯营南十余里地方皇阁村、马甸等地溃窜。该方面，团队早有戒备，业已形成夹攻局势云。

《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1935年5月23日）第三版是这样报道的：

北平　遵化电话：团队二十一日下午二时与大小寨之匪开始接触。相持数小时，匪即不支，纷向迁安三屯营南〈十〉余里皇开〔皇阁村〕、马句子等地散窜。又流星峪、般岩院〔般若院〕之匪，现仍匿于茅山〔毛山〕内，凭险抵抗。（二十二日中央社电）

上引两则报道介绍的攻击部队都是“警队、民团”或“团队”，只字未提日军，给人的感觉，大寨之战是中国特警队和民团主动进攻并独立完成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抗日救国军战士常久芳是大寨之战的参加者。1989年1月23日，他曾向前来采访的佟靖功先生回忆起那场战斗的经过。他印象中，他进口后先住在侯家寨，孙永勤等人居住在上下港。仅仅过了一夜，“日本子听见啥话了，遵化县就满了，汽车来回直跑。次日，拉到遵化东南笔架山。到山上就打上仗了。打了一天，我们1000上下人没大伤损。孙永勤醒过闷儿来，还是往北返，往北撤，奔景忠山往北撤。我们从大寨西沟、南沟撤到大寨，孙永勤、王宝石他亲家、他侄子、一个占卦的老道，还有一个小亲兵，十四五岁，这五个人骑着四匹马。一进大寨西门，刚到庄里，日本子就开枪了。孙永勤等人冲出去了，奔石桥头了。我们在西门外伤了好几百人，少了400多人”。

常久芳的回忆中，有一个令人不解之处：笔架山在遵化城西南方向13华里处，他为什么却说在遵化东南？是他确实去了笔架山，打一仗后向东转移到了大寨，还是根本未去那里，只是将遵化东南一座山误记成了笔架山的名字？我因看到常久芳这段回忆的时间较晚，未去笔架山调查，在这里只将问题提出，待有机会再进行核实。

不管抗日救国军是否到过遵化城西南的笔架山，他们是从西面转往的大寨却似是不争的事实。

“孙永勤从平山铺过来。南山有个人家，他们在那儿歇着。”徐绍庆老人当年10岁（虚岁）。2009年11月30日我到大寨采访，他向我介绍了他知道的大寨战斗经过。他说的平山铺在今遵化市刘备寨乡境内，位在大寨村西南方向。“中午，孙永勤他们过来，让村民做饭送上去。送饭的没到，日本兵就开枪打上了。孙永勤他们没吃饭就跑了。日本兵是从西边追过来的。孙永勤他们从南山跑下来，跑毛山去了。过去之后，才听说是孙永勤的队伍。”老人回忆中提到的抗日救国军歇脚的南山人家，我在采访他十几分钟后，与一位推车前往南山方向的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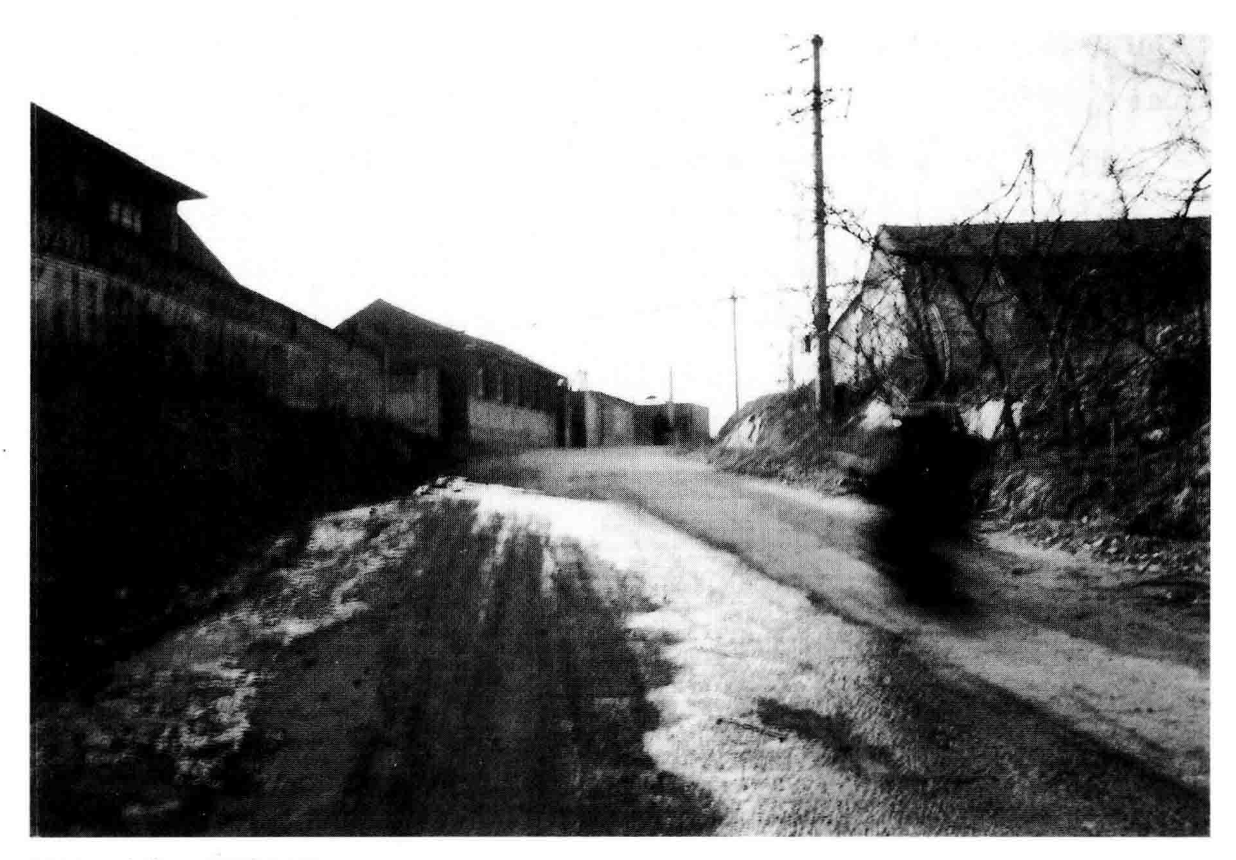


图137　大寨　2009年11月

女相遇，她正好是那户人家的亲戚。据她讲，南山人家现在的主人叫李青，当时他家约四五口人。

常久芳、徐绍庆的两个回忆中，攻击抗日救国军的都是日军，至少战斗发生时，未见特警队、民团在大寨出现。民国报纸将孙部之所以从大寨撤出说成是中国警团攻击的结果，考诸21日以后民国各报所发消息，旨在表明中国方面确实在积极地“围剿”孙永勤部，努力维护中日使节升格后两国关系好转的局面。日伪方面未作积极报道，保持沉默状态，目的则是尽可能掩盖已深入《塘沽协定》划定的非战区内40华里的事实，以免引起中华民国政府，特别是英国、美国的猜疑。

大寨之战中，抗日救国军的弱点又一次得到暴露。“孙永勤队伍那时也是不中，连岗都没有。起民众时，你也去我也去，军事素质还是不中。”徐绍庆老人说。

两日后，抗日救国军将因为这个多次出现的问题而尝到苦果。

二、遵化城东北4华里之战

此战在5月23日出版的《申报》、天津《新闻报》中都有报道，内容相同。

今援引《申报》报道如下：

北平 中国保安队与孙永勤部昨夜在遵化城东北四里许开战，孙部向南溃走。中国官场消息，日兵并未加入昨日战争。（二十二日路透电）

报道对开战的具体地点未讲。抗日救国军战士的回忆录中未有对此战的回忆，我亦未做调查。

日本方面，21日动态如下：

1. 关东军司令部分别向日本国内、中国方面通报了派兵进关“围剿”孙永勤部的情况。

关东军向日本国内汇报的消息出自天津《大公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2日（1935年5月22日）第三版：

日军入遵化

扬言追剿孙永勤

【东京二十一日电】 据关东军司令部本日报告，为平定孙永勤部计，被迫派日军一支队入华北非武装地带。该日军一俟孙部平定，即撤回热河。

关东军向中国方面通报的情况，见于《盛京时报》康德二年5月22日（1935年5月22日）第二版的报道中。

【北平廿一日电】 在非武装地区遵化营巢之匪孙永勤部，屡次侵扰热河省南部，关东军为彻底的歼灭计，故而一时进入长城线迤南地区，亦所不得已，业向华方官宪通达斯旨。

2. 日军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当日曾命遵化县长何孝怡暂行遣散孙永勤部。

消息来源自《盛京时报》康德二年5月24日（1935年5月24日）第四版：

孙永勤匪暗幕

由于学忠提线



图138 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照片提供：詹洪阁）



图139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照片提供：伪满皇宫博物院）

遵化县长实在间相操纵

驻防热河日军毅然进入遵化县境，痛击孙永勤匪，已详昨报。兹据续讯，孙匪逃入遵化县城以后，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于二十一日饬令遵化县长何孝怡，在外交工作未有利进展以前，应将孙永勤部暂行解散。经何县长拨款，每一匪二十元，临时解散，待令再度集合。

3. 日军飞机进驻马兰峪机场。

事见《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1935年5月23日）第三版报道：

天津 闻日兵二百已穿越长城而入遵化之停战区域，追击孙永勤部。此间闻此消息，甚以日军又侵入华北为虑。查孙部现驻于距遵化城北约十五里之十里铺，闻日飞机若干架已抵马兰峪之飞机场。又闻今晨有日本军用飞机一架飞过天津，向东飞去。（二十一日路透电）

4. 日本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关东军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当日在天津就两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孙永勤进入遵化事件进行密议。

消息见《大同报》康德二年5月26日（1935年5月26日）第一版：

暗杀两报社长事业经判明

彻底扫荡扰治安者

孙匪与北平义勇军系有关

－高桥日本驻平武官谈－

【北平二十四日电】 廿一日，在天津，酒井参谋长、仪我特务机关长，对天津暗杀事件，就孙永勤讨伐问题，有重要协议。高桥驻平武官于廿三日回平，廿四日所谈如左：

今回之会合，关于暗杀事件，正体确已明了，无论如何应断乎处置。其具体之事究竟如何处置，尚不能言。孙永勤匪确与其他匪贼不同，中国侧曾任孙匪组织热河自卫军，与北平义勇办事处系相连系，纯然为抗日军，故中国侧官宪与以援助，即各取缔之事，更难作到。前者因我方之抗议，于是派张砚田及张庆余等保安队之大队出动，有阻止该匪南下之样。然在我方之地位，宜独自将治安搅乱者彻底扫荡，至何地步，总以肃清为终止云。

5. 驻承德关东军川岸旅团长抵达天津，和仪我、高桥坦共议“围剿”孙永勤部问题。

消息载《大同报》康德二年5月24日（1935年5月24日）第一版，内容在介绍日军5月20日的活动时已引用，不再重复。

国民政府方面：

1. 当日上午，何应钦在太原市大校场阅兵，并致训辞，希望军人明了保国卫民之天职；遵守纪律，以岳飞为军人模范；积极研究新学术；实行新生活。

2. 蓟密区督察专员殷汝耕上午10点到日本驻华使馆访高桥，拟阻止日军侵入华北。同日，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向何应钦汇报了遵化匪患情况。

前者见《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2日（1935年5月22日）第三版：

北平 殷汝耕今晨往访日武官高桥，拟阻止日兵之侵入华北。闻殷向高桥担保，中国当道必竭力剿匪，关东军无需派兵入关。（二十一日路透电）

后者出自《大公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2日（1935年5月22日）第三版：

【平讯】 日方以遵化股匪前曾窜扰口外，势甚猖獗，即派队截剿，匪复窜入口内。日关东军方面前曾电日使馆武官高桥访平市军事当局，表示拟派队追剿。高桥即于前日访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商谈此事。我方以遵化方面已有张庆余、周毓英两部警队及民团并力堵剿，匪患当可肃清，表示毋庸日军代劳，以免引起人心不安。蓟密区行署督察专员殷汝耕前晚返平后，当晚即谒鲍文樾，有所商谈。殷氏复于昨晨十时赴日使馆访晤高桥，商谈一切。闻高桥已将平方之意电关东军报告，此项问题即可解决。闻鲍氏亦已致电太原，向何委员长应钦报告。

3. 河北省政府致电新编特警队张庆余部、旧战区保安队周毓英部，加紧搜剿孙永勤、刘桂堂“股匪”。

消息载《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1935年5月23日）第三版：

天津 冀省府电饬张庆余、周毓英两部，对长城线附近孙永勤、刘桂堂各股匪，务须赶紧搜剿，勿使窜扰。（二十一日专电）

4. 非战区内将要发生战事的消息开始在华北地区流传。

《新闻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2日（1935年5月22日）第五版报道：

▲路透社二十一日北平电 此间谣言甚炽，但各方面并未接到停战区域发生战事之消息。日兵昨由热河出发，明日可抵遵化。如孙部不降，则战事难免发生。闻日当道曾请中国当局会同驱逐孙氏，但中国当局不允。答称，停战区域内之警力，足以处理此事，日兵无越入中国区域之必要云。

1935年5月22日（中华民国24年5月22日）：

抗日救国军方面，当日的活动情况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描述：

马秀山先生认为是，“孙永勤率队由于家沟转移到吴家沟，住于张志跃家，其队伍分别隐蔽毛山沟、桃树沟一带驻守”。

抗日救国军战士常久芳的回忆为：“天亮（指大寨战斗次日——编者），孙永勤带着300上下人奔毛山了。李连贵、年焕兴我们在后边，还有400上下人，我们奔了景忠山南坡。下了景忠山，到电道上，看见从东边开过来十几汽车日本兵。我们藏了起来。等日军过去，我们也奔毛山沟，住在柴户场上下了。孙永勤在老梁上过滦河时，正面踝子骨挂花了，到柴户场，伤疼，在那里住了五天。”

上面两种叙述哪个是抗日救国军22日的真实活动情况呢？

兴隆史志办提供给我的资料里，有两份吴宪国所写的调查材料。吴宪国于1986年12月21、22日，曾到小于沟、柴户场、秋花峪等地了解孙永勤队伍进关后的情况。他去世后，在兴隆政协文史委工作的闻成先生将其采访到的内容抄下，转给了兴隆史志办。

据吴宪国当年调查，孙永勤牺牲前既在小于沟住过，也曾在柴户场驻扎，以小于沟居住次数和时间为多。

“孙永勤在牺牲前驻扎在小于沟好几天。”几位接受吴宪国采访的老人们说。孙永勤之所以在小于沟住了较长的时间，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孙永勤腿部有伤，找方德福给治过。也曾派人去遵化城请过医生，没请到”。第二种说是“不是有伤而是患病，请农村医生庄久海给治过，行动着人用椅子抬着”。

孙永勤在小于沟的所谓“住好几天”应不是一次驻扎的结果，而是三次驻扎的总和。抗日救国军军部曾安于其家的吴凤忠当年接受吴宪国采访时说：

“头一次来小于沟，住三天，有200多人。他们有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叫刘秀存，第二大队长叫张××，第三大队长是个老道。听说他们去过遵化城南。第二次来小于沟，是从大寨



图140　站在毛山山顶东望，后景左侧最高处为迁西县属官台子。1935年5月24日战斗中，那里是日军的炮阵地之一。官台子下面的村庄为小于沟。画面右侧的村庄为秋花峪。2006年4月



转回来的，住在我们家，头目是个大胡子。对带的俘虏，大家要处决。孙永勤不同意，说要与之谈判，枪支弹药给了再放。第三次来就不如以前了，纪律不好，找吃的。”

“奶奶当时正坐在院子外边自然挖出的一块棕色大石头上，那石头很平。孙永勤来了，说：‘大嫂，这石头挺好啊。’”2007年4月13日，我到小厂乡采访，吴凤忠之子吴艳民向我说起奶奶讲述的孙永勤驻扎他家的经过。他印象中，奶奶似乎说抗日救国军军部三次都安在了他家。“孙永勤对上岁数的人特别好，婶子、大爷的叫得特别亲。我奶奶说，当时孙永勤住一两天就走。每次回来都先打招呼：‘大娘啊，我们回来了。’奶奶起来就给腾地方。当时我们家是三间草房，坐东朝西。爷爷没了，我奶奶、父亲住着。还有两间草房，坐南朝北，我大爷、大妈在里面住。南边有个柴棚子，北面有一个羊圈。孙永勤每次来，都是住在大房子里，勤务兵和我大伯大妈住在小房子里。老年人评价，是相当义气的一支部队。据说谁要说日本人好了，抓起来就打。吃饭朝大户、大家儿要，想吃肉，买，但票多，洋钱特少。有时候买不来，背着跑的也有。在小于沟没打过老百姓，老百姓对这支部队没反感。”



图141　吴凤忠　（照片提供：吴艳民）

孙永勤之所以三次把军部设在小于沟，在吴艳民这个参过军的人眼里，与小于沟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有关。“往正东，翻山可到马台子。往北走，经关庄可到官台子。小于沟是通往滦河桥、喜峰口的交通要道。”而在庄开云老人看来，那里民风好也是重要因素。“民众打日本时，村里年长的人就自发组织放哨，风气特好。不然为啥以后八路军也总住这儿？抗战时，这儿出去三个县委书记级干部，一个伪军都没有。”2007年4月14日，我在吴艳民陪同下，到小于沟、王家沟自然村采访，已89岁（虚岁）高龄的庄开云老人说。

柴户场在小于沟村西北三华里处，由四个自然村组成。孙永勤曾在柴户场驻扎过，是庄世忠、庄庆丰、庄庆富三人向吴宪国回忆的。“民众军五月左右来柴户场住几天，带着两个日本人、一名翻译三个俘虏，住在庄宽的西屋。翻译对民众说：‘只要把两名日本人放了，要啥给啥。’孙永勤坚决不放，说：‘日本人死一个少一个。’”

孙永勤在柴户场驻扎的具体日期，吴宪国的调查材料里未显示。吴凤忠1986年接受他采访

时，说抗日救国军被包围时，孙永勤是在小于沟开的领导人会议，并说“孙永勤去毛山是从小于沟走的”。由这两个情况来判断，孙永勤5月22日当天住在小于沟的可能性较大。理由是，根据吴凤忠之子吴艳民回忆，吴凤忠1921年生人，至1935年时他已有15虚岁，对毛山战斗这样重大的事件及其前后一些事情已能留下清晰的记忆。何况毛山之战中牺牲的孙永勤还曾在他家住过，孙永勤之死会特别强化有关他的一切记忆。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孙永勤5月22日，如常久芳所说，住在柴户场，23日一早转移到小于沟，开会后，下午由小于沟出发，绕毛山南麓，往西北方向开拔呢？由于吴凤忠未详细说明孙永勤第三次到达小于沟的时间，应该说，不排除有这种情况的可能。但不论22日孙永勤驻扎在小于沟也好，住在柴户场也好，他在毛山东北麓驻扎，而未住在吴家沟似乎是肯定的。根据是闻成先生在吴家沟做的两个调查。

毛山之战前一天，即1935年5月23日，吴家沟的陈贵平、陈安良、吴广胜曾给抗日救国军带路，三人中的陈贵平、陈安良分别是闻成先生的舅舅和表兄。1987年9月4日，闻成先生到吴家沟采访，表兄陈安良回忆当年情况时说：

“闹民众那年，一天下午5点多，我和老叔陈贵平、吴广胜在狮子峪薅粳子。从陡岭子过来的民众军一部先头部队叫我们仨给带道，说明从鸡鸣村去傅家城出口。我和尖兵走在最前面，我老叔和吴广胜在中间。我们走到三里店庄北梁根，看见山上乡团六七人正换岗。坐椅子的孙永勤派人上山联系借道，乡团不肯借。这股乡团只有28人，总部在松棚营。怕民众缴他们的械，谎称有七八十人。民众军怕强过易惹事，怕乡团从后面打他们，孙永勤决定返回住吴家沟。

“庄西路南从西数第一户是张志跃，第二户是我家。我们两家房子多些，军部设在我们两家。孙永勤住在张志跃家。我家东厢房押两名日本人，绑着。还有一名翻译官，没捆。南屋正房也住军部的人，听口音有当地人。后来知道这几个本地人后半夜结伙向西逃去，没上毛山。

“那两名日本人在毛山上被民众军打死，次日把两具尸体运走了。”

“民众军来吴家沟住，”吴家沟吴宗耀对毛山之战前一天抗日救国军在吴家沟的情况有清楚记忆。1987年9月4日，即采访完陈安良的第二天，他对闻成先生说，“我看见孙永勤坐爬山虎（即一把椅子四个人抬）进村。另一名头目骑匹黄马，带两名警卫员，住吴占祥家。骑黄马的头目听说是瀑河口人，这人死在毛山。毛山仗打完次日，我上山看见了死黄马。”

上引两人回忆都提到孙永勤部是毛山之战前一天才到达的吴家沟，未说之前孙部曾在吴家沟驻扎。陈安良更说5月23日当天他们是从陡岭子过来，与不少人回忆的孙部是从毛山东面，绕毛山外围，准备经三里店出口相符。我由此判断，抗日救国军5月22日仍在毛山东面的小于沟或柴户场驻扎，常久芳的回忆较接近抗日救国军当日活动真相。之所以说较接近，是因为他说孙永勤在柴户场一住五天，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抗日救国军到达毛山东面驻地的第三天早上，毛山之战即开始了。至于马秀山先生的记述，我认为比事实提前了一天，即把抗日救国军

5月23日的活动记到了5月22日那天。

以上是党史工作者、目击者对抗日救国军5月22日活动的记载。民国报纸对孙永勤部当日活动报道如下：

大连　据关东军息：协助日军攻入长城之“满”军日人军官原口骑兵中尉，于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在遵化东南郊与孙部对阵时，被击大腿，后即殒命云。（二十四日华联社电）

长春　协同日本军讨伐蟠居敦化〔遵化〕附近义军之“满国”骑兵，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在敦化〔遵化〕东南二十三基罗〔公里〕地点，遭遇有力义军。经激战后，虽将义军击退，但骑兵中尉原口松雄因站前线奋战，致中弹阵亡。（二十四日电通社电）

以上两条消息均出自《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5日（1935年5月25日）第三版，虽说的是一件事，但详略不同，互相补充，故全部抄录于上，以期读者对当日战斗情况有完整的把握。

日本方面，5月22日有三项活动须记载：

一、日使馆武官高桥坦当日去天津与关东军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支那驻屯军参谋大木会晤，并访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消息出于《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1935年5月23日）第三版：

天津　驻平日使馆武官高桥二十二午由平来津，晤仪我、大木，午后二时半偕到冀省府访于学忠。（二十二日专电）

二、关东军司令官命令驻马兰峪山田部队对孙永勤部彻底讨伐。

消息同出《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第三版：

长春　今日南关东军司令官电命驻□□之山田部队，对于在停战协定区域内扰乱和平之孙永勤军，彻底讨伐，采取适宜处置。（二十二日电通电）

三、当日晚，驻马兰峪山田部队长向遵化县长何孝怡下最后通谍，如24小时内不讨伐，日军则自行“围剿”。

《大同报》在毛山之战后第三日，即1935年5月27日（康德二年5月27日），才披露此消息。

遵化附近，按停战协定，日本军



图142　1934年10月，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致辞

原可自由行动，惟究系中国领土，故作战行动极为慎重。且曾以由中国侧讨伐之，要求于遵化县长，而该县长不但左右支吾，不行讨伐，且据诸情报，皆谓有援助孙匪之说，乃成为即匪团之位置亦难确证之状态。山田部队长乃对县长宣言，谓在廿四时间以内不讨伐，则日本军即取自由行动。县长谅悉而退。〇〇部队长于廿四日（应为“廿二日”——编者）午后五时，随参谋赴撒河沟〔澈河桥〕战斗司令部。山田部队长谓县长拥有保安队、民团等三倍孙匪以上之兵力，包围占领遵化东北方三里〔三里店〕毛小沟〔毛山沟〕一带地域之孙匪已有二日，并未讨伐云。〇〇部队长乃决以日本军歼灭之，命山田部队长实行讨伐。山田部队长在一战可灭孙匪之信念下，于廿三日夜冒雨行动，配备包围。

国民政府方面，何应钦当日上午在太原中山公园发表讲话，下午与阎锡山长谈，商量如何“清剿”陕北红军。

消息见《大公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1935年5月23日）第三版：

【太原二十二日下午四时发专电】　各界二十二日晨假中山公园大自省堂，召开欢迎何应钦大会。赵戴文、徐永昌等各军政长官均出席，参加团体学校机关等代表二千五百余人，情况异常热烈。大会由徐永昌主持。徐讲欢迎意义后，何先述“新生活真谛”，次讲“青年与国家”。谓吾国危难已达极点，多数民族，因智识甚低，对国事似乎无关痛痒，而有智识之一部分，不流入盲目的悲观论，即流入盲目的乐观论。乐观论者觉中国不会亡国而不努力，悲观论者认中国毫无办法而不努力。此种现象为使国家日益危弱之一大原因，必须自己反省，始能改正。至青年为社会中坚，负有复兴民族国家之责，应格外兴奋，特别努力，并须：（一）应具有强度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铲除自私自利苟且偷安心理。（二）应当在公共组织中去锻炼自己，使全国国民从一盘散沙旧情况恶情况下，变为一个有机体的组织。（三）应该努力学习卫护国家学术的技能，始克有济。（四）应该有竞争心及名誉心，国家始能发达强盛。如全国之人皆能注意此数点，而切实力行，国家民族前途有莫大希望。散会后何赴绥署，应各界公宴。

【太原二十二日下午九时发专电】　何应钦二十二日午应各界公宴后，下午三时至五时与阎锡山长谈，对清剿陕北共匪，已商有具体办法。五时何赴兰村游览。

1935年5月23日（中华民国24年5月23日）：

抗日救国军本日的活动情况，遵化党史办马秀山先生、兴隆政协闻成先生都做过详细的记载。

马秀山先生的描述是：“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总体上集中在柴户场、秋花峪以西，毛山沟的东北之一带山地。其北面九虎岭一带有大量日军封锁，其东面有日军逐次逼近，其东南面及南面有保安队特警队长张庆余、周毓英及民团数千人。毛山西北长城南侧有小股日军。这时国民党保安队一方以为自己应负责的防区为长城以南15华里之外，抗日救国军已不处在自己的防区，不肯再向北推进。而日军山田队长又碍于‘勿用日军代劳，匪患当可肃清’一说，对

救国军虎视眈眈，亟想亲自行动，而等待警告县长‘二十四小时之内’过后，于是日下午采取了自由行动。在马台子、官台子、九泉山三处做出向毛山一带抗日救国军阵地炮击的准备，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孙永勤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围方略。会后分两路行军。孙永勤率直属队，关元有、赵四川、王殿臣、马保德等率队相随，沿毛山南麓进发，意欲奔片石峪，出马蹄峪。行至三里店北山根，接到驻遵化保安队大队长吕振江捎来口信说‘日军将要发起总攻，你们得快走’。但前面山梁上有数名民团正在换岗，派人去联系借道，他们说‘负不起责任，不敢答应’。孙永勤不愿与民团发生正面冲突，于是率救国军返回吴家沟。晚饭毕，天下大雨，权宜就地住了下来。另一路李连贵、年焕兴等傍晚从小于沟西边王家沟出发，沿山脚奔秋花峪，经毛山沟、小厂绕过松棚营西沟，夜宿黄花峪。次日拂晓，率主力300余人奔房山沟突围出关，曾与日军石井队（前部）几战几旋，有小量牺牲，小股队伍失散。”

闻成先生针对抗日救国军进关后的活动情况专门写过两篇文章，其一为《关于孙永勤和忠义救国军的调查材料》，其二为《关于孙永勤和忠义救国军遵化毛山战役的补充材料》。对于抗日救国军在5月23日的活动，闻成先生根据他在吴家沟采访陈贵正、陈贵平、陈安良、吴广树、张启生、穆柏成等老人的结果描述如下：

“5月里，孙部从小于沟往西，想撤回兴隆。孙率一个大队300多人从陡岭子过来，在吴家沟村南地里遇到陈安良，叫他带道，通过傅家城、大屯，出马蹄峪、秋花峪回兴隆。队伍走到西三里店庄北山根下，看见山上有保安团士兵数人正换岗，时间是下午5点钟以后。孙派员上山与站岗士兵联系，要求借道。保安团士兵答复是：‘要向连长请示。’而连长还在松棚营，离这里三华里。孙考虑不好通过，又念及战士十分疲劳，不便强行通过和乘夜突围，决定在吴家沟住一宿。村中筹集粮柴吃了晚饭，一齐睡大觉，庄西头、马山上均未放岗。午夜后敌人集中包围了村子。日寇用两辆汽车载士兵、武器（机枪、小炮）直达吴家沟的村西，下车即冲进庄里。孙部仓猝应付，没有还击，即整队往东西方向的毛山跑。孙的警卫员的臀部中弹受重伤。孙部在山上，从第一道山撤到第三道，想从主峰由后背往北撤，后背又被在九虎岭后的大块地盘距的马拐子匪帮100多人堵住。这时孙部已处于绝境，当场牺牲400多人。

“另一个大队在房家峪（毛山东麓的一个大村）住，遭从三屯营、滦河桥过来的日寇的包围，撤至山根的秋花峪与敌激战，一百多人全部壮烈牺牲。战斗打了半天多，晚上敌人撤走。

“在吴家沟村隐蔽下来，在山下溃逃的少数人，如马保德、何广永、年焕兴、郝玉祥（应为“郝敬义”——编者）等人逃出脱险。马保德（东双城人）和张××（西小寨人）各自逃回本家。张逃往东北，马后被遵化县抓捕处死。何广永等人回到上港藏匿。

“李连贵的一个大队没在吴家沟住，连夜绕过保安团驻地东小厂、松棚营，从庄客西沟逃往口外。

“孙部不过有几百条长短枪，子弹不多，没多少手榴弹，没看见有机枪，只有两匹军马。看见了他们带着捉来的俘虏，有日本人、中国人。孙永勤住在张志辉（应为“张志跃”——编者）即张启生的隔壁。看见孙永勤正闹病，带伤，行动着人用椅子抬着他。”

马秀山先生、闻成先生关于5月23日抗日救国军活动的描述在三点上相同：

一、孙永勤率一路抗日救国军欲经三里店从马蹄峪出口。

二、孙永勤所带队伍在三里店借道不成，当晚被迫住到吴家沟。

三、李连贵率一路抗日救国军当晚成功地通过了松棚营。

上述三点与参加当日行动的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刘秀存、常久芳及第八队长单忠英的回忆基本一致。

对5月23日即毛山之战前一天的情况，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炳曾作过两次回忆。两次回忆大部分内容相同，个别地方有出入。1983年，他在接受栾福忠先生采访时说：“（到遵化城取枪不成后）回到遵化的鸡鸣村。开会，副军长、王宝石人关元有说：‘我们回黄花川、五指山。’马保德、赵四川说：‘到盘山找八路军。’最后依马保德、赵四川的意见打旗子西进。鸡鸣村的敌人卡住不让过，又回来了。黑夜我们进毛山沟，派饭吃，找地主要小米。第二天早上4点钟，敌人把炮、机枪架上了，开了火。”1986年11月17日，他在接受佟靖功先生采访时讲道：“回到鸡鸣村，屡屡地得到信，孙永勤的朋友（也是老百姓）来信说：‘敌人都发来了，你们在这儿呆着不行啊！’孙永勤召集队长们上军部开会。关元有、老张我们说回五指山，副军长马保德说去滦河桥悬呼山，孙永勤说奔蓟州盘山，依着孙永勤了。到鸡鸣村梁上，有伙会、军队不让过，要过就开火。说合一回，还不让过。住在一个小山沟里，住半宿敌人就来了，咱们部队上毛山了。孙永勤当时脑袋疼呢，用椅子抬上毛山了。”

刘秀存对毛山之战前一天的回忆是，从七户东边山梁撤下来后，他们经景忠山到了白马峪，从白马峪分两路奔了小于沟，之后在王家沟驻扎。“傍黑，”1987年3月8日，他向佟靖功先生说，“我们四大队集合。李连贵说：‘咱们不上毛山，明天毛山要有危险。’我们从秋花峪奔毛山沟、小厂、松棚营、西沟，在黄花峪宿的，漆黑的。我们第二天从黄花峪动身时，八、九队有几个人跟我们四大队走了。当时八队有200多人，九队也是200多人。李连贵神。”

常久芳记忆中的情况是：“孙永勤伤口疼，在柴户场住下后，四周的甲长不停地来，和孙永勤说：‘你们还是躲，还是打呀？’四周都被日军围上了。到五天后末晌，烧后晌火前，我们在柴户场集体开个会。孙永勤讲：‘我们现在别紧张，本来就没想活着回去。哪个队能出去，咱们上五指山集合，再找关系，再做计划。’李连贵、年焕兴一个队，何广永、陈广发一个队，康永贵带着40多人是第五队。孙永勤说：‘你们这几个队往西转，奔黑锅顶。’我们几个队400多人到毛山顶，一看都是齐胸深的战壕。我们在毛山顶上眼瞅着孙永勤带300多人出大

沟，奔景忠山了，也可能又奔毛山了。”

抗日救国军第八队长单忠英对5月23日当天的情况只留下了一句话：“毛山南面三里店，我们明白了谁是汉奸。”这句话显然是针对拒绝抗日救国军通过的三里店民团说的。因为这几个人的不同意借道，导致抗日救国军当晚未能出口，次日一早遭到日军和国民政府华北当局的联合“围剿”，很多人在战斗中死去。

从上面四位抗日救国军官兵的回忆看，第一，孙永勤曾召集领导人开会，商量行动去向，会上有不同意见，最后决定西去。这一点大家意见一致，但开会地点说法不一，有鸡鸣村、柴户场两种看法。如果加上吴凤忠1986年对闻成先生讲的在小于沟开会说，那么孙永勤开会地点就有三种说法。会商的结果，也并不统一，有去盘山说，也有重回热河说。第二，会后，抗日救国军分两路西进，孙永勤率一队，李连贵带一队。这一点意见一致，但李连贵为什么未和孙永勤一块行动，说法却又不一。一种说法是孙永勤指定的，另一种说法则是李连贵凭直觉意识到毛山第二天会发生危险，于是决定不在毛山一带停留，连夜向西北山区挺进。第三，孙永勤所率队伍在西行中曾遇民团（一说伙会）阻挡。这一点意见一致，但民团（伙会）阻挡地点，又有鸡鸣村、三里店两种说法。

上述三点中，第一点里面的开会地点，由于有孙永勤驻扎于其家的吴凤忠作证，兼之闻成先生调查的情况也为孙永勤率他那路队伍从小于沟出发，可以确定为小于沟。第三点中的遇民团（伙会）阻截地点，由于有当时亲自给抗日救国军带路的闻成先生的表兄陈安良作证，可以确认为三里店。除此之外的其他意见不一致的内容，仍待进一步调查、确认。

孙永勤遇阻的三里店山梁，在吴家沟村西南二华里处。2007年4月13日，吴凤忠之子、小厂乡信访办科员吴艳民开着他那辆吱吱嘎嘎哪儿都响的“坦克”——一辆开了若干个年头的红色昌河面包车，带我实地看过。之前在阅读抗日救国军战士的回忆和关于孙永勤的研究文章时，我曾以为它是一座高峻险要的山岗，只要卡住了路口，下面的人休想轻易通过。到了孙永勤部被阻截地点，才发现那不过是一座稍微有些起伏的黄土丘陵。那样一个地方，因为几个民团（伙会）——陈安良说只是六七个人，不敢做主让他们通过。孙永勤和他率领的那一路数百名抗日救国军便未强行冲过去，致第二天很多人血洒毛山，不能不令人惊讶。

“我是当过兵的人，知道孙永勤就该死。”吴艳民感慨道。他这句充满宿命味道的话不是随便发出的。

5月23日当天，在三里店因民团（伙会）拦阻，应该西去而未西去，只是吴艳民说出上面那句话的原因之一。到达吴家沟后，又发生了两件事情，导致孙永勤最终作出了当夜停止西进的决定。

首先是，孙永勤到吴家沟后感觉精神状态不佳。

过去有文章提到孙永勤之所以当夜在吴家沟住宿，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在饮马坑所受腿伤一



图143　抗日救国军遇阻未能通过的三里店山梁。2007年4月



图144　吴家沟村头　2007年4月

直未愈，到吴家沟当晚疼痛加剧。2005年8月，我到吴家沟采访5月23日晚曾给孙永勤治病的医生之子吴广顺老人，确认那晚孙永勤驻扎吴家沟和腿伤未好不能说无关，但主要是精神不好，不想动弹。

“我父亲叫吴占满，当时也就四五十岁，会先生。孙永勤晚晌到这儿就住了，他那天懒得动。我父亲会先生，给整治整治。黑夜都睡觉了，日本子就追上来，围上了。民众都知不道，连庄上人都不知道。天亮时，看见山上有人，才知日本子全给围上了。”

其次，入夜，吴家沟一带又开始下雨。孙永勤因此决定抗日救国军当晚住宿吴家沟，第二日再出发，给日军留下了成功合围的时间。按闻成先生、吴广顺老人的说法，抗日救国军当晚住宿时还未放岗哨，或放出了岗哨却未看到日军，造成了未及时发现敌人来袭，及早发出警报，让抗日救国军在日军合围前突出去的最后一个机会也丧失，导致第二天只能被动地退上毛山，让日军发挥空地打击优势，彻底消灭的命运。

按照马秀山先生的说法，孙永勤在率领他那路队伍到达三里店北山根前，驻遵化保安大队长吕振江曾捎来日军将要总攻、希望抗日救国军快走的口信。为什么已经知道形势比较严峻，孙永勤仍不努力离开毛山地区呢？即使不知道吕振江所说的情况，根据孙文炳、常久芳的回忆，孙永勤自己也早就从毛山周围百姓和很多甲长那里获悉了日军来包围的消息，为什么当在三里店遇到民团（伙会）的拦截时，以数百人对六七个人都不强行通过呢？到达吴家沟后，因

为不愿动弹、遇雨就暂停突围行动，在那里驻扎了呢？仅仅是因为孙永勤一直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想法，不愿与民团（伙会）交战，或担心与民团（伙会）交火后会引来更多敌人，战士连日战斗非常疲劳，下大雨行军辛苦这样的原因吗？

“作为总指挥来讲，孙永勤有一种末日之感。”2006年4月，我到遵化大草店拜访闻成先生时，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闻成先生的这句话说透了孙永勤当时真正的心理状态。

根据孙文炳1986年11月17日对佟靖功先生的回忆，5月23日当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孙永勤起义不久便参加了他的队伍的王福合（孙文炳说他是第三队长）带着150多人脱离了大部队，准备回到热河。当他们行至今迁西栗树湾南面一个叫大块地的地方时，被孙永勤派两个队追了回来，但当晚王福合自己又一个人脱队走了。

孙文炳所讲是否属实尚须调查，然由此前援引的陈安良的回忆中也提到5月23日后半夜，军部有人逃跑来看，5月23日当天，抗日救国军中肯定再次出现了军心浮动的情况。我猜想这一定令孙永勤很是悲伤。他之所以入关，就是因为军需不足，导致军心不稳，部下离散，不仅影响到抗日救国军存亡，且殃及抗日大业是否还能继续，为不致出现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才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如今进入关内，军需还是没有着落，并再次出现了他担心的军心动摇、部分人对抗日救国军前途失去信心的局面，孙永勤肯定内心非常痛苦。这种精神上的痛楚和伤口未愈带给他的肉体上的痛苦及天气给人的心理的不良影响交织在一起，一时令他的情绪非常低落，悲凉、迷茫、孤独的感觉充斥心间，导致他在23日连续作出了对抗日救国军不利的判断。

以上是对抗日救国军5月23日活动的介绍及对孙永勤为什么未能西进的真实原因的推测。

当日日本方面要记载的有如下几方面事情：

1. 当日下午2点至4点，仪我、高桥坦、酒井隆、大木在天津日租界常磐旅馆与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一起就“围剿”孙永勤问题商谈。会后，仪我在殷汝耕、陶尚铭陪同下到河北省政府拜谒省主席于学忠，就非战区问题进行协商。

事见《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4日（1935年5月24日）第三版和《新闻报》同日第四版。

《申报》的标题是：“中日交涉人员续商剿匪问题，会商毕偕谒于学忠，特警追剿遵化残匪”。内容如下：

天津　陶尚铭二十三日早六时半，搭平沈通车抵津，午前十时偕殷汝耕同到省府谒于学忠，报告特警第二总队张砚田部及保安队第二总队杨玉成部换防情形，并讨论遵化刘桂堂匪股剿击各事。二十三午后二时，殷汝耕、陶尚铭偕到日租界常磐旅馆访仪我、高桥、酒井、大木，谈长城线附近匪股孙永勤部清剿事，迄四时方散。（二十三日专电）

《新闻报》标题为：“蓟滦两区特警夹击孙永勤匪部，现正向迁安追击，残余绝难漏网，殷陶昨抵津，访高桥商战区问题，传日军将有千名开入战区”。内容为：

▲中央社二十三日天津电　仪我二十三日午后由殷汝耕、陶尚铭陪赴省府谒于学忠，对战区一般问题有所协议。据魏鉴谈，孙永勤部自抵遵化后，日军开遵化，我方特警即抵遵化南部追剿。刻孙部已窜迁安，遵化由特警接防。

2. 伪热河日军参议小烟到天津与梅津美治郎会晤。

事见《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4日（1935年5月24日）第三版：

天津　仪我、高桥今访于学忠，伪热河日军参议小烟二十三来津晤梅津。（二十三日专电）

此消息中之“小烟”与《盛京时报》康德二年5月24日（1935年5月24日）第四版中提到的“小幡”是否同一人，不得而知。如是的话，他来天津的主要目的是与梅津美治郎、仪我、高桥坦共商“围剿”孙永勤抗日救国军问题。

《盛京时报》5月24日相关内容如下：

又天津电：向遵化方面逃走之孙永勤匪，受在马兰峪之山田部队一支队于尖山屯击退，孙永勤脚部受伤。当孙匪由热河退出时，已受大打击，仅有百余名。而自入遵化以来，纠合附近匪军，现势力号称千六百名，如武器子弹，由遵化县长供给。在停战地区内仍然有如斯不法行为，军部当然有讲求膺惩手段之必要。待仪我大佐、高桥驻平武官及二十三日到天津之〇〇团小幡参谋〈会合〉，即行协议重要对策。

3. 日军热河警备队秋原旅团一部、驻热河关东军松井部队、驻马兰峪山田部队开始包围孙永勤部。驻喜峰口日军侦察队、驻凌源日本守备队、古北口石井部日军本日也应在准备出动或已经在前往毛山的路上。

前者见于《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7日（1935年5月27日）第三版：

北平　日本热河警备队秋原旅团一部因孙永勤部队扰乱战区，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开出动（应为“开出”或“出动”——编者），并有一部越入长城线追击。松井部队亦联合当地之中国警察队向茅山〔毛山〕及三屯营等地包围孙部。同时驻马兰峪之日本侦察队百余名亦于二十四日在尖山屯与孙部发出接触。以上日军出动事件，平日使馆武官屋曾向中国官宪声明，谓关东军为彻底的歼灭该部故，而一时进入长城线以南地区，是乃出于不得已等语，故中日双方均极谅解。（二十六日专电）

驻喜峰口日军侦察队、驻凌源日本守备队也曾出动攻击孙永勤部的情况出自《申报》5月27日同一版：

北平　日方于孙永勤部窜扰遵化时，曾派遣以下各部开入战区协剿。计一、热河警备队秋原旅团。计二、驻热河关东军松井部队。计三、驻喜峰口日军侦察队。计四、驻凌源日本守备队。计五、驻马兰峪山田部队等。该日军等以孙部已全部溃散，决即撤出长城线外。岳开先今晨由察来平，料理事务。察省日军事联络员松井今晨由张垣来平，与该国使馆接洽事务，日内

即返察。（二十六日专电）

除以上部队外，驻古北口日军独立混成旅团第十一联队第二大队石井部也参与了攻击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行动。

根据《申报》报道，1935年3月上旬，驻热日军第七师团奉调回国。原防务由关东军奉日本陆军机关命令临时组成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负责，旅团长一职由川岸文三郎少将担任。[1]古北口接防部队为该旅团第十一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石井信。他于3月20日左右率步炮机枪各一中队，计600余名日军到达古北口。5月4日，孙永勤部占领下板城，准备攻打承德时，川岸文三郎曾急调古北口及承德附近各县日伪军救援。石井大队长以兴隆县双洞子发现教匪千人、需要“堵剿”为名，率古北口驻军大部东出墙子路增援，此后一直未回防，古北口防务由隈部山炮队长留守。

根据《大同报》、《申报》报道，石井部曾于5月24日拂晓攻击李连贵部，并在毛山之战结束九天后尚滞留长城口内。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古北口办事处主任霍实子解放后曾撰文，认为在遵化境内攻击孙永勤的驻古北口日军是永见后德的部队，事见霍实子1982年9月3日在上海写作的《我脱离殷汝耕的经过》。文中说：“后来，我才知道‘围剿’孙部的日军轰炸机是由承德起飞的，地面部队是驻古北口的日军三十五联队永见后德的部队。当他的部队出发前，日军扬言是他们照例每年一次的秋季行军，以掩我方耳目。”然1935年5月时期古北口曾驻有日军三十五联队一事，既未见诸各报章，也与他当年对外界所谈不符。我疑驻古北口永见后德部队攻击孙部的说法，是他晚年没有条件核对史料，只能凭借记忆写作，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的结果。

霍实子当年的谈话内容载于《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7日（1935年5月27日）第三版：

北平　古北口办事处主任霍实二十六日来平，谒殷汝耕，报告地方情形。定二十七日赴通县，出席蓟密区行政会议。据谈，古北口日军自四日由石井大队长率领大部分部队出关，现尚未返防，由该队隈部山炮队长留守。地方治安，因我警察维持得力，甚为安谧。又古北口日军连日戒严，对于往来行人，检查甚严。（二十六日中央社电）

日军当年由热河调兵到毛山包围孙永勤部队的行动，有一位目击者。2007年4月13日，我在遵化小厂乡采访时，毛山沟村民赵金山对我说：

“父亲原来家住兴隆的三道河子，集家并村时招赘到遵化毛山沟。他那年十三四岁，在三道河子澈河南大东沟亲眼看见日本调兵。他说，日本子一听说要打孙永勤，呲牙咧嘴、瞪

[1] 1935年3月至6月的民国报纸在报道川岸文三郎任旅团长的独立混成旅团情况时，未写其番号。有可能此旅团因系“临时组成”，最初一段时间确未有番号。由川岸文三郎履历来看，此旅团的最后定名应为“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有中国抗战史研究者依据日方资料指出，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与日军其他的独混旅团还不同，它是拥有野炮、山炮各一大队的火力强化的野战旅团。这解释了以后毛山之战的亲历者、目击者何以多说日军主要是用炮打的毛山的原因。


图145　从九虎岭炮阵地眺望毛山。2007年4月

着眼珠子往南边赶。从口外用骡驮队驮着机枪、小钢炮，由半壁山、三道河子、蘑菇峪三条沟往毛山发。调兵调了一天一夜，到九虎岭变电所那儿把炮支上了。日本子觉得可在毛山打一决战了，高兴坏了。让老百姓牵着骡子，推着骡子屁股，牲口流着汗，往山上驮炮。看见老百姓动作慢了，举起枪托子就砸。孙永勤部是敌人多了就躲了，敌人少了就把你灭了。日本子都管孙永勤叫'山耗子'，把他恨透了。"

4. 日军司令部移至滦河桥。

消息出自《大同报》康德二年5月27日（1935年5月27日）第一版：

【北平廿五日电】　据本地日本机关所得情报，向孙永勤匪讨伐中之某部队，于廿三日夜，向其正面开始行动。廿四日拂晓，向蟠踞于柴户场之孙匪加以猛击。该匪放火焚烧附近民家，向迁安县境方面败走。又某团司令部于廿三日夜移于撒河桥〔滦河桥〕，某团团长亲自督战云。

"某团团长"在本则消息中未说名字，实即关东军驻热独立混成旅团长川岸文三郎。

国民政府方面5月23日的动态如下：

1. 何应钦在与阎锡山商量完"清剿"陕北红军办法后，于本日由太原回到北平。

消息出自《大公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4日（1935年5月24日）第四版：

【太原二十三日下午八时发专电】　何应钦连日与阎锡山对清剿陕北共匪已商有完密办法。何二十三日晨偕刘冀飞开全体随员离并返平，阎与徐永昌亲赴站欢送，各军政要人各界代表赴站欢送者达千人。

【北平电话】　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于昨晨专车离并。午至石家庄，即转平汉路北上。晚八时过保定，夜十二时抵平。商震、王树常、鲍文樾、关麟徵、邵文凯等及军分会组长以上职员百余人均至车站欢迎，何下车后与欢迎人员略事寒暄，即返居仁堂休息。

2. 殷汝耕、陶尚铭到津，上午向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汇报特警换防经过，请示遵化"剿匪"问题，下午到日租界常磐旅馆，与高桥、仪我、酒井、大木等协商"围剿"孙永勤部队问题。会后，陪仪我与于学忠协商非战区内各事项。

殷汝耕、陶尚铭与日方商谈内容，据殷汝耕5月24日中午回到北平后对报界披露，为"我

方曾对日方表示，现在战区内我方保安队人数甚多，少数土匪之剿灭，绝对不成问题。孙永勤部现已逃迁安，张庆余部七中队正追击中，张砚田部六中队亦正迎头截击，不难歼灭”。消息见《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5日（1935年5月25日）第三版。

3. 驻滦榆区特警一部也加入到围堵孙永勤部的行动中。

消息见《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4日（1935年5月24日）第三版：

北平 遵化电：大寨方面之匪，经保安队击溃后，已窜入迁安县境。特警第一总队区队长张耀明亲率第三大队尾随追击，滦榆方面亦调派一大队迎头堵击，不难聚歼。在茅山〔毛山〕盘踞之刘桂堂残匪，经团队追剿后，现已逃至洪山口左近，人数只数十名。（二十三日专电）

文中之特警第一总队区队长张耀明，大部分报纸写作“张含明”，伪滦县公安局分所雇员张炳如在专文《冀东保安队琐闻》中也写作“张含明”，据此判断，“张含明”是正确写法。

驻滦榆区特警为河北省特警第二总队，总队长是张砚田。他的队伍与张庆余部同于5月10日开出，与旧战区保安队换防，但最后一批19日才开出，20日前后才全部到达原由杨玉成部驻扎的防区。

1935年5月24日（中华民国24年5月24日）：

抗日救国军方面，马秀山先生记载如下：

“凌晨4时，日军开始攻击。先是山田队200多人乘车冒雨越过国民党保安队特警防区，从南面驶向吴家沟村西口。在日军通过保安队特警防区时，有的特警鸣枪。抗日救国军一闻枪声，迅速撤出村外，进入毛山沟。日军见状后，以机枪、钢炮向毛山沟轰击。随即马台子、官台子、九泉山三处，同时朝救国军阵地毛山沟开炮。炮声停止后，日军石井队从西北向毛山沟穿插，川岸联队主力从北面向毛山包围，松井队从东面向毛山兜进。此刻孙永勤伤势未愈，在赵四川、王殿臣、关元有等保护下，人们用椅子抬着登上山顶，指挥部队，占据了头道毛山、二道毛山、三道毛山。凭借1933年国民党二十九军长城抗战时的壕堑固守阵地。战斗中日军利用飞机空中盘旋，指示目标，炮火异常猛烈。孙永勤一度让关元有单独率部突围，关元有不肯，他决心与孙永勤一同报国。遂将队伍两路分开迎敌。救国军在处境艰难情况下，仍多次击退日军。曾击毙日军田边少尉及一下士，打伤日军士兵十余人。战到中午12时15分，孙永勤、关元有等壮烈殉国。赵四川、王殿臣等领导者亦随之先后英勇献身。战斗中由于日军的炮击与空扫救国军，阵亡者约300余人。少数幸存者各自为战，最后有的战死，有的被俘。是日下午，日军分别撤回马蹄峪及澈河桥，保安队留少数清理战场，大部撤回遵化城。”

马秀山先生的上述描述当是综合了伪满《大同报》、《盛京时报》报道和《孙永勤烈士传》中相关内容，对其进行概括的结果，有少部分是他自己亲自调查的材料。好处是比较简洁，缺陷是漏掉了5月24日当天很多真实的、残酷的东西。

为尽可能让读者对1935年5月24日抗日救国军被“围剿”的情况有个全面真实的了解，我拟从报纸报道和图书，档案资料，抗日救国军幸存者回忆，目击者和知情人回忆，传说五个角度予以介绍。

一、报纸报道和图书

1. 报纸

伪满方面：

《大同报》康德二年5月27日（1935年5月27日）第一版以“扫荡国境孙永勤匪，毛山沟已发生战斗——关东军司令部之发表”为题，介绍5月24日战斗过程如下：

（前略）战斗系于廿四日拂晓。有孙匪一部李连贵匪百五十名，谋脱逃，而现出于石井部队之正面。距离五十米，铳火齐开，一举而溃灭之。次即炮击毛山沟高地。川岸部队长乘联络用之莫斯机，午前七时由撒河桥〔潵河桥〕出发，低飞行于战场上空。认清孙匪据〔踞〕有河北策〔作〕战时中国军所构筑之战壕，我飞行机扬日章旗以示位置。及见我部队之位置，确认吾已完全包围匪团，乃投下通信筒，通知山田部队长，曰“可安心，吾已确实包围敌人”。兵团长自行侦察敌情，与第一线以情报，实战史上未闻之从容光景也。第一线部队以本部队长



图146　站在毛山峰顶南望，十几华里内均是开阔地。2006年4月

之激励，勇跃前进，缩小包围圈，午后零时十五分将敌歼灭，日章旗得飞扬于毛山沟高地最高部。扫除战场结果，匪贼遗弃尸体三百余，卤获步枪、手枪二百余。匪团四百余，以半日战斗歼灭之。孙永勤并其参谋长宫有元〔关有元〕之尸体亦于最后複阁阵地收容之。完全被包围之匪贼困斗，亦甚凄凉。我方战死者将校一、下士一、兵四名，下士官以下重轻伤者九名，诚属遗憾，是盖为热河治安之基础而牺牲者。

同版，《大同报》还发表了以下消息：

孙匪尸体发现

毛山沟日军有死伤

名誉战死将校一名

毛山沟附近战斗，敌匪参加约四百名，遗弃尸体三百有余，其中有匪首孙永勤及参谋长宫有元〔关有元〕尸体在内。其卤获品，大枪及手枪二百五十支。日军名誉战殁者，将校一员，下士一，重伤者二，轻伤者一名。

神鬼共泣

田边少尉之战

毛山沟附近高地战斗，其悲壮战死，田边少尉状态，神鬼为之共泣。田边少尉乃第四十六期青年将校，此次讨伐，由开始勇敢活泼，颇著功绩，于廿四日在遵化东北方约三〈十〉里之吴家沟，攻击中，午前六时廿分受致命一弹，当即倒卧。中队长跑到，将伊抱起，即云我难以报国，请勿为念，请伤〔饬〕中队前进。言后露悲壮之声，大呼天皇陛下万岁，呈请队长代唱陛下万岁之声，后气息已绝矣。

日军部队

全面猛击孙匪

【北平廿五日电】 据本地日本机关所得情报，向孙永勤匪讨伐中之某部队，于廿三日夜，向其正面开始行动。廿四日拂晓，向蟠踞于柴户场之孙匪加以猛击。该匪放火焚烧附近民家，向迁安县境方面败走。

《盛京时报》康德二年5月27日（1935年5月27日）第二版也做了相应的报道，标题及内容如下：

孙匪全部

被击溃灭

关东军司令部发表

【新京电】 据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川岸部队所属之孙匪讨伐队，探知孙匪之集团在三屯营西北方十二满里之柴伏厂〔柴户场〕（遵化东方二十四满里）附近，且悉其阵地在毛山沟

（三屯营西北十二满里）北方五十米远之高地，并依靠河北作战当时沿棱线所构筑之堑壕，故由五月廿三日夜开始行动，由廿四日拂晓开始攻击，将匪完全包围。集中炮火，越过险艰之山地，沿着棱线，逐次压迫厂〔该〕匪。午后零时十分完全占领该高地，对孙之主力予以歼灭的打击。将尔后之行动准备中。日军虽有相当之损害，但目下正调查中云云。

《盛京时报》在同版也报道了孙永勤部及日军的伤亡情况，但与上引《大同报》消息有两处不同：一是将孙永勤参谋长名字写成了“韩有源”。二是将日军轻伤者记为十人。

中华民国方面，《申报》、《新闻报》对5月24日战况也作了报道。

《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6日（1935年5月26日）第三版以“遵化秩序已恢复，日军向撒河桥〔潵河桥〕撤退，孙永勤部窜喜峰口，孙有被特警捕获说”为题，发表了四条有关孙永勤的消息：

天津　二十四晨，日军自遵化、迁安向撒河桥〔潵河桥〕撤退，遵化一带秩序已恢复，城门开启解严。孙永勤部廿三夜经日军围击，死伤甚重，残部二百窜入迁安山中，日军仍在搜索。传孙永勤已经我特警捕获，解遵化县府。（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　孙永勤部与保安队特警及民团等接触，仅余二百余人，逃往喜峰口附近之深山中。孙永勤本人率队百余人逃至喜峰口，二十四被围，并传孙被捕。（二十五日专电）

天津　官息：长城线遵迁一带剿匪计划自商定办法后，日军积极行动，在遵化北三家店〔三里店〕、鸡鸣村将孙永勤部包围，战甚激烈。孙部受创颇巨，有向东窜模样。（二十五日专电）

长春　川岸部队二十四日晨在毛山沟包围孙军四百余人，日军以步兵炮扫射。据关东军发表，孙军在此战斗阵亡三百人，孙永勤本人及参谋长官亦同时战死。日军方面死三人，重伤二人，轻伤一人。（二十五日日联电）

次日，即1935年5月27日（中华民国24年5月27日），《申报》在第三版又发表了两条消息：

天津　官息：孙永勤部二十四日在迁安三头营〔三屯营〕遭日军围击，孙本人及其参谋长官有元〔关有元〕确已阵亡。（二十六日专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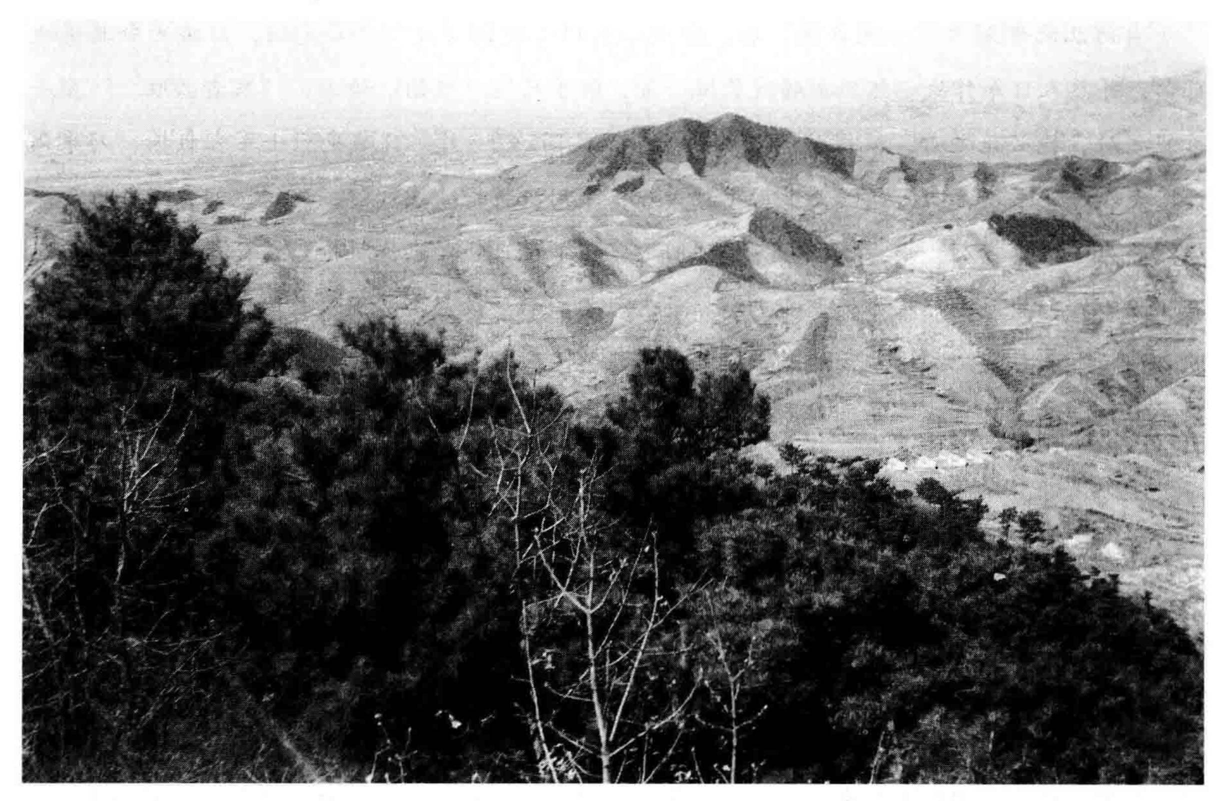
北平　孙永勤匪部在大茅山〔毛山〕被夹击，伤亡甚重，孙本人亦负伤，余匪均逃散，刻正由团队搜索中。（二十六日中央社电）

天津《新闻报》关于“围剿”孙永勤部的报道比较有价值的是两条，第一条载中华民国24年5月25日（1935年5月25日）第四版：

▲日联社廿四日北平电：遵化、迁安两县保安队，由东、西、南方夹击孙永勤部，关东军川岸部队现由北方向三屯营前进。

第二条载中华民国24年5月27日（1935年5月27日）第四版：




图147　站在毛山山顶西望，远处山峰是二道九泉山，1935年5月24日，那里也设有日军的炮阵地。2006年4月

▲北平　蓟密区署息：日军二百余名，廿四日在罗文峪将孙永勤部击散后，当日即撤回长城线外。蓟密区特警七中队，因三家店〔三里店〕、鸡鸣村一带已无匪踪，廿四日亦撤回遵化城内。

从以上援引的民国报纸的内容看，它们对5月24日战斗过程的记载不如伪满报纸详细，其价值主要在于提供了毛山外围的一些战斗的情况和中方特警队、保安队在5月24日的行动轨迹。

2. 图书

距离1935年5月24日最近的记载有毛山战斗的图书是王亚编的《东北抗日烈士传》，当中收录了闵时夫所写的一篇《孙永勤烈士传（附宫有元李运贵及孙部七百余人殉国事略）》。标题括号中的“宫有元”实为关元有，被误听或误传成“宫有元”。“李运贵”通过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核对原书，发现是排版错误，实际应为“李连贵”。

《东北抗日烈士传》出版于1935年12月，距孙永勤牺牲仅六个月多一点。由于时隔不远，这篇文章中尽管部分内容有夸张、演绎的成分，但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该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字极其简炼、有力，全篇自始至终充溢着一种激愤的英雄情怀，读来令人震撼。在我看到的所有关于孙永勤的文章中，它是写得最好的一篇。

我现将此文章中自孙永勤拒绝日伪招抚直至牺牲之时的文字尽数抄录如下：

自河北北部划为“非武装区”后，保安队长均逐渐换为日本忠实走狗，日贼遂命其夹攻孙部，并参入日军作战。然烈士转战长城一带，时予日寇以重创。语云：“哀者必胜。”烈士杀贼之时，抱必死之心，故得必然之胜利也。至民国24年4月，日贼见烈士军容日振，乃采用最惨无人道之手段，四面包围，上用飞机轰炸，下用机关枪、烟幕弹、达姆达姆毒弹并毒气进攻。然烈士仍率万人，竭力抵御。虽用陈旧之军械抵抗日贼之毒弹机枪，前仆后继，仍杀日满军队五千人，然烈士部队亦损失甚重矣。最后烈士四面受敌，乃突围入长城，以至关内可得同胞之应援也。日贼拟加堵截，然烈士所部大队斩关退入河北，毙扼守长城关隘之日贼百名，卒退至遵化一带。时日贼一面调杉原部队进击，烈士亦率众在长城内外抗战。血战三周，虽牺牲二百人，然日贼势亦不支。至民国24年5月初，大洼一带农民均起响应。即大刀会及各地其他会党，亦闻风兴起。自热河以至遵化，相从者一时数逾四万。日贼亦开始作总攻击，一面迫令兴隆县全体人民退出，以便飞机乱炸，同时并集中日军千名、伪军千名，由松井等贼，出撤河桥〔潵河桥〕进攻遵化；一面调动古北口石井部五百人，经石匣镇出长城小口墙子，以攻其背；一面调川岸部由罗文峪方面进攻，同时又由所谓“非武装区”保安队由张砚田张庆余等部作严密之总包围。日贼并请遵化县长“协剿”。县长派警队迫孙军，烈士亲至其前曰：“君中国人耶？日本人耶？如为中国人，请告余果犯何罪，余可自杀。如君为日本人，则余将杀汝也。”警官即率队逃回县城，闭门不出。然保安队及特警仍奉日贼旨意，猛烈进攻，同时日贼军大队亦于5月20日进长城，21日抵我遵化矣。至是孙部于沿途转战之余，当有原举义之志士千人，枪亦近千支，22日在遵化十里铺、茅山沟〔毛山沟〕一带与贼开始激烈战争。时孙部将李连贵率一五〇人与日贼石井部队激战，已迫日军后退。但自南面进攻者，除保安队外，尚有河北省政府派遣之军队两营加入，与日贼协同进攻。日贼又用大炮飞机毒弹机枪，向茅山沟〔毛山沟〕孙军总部作残酷之轰击，附近村镇全被日军毁灭，皆成灰烬，农民惨死者亦不可胜数，受伤者群集道旁。烈士在战线中指挥，见无辜农民惨状，大恸，顾其参谋长宫有元（关有元）曰：“今弹尽援绝，又被日伪及河北省政府严密包围，吾决在此为最后之一战，君可率一部冲向热河。因如向南退，日贼又将借口追击，进扰华北矣。”宫〔关〕烈士曰：“吾当与君报国于此，回热之军由他人领率可也。”于是孙下总攻击令。孙在中央，手执机关枪，向日贼密处射击。宫〔关〕担右翼，李任左翼，向前冲锋。而另一部则乘时突围出热河。当此时也，弹如雨下，血肉横飞，激战至25日，日伪虽亦损失甚大，然我烈士孙永勤及参谋长宫有元〔关元有〕、队长李运贵〔李连贵〕并全体士兵均血战而死。据日贼报称，检点遗尸，凡七百余具。呜呼！血战至最后一人，无一屈服者，惨矣，烈矣！在殉国英灵之尸体中，发现孙烈士及宫〔关〕烈士，衣上均绣有姓名，全身均为机关枪所伤，遍体血肉模糊。当地居民乃含泪掩埋，而此诸抗日英雄遂与世长辞矣。呜呼，此累累之骨肉，实我民族最勇敢优秀之菁英也！

二、档案资料

兴隆史志办保存着一份电话记录，来电人是承德党史办彭明生先生，来电时间是1985年2月27日。电话内容是关于孙永勤头颅之事：

“我们去中央档案馆查资料，翻阅‘山斋秀也〔三宅秀也〕’卷一，编号5，第12页，记有：有一个部队长山田把孙的首级带到承德，在河南街向一般街民展示（河南街就是二仙居）。”

三、抗日救国军幸存者回忆

我看过的材料中，有八位参加了5月24日战斗的抗日救国军官兵留下了直接或间接的珍贵回忆。其中，刘俊岳、单忠英、孙文炳、郝敬义、杨佩之是从毛山上突围出来的，刘秀存、常久芳是李连贵、年焕兴那路队伍的幸存者。

先介绍刘俊岳等对毛山主战场战斗的回忆。

刘俊岳在上世纪60年代初、80年代初曾两次讲述毛山之战的情况。1961年，他对采访者王玉璋说：“在洪山口三道沟村，我们知道了敌人要以最大兵力包围我们。命令集中到遵化东北毛山，我们就向那里转移。在六月二十一二日就被鬼子包围了。围到六天头上，同志们向外突击，我们第一大队只冲出20余人。这次战斗，敌集中了迁安、遵化、蓟县、滦平、兴隆五个县的鬼子约六七千人，警备队约万余。

“我们二十几个人冲出后，到兴隆的黄台子分手了。在家躲二年多后，我参加了1938年的大暴动。”

刘俊岳的上引回忆中有个错误，即日军包围和攻击他们的时间与实际对照，错后了两个月。此外，包围他们的敌人数量恐也较实际为多。

在第一次回忆过去20多年后，1983年6月15日，他接受了兴隆党史办栾福忠、邢连义先生的采访。这次他主要对毛山之战失利原因作了分析。

“我们是从毛山东面冲出去的。在五指山前怀黄台子吃了午饭，解散了。

“毛山我们占的是大山，连树都没有。如果在兴隆的小山不会有那事（指失败——编者）。即使敌人包围了，如果占小山，走着也便利。

“毛山没崖，没树木，没柴草，干干净净。毛山活动，敌人看得真真的，一行动四周哪儿都能看到。感觉毛山高可能会对作战有利，没有经验。”

单忠英回忆毛山之战的时间是1983年4月17日，采访者也是兴隆党史办栾福忠、邢连义先生。

“到毛山不过五个队。

“毛山东西保安队围上我们。

“日本人到处炮轰我们。跑不了就打，打不了就跑。

“孙永勤在毛山自杀，听说自杀。他的尸首给拉到遵化街头放了三四天。

“张守礼我们托人把枪藏了起来，藏到老乡家里，躲过日本军的搜查。”

单忠英接受采访时，年岁已高，关于毛山之战只讲了以上这些话。但他生前身体硬朗、思维清晰时，曾对儿子单志华、孙子单健陆陆续续回忆过一些抗日救国军最后一战的情况。经单志华、单健的转述，我们得以了解了更多的那场战斗的情景。

“据我父亲说，”1983年4月17日，与采访单忠英同一天，单志华对栾福忠、邢连义先生说：“战斗开始，敌炮向扎鞋底一样炮击毛山主峰。那时我父亲在另一个山头。孙永勤看到大势已去，把四个日本俘虏打死（实为两个——编者），自己也把自己打死。我父亲几个弟兄握大枪磕头，发誓突围出去：‘谁也不准当汉奸，谁当汉奸谁遭车轧。’我父亲突围，冀东特区保安队有个吕大队长有民族气节，把我父亲他们捉住，给了一条活路，让他们从防区爬山走。我父亲他们把枪藏起来，到了北二里村。姥爷是保长，穷秀才，两面政权，为共产党办事，把我父亲他们四个人藏在地窖里养伤。这四个人，一个叫杜山，东北人；一个叫曹万林，北二里人，穷得一贫如洗；还一个张维利，迁西兴城人；再就是我父亲。”

“整个的山头给炸下一两米。”2005年夏，我采访单志华时，他说，“上面飞机照着，下边炮往上轰，周围全是日军，出都出不来，炸都炸死了。向外闯一部分人，也没闯出去多少，几道圈啊。我父亲他们侥幸，是打阻击的，给围在外圈上了。如果围在里圈，也出不来。

“我父亲说，都混战在一块了，最后搅到一块了。向下冲啊，突围呀，冲不出去呀。炮都打成那样了，日本人集中了好几个地方的兵力，连炮带飞机，下多大工夫。差不多就冀东来说，打得最激烈的一次。共产党在冀东，日本人也没动用那么大的兵力呀。那时候共产党主要是打游击呀。

“上边飞机炸，下边都是山炮，像纳鞋底似的，把整个毛山炸得一片火海。他说不要拼刺刀啦，拿炸弹就差不多把山上的人都炸飞了，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

“那都是石头山，藏都没处藏，太惨了。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只有向那儿退了。最后像狼牙山五壮士似的，哎呀，太壮烈了。我们老头不愿聊这些个，聊也没啥用。他说：‘谁还拿过去的事当个事？’生活一幸福了，愿意听过去事的人就少了。”

“他们没多少子弹，就是刺刀。”同年夏，单忠英之孙单健对我说，“很难想象当时战斗该有多么艰苦，抗日救国军是如何宁死不屈、决一死战的，那种战斗意志是很难让人想象的。我爷爷他走运，活下来了。我还是小孩的时候，见有时爷爷看着我和弟弟满地玩，老头口叼着小烟袋，看着我们就乐。他的那种感情，那种快乐，我现在才有所体会。他不是一般的老头，他见了很多生死。他年轻的时候，好多战友都死了，死了以后，他们的整个人生便戛然而止。我爷爷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了，而且又活了几十年，他儿孙满堂，生命有了延续。生命一代一代往下传，子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一大群，他有一种天伦上的满足感。这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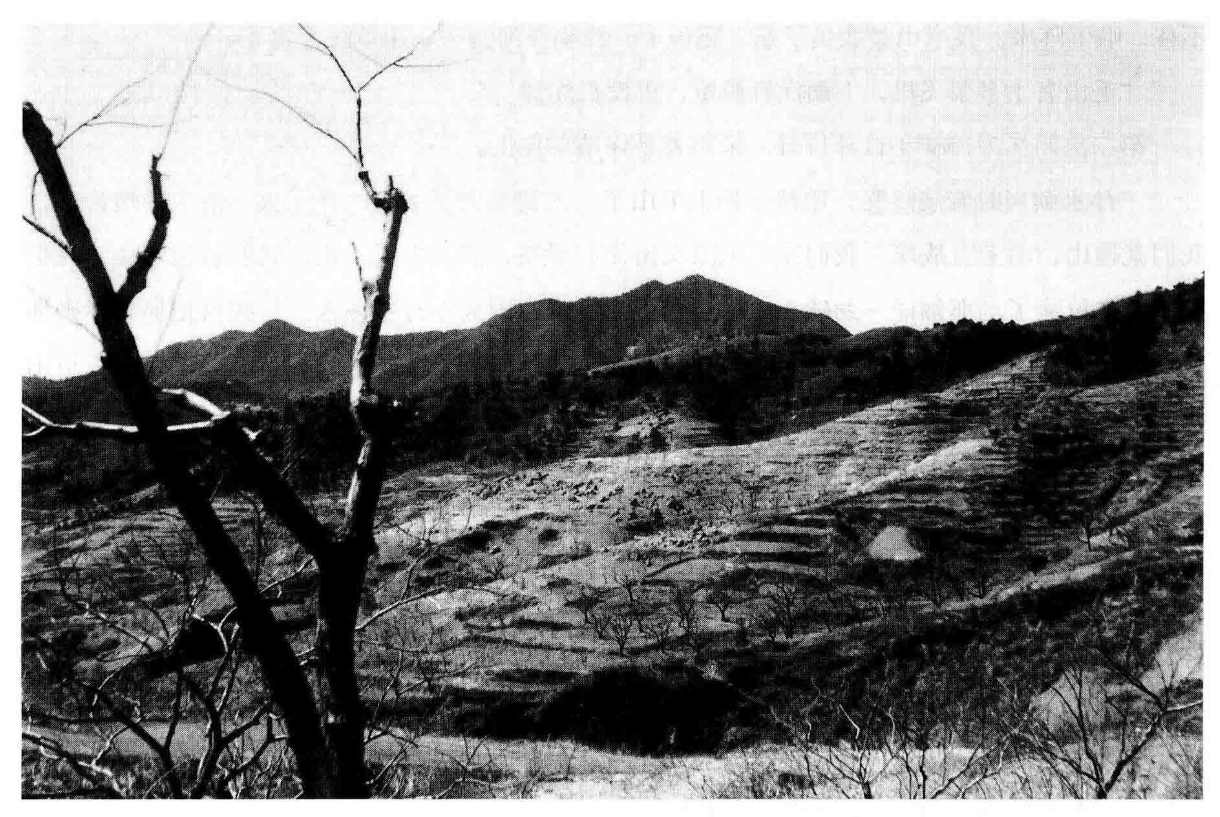


图148　从官台子炮阵地眺望毛山。2007年4月

足感，是咱们没有经过战争、没有经过生死的人很难理解的。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随时都可能死，他从来没想到过还能享受这种天伦之乐。我有好几个姑姑，我爸，然后我，我弟弟，子孙一大群，他能感受的那种天伦之乐，一般人感受不到。估计他很怀念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都二十几岁就死了，死了，就是生命到他们那儿就停止了。中国人从伦理观上说，讲究承上启下，每一个人都有承上启下的任务。当他们死去，就意味着很多生命再不会出现了。没有儿子女儿了，没有孙子了。这是极大的不幸，在中国来讲，极大的不幸。我爷爷通过这种比较，认识到自己太幸运了，生活对他来讲，太值得知足了。我长大以后才理解了这点，小的时候不懂。小时候见老头看我们玩，高兴了和他一块说说话，让他给我们讲故事。不高兴了，把爷爷一扔，自己玩去了。以后知道了爷爷过去那些故事，我才一点点对他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孙文炳对毛山之战也回忆过两次。

第一次是1983年，采访者为兴隆党史办栾福忠先生。

“黑夜我们进毛山沟，派饭吃，找地主要小米。第二天早上4点钟，敌人把炮、机枪架上了。开了火，把我们追至毛山沟。我建议北撤，孙永勤说：‘不怕，和他们打。’敌人机枪、钢炮铺天盖地，占领了要道、路口，我们分据在三个山头上抗击敌人。我们三个人在山梁上顶

不住，败下阵来。在半山腰我负了伤，跑不了，我躺在河沟中，用草盖上身子。

“毛山有十多架飞机，上面没有机枪，也没扔炸弹。”

第二次回忆为1986年11月17日，采访者是佟靖功先生。

“孙永勤当时脑袋疼呢，用椅子抬上毛山了。大清晨上了毛山，开了火。敌人的炮住了，我们就抱山，山上有战壕。我们在三道梁头南面的梁鞍，敌人来了飞机，我们被包围住，我把那俩日本枪毙了。那翻译一劲磕头央求：‘孙永勤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就把那翻译扔那儿了。这时孙永勤在三道梁头上，赵有在我跟前，他是军法处队长。我们从战壕里跑上三道山头，看到孙永勤。孙永勤说：‘你们顶住打！’打有一顿饭时间，两个钟头。上边山头上也有敌人用机枪扫，我们就跑下山去。跑到山半腰，有一片榛柴，一个小沟，我身子上热，发觉受伤了，就趴在那小沟里了。一黑天，敌人吹号走了。黑夜我劈个小树杈子，一拐一拐地下山了。强庄的强连瑞把我接到强庄，离鸡鸣村十多里地。在强庄养一个月零七天，能走动了，才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孙永勤哪儿去了。

“孙文华我们在毛山见面来的，他的脖子后头被打个大口子。”

孙永勤军师之一的郝敬义对毛山之战没有留下直接的口述材料。他关于那场战斗的记忆，我们今天要通过他对他所在村庄的乡亲和后代的讲述，才能知道。

1988年12月15日，郝家营郝士玉老人对前去采访的佟靖功先生说：

“听郝敬义说，他推八门，说不能上毛山，往那么去不是生门，是死门。孙永勤没听。当时孙永勤病了，刮打青紫。被围后，子弹打净，孙永勤拿出手枪，让别人赶紧走。别人不走，逼着别人走了。孙永勤死在毛山了。

“郝敬义说，他藏在榛子棵里，日本人来回走，没看见他。化鱼沟有个张凤义，他们一起从毛山回来的。”

郝家营郝连存听到的情况是：“郝敬义藏在死人堆底下，敌人撤了，他回来了。听说孙永勤是玉鼠星下界，毛山是猫，犯地名了。郝敬义不让上毛山，结果被围在那儿了。”1988年12月15日，郝连存对佟靖功先生说。

郝家营郝连发老人是郝敬义的亲侄子。2007年4月23日，我到郝家营采访时，他对我说：“我大爷在毛山，猫在树林里，大气都不敢喘，这么出来的。他说，其他人都打死了。大爷算卦、推八门准。他说，依着他，不上毛山。司令（应指孙部一位副军长——编者）反对，说：‘不听郝军师的，就要上毛山。’大爷说：‘上毛山，就得受损失。’后来孙永勤埋怨司令，说：‘郝军师算得准。’那个人说：‘算鸡巴啥准？’孙永勤说：‘我就相信郝军师算得准。’”

郝敬义孙子郝连坤也说爷爷生前讲过，他不同意上毛山。2008年7月20日，我到大杖子采访他，他说：“爷爷跟我说过，当时他不同意上毛山。他知道，一个犯地名，一个是毛山只有

点榛棵子。孙永勤不知听了谁的主意，就要上。后来爷爷几个就藏在榛棵里出来了。他说，打起来后，打散了，他猫在榛柴棵子底下，大概猫了一天时间才出来。跟他一块出来的最多没超过三人。回来躲了，估计也就躲在石洞子沟，那儿有表亲。石洞子沟分成沟里沟外两组，总共十几户，现在年轻的都搬出来了。

“爷爷说，孙永勤为人豪爽，枪法挺准。他说，孙永勤上毛山，是遵化方面有人找去的。问我爷爷，爷爷说不好，孙永勤还是硬去了。爷爷说还是在老梁一带打游击。”

杨佩之关于毛山战斗过程的回忆未见有人叙述，目前只知道他从毛山出来的经过。

1986年11月8日，张杖子张如山老人对佟靖功先生说：“杨佩之随孙永勤一二个月便去了毛山。被围了，杨佩之他们三人在山头上松树底下，用绳子把自己绑上。日军发现了他们，把他们带到村里审讯。上边用千斤顶压，下边坐铁砧。日军的翻译官是杨佩之的老师，把他放了。杨佩之在旧历六月回到我们这儿，把口里情况说了。不久，他就搬回宽城。他的岳父家在宽城县老爷庙，清河口往里，塌山这边。他走了以后，就再没回来。当时，我十八九岁。”

孙杖子孙中彦的父亲是杨佩之的学生。2009年12月4日我到孙杖子采访时，孙中彦对我说：“杨佩之会日语，他从毛山出来后，对我父亲说，他让日军找去认孙永勤。他找了一个像孙永勤的，说这就是孙永勤。日军把他放了。”

以上是毛山主战场幸存者对1935年5月24日战斗的回忆。下面介绍李连贵所率队伍幸存者对当日情况的叙述。

刘秀存在1935年5月23日晚随李连贵西行到黄花峪后，便开始犯心口疼病。1987年3月8日，他对前来采访的佟靖功先生说：

“我心口疼。我们班里有个唐山附近的人，姓李，他给我点大烟吃，有棒子粒那么大块。我吃了，迷昏，傍亮了起不来。年焕兴说：‘你咋不起来？’我说：‘迷昏，吃大烟了。’年焕兴说：‘哎呀，吃那么多呀！毙他！’集合，把我搀出去了。八沟的一个人给我一点药吃，觉着清快些。我们奔房山。刚到当沟，发现房山外边山上有日本军。日头要出来了，李连贵说：‘奔山沟走。’日本军打枪，我们死了十多个人。李连贵爬上小山头向日本军打枪，他们撤了。我们在山头上时，从南边又过来一股日本军抢山头。李连贵他们往北去了。我和几个人藏在山沟里。我躲到一个牛圈里，过来一个人，是当地老乡。我问：‘上边日本子走没有？’他说：‘四周都是日本子。’我们呆到日头快落时，奔到房山阳坡根几户人家。人家给我们做晚饭，小米水饭、摊白果。听到外边有人声，出去一看，见七八个小伙子拿着大镐把站在外边。我们班里有个横河羊羔峪的小伙子想打，我说别打。我问：‘你们干啥？’对方说：‘日本子没走，你们上我们这儿来，房子给点着怎么办？’我掐着枪，我说：‘你们散散，既然没感情，我要开枪了！’他们走了。不大工夫，闯进一群当地人，把我们四个人的枪下了。对方

说：‘你们走吧。’我们四个人分别回家了，走时已经是黑夜了。我们在房山山沟躲着时，毛山上响了一天枪。我奔到黑峪沟，那是我的家，到家亮天了。

“我们正式进关后，就是在房山沟与日本军打了一小天子。那次跟着李连贵走的有八、九队，队长是何广永、康永贵。八、九队在河套死了12个人，我们第三队没死多少。”

常久芳也在随李连贵西去的队伍中。1989年1月23日，他对来访者佟靖功先生说：

“我们绕了一宿，也没出敌人圈。一宿也没断了走，一亮天到三道房子山根，走到日本军跟前了。山上日军支着枪呢，在三道房子山大门下的红石砬子一搭话，日军开枪了。我们400多人被打死一河套。青杏沟一个姓司的副队长，他会抽大烟，叫司福×，死了。我提起他的撸子往回跑，右小腿下挨了一枪。跑到北沟里，走不了啦，躲到黑处。日军围了三面，我拿了一支韩连春大枪，还有那棵撸子，躺下。天亮了，朝外100多步，对面梁上有挎洋刀、背兜子的，是官。我正要打，又爬到我跟前一个人，柳河的，姓苗。他说：‘我大腿受伤，走不了啦，死在一块吧。’我说：‘你能跑不？’他说：‘知不道啥，不知能迈步不能迈步。’我说：‘咱俩死死在一块。’我说：‘你朝背兜子的打，我向挎刀的打。’砰砰两枪，同时把那两个鬼子打下去了。我们往北尖爬20步，再往北就是阴坡，敌人打不着。到阴坡一看，跑出去的只有20多人。这个队两个，那个队两个，都散班了。那地方叫寨子沟，四月前，有榛子棵子。我们和那20多人不是一块的，我说：‘不能走的就钻榛棵子里去吧。能走的得走了，日本子要来了！’我们在那儿呆了一个半钟头，听着毛山上一个劲儿打炮。横河的一个排长，叫徐连芳，蓝旗营北沟杨树台人。温显有说：‘我小的时候，徐连芳是土匪。’徐连芳小车轴汉子，红脸，后头让土匪放了后，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问徐连芳：‘排长，咱们往哪儿跑呀？’他说：‘还是由着上级指示，奔黑锅顶吧！’我们离黑锅顶不远了，就隔着刁山一个洼。我们从梁鞍奔黑锅顶。黑锅顶边墙上有一拨匪，日本军供他们子弹。匪头姓王，100多人，从玉田那边过来的。匪头王队长是玉田的一个财主，被匪抢了，又当了匪队长，后到洪山口。洪山口、大块地立伙会打这拨匪。匪抓伙会十几个人去，在大块地把他们杀了。这拨土匪是从小黑鱼沟子下来的。看见我们，土匪把头把枪伸出来：‘缴枪吧！’我们没法，把枪扔上去了。缴一个被绑一个，匪跟着一个被绑的人。在绑这个空儿，不到晌午呢，日本军从刁山下来了，朝北阴坡打枪。那些匪也是便衣，日军把他们当民众打，匪不还枪。匪头最后绑的我，刚绑我一个胳膊，日本军一枪把匪头打骨碌了。我的手枪、他的手枪邪三把都骨碌了。往前跑还跑土匪怀里去，在那儿呆着也不行，我伏在桌子大的一块石头后头了。呆一会儿，日本从刁山上了黑锅顶，从黑锅顶压下来了。日本头里的离我不够20步了，我不顾疼痛，翻身跑了20多步，跑到小黑鱼沟庄。匪喊：‘过来！’我翻身又往上跑七八十步，钻了树林子。敌人捉住我，把我们20多人都交给日军了。康永贵原是那匪队的副队长，匪和他有仇。抓住康永贵的

人，匪就杀了。是李连贵的人，就事前偷着放了。李连贵和该匪头有过联系，谁也不打谁。

“土匪和康永贵结仇，是杀伙会时康永贵不同意，说：‘咱们为财，谁该谁的命呢？（意即伙会不欠咱们命，不该随便杀他们——编者）’后来康永贵走了，找李连贵当了民众。匪头打发方文明出来调查他。方文明走到小石门，往下走，康永贵我们四五个人往上走。康永贵认得方文明，掏出撸子要毙他。方文明磕头礼拜，认康永贵为干爹，也当了民众军。毛山回来后，方文明在刁山又被日军抓住了。伪满军留下他，他当了伪满军。到洪山口，洪山口人认的方文明，说他吃了我们多少多少人心。满军转到三道河，把他毙了。

“康永贵以后的情况不知道了。

“李连贵也被俘虏了，他回得好，又出去了。他的手枪没失落，也可能把枪插（方言，藏起来之意——编者）哪儿了。

“年焕兴有个二把手枪。在房子一打，年焕兴钻到猪圈里去，把枪插了，自己把自己绑上了。日本军抓住他，他说民众把他绑去的，这么出来的。”

常久芳回忆中关于年焕兴出来经过的叙述，与司显文了解的情况有些不一致。1989年1月19日，即采访常久芳的前几天，司显文对佟靖功先生说，毛山之战后，有一天他正在南山薅荞麦，“从山上往下骨碌石头，一看是年焕兴。年焕兴说，他是被围后从匪这边打出来的。匪也有意放他们”。

四、目击者、知情者回忆

迄今为止，共有20余位目击者、知情者留下了关于5月24日战斗的回忆材料，我按照先毛山西麓、次毛山东麓、再毛山北麓的顺序予以一一介绍。

1. 毛山西麓

（1）刘青林回忆

刘青林的《毛山战斗》是我看过的材料中采访时间最早的一份目击者回忆录。刘青林，遵化小厂乡毛山沟人。毛山之战发生时他15虚岁，正在毛山脚下放羊，亲眼目睹了山上战斗的全过程。

1982年12月8日，他对遵化党史办的李永春先生说：

“1935年旧历四月二十四日（应为四月二十二日——编者）凌晨，孙永勤率领部分民众军在遵化镇突出重



图149　刘青林一家（中排右一为刘青林，后排右一为刘宝全）。（照片提供：刘宝全）

围，攀上了毛山。拟在甩掉敌人之后，西去马兰峪，然后撤至兴隆马鞍道一带。不料他们已被敌人死死咬住，攀上毛山立脚未稳，敌人便从四面将他们包围。太阳红沿时，民众军对敌人的一场英勇悲壮的战斗便开始了。

“嗡嗡嗡，敌人的两架飞机在民众军的头上直打转转。民众们气红了眼，他们架起了机枪，瞄准了敌机，哒哒哒一阵猛扫。一架敌机饮弹负伤，歪歪扭扭地栽落到澈河桥那边。另一架敌机见势不妙，也掉转屁股狼狈逃窜了。

“敌人的飞机被打跑后，四面山下的敌人端着枪呀呀呀地冲了上来。孙永勤部署好兵力，民众们有的伏在石头后面，有的趴在橡树棵子下面，人自为战大量地杀伤着敌人。李连贵一人在橡树棵子下面就打死鬼子三人。不一会儿，敌人大片地倒下了，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了。紧接着，敌人一次更比一次猛烈地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敌人的数次冲锋又被打退了。直到大晌午时分，民众军的子弹打光了，一切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用光了，再也无法抵挡敌人的冲锋了，民众们大多壮烈牺牲，敌人上了山头。以后敌人又凶狂地搜山，敌人搜捕去了未牺牲但也未及逃脱的民众军，也搜捕去负伤的孙永勤的近人。这些被捕的人被敌人穿上锁甲骨，拉到山下，惨酷地杀害了。

“毛山战斗结束后，我曾带人去毛山顶上认领、掩埋烈士的尸体。见那里至少有200具尸体，孙永勤的头颅也被敌人割去了。日本鬼子在毛山制造的惨景真是令人不忍目睹啊！”

刘青林的上述回忆比较简单。2005年8月，我到毛山沟采访，他的儿子刘宝全向我讲述了详细的毛山之战过程。

“听我父亲说，5月24日那天清晨，孙永勤将军是从我们家门口直接上的毛山。想到我们家喝点水，做点饭，下边立刻有通信员上来报告：‘赶紧走，黄豆皮子就在后边追着呢！’孙将军他们都管日本兵叫‘黄豆皮子’，因为日本子的军装跟黄豆色差不多。当时日本兵离他们也就一二里地远。孙将军负伤了，原来他骑着马，爬山走不了了，找了两个椅子，绑在一块，四个人抬着上了山。

“天亮前，日本子包围了毛山。在小于沟东山使炮，北面洪山口大岭、西面九泉山上也使炮，近处是高峰的地方都使机枪。我父亲说，四面山头都夹击一个主峰。

“小日本那炮直接往主峰打，炮弹一个一个地排，把整个主峰都炸平了。下面到处是机枪，就在我们家下面山沟那儿就有两挺。我父亲平时都在这山上放羊，但打仗那天他没法放，就把羊拢住，在那小山下面看着。那儿有两挺机枪，他说，那火力忒猛，两挺机枪打完了，地上一麻袋多空壳。

“除了炮、机枪外，日本子在毛山上面还有三架飞机。其中一架被民众打中了，落澈河桥了。

“孙部下全在主峰，在炮火特别猛烈的情况下，再让敌人飞机这么一打，孙将军就在主峰

下面，坝墙洼上面那么一点，在那儿，孙将军中弹了，壮烈了。清理战场时，日本子把孙将军头颅割下来带走了。孙将军身上挂着一条礼仪绶带似的东西，上面写着：忠义救国军军长。战斗结束后，我爸上山发现了孙永勤尸体，与在门口看到的正好符上，回来就喊乡亲们上山埋尸体，把孙将军就地葬在那儿了。

“要按我父亲说，当时山上死了得有五六百人。具体谁也没数，因为死尸遍野，哪儿都是。这么大山，怎么埋呀，只好仨一个坑、五一个坑埋了。

“我父亲说这支部队是好人，不扰民，上来都规规矩矩的。他说，清理战场时，在南侧还有活着的战士呢。日本子上来，顺着梁上那么一走，一露面一枪，一露面一枪，给打死不少。当时那个枪法，我父亲说，打红围出身，枪法准极了。”

（2）王宗泽介绍

王宗泽，遵化侯家寨乡秋科峪人，退休前在兴隆县当教师。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对抗日救国军在遵化北部山区的活动作过调查。1987年3月6日，他对兴隆党史办栾福忠先生说：

“毛山战斗后，在舍身台，有20名民众被日本守备队抓住，在侯家寨西小河被杀。有一个肚子被扎了一刀，跑了出来。逃出的战士是白马川人，是王满把他送走的。由于集家并村之前这一带没有常驻日本守备队，判断应是来围攻的日军。这次被抓的是毛山战斗溃散的20名民众，逃出的是被刺刀穿透了没有死，王满给救活，养好伤后，送回兴隆。”

（3）吴宗耀回忆

吴宗耀，遵化小厂乡吴家沟人，毛山战斗发生那年他30虚岁。1987年9月5日，他对采访者闻成先生说：

“毛山战斗结束，下午一股日军带七名俘虏到吴家沟村西，找我、陈贵平等几人挖坑活埋人。我看见七人中一个四十多岁、胡子很长的，突然向日军军官和那名二十多岁的翻译官用日语讲话，立刻受到欢迎，给他一支撸子。接着就杀人。一个小伙子撒腿就跑，等日军要开枪，他已跑出十几步。日军没追，也没开枪。听说这人是迷子地村的。杀死五人，天黑他们走了。次早，这两名翻译官又乘汽车来了。在吴家沟村要八名壮年、两付门板和杠子、绳子，另找张启生牵一头毛驴，两名翻译官轮流骑。带我们到三道毛山顶峰下，从沟里挖出两名日本人尸体。四个人抬一个，送到东小厂，装上汽车，放我们走了。”

吴宗耀所说的逃脱的青年，当夜未能离开吴家沟，事见吴广顺老人的回忆。

（4）吴广顺回忆

吴广顺，遵化小厂乡吴家沟人。他即1935年5月23日晚给孙永勤治病的吴占满之子，1935年时11虚岁。2005年8月，我到吴家沟采访时，他说：

“那天晚上（指5月23日晚上），民众要走就没事了。天亮时，看见山上有人，才知日本

子围上了。民众要顺山根往小厂那边跑，没事来的。他们不知道情况，上毛山，还得上毛山。立刻两边各家大门全被日本子踹坏了，追下去了，就围上了。日本子一边追，一边打，一直打到毛山后背，民众都死那儿了。抓起来七个民众子，当天晚上，在我们西边，庄南那儿有个河套，全都枪崩了。剩一个，往起跑了。跑了一宿，顺着山那边有个人家，早晨一看，这是哪呀，哎呦，一看，把他吓坏了。跑了一宿，没离开吴家沟。那人家说：'日本子还没走呢，把你送送啊。'把他送送，往别处跑了。就跑了一个。

"打了将近一天呢，晚末晌就结束了，日本子把民众都消灭在这儿了。日本子在这儿住了一宿，第二天走了。"

（5）傅连贵回忆

傅连贵，遵化小厂乡毛山沟人，1935年时5虚岁。2005年1月、8月，我两次到毛山沟采访，老人对我说：

"老百姓对民众反映好。一开始，民众在八区华山那边打了一仗，这边听念叨就知道打仗了。那时没见过面，不知道他们队伍怎么样，打老百姓不打老百姓啊，等到见面知道了，一概不惹老百姓。不打人，也不骂人，不混巴溜溜的，对老百姓不错。还是一心一意打日本，军头还是好军头。

"头几天在八区大寨那儿打了一仗，之后就退过来了。一清早，到了我们庄大街上。庄里人都还没起来呢，没开门呢。我们庄东头有个哑巴，那哑巴初一、十五的哪儿唱戏都知道，一般的事都懂得。他起得早，到大街上了。民众也到大街上了，打听道儿：'上毛山怎么走？'哑巴一哇啦，民众说：'今天早起不顺，大清早碰上个哑巴，今天好不了。'那时都讲究迷信不是？这就到傅义老爷子院来了。先问他们有方便饭没有，做点吃，好几天没吃饭了。那时候哪有粳米白面哪，都是粥渣子。说有粥渣子也中，赶紧给我们做点吃。还没吃上呢，日本子就上来了。

"见一个打一个。从吴家沟朝上是火线里，日本子见着一个人打一个人。都是老百姓衣裳，他们知不道哪个是民众，哪个不是民众不是？

"日本子把人突突了，房子也点着了，就抓山了。往上打的时候，四面包围这个山。这边往上围，小于沟那边也往上围。打那炮，都过山了，把那边自己人还打死不少。像秋花峪李永发家垛一屋，全是尸体，那是自己打自己打的。

"四面包围。东边打炮，那时技术不强，它打到山这边来，这边打炮打到山那边去。山下边都是日本子不是，他妈自己打自己，他妈咣当四面炮，当当地，把自己人给咣当死不少。打仗时，毛山上面还有飞机在天上绕。开始飞机飞得高，打不中。后来一架飞机忒靠近了，民众使快枪，当一下，飞机吱歪一下，飞走了，飞滦河桥了。滦河桥是日本局子嘛，打下去了。

"晌午时，孙永勤一个跟班的跑下山，奔着黑胡桃那条路跑下去了。还到沟里头刘青林

家来着。早晨在刘万福家想杀羊吃，枪响了，那还吃啥。孙永勤他们都在那儿来着。有一匹白马，孙永勤骑白马上来的，赶到那儿，就病了，骑不了了。孙永勤和几个跟班的都那么高，就是手长过膝，就这一样特殊。你要把他们都逮住，说哪个是官？不认得，看着都一样，就那手特殊点儿。白马骑不了了，就找人用椅子抬着上山了。在头道毛山打来着。晌午前，跟班的就跑下来了，帽头里兜着枪。刘青林一看孙永勤跟班的下来了，就往他跟前凑。那跟班的就往后退，不知道当地老百姓打他呀，不打他呀，害怕了。刘青林说：‘你不用害怕，我不会咋着你，不害巴你。我就问问咱们军长到啥份上了？’他这回不往后退了，靠近了说：‘军长那儿，当下还有四箱子弹。四面包围往上打呢，够呛了。’跟班的下去了。

“打完仗，上去埋人。是这边上去也埋，那边上去也埋，那都埋不起，死的，都扔到沟渠子里头了。那哪埋得了啊，也没土，也挖不了坑子。那上面还是国民军在上边挖的沟渠子呢，想跟日本子作战来的，没用上。日本子进关时挖的沟渠子，战壕。顺着梁挖进去，都是往下扎，往下扎，都是饭槽子坑。人往那儿一蹲个的，留着打仗的。日本子进关时，他们进遵化城东门，国民军出西门，就差那么一点工夫。这庄都住过国民军，住下后，练武术。

“毛山打完仗好长时间，我们羊儿峪这儿的还死过一个人，外号叫‘虻六’，上上面捡洋落儿去来着。人都打死那儿了，趴在那儿，枪在怀里抱着呢。按说捡洋落儿的他也是废物，边上这么拽呀，他冲着这么一拽。手还搂着扳机呢，这么一拽，当，把他给打死了。捡洋落还给打死了呢。

“不是民众打不了日本子，是关里柴草小。听念叨，他们在口外，那边山好，柴草大。日本子在这边堵着，民众从那边绕到他屁股后跟去了，咣咣给他两枪。日本子一打，又钻到旁处去了。日本子不敢往柴草里钻，柴草一人多高，他们不敢进去，孙永勤队伍在那里平趟。在那边打仗，打一仗，胜一仗，就是在关里，操蛋了。关里山上没柴草，到哪儿都光头露面的。听人说，日本子给孙永勤起外号叫‘山耗子’，在口外打不了，就有人出主意，说关里有个毛山，能打得了。‘毛山’‘猫山’是一个意思，猫吃耗子，打得了孙永勤，日本人信了。说是有个大军师，有个二军师，大军师是老道，二军师也是。大军师不让上关里，上关里没好处。没法了，过来，过来就死这儿了。

“这村那时人口不多，也死了好几十口子。有的是在河套让机枪给突突了。有的是上房救火，日本兵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开枪打，人掉火里烧死了。我们村一个老奶奶岁数大了，瘫痪了，出不去了。她大孙子让日本兵给圈出去突突了。老爷子烧得看不着啥了，也跑了。没人管她，就烧死房里了。保安队来，去看，脑瓜骨头还冒烟呢，嘶拉嘶拉的，烧不透不是。

“沟里头也有人家背着、领着孩子叽叽喳喳地往外跑。跑的时候，两边山上往下打枪，两边山上都是日本兵，把背孩子的老爷们的大脚指头给穿上了，瘸楞瘸楞地往下跑。跑到我们后边这河弯子那儿，听见孩子的叫声，对面街坊老爷子没让机枪打死，在死人堆里偷着往外一

瞅，是跑反的下来了，这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跟着往外跑。跟跑反的人跑到宋家窝棚，他兄弟脑袋上的骨头碴子还插到手上了，到那儿才拔出来。

“东院我们老爷猫到哪儿了呢？猫到牛圈里了。房子都点着了，牛棚也着了，他猫在里面也没出来。牛棚着大了，把牛都烧死了，他头发、眉毛也全燎了，你把圈门子开开跑哇，他迈过圈门子跑了。他跑出去，眼给烧得花不瞪瞪，岁数再大点，跑到西边这儿，就转起来。找不着道儿，雾迷了。我父亲在南边犄角内看见了，说：‘不是老叔吗？’‘是啊，大小子，我找不着道了。’‘你顺着我的声音来，冲我来。我把你领到河套去，你跑出去吧。’他这才跑出去了。

“南边，这边家数少，我们在南边住，房也着了，我父亲把我们家的东西抢出去了。日本子南边没来，要来也就把我父亲他们撵北边突突了。我叔叔挑水。把我搁到南边一个院子里了，有个井，我看得真真的，我5岁。他挑水，呼哧呼哧快挑，我父亲在那边等着。都是草房，到那儿，我看着泼上一勺子也不灭，泼上一勺子也不灭。我叔叔一个劲儿地挑，挑着挑着，北面跑反的下来了：‘你们还哭呢，都打死一大堆了，庄北呀，你们还不跑哇。’我奶奶坐在南山根上哭着，瞅着房子着了心疼不是。‘还哭呢？’我奶奶听见，也不顾得哭了，站起来就往河套里跑。我就着急了，就叫唤上了。得抱着我呀，不抱上我，你说我还不哭。我奶奶不顾我了，平时没事她顾我，这时各顾各地了。这一哭，我妈到跟前了，抱上我，跑出去了。我在这儿瞅着，日本兵已经到后街门这儿了。

“那以后，村人都住在遵化了。遵化那时是县。我们都住在玉林堂了，城里放粥，开粮仓，给这边去的人做饭吃。”


图150　傅义老人　2006年4月

（6）傅义回忆

傅义，遵化小厂乡毛山沟人，1935年16虚岁。2005年1月、8月，曾两次对我讲述毛山战斗那天的情景。

“我那年16岁。土匪过去了十来天吧，民众就到了。

“四月二十一那天前晌，就听说到大寨后山了，劳动力就都回家了。到东梁上瞅来的，也瞅不着人。日

头没了，黑了，他们就商量：‘咱们咋想啊，是跑哇，还是在家呆着？’有的就说：‘往哪儿跑啊，你知他们上哪儿去？’‘那咱们就家呆着。’就在家宿了。等二十二那天，刚一蒙蒙亮，民众就到了，招呼开门。这屋来了十来个呢，绑了三个日本的官，在这屋呆着。说：‘给我们做点饭吃。’‘中，做啥饭哪？’‘啥饭都行，干的、稀的啥方便咱们吃啥，是饭就解饿。’大劈柴点着了，烧了一锅水，刚要舀粮食，枪就响上了。‘别做了，别做了，给我们带个道吧。’我有个哥哥不是，那年刚21，让他给带个道。我们老爷子说：‘我去吧，他们年轻人没主意。’我们老爷子就领着他们，出了大门，有个胡同来着，从那儿一直往北去了。‘去哪儿？’‘上毛山。’到了半截，还没到毛山上呢，梁上，从后面、东面，哐哐，枪就响上了。接着九虎岭，咣咣，大炮放上了。‘我回去，行吗？’‘行啊，回去从阳面走，别从北面走。’北面枪炮直响，我们老爷子顺着阳坡突噜突噜下来了，从那边回来了。还没到家，房前面有个猪圈，枪炮响得啥似的，就猫在猪窝里了。头里有个车，着了，火星子落身上，哪落儿哪捻，择（音zhái）不了了，到街坊家后头院子，那有个薯坑，猫那儿去了。我们老爷子就看见日本人了，日本人没看见他。猫那儿，听见枪炮哐哐一劲儿响。我们对面屋一家子在西屋炕根上猫着呢，我和我母亲哥哥我们一家子在这东屋炕根上猫着呢。枪炮过劲儿了，还响着呢，日本兵来了。三四个进西屋，‘呀呀呀呀’，三四个进我们屋，‘啊啊啊啊’，也听不懂说的是啥。我们全立起来了，也不敢出来呀。拿枪挑着门帘子，进去个日本兵，把我拉出来了。拉到外屋地，把我哥哥拽出来了，把西屋的人也拽出来了。出去，刚到大门，东边隔壁门里傅老爷子是个财主，他有个管事的，把他连傅老爷子仨儿子全圈出来了。圈到一块，往西走。西道口有个道，往后寨去的。到那儿，拨拉拨拉，把我母亲、我们几个孩子和大人拨拉开，就押着我哥哥他们，连那管事的，还有傅老爷子仨儿子，上后台子了。后台子那儿有三间房子，是封火檐，点不着。日本兵把柴禾垛拆开了，窗台前摆上一摞树枝子，点上了。把我哥哥他们全都圈东北犄角河套那儿去了。跪那儿，突突突突，拿枪打死了。我们对面屋老爷子不知怎么该活，把膀子穿了层皮。在那儿跪着猫着，也不敢动。有人家跑反下来了，有孩子、老娘们，孩子妈呀妈呀地叫着。老爷子听见孩子叫，抬头偷偷那么一看，孩子、妇女是沟里的，就跟他们跑了。我们这庄死好几个呢，东边还有两个，打河套里了。有一个，脑门掀开了，眼珠、脑浆流出来了，头耷拉着，趴着死了。我们在庄西头，呆了会儿，就跑了。跑到吴家沟，不敢回来，日本兵还没走呢。隔了一天，看见日本兵走了，我们才回家。一瞅，河套躺着好几个呢，都死了。我哥哥是末了死的，子弹从腰这儿打进去的，还拿手指头这么塞着呢。把他埋了，我们就到城里去了。我父亲躲东院白薯坑里猫着，没死。”

（7）马广兴回忆

马广兴，遵化崔家庄乡东双城人，在小十二岭牺牲的来子之弟。毛山战斗发生时，他13虚



图151　马广兴老人　2006年4月

岁。2005、2006年，我两次到东双城采访他，提起毛山战斗，他说：

“我那时十几岁。民众开始招兵买马都在边关外。日本子这儿也攻，那儿也攻，他们呆不了就进口了。就由我们东边这道奔的大寨，人不少，得有一两千人，整过了半天呢。我就在这儿住着，他们从我们门口路过。都是普通老百姓，穿着咱们这随便衣裳，有领章。让日本子给追回来了，一下子给追到毛山。毛山是座荒山，啥也没有。围上后，上面飞机罩着，下面就使炮往上打。毛山离我们这儿只有十多里地，那得看是不。民众都死在那儿了。也有跑了的，我们庄跑回来仨呢。我们庄当民众去了不少，都奔着马保德去的，他不是二头嘛。那以后没人了，也就没再组织组织。”

（8）赵德回忆

赵德，遵化崔家庄乡东双城人，1935年时14虚岁。2006年4月，我去东双城子采访时，他说：

“毛山过去是穷山，没人养树。有点柴禾，穷小子还给割了。毛山上有松树，是30年前公社时期种的。

“打毛山时有特警队，穿黑军装，戴大盖帽。日本子从南边把民众追过来，特警队根本不知道，日本人没通知他们。

“打毛山时，我们庄北，日本子四门大炮朝十几里外毛山打。看得真真的，炮弹落在哪儿，哪儿的人乱跑。那仗打得艰苦，民众没子弹了，只能用石头砸。

“孙永勤是革命的队伍，打日本子挺狠的。老百姓都说他们是好队伍。”

（9）刘国梁回忆

刘国梁，遵化小厂乡杏儿峪人，曾当过乡武装班长、村治保主任、贫协主任、党支部委员、支部书记。1935年时11虚岁。2007年4月14日，我到杏儿峪采访时，他说：

“那年闹土匪，家里都没人了，全跑遵化了，在那儿看见打毛山。

“民众就有点破套筒子，有时给点棉衣裳、单衣裳，灰的。白布，用苇叶染的，把苇叶烧成灰，搁锅里煮，放少许盐。

“让人家追得没法了，跑毛山上。底下是日本兵，上面是飞机，没处藏，没处躲。日本兵

用的是老磕炮，炮膛里装的是羊粪蛋大的铅弹。炮打在毛山上，民众都死在那儿了。把毛山打完了，我们回去瞧瞧。瞧啥呀，房子点着了，民众让人打死那儿了，冲出去没几个人。这咋弄啊，这儿一大腿，那儿一脑袋，那儿一嘟噜肠子，不好听（即气味不好闻——编者）。我们村陆占和说：'你们上去，盖盖吧。'我们就上去盖。后盖不过来，不盖了。那狗就疯了，吃人肉吃红了眼了。

"打毛山时，我们村里也死了人。刘明贵背着他的孩子跑到沟里，在那儿躲着。总觉得饿得慌，说：'忒饿，得回家找点吃的。'孩子也闹，他就回来了。走到下边村委会那儿，被日本兵扎了脖子，一刺刀给扎死了。"

（10）张福荣回忆

张福荣，遵化小厂乡高家峪人，原村支部书记。毛山之战发生那年8虚岁。2009年11月27日，我去高家峪采访，老人说：

"我是北边柴庄子出生的，闹治安军时搬到高家峪，俩庄离着5里地。我大大爷当时在高家峪住，听他说，天刚一亮，日本兵就从高家峪过，步行，过了一个多钟头。步兵过的时候，有头道、二道、三道九泉山，日本兵在二道九泉山山顶同时打炮。是小炮，大炮上不去。日本人是从九区，就是遵化城那边上去的。那边有山，但是矬。打炮得打了半个多小时。除了二道九泉山那里一个炮阵地外，松棚营东山还有一个。打完炮，日本兵就出松棚营，从庄客、杏儿峪追下去了。

"民众从毛山想往北走，在九虎岭那儿让日本人一卡，动不了了，人死多了。东边也上来日本兵了，把整个民众都围毛山上了。打毛山时，庄里上岁数的谁也不敢出去，都在屋里猫着。有年轻的去看，说人死成堆，把毛山都给打着了。

"那时候民众使的都是大刀，有枪也是单子，甚至火枪。

"民众在柴庄子站过。我看见他们在那儿烙饼，烙得很快，不放盐。有四五十人，都是大刀，跟大西瓜刀似的，有70公分长，在腰下斜挎着。我小，他们也喜欢小孩呗，给我一块饼来着。饼里不搁盐，说是挂花后伤口容易好。

"那拨民众子是从毛山上跑下来的。在他们之前从毛山上跑下来过一拨。先下来的一拨往西北跑了，不知打死没有。在柴庄子的，是10点左右跑下来的。柴庄子13户人家，40来口人，当时地图上没有。日本兵从遵化那边过来，把柴庄子给漏下了。

"民众正在柴庄子烙饼呢，就听到信儿，说日本兵来了。一说走，把面、烙饼扔了，不顾得吃了，没命似地往西跑了。大概往片石峪方向去了，11点左右。当时九泉山上还有日本兵，炮不打了。

"民众子打土匪，有一部分土匪在洪山口那边。民众不害巴老百姓，是好人。"

2. 毛山东麓

（1）小于沟三位老人回忆

1986年12月21、22日，吴宪国到遵化小厂乡小于沟村请三位老人谈了毛山战斗的情况。三位老人的名字他未记，访谈结果有下面几点：

①毛山东麓抗日救国军死了200多人，日军也死了不少，垛满一屋子，以后运走。

②有三名日军在秋花峪石梯子被打死，日军发现后将三具尸体停放在李永发家，战后运到激河桥火化。为报复，日军将当地一个大概叫李福环（被采访者未能确定）的人家，杀死六口，只剩一口；李永发四口，只剩下李树森一人。

③战后，日军曾让人赶驮带着一些人头到激河桥，让人辨认是否孙永勤。

（2）吴凤忠回忆

1986年12月21日或22日，吴宪国还访问了孙永勤曾在其家驻扎的吴凤忠。吴凤忠说：

“毛山战役，孙永勤牺牲在四洞沟沟里，与毛山沟村交界处。在那里发现了他坐用的大椅子和一具没有头的尸体。民众在李福尊家门口打死几名日本兵。日军报复，把李福尊家全杀了，把人头带去遵化城，挂起示众。”

除对吴宪国回忆过外，吴凤忠生前还多次对儿子吴艳民讲起过毛山战斗的惨烈情景。2006年4月、2007年4月我到小厂乡采访时，吴艳民对我说：

“据父亲讲，那天早上没有一点迹象要打仗。突然就听说毛山上上来人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老百姓只能跑。父亲、奶奶和村里人全跑到小于沟东山上，枪声稀少时才回村。

“父亲说，日本人全是用炮打的。他们占领了大块地、官台子，这两个地方是炮群，老磕炮，打得挺准的。民众枪不好，有劲使不上。日军炮够得到民众，民众枪够不到日军。

“据说第一阵炮击过后，民众冲下山来的人有三分之二。他们奔秋花峪下来，但下到一半，又翻回去了。老百姓不明白怎么回事，都觉得仗打得不明不白。父亲说，第一次要冲出啊，就出来了。有可能是联络不上，出于哥们义气，又回去找，结果正好日本人炮火延伸，翻回去的人一下子死了很多，不然得冲出一半来。父亲说，要冲到小于沟就安全了，往东北就能冲出去，后来出去的人也走的是这条道路。

“据父亲说，仗打到后面，有20多人顺着小于沟东北角奔喜峰口杀出去了，但出去大约半年光景也就覆灭了。

“民众死人主要是在西坡，东坡少。像我们村吴显来就说过，在东坡只听说有飞机，但是没有看见。

“埋尸首时，父亲跟着来的。他说，孙永勤的尸首，衣服像他，但穿一样衣服的不少，都是光羊皮板、羊皮帽子。

“埋尸首都是群众自发上去埋的。在庄稼坟那儿，老百姓埋了70多口。以后抬不过来，就得哪儿埋哪儿了。前十年盖房，挖地基，还挖出过锈的刺刀、铜裤带钎子。狗剩台子，一个叫狗剩的人死了，埋在那儿。毛山仗打完好长时间后，台子上的血，太阳一晒，皮翘起一指头厚。

“吴凤卜，我管他叫六大爷。比较富裕，长袍马褂，扣碗帽，是学校校董，王家沟的老庄家。他经常跟我们拉，说民众是土匪，跟别人观点不一样。那个人呆不住，说话还结巴，在狗剩台子屁家沟被日军逮住了。日本人以为他是民众的官呢。傍晚抓住，后来装解手，跑出来了。”

（3）吴宪国调查，回忆者名字不知

闻成先生在1987年2月4日写作的《孙永勤队伍在遵化的活动》中，提到这样一件事：

“经吴宪国调查，小于沟有大自然村叫王家沟，但日寇没在这里火化尸体，几具尸体运回驻地澈河桥火化。王家沟一家的羊圈烧着，一群羊被烧死。这股日寇在柴户场的屠杀、烧房应当记载。”

（4）王俊成、王俊山回忆

王俊成，遵化小厂乡秋花峪人，1935年时9虚岁。1987年3月8日，他与王俊山向来访的佟靖功先生说：

“打大仗那天是旧历四月二十二日。民众军头天夜里住在小于沟，起早从南边毛山沟上了毛山，从秋花峪也上了毛山少一部分。日本子从马台子、官台子、西边的九泉山往毛山上打炮。民众军在大塆峪沟里死了200多人，偏道子往上死140多人，大王家沟死30多人。大塆峪沟里有13人被绑着来的，穿着便衣，死在一起了。其中一个人被烟园子人认回去了。这沟外李福尊介绍，打仗时他家进来一个民众军，看到山外来三个日本兵，民众军开枪把三个日本子打死了。民众军走了，从毛山上下来三个日本子，把李家六口人打死了。李家七口人死了六口。

“孙永勤牺牲在头道毛山尖东面坝墙洼。我们上去时发现那儿有一个椅子，有一具死尸没有脑袋。那椅子是毛山沟刘万亮家的，抬着孙永勤用的。

“李向元从毛山上抬下一个日本兵。死的日本兵都垛到李永发的屋里，以后运走了。下去二三天还有日本子上山，来寻找日本兵死尸。”

（5）秋花峪一位老人回忆

这个情况是由兴隆史志办刘玉兰女士向我介绍的，老人未留下名字。

“2004年春天，我们到遵化毛山东面的秋花峪采访，遇到一位老人。他说：‘当时毛山顶上有好几具被割去头颅的尸体。日军将这些头都带到澈河桥，让一个认识孙永勤的道士辨认后，将认为是孙永勤的头带往承德二仙居示众去了。”

（6）吴凤起回忆

吴凤起，遵化小厂乡小于沟人，抗战时期曾任村武装班长，1949年起先后任村治保主任、

会计，1968年至1984年任大队长。毛山战斗那年，他12虚岁。2006年4月我到小于沟采访时，老人说：

“那时十几岁。民众从口外来，往哪儿走，日本子大围攻。到毛山给围紧了，毛山那时候是光山，民众没处跑了。民众没多少枪，很多人是大刀片、扎枪，还有的拿棍棒。民众挺厉害的，日本子挺怕。日本子在北边全是炮打的，没使机枪。我和家里人跑三里屯了，看得清楚，一炮一个烟儿。那人死得惨，有没脑袋的，有的一串串拴上，推下来摔死。二三十一串，二三十一串，抓到就拴上，从山上推下来摔死。有特务穿便衣，给日本子更出力。不是翻译，翻译都穿军装。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是前晌跟中午。民众枪打得准，但没那些枪和子弹。打完了仗，毛山底下王家沟二三个月臭得进不去，死尸流的水都是红的。”

（7）吴显来回忆

吴显来，遵化小厂乡小于沟人，1935年时9虚岁。2006年4月，和采访吴凤起同一天，老人对我说：

“早晨日头刚一出来，炮就响上了。庄里人都跑了。我们庄有个叫吴守义的，看人都跑了，就喊：‘坏了，坏了，今个庄里要死人。’我有个大哥，那之前让地枪给崩了，走不了，我和我妈把大哥架到大石门了。我们跑到离我们庄一里地外一个石洞，看见日本兵一个劲儿往毛山上打炮。就听见炮响，没看见他们往上冲。炮打得挺厉害，一打一冒烟儿。

“上午11点起，日本兵开始往潵河撤。一直到夜里点灯后，还往那边走呢。吴凤卜让日本兵给抓住了，他们让他用打栗树的杆子抬着一个布包着的头，说是孙永勤的头，实际上是王家沟狗剩台子那儿一个没脑袋的人。吴凤卜穿得阔，整齐，夜里走到马台子塪家沟梁上歇着时，他说解手去，跑了。秋花峪李福尊家人都死了，他装死，活了下来，后来跑三屯营去了。

“据亲家刘秀存说，孙永勤死在曹树沟。看不行，他就让亲兵们能走的走。王家沟、秋花峪、春石沟民众死的多。狗剩台子那一个地方就死二三十呢。民众死的大部分都埋了，还有狗拽了的。”

（8）庄开云回忆

庄开云，遵化小厂乡小于沟村王家沟人，1935年时17虚岁。2007年4月14日，我到王家沟采访，老人对我说：

“王家沟当时就我们一大家子。打毛山那天，我借了驴正打白薯垄。当时有一拨民众在这儿吃饭，好几十人。日本探子郭天禄来探听消息，民众发现后马上走了。在南边又给顶回来，上了毛山。日本子是由草场子上来的，应是龙井关、潵河桥方向的，他们把民众围上来。我见日本人来了，就跑山上了。

“打民众时，飞机一个劲儿过，没扔炸弹，都是用炮轰的，炮从官台子往这边泻。秋花峪，



民众死了300多人，王家沟这条沟死了二三十人，哪儿都埋。秋花峪李福尊一家被杀六口。

“狗剩台子那儿，日本人打完仗，在核桃树下吃饭。那树有一搂粗，有一民众跑到核桃树树尖，日本人没发现，后跑到马石沟去了。”

（9）李清来介绍

李清来，遵化小厂乡秋花峪人，2007年时54虚岁。当年4月14日我到秋花峪采访时，他对我说：

“秋花峪，早先叫丘虎峪。有一个老道叫金永，他在这沟里修了一道墙，圈老虎用。下山都骑着虎，回来把虎放在墙内的沟里。一九五几年改地名，改成秋花峪。秋花峪沟长6华里，当年只有十几户人家。听老人们念叨，当时日本人在每个小山头都有机枪，用交叉火力封锁山沟。民众好多只有扎枪，甚至扁担，让人打死很多。杨树洼梁死了得有几百人，都上垛了，发水都是蓝的，因民众衣服是蓝的。除民众外，还打死不少捡洋捞的，捡洋捞的不是本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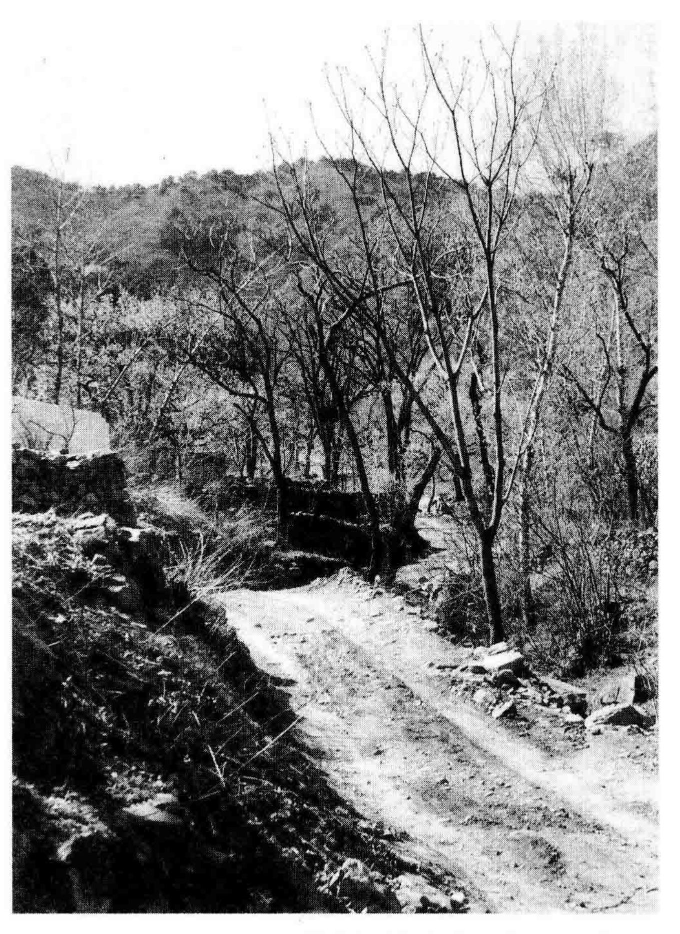


图152　秋花峪李福尊家旧址。2007年4月

“我们村李福尊一家只有他弟弟李福余跑了，李福尊可能确实和民众有联系。离李福尊家二三里远，有一个叫大兵的，也死了。大兵参加过清兵，毛山打仗时，他用刀杀死日本人，自己也让日本人杀了。”

3．毛山北麓

毛山北麓的情况，目前只有傅连明老人一份回忆。

傅连明，遵化小厂乡毛山沟人，1935年时11虚岁。毛山之战前不久，他与父亲、叔叔一道被土匪绑走。在父亲答应回村给土匪筹备赎金和大烟后，他和叔叔便被土匪带回了土匪驻扎的村庄。2005年8月，老人对我说：

“在庄上呆了几天，土匪把我们弄到毛山顶上。把我二叔放了，让他告诉我爸爸：‘跟你哥哥说，赶紧办。办了，把小孩放回去。不办，把他们都崩了。’我二叔就从大梁上下去了。看见他走的方向，我才知道哪边是我家。要不知不道哪里是家呀，没去过那山上。二叔走后，

我们几个又回到那庄里。在那儿呆了几天，开车又走了，到洪山口。中街道南有两间房，把我们搁那儿了。土匪都住满了。之后就闹民众，民众一过来，就跟土匪接上火了。土匪怕民众，不敢惹。他有机枪也不中，民众有两千多人，他敢惹？这天晚上，民众就围我们住的庄子。等到毛山打起来，土匪也没走，就从洪山口又撤回到九虎岭上，接着打民众。那回他们得了点子弹。为什么得了点军火？他们帮助日本军打民众，送给他们的。为了得到点军火打民众，我没见着，我听他们讲。把仗打完了，土匪就奔口门子外头大东沟。又呆了一两个晚上就走了，一直奔到古北口，就往那边去了。他们那点子弹就用了几个月，因为北半部的民团什么的不少，哪儿都打他们。民团打，土匪就还击。打也打不着啥人哪，开枪一打，呼，人全跑了。土匪绕到延庆住了十天，之后直奔山西大同。以后都不看着我们了，在半道上想把我们卖了。

"毛山那仗，土匪要不截着，民众也许能跑出去一点。他们一截着，民众就不得跑不是？有卷回去的，在三道毛山那儿。打死的哪儿都是啊，民众啊。赶以后我放牲口到那儿去，没少看见骨骸啊，哪儿都是啊。

"那民众，你还别说，艰苦的地方真中，真有两下子。这块有当民众的，我们一块开会，都拉过这个。据他们说，有的时候吃得上饭，有的时候吃不上饭。没有给养，没有粮票，那就是转着各家号着吃饭。有住家儿的号点饭，没有住家儿的哪儿吃饭去？都这样。"

五、传说

1. 郝席庵供述

以下文字出自《郝席庵亲笔供词》，写作时间是1958年10月至1959年。

"1935年6月间，孙永勤领导的农民起义武装约2000余人，在遵化县东双城子一带乡村，与日满军警及伪冀东保安队并遵化迁安驻在的日本军交战多次。后因给养弹药缺乏，伤亡甚多，于是以孙永勤为首的起义农民武装，被日满军警包围，全部被俘击灭了。当战斗激烈时，有部分农民武装突围而去，不知下落。据闻孙永勤当时率少数农民突围而出，向北京方向走了，后来亦不知其结果如何。"

2. 李子华回忆

遵化孟家铺区委负责人李子华曾为《孟家铺村史》撰写过稿件。在1964年6月2日完成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敌人调来了丰润、迁安、兴隆等县兵力，围攻孙永勤的部队。事败后，孙永勤带着几百个人跑到绥远去了。

"这次联系孙永勤的军队进行抗日没有成功，但也给在这一带的日本军队以很大的震动。"

3. 贠玉萍回忆

贠玉萍，孙永勤二儿媳，现住兴隆县兴隆镇车道沟。2005年1月我去采访时，她说：

“我们婆婆叫雷永兰，33岁就守寡。我们结婚的时候，她对我们说过，老爷子死在遵化毛山。‘文革’时，我们老家有一支部书记，他的爷爷跟我老公公是叔伯哥们儿。他爷爷那阵是给日本子办事的汉奸，我老公公是打日本子的。文革期间这个支书就批斗我们，说我们是土匪后代。文革后期我们出来搞平反。打官司期间，我们去了一趟遵化毛山。就知道我们老公公没脑袋了，听说把他脑袋割下来，用漆油了，在澈河桥、半壁山一带震唬老百姓，说‘这是孙永勤的脑袋’，挂在树上示众，身体被埋了。我们扒了几个坟，都有脑袋，有脑袋就不是我们公公。后来又听说在兴隆什么地方，我们没找到地方，后来就没再去找。

“听婆婆说，打完毛山后，她好像让他舅爷去找公公尸首来着。她自己去没去没说，就说让我们舅公公去找来着。”

4. 史耀清讲述

史耀清，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菇峪村黄花峪人，孙永勤表外甥，抗日救国军战士史耀华之弟，1935年时14虚岁。2005至2007年，我三次到黄花峪采访，他三次提到，如果用迷信话说，孙永勤是黄狗转世，不是凡人。

2006年4月我去采访时，他说：

“孙永勤不属狗，是黄狗转世。据说打仗时能看到他是黄狗。死在毛山上时，头被日军割去，黄狗出窍，绕了几圈。”

2007年4月15日我第三次到黄花峪采访时，他说，孙永勤至少显过两次黄狗。第一次是打车河口大成兴时，第二次是打吴家沟即打毛山之时。

“打吴家沟，孙永勤显原形了。”

5. 何树宝讲述

何树宝，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人，2007年时47虚岁。那年4月16日，我到张杖子寻找黄花川源头，他对我讲道：

“听孙文炳说，在毛山没有看见孙永勤尸首，只看见一只狗。”

以上是各方对1935年5月24日抗日救国军活动的记载和回忆。由于每个人在时空上距离现场远近不同，在描述5月24日情况时，出现了很多方面不完全一致的现象。

尽管存在着以上的问题，但5月24日当天几个基本情况还是能够明了的：

1. 日军是凌晨发动的合围、攻击。

2. 日军攻击时，孙永勤率领的抗日救国军大部驻扎在毛山西麓的吴家沟，毛山东麓也有少量队伍；李连贵一路抗日救国军夜里住宿黄花峪一带，天亮起程，行至房山沟与日军遭遇。

3. 毛山主战场方面，日军是从西、东、北三面发起的攻击，武器以火炮为主。目前确定的炮阵地有：九虎岭、官台子、二道九泉山、松棚营东梁、东双城，共五个。一种说法还有马

台子，但意见不统一，还需要查考。火炮外，日军大量使用了机枪，此外天空还有飞机盘旋。根据《申报》的报道，飞机当属驻热河日军飞行联队，毛山之战前三日从承德飞抵马兰峪机场。房山沟战场方面，与李连贵一路遭遇的日军是从西面来的，是否驻古北口石井大队，待查。

4. 抗日救国军当日死亡人数，日军报道为300余，这应是没有包括李连贵一路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即便毛山战场，根据当地百姓的回忆，抗日救国军实际死亡人数也要超过300人这个数量。按照百姓战后对各个地方尸首的统计，毛山战场抗日救国军阵亡人数不会少于400名。房山沟战场，根据刘秀存、常久芳回忆和王宗泽调查，抗日救国军死亡至少超过100名。如此来看，5月24日当天，抗日救国军阵亡人数至少在500名以上。我个人的看法，有可能在500至800名之间这个范围。日军当日死亡人数，毛山战场，日方先报道为三人，后又说成二人、六人。实际情况应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根据刘青林、毛山东麓百姓的回忆，日军仅在毛山顶、秋花峪石梯子就已死亡十几人和一屋子尸体，所以我认为日军在毛山战场死亡数量不会低于20人。这个数字尚未加上5月25日早晨被运走的孙文炳在毛山顶枪毙的两名日本俘虏。房山沟战场，日军死亡人数未见报道。

5. 直接参加攻击的日军数量，过去的说法是5000名，根据各方资料来看，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日军“围剿”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部队，目前知道的是：①热河警备队秋原旅团一部。②驻热河关东军松井部队。③驻古北口石井部队。④驻马兰峪山田部队。⑤驻喜峰口日军侦察队。⑥驻凌源日本守备队。这六支日军部队中，已知驻古北口石井部队共出动了500人，驻马兰峪山田部队出动了200人，其他部队数量不清。由5月23日民国各报报道：日本方面照会国民政府将派兵千名进入非战区，从抗日救国军战士及毛山当地目击者都未回忆有大量日军步兵出现在毛山及房山沟战场看，我认为5月24日在非战区内直接攻击抗日救国军的日军人数大概在1000名至2000名之间。不低于1000名的理由是，石井、山田两支部队人数即已达到700人。根据报纸报道和抗日救国军战士回忆，山田部队发动进攻是在毛山西南方向。从西面向毛山开进，并一度与李连贵一路抗日救国军激战的是否就是石井部，虽还要查考，但我怀疑这种可能性很大。换句话说，700人是毛山西麓的日军数量，如果加上毛山东麓的日军步兵数量，官台子、九虎岭、东双城的日军炮兵人数，超过1000人完全有可能。但我为什么说直接参加攻击的日军上限不会超过两千人呢？首先，有日军密集炮击、机枪射击的记载和回忆，但没有非常多的日军士兵出现在战场的目击报告。其次，以超过对国民政府照会一倍或更多的兵力出现在非战区，不仅会引起国民政府的严重不安，日军当时也要考虑英、美两国的压力，而目前除了在5月23日的民国报纸上见到中方带有悲观色彩的忧虑外，未在5月24日及以后的报纸上见到遣责日军派遣两倍于照会或更多的兵力入关的报道。

以上是对5月24日在长城以南的非战区内直接攻击抗日救国军的日军人数的推测，没有将

在长城各口围堵抗日救国军的兵力计算在内。如果加上这些兵力，为围剿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而调动的日军人数达到或超过5000人是有可能的。真实的情形希望将来能在日军的战史中找到答案。

6. 孙永勤牺牲于毛山之上应无疑问。尽管存在着无法肯定毛山顶上的几具无头尸体中是否真有孙永勤这样的问题，此外还有他去了北京、绥远的说法，5月29日的《申报》、《益世报》、《新闻报》还说他和关元有的遗体是在"遵迁交界鸡鸣村野地内"和"遵迁交界旷野"发现的，但孙永勤5月24日在毛山上阵亡我认为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理由是，孙文炳、单忠英、郝敬义、杨佩之等幸存者都是经历九死一生或用计才从毛山逃出，一直在山顶指挥战斗、腿伤未愈、又疾病缠身的孙永勤冲出日军包围的可能性不大。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可以确定孙永勤1935年5月24日牺牲于毛山之上，但其如何牺牲的，目前却无法得出确切结论。民国、日伪报纸和抗日救国军官兵回忆录中给出了飞机射中、机枪射中、自杀三种说法，哪种说法为真，因缺乏近距离、第一时间目睹孙永勤牺牲过程的证人的证词，只能等待将来有确切资料发现时，再下结论。

7. 孙永勤在毛山上的牺牲地点，援引的回忆中，有四洞沟沟里、头道毛山尖坝墙洼、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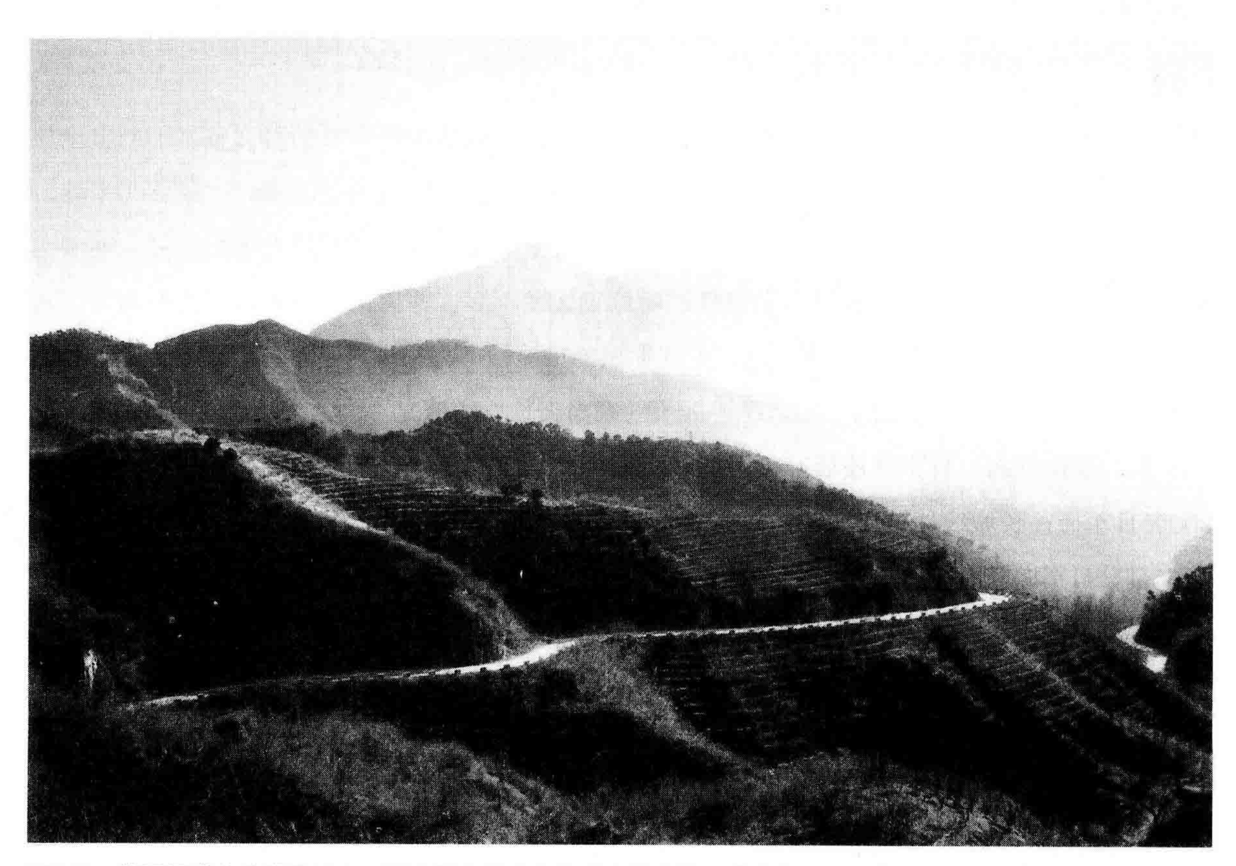


图153　薄雾侵袭中的遵化毛山。图中最高的山尖为毛山最高峰三道毛山。1935年5月24日中午12时前后，孙永勤牺牲于三道毛山南方直线距离约1500米处的头道毛山山顶下。2009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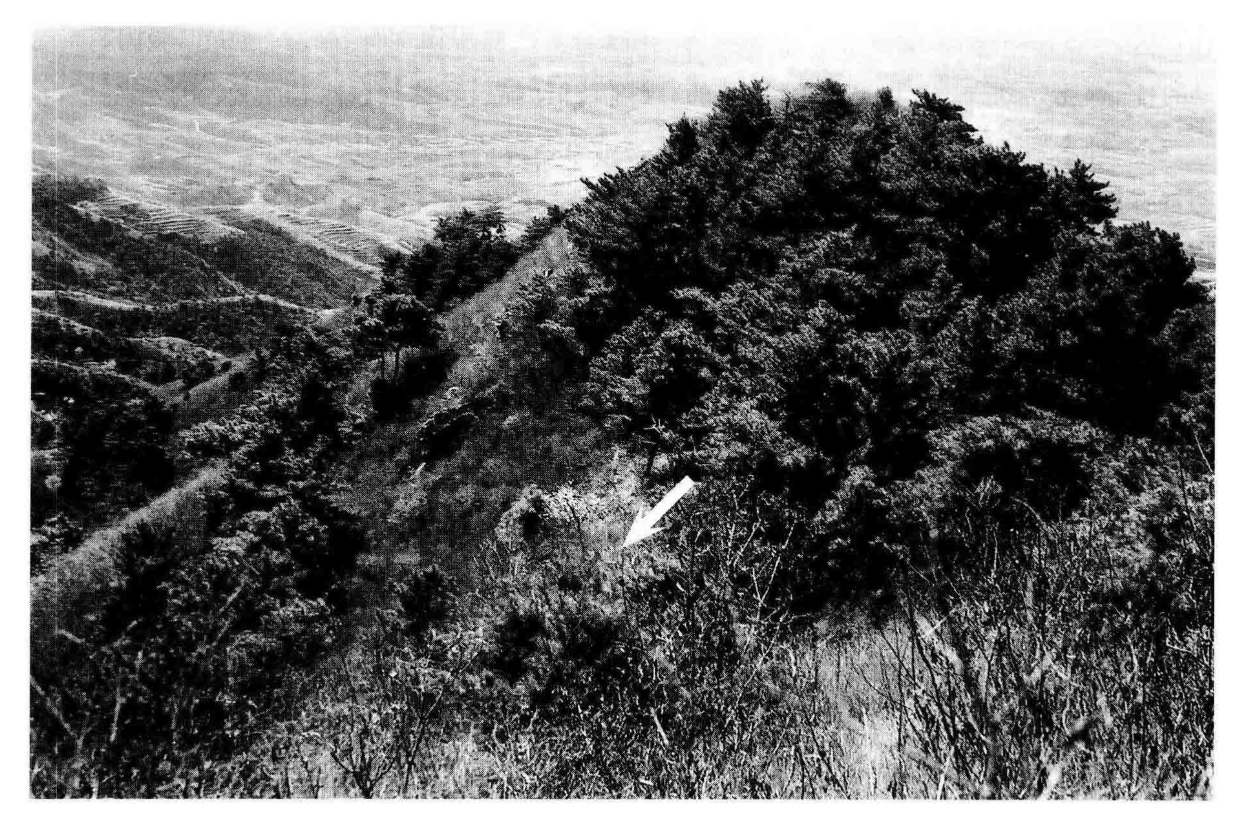


图154　头道毛山山顶下发现孙永勤无头遗体的地点：箭头所指松树处。2006年4月

树沟三种说法。2010年7月13日，经向2006年4月22日曾带我到毛山主峰的刘青林之子刘宝全核实，确认准确地点为头道毛山坝墙洼上尖，具体位置在头道毛山山顶东南侧下方约100米处，今属遵化小厂乡秋花峪村管辖。其地，解放后，刘宝全父亲刘青林曾亲自为他指认过。四洞沟沟里距离坝墙洼上尖不远，和孙永勤牺牲准确位置偏差不多。曹树沟在坝墙洼上尖西南方，走山路要5里，以孙永勤当时的身体状况，走到那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基本可以确定为误传。

说过了5月24日抗日救国军的情况，再谈一谈当天日方的情况。

1. 遵化方面，日军从凌晨开始对抗日救国军发起攻击，午后，毛山及房山沟战斗结束，200名日军撤往长城线外；当晚，遵化县长何孝怡被日军挟持至澈河桥。

部分日军撤退消息载《新闻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7日（1935年5月27日）第四版：

▲北平　蓟密区署息，日军二百余名，廿四日在罗文峪将孙永勤部击散后，当日即撤回长城线外。蓟密区特警七中队，因三家店〔三里店〕鸡鸣村一带已无匪踪，廿四日亦撤回遵化城内。

何孝怡被挟持之事，出自严复之侄严家理的回忆文章《记老牌汉奸殷汝耕》中：

“何孝怡任遵化县县长时，日寇正因时常受到东北义勇军的打击而坐卧不安。蒋政权下的华北军政长官如黄郛、何应钦之流一再严令各级政府与部队要把义勇军当‘匪’堵剿，以讨好



日寇。某日，一位孙姓志士率领的义勇军（有300多人）因被日军追击，越过长城，避入遵化县境，和何孝怡接头。何准其暂时避难，叫手下做了馒头，备了酱菜，给士兵们吃，还请孙及其左右吃了一顿丰盛的筵席。事为汉奸所悉，不及二三日，日寇就在轰炸机的配合下围歼了孙部，并黄夜将何孝怡绑架到瀔河桥日军司令部。日寇用两把手枪对准何，逼他把他们预先拟好的屈服条款抄写一遍。何无奈只好照式抄写。抄毕，灵机一动，在署名处后写上'某年月日瀔河桥日军司令部'。日军司令看后，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中国办外交的人真狡猾，添了这一行，上面这许多条款全无效了。我得另想办法，你先回去吧。'"

2. 天津方面，关东军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当日到河北省政府访于学忠，希望中方特警、保安队防堵住孙永勤部。

消息载《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5日（1935年5月25日）第三版：

天津 仪我二十四午前十一时到冀省府访于学忠，仍谈长城线剿匪事，希望省府转饬特警及保安队在迁安三头营〔三屯营〕以南防堵，勿使孙永勤不南窜。于学忠表示决力剿击，以维持战区治安。仪我满意而去。（二十四日专电）

3. 北平方面，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就5月21日在天津与酒井隆、仪我商谈内容，对外界发表谈话，明确指认孙永勤部与北平义勇办事处有联系，中国官宪曾予以帮助，日军决心将其彻底扫荡，直至肃清。

消息见《大同报》康德二年5月26日（1935年5月26日）第一版，前已援引，不再重复。

国民政府方面，当日有三个情况要记载：

1. 在非战区，新编河北省特警队和旧战区保安队从东、西、南三面围堵孙永勤部。消息见《新闻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5日（1935年5月25日）第四版，前已援引，不再重复；

2. 蓟密区专员殷汝耕中午返北平，向外界发表在天津与仪我等会商内容。

消息载《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5日（1935年5月25日）第三版：

北平 殷汝耕今午返平，据谈，此次在津，系会同陶尚铭与日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今〔津〕日驻屯军司令部会商战区剿匪问题。我方曾对日方表示，现在战区内我方保安队人数甚多，少数土匪之剿灭，绝对不成问题。孙永勤部现已逃迁安，张庆余部七中队正追击中，张砚田部六中队亦正迎头截击，不难歼灭。余定二十七日赴通，主持蓟密区行政会议开会事宜。定今日下午谒何，报告此次在津会谈经过。（二十四日专电）

3. 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当晚由天津去北平。

消息载《大公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6日（1935年5月26日）第三版：

【北平通信】 冀省府主席于学忠于前夜由津到平。昨晨十时许赴居仁堂晋谒何委员长，报告战区剿匪近况，并有所请示，至午始出。于氏定今明日离平返津云。

以上各情况外，5月24日尚有一件事值得记载：蓟密区范围内当晚狂风大作。

消息出自《申报》中华民国24年5月26日（1935年5月26日）第三版：

天津　蓟密区长途电话杆线二十四晚被风吹断甚多，二十四晚七时许电话不通，现正派员修理。（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　蓟密区署由平通至马兰峪遵化长途电话昨夜发生障碍，北平仅能与三河通话。据调查系电杆被折，今日尚未恢复原状。（二十五日专电）

狂风刮断电杆现象，1935年4月下旬便在冀东地区出现过，如《申报》中华民国24年4月27日（1935年4月27日）第三版曾以“暴热之后，平津忽起狂风，温度骤降，交通受阻，电杆树木多被吹拔，房屋倒塌，伤毙人命”为题，报道冀东各地遭受风灾情形：

北平　昨气候暴热，达华氏九十度。今晨二时，狂风大作，温度骤减。今晨七时华氏卅二度，今午四一度，下午三时四六度，较昨温度差一倍。市内建筑及交通方面受风侵袭，损害甚多。郊外农作物被摧残，秋收可虑。南苑欧亚航空存机厂铅板顶被风吹离原位，中航南下机停止起飞。由平至南苑电线杆树木等多被吹拔，平津、平保、平通及由平至香山、汤山等处长途电话今晨完全断绝。因风势过大，电话局无法修理。市内电话线吹折甚多，不通话用户达二千余家。电灯线亦吹折千三百余处。因路上行人稀少，电车出厂数量较平时减少一半。树木拔毁，房屋倒塌甚多。中山公园走廊及过厅五间吹塌，倾入河内，损失甚大。宣武门洞今晨行人穿行时，洞门吹阖，撞伤数名。和平门洞门亦被风吹阖，适撞车夫李凤山头部，立即毙命。据测候所称，今晨风速度每秒钟竟达二十六公尺，风向西北。（二十六日专电）

天津　二十五夜十二时后，津市狂风大作，迄二十六晨益烈，飞沙扬尘，天气昏晦。平津长途电话线为吹折，电话局难派员工修理。因断折处甚多，一时难通话。大风二十六晚始息。唐山大风二十五日未息，津唐长途电话线断折已一日，未修复。二十五日市内小广东街及沿铁路线树木电杆房舍吹倒折者极多。因风沙过大，市内行人甚稀。大名、兴济、安次、香河、德县均报风灾，旱风已一周不息，天气燥热，麦苗多枯死。大名西北乡一带数十村发生虫灾，禾稼多为蚀食。（二十六日专电）

北平　平沪北上车，因途中遇风，速度减缓，抵平时误四十分钟。（廿六日专电）

北平　唐山讯：唐山及滦东各地，连日狂风大作，树木被拔者极多，唐山至战区各县间电话全被吹断。（二十六日专电）

冀东地区莫名遭受狂风侵袭，冀东民众认为与殷汝耕有关。“殷汝耕坐冀东，不下雨净刮风。”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



毛山失败原因考

一支在伪满西南“国境”与关东军、伪满军警浴血奋战了近一年半的农民抗日武装，为补充枪弹给养，继续抗日，被迫进入长城以南的中华民国境内，然而入关仅十天，便突然覆灭，不能不令时人震惊。

1982年10月11日，孙永勤之妻雷永兰在接受采访时说：

“永勤在毛山遇敌战斗中牺牲的消息，犹如晴天一声霹雷，震得我头晕眼花，悲痛欲绝。我哭得死去活来，得了一场重病，卧床二年多时间。”

关元有堂弟关元奎2005年7月接受采访时说：

“毛山战斗惨，死人死多了。村里关元士、关恒发、李起发二儿子、杨德义、关元清儿子、关元山弟弟都死毛山了。

“听到人都死在毛山，家里人还不哭？元士大哥家我那大娘哭得死去活来。元士大哥也是拉船的，跟关元有一个船，和他一块参加民众。”

“民众是革命的，不骚扰老百姓，就是供吃，就是打日本人。要是稍微等等，等共产党过来就好了，让人收割得太早。”2005年7月，牺牲于小十二岭的来子之弟——遵化崔家庄乡东双城村马广兴老人说道。

“那时起匪就是革命，就是跟八路军没联系上。孙永勤是好样的，他是跟老百姓一心哪，为了打日本子啊。”2007年4月23日，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陆翠芝老人说。

不仅阵亡抗日救国军家属、对孙永勤队伍有好感的一般民众对非常多的抗日救国军官兵骤然间殁于遵化感到悲痛、难过，就连曾被孙永勤队伍压过枪的一些大户子弟也觉得非常伤感。

2005年7月，我到兴隆县三道河乡偏岭子村采访，高作忠之孙高印萱对我说：

“孙永勤死后，一人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有一个反应，绝对不一样的。有的人感觉孙永勤抗日对他本人没啥利，死了就死了，不死他也不恨。实际上他是享受到好处了，但他个人没觉察到。你比如说，孙永勤打日本人，你不把日本人打跑了，就受他们屠杀了。你没受着，就觉着我没他，不也活得好好的吗？这是见识太短。你要懂得道理的，还是拥护孙永勤的。要不日本咋不敢到这边来呀，就是因为他打他们。咱们中国倒出来一个英雄啊，敢打日本人，不让老百姓受罪，挺缺乏的呀。懂得这个道理的，对孙永勤的死，当然是挺悲痛的。你像我父亲那样的，让孙永勤他们给绑到黄酒铺过，可他就认着支援孙永勤，他也不乐意帮助日本人。因为孙永勤不要你命，你日本子，一句话没说好，还兴误会了。我把你一告，你反对日本来着，他一

听，把你抓进去，就把你杀了。孙永勤，你就是有人告，说这个大财主挺恶，他得亲自来这财主家看看，你是不是真恶，你是不是对穷人真不照顾，他并不随便把你害巴了。要不老百姓，不管穷人、富人，只要心里明白的，他一比较，就恨日本人。这孙永勤一死，是他们的一大损失，对他的死当然是挺悲痛的。他死在敌人手里，说明他不是为了个人。”

在长城北面严酷的自然、社会环境下，尚能够坚持较长时间，为什么到了长城以南气候温暖、生活富足的地方，还是民国政府行政权力所及之处，抗日救国军却迅速灭亡了呢？自孙永勤牺牲时起，这个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七十多年间，围绕抗日救国军在毛山为什么战败，人们给出了各种答案。

第一种，是孙永勤中地名说。除了“毛”“猫”同音，毛山是“猫山”，孙永勤是“山耗子”，猫吃耗子，所以孙永勤会在毛山失败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孙永勤的“勤”字与“禽”同音，猫吃禽，所以他在毛山无法摆脱被“剿灭”的命运。

第二种，住宅风水决定了他最后结局说。认为孙永勤成年后在孙杖子庄西所选的房址，即今天的孙永勤故居遗址，主“灰飞烟灭”，所以才出现孙永勤在日军的炮火枪弹之下悲壮的牺牲的结局。与住宅风水决定了他最后命运相关的一种观点是，孙永勤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在热南和冀东北部都享有盛名的英雄豪杰，与孙杖子庄的地理有关。孙杖子庄的前山尖很像状元旗，主庄里必出一个领导群雄的人物。

第三种，和抗日救国军缺枪少弹，敌我武器相差悬殊有关。

毛山之战前被土匪绑架、次年初获救回到毛山沟的傅连明老人说：“民众武器夺的都是日本人的，都是砸据点得来的。不夺他们哪有啊？各家哪有啊？我们一个庄总共才趁一棵七九。那有枪的，一棵枪，两棵枪，民众来了，都给敛走了。那都是哪样的枪，那枪都软哪。光有枪还不中，你没子弹不行不是？你还得有子弹啊。”

第四种，关内山小，且没柴草。

不仅李连贵哥哥李连福、抗日救国军战士刘俊岳表达过这种观点，毛山沟傅连明、傅连贵、东双城马春林等许多老人都认为这是抗日救国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他们要是不进九虎岭（指遵化九虎岭——编者）这边来，没事。因为啥没事呢？这边山上没柴草，那边山大、柴草大，一上山，你就找不着了。”傅连明老人说。“日本子怕民众，在口外，山大，一打，他们就钻山，日本子没招。最后，挤挤挤，把民众挤到平原地区，站不住了，消灭了。”马春林老人讲道。

第五种，没有打人民战争。

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一位不知道名字的作者。1935年7月31日，孙永勤牺牲两个月零六天，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战斗的将千百万武装抗



日部队争取到党的领导之下来——义勇军孙永勤部半年来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的血战经过》。在文章第二部分“残酷的战斗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这位作者写道：

“这一部队虽是在广大群众的拥护下，获得了不少的胜利，壮大了自己，巩固了自己，推动了口里口外千百万劳苦群众的反抗斗争，但是不可否认的还存在着很多的弱点，是值得我们和每个抗日战士所深刻地领悟的。首先是缺少一种广泛的群众工作，而形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未能组织与领导成千成万的反日群众来参加这一神圣的、光荣的民族革命战争，一般的只是听其自然发展。同时缺少鲜明的斗争纲领，与对广大群众缺少具体的帮助方法，甚至认为，定名为‘抗日义勇军’恐引起中国各军阀的多方进攻，而更名为‘抗日仁义军’等等机会主义的办法。第二，没有坚决地采取进攻的策略。如一些完全可操胜利的战争都没有去作战（如在几次进口的日军长途奔跋情形下，没有急起直追地驱前解决之，而白白等着日军前来追攻我们），特别是在二次进攻宽城中，没有贯彻自己进攻的主张，中了日军假求和之计，而让它逃跑了。第三，关门主义的倾向还是存在的。每到一地不能尽量地武装群众、组织群众，造成新的军事根据地，尤其是对于几次哗变出来的满洲军的共同抗日请求，加以无理由的拒绝。

“有了以上这些弱点，所以使得全京东以及关外各地的千百万劳苦群众，虽然望眼欲穿地盼着民众快来（口里外的人都叫这一部队为‘民众’——编者），虽然千百万劳苦群众积极要求共同抗日，广大民众络绎不绝地远自数百里外来送信，报告日军消息，日满军队不断地哗变，曾与民团相率不愿去打抗日民众的情形下，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与发展。主要的原因是，在部队中缺乏无产阶级的骨干及其政党的坚强领导。我们为了开展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与争取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与自由，只有更加加紧一切抗日部队中的工作与领导，争取上百万抗日义勇军与抗日游击队到党的领导之下来。”

在《火线》刊物发表上述观点后三四个月，中共遵化、丰润县委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时任中共遵化县委书记的骆凤庭在1987年3月6日对佟靖功、栾福忠先生回忆说：

“孙部毛山被围失败之后，上级有这么个建议，开会追悼和研究孙部失败的原因。是在口外冷嘴头大青山开的会，检查孙部失败的原因。孙部和何孝怡的联系不知道。孙部没有党的组织，那个地方（指口外）也没有群众组织，枪支弹药少，军需太缺，经不起敌人打。孙永勤到这边来，就是到有党的组织、有群众组织、有游击队的地方，可以得到支援，保存实力。那次会上同志们是这样分析的，我们力量小，但是地委也没支援上，都有责任。最后得出一句话是‘人民战争万岁’。没有人民支持是不行的。在冷嘴头大青山召开的那次总结检查会议，参加的有张志全、高存、马子敬，当地的同志不知姓名。这次会议主持人可能是张志全，张志全是丰润县委的，和苏林燕一起活动。张志全不在地委，那次会议没有地委的人参加。王平陆没有参加。会议时间是1935年接近冬天，秋冬季。

“孙永勤毛山被围怎样汇报到上面的我不知道。我也向上级汇报过，孙部失败后汇报省委，省委负责人的姓名我不知。”

第六种，没有和中国共产党接上头。

1983年6月1日，张杖子张如山老人在接受栾福忠、邢连义先生采访时说：“孙永勤就是敢干，有了子弹就打一阵。谁家有枪跟谁要，不给就绑起来。我觉得他是有勇无谋的人，没有和党接上头，所以败了。”

第七种，起义过早，时机不对。

不仅马广兴、陆翠芝这样的普通百姓认为孙永勤如果等八路军挺进冀东后再起义，结局可能会好一些，抗日救国军战士孙文阁也持这种观点。1983年6月1日，他对栾福忠、邢连义先生说：

“孙永勤就是敢干，没有军事（原文如此，完整意思当为‘没有军事谋略’——编者），和八路军接上头就好了。”

第八种，国民政府当局不仅不援助抗日救国军，反而派兵合击孙部。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孙永勤的宣传文章大部分持此说，然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莫过于闵时夫所写的《孙永勤烈士传》。在1935年底完成的这篇传记的结尾部分，闵时夫写道：

“民史氏曰：当孙烈士纵横热河之际，全国报纸犹不敢不称之为义勇军。及民国24年5月初中日交换大使之后，亦日贼与烈士血战之时，乃各昧良称之为‘变民’。然蒋作宾及广田之香槟酒未干，日本贼军已借口‘刺杀二亲日社长事件’及进攻孙永勤部，违约开入非战区，杀我同胞矣。时汉奸殷汝耕首随日贼称烈士为‘匪’，而全国之报纸竟一致称烈士为‘匪’，而南北当局亦加入‘围剿’以媚日贼。蒋介石、宋哲元卖国政府之丧心病狂，自不足论，然我舆论界竟有少数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未有如此之甚者。而全国知识界正气为卖国政府所抑压，以至有少数甘于认贼作父，丧尽天良，贻中国文人万世之羞者，亦莫以此为甚。哀莫大于心死，吾痛莫可言矣。当日伪在国境内进攻孙军之时，所谓当局不惟不抗议，反向日贼谢罪，谓‘麻烦’日本，殊为‘抱歉’。不惟不援助孙军，反派兵合击，以为日贼即可满意。孰知自毁长城之后，日本不断‘抗议’，压迫河北省政府移保，强迫撤退驻军及取消国民党与蓝衣社。此何事也，然蒋介石、宋哲元等卖国政府均一一为之。但日贼野心并不以为满足，仍节节进攻，五省河山，名存实亡，今无耻下流汉奸殷汝耕且立所谓自治政府并迫五省脱离中国，而河北及察哈尔又将实行所谓‘特别区’矣。彼拥兵百万者，何以对烈士于地下乎？孙烈士最后以一千之兵，战日伪汉奸逾万之众，力尽殉国，无一偷生，应在人类解放史中国革命史上占一最光荣壮烈之地位。昔田横自杀，五百随之。今孙宫〔关〕烈士等七百之众，一时饮弹沙场，实尤壮烈万倍。彼等为国家争万世之光，死可无悔，然我国民能忘日贼杀我七百烈士之血海深仇乎？我中国民族仅有一孙永勤一宫有元〔关元有〕存天之正气乎？我中国舆论界中的少数分

子，犹能丧心病狂，冷血无耻，称民族英雄为‘匪’乎？我国民除听令日贼日日占我领土，杀我英雄，听卖国当局日日卖祖国杀忠良以外，竟能忍辱含垢不求自处之道乎？”

第九种，战争观念尚停留于古代，未意识到时间已是20世纪。

我看到的文章和采访过的人中，只有三个人意识到了此点。

1. 抗日救国军战士刘俊岳。

1983年6月15日，他在接受兴隆党史办栾福忠、邢连义先生采访时说：“感觉毛山高可能会对作战有利，没有经验。”显然他经过毛山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反思，已意识到了冷兵器时代以高为准的作战指导思想是造成毛山战斗失利和抗日救国军覆灭的重要因素。但他只谈了这一句，再未多讲。

2. 原兴隆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闻成。

2005年1月我到遵化大草店采访他时，他说：“孙部在遵化的行踪被日军掌握以后，以日军当时的那通信、交通条件，就是半夜知道情形，也可以调来军队。孙永勤在吴家沟住宿后，敌人紧急从古北口调一个连，从迁西的澈河桥，那里有日本驻军，住着好几百日本兵，也调了一个连。直接从南面进攻的，是从古北口来的日军。这个连从古北口到遵化城东是夜间行的军，大概是三个汽车，从靠山庄往北，直接开到吴家沟村西去了。澈河桥那一个连是从三屯营扑过来后，用汽车半夜运到房家峪。部署在毛山东麓陡岭子、房家峪、强庄子、柴户场的日本兵都是澈河桥来的一个连。东边的日军和西边的日军联络得非常好。”

3. 遵化小厂乡信访办信访科员吴艳民，即孙永勤曾住宿于其家的吴凤忠之子。

吴艳民，1952年生，1972年至1978年曾在天津警备区86978部队服兵役六年，当过班长，对军事地形学有研究。由于当年孙永勤的军部曾设于他家，兼之奶奶、父亲经常向他提起孙永勤的仁义和英勇，所以他对孙永勤及其领导的抗日救国军非常有感情，曾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他们之所以在毛山失利的原因。

我与吴艳民第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4月，是由小厂乡文化站站长黄振来先生帮助介绍的。第一次见面，他只是在地图前为我阐述他关于孙部覆灭原因的看法。2007年4月，我第二次到小厂乡见他，他开着他那辆丁当乱响的“坦克”，陪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整围绕毛山转了一天的时间。2009年11月27日，我第三次到小厂乡见他，他又陪我到毛山西麓当年的日军炮阵地旧址看了半天。

吴艳民关于抗日救国军毛山失利原因的看法总结起来是：以现代战争的观点来看，毛山在军事上为绝地。孙部抢占毛山，不但无法发挥他们的优势，且将他们的弱点尽数暴露于日军面前，遭受失败几乎是必然的结局。

吴艳民说：“毛山为孤山，像一个坟头。这座山很怪，北面与庄客连不上，有两公里宽

的大沟。东面与小于沟连不上，也是两公里宽的大沟。西面的沟更宽，得有3公里，而且越往西，山越小，最西面的只能叫丘陵。南面是一块开阔地，足足断绝7公里。只有东北角那里有一条很小的缝隙，由王家沟经小于沟奔喜峰口才能冲出去。

“孙永勤他们绝对属于从溥仪伪‘满洲国’杀出来的一支队伍，他们的根基在那儿。原来一直打游击，打近战、夜战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从兴隆到遵化，可以说一路顺风。但是毛山战斗属于打阻击，他们打阻击战不行。游击习气，不适应这种转变。

“日本人经过在长城北面和他们打了很多次仗，已经把他们专钻山沟的特点摸透了，所以占住了毛山西、北、东三条山沟。过去打仗以高为准，孙永勤他们以为毛山高，可以居高临下，没想到日军用的是炮。日军使用的应是两个轱辘的九二步兵炮，能够覆盖毛山。等孙永勤他们上到毛山顶上，就跟上到坟尖上一样，军事上就陷入绝地了。没有战术位置，也没有战略位置。日本兵的炮够得到民众，民众够不到日军，因为民众的枪不好。日本人的三八大盖能打3500米，民众用的汉阳造只能打2500米左右，差一公里。再说准确性，汉阳造肯定不如三八枪。所以，民众在毛山上有劲使不上，基本上只有被屠杀的命运。

“民众那天抓山头抓错了。要是抓庄客、北岭，向东西两边撤，完全可以。只有毛山特别孤，他们吃亏在于抓了一个孤山头。当然这都是现在的猜想。

“从那天的情况看，即使抓了毛山，如由王家沟、小于沟奔喜峰口或者铁门关长城，也应能冲出去，因为那里正是日本人的空隙。但第一部分人冲下来后，不知为什么又回去了。只要冲到小于沟就安全了，往东北就能冲出去了，后来冲出去的人走的也正是这条道路。”

以上是我看到、了解到的抗日救国军为什么在毛山失利、覆灭的全部答案，哪些答案是抗日救国军失败的真实原因呢?

我认为三、五、八、九涉及到了抗日救国军失败的真正原因，一、二、七没有对问题进行实质性解答，四不是抗日救国军一定失败的因素，六忽略了孙永勤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多次联系的事实。

因为地名和风水不好导致死亡和命运悲苦的案例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为数不少，但命运不可改易的观点并非中国命运哲学的全部内容。在宿命学说大行其道的同时，中国古代哲人还努力传播过一种“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观点，即一心行善或一心行恶皆可改变原来的命运。相由心生，命由心造，一切皆由自己的内心决定。按照这种观点，孙永勤和抗日救国军既可以在毛山失败，也完全可以不在毛山遭受灭亡的命运。宿命论观点注意到了孙永勤、抗日救国军曾被注定的命运，但未看到孙永勤、抗日救国军抗争命运的努力。反抗了而未成功，什么导致了这个不成功，在什么情况下能成功，这才是我们要探讨的话题，宿命论观点显然回避了这一点。

至于七“起义过早，时机不对”之说，作为对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惋惜同情完全可以理

解，但首先忽视了晚起义或等八路军过来再起义，孙永勤就不成其为孙永勤了。其次，为什么晚些时间起义或八路军过来之后就可以避免被消灭的命运也没有说明，因此可视为也没有正面回答孙部失败的原因。

第六种说法“没有和中国共产党接上头”，不仅与实际不符，而且忽视了若不是冀东有韩东征、李运昌等坚持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人存在，抗日救国军很可能在1935年5月24日之前便因“左”倾路线的影响，经历像1933年时期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一样结局的情况。

为什么说三、五、八、九这四种说法（即敌我武器相差悬殊、没有打人民战争、国民政府当局派武装力量合击孙部、战争观念停留于古代）是导致孙部毛山失败、抗日救国军覆灭的真正原因呢？

理由有以下几点：

1. 抗日救国军进关就是为了补充枪弹、服装等给养，如果后勤供应充足，他们不会进关，也就没有在毛山战败一说。即使上了毛山，如果武器对等，或相差不大，也不至于遭遇完全被动挨打的命运。甚至只要枪弹充足，除非日军不上山，完全靠火炮和飞机轰炸将抗日救国军尽数歼灭，否则抗日救国军以他们的枪法和近战技巧也不至于死去很多人，使抗日救国军解体。

2. 如果打人民战争，有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他们的军需自然不成问题。军需充足，像上面所讲，自然可以不必入关，即使进关，与日军作战也未必完败。

3. 如果没有国民政府方面武装力量的围堵，他们完全可以摆脱日军的追击，向南深入国民政府统治区内，或向西北穿插重回长城以北，而不至于被压迫到毛山周围的狭窄地域，无路可走，除李连贵一路外，大部分最后只能攀上毛山，被动地被歼灭。

4. 如果他们的战争观念能从《水浒传》、《岳飞传》的战争思维中早早觉醒，即使不能完全转变，至少从老梁之战中能反思出一些教训，认识到他们的敌人是用火炮、飞机、及时通信的电台和可迅速抵达的汽车武装起来的，战争观念是空地立体打击的，那么也不至于在明知敌人要彻底消除他们这个心腹之患的情况下，还朝毛山顶上攀爬，结果正中敌人下怀。

上述四点，第一点说的是战争的后勤保障问题；第二、第三点讲的都是要取得战争胜利，必须最大限度地实行统一战线，变孤立、局部抗战为全面抗战的问题；第四点说的是，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形态和古代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观念必须及时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的问题。孙部因为在后勤保障、统一战线、全面抗战、战争观念上出现了问题，才导致最终的失败。

后勤保障、战争观念问题不多讲，这里只说一说全面抗战问题。

根据目前能够看到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史料和研究著作，冯玉祥之所以在1933年8月作出了解散同盟军的决定，除国民政府大军压境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南北反蒋抗日联盟

因为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不合作和蒋介石、何应钦的破坏解体后，他已意识到单靠个别抗战、局部抗日，不动员全国所有的力量一致对外，是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的。察哈尔抗战失败三四年后，冯玉祥在总结察哈尔同盟军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失败的教训时，明确讲道："这样看来，好像结果与原因相违悖，有点奇怪，但是当中实有根本的原因存在。这个根本原因就是个别抗战和局部抗战的万不得已的缺陷。局部的行动已不适用于现代国家，现代任何国家欲其行动或政策发生作用，必须有统一的整个的一贯原则。"他说，"我们如果想保持过去的光荣历史，实现将来全盘的成功，就须先补充过去万不得已的缺陷，结成整个的、统一的、一贯的'民族阵线'，发动全部国民起来一致抗战。最重要的前提还需要中国内部能协力合作，和衷共济。质言之，中国今日要达到抗战救亡、民族独立的目的，必须对内和平统一，精诚团结。"

靠少数热血中国人之力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承德县、热河，最终驱逐出中国大陆，实现起来非常困难，至迟在老梁之战后，孙永勤也应该是有了深刻体会的。他之所以率队进入长城以南的中华民国统治区，除了遵化县长何孝怡、孟家铺区委提供了两个补充给养的机会外，和他内心里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幻想也不能说没有关联。即他认为自己不是"满洲国"人，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队伍是中国的军队，中国人、中国军队到了中国境内，中国政府总不会看着在长城外苦斗苦熬了一年多的他们窘困潦倒、自生自灭。换句话说，孙永勤并非不想改变抗日救国军在伪满境内非常孤立的抗战的局面，然而全面抗战并非他所能发动的。在中国政府尚未动员全民一致抗战的情况下，他只要能得到中国政府对他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物资上进行一些补给，精神上给予一些安慰、鼓励就很满足了。然而他的小小的希望最终也落空了。这就涉及到了一个70多年来一直困扰着阵亡抗日救国军家属、抗日救国军幸存者以及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研究者的问题：当时的国民政府华北当局为什么不但不支援抗日救国军，反而派出了警队、民团围堵他们，致使他们因无法突出包围，而被日军消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研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基本相同，即蒋介石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反对民众抗日，集中全力"清剿"共产党。如《热河革命史稿》在总结抗日救国军失败教训时说："国民党执行不抵抗的反动政策是这支农民抗日武装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却反对一切抗日力量，致使国民党地方当局竟敢出卖民族利益，出卖抗日救国军，甚至与日伪互相勾结，日伪蒋合流，联合剿杀了这次农民起义。"《冀东革命史》在解释国民党当局配合日军"堵剿"抗日救国军的原因时，答案是"本为媚日乞怜，苟且偷安，结果却适得其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抗战时期的档案文献的陆续公布，特别是保存在俄罗斯、美国、英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档案资料机构中的与中国十四年抗战相关的解密档案、日记等为越来越多的大陆学



者阅读到，当年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攘外必先安内”，在七七事变发生前一直对日妥协，其真实原因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个情况导致了对国民政府华北当局在1935年5月为什么要配合日军围攻孙永勤抗日救国军有了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

“‘九·一八’后，至“西安事变”前，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直奉行的都是‘攘外必先安内’这样一个处理内政的国策。”原贵州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宗仁先生是何应钦问题研究专家，对何应钦在抗战中的作用及何氏与蒋介石的关系，特别是何应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攘外安内”、“何梅协定”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2005年9月初，我到贵州省安顺市与正在那里参加会议的熊先生见面，请他就国民政府当年为什么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谈了看法。他说，“‘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国策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抗日战争准备阶段，至少在西安事变解决以前，必须注意到当时整个中国实际是三派政治势力、三种政权、三种军事力量‘三足鼎立’之势。三派政治势力分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系；以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反蒋地方实力派；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三种政权是：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5月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及其后演变出来的西南政务委员会、1933年11月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中共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及后来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政权。三种军事力量是：国民党中央系直接指挥的中央军；以桂系、粤系、川系和西北军、东北军为代表的分布于两广、四川、云南、华北、西北等地的国民党地方军和杂牌军；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三派政治势力、三种政权、三种军事力量在抗日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根本分歧的，都是要抗日的，然而他们各自又都设立了抗日的前提。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系、南京国民政府针对国内当时的情况制定的是‘攘外必先安内’这样一个政策和策略。它的实际内容是三个：其一，以‘剿共’为当务之急，这是安内的核心。其二，要解决中央一体化的问题，就是把各地方实力派的力量统一到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系、南京政府的指挥之下，由他们来统一指挥；其三，努力充实国防力量。准备抗战，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准备的。也就是说，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系、南京国民政府攘外是毫无疑问的，还是要抗日的，但是要等他们准备好以后再抗日，而且要由国民党中央系包办来抗日，在‘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下来抗日。以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例，他们的分歧不在抗日与否这个问题上，而是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系设立的抗日前提是：不剿共，无法抗日，要在消灭了共产党后才抗日。而中国共产党呢，当时在‘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也设立了抗日前提，即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显然这也是不利于中华民族团结的。这就是当时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上的分歧。实践证明，国共两党在对日战争准备阶段设立的抗日前提都是错误的，都背离了中华民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时所应采取的正确选择，那就是停止内战，全面抗日。1935年夏以后，中国共产党以《八一宣言》为


图155　1935年，蒋介石在军官学校演讲

标志，放弃了‘反蒋抗日’政策，转变成了‘联蒋抗日’。西安事变过程当中又变成了‘逼蒋抗日’，最后是‘拥蒋抗日’。蒋介石、国民党也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策略，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根本敌对的局面开始改变。“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才终于走上了停止内战、共赴国难的轨道。”

熊先生说，西安事变前，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系、南京国民政府自设的是在“剿灭”共产党、推进中央一体化、充实国防后再进行抗日这样一个前提，所以长城抗战失败后，在对日关系上一直采取了妥协态度。

“热河失陷以后，整个东北四省全部沦入日本人之手。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东北属于东北军的势力范围，没把它像内地一样看成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东三省的失陷、热河的失陷都没有在意。南京国民政府所追求的利益是确保华北的安全。长城抗战失败以后，它与日军之间签订了一个《塘沽协定》。过去说这是一个卖国条约，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的，因为它出卖了我们国家的主权。但确切一点说，它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一个结果。妥协的目的，便是要腾出手来，首先解决南方的中共问题；其次解决地方实力派问题；再次充实国力，加强战备。为实现上述目标，对于一切有碍于对日妥协的抗日武装力量，不论是共产党的还是非共产党的，通通都在它的‘剿灭’范围之内。”

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系、南京国民政府并非不抗日，而是要待解决了中共、地方割据势力，使国家在实际意义上获得统一，加强国防后再抗日的观点，在杨天石、杨奎松、熊沛彪等学者的著作中同样可以看到。可以说，近年，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一手档案、文献被学者发现，此观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

为完成抗战准备，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系、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亲近英国、美国，依赖它们牵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对日本，由于完成抗战准备需要时间，为尽量避免过早与日本开战，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系、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妥协策略。让蒋介石等十分看重的在华北的对日妥协工作主要是由1930年3月升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来承担的。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县泥凼村。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在黔军中任过职。协助筹办过黄埔军校，任过黄埔军校总教官、教导团团长，

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中原大战、第一至四次对红军的“围剿”。热河战事起后，被蒋介石派往北平，名为保卫热河，实际为办理对日交涉，同时作取代张学良、“统一”华北的准备。1933年3月14日，即张学良通电下野的次日，何应钦以军政部长职兼代了原由张学良担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务，开始了他全权控制华北、平津军政近三年，谋求对日妥协，以解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后顾之忧的生涯。

“北平军分会的近三年时间，如果何应钦愿意回忆的话，应该是他一生中最违心做事、最不光彩的一段时间。”熊宗仁先生说，“何应钦的情况和国民党其他将领还不一样，他手上没有一兵一卒，所有的权力都是蒋介石给的。蒋介石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我蒋介石，就没有你何应钦。’实际上，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蒋介石头上。如果没有何应钦，也就没有蒋介石。他俩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蒋介石为什么把对日妥协这样一个会招全国人所指的任务交给何应钦呢？就是相信他。蒋介石和他是留日的前后期的同学。蒋介石说，何应钦对日本的情况比较熟悉，侵华日军中，很多人要么是他士官学校的老师，要么是他前后期的同学。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他最听蒋介石的话，蒋介石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才把对日妥协的工作让他负责。他到北平，取代张学良，担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张学良的权力消弱掉，真正让张学良、东北军纳入国民党中央系的统治。第二个目的，东北沦陷后，东北军要打回老家去，要抗日这种情绪日益高涨，张学良本人也意识到，‘九·一八’时没抵抗，让日本顺利地占领了东北，有愧于自己的祖宗，有愧于东三省的父老，也有抗日的要求。那么蒋介石不放心，让何应钦去取代张学良，就是要实现对日妥协，同时把华北那一带的各种非中央系的武装力量完全纳入到国民政府的统一控制之下。而何应钦未必不知道，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做这种妥协的事情，就像李鸿章当年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那样，肯定会遭到国人的痛骂。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蒋介石把这个别人不能胜任的重要工作交给了他，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因为他知道，他所要做的，是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集体意志已经定了的东西，不过是让他操作罢了，他只是一个执行者。他怎么操作得好，让蒋介石能赢得时间，腾出手来剿共、统一地方实力派、加强战备，特别是完成‘剿共’这个安内的中心任务，只要实现这个目标，手段是次要的。”

明了了何应钦到华北的任务后，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包括之前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内，之所以会被作为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的代理人的何应钦消灭也就容易理解了。

“孙永勤抗日救国军也好，在他前面举起抗日旗帜的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也好，都是一个目的：驱逐日寇，而且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当时认为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就是投降卖国，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政府卖国，所以你政府不抗日，我们自己起来抗

日。在这个意义上讲，虽然这两支队伍情况还有些不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受了共产党的直接影响发起的，队伍中有共产党员参加，但它们性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都属于爱国民众的自发武装。那么，这些爱国的抗日武装为什么会被国民政府联合日军给消灭了呢？因为何应钦的任务就是秉承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的意旨，在北平和日军进行妥协谈判，为蒋介石争取时间，解决剿共这个安内的核心问题。这些抗日武装的行动，他认为妨碍了对日妥协，妨碍了为蒋介石赢得时间，所以才导致了在他的消灭范围之内。此外，这样一些武装很容易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因为当时中共主张武装民众抗日。如果他不消灭，那么这些人很可能成为共产党的武装，这让他更要将他们消灭。这和剿共这个安内的中心是完全一致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日军做不到的事，何应钦做到了，实际上帮助了日本，是我们自身抗日力量的一种内耗、削弱。”

熊先生的观点与1935年5月国民政府华北当局作出协助日军围攻孙永勤部的决策过程相符：①由“关内十日记”部分援引的民国报纸的报道可以看出，虽然表面上与日本方面折冲解决孙部入关问题的主要是蓟密区专员殷汝耕、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滦榆区专员陶尚铭部分地参与到其中，但实际上不论殷汝耕也好，于学忠也好，都要向北平军分会汇报——当何应钦在太原时，向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汇报，然后由鲍将遵化情况电话转报给何应钦；何应钦返回北平后，直接向何应钦汇报。由此可以看出，在夹攻孙永勤部事情上，隐在幕后的真正决策者是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②抗日救国军入关后，国民政府华北当局对日方请求中国当局共同驱逐孙部的前期答复虽是“停战区域内之警力足以处理此事，日兵无越入中国区域之必要”，后期才商定与日方夹攻，但从孙部才入关，华北当局就派出了旧战区保安队周毓英部和新编河北省特警队张庆余部前去截堵情况看，对孙永勤抗日救国军采取消灭的态度是贯穿始终的。前后期对日采取不同态度的区别只在于：前期不希望日军入关，以免使得华北局面重现1933年长城抗战时的复杂情景，拟自己解决；后期因已无法阻止日军入关，为使华北事态不致扩大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影响国民政府的国策，才采取了合作的姿态。前期是“小事化了”，后期是“大事化小”，无论前期、后期，孙永勤部抗日救国军都被视为消灭对象是一致的。

“由于抗战初期，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系、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实行的是妥协政策，所有威胁到这个政策实施的抗日武装力量就注定成了要被消灭的对象，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孙永勤抗日救国军都成了这个政策的牺牲品。”熊宗仁先生说。他的话还可以再明确一些，实际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抗日救国军更主要地成为了蒋介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思想的牺牲品，因为那才是深受朱熹、王阳明、曾国藩思想影响，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已占据地位、权力顶峰的蒋介石个人的理想。

华北当局出动的“堵剿”孙永勤部的警团人数，过去的研究和宣传文章中，大多写成一万

名。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数字有些夸大，实际人数应该没有这么多。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当年民国报纸的报道。

逐日查阅1935年5月的天津《大公报》、《申报》等民国报纸，可以发现，国民政府方面围攻抗日救国军的武装力量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 驻遵化保安大队王占元部。

2. 旧战区保安队第三总队周毓英部。

3. 新编河北省特种警察队第一总队张庆余部。

4. 新编河北省特种警察队第二总队张砚田部。

5. 遵化县各村民团。

其中驻遵化保安大队王占元部，我怀疑也属于旧战区保安队周毓英部。但目前缺乏更多的资料来证明，所以暂时将其单列。

民国报纸对以上警队派出情况的介绍是：

5月15日孙部入关之前

除驻遵化保安大队王占元部、遵化各村民团外，外部进入遵化的武装力量只有新编河北省特警第一总队张庆余部于14日派去了队警百余人。

5月17日

旧战区保安队周毓英部两大队当日驰往遵化。

5月18日

周毓英部驻抚宁两大队、驻玉田两中队当日开抵遵化。

驻蓟县新编河北省特警第一总队张庆余部派第一区队两中队开遵化。

5月19日

张庆余部一中队奉令驰抵遵化。

5月20日

周毓英部400名由玉田开抵遵化城内协防。

遵化县政府派出大批团队围攻小寨一带之“匪”。

5月23日

张庆余部第一区队长张含明亲率第三大队尾追孙部。

驻滦榆区的新编河北省特警第二总队张砚田部亦调派一大队迎头堵击孙部。

5月24日

张庆余部七中队追击孙部。

张砚田部六中队迎头截击孙部。

以上即为目前所知的5月24日及之前国民政府华北当局围攻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全部力量，统计为：王占元部大队全部出动；旧战区保安队周毓英部报纸显示为共出动了四个大队、两个中队，还有400名队警；张庆余部出动了一个大队、四个中队，另有100余名队警；张砚田部派出了一个大队、一个中队；遵化县民团出动了大批。

王占元大队的总人数不详；周毓英部每大队的人数，按《申报》1935年3月27日所载，为600人、中队人数不知；张庆余、张砚田部每大队人数约为400名，每中队人数约为100名，这是根据报载两总队的编制情况所作的推算。《申报》1935年4月17日、5月12日、5月15日曾对新编河北省特种警察队的组织情况作过介绍：新编河北省特警队共分为第一、第二两总队，每总队各编特警2500名。总队部设总务、督察、执法、医务、会计五大处，另设外交处，办理对外各项事情。总队部下辖两区队，另有一骑警队。每区队分为三大队，每大队分为四中队，每中队又分为三小队。总队部和骑警队的人数，报纸未公布，以共100人来计，则每区队为1200人，每大队为400人，每中队为100人。

如果王占元大队人数就高不就低，按周毓英大队人数来算的话，根据上面的统计，王占元部出动了600人，周毓英部派出了超过2800人的警力，张庆余部出动了900余人，张砚田部派遣了500人，合计4800人。然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因周毓英部在非战区内的全部人数，按《申报》1935年5月11日所载，才2000人，之所以会出现超过2800人的统计结果，其原因是报纸进行了重复报道，但未予以澄清。目前可基本判定的是，5月17日、5月18日对周毓英部出动警力的报道属于重复，它们与5月20日的报道是否重复现在尚不清楚。重复报道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周毓英部围攻孙部的队警人数上，在张庆余部、张砚田部出动的警力上也可能存在。5月18日、19日对张庆余部警力的报道，5月23日、24日对张砚田部警力的报道可能就属于同一性质。为避免出现少于实际人数的情况，对于旧战区保安队、新编河北省特警队，我现在是按王占元部600人、周毓英部2000人，张庆余和张砚田部仍按900人和500人的方式统计，这样新旧队警的人数是4000人。遵化县各村民团的人数不好量化，目前按3000人来估计，但由于目击者的报告中，看到民团出现的情况很少，所以我认为实际出动围攻孙永勤部的民团人数远低于3000这个数字。即使按3000人来算的话，与旧保安队、新编特警队人数相加，华北当局派遣和动员的围攻抗日救国军的武装力量也不过7000人。我个人的看法，旧战区保安队、新编特警队大约出动了3000人左右，最多不超过3500人，遵化县民团有可能在1000至2000人之间，围攻孙部的警团总人数约5000人左右。这个数字与伪满《大同报》康德二年5月27日（1935年5月27日）第一版的报道基本相符。在标题为《扫荡国境孙永勤匪，毛山沟已发生战斗——关东军司令部之发表》的那篇报道中，记载有5月23日晚（原文误写作24日）日军山田部队长抵达滦河桥日军司令部时说过的一句话："县长拥有保安队民团等三倍孙匪以上之兵力，包围占领遵化

东北方三里毛小沟（应为‘遵化东北方三里店毛山沟’——编者）一带地域之孙匪已有二日，并未讨伐云。”这句话透露出的一个情况是，当时中国方面围堵孙永勤部的全部力量是“三倍孙匪以上之兵力”。“三倍孙匪以上之兵力”转换成具体人数是多少呢？由于“孙匪”部的人数，日军认定为1600名——消息见《大同报》康德二年5月24日（1935年5月24日）第一版。“三倍孙匪以上之兵力”，实则为4800名，或比4800名稍多一些。由此我判断，国民政府方面配合日军围攻抗日救国军的总人数约为5000名左右，可能比较接近1935年5月的事实真相。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民政府方面对孙永勤抗日救国军持消灭态度，但旧战区保安队周毓英部、新编特警张庆余、张砚田部在5月24日当日及之前的实际围堵过程中对抗日救国军却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原遵化党史办副主任马秀山先生在他的《试论当年日军逼签“何梅协定”的两个借口》中，曾列举了他了解到的几个情况：

“尚健在的原保安队人员提供证明，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进关时，保安队内部有口头密令，任何人不准开枪射击，违者杀头。

“实地走访现尚〔健〕在当年抗日救国军中的小队长、班长、战士及其活动地区的高龄老人，他们都能证明保安队始终没和救国军正面作战。在保安队尾追孙部过程中，虽然时有密集的枪声，而孙永勤从没下令还击，实际孙部并无一伤亡。

“孙部驻遵化城东西小寨期间，曾派出十八名勇士化装樵夫荷柴入城，意欲找县长逼索粮秣军需。入东门后被警宪人员察觉，立即转出〔往〕南门，又遇保警人员截阻盘问。不得已，十八名救国军勇士亮明身份。经与警方严正交涉后，竟开门放出。警宪人员向空中鸣枪，十八人安全返回。

“隔日，自遵化城内向西小寨孙部营地两次送去军需什物。一次送大米约2000斤，猪肉少许，尚有子弹两箱、枪两支。又一次，送革制皮鞋数麻袋。救国军从来人中获悉日军即来‘抄剿’的确实情报，孙部当即转移，使日军扑空。

“孙部于毛山被围，在日军总攻头天下午，在包围圈内迂回行军途中，于三里店北山根接到保安队驻遵化三大队长吕世江派员送来口信，大意是‘日军将要发起总攻，你们快走”。孙部继续进军，少时西面山头遇有民团岗哨。孙部派人联系借道，民团战士表示不敢答应。孙不愿与民团发生冲突，又返回原驻地，天黑又雨，权宜在原地宿营，未能脱开包围圈，致使次日遭袭。

“毛山战斗总攻开始前夕，李连贵(孙部四总队长)突围走散的小股抗日救国军战士在总攻开始后，由包围圈西部突围时遇保安队，竟安然得到放行，且有人提示他们事后要将枪支隐藏好。

“保安队虽陈兵于鸡鸣村、三里店一带，面向北部毛山包围孙部营地，但实未主动出击。

“事后，有人亲自听到保安队第二总队第四区队第一大队长贾勋臣谈论孙永勤说：‘孙永勤太不聪明了，当时西边为他们留出一面，示意让他们从西边冲出去，他看不出；保安队的机枪往空中打的，他也不听听枪声儿，还不往外冲！’

“5月24日晨，日军对毛山孙部发起总攻时，山田队乘汽车，冒雨从包围圈南侧穿过保安队防区，向抗日救国军作突然袭击。保安队防区有人借故鸣枪，枪声为抗日救国军传递了信号，孙部及时离开营地进入毛山沟准备迎击（此时仍在包围圈内）。

“遵化毛山沟附近秋花峪，一位高龄老人亲眼目睹当时的保安队数名士兵，给战斗后清理战场下来的一名抗日救国军伤员食物。伤员吃不下，一个保安队士兵动员说：‘吃吧，养好伤，还打他日本王八蛋！’”

马先生说到的最后一个情况，在佟靖功先生的采访记录中也有显示。1987年3月初，佟先生到遵化毛山东麓调查抗日救国军被围攻经过，房家峪当年68虚岁的李春云老人回忆说：“毛山战斗结束第三天上，民众军一位伤员拄棍子往东走。走到沙岭子东梁上，遇到保安队两人在梁上站岗。他们给伤员馒头吃，并说：‘吃饱着点，把伤养好了，还打他们去！’”

战区保安队、河北省特警队，包括遵化县长何孝怡同情抗日救国军，至少没对他们真正开枪的情况，不只在马秀山、佟靖功先生开展调查的20世纪80年代在战场地区的民众心中有记忆，2005、2006年，在抗日救国军被剿灭70年，马秀山、佟靖功先生调查20多年后，遵化很多老人们还能清楚地说出相同的情况来。

东双城马广兴、赵德两位老人对特警队的回忆在叙述5月24日战斗时已引用，这里不再重复，只将2005年8月我到吴家沟、毛山沟采访，从吴广顺、傅连明两位老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介绍如下。

“日本子是顺着吴家沟庄头这条道过来打的毛山，保安队都在西梁上，他们没动手。”吴广顺老人说。

“在东面小于沟那儿，”傅连明老人说，“据说有一部分保安队使旗子朝民众晃来的，让接头。他们枪向高里打，让民众往东跑，撤出去，让日本子逮不着影。民众没明白，怕都是日本子，根本不都是。还有保安队不是，保安队没打不是，他们没上山，上山的全是日本人。据我们这附近当过民众的活着时候讲：保安队没上山，他们在底下那就是敷敷衍衍事儿。等到战争打完了，日本人下山，把民众岁数大的杀了几个，赶那年轻的，叫保安队趁日本人正杀人不注意，把绳子给解了，‘往西跑，快跑！’这就跑了。等到日本人要杀时，拿着个刀，提了个鞘，一看少了，问保安队：‘往哪儿跑了？’说：‘往那边跑去了。’本来往西跑了，他说往东跑了，那日本人上哪儿追去，没处追。岁数小的民众差不多都让保安队给放了，没死。”

战区保安队、新编特警队为什么对抗日救国军采取了同情，至少是不积极剿灭的态度呢？



马秀山先生在《试论当年日军逼签“何梅协定”的两个借口》中认为，与下列因素有关：

1.“当时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战区保安队领导人于学忠，对蒋介石、何应钦等人顺服日寇、丧权辱国的行径内心不服，认为他们在涉日关系上有许多问题，不但不支持地方，反而给地方为难。于学忠在《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文章中说：‘1933年至1935年之间，我曾在河北省政府任主席三年，其时日本正谋控制华北，……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当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何应钦、黄郛等人压在人民头上，只求维持其反动统治，不惜仰承日寇的鼻息，对于对日外交问题和中国高级官员任免问题，均唯日寇之旨意是从。……而当时的环境的确是外受日寇的欺凌，内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双方相煎，苦痛难言。’



图156　河北省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

2.“于学忠到河北就任以来，与日军关系格格不入，日军欲驱其离开华北存心已久，当时又在天津日租界的暗杀事件上被日方涉嫌。于学忠原系东北军张学良的亲信，长城抗战期间，张学良被蒋介石逼迫下野，临行时将原26万人的东北军分出17万交给于学忠。于学忠颇有些实力，遂为日军所嫉视，曾对其实行拉拢、威胁(包括暗杀手段)兼施，于学忠软硬不吃，被日方视为与其势不两立的人物。

3.“战区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两总队原系东北军，是《塘沽协定》后由于学忠指令改换军装编成的，其中下级军官及士兵多系东北人，东北家乡沦陷，怨蒋仇日情绪颇深，隐愤难言。

4.“《塘沽协定》后，战区各县县长的人选，都是由于学忠作主指派的。遵化县县长何孝怡受到于学忠的信任，与于学忠有着思想上的共鸣。于学忠调离华北后，何孝怡托病辞职，并得到当局照准(还有人说何孝怡与孙永勤早有交往，但一时难于考证本末)。”

马秀山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已基本上回答了战区保安队、新编特警队（马先生一概称之为“战区保安队”有些不准确）同情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原因，但还需要再挖掘一下于学忠为什么与日军势不两立的深层因素，此外他与特警队、何孝怡之间的关系也有必要多作一些说明。

于学忠，根据《于学忠将军传》作者张传瑞先生介绍，字孝侯，祖籍山东蓬莱，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八日（1890年11月19日）生于旅顺口。其父为宋庆所部毅军士兵，甲午战争时，曾赴朝鲜与日军作战。于学忠童年家境贫困，小学上了五年后，便被迫辍学，后由武卫左军前营

管带官米振标保送入绥化随营学堂，才得以继续学业。1908年，于学忠考入通州陆军速成随营学堂炮科，1911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分配在武卫左军任排长，从此开始职业军人生涯。他曾任过热河林西镇守使公署副官长、湖北襄阳第十八混成旅炮兵营长、第十八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团长。1921年在川军援鄂的宜昌之战中，以有胆有识为北洋直系统帅吴佩孚所发现，先后被吴任命为第十八混成旅旅长、将军府将军、第八军军长、十四省讨贼联军第九军总司令兼荆襄总司令等职。1927年6月，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攻击下败北，西行入川。于学忠感激吴佩孚的提拔与信任，不愿背叛他，与之共进退，解甲回到故乡蓬莱。两月后，因原部下对收编他们的冯玉祥部不信任，为给部队谋出路，应部下所请，在奉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诚恳相邀下，加入奉军，被任命为镇威军第二十军军长，归属张学良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其后，参加过攻打冯玉祥的彰德之战，消灭张宗昌、褚玉璞直鲁联军的滦东战役，1928年11月被张学良任命为临绥驻军司令。中原大战起后，又被任命为东北第一军军长，奉张学良命进关和平接收被晋军占据的华北地区。1930年10月20日，于学忠在北平就任平津卫戍司令职。1931年7月，石友三发动针对张学良的叛乱，于被张任命为平汉线前敌总指挥，主持平定石友三的战事。"九·一八事变"后，于学忠在东北军中独持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意见，认为一再忍让只会让日军得寸进尺，多次主张牺牲几万人，给日军一次沉重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1932年8月17日，在张学良的请求下，南京政府发表王树常、于学忠对调命令，于学忠交卸平津卫戍司令职，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热河陷落后，曾力主扣蒋说理，实行兵谏，未被张学良采纳。1933年3月10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出国前，将东北军改编为五个军，共计26万人，命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各率一个军，三个军共计9万人，所余17万人全部交给了于学忠，并命他以河北省主席身份兼任第五十一军军长职务。由1932年8月任河北省主席至1935年6月被蒋介石强行免职，西调甘肃，于学忠共主持河北政务近三年时间。其间针对日本侵略者软硬兼施的拉拢、破坏、暗杀、挑衅采取了坚守主权、寸步不让、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态度。他之所以对日本侵略者取此态度，与他的成长背景有很大关系。

"我父亲从小就对日寇非常憎恨。"2005年6月，我到北京采访了于学忠的四女儿——原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工厂高级工程师于允贤。在谈及其父何以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无理要求采取丝毫不妥协的态度时，她说，"我祖父曾经在满清的老毅军当兵。毅军那时驻扎在旅顺，我父亲是在旅顺出生的，他在那里一直长到5岁（虚岁）。甲午战争爆发后，祖父跟随毅军的统率宋庆和日本人打仗去了，留下祖母、父亲在家。听到日本人要进攻旅顺的消息，祖母、父亲回到老家避难。战争结束后，从蓬莱又回到旅顺。父亲当时的家就在旅顺万人坑的边上，那坑里埋着18000多中国人的尸体，都是被日军杀害的普通百姓。这让父亲从小就对日本人的暴虐凶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给我们讲起当时的事，那时我们还小，我是1937年7月2日在

北京出生的，7月7日就发生了‘七・七事变’。他说：‘你想，日本人跑到中国来打仗，把中国的无辜百姓给杀了那么多，旅顺的中国人差不多都给杀光了，总共才活了三十几个人，一个国家要不强盛，这国家的人民真地很倒霉。”而且日本人不是说在甲午战争、抗战的时候才侵略中国，我们的家在山东沿海，查历史，明末倭寇就在海上对中国的渔船进行拦截、抢劫。所以要说中日之间的关系，其实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已经很长了。由于这些原因，我父亲对日本人很有看法。他自己后来当了兵，他老说他是蓬莱人。因为蓬莱出了个戚继光，戚继光是抗击倭寇的，非常勇敢。父亲最佩服的就是他。”

除了上述原因外，于学忠反对与日本侵略者妥协，与他一生恪守的人生信条也有重要关联。

“我父亲一直教育我们要忠孝节义，就是对国家、对民族你必须要忠诚，对父母亲要孝顺。他经常教育我们：‘你可以穷，但是你不可以没有气节。’拿与日本人的关系来说，他讲：‘对日本人，我就要有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不管你给我多少钱，给我多大的官，还是你想要我的命，我是中国人，我绝对要站直了。’他对国家忠诚，对自己的父母亲也是非常非常孝顺。举例来说，我祖母是山东蓬莱人，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没什么好吃的，就把已发臭的小鱼小虾，别人剩下的那种，都做成虾酱，我祖母就吃那个长大，所以那个虾酱是离不开的。我们后来到重庆，那个地方没有这个东西，我父亲就到处给我祖母找。此外，像我祖父母都是山东人，吃面食。在重庆的时候，家里吃的全是米，因为四川就只有米。那面呢，除了馒头，别的就没什么好吃。这面条，那时候不像现在到处是切面，那时候没有。我父亲就自己到乡下，请人做了一个简单的压面机，压饸饹什么的，把面放里面一压，底下就出面条，好让我祖父母除了馒头以外，还能吃到别的面食。我觉得看一个人，你得把他放到当时的那个时代、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看。现在也许有些人觉得这些事都特傻，但是对于我父亲他们来说，那却是必须要这么做的。”

出于对日本民族凶残、侵略本性的认识和对国家的忠诚，于学忠主政河北期间，在处理与日本有关的事务时，可谓煞费苦心。今只举两个例子：①有关冀东22县县长、公安局长安排事情；②组建新编河北省特警队第一、第二总队事情。

先说冀东22县县长、公安局长安排事情。冀东22县指长城抗战中一度被日军占领的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之线以东及以北的22个县。在《塘沽协定》中，这22个县被日本方面视为“非武装地带”或叫“非战区”，中国方面称之为“战区”，不准中方驻扎正规军队。根据陶尚铭在《黄郛与塘沽协定》一文中的叙述，《塘沽协定》签字，日军开始向长城线及以北的伪“满洲国”境内撤退后，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令河北省政府在天津组织一个战区接收委员会，以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委员长，河北省民政厅长魏鉴和殷同、陶尚铭、殷汝耕、刘石荪等为委员，负责接收22县事宜。殷

同去大连与冈村宁次接洽时，曾有关东军别动队头子李际春（又名丁强）提出将10个县长、20个县公安局长的委派权力交给他。殷同回答说：“假若当初您成功，您便是河北省主席，全省县长和公安局长都归您委派。按现在的事实就不然了，连何部长和黄委员长关于河北人事问题，完全由河北省当局主持，绝不保荐一人。”此话透露出一个情况，即在冀东22县县长、公安局长的人员安排上，于学忠是持非常慎重态度的。遵化县属于冀东22县之一，按《遵化县志》的介绍和《申报》提供的信息推测，何孝怡应是1935年初到遵化县当县长的。以何孝怡与殷汝耕之间比较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殷初当专员时许多丑表功的消息都是出自他手这一情况来分析，于学忠应不会同意他到遵化当县长的。但于学忠不但批准了殷汝耕的请求，而且在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失败后，日方和何应钦，包括蒋介石，都批示要求严查何孝怡是否援助了孙部，如属实定要严厉惩处时，于学忠不但未查办他，反而安排他到“非战区”外的盐山县当了县长，远离日军势力范围，从这件事情上看，于学忠对何孝怡的本质是非常了解的。反之，从何孝怡是带着铺盖到保定，准备好要坐牢这一情况看，他对于学忠的内心世界实际是非常隔膜的。事见严家理在《记老牌汉奸殷汝耕》中叙述完何孝怡在滦河桥日军司令部一段经历后的介绍：

“一星期后，天津日领向于学忠发出照会，要于‘严办遵化县长何孝怡勾结盗匪’。于是何被免去县长职务。旋接省政府急电，叫他在交卸后‘即日来省（保定）’。何想这次要坐牢候讯了，赴省时带上了铺盖。不料于学忠对何孝怡深表同情，邀入内室慰劳了几句，改委他为盐山县长（在‘非武装区’之外，不属当时日寇的势力范围）。何孝怡接了新命，感动地说：‘我真不信今天还有太阳！’”

再说新编河北省特警队第一、第二总队的组建问题。

新编河北省特警队的产生经过，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张庆余回忆录《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记》、张传瑞先生著《于学忠将军传》介绍为：按照《塘沽协定》第四条的规定，“非战区”内不能有中国正规军驻扎，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中国方面最初派往“非战区”的警察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东北军的两个步兵团，团长分别为范景华、杨玉成，陶尚铭在《黄郛与塘沽协定》中描述为“连夜换上警察服装”。二是曾经帮助关东军侵略中国的李际春（又名丁强）别动队，经编遣后，缩为4000人，分成两个总队，每队2000人，队长为刘佐周、赵雷。刘佐周，据陶尚铭介绍，是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生，在东北军中当过中下级军官，并且参加过东北义勇军，后来投降日本。赵雷，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生，原为东北军独立十六旅的营长，因长城抗战失职降为上尉，他便把队伍拉出关外当了土匪，后经李际春拉拢，做了李的基本队伍。上述四支队伍都被冠以“保安队”名字。1935年春，又增加了东北军周毓英部，即截止到1935年春，非战区范围内共有五支保安队。其中范景华、杨玉成、周毓英部驻在“非战区”内部，刘佐周、赵雷部驻在非战区外围边

缘地带。这两个总队之所以被如此安排，是中方与日方交涉的结果，意在通过范景华、杨玉成部，后来又加上周毓英部，将刘佐周、赵雷与日军和伪满隔离。

到了1935年初，关东军、中国方面协议交换范景华、杨玉成两个保安队——那时周毓英部尚未开入“非战区”。交换原因具体为何？是否关东军觉得这两支队伍本为中国方面正规军，长期驻扎在伪满“国境”附近，对伪“满洲国”的稳定和日本方面总体战战略的实施是个威胁？我因未能看到更多的材料，无法得出肯定结论。但由后来取代范景华、杨玉成部，包括完成剿匪、收编民团任务的周毓英部的，不再是正规军，而是重新招募训练的警察来看，这种推测成立的可能性非常大。

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中收录的昭和10年1月15日（即1935年1月15日）关东军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大佐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会见谅解事项，以及昭和10年4月11日（即1935年4月11日）天津会议的协定，目前知道，“非战区”内交换配置的保安队总人数在5000名以下。警备区域为：第一总队负责蓟密区全部，第二总队负责临榆、抚宁、卢龙、迁安，第三总队负责昌黎、乐亭、滦县（含沙河以东），第四总队负责滦县（沙河以西，不含沙河）、丰润，第五总队主力驻扎燕郊、夏居（疑为夏甸之误），一部分在唐山待命。保安队的指挥权在专员，人事、财会权也由专员掌握。

冀东22县在《塘沽协定》签订后，经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协商，设立了蓟密、滦榆两个专区。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通州，专员为殷汝耕。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唐山，专员为陶尚铭。1935年初，或是较之更早一些，当出现要组建真正的警察武装以取代范景华、杨玉成两部保安队情况时，引起了殷汝耕、陶尚铭的焦虑。因为要组建两支共计5000人的武装力量绝非易事。其中又以殷汝耕最为焦急，因为他既无经验，也无能力招募那么多的警察并为之配备好武器。根据张庆余的回忆录和张传瑞先生著《于学忠将军传》所写，殷汝耕的忧愁在与于学忠见面时表露了出来。于学忠觉得这仍是一个埋伏抗日力量的好机会，于是答应帮助殷汝耕组建队伍。他从自己的五十一军中抽调了张庆余、张砚田两名团长，作为后来正式定名为“河北省特种警察队”的第一总队长和第二总队长；营长和连长，即后来的区队长和大队长，于学忠让他们从五十一军中选调；排长和班长，即后来的中队长、小队长，于学忠允许他们从自己的两个团中挑选；特警队队员则主要从河北省各县的青年中招募。每一总队含官长人数，张庆余回忆录说是5000人，但当年的民国报纸均说是2500人。我个人看法，民国报纸的报道是准确的。理由是，从上引昭和10年1月15日仪我与于学忠会见谅解事项中可以看出，当年中日共同议定开入“非战区”的总人数是5000人以下，在那份谅解事项中还注着，“为点检保安队装备，日军被赋予随时检查部队的权力。”如果张庆余、张砚田每总队人数都是5000人，两队共计一万人的话，那么人枪一旦在“随时检查”过

程中——日军经常以“参观”之名监视，被发现超出协议，马上便会有外交抗议和武力恫吓事件发生。但张庆余、张砚田部开入“非战区”时，未闻有抗议事件，所以我认为这两总队特警进入冀东“非战区”时，人数与报纸报道相符。至于张庆余所讲的每总队5000人这个数字，我认为有可能是1935年底，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河北省特警队变更名字为“冀东保安队”后的情况。当然这个情况是否属实，还有待查阅资料。

张庆余，《于学忠将军传》作者张传瑞先生介绍，他是河北青县人。早年入北平军官模范团步兵科学习，后入陆军大学学习。出任河北省特警队第一总队长前，在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任团长。亦有一种说法，他是五十一军第一一八师第六二五团团长，事见抗战时期在伪滦县公安局分所任雇员的张炳如的回忆录《冀东保安队琐闻》。

张砚田，张传瑞先生说他是河北遵化人，毕业于保定陆军讲武堂。担任河北省特警队第二总队长前，在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任团长。

张庆余、张砚田第一、第二总队都是1935年5月10日分别由蔡村、沧县开拔前往“非战区”的。张庆余第一总队进驻蓟密区，与旧保安队范景华、周毓英部换防，总队部设蓟县城内，防地为顺义、密云、遵化、三河、玉田、蓟县，全部开抵防区时间为5月19日前后；张砚田第二总队进驻滦榆区，与旧保安队杨玉成部接防，总队部设留守营，第一区队部设迁安，第二区队部设卢龙。

除第一、第二总队外，新编河北省特警队另有三总队驻“非战区”附近。第三总队为刘佐周部，编制二千名；第四总队为赵雷部，编制也是2000名；第五总队为李允生部，编制1000名。五总队共计人数一万名。

河北省特警队在1935年7月于学忠被免职西调、商震接任河北省主席职务后，被改名为“河北保安队”。11月，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河北保安队又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名称虽换，但内部人事未更改。1937年7月27日，张庆余、张砚田率部在通州起义，驻通州日军、宪兵、特警及日侨约六七百人，除一部分逃亡外，顽抗者均被歼灭。

二人在通州起义的事情为于允贤所知时，她随家人已移居重庆。2005年6月，她说：“那时我父亲队伍在重庆设有办事处，办事处里来来往往的总有从前方回来的副官。他们讲，张庆余、张砚田把在通州的日本鬼子整个给抄了，因为那是个挺大的事情，对日本人的震动很大。后来张庆余他们又带兵找五十一军，接着投入战斗，对这个事情，副官他们都挺佩服。那时候，他们都把我父亲叫老板。为什么呢？那时候往前方打电报、带信什么的，你不能写‘总司令’或‘司令’什么的，代替的名词就是‘老板’，他们就说：‘老板吧，在事先就考虑到这些问题了，考虑得挺远的。谁都想不到，老板他在华北时就想到了华北那块地方不能让汉奸、

不能让日本人给占领了。所以当时趁着殷汝耕要组织保安队（即特警队，下同），那时候殷汝耕还没有公开地成为汉奸，还在受中央政府的支使的时候，要组织保安队，老板就想到了。打定主意不能让殷汝耕他们控制保安队，结果他从五十一军里选的人。选人，起码得选河北人，因为这是他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会比别人更加地热爱。当时就从五十一军里选了两个正规的团长，这两个人都是河北人，就让他们到殷汝耕那儿埋伏下来。'听他们讲，我父亲后来说，当时想得挺多。他不能真把五十一军的士兵都调拨过去，以免殷汝耕、日本人怀疑。于是，他对张庆余、张砚田说，'我把武装，也就是枪支弹药、编制给你们弄好，可是下边的人自己去招。'他们俩就去招人，招的都是河北人，编成了两个团。我父亲派人给他们进行正规训练，支持了通信器材，派五十一军管通信的人去教他们怎么使用设备。我父亲对他们俩说，派他们到殷汝耕那里这个事情要保密，对谁都不许说。就是五十一军的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儿，只知道这两个人走了，连他们的家属都不知道。当时就是保家卫国嘛，为国家忍辱负重，这两个人真的是忍辱负重。后来通县的事情出了，张庆余他们又回到五十一军以后，那些副官才知道，老板原来埋伏了这样一支军队。当时谁也没想到，都以为这俩人怎么那么没骨头，宁愿离开抗日队伍，给殷汝耕当黑狗子，五十一军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这两个人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从来没有。一直到后来，听他们前方回来的人说，到'七・七事变'打响了之后，我父亲从前方派人告诉他们，现在是你们该回归的时候了，这两个人才在通县起义。其实要说起义，并不准确，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汉奸部队，事实上他们是抗日部队。两个人带领部队把通县的日军机关、日本兵，全给抄了、杀了，然后他们带领这支部队又投奔了抗日前线。通县的事情，我就知道这么一点，都是在重庆的时候，听从前方陆续回来的那些副官们讲的。解放以后，不知道住在通县的是张庆余还是张砚田，搞不清是他们哪一家，在三年困难时期知道我们家人口多，还给送来了一麻袋芝麻叶子。当时以菜代粮嘛。和着玉米面蒸窝头，特别香。我父亲那时候特高兴，就说：'不管怎么说，他们没忘了我'。过年的时候，那时候鸡蛋太珍贵了，还送了几个鸡蛋给我们家。感觉得出他们与我父亲之间的感情超出了上下级，真的是生死与共的那种感情。"

由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遵化县长何孝怡，张庆余、张砚田部特警队，包括周毓英部保安队——周毓英也是五十一军团长，之所以在围剿孙永勤部时虽然不得不遵照北平军分会的命令进行围堵，但并未主动攻击孙部，甚至一度企图帮助他们，这与何孝怡、张庆余、张砚田、周毓英具有爱国情怀有关，但真正的根源在于河北省主席、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同情抗日。

"到底是谁下的不许朝孙永勤队伍开枪的密令？是不是他下的密令？他不会给家里人讲的。"2005年6月，我就剿灭孙永勤队伍时有密令不准对他们开枪、否则格杀勿论一事，向于

允贤了解情况，她回答说，“我父亲一直给我们讲的一句话是：抗日无罪。他的思想里没有那么多党派概念，只要是抗日，不管你是哪一党哪一派的，我都会支持你。他不会对不同的党派采取不同的态度与做法，他从来不那样。你可以想一想，五十一军在国民党的部队里是共产党员最多的，他不是不知道。你说他一个军长糊涂到那种程度，甚至连他的机要秘书郭维城都是共产党员，他会不知道？最后是他把郭维城放走的。他怎么会不知道？他心里一清二楚。就一点，看你是不是真心抗日。你只要是真心抗日，我绝对不会另眼看待。不管是哪个部队，只要是抗日的，起码在我父亲心目中，他不会下命令去打你。我觉得这一点他心里特别清楚。他知道跟日本人早晚得打一场战争，否则他也不会把张庆余、张砚田他们埋伏到殷汝耕那里。只要是抗日的、反日的，我觉得他都会支持。”

在1935年5月的围攻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战斗中，尽管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河北省特警队第一总队长张庆余、第二总队长张砚田、旧战区保安队第三总队长周毓英及他们的部下官兵、遵化县长何孝怡对抗日救国军表现了同情的态度，但有一个基本事实却不能无视，即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却是下决心要消灭孙部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北平军分会要求河北省政府，蓟密、滦榆两专区派出警力围堵孙部，使之无法南进，兼之孙部在枪弹补给、战争观念上出现了问题，才导致了抗日救国军最终被日军消灭，500至800人血洒遵化东北部山地的悲惨结局。

通往“何梅协定”之路

孙永勤队伍虽因日军和中华民国政府华北当局的联合“围剿”而在1935年5月24日失败，但由于当日有少量官兵冲出了日军的包围，所以5月24日后，日军并未立即全部撤回原防，大部分进入关内的日军仍继续滞留“非战区”内，跟踪追击突围者。

根据《申报》、天津《大公报》等民国报纸报道，突围抗日救国军官兵人数最多者为两支：一支为100余人，奔到了毛山东南20华里的迁安三屯营（今属迁西县）一带，“拟向东北续窜”；另一支为200余人，突击到了毛山东北30华里的喜峰口附近的深山中，准备从那里出长城，因遭各口日伪军截堵，5月27日被迫折返毛山一带。

在三屯营的抗日救国军和折回毛山的抗日救国军余部最后均未逃脱被消灭的命运。前者被击溃于25或26日，报载进抵三屯营的日军从26日开始向马兰峪、潵河桥、建昌营、喜峰口撤退；后者约被消灭于28日，报纸报道在毛山清剿的日军28日（一说29日）撤往长城线。

29日当天，进关“追剿”孙部的日军除留下少部分继续“会同特警搜剿余匪”外，其余大部回到长城各口或原防。

在5月24日以后的搜索孙永勤余部的行动中，日军曾几度出动飞机在北平及冀东地区的上空侦察。

《申报》5月28日第三版报道：

北平　昨晨平市发现怪飞机，比经日使馆某武官向关系方面声称（原文如此——编者），该机系飞战区内侦察孙匪，并无其他用意。（二十七日专电）

《申报》6月2日第三版报道：

天津　三十三十一两日，各有日机两架，沿山海关低飞至长城线遵化、迁安边境，侦察孙永勤残部。三十日并有一架飞抵唐山，盘旋多时。（一日专电）

日军在非战区内对孙永勤余部的搜索直到6月份仍在持续，新编河北省特警队张庆余、张砚田部自始至终配合了日军的行动。

在搜捕孙部残余官兵的过程中，于5月28日发现了孙永勤、关元有的尸体。消息见《申报》1935年5月29日第三版、《益世报》1935年5月29日第三版、《新闻报》1935年5月29日第五版的报道。内容略有不同，一一抄录如下。

《申报》：

天津　遵化电省，孙永勤与其参谋官有元〔关元有〕确已死，尸体在遵迁交界鸡鸣村野地

内寻得，已经土人掩埋。孙衣襟绣有姓名，并经人指认无讹。（后略）（二十八日专电）

北平 遵化电话：孙永勤战死说已证实，缘孙套有臂章，上书“孙永勤”字样，系于机枪扫射中殒命。追随孙左右之参谋长宫有元〔关元有〕，同时战死。该两尸体均埋于乱岗中。遵化、迁安县境内已无匪踪。刘桂堂残匪现在洪山口外，日方允负责剿办。（二十八日专电）

《益世报》：

【平讯】 关系方面昨（二十八）接遵化电话称，该县境内已无匪踪。刘桂堂残部现在洪山口外盘踞，日军兀〔允〕由彼负责剿办。茅山沟〔毛山沟〕一带所遗匪尸，现正从事掩埋工作。证明孙永勤确不在人世，系与其参谋长宫有元〔关元有〕，同时死于飞机扫射之下。孙与宫〔关〕均套有臂章，注有姓名，其尸体同葬乱岗中。剿匪区内之地方善后，遵化县政府呈上级机关核示云。

《新闻报》：

▲天津 省府接遵化县长电，孙永勤与其参谋宫有元〔关元有〕尸体在遵迁交界旷野寻获，乡人已掩埋。孙著衣留有姓名，证明确已阵亡。（后略）

▲中央社廿十日北平电：遵化来人谈，孙永勤股匪现已肃清。孙击毙后，首级为日方割去，现该县安谧如恒。前由外乡逃往县之难民，已由县府设收容所收容，约三百余人。县境仅有刘桂堂股匪百余人，枪弹无多，仍啸聚于茅山〔毛山〕一带，近日尚无四出抢掠情事。但因该山形势险峭，我方无重炮大炮，故扑灭颇感不易。

上面三份报纸的报道中，孙永勤、关元有遗体的发现地点，一说在遵迁交界鸡鸣村野地内，一说在遵迁交界旷野。前者在毛山西南方，距毛山主峰直线距离10华里以外。后者就字面意义来看，可以理解为毛山东面的官台子、马台子延长线附近（距毛山主峰最近处直线距离在5华里以外），也可以理解为毛山东面山麓以东的广大地方。但即使是毛山东山麓，距离主峰也有很远的山路里程。出于叙述5月24日战斗时所讲的原因，我认为不论“遵迁交界鸡鸣村野地内”说，还是“遵迁交界旷野”说，报纸误报的可能性都比较大。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即民国报纸是故意这样报道。如果说“遵迁交界旷野”说除了告诉读者孙永勤、关元有确实死亡外，尚不能再传达出其他更多的信息，那么“遵迁交界鸡鸣村野地内”特别强调是在鸡鸣村一带发现孙、关的尸体，而鸡鸣村又是河北省特警队陈兵布防围堵孙部的地区，考之5月24日后，酒井隆、高桥坦变本加厉地向华北当局施压，何应钦努力不使国民党中央势力从华北退出这一情况，则不能不让人想到，有可能是故意向读者，特别是日本人，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南京政府华北当局并非阳表对日亲善，内行排日抗日之实，而是切实地发动了对孙永勤“匪”的“围剿”，并切实地在实施着增进中日友好之事。

在对上述两支较大的孙永勤余部追杀的同时，对零散冲出包围的抗日救国军官兵也开始了搜捕和杀戮行动。这一行动不局限在“非战区”范围内，而是在中华民国辖区内和伪满热河省

境内同时开展。

中华民国辖区内，目前知道在遵化有多名抗日救国军官兵被捕，其中一名被杀害，两名被释放，其他人下落不明。

被杀害的人为遵化东双城的马保德。他是最早随孙永勤起义的十几个人中的一个，被捕前系抗日救国军副军长。

马保德是在东双城被抓的，他被抓前的情况目前难以判断：马保德的邻居马金龙说他是在毛山之战前二三天回到家中的；闻成先生说他是5月24日晨，日军冲入吴家沟时，就地隐蔽，然后回到了东双城；东双城马春林老人说他是毛山战后才回来。

闻成先生的说法在叙述抗日救国军5月23日情况时已介绍过，不再重复援引，只将马金龙、马春林老人的说法介绍如下。

“民众从村西过去，五六天后，马保德从二十里铺回来。”2006年4月我到东双城采访，当年82虚岁的马金龙老人说，“马保德他们几个干部先回来，露了馅。去蓝旗驿，从那儿又回家，打探情况，让马保长（名叫马德禄，下同）带人抓住了。马保德是在打毛山之前被抓走的。两天后，民众大部队过来，日本人追上来，才开始打毛山。八路军来了以后，马保德家一个当民兵的侄子把马保长告密这件事上报给区长。区长召开会议，讨论马保长该不该杀。第一次刚开，敌人过来了，只好散会。第二次开会，区长李金决定杀。刚上报两三个钟头，敌人过来，马喆亲手把马保长枪毙了。”

“我那年12岁，我们庄在毛山死了五六个呢。”2005年7月，马春林老人说，“马保德在这庄有个干兄弟，叫马德禄，在敌人那边当保长。马保德回来就投奔他了，带回来七棵大枪、两颗手榴弹。以后马德禄把马保德出卖给了日本人，马保德被抓到城西清风寨，砍了头。马德禄得了钱，把大枪也都交出去了。以后，八路军过来，把马德禄枪崩了。”

除在回到东双城的时间上意见不一外，抓捕马宝德的具体地点目前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东双城马志老人说马保德是在东双城村大道上被抓住的，马广兴老人也持此说法。2005年7月，他对我说：“我们庄当民众去了不少，都冲二头儿（即马保德）去的呗。打完毛山，我们庄的人还带回来三棵枪呢，都交给马德禄了。不知他交没交，反正没了。马保德回来就在南边大河套躲着，上边就跟马德禄说，要这个人，就派人去大河套给诓回来了。诓到大道上，两个便衣背着钱褡子，把他按住了，捆上，给弄走了。”

与马志、马广兴老人所讲不同，东双城赵德老人说马保德是在家中被绑去的。2006年4月，他对我说：“马保林早晨出去，一到大街上，看见五六个穿便衣的，感觉不对，要有事，赶紧返回来。早饭后，村里保长马德禄带着十来个便衣来抓马保德。到他们家大门口，看见马保林正在当院朝外瞅，马德禄朝他一指：‘告诉马保德，老实跟我们走！’几个便衣从后门围

上去、后门的到了屋里，前门也进去了，把马保德绑走了。”

马保德被抓捕的地点，我原想再听听马保德的邻居马金龙老人的意见，2007年4月，即采访他的次年，我去东双城找他时，村人告知我他已在几个月前去世，未能实现。

马保德被抓走后，按1935年时任蓟密区驻古北口办事处主任的霍实子在《我脱离殷汝耕的经过》中所说，随即被殷汝耕引渡给了日军，之后被日军杀害。霍实子得知此事，据他说，起因于驻承德日军川岸旅团长在于学忠被强行免职后，于古北口请他吃饭时让他带给殷汝耕的一句话："酒过数巡，川岸首先赞扬殷汝耕和日本方面的关系搞得‘甚好’，托我回北平带个口信给殷汝耕说：‘今后仍请按照处理马永德（即马保德，下同——编者）的事那样办理。’”霍实子当时不知道马永德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回到北平后，开始了解。“马永德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一定要打听清楚。”霍实子写道，“好在有一位公署的署员告诉我说：‘马永德是河北省遵化县人，原是关外义勇军孙永勤的参谋长。孙部曾一度转移到了遵化县境，日方以遵化县长何孝怡协助孙部运军火，要逮捕何县长。何逃到南方，投靠了陈仪，做了陈的幕僚。而孙永勤和所属义勇军的大部却被日军围歼于遵化县的毛山山顶上，马永德则逃回遵化乡间暂避。结果被‘战区’保安队一伙人抓住，殷遂命令引渡给驻马兰峪的日本宪兵队，马永德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从容就义于长城之下。”

在马保德被从东双城捕走后，或是同时，河北省特警队在东双城设立了一个据点，专门审讯被抓获的抗日救国军官兵，这个情况是由马广兴老人提供的。

“打毛山之后，特警队在东双城子安了据点，调查谁家有民众。他们都是灰衣服，平顶硬帽，不是本地口音，都是侉子，南方的。他们吃日本俸禄，不是国民党，呆了约一年时间。特警队专门抓民众，把那些当过民众的抓来，在厢房里压杠子，听着那人是嗷嗷地叫唤。”2006年4月，马广兴老人说。

他所讲的特警队我最初无法判断是哪支队伍，因周毓英、张庆余、张砚田部都在遵化配合日军“堵剿”过孙永勤部，而驻扎在“非战区”边缘的刘佐周部、赵雷部又曾充当过关东军的别动队，与他说的吃日本俸禄相符。但因周毓英部在毛山之战结束后便陆续朝杨柳青集中，归还五十一军建制，张砚田部实为客队，他们的防地在滦榆区。而刘佐周、赵雷部目前又未见他们与张庆余部换防的报道，分析之下，在东双城设据点审讯抗日救国军的只有张庆余第一总队的可能性较大。

那么，为什么在5月24日及之前的“堵剿”抗日救国军的过程中，张庆余部尚能对孙部官兵网开一面，而在5月24日后却又表现为另外一种态度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可能出在蓟密区专员殷汝耕身上。

根据曾介绍过的昭和10年4月11日（即1935年4月11日）天津会议的协定，保安队的指挥



权在专员。当力主对日不妥协的于学忠担任河北省主席时，殷汝耕虽有此项权力，但因蓟密区毕竟是河北省政府管辖下的一个专区，所有重大事情他尚不得不向于学忠请示汇报，征求他的意见，不敢明目张胆地做出亲日举动。而当于学忠因蒋介石、何应钦的逼迫被迫将河北省政府迁至保定，远离冀东，特别是1935年6月中旬于学忠被强行免职西调后，由于阻碍他与日本方面密切往来的强势人物已去，他便可以高调地行使专员权力，要求特警队对抗日的孙永勤部突围者大力缉捕，以赢得日本人的好感了。上引霍实子回忆录已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有可能是因为蓟密区专员殷汝耕下达了命令，受专员节制的张庆余特警队不得不努力审讯、缉拿孙永勤部突围者。

在东双城被特警队拷打的抗日救国军官兵后来的命运如何，没有人知道。目前清楚的是，第七队长（一说第九队长）何广永因“通州事变”得救，第八队长单忠英因为后来成为他岳父的遵化东二里保长的营救，被释放。

何广永的被捕和获救经过是由他的弟弟何子桥介绍的。1961年11月15日，他对到河南采访他的王桂荣说：“抗日救国军失败后，日伪就通缉孙部下的主要领导人。因双城子马建池（曾支援过孙部，给买过子弹。孙永勤败后，怕受累，就供出了马保德、何广永）向日本报告，因此，马保德被捕后，抓到马兰峪日本大队部枪决，何广永也在龙宫被捕，解到通县殷汝耕伪自治政府。在狱押了几个月，因通州事变跑出来。”何子桥的回忆中，不仅何广永被捕被认为是马建池告密的结果，马保德被抓也被说成是因为马建池告发，与东双城人普遍认为是马德禄出卖不一致。东双城是否有马建池此人？他与马德禄是否同一个人，只不过一个是字，一个是名？我因了解何子桥所说的这个情况时间较晚，去东双城采访时未作调查，待将来有机会时再作查考。

单忠英被释放过程是由单志华介绍的。

“特警队放了我父亲他们四个后，”2005年9月，单忠英之子单志华说，“当中有个叫曹万林的，是遵化北二里庄的农民。我父亲他们在山上临散的时候，曾经发誓：‘同甘苦，共患难，一定闯出去，跟日本干到底。’这四个人就到了曹万林家，藏在白薯窖里。他家特穷，大娘瞎叽叽的，没吃的，也没被子，穷得不得了。到了冬天，我父亲他们全是单衣，衣服褴褛，就弄点棉花套子睡觉。东二保的保长是满清的秀才，博古通今，是那一带的开明绅士，思想比较进步，以后也给共产党办了好多事，知道民众在曹家藏着。都一个姓不是，就周济他们，给点吃的。可总猫着也不是回事，经商量，东北的杜山，还有迁安的张维利两个人回家了，就散伙了。唯独我父亲，老家是东北兴城人，家里没人了，跟孤儿一样，无家可归。咋办呢，就跟曹万林家一块过。总得活呀，他看到城里有做洋铁壶的，就也去给人焊点活儿、做个壶什么的，帮助曹万林他们过日子。东二里保长看上我父这个东北汉子了，准备把女儿给我父亲。这一来，让村里的一个汉奸很不服气，觉得我父亲，你一个东北人，要饭的出身，在我们这儿娶

媳妇，媳妇还挺漂亮，有气质，我母亲大家闺秀不是，心里边非常不平衡。他知道我父亲是民众军，我父没结婚呢，刚有些消息传出来，就去城里给告了。特务就来找我父亲，说：‘单掌柜的，县政府有点活儿，你给干干。’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这人有功夫，是武林高手，不能直接逮，得想办法。我父亲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挑着担子就去了。刚进县府头道门，门就关上了，大杠子架上了，多少个小伙子上去就把他按住，给绑起来了。先给他灌凉水，然后是压杠子，问他是不是民众。我父开始坚决不承认，只说‘是民众让我们扛枪’。后来把曹万林带出来了。原来逮我父亲时，把他也给逮去了。曹万林一压杠子，受不住，招了，承认自己是民众，说单忠英是我们领导。我父亲一看，认了吧，但心生一计。那时还没有交给日军，是在县政府审的，审讯他的翻译官私卖过军火，这事情我父亲不知是怎么知道的，于是他就说：‘我是抗日救国军八队队长，但我身为中国人，打的是日本人，不像你们给日本鬼子当汉奸，你们看着咋办吧。’翻译官说：‘那你招吧。’我父亲就说，我有多少把手枪，多少杆大枪，多少两烟土，那时是作为他们的经费，还有多少洋钱，反正说了不少。翻译官一听挺高兴，说：‘你态度挺好，帮着我们把它们起出来。’我们老头虽然年轻，但见过世面，在大帅府里当过卫队队员不是。他对翻译官哈哈一笑，说：‘你是东北人，我也是东北人，你不想让我活，我总得拉个垫背的，死了咱们做个伴啊。你倒卖军火也是死罪，你报吧，根本没这些东西。你把我交给日本人也是这套，你倒卖军火，我没有这些东西。’翻译官一看，你比我还能耐，把你交给日本人，你铁嘴钢牙这么一说，你完了，我也完了。跟日本人讲不清楚这些事不是，不能把他交给日本人，就说：‘把他先押起来吧。’把我父亲押大狱里了。里面并没怎么受罪。有一个看狱的，叫张福，遵化人，挺敬重我父亲。经常弄些猪头肉、酒啥的，不让别人看见，偷偷给我父亲吃。我外祖父不是东二保保长嘛，曹万林和我父亲得保出来。里面传出话来，得一个一个保。就从庄里弄了一百块现大洋，把曹万林先保出去了。曹万林出去后，翻译官对我父亲没办法，也不敢交给日军，实在想不出主意来，只好把他也给放了。这一百块大洋保出两个人来。保出后，我父亲就搬到城里和我母亲结了婚。后来张志全、张守礼到城里办事，一看见我父亲：‘哎呦，这是我们部队的老单哪！’这以后我们家就开始做冀东党锄奸组的联络站，天天在我们家开会。我父亲以后就搞地下工作了，和冀东联系上了。”

以上是中华民国统治区内对抗日救国军突围官兵的搜捕情况，下面再说一说伪满热河境内的检举、杀戮情况。

就我去过的今兴隆县、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三县而言，目前知道，孙永勤家属、李连贵曾遭到过追捕；孙永勤大哥之子孙文贺被捕后，侥幸生还；雷常玉、张福山、张福义、张福存四人遭到杀害。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孙永勤家属逃亡经过

“后来敌人到处抓我，我就带着孩子躲进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四处流浪。那个时候的苦日子，是不敢回想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我们才像一家子人家啊！”

1980年前后，孙永勤妻子雷永兰接受从言己采访，谈起当时的情况时说道。但这个回忆比较简单，根据其三儿媳郭瑞萍讲述，雷永兰在得知孙永勤牺牲消息后，曾夜骑毛驴到毛山哀悼丈夫。日伪开始大搜捕后，她先是躲藏于孙杖子周围的山中：

“毛山仗打完以后，日本子去婆婆家找有什么后代。看见日本子来，她们就往山里跑，钻到山洞里。孙杖子、河口这边不都是山洞嘛。我们文顺是梦生（即遗腹子——编者），婆婆怕他的哭声引来什么不测，捂着他的嘴，甚至想掐死他。我听文顺说过：‘我从小，我妈就险点把我掐死。’我婆婆也说过：‘怕他哭，日本子听见了了不得呀。小孩一哭，孙杖子人都姓孙，连别人都吃挂落，都得死了呀。’几次把文顺扔山洞外边，差点死了，都让侄媳妇给捡去，侄媳妇给吃东西养大。后来，文顺当兵出来后，每次回孙杖子探亲，都给侄媳妇砍两挑子柴禾挑去，到她家还给挑两挑子水。‘哎呦，侄媳妇中了，吃侄媳妇奶长大的，我总也忘不了哇。’我们文顺总这么说。”

大概抓捕的风声越来越紧，在孙杖子一带已无法躲藏，雷永兰不得不带着孙永勤前妻留下的孩子和自己与孙永勤所生子女开始了在外两年多（一说十年多）的逃亡生涯。

据雷永兰次子孙文孝回忆，他们曾到过毛文峪、黄花峪、河玉桥、左家坞，分别改姓过陈、王、任、张，“整天改名换姓，过着不安的生活”。而据郭瑞萍听雷永兰生前讲述，他们可能还到过丰润。“她好像逃到过丰润那地方，租人家房子，给人锥帮、纳底子。大姑姐挺大了，有人想要，婆婆不给。恨不得抢了，婆婆吓得雇马车，半夜三更偷偷跑了。她们后来还去过东北，婆婆说，那儿气候特别冷，水土也不服。”根据雷永兰表外甥史耀清回忆，雷永兰和子女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才由外地回到孙杖子，一说日本投降后才回来。

二、李连贵避难经过

根据1989年1月20日李连贵之侄李恩对佟靖功先生的回忆，李连贵在房山沟脱险后，先隐藏到了遵化城东上水河黄兴家，通过黄兴的关系，受到上水河的头面人物掩护。他所说的黄兴，与李连贵之子李山所讲的黄老二有可能是同一人。与李恩接受采访同一天，李山对佟靖功先生说：“民众军被打花达了，我父亲跑了出来。听我母亲说，我父亲的双枪插在上水河。上水河在遵化城东20多里地，我父亲在上水河黄老二家住，黄老二是我二哥的干爹。这时，苇子峪在抓人，我们娘儿几个不敢在家住，只好到外边藏着。不久，我母亲、我二哥李清、我五哥李云、我三嫂、我、我妹子，她现在口里刁山住，去到上水河与我父亲住在一起。我父亲的左膝上有枪伤，右肩上有枪伤，黄大衣上，那黄大衣是从日本军那里缴获来的，都是破绽。在上

水河住一个月，日军张贴画像捉拿我父亲，父亲又带着我们搬到唐山他的一个朋友家住，姓名不详。在唐山住了三个月，我三哥李儒给我们送信说，苇子峪抓人气氛松些了，我们娘儿几个就都回苇子峪了。我父亲没跟我们走，他说：‘日本子不倒，我不回家！’我们回来以后，就再也没见过老爷子，现在分析老爷子是死在外边了。”

除上水河、唐山外，按照李恩的回忆，李连贵还在遵化皮各庄躲藏过。“毛山突围的第二年，夏至以后，李连贵从唐山回来。唐山有一人叫杨迺儒，大名叫杨国林，要人的，与李连贵我二叔是朋友。他借给我二叔俩钱，在唐山做买卖，混几天。我二叔从唐山回来后，带着手枪来到遵化城北8里皮各庄我姐姐家藏了两宿。我姐夫名字叫陈德玉。”皮各庄之后的情况，李恩未讲，也有可能不知道。根据抗日救国军战士常久芳的回忆，李连贵有可能最后又回到了唐山。“李连贵到遵化县粥厂喝了一些日子粥，以后又到唐山下煤窑。他有手枪，听说他劫人打杠子，被人家打死了。”1989年1月23日，常久芳对佟靖功先生说。

李连贵被人打死的情况，常久芳坦言是听别人说的。“我是听南天门唐营说的。三道河北沟雪山有一个唐营，是被复查的，没办法，去唐山卖板子。还有一个唐杖子叫花开山的，也去唐山卖板子。是他们回来说的，他们也是听人家说，因为他们到唐山去过两三次。”

常久芳说的李连贵最后结局，老实说，我不相信。即使是真的，我也倾向于李连贵最后实在是出于万般无奈、迫不得已。以一个坚决抗日，为推翻“满洲国”，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不惜将妻子儿女全部舍弃，料敌如神，且又对贫苦百姓深具同情心的人，落得那样一个凄惨的结局，如果是真的话，不能不令人难过、悲伤。

以上介绍的是李连贵亲属、抗日救国军战士常久芳对房山沟脱险后李连贵情况的追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李连贵在抗日救国军失败后的情况，还有另外一种记载。“1936年2月，毛山突围后，年焕兴、李连贵率救国军50多人在黑鱼沟、苇子峪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活动。被半壁山、蓝旗营子伪警察300多人包围在苇子峪村，经过浴血奋战，救国军伤亡40多人，李连贵中弹牺牲，年焕兴带十几名战士突围。”王泽、张福庭在《记优秀的抗日游击大队长年焕兴》中说。

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正式发表的文章、出版的图书中，在介绍李连贵结局时，采用的均是王泽、张福庭的说法。

三、孙文贺生还经过

孙文贺为孙永勤的大哥孙永彬第五子。根据其子孙中印介绍，因为孙永彬的拦阻，孙文贺未能随孙永勤进关。尽管这样，抗日救国军失败后，孙文贺还是遭到了日伪当局的抓捕。

“打毛山时，爷爷没让父亲去。父亲在三爷（指孙永勤）失败后，被抓到蘑菇峪。第二天要被枪毙，听说是宋哲元换防，才活了。1948年，父亲担着挑儿，要饭要到康各庄。”2009年11月29日，孙中印说。

四、雷常玉遇害经过

有关雷常玉的牺牲经过，是由他的外孙朱金城讲述的。2007年4月18日，他对我说：

“三姥爷在毛山冲出来后，大约当年冬天回到家乡。才回家，行踪就被人发现，报告给日伪。日伪来抓他，三姥爷在河南大峪一带山中躲藏一个月，终被捕获。跟三姥爷一块回来的一个人也一同被抓走。三姥爷给押到下板城后，被日本人剖腹。日本人想看看他在山里吃什么，剖开一看，肚子里只有草根。他的尸体随后被日本人抛入了滦河中。”

五、张福山遇害经过

张福山即张三，曾在赵林家租种土地，也是最早随孙永勤起义的十几个人之一。他的牺牲过程，据赵林长女赵玉芝、赵林次子赵廷山，及赵家庄杨秀琴、赵廷良等人讲述是：赵玉芝、赵廷山在抗日救国军往关内进发前回到了家乡。为防日伪抓捕，与母亲（即赵林的妻子）、妹妹赵玉荣躲到了赵家庄西南7华里的北鄌南山四道沟的一个山洞里。半个月后，毛山之战发生，张福山在子弹打光后，藏身一个小洞里，躲过了日军的搜索。从毛山逃出后，张福山也来到北鄌洞里。据赵廷山讲，张福山对他说：“孙永勤受口里的伙会骗了。骗到毛山，受包围，孙永勤自刎了。”赵玉芝、张福山等藏在四道沟山洞里的消息为崔家庄崔永秀得知，崔永秀报告了日伪当局。下板城一个甲长胡品卿带着警察，一说是日本人，来抓。赵玉芝给胡品卿磕头，胡把其他人保下，只将张福山带走。张福山从毛山回来时，随身带着枪。初时胡品卿不敢让人上前绑他，知道是炸口枪后，才让警察将张福山绑上，带下山。

张福山死于路通沟赵家庄后山。杨秀琴老人说：“日本人让张三说路通沟谁是坏人。张三说：‘都是好人，就是我抗日。’就在这个后山，日本人把张三绑在栲罗树上，一个日本人照张三脑袋十字架样地砍了两洋刀，张三没叫唤。日本人又一刀扎心窝，张三叫唤一声，死了。次日，日本人又来，把张三脑袋砍走，带到下板城满铁。张三那年28岁，头在满铁悬挂了一个多月。”

张福山的坟今尚在赵家庄后山，里面埋葬着他的无头尸身。

赵廷良老人的看法是，“张三要不是因为顾赵玉芝，不至于被抓，被割下脑袋”。

赵玉芝后与一个名叫栾成章的人结婚，20世纪90年代去世。

六、张福义遇害经过

张福义的死亡时间，按其子张德兴回忆，为他6岁（虚岁）那年，“阴历六月，阳历7月。”张德兴是1930年出生，按此推算，张福义遇害当为公历1935年7月。

张福义是否参加了毛山之战，说法不一。张德兴说“我父亲是在毛山打仗回来的”。他对父亲被害经过的回忆是：跟随孙永勤起义后，两个哥哥先后被日军打死。“他们哥俩死后，我父亲不能在家。我父亲、我母亲领着我在承德市附近葛家过了年。以后往北走，过松树梁，在观音堂村里呆了三个上下月，就我们三口人，没别人。四五月间，我们从观音堂回来，没敢

到家，到宝地我表舅家呆着，表舅姓谢。在表舅家的时候，就我和母亲。父亲把我们娘儿俩搁那儿就走了，他有时候偷着回家看看。有一回，我嫂嫂、我父亲又回到宝地谢家看我们。那天中午，我记得是趟地时候，我们正在屋里坐着，外边来人问：‘张福义在这儿？’我父亲回答说：‘在这儿。’来人一进屋，就把我父亲拽住了。兵把我父亲带到东院，打我父亲，问：‘你媳妇、你儿子哪儿去了？’有带道的说我们三口都在这儿。我表哥一看不好，把我背出去了。我妈听见问话时，正要去东院，一个兵进来，问我妈：‘张福义媳妇在这儿吗？’我妈说：‘去大水泉了。’兵回去了。兵把我父亲弄到兴隆枪毙了。”

上面的回忆，是1988年12月16日张德兴对佟靖功先生讲的。2007年4月20日我去张家锅伙采访他时，他讲了大致相同的内容，所不同的，只是在其父最后的结局上又作了一点补充：“有人告密，父亲被抓到兴隆警察署，传说被铡成三截。”

张德兴的回忆中，其父是被害于兴隆，然这不是张福义死亡地点的唯一说法。“孙永勤上毛山了，张福义在全宝河打散了，各奔各家。打杠子，在寿王坟葫芦峪让人把脑袋用铡刀铡了，用锅炸了，示众。”张家锅伙高庆树老人说。

按高庆树老人所讲，张福义不仅未参加毛山之战，且最后也是因“打杠子”被杀，结局令人感到意外。但因此说高庆树老人坦言也是听自他人，所以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考。

张福义被抓走后，按张德兴回忆，他与母亲不敢再在表舅家居住。1988年12月的采访中，他对佟靖功先生说：

“我表哥把我母亲和我送到山沟里。下大雨，在山沟里过了一夜。早晨回到谢家，吃点饭。半夜前表哥送我们到梁上，我们去土城头我姥姥家。亮天，我们到土城头，我叔伯舅舅叫刘恩林，和孙永香、大坡邓云祥说上话了。回家后我们杀猪请客说和，这才回到张家锅伙。”

以上是张福义儿子、张家锅伙村民对1935年5月及以后的张福义情况的回忆，像李连贵一样，关于张福义在抗日救国军失败后的经历，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记载。王泽、张福庭在《记优秀的抗日游击大队长年焕兴》中说，张福义在抗日救国军失败后，回到承德县，又组织起百余人的“抗日保国军”，继续抗战，1937年7月殉国。

党史、政协文史工作者正式发表的文章、出版的图书均采用的是王泽、张福庭的说法[1]。

七、张福存遇害经过

张福存，宽城塌山村小东山人。孙永勤起义后参加了他的队伍，毛山战斗结束后回到家中。

张福存的牺牲经过是由他的弟弟、抗战时在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敌工科当战士的张凤林老人讲述的：

---

[1] 由于知情者越来越少，李连贵、张福义在抗日救国军失败后的真实情况和结局，恐只能寄希望于将来能在日伪的报纸、档案及关东军参战部队战史、参战官兵日记中有所发现了。

“孙永勤牺牲，队伍跑散了，我哥也就回来了，带着一棵枪回来。我哥就成了地主的眼中钉了，有个民团有几十人，这伙人就和当地的甲长、保总来抓他。其中就有我们村一个叫张陈的，我管他叫叔叔。他用什么办法勾结民团来呢？当时是夏天，我哥藏在庄外的庄稼地里。他把我哥骗回来，弄到屋里，说：‘张福存，我看看你这个枪啥样的，好不好哇？’我哥想，还应管他叫叔叔呢，他想看就给他看看吧，就说：‘你看看。’张陈就把枪拿过去了。他‘咔’把枪栓一拉，撞针就给别折了，对付上去，对我哥说：‘行了，你这枪就这样吧。’他说：‘我泻肚，我出去会儿，回来咱们再谈。’他出去到庄头，找到地主的民团，就说：‘张福存的枪让我给弄坏了，你们去没危险了，进去抓他吧。’民团来，我哥拉枪栓顶子弹，不管事，不响啊，撞针折了它还响吗，就把他给抓住了。土改时我们和地主斗争的八块银元，也让他们给翻去了。抓住我哥后，就把他弄到院外房后头庄稼地里，让六道河有个叫杨宗宪的把我哥胸口这儿给打了一枪。民团走后，我叔伯哥叫张福山，听见他在地里直叫唤，就把他给抬回屋来了，流的满炕都是血。第二天，吃完早上饭，民团又来了，要活埋他。在这庄找了几个劳动力，上我父亲的坟底下给他挖坑子。挖好了，民团就让他上坟地，说：‘你走不了，我搀着你。’哥说：‘我走得了。’自己走到坟地去了。到了那儿，我那叔伯叔叔张陈就说：‘你躺到那坑子里头。’我哥就躺到那儿了。那一年，我哥20岁，他在坑里用一月白色的衬褂把脸一蒙：‘你们埋吧，过20年，我还二十，我再报仇不晚！’这么着，就把他活埋了。

“几个月后，承德警察署、承德县大彭杖子警察所都来人了，把我父亲和我找去了，我们在承德县下板城住呢。因为地主有钱，买通了他们，不让我们再告。说：‘要再告的话，你们也得不到好处。’这样，人死了，也就拉倒了。旧社会，谁有权力告哇。”

上面，我介绍了1935年5月24日后日伪对抗日救国军突围官兵、孙永勤家属的追捕杀害情况，及南京政府华北当局特别是蓟密区配合日军搜捕的情况。在以关东军为主的针对抗日救国军官兵、家属的行动开展的同时，以“胡白暗杀事件”和“孙永勤事件”为借口，由日本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发起的旨在将张学良势力及国民党中央系势力驱逐出河北、察哈尔省的对华交涉也在积极进行着。

“胡白暗杀事件”指1935年5月2日夜11点和3日晨5点，在天津日租界先后发生《国权报》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杀事件。胡死于寿街北洋饭店，身中四弹毙命；白死于须磨街二十二号，身中三弹而亡。胡、白是从伪“满洲国”领取财物援助的汉奸报人，一直利用手中的报纸向中国人民做亲日满和反蒋宣传。白逾桓兼任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据说被杀时身上带有写给关东军司令官的密函。日本人认为胡、白是于学忠体会蒋介石、张学良意图，通过天津市长张廷谔利用宪兵第三团人员等以5000元报酬刺杀的。

“胡白暗杀事件”真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揭露出来。据原遵化党史办副主任

马秀山先生说，日本支那驻屯军参谋石井嘉穗回忆，白逾桓的被暗杀，实际是在酒井隆的唆使下，由日本租界内的青帮分子所为。此事记载于日本学者秦郁彦的著作《日中战争史》中。胡恩溥被杀，据说也出于酒井隆的策划，目前尚未见到详细材料。

“孙永勤事件”即指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因日军“围剿”、给养困难，被迫进入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地带”，日军认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遵化县长何孝怡不但不讨伐孙部，还在背后支持孙部事件。

“胡白暗杀事件”、“孙永勤事件”发生于河北省，又被合称为“河北事件”。

最先利用“河北事件”向南京政府华北当局发难的是高桥坦。高桥坦，日本陆大38期毕业，时任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1935年5月17日中日使节升格后，为日本驻北平大使馆武官），一说为武官辅佐官。1935年5月11日，即胡白暗杀事件发生的第十一天，他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质问：“在一夜之间有两个人被暗杀，必有极其周密的计划，乃系国家组织或有力团体之所为。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当知其情况，为什么不加取缔？”矛头直指南京政府和于学忠。孙永勤部进关后，高桥坦于5月20日下午再闯军分会。因何应钦当时在太原，便向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责问“中国官宪之不信行为”，并发出通告，“事态如果渐大，关东军只得进出于长城以南，独立将该匪遵化根据地荡平。”

利用河北事件嫁祸国民政府和于学忠，企图使蒋介石、张学良的势力从华北退出的行动在酒井隆开完参谋长会议，从日本回到天津后更加变本加厉起来。

酒井隆，1887年出生于日本广岛县，陆大28期毕业，曾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辅佐官、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1928年，为阻止北伐军北进攻击奉系军阀，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济南惨案”，致中国军民死6100多人、伤1700多人。之后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中国课课长，1934年8月调任日本驻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参谋长。1935年1月、3月，关东军两次在大连召开幕僚会议，讨论以武力推进华北分离问题，酒井隆均受邀参加。酒井隆是个粗野狂妄的军国主义分子，赞同军部从加强对苏战备需要提出的以武力为后盾，将华北肢解出去，使之变成亲日地域的“华北分离政策”。反对外务省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为对象，以经济提携为主，开展“协和外交”。认为“日中关系是日本民族同汉族间的蹂躏或被蹂躏的殊死民族斗争”，“分不清敌我，涂上亲善色调是不行的。”从大连开完关东军幕僚会议，回到天津后，酒井隆便开始谋划如何贯彻“华北分离政策”。他认为要实现这一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必须先将中央军、东北军及国民党党部驱逐出华北。于是一手策划了胡、白两社长被暗杀事件，并与驻平武官高桥坦串通，通过高桥坦向华北当局兴师问罪，来观察测试国民政府的反应。由于“中国当局有意使事件平淡化，以期尽量糊里糊涂地掩盖过去”，5月21日，回到中国的酒井隆与高桥坦、关东军榆关特务机关长仪我等围绕“胡白暗杀事件”、“孙永勤事件”在天津密议，确立了进一步

将两事件与中国官宪、南京政府牵连的原则。此后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开始针对于学忠开展了全副武装的游行示威活动，一方面向于学忠施压，一方面给酒井隆、高桥坦造势，加快将于学忠驱离河北，国民党党部、中央军撤出华北目标尽早实现的步伐。

5月29日，酒井隆、高桥坦分别代表日本支那驻屯军和关东军前往居仁堂会见何应钦，“严正要求蒋介石清算对日二重政策”。据满铁总务部资料课《华北事件经过‘极密’》综合情报10之号外载，当日，酒井隆向何应钦提交了如下内容的通告：

1. 于学忠须辞职并退出华北。

2. 于学忠军及中央军须撤至黄河以南。

3. 须撤换天津市长张廷谔及公安局长李俊襄。

4. 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及军事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须免职。

5. 须实质上封锁省市各党部。

6. 须逮捕、严惩天津暗杀犯人。

7. 须赔偿天津暗杀被害者损失。

8. 须解散各种排日团体。

9. 须取缔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废弃排日书籍。

10. 河北省政府须迁移到保定。

11. 如不实行以上各项，则将停战地域扩大至平津线，同时撤销军事分会、平津卫戍司令部及其他机关。

以上通告发出后，北平、天津、新京、上海、东京等地的日本军部当局立即表态，要求南京当局落实通告要求，否则不惜扩大军事行动。关东军也非正式地公然表示支持支那驻屯军的态度。

南京国民政府未想到事态变得很严重，为不使日军采取军事行动，于6月1日在南京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3日，在南京，由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向日本驻南京辅佐官雨宫，4日，在北平，由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向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分别回答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的协商结果：

1. 天津作为特别市列入南京政府直辖之下，如这次对事件不取缔之事不再发生。

2. 天津市长张廷谔是事件责任者，免职，任命王克敏为继任市长。

3. 在天津新设警备司令部，任命商震为司令。

4. 河北省政府7月1日以前将迁至保定。

5. 支援孙匪问题正在调查。

6. 天津暗杀犯人正在严密搜索中。

7. 暗杀事件的责任者，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北平军事分会政训处主任曾扩情已于1日给予免职处分。

8. 北平撤除驻屯宪兵。

9. 于学忠的免职问题，何应钦在呈报中。

10. 今后停止中央军第二十五师的学生训练。

11. 撤销党部及其机构，应由何应钦向中央申请。

据中方材料，6月4日何应钦与酒井隆的会见，高桥坦也在场。二人听完何应钦介绍的情况后，仍然不满意，认为凡是有排日倾向的个人或团体均应罢免或调离。

6月8日，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召开扩大军事会议，决定以武力为背景，采取强硬态度，迫使南京政府接受要求。关东军于当日午后连续向山海关、锦州、古北口等地运送兵力，造成华北危机再次一触即发的态势。

6月9日，酒井隆、高桥坦第三次与何应钦会面，向他提出了最后通谍：

“在确保日满华三国国境持久和平上，将整个河北省置于与非武装地区几乎同一状态并非不是理想。日本军从此见地出发，要求：

1. 撤回北平军事分会。

2. 中央军、旧东北军及一切杂牌军撤离河北省。

3. 对以上各项要求须在6月10日以前回答。

“同时，为了日中两国的利益，要求在全国解散蓝衣社及其他各种排日团体，请诚意予以考虑。”

据满铁总务部资料课《华北事件经过（极密）》综合情报10之号外载，当日，在酒井隆、高桥坦向何应钦提交了最后通谍后，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少将也会见了何应钦，“给以很大的鞭挞”。

南京国民政府为不使情况恶化，在接到何应钦关于最后通谍的报告后，召开了紧急中央会议。会议由行政院长汪精卫主持。协商结果，决定全部接受日方要求，以使事态得以“和平解决”。当日，汪精卫奉蒋介石指令，给何应钦发去指示电：“全部同意日方要求。”当日夜，何应钦召集鲍文樾、王树常、关麟征、黄杰等到居仁堂会商，10日拂晓达成重大协议，认为需立即采取让中央各军撤退的步骤。10日午后，何应钦访问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正式回答同意日方全部要求。

10日晚，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开始由北平出发向汉口转移。此前，9日深夜，军分会政训处约200人即已全部前往汉口。

10日当天，国民政府还自动地颁布了《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文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最后强调：“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根据国民政府10日的正式答复，日本方面要求的东北军及中央军势力撤出华北的愿望已得到满足。然而日方认为“中国能否诚意履行尚需充分监视，并且随着中央势力的撤退而继续发

生的各种形态的华北新政权建立运动，及在全国废除蒋介石的对日二重政策问题等日后处理问题也很重要”。为监视10日答复的执行，并为“日后的处理”做好准备，11日，在天津支那驻屯军司令官官邸，梅津美治郎召集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陆军省满蒙班长大城户、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喜多、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驻平大使馆武官高桥坦等进行协商。会后，由高桥坦将梅津美治郎签署的一份《备忘录》通过军分会办公厅组长朱式勤转给了何应钦，要求他签字盖章，予以承认。

《备忘录》全文如下：

觉　书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此致

何应钦阁下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此《备忘录》的第一部分为何应钦6月4日、9日、10日的三次口头承诺的内容，第二部分为酒井隆6月9日与何应钦会面时留下的一份日文缮写件，三项附带事项他未提出，何应钦也未承诺。日方之所以把何应钦承诺事项以《备忘录》形式体现，要他签字盖章，是希望使之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协定。而三项未承诺的附带事项也写进《备忘录》中，则凸显了日本侵略

者善用诡计、得寸进尺、欲壑难填的特点。

何应钦命朱式勤告知高桥坦，此次事件纯属口头交涉，中方已按日本方面要求主动解决，多项已办好，无须书面答复。第二部分附带事项多关政治，不在自己权限范围之内。由于断定高桥坦还会继续纠缠，为回避书面答复，何应钦在电告蒋介石、汪精卫后，于6月13日乘火车离开北平，前往南京。中途得到高桥坦果然再次到军分会请求见他的报告，于是他将此事提交南京国防会议议决。当日，国防会议作出决定，拒绝任何书面答复。

不甘心的高桥坦为得到书面答复，决定改变策略。6月21日，他放弃让何应钦在“备忘录”上签字盖章这种形式，而将由他代拟的一份以何应钦名义写给梅津美治郎的通告文稿交给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请他代转何应钦签字。

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仲鸣先生在其《再论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的何应钦》中介绍，高桥坦的文稿写了两次，第一稿为：

军分会何委员长所提对梅津司令官之通告：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约定事项，以及有关履行此等事项之附带条款，吾人一概加以承认。并可望将此等事项及附带事项自动付诸实现，特此通告。

此稿因涉及“附带条款”，未被北平军分会接受，于是高桥坦对其修改，去掉了“附带条款”、“附带事项”字样。第二稿文字变为：

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事项期望，均予承诺且自动加以实施。

此致

梅津司令官宛

何应钦

第二稿在7月1日通过北平军分会周永业转交办公厅主任鲍文樾，鲍通过电报告知何应钦。

7月4日，何应钦向在上海的汪精卫请示。汪于5日回电何应钦：“稿文与前此吾辈所商定者大致相同，弟同意发出。”6日，何应钦将汪精卫同意发出的情况告知在成都的蒋介石。经蒋认可，于同日致电在北平的鲍文樾，命其按高桥坦的修改稿出一打字油印复函交给梅津美治郎。内容如下：

迳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由酒井隆在6月9日提出，写入6月11日梅津美治郎《备忘录》第一部分的“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与7月6日何应钦的复函，便是以后被日本和中国方面很多人称之为“何梅协定”的全部内容。

由于此协定并未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本，所以1935年7月6日后至蒋介石、何应钦离世前的几十年间，二人均对签订“何梅协定”和存在“何梅协定”之事予以坚决否认。据何应钦研究专家熊宗仁先生在《何应钦——漩涡中的历史》中介绍，“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蒋介石在召见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训话时，明确声明：“绝对没有这个“何梅协定”。这件事是怎么讲起来的呢？就是日本向何部长提出要求中国撤退河北境内的中央部队，并撤销所有平津冀察党部的特务机关。何部长回一封极简单的信答复他说：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们中国已经自动办好了。信中只说这几句话而已。但是他拿了这封信就无中生有，张大其词，说是成立了什么“何梅协定”。”1936年6月3日，针对上海《大公报》社论中出现“何梅协定”字样，何应钦专门致函该报总经理胡霖、总主编张季鸾，解释道：“河北事件之发生，中日双方自始至终均系口头交涉。至于交涉之问题，当时均已完全解决完了，此外并未签订任何协定。”以后，何应钦还在许多场合声明始终未与梅津美治郎谋面，7月6日的打字复函并未签字和盖章。“1977年12月，何应钦还在台湾的《近代中国》季刊发表了一篇《河北事件中绝无所谓“何梅协定”》的大块文章，随后又在不少书刊中转载或翻印，旁征博引，叙述事情的经过，证明他没有签订“何梅协定”，也不存在“何梅协定”。”

来自日本方面的证词也证明了并没有“何梅协定”存在。熊宗仁先生在《何应钦——旋涡中的历史》中说，1966年5月1日，日本侵华时任驻南京武官的冈田政芳曾致函何应钦，说他曾访问当年的日本驻华大使馆首席武官、参加过1935年6月8日在天津由梅津美治郎召开的扩大军事会议的矶谷廉介。谈及“何梅协定”时，矶谷说：“何梅协定完全是日本单独强迫中国而为的”，何应钦“根本没有签字或盖印，而日本方面故意宣传，使人发生误会，似真有其事的印象。”

鉴于并没有法理意义上的“何梅协定”存在，1988年，熊宗仁先生在专著“何应钦传”中首次对“签订了《何梅协定》”说法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1991年，他明确提出史著和教科书中，宜用日方以备忘录而何应钦以承诺通知书的方式达成了秘密的“何梅协定”之类的提法，且在“何梅协定”四字上，宜用引号，而不用书名号。在2001年完成的《何应钦——旋涡中的历史》中，他更进一步阐明道：“人们认为有‘何梅协定’，虽未背离事件的本质，但却有悖法理。应视为何梅交涉中，日方以备忘录形式，何应钦以承诺通知书的方式，达成了妥协，而且南京方面自动地履行了日方备忘录中除附带事项之外的全部九项条件。何梅交涉迂回曲折的方式，堪称侵略者与妥协者在外交手段上共同的发明创造。人们不应以通常形式的协定来理解这一煞费苦心的交涉结果，在表述上不应提‘签订’或‘正式签订’之类的词，也不要在‘何梅协定’四字上冠以书名号，而改用引号，那‘何梅协定’有无的公案，也就自然可以了断。”

原遵化党史办副主任马秀山先生也反对在历史著作中使用“签订了《何梅协定》”的说法。1988年，与熊宗仁先生对“签订了《何梅协定》”说法提出质疑同一年，他在论文《试论当年日

军逼签所谓"何梅协定"的两个借口》中，对何梅协定四字也使用了引号，并认为它是一纸性质模糊的不具效力的"协定"。2005年1月，我到遵化采访他时，他对这一论点解释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咱们国家起诉日本侵犯中国主权，日本就要反驳，拿出理据。在法庭上，它拿出这个所谓"何梅协定"，没被认可。这算一个什么协定啊，给驳回了。日本侵占华北的罪行推脱不了，国际上不承认有"何梅协定"，中国成为胜诉国。蒋介石抗战时期便不承认有"何梅协定"，日本投降后，远东军事法庭也不承认，而现在你历史书上还那么写着呢，连字典上都能查着，还特别肯定地说："这一条就是《何梅协定》。"我心里话，就是为啥国际上不生效？你惦记着让上国际上生效去呢？你要惦记着让它在国际上生效，你就是妈的民族的叛徒！让日本有理了？让中国失败了？要的确是合理合法的协定存在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它不能轻易否定不是？它就得承认有那么回事不是？可为什么日本没有胜诉呢？所以我认为，起码是没有典型的"何梅协定"存在。所谓那纸条，实际是'非典'！"

需要说明的是，"何梅协定"虽然在法律上不具效力，但因南京政府实际履行了多项对日军的承诺，日军因此在依靠《塘沽协定》夺取了中国东北四省主权的基础上，又剥夺了中国的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却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上述四点要求（指酒井隆5月29日所提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长张廷谔，处罚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及蓝衣社负责人，国民党党部、宪兵队及中央直系军队撤出河北省，应保证今后在华北严格取缔排日侮日等行为）是"何梅协定"的基本要点，其中很多涉及中国内政，而且既广泛又强硬，纵然是为了根绝排日祸根，但也未免过分。天津军作为彻底打击中国顽固执行反满抗日行为的这一手段，是通过与关东军联络后并经中央批准的。另外，天津军在与关东军联络之际，关东军约定给以有形无形的援助。中国方面迫不得已接受了天津军的要求，主要是由于对关东军怀有畏惧。"二次世界大战后，高桥坦在回忆"何梅协定"的出台经过时写道，"中国在热河作战中已体会到关东军的实力，担心不签署协定必将招致关东军占领平津的结果，因而才忍泪承诺。中国方面也因何应钦交涉不力，竟签订如此屈辱的协定，对何有所非难。但是，签署协定的决定权在于中央政府，何应钦不能擅自决定。当时，何应钦一接到南京接受"何梅协定"的指令，立即通过北平武官将指令内容告知天津军，同时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委托鲍副主任（鲍文樾），自己返回南京。其后，中国方面将协定之第一、二、三项立即付诸实施，对第四项取缔排日问题，只表面上做了些工作。根据国民党收复满洲失地的大方针，对此项的彻底实现是不可能设想的。"高桥坦说，"这个协定，使中国蒙受了自己的军队在自己国土上因外国的压力而自行撤退的奇耻大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天津军参谋长酒井隆和北平武官高桥坦，被指定为与中国有关的战犯，酒井隆参谋长被判处死刑，高桥武官被处无期徒刑（高桥于1952年被释放）。中国对此协定之愤恨，由此可见。"

人民万岁

“何梅协定”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上产生的。

湖南籍青年学者熊沛彪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时，便开始了对日本霸权政策、战略问题的专题研究，到日本求学后，又对保存在日本外交史料馆、日本防卫研究所资料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地的大量珍贵原始档案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据此写作了专著《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

由于此书是在第一手原始档案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立论的，更接近历史真相，且又是在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史这个背景上审视中日关系、日本侵华战略的发展轨迹的，视角独特，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视野对近代以来日本何以不断地发起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及战争中其政策、战略为什么不断演变，有一个清晰的把握，避免了仅从局部入手研究日本的侵华政策、战略，会出现很多现象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本书主要是在此专著基础上，部分地参考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沈予先生所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来介绍“何梅协定”何以产生，并审视孙永勤抗战的意义的。

根据熊沛彪的研究，明治维新以来，由于综合国力和国际关系制约，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经历了逐步扩大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对外侵略扩张战略也随之经历了多次起伏扩展的阶段性变化。

熊沛彪认为，明治维新后至“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执行的主要是向与自己相邻的国家进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尚未确立称霸东亚和西南太平洋的东亚新秩序政策。其对外扩张战略最初仅表现为随着仿效欧美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力充实，和鸦片战争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制”逐渐瓦解，吞并琉球，侵略朝鲜，发动甲午战争，向中国局部扩张。

甲午战争后，在东亚维持了2000多年的国际秩序——“华夷体制”彻底崩溃，在新的集团安全保障体制——“华盛顿体制”出台之前，东亚地区一直处于混乱动荡的局面中。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纷纷向东亚地区，特别是东亚大陆，大肆扩张殖民权益，一方面围绕如何最大限度扩张自己国家的殖民权益问题，相互之间又展开激烈争夺。期间，日本因战胜清帝国后，于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侵略欲望开始急剧膨胀，不甘心在和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均势中仅仅充当一员的角色，于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之机，企图在中国确立起超跃欧美列强的“优势地位”来。

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野心为列强所察觉，为规范东亚包括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殖民秩序，

由美国联合英国发起，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了有美、英、法、意、日、中国等共九个国家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产生了以美国代表提出的“四项原则”、“在华门户开放案”为基础的旨在全面否定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特殊利益”，限制其在中国的扩张的《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试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使东亚、太平洋地区在“华夷体制”解体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体制——“华盛顿体制”。该体制规定由美英为主导，日本为其中一个重要成员，法意等国为配角，相互保障和协调各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日本由于当时的综合国力尚远不能与美英等国抗衡，此外在资源、技术、贸易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欧美，故在“华盛顿体制”确立后的一个时期内，暂时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与美英等国实行“国际协调”的政策，然骨子里并不满与美英作平行的对华扩张，一心希望在国内外有利时机到来时，向“华盛顿体制”发起挑战。

日本向此体制发起严厉挑战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发动“九·一八事变”。此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企图占领“满蒙”，即中国的东北部和北部地区。而占领满蒙，又和日本认识到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起点，国家总体战即举国家总力进行战争，已成为帝国主义各国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的战争的主要形态有重要关联。日本实施总体战的作战目标主要是制约大规模扩张的美国、英国以及苏联三个国家。为在时机到来之时有足够的综合实力与美英苏三国争夺，极大地扩张其在中国的权益及远东海域的制海权，需要稳固地拥有大量战争资源。日本资源匮乏，中国特别是其满蒙地区资源却特别丰富。用“九·一八事变”前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的话说：“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因而，满蒙与对美俄中三国作战均具有最为重大的关系。”由于能否稳定地占有并开发满蒙的资源，决定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基础是否能够很好地奠定，加之1929年开始，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严重冲击欧美，“华盛顿体制”随之有所削弱，于是日本乘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首先武力侵夺了中国的东北三省。由于中国方面当时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美英等国觉得事变未对自己的在华利益构成威胁，或未对核心利益造成影响，故未根据“华盛顿体制”采取有力制裁措施。日本遂抛弃其以往的“协调外交”，转而实行“自主外交”，并不顾会陷入国际孤立的局面，宣布退出国联，提出要实现“日本指导下的日满华三国合作”。表明日本已下定决心打破“华盛顿体制”，不但要长期占领东北，而且要向中国全面扩张、独霸中国，建立起以日本为霸主的“东亚国际新秩序”来。

考虑到日本的这一霸权新政策如果真正付诸实施，将来必然要遭到中国的抵制和美英苏等国的牵制，导致日本与各国之间的矛盾激化，为使自己在未来的与美英苏的世界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日本需要首先拉拢、胁迫中国逐步全面服从日本，并接受其“指导”。这一对华政策要求其尽可能避免以大规模军事入侵和长期消耗在中国战场的方式，即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

占领中国的土地和资源，并强迫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其霸权政策服务，以加强其对美英苏三国的战略地位。出于此方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地转换手法，对华开展外交工作。

为实现逐步变中国为日本“指导”下的保护国或者说殖民地这一预定对华目标，日本的外务省和军部各自推行了“协和外交”、“武力外交”路线。外务省考虑到国际形势，主张以外交手段为主，从全盘着手，拉拢、压迫国民政府由亲英美转向亲日，以逐步全面实现对华政策总目标；军部则重视对苏战备需要，主张以武力为手段，以蚕食的方式，从局部着手，先解决华北问题，之后逐步控制中国其他地区的领土和主权，以最终迫使中国服从日本的“指导”。外务省、军部在目标上一致，在步骤、手段上有分歧，受对方的影响，有时也互相妥协。“何梅协定”即是在此一背景上产生的。

据熊沛彪在《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中介绍，《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即开始谋划新一轮的侵略扩张。初时，由于关东军的重点尚在经营“满洲国”，并与国民政府北平政务委员会交涉《塘沽协定》的落实上，对华交涉主要是由外务省进行的。当时的广田弘毅外相鉴于中国的反日态度、美英苏的牵制，欲实现日中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全面提携非常困难，于是提出了先将“日中经济提携”作为实现“日中全面提携”的第一步的方案。由于国民政府对日本这一企图驱逐欧美在华势力、独自霸占中国的主张采取了“不承认日本在远东之任何特殊地位”，并进一步向英美靠拢的政策，使外务省主导的以“经济提携”为近期目的的“协和外交”陷于停滞状态。于是军部决定“自行下手”，在已经将东北三省及热河从中国领土分离出去的情况下，进一步推动“华北独立”运动。

1934年6月开始，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省有关官员开始磋商对华政策，经过半年的讨论、协商，于12月7日制定出了《关于对华政策之文件》。该文件首先提出：“帝国方针是要使中国追随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提携互助，以此确保东亚和平。”然而鉴于中国的现状，实现此目的至为困难，因此，“首先要在中国建立强固的经济上的地位，这不但是我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内容，另一方面，又是我方势力得以控制中国，并使中国不得不谋求向我方靠近的有力手段”。之后，文件写道，“我方希望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于华北地区，但要在此际造成这种形势，我方如无行使巨大实力之决意，则实属困难。目前，要逐步在华北造成南京政权之政令与华北地方的现实事态相乖离之形势，以此为目标，逐渐实现。”所谓“相乖离之形势”，即“使华北政权成为有力之政权，并表示诚意，我方亦以好意临之，以致力于解决悬案及维持、伸张我方权益。至少要在事实上查禁党部的活动，且使华北政权下的官职换上便于实施我方政策之人物”。最终造成“无论何人成为华北政权之首脑，皆不能无视日满华在华北的特殊关系之状况”。这个文件是日本外务省与军部经过内部协调的产物，军方同意以“经济

提携”作为近期对华外交总目标，外务省则认可军方在制造了“满洲国”后，继续以武力推行“华北分离政策”，只是要求其逐步推进，以免影响对南京政府的交涉。此文件，中国社科院沈予先生评价为，“是三十年代在军部主导下制定的一部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文献，它把‘华北分离政策’作为重要内容写入了日本政府的政策文件。这一文件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占东北四省后决意将其‘利益线’推进到中国的华北地区，实行以‘分离华北’为核心的大陆政策”。此后，外务省与军部分头行动。外务省继续与国民政府开展“经济提携”外交，并由广田外相提议，于1935年5月将日中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以示“日中友善”。日本陆军中的关东军为贯彻实施《关于对华政策之文件》，于1935年1月4日、3月25日两次在大连召开幕僚会议，于3月30日，根据土肥原的报告制定了《关东军对华政策》，确立了将华北作为“满洲国”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并使之在经济上成为日本军需资源的补给基地的原则。当年1月中旬，关东军以宋哲元部驻扎的沽源县所属长梁、乌泥河、北南石柱子等地属于热河为借口，制造了察东事件，与北平军分会达成了“大滩口约”。6月初，以关东军驻阿巴嘎旗特务机关的大月桂等四人受到二十九军“非法监禁”为由，制造了张北事件，迫使中国与之签订了所谓“秦土协定”。支那驻屯军不甘落后，由受邀参加了大连关东军幕僚会议的酒井隆策划，关东军予以配合，以胡白两社长被暗杀和孙永勤率领的抗日救国军进入长城以南的“非战区”，受到中国官宪支援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与之达成了“何梅协定”。通过这一系列事件所达成的口头约定和书面文件，日本在东北四省外，又控制了河北省、察哈尔省部分地区，完成了华北自治的第一阶段工作。然而驻华日军依靠武力先制冀察、再树立华北五省“自治政权”的过激行动，却让日本政府发觉不仅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警惕，且开始让英美不安，有破坏实现对华外交全盘目标的危险，于是责令驻华日军放弃“高度自治”目标，对华北改取“轻度自治”方案，“以渐进方式工作”，导致了“满洲国”之后，1935年11月25日在华北又出现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这样一个傀儡政权，1935年12月18日成立了“冀察政务整理委员会”这一半自治政权。

依靠军事手段实现最终控制中国目标的方式受到抑制后，外务省重新夺回了外交主导权。继“日中经济提携”后，广田弘毅又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和“中日悬案交涉”，佐藤尚武任外相时推出了“佐藤外交”。然由于国民政府对这些貌似温合、实则仍是欲将中国变为日本附庸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对华交涉十分戒备，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最终全部失败。

此后，日本挑起卢沟桥事件，企图再次以军事手段逼迫中国接受日方提出的逐步控制中国的各项侵略要求，以实现在东亚地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的目标。在其要求遭到中国拒绝后，日本决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武力全面征服中国。侵华期间，日本一方面全力从事对华战争，一方面以各种手段迫使中国与其“和谈”，以免因在中国大陆陷入持久战之中

消耗过大，再无力量北进攻苏或南进攻美，同时拖垮日本经济，无法及时改进和更新陆海军的装备。由于中国军民坚持长期抗战，美、苏、英等国也逐渐以各种方式援华抑日，并在日本放弃北进攻苏‘选择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组成了反日反法西斯军事同盟，中美英苏联合对敌，使得日本不仅军事上连续遭致挫败，军需很快消耗殆尽，国民经济也很快走向崩溃。1945年8月15日，日本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企图独霸东亚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东亚国际新秩序”的政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14年后彻底破产。

以上，我介绍了中国青年学者熊沛彪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框架下，根据第一手档案资料，对日本何以发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原因的解读。在他所描绘的日本欲打破美英主导的“华盛顿体制”、在东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建立自己为霸主的国际新秩序的背景上，如何看待发生于1933至1935年的孙永勤抗日起义呢?

“今天回过头去看那段历史，我们能够总结出的一点是：最伟大的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全民起来之后，抗战才能真正地开展起来。”

2005年9月我到贵州采访熊宗仁先生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此话不仅仅针对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而讲，也包括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之前之后东北地区众多的民众自发抗日活动。他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以孙永勤抗日为例，长城抗战失败以后，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政府在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要求“抗日必先反蒋”，各地的军阀和实力派系也都企图在自己的欲望和权益得到满足之后才去抗日。在此情况下，仅凭着赤诚的爱国心，勇敢地起来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确实让人感到中国之所以延续了几千年，屡遭外敌入侵而不亡，全赖有这些伟大的民众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以怎样的词汇来赞美孙永勤和与之同样的英勇抵抗外侮的中国民众都是不过分的。

“抗日英雄孙永勤，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民族之魂，很值得钦佩的一个英雄。”

“一个农民，为了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为了民族的尊严、国家的荣誉，能够顽强到那种程度，是非常可歌可泣的！”

“孙永勤绝不是一般的农民，他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智慧，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视死如归，他具有英雄的品质。他的名字能在《八一宣言》上出现，中国共产党把他视为民族英雄，不是没有根据的，他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代学习的。”

“在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时候，能够不做汉奸，勇敢举旗抗战，这是一种精忠报国的行为。在关外那样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关东军把东北四省都占了，长城以南是‘非战区’，实际上也是被日本人控制着，在侵略军四面包围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一年半的时间，那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要我来评价孙永勤将军的话，他是一个精忠报国的英烈，一个革命的先驱，值得我

们后人永远牢记。中国人现在就缺乏他那种精神，如果都能向他那样，都能有他那种精神，今后谁还敢侵略我们的国家！中国人再富裕，别忘本，别忘了过去的那些烈士们。如果忘掉了那些精忠报国的人，那就是民族的罪人！”

以上分别为原中共遵化县委党史办副主任马秀山先生、原中共兴隆县委党史办副主任佟靖功先生、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刚范先生、画家单志华先生对孙永勤的评价，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或基本适用于与他一样的自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民众身上。

然“最伟大的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总结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历史时得出的一个总的结论。回顾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挑战英美霸权、企图独占中国那个历史时期，孙永勤的起义对遏制日本的侵略、促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霸权梦想终于破灭上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我父亲到死也佩服孙永勤。”2005年夏，我去采访画家单志华——抗日救国军第八队长单忠英之子时，他讲，“有人说，孙永勤有勇无谋。我父亲说，孙永勤绝不是有勇无谋的人。他说孙永勤打仗很巧，不是蛮干的。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如果蛮干的话，几天就完了，还用日本人费那么大事？父亲说，孙永勤只是命不行。人得占天时地利人和。那时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国民党不支援他，共产党想支援没有多少力量，他孤军奋战。当时那么一个困难的环境，不要说坚持一年半，就是几个月，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啊。我们老爷子到什么时候也没说他们的仗打败了，这‘败’字不说，他不承认败。那就是在特定环境下，能够走到那步那是必然现象。失败，失败也是胜利！”

单志华“失败也是胜利”的观点，是迄今为止对孙永勤抗日贡献的最好概括。根据学者的研究和我近年的调查，我认为发生于日本侵华十四年初期的由热河农民孙永勤所领导的抗日起义至少起到了如下五方面积极的作用：

一、在抗战初期中国的抗日情绪处于最低谷，人民备感迷茫绝望的时刻，孙永勤自发地组织起一支农民抗日武装，勇敢地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法西斯思想充斥头脑，曾令国民政府军胆寒的关东军战斗，并取得了相当数量的胜利，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人民士气的作用。

此观点在《热河革命史稿》中已经体现出来，在原贵州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熊宗仁先生那里得到了更为明确的阐述。2005年9月我到贵州采访他时，他说：“虽然由于多重原因，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孙永勤抗日救国军都被国民政府和日军联合绞杀了，但在热河失陷、长城抗战失败后，士气民心低落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自发地行动起来，开展武装抗日活动，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抗战仍然起到了积极的鼓舞精神作用。”

熊先生的话可以从真实的抗战历史中找到依据。自日本攻陷东北三省，又夺取热河后，中国人民，特别是沦陷区人民，迫切希望国民政府出动军队赶走日本侵略者。然在国际上代表中



国的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不仅持“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的“抗战三日必亡论”观点，而且认为“日本的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而共产党的“捣乱”则“是内心的，如同心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所以坚持在完成“攘外必先安内”任务后再行抗日，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余惟卓立不动，以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政策，先巩固革命基础，整顿革命阵容，再与倭决战，以雪此奇辱。”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做法从军事角度上讲是有道理的，然却让中国广大的爱国民众，特别是沦陷区人民异常愤怒与绝望。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人勇敢地挺身而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无疑使沦陷区人民又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原承德市政协副主席白春旺先生在2005年6月接受采访时，讲述了热河沦陷区人民闻听孙永勤起义后的心情。他说：“《塘沽协定》签订以后，华北不抗战了，老百姓非常失望。蒋介石不是提出‘先安内后攘外’吗，先要消灭共产党再抗日，老百姓意见特大，特别恨他。日本人欺负中国人，老百姓恨透了他们，非常希望打他们。听到孙永勤起队伍抗日的消息后，热河人都非常崇拜他，认为他是一个抗日英雄。大家都想有这样的人带头，能早一点把日本鬼子消灭掉。”

二、毛泽东曾评价红军的长征是“播种机”，和长征同一时间，甚至比它还要早展开的孙永勤的抗日行为同样起到了“播种”作用。

《热河革命史稿》说：“这支抗日武装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在长城内外撒下了抗日的火种，激励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决心，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其评论是很准确的。据现有资料，孙永勤牺牲后，至少有单忠英、年焕兴、康永贵、何广永、刘玉堂、刘俊岳、张志全、张守礼等八名原抗日救国军中下级干部、200余名普通战士，在八路军挺进冀东后又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1937年7月27日夜冀东保安队（原河北省特警队）张庆余、张砚田部在通县起义，1938年7月上旬冀东爆发有20万群众参加的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又称冀东抗日大暴动），虽分别与于学忠指示、中共领导有关，然和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英勇抗战与悲壮牺牲给冀东各阶层人民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令他们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并对能取得抗战胜利充满信心，不能说没有丝毫的关系。

三、迟滞了日军对华北的入侵。

熊宗仁先生在评价孙永勤抗战的贡献时还曾说过一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在阻止日军占领热河后继续向华北推进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初时我对这句话无法理解，因为《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军便返回了伪“满洲国”境内，何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起到了阻止作用呢？仔细阅读包括熊沛彪《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在内的诸多关于日本侵华政策和战略的研究著作，我才

明白，总体战体制决定了日本一定要占领中国的“满蒙”地区，而为确保“满蒙”这一总体战基地的稳固和安全，日军一定要在“满蒙”与所谓的“中国本部”之间设立一个将他们认为骨子里是反日的南京政权排挤出去的中间地带。也就是说，华北是一定要占领的，何况那里还有满蒙缺乏的许多资源。而由于先有国内各党派、普通民众的武装，包括朝鲜的武装，在东北三省开展抗日活动，继而有冯玉祥组织民众在察哈尔省与热河边境地区抗战，之后又有孙永勤在热河省举起抗日旗帜，使日军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整肃”伪“满洲国”的治安上来，才导致了1935年初才开始了实际的侵略华北的行动。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有包括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在内的长城以北众多抗日武装积极开展对日作战，牵制住了日军的兵力，日军不会1935年初才入侵冀察，实施“华北分治”。

四、孙永勤所领导的农民自发抗日武装以他们的拼搏和热血，不仅让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后再次认识到真正的民族伟力存在于人民特别是底层人民之中，而且因为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在冀东长城南北地区非常残酷和孤立的军事环境下，尚能成功地坚持了一年半之久，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做出了完全可以派遣一支八路军，前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冀热边区域，以雾灵山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不但为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且为将蒋介石政权赶出大陆作出了贡献。

有据可查的最早提到孙永勤名字的中共中央文献是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1]）。在这份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起草，约于1935年7月下旬提交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0月1日发表于法国巴黎《救国报》的文章中，孙永勤被称为“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与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方志敏等十人并列，称他们与国内各界人士的抗日行动“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

五个月后的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中共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中提到了冀东农民的抗日游击战争：

“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报告中毛泽东虽未提孙永勤名字，用的是“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这一表述方式，但由于“九·一八事变”后至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热边之前，在冀东长城南北一带以较大的规模勇敢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农民武装只有孙永勤所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所以“冀东

[1]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中共驻国际代表团于法国巴黎创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报》上发表时，落款日期写为8月1日，该文因此又被称为《八一宣言》。

的抗日游击战争”实际指的就是孙永勤领导的农民武装抗日斗争应无疑义。

《八一宣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中国共产党尚只是以孙永勤等为例，论述由于有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抗战，中国终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抗日民族统一阵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打进“中国的本部”，组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观点，尚未从军事战略角度观察孙永勤在热河南部、冀东北部抗战一年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的生存与发展是否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开始明确地认识到冀东长城地区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并应努力在那一区域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在“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聂荣臻回忆录》中写道：

“冀东地区地理位置很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里平原多，丘陵也多，农业很发达，矿藏十分丰富，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地方。正因为冀东处在一个咽喉要道的战略位置，所以，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为了吞并整个中国，首先就把魔爪伸向了冀东。他的如意算盘是，占领了冀东，不仅可以控制从东北到华北的大陆交通线，而且可以把它作为进一步侵华的兵站基地和军事跳板。“七·七事变”前后，日军进攻我国内地的兵力和军用物资，几乎都是经过冀东运送的。

“还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了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指示说，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1938年2月，毛泽东同志又给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同时发来电报，指示说：以雾龙山（即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并且指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从红军骨干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由邓华同志负责，组成了邓华支队，决定进军冀东。”

邓华接受任务后，先向平西，即北平西部一带开进，为进军冀东建立可靠的前进基地。1938年5月，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将在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于6月份向冀东挺进。

八路军向冀东进军并连战皆捷的消息为冀东百姓所知晓。据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讲，“冀东的老百姓在家乡沦陷了几年之后，看到八路军大部队开来，真是喜出望外，欢欣若狂，对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的爆发，无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也称冀东抗日大暴动。它的领导人之一，时在中共冀热边特委负责军事工作、任抗日联军司令员的李运昌多年之后回忆说：“四纵的快速东进，引起日军司令部的注意，他们慌忙调集冀东各地的日伪军，赶到长城线去拦截阻击。伪军、民团的士气本来就不高，从四面八方赶来时，还没有看到八路军的影子就自相惊扰起来，纷纷逃散。在逃跑途中，他们传出了‘八路军来了’的

消息。久盼天晴的群众听到这个消息欢喜若狂，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冀东全境。冀东的人心大为振奋，敌伪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动摇，革命的人民再也等不下去了。”[1]按中共北方局、河北省委、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与中共中央共同商定的结果，当八路军第四纵队抵达冀东时，冀东地区要发动人民举行武装抗日大起义，以配合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大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由冀热边特委负责，李运昌回忆说：“从7月6日港北起义开始，到7月18日开滦矿工起义，抗日队伍在昌黎、乐亭、滦县、丰润、遵化、迁安、卢龙和蓟县、玉田、三河、平谷建立了三个中心区域。那时，从农村到城市，从山地到平原，西起潮白河，东至山海关，北起青龙、兴隆，南到渤海湾，到处红旗招展，到处是暴动的队伍，也数不清有多少人，多少番号。群众形容当时的情况是‘司令赛牛毛，主任遍天下’！抗联原计划成立六个总队，结果搞了三十九个总队，外加一些独立大队，仅抗联系统就有七万多人全副武装的部队。属于国民党和杂牌的有三万来人。”[2]1938年10月中旬，由于八路军四纵的负责人——主要是宋时轮，错误估计形势，八路军主力和抗联全部西撤，途中遭受巨大损失。但坚持下来的八路军包森支队等与西撤途中返回冀东的冀热边特委李运昌等人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互相配合，重新打起了抗日的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创造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冀东长城一带的成功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正确判断和艰苦努力的结果，然孙永勤1933至1935年时期为时一年半的抗日斗争未必不是其中的一个参考和激励因素。毛泽东、刘少奇多次给八路军前方总部、晋察冀军区、冀热边特委负责人发去电报，指出冀东地区有很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是也有很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虽未明言，但从其语气上看，让人感觉实际是暗含着这样的思想的。而包森、李运昌能在冀东残酷的环境下坚持下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一个原因也和能虚心吸收孙永勤当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有关。这一点在叙述孙永勤进关章节时已谈到，不再多讲。

五、对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改变对日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按照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策略，对日开战越晚越有利，以便有充足的时间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统一各地的实力派，加强国防。然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活动、孙永勤的抗战活动，特别是国民政府与日军相配合，对这两支抗日

---

[1] 李运昌：《冀东抗日大暴动》，转自《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6页。

[2] 李运昌：《冀东抗日大暴动》，转自《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第42、43页。



武装力量的绞杀，却让广大爱国民众对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更加不满。人民的愤怒在1935年底的“一二·九运动”中开始爆发，受其影响，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以此事变的和平解决为转折点，蒋介石开始调整内战政策，在“七·七事变”后终于走上了全面抗战的轨道。

“反思这段历史，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特别是像孙永勤那样的一些由爱国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全面抗战没有爆发的时候，以自身微弱的力量，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唤醒整个中华民族进行抗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给以高度评价。”抗日救国军失败60年后，熊宗仁先生评说道。

“一方面，局部抗战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全面抗战的实现，有赖于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推行对日妥协政策，因此必须依靠人民斗争的力量促其改弦易辙。察哈尔抗日与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其他局部抗战一样，是迫使南京政府改变对日政策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要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实行‘整个国民的总动员’，一致抗战。”陕西师大副教授王晓荣在《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中写道。她的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孙永勤的抗日行为在推动全面抗战尽早发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以上我介绍了孙永勤在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史中所作的贡献。尽管我非常赞同单志华“失败也是胜利”这一评价用语，然不能不说，抗日救国军失败毕竟是个巨大的悲剧。实际上单志华在说“失败也是胜利”时，语气中何尝不是透露出巨大的无奈呢！

造成抗日救国军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呢？

主要在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那里，特别在蒋介石身上。由于蒋介石受传统的封建思想影响很深，一心希望以“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统一中国，即使抗日，也要在他和国民党的领导下，由国民政府军队在准备好后再来抗日，所有的持不同见解的政党、派别、抗日行动就都成了他的这一目标追求和政策的牺牲品，遭到毫不留情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孙永勤抗日救国军不仅得不到有力的支援，而且因干扰妨碍了他的目标的实现，而遭到围堵夹击的命运。

多年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因为他们的一意孤行的政策终于尝到了苦果。原承德市政协副主席白春旺先生在回忆日本投降后热河的情况时说：

“由于蒋介石先要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老百姓特别恨他。所以后来1945年日本投降之初，国民党通过电台广泛地宣传：‘不要向八路军交枪，各地的日军和伪满军队要向国民党政府交枪，向国民党军队交枪。’大家听到后就说：‘这样弄的话，就完了。’大家知道国民党过来后，和日本人进来前一样，在东北地区还得建立满洲。大伙说：‘可不要走过去满洲的老路。走这条路，老百姓就更完了。’大家都承认，希望八路军壮大起来，打败国民党。”

由于失去了民心，蒋介石、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结束四年多后，便失去了大陆。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给备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的中国人民带去了希望，用朱德的话说，“在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上，我们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曾流洒了最多的热血。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愧为中华民族最好的子孙，因为我们做了中国人民所最希望的事业，而且我们将继续不屈不挠地做下去。”因而赢得了人民的爱戴。解放战争中又通过土地改革，给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分去了土地，赢得了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大力支持，因而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四年多后便赢得了政权。

国民党丢掉政权和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历史从反正两方面说明了历史的伟力存在于人民之中，特别是底层人民之中。无视和抛弃人民的人终会被人民所无视和抛弃，而只有尊重人民的人，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真正赢得民心，能将广大人民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开展人民战争，才能最终取得胜利。中国有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说“人民万岁”，实在是人世间颠扑不破的真理。


革命烈士证明书

同志

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年 月 日

图157　烈士证明书　（证明书提供：孙永勤家属。翻拍：刘永兰）



图158　雷永兰晚年在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孙永勤塑像前（摄影：李耀南）

最后，根据各方资料，将与孙永勤抗战有关的一些人物的结局作个简单介绍。

抗日救国军及其家属方面：

孙永勤，毛山牺牲后，头颅被日军割下，带到承德二仙居示众，下落不明。牺牲后不久，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八一宣言》中，称他为“民族英雄”。1981年12月16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批准为革命烈士。

雷永兰，孙永勤牺牲后带着子女四处逃难，“七·七事变”后，一说日本投降后，才回到孙杖子。“文革”中被定为“地主分子”，

受到迫害。上世纪80年代初，在承德地区行署副专员陆生的帮助下，由原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写信证明，予以平反，享受军长级烈属待遇。1991年2月20日在兴隆县兴隆镇车道沟去世。生前一直供奉着孙永勤的灵牌。

关元有，在毛山牺牲48年后，党史工作者才首次了解到他生前是中共党员。其妻在他阵亡后改嫁同村关元敏，集家并村时被日军集体屠杀于柳河口，时间是1944年。其子关恒利，据王宝石关元奎老人介绍，成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游击队，一说区小队。1943年在遵化遭伪满国兵机枪射中牺牲。其女儿在伪满时期移民黑龙江省龙江县碾子山，已去世。

赵林，他的情况目前有三种说法。承德县路通沟赵家庄杨秀琴老人在1988年12月13日回忆，老梁之战后，赵林去了围场。“奔他姥姥家，在那儿挑货郎挑，解放后患伤寒病死了。后来廷山舅舅给廷山来信，让去起尸首。廷山去了，埋尸首的人没在家，没起回来。”同日，赵林之子赵廷山回忆：“我父亲从毛山出去，到围场。”2010年7月11日，赵林之孙赵文忠回忆：“爷爷打毛山没回来。以后姑父栾成章去毛山起尸首，知道地点的老东家出门了，没起回来。”

赵廷普，赵林长子，牺牲于毛山。

赵有，牺牲于毛山。

何广永，据其弟何子桥（原名何广森）回忆，从通县狱中出来后，先到赵各庄做工。“1937年秋，何广永又组织了一些人，与康永贵合起来，共20多人。到1938年6月，在徐南野（党员）掌握下，组成一个总队四个大队：总队长甄明阁，副总队长何子桥，第一大队长李建庭，第二大队何广永，第三大队翟玉润，第四大队李保华。暴动起来后，何广永被运昌委任地方除奸大队长，在遵化大寨子徐店子北沟被郑千和一个姓于的刺死。何广永听说外边有郑于两人求见，一问是熟人，就让进去了。郑于一见何广永有枪有戒指，就将他刺死了。”

康永贵，据兴隆县《雾灵英烈》记载和遵化党史办李永春先生调查，抗日救国军失败后，先回到家乡白石峪隐居，不久参加绿林豪杰杨二的队伍。冀东人民抗日大起义（也称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后，被杨二任命为民众抗日救国军的团长，在长城沿线的遵化龙须沟、冷嘴头，兴隆县的白石峪一带抗日。1938年8月28日第二次攻打倒流水金矿时，遭敌机枪扫射，身中五弹牺牲。

年焕兴，据《记优秀的抗日游击大队长年焕兴》作者王泽、张福庭介绍，抗日救国军失败后，先到遵化马兰峪做工，1938年6月加入八路军第四纵队，参加了攻打兴隆县城的战斗。四纵西撤后，任留在冀东的包森支队第二大队副队长，后任迁遵兴联合县游击总队长。参加过袭击野鸡峪伪金矿、潵河桥据点、毛峪税关总署，配合八路军主力攻打东双城、杨店子治安军据点等很多战斗。最为著名的是与战友一起活捉过日军驻唐山特务机关长、宪兵司令赤本大佐。1945年7月被伪警察捕获。在狱中组织越狱暴动，被敌发现，判处死刑。敌两次枪决他，均没能实现计划。未等第三次行刑，日本投降，年焕兴得救。解放后任蓝旗营村治保委员，1973年2月去世。

单忠英，出狱后不久，参加了中共冀东党组织领导的锄奸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积极支持过冀东行署公安局的工作。解放后，靠手艺为生，1985年前后去世。

张志全，据《人民公仆，抗日先锋——记张志全烈士》作者白振国介绍，抗日救国军失败后，在池家屯秘密发展党员，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后，任一支暴动队伍的大队长。1941年1月后，任中共丰玉遵联合县工委二区区委书记，秘密建立党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日本投降后，为缅怀先烈，教育子孙，在自家耕地上为冀东22个县的抗日烈士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土地改革期间，因积极宣传中共中央土地革命精神，为国民党所仇恨，于1947年5月13日将他逮捕。在狱中，他受尽折磨，在保释回家的路上牺牲。

杨佩之，据兴隆县大杖子乡大杖子村关元会老人回忆，“毛山打完之后，杨佩之又到王宝石教私塾，后来到车河口村公所当会计”。又据兴隆县蘑菇峪乡王宝石村关元奎老人回忆，1948年前后，杨佩之去了东北，“去吉林哄孙子去了。他大儿子在吉林，叫杨震岳，是团级干部”。

日军方面：

酒井隆，他是南京国民政府绝不饶恕的两个日本战犯之一。另一个为高桥坦。1936年任步兵第二十三联队长，1937年任日军第十四师团步兵第二十八旅团少将旅团长，随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参加了开封会战。1938年6月至1940年6月，先后担任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日本内阁“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长官、驻蒙军军付等职，鼓动“蒙疆自治”，并大肆掠夺华北的资源、财富。1941年11月6日，被任命为驻广州的侵华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当年12月，指挥所部日军占领香港，放纵部队烧杀淫掠，犯下种种惨无人道的野蛮罪行。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8月27日，被国防部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9月30日，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

高桥坦，侵华战争后期任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日本投降后被国民政府作为战犯逮捕，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释放。

仪我，是酒井隆、高桥坦外另一个重要的参与制订“围剿”孙永勤部队策划者。根据国内目前能看到的资料，他的全名为仪我诚也，也写作仪峨诚也，日本兵库县人，1888年生于东京。1909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与石原莞尔为同学兼好友。1918年进日本陆军大学（第30期）学习。1923年晋升为步兵大尉。曾任张作霖私人顾问，替张作霖策划东北三省独立。1925年5月晋升步兵少佐。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死时，他与之在同一列车上，面部及手腕受轻伤。后被张学良派往第三、第四方面军做军事顾问。1929年回国，任步兵第十一联队付，同年8月晋级步兵中佐。1933年（一说1934年）晋升为步兵大佐，任关东军司令部付、榆关特务机关长，负责搜集华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孙永勤部队被“剿灭”两个月后，1935年8月被任命为日军步兵第三十联队联队长，留驻长城线以南，负责修筑军事设施。工程结束后将劳工全部杀害，尸体抛入河中，在日军中首开杀害中国劳工以防泄密之先河，以后为很多

日军将领所效仿。1937年8月被调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付、天津特务机关长，主要负责搜集中方军事情报，在日军进攻平津的过程中给中国军队的作战带来极大危害。平津沦陷后，他广泛搜罗亲日分子拼凑伪“天津市政府”班子，并多次与驻北平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谋划成立伪“北平市政府”，推举汉奸潘毓桂为“市长”。1938年1月24日在天津死亡。日本方面说他“战病死”，因急病死亡。另有一种说法，他被中国“便衣人员”下毒致死。真实死亡原因不明。死后晋升为少将。

川岸文三郎，他的材料国内能见到的不多，目前仅知他1882年生于日本群马县，190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与梅津美治郎及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为同期同学，三人均参加了日俄战争。战后不久，川岸文三郎入日本陆军大学（第23期）学习，1911年毕业。之后任过天津驻屯军参谋、关东军司令部付、参谋本部员、第一师团参谋、近卫步兵第四联队长、关东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长等职。“剿灭”孙永勤部队两个月后晋升为陆军中将。“七·七事变”爆发时任关东军第二十师团长。太原会战期间，率其师团攻陷娘子关。后任日本国内东部防卫司令官，1939年12月编入预备役。之后任过朝鲜联盟事务局总长、兴亚炼成所长、大东亚炼成院第一部长职务。1957年6月16日去世。

南次郎，即《申报》1935年5月23日第三版提到的下令“彻底讨伐”孙永勤部的“南关东军司令官”。1874年生于日本大分县，189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190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17期。参加过日俄战争，曾任日军第十三师团参谋、关东都督府陆军参谋、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第十六师团长、朝鲜军司令官。“九·一八事变”时任陆军大臣，是第二十二任陆军大臣。1934年12月10日起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大使。1936年4月22日编入预备役。之后任过朝鲜总督，残暴统治朝鲜半岛近6年。回国后先任枢密顾问官，次任贵族院议员。

他是日本投降后首批被逮捕的28名甲级战犯当中的一个。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假释出狱，1955年病死。

梅津美治郎，1935年8月1日调任仙台第二师团师团长。1936年3月任陆军次官。1938年5月任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官，率日军进入山西，进行所谓的“治安肃正作战”。1939年9月7日被昭和天皇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特命全权大使，在任期间签署了创立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命令。1942年10月，关东军升为总军，梅津美治郎成为首任关东总军司令官。1944年7月18日担任小矶国昭内阁的参谋总长。二战结束后被定为甲级战犯。1948年11月20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判处其无期徒刑。1949年1月8日因癌症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土匪方面：

毛山之战中在九虎岭参加攻击抗日救国军的土匪，于当年农历腊月二十八（公历1936年1

月22日）被国民军消灭于山西阳泉地区。

中国国民党方面：

何孝怡，孙永勤部被“剿灭”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不但未惩处他，反将其外派至盐山县当了县长，远离日军的势力范围。殷汝耕叛国后，欲让他主办一本汉奸杂志，被他拒绝。后来通过钱履周的关系，到陈仪任省主席的福建省财政厅当了一名科长。1944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他为委员之一，对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详细调查。日本投降后随陈仪赴台，接收台湾。据其堂弟何方生先生回忆，约1950年前后，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于台湾。原因不明，有可能与陈仪案有关。他死后，家属移居美国奥克兰市。直至1985年，他妻子尚与福州何方生先生家有书信往来，之后再无消息。

殷汝耕，1935年11月25日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公开叛国。张庆余、张砚田在通县起义后，殷汝耕被日军逮捕，旋被释放。汪伪政权成立后，曾任中日合办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伪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日本投降后被国民政府逮捕。1947年7月31日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同年12月1日被枪毙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周毓英，完成围堵孙永勤抗日救国军任务后，于1935年5月底归还五十一军一一八师建制。同年6月随于学忠西调甘肃。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过淮河阻击战、增援台儿庄、掩护鲁南兵团撤退、武汉会战、山东敌后游击战等战斗战役。1938年5月任第一一三师师长，1939年3月任五十一军副军长，1942年1月任五十一军军长，1944年参加豫中会战。日本投降后，任整编第五十一师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20日在鲁南战役中，率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部向华东野战军投降。1948年被送到解放军军官训练团学习，1961年释放，其后情况不详。

张庆余，商震接替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后，改河北省特种警察队为“河北保安队”，殷汝耕叛国后又更名为“冀东保安队”，但人事没有改变，张庆余仍任第一总队长。“七·七事变”后，他与二十九军相约一面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共同夹击日军。1937年7月27日夜12点，他与张砚田在通县起义。由于宋哲元部先行从北平撤出，张庆余在部下遭受巨大伤亡后，率幸存保安队官兵徒步到达保定与二十九军会合。不久被蒋介石电召南京，报告起义经过。之后被任命为军政部开封第六补充兵训练处中将处长，1938年改派为九十一军副军长，因病恳辞，终未到职。据小说《遍地八路》作者阎瑞赓在他的博客中介绍，张庆余还被委任过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议职务，是否到职不得而知。1946年退役赴津定居，1963年9月18日病逝。

张砚田，1937年7月27日夜与张庆余共同在通县起义。据张庆余在《冀东保安队通县反正始末记》中说，28日正午，日军派来24架飞机对起义队伍实施轰炸，“张砚田因见日寇势力强大，恐难与敌，乃乘日机轰炸、我忙于防空之际，不辞而别，潜回天津寓所隐匿”。此后的情



况不得而知。

张含明，围堵孙永勤部时，任河北省特警队第一总队第一区队长。通县起义后撤至北平城下时，先有一队日军从城内冲出，劫走殷汝耕，继有20多辆装甲车从城内开出，集中火力向起义军轰击。张含明与另一团长沈维干率队反击，中弹身亡。

于学忠，据《于学忠将军传》作者张传瑞先生介绍，1935年6月被蒋介石强行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西调甘肃，以五十一军军长身份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参加“西安事变”，并在西安指挥部下发动“兰州事变”，配合张、杨的行动。后任江苏绥靖主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鲁南兵团副总指挥等职，指挥过淮河阻击战、增援台儿庄、掩护鲁南兵团撤退等重大战斗战役。武汉会战时任左翼兵团副总司令。1939年1月1日任鲁苏战区总司令，在山东敌后指挥东北军抗战四年半。因与八路军团结抗日，于1943年7月被蒋介石强行调离山东。两个多月后被解除兵权，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解放战争时期，于学忠拒绝到山东打内战，并在蒋介石从大陆撤离时拒绝去台湾，选择留在了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学忠先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64年9月22日因病在北京去世。

何应钦，据熊宗仁先生在《何应钦——漩涡中的历史》中介绍，1935年11月23日蒋介石明令撤销北平军分会，此后何继续担任军政部长职，并任过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参谋总长，参与指导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缅北会战等战役。1944年11月20日被任命为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指挥发动桂柳反攻。1945年8月15日奉蒋介石之命，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率接受日军投降，9月9日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无条件投降签字典礼。1946年4月23日任军委会重庆行营主任，6月7日奉派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兼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1947年4月2日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1948年5月31日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1949年3月12日任行政院长。1950年5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省复行总统职权后，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1954年10月27日当选台湾当局“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1987年10月21日因心脏衰竭逝世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中国共产党方面：

骆凤庭，1935年10月因叛徒孙彩出卖被捕，后被表兄弟保释出狱。由于表兄弟与殷汝耕关系较近，他从此背上无法解释的“叛徒”骂名。土地复查前后，陪母亲去西刘村治病。恰巧当天西刘村一位村干部被敌人抓走，误认为是他向敌人告的密，被以“破坏合理负担，破坏贫下中农，投敌叛变”罪名逮捕，先后在保定、芦台、南浦盐场、兴隆煤矿劳动改造15年。1966年刑满释放，适值“文化大革命”开始，又被戴上“反革命”、“地主富农分子”双重帽子，受到造反派的非人折磨。多亏遵化党史办李永春先生帮助，请原冀热辽行署主任张明远、原中共

丰润县委书记李一夫出具证明材料，才于1984年被平反。2001年，骆凤庭因心脏病转老年性脑出血去世，终年90岁虚岁。

孟寿田，原名孟昭泰，寿田为字，后改名冀光。1935年10月因孙彩叛变被捕，次年春，经全村民众具保营救始被释放。之后与李子华、马子敬等开展游击活动，曾攻克过清河沿、药王庙据点。冀东抗日大暴动中，在抗联新五总队做政治工作。1938年8月调丰玉遵联合县政府，负责组织救国会工作。次年春担任遵化县救国会主任，同年8月被捕。由于坚不吐出共产党机密，被释放。1942年任迁遵兴联合县委宣传部长，1945年任十五地委宣传部长。1947年，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在热河林西县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会后，冀光随冀东代表团南返。5月21日，在赤峰以西九十华里的柴火栏子村，遇国民党数百骑兵的包围。奋力阻击后，饮弹自尽。

李子华，据其女儿李小伶、《革命先辈李子华》作者程水星介绍，抗日救国军失败后，在遵化当地开展小型武装活动。曾打进河北保安队（即原河北省特警队，1935年7月商震任河北省主席后更名）第二总队当武术教练，启发官兵抗日爱国思想。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后，任抗联新五总队总队长，围攻过丰润沙流河镇日军据点。1938年10月，八路军四纵和部分暴动队伍西撤，李子华率队伍到达平西宛平县。此后一直在平西根据地负责军队后勤供应工作，先后担任过粮秣科长、军需科长、代理供给部部长等职务。1942年起，在晋察冀边区十一军分区负责采购经济工作。抗战结束后，到冀东负责部队后勤供给，任冀察热辽军区供给部冀东办事处主任。以后转业到外贸部中央对外贸易学院。1954年从北京回到遵化家中休养，1969年病逝。

马子敬，据遵化党史办李永春先生在《可敬的马子敬》一文中介绍，孙永勤抗日救国军失败后，与李子华一同开展小型武装斗争。冀东大暴动中任抗联新五总队政委，后随八路军四纵西撤平西整训。1939年调任十五地委工会主席。1947年1月31日凌晨在孟家铺遭还乡团抓捕，同年3月1日，在遵化西关刑场就义。

樊凌玺，据《师教导员樊凌玺》作者陈述介绍，1938年参加了冀东抗日大暴动。同年10月，与丰玉遵联合县政府机关人员随四纵西撤平西。受训后，调任挺进军师政委。1940年奉命去平北开辟地区，任滦（平）昌（平）怀（柔）办事处工委书记。1942年3月，在驻地遭日满军包围，力战突围中牺牲。

李运昌，冀东抗日大暴动领导人之一，1938年7月起先后担任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司令员、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中共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员、热河省政府主席、中共热河省委书记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职务。1982年9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孙永勤研究、宣传的最主要倡导者。2008年10月24日在北京去世。



致 谢

从2002年7月第一次实地调查孙永勤事迹，到2011年9月本书编写完毕，曾得到了河北省内外300多名各界人士的积极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祝他们幸福吉祥！这些人士分别是：

河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河北省文史研究馆）：詹文宏、郭庆华

中共兴隆县委宣传部：马德君、司志允、孟庆华、王俊杰、陈永胜

兴隆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王庆生、刘玉兰、佟靖功、栾福忠、李志宏、徐铁仁

兴隆县蘑菇峪乡党委政府：孙中纪、刘素华、曹佐锋、阎继国

兴隆县蘑菇峪乡孙杖子村：李玉保、孙中彦、孙中训、孙继民、孙中志、赵显刚、张景志、张青山、田玉仓、孙中贵、孙中亮

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菇峪村：史耀华、史耀清

兴隆县蘑菇峪乡张杖子村：陈翠琴、何树山、张文如、何树元、何树宝、张廷云、陈永会、付艳金

兴隆县蘑菇峪乡双塘子村：张凤阁

兴隆县蘑菇峪乡王宝石村：李常增、关元奎

兴隆县蘑菇峪乡李杖子村：鲍印兴

兴隆县蘑菇峪乡二道岭村：赵汉慧、张玉良、李秀花

兴隆县蘑菇峪乡关门岭村：王成国、于祥文、王纪方、王占富

兴隆县蘑菇峪乡雪山村：常永广、郝连合

兴隆县蘑菇峪乡宽甸村： 李昆峰、李春辉

兴隆县蘑菇峪乡城墙峪村：陈永付及其女婿

兴隆县蘑菇峪乡河南大峪村：任梦奇

兴隆县蘑菇峪乡李杖子村：徐久强

兴隆县蓝旗营乡党委政府：吴建华、白海霞、莫桂金、张福仁

兴隆县蓝旗营乡苇子峪村：李海东、陈桂荣

兴隆县蓝旗营乡刁山峪村：陈国林

兴隆县三道河乡党委政府：张继满、闻全义、司玉霞、韩瑞森、卢久青

兴隆县三道河乡灰窑峪村：李思迁、李思伶、李思尧

兴隆县三道河乡偏岭子村：高印萱

兴隆县三道河乡中兴村：郝文山、郝连合

兴隆县蓝旗营乡蓝旗营村：年秀君

兴隆县大杖子乡党委政府：高明、刘锐、见红燕、杨福东、张奎红

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梁村：高庆玉、高继宝、孟繁林、孟庆生、孟庆礼、孟庆山

兴隆县大杖子乡邢杖子村：姜君林、刘祝金

兴隆县大杖子乡车河口村：张连志、徐敬礼、辛连海、张凤树、岳云霞、罗凤书、罗凤刚、张占君

兴隆县大杖子乡郝家营村：郝连玉、陆翠芝、郝连发、郝连坤

兴隆县大杖子乡大杖子村：孟广发、王福清、霍秀成、关元会

兴隆县大杖子乡化鱼沟村：陈文儒

兴隆县孤山子乡党委政府：郑玉林、司海波、陆海军

兴隆县孤山子乡孤山子村：吴从信、马林

兴隆县大营子乡前莫河北台村：姜以珠

兴隆县挂兰峪镇文化站：郭叔文

兴隆县政协文史委：闻成

中共兴隆县委组织部：杨玉梁及其爱人夏翠兰

兴隆县兴隆镇：贠玉萍、孙翠芝

承德县人民政府：许志忠、孙振民、郭培臣、唐志民、张宇春

承德县下板城镇党委政府：张俊清、娄瑞林、邢继承、杨慧丰、张文彬、张启山、张俐

中共承德县委宣传部：郭春林、王士帅、高建华

承德县八家乡党委政府：韩永清、姜志勇

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李素云、徐文林、徐学国、吴建华、吴志平、张玉书

承德县八家乡庙梁村： 张淑新、石振林、谢福成

承德县下板城镇老梁村：王树海、王贺林、李亚枝、王树森、许振岭、杨宝全、李振庭、王永存、李长文、许振刚

承德县下板城镇路通沟村：崔存、彭良春、刘胜新、赵廷良、任富、张俊文、马志善、赵文忠、张福玉

承德县大营子乡政府：高凤军

承德县大营子乡八卦岭村：彭安会、张德兴、王桂英、张秀春、高庆树、杨桂芹

承德县下板城大平台中学：徐学喜、池桂红



承德县柳树底乡常峪沟村：姜以田、姜以周、薛金城

承德县上谷乡郭杖子村：郭书均

承德县下板城镇：吕飞、李秀兰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马秀山、李永春、石学锋、程水星

遵化市小厂乡党委政府：黄振来、吴艳民

遵化市小厂乡毛山沟村：傅连明、傅连贵、傅义、刘宝全、赵金山

遵化市小厂乡吴家沟村：吴广顺、吴晓利

遵化市小厂乡小于沟村：吴凤起、吴显来、庄开云

遵化市小厂乡秋花峪村：李清来

遵化市小厂乡高家峪村：张福荣

遵化市小厂乡杏儿峪村：何万勤、刘国梁

遵化市小厂乡大块地村：方守义、岳广田、方宝青

遵化市政协办公室：王凤悦、赵建辉

遵化市侯家寨乡前山寨村：李金荣、邵井岐

遵化市团瓢庄乡骆各庄村：骆玉占

遵化市堡子店镇孟家铺村：李春山

遵化市新店子镇康各庄村：孙中印

遵化市新店子镇尖山屯村：陈瑞祥

遵化市崔家庄乡东双城村：马广兴、赵德、马金龙、马春林、马志、马柱

遵化市东旧寨镇大寨村：徐绍庆

遵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李小伶

遵化市公安局：王彪、梁海军

宽城满族自治县老区建设促进委员会：杜青怀

中共宽城满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杨润金

宽城满族自治县地名办公室：刘树

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九虎岭村：甄德贵、王树庭

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张杖子村：刘玉良

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党委政府：赵印锁

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塌山村：张城鑫、张凤林、王胤淋、王士和、王德云、王德彬、王吉满

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西沟村：崔作祥、杨印增

宽城满族自治县塌山乡瀑河口村：任继锋、任克泰

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政府： 胡秋立

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广东山村：金秀贵、金天和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成民、李志砚、刘玉芝

中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杜志成

迁西县汉儿庄乡岔沟村： 王久业

中共青龙满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汤玉胜、肖书静

青龙满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局：张树民、王永涛

中共张家口市委党史研究室：蒋维权

张家口政协文史委：张书平

玉田县政协：宣奇稳

中共天津市蓟县县委党史研究室：高卓越、李海云、郭忠宝、李长林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刚范

河北省人大财经委员会：陆生

河北省政协文史委：石玉新

河北电视台：黄朝耕、陈清华

河北电影制片厂：申晓义、潘胜民、尤博义、张建奎、吴胜霞、史茜

河北科技大学：李建苏

河北省审计厅：张成桥

燕赵都市报：李文合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赵胜军

中共河北省承德市委理论研究室：杨勇

承德市国防教育办公室：康义艳

承德市妇幼保健院： 张民学

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王振兴、邓一民

承德市政协：白春旺、高思文

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白新民、胡宪悦、张书德、张鸿元

承德市民政局：张环

承德市电视台：吴秀云

承德市话剧团：魏定一

承德市农业局：尹忠

承德师专：钱树信

承德市档案局：高俊、刘郁红、陈立影

中侨联半坡文化产业集团：王秀杰

热河民俗博物馆：柴胜亮

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寿王坟镇罗圈沟村：张素敏、禹桂娥、李瑞言、孙守合、孙守礼、孙守印、孙玉钟

承德市：罗江帆

中共平泉县委党史研究室：徐志友

冀东烈士纪念馆：李秋生、刘胤昌、郝秀丽、刘守荣、张艳明、刘丽梅、张玉江

唐山市标准件厂：陈振民

唐山市：郭瑞萍、孙团营

张家口水母宫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荣惟木、李仲鸣

中影集团公司：张延继

北京团结出版社：张宏儒

总政金沟河干休所：张传瑞

北京市通县档案局

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庞宝忠

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善本室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工厂：于允贤

北京市：李运昌、刘树屏、单志华、单健

沈阳詹氏历史资料图片收藏馆（筹）：詹洪阁

沈阳市：杨光

南京电影制片厂：张小兵

深圳市千秋家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朱金城

福建省体委：何方生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熊宗仁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东北沦陷史总编室：李茂杰

伪满皇宫博物院：赵继敏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县志办公室：侯俊良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政协：马瑞林

除以上这些人士外，尚有一部分人员因种种原因未能记下他们的名字，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谢意。

调查、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的父亲翟士和、母亲彭桂兰给了我非常多的关心，我的妹妹翟丽红、翟丽淑，妹夫王岭、关泽民为我承担了很多照顾父母的责任，在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感谢我的初中老师杨守荣，三十多年如一日关心我的成长。遗憾的是，我尚未能报答她，她便于2009年离开人世。在我编写本书的后期，遭遇情绪极度低落时，她托梦鼓励我“一往无前！奋勇向前！”，使我振作起精神，终于完成本书的编写工作。除献给以孙永勤为首的抗日救国军英雄们、张纯如外，本书亦献于她的灵前。

由于我本人学识有限，加之本书涉及人物、事件众多，受主客观条件制约，无法对全部事情一一进行核对，本书中一定会有不少的错误存在。本着对历史，特别是历史中的人物负责的精神，欢迎读者不客气地指出，以便将来有机会再版本书时予以改正。在此先向各位读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的通信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槐中路228号

河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室

翟丽芳

邮编：050021

E-mail：tangdongjiebu@sohu.com

参考书目

一、回忆录

翟丽芳编：《孙永勤与抗日救国军口述及研究资料集》

二、报纸

天津《大公报》

天津《益世报》

《申报》

《新闻报》

《大同报》

《盛京时报》

《救国报》（抄件）

三、刊物

《火线》，第四十二期（抄件）。

承德地区文联编：《燕山》，1981年第2期。

《中国科学探险：北洋水师120周年祭》，2008年10月号。

四、图书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7月第1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热河失陷目击记》，中外出版公司，民国22年5月初版

和瑛编：《热河志略》，嘉庆二十年印行

洪涛编译：《热河概况》，内外通讯社，民国23年印行

王亚编：《东北抗日烈士传》，大连大众书店，1935年印行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2：华北事变》，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1版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4：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年4月第1版

熊沛彪：《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新华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邓一民主编：《日本鸦片侵华资料集（1895~1945）》，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2002年8月印行

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11月印行

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1版

《日本四书》，线装书局，2008年11月第1版

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松本草平：《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方军：《我认识的鬼子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12月第1版

方军：《最后一批人（一）》，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1月第1版

俞天任：《军国的幕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4月第1版

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

王彩梅：《燕国简史》，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邓辉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第1版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全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王光远编著：《蒋介石在台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熊宗仁：《何应钦——漩涡中的历史（上、下）》，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抗日同盟军专辑），1991年3月

中共张家口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一集）》，1986年10月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王晓荣：《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张传瑞编著：《于学忠将军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李运昌》画册编写组编辑：《李运昌》，2002年12月第1版

项秀文主编：《雷烨纪念集》，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杭州市新四军研究会、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共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辑出版，2005年印行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稿（1919~1956）》，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邓一民主编：《热河革命史大事记（1919~1955）》，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东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编：《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中共蓟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著：《天津党史资料丛刊：蓟县革命史（1927~1949）》，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5年8月第1版

承德县革命斗争史编委会编：《承德县革命斗争史》，2005年2月第1版

遵化县政协编：《遵化史话（第二、三、四、五辑）》

中共遵化县委党史资料办公室编：《遵化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一）》，1985年8月印行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遵化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之二：遵化革命人物》，1992年12月印行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让历史告诉未来——遵化市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史料专辑》，2005年9月印行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围场文史资料第七辑：围场剿匪斗争》，1998年12月印行

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古北口镇人民政府编：《古北口抗战文集——纪念长城抗战七十周年》，2003年印行

密云县政协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1990年3月第1版

密云县政协编：《文史资料选编（第六辑）》，1999年9月第1版

白天编：《古北口的“圆明园”》

白天：《古北口往事再续》，中国展望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编著：《雄关御道古北口》，文物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古北口镇人民政府、密云县史志办编：《古北口旧影遗珍》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编辑组编：《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清东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海河志编纂委员会编：《滦河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兴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兴隆县志》，新华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遵化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遵化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承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承德县志》，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宽城县地名办公室编：《宽城县地名资料汇编》，1983年5月印行

